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

文 物 出 版 社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

(DB97/12)



中 国 考 古 学 会 编
文 物 出 版 社
北 京



1142424

封面设计：阚文青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3

ISBN7-5010-0159-6/K·58

统一书号：11068·1584 定价：3.50元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52

目录

考古学研究

1 旧石器时代考古　张森水
11 新石器时代考古　谢端琚
27 夏商周时期考古　李伯谦
44 秦汉考古　叶小燕
56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　段鹏琦

考古文物新发现

北京市

80 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81 房山县琉璃河西周墓
81 延庆县葫芦沟山戎墓地
82 海淀区太平路唐代墓葬

天津市

83 静海县东滩头汉墓
84 蓟县逯庄子乡东汉墓葬
84 蓟县明代长城
85 天津市区出土大批清代铁钱

河北省

86 武安县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86 涞水、易县新石器时代至西周遗

址
87 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
89 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灵寿城址
89 阳原县汉墓
90 临漳县曹魏北朝邺城遗址
90 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
91 明蓟镇边长城的考察

山西省

92 襄汾县柴寺村细石器地点
93 榆社县赵王村细石器地点
93 侯马市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
94 垣曲县古城东关新石器时代及东周遗址
94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前期城址
95 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
96 侯马上马村两周墓地
97 侯马呈王东周古城遗址
97 侯马东周祭祀遗址
98 原平县刘庄东周墓
98 朔县赵什八庄一号汉墓
98 朔县东汉彩绘骨尺

内蒙古自治区

99 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
99 包头市西园新石器时代遗址
101 察右前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墓地
102 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
102 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
103 达茂旗明水金、元墓地

辽宁省

104 绥中市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105 东辽县石驿乡汉代透雕铜牌
105 抚顺市高尔山城

吉林省

106 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
106 农安县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08 柳河县大通沟乡新石器时代遗址
108 镇赉县向阳南岗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文化遗址
109 珲春县新兴洞青铜时代墓葬
110 镇赉县黄家围子青铜文化及金代遗址
111 集安县禹山高句丽墓葬
111 集安县通沟河口辽、金遗址
112 延边地区东夏边墙
112 农安县镇金代窖藏
113 珲春县黄家店元、明墓葬

黑龙江省

114 亚布力镇北沙场新石器时代遗址
114 泰来县战斗青铜时代墓葬
115 讷河县二克浅古代少数民族墓群
115 黑河市卡伦山辽代女真墓葬

上海市

116 青浦县金山坟新石器时代至南宋遗址

江苏省

117 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遗址
117 连云港市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18 沙洲县徐湾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119 常州市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120 丹徒县东烟墩山西周墓
120 镇江市谏壁王家山东周青铜器墓
121 苏州新庄东周遗址
121 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
122 仪征县烟袋山西汉墓
123 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
124 武进县湖塘乡南朝隋朝墓葬

浙江省

124 余杭县良渚荀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25 嘉善县大往新石器时代遗址
125 绍兴县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26 温州东瓯窑遗址

126 绍兴市兰亭宋代古道遗迹
127 南宋临安城遗址
127 杭州市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

安徽省

128 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128 肥东县古城吴大墩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
129 岳西县祠堂岗、鼓墩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129 马鞍山市杨坝村商周遗址
130 南陵县千峰山周代土墩墓
130 郎溪县宣郎广茶场西周铜鼎
131 肥西县新仓乡楚铜贝窖藏
131 南陵县、铜陵市春秋至唐宋冶铜遗址
132 当涂县双梅村孙吴地券

福建省

132 平潭县南垅壳丘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133 诏安县腊洲山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133 崇安汉代城址
133 福州市古城村汉代古城址
134 建阳县将口唐代龙窑址

山东省

134 广饶县付家、五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墓地
135 章丘县邢亭山大汶口文化至商代遗址
136 章丘县乐盘大汶口文化至商代遗址
136 昌乐县邹家庄大汶口文化至商周遗址
137 邹平县厂宫村大汶口文化至汉代遗址
137 泗水县尹家城龙山文化至汉代遗址
137 滕县前掌大村商代墓葬
139 长岛县王沟东周墓地
139 淄博市齐鲁石化乙烯厂东周墓
140 临淄、益都县稷山西汉墓
140 淄博市辛店西汉墓
140 蓬莱县小迟家村西汉墓
141 诸城县杨家庄子西汉墓
141 淄博市齐鲁石化乙烯厂东汉砖室墓
141 枣庄市渴口汉墓
142 宁阳县西太平村唐宋瓷窑遗址
142 滕县薛国故城内发现一座小城

河南省

143 临汝县槐树阴裴李岗文化遗址
143 临汝县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144 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
145 济源县苗店龙山文化遗址
145 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及汉墓
146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
147 渑池县郑窑二里头文化遗址
148 偃师县尸乡沟商城遗址
149 安阳大司空村、花园村、刘家庄等地殷代墓葬
150 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
151 上蔡县砖瓦厂战国墓
152 宜阳县牌窑村西汉彩绘空心砖墓
152 洛阳汉魏故城
153 偃师县杏园村汉唐墓地

江西省

154 九江县神墩新石器时代与商周遗址
155 宜丰县牛形山商代铜铙
156 遂川县洪门村商代青铜卣
156 高安县郭家山战国墓葬
156 南昌市进贤仓唐代城墙墓
157 赣州市七里镇古窑址

湖北省

157 宜昌县白庙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158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商代遗址
159 宜昌乔麦岭新石器时代及商时期遗址
160 秭归县中堡岛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
161 宜昌县三斗坪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161 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及东周遗址
163 宜昌县杨家嘴早商遗址
164 盘龙城李家咀商代遗址
164 宜昌县周家湾周代遗址
165 秭归县怀抱石村的三件编钟
165 随州市安居砖瓦厂东周墓群
165 阳新县港下东周古矿冶遗址
166 郧县砖瓦厂东汉墓
167 郧县砖瓦厂唐墓
168 汉川县马口镇明墓
169 黄梅县西池和孔垅明墓

湖南省

170 临澧县六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
170 武岗县四季岩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171 长沙县大塘新石器时代遗址
171 衡阳市杏花村商代提梁卣
172 浏阳县柏嘉镇商代铜铙
172 邵东县民安村商代铜镈
172 衡阳县新平村商代遗址
173 株洲县油圳村西周铜铙
173 安乡县黄山头周代遗址
173 益阳陆贾山东周墓群
174 澧县新洲一号战国墓
175 桃源县三元村战国楚墓
175 湘乡县城关长桥战国墓群
176 长沙市留芳岭战国木椁墓
176 临澧县姑儿山战国墓群
177 攸县网岭镇东周、两汉墓葬
177 耒阳县城关战国至宋代墓葬
179 郴州市战国至隋代墓葬
179 长沙市左家塘东汉墓
179 衡阳县爱国村东汉古墓
180 永州市三座汉墓
180 衡阳县古重安城遗址
181 郴州市文化路唐代水井
181 衡阳县新圹宋、元、明窑址
182 沅陵县双桥元代夫妇合葬墓
182 衡南县石塘湾元代银器
183 邵阳市汤家山明墓

广东省

183 南海县西樵区鲂鱼岗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184 深圳市新石器时代遗址
184 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新石器时代及宋代遗址
185 曲江县石峡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
186 博罗县春秋时期编钟
186 广州市西汉墓
186 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
187 梅县市水车晚唐窑址
187 梅县市瑶上南宋窑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8 靖西县宾山南洞人类化石
189 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189 崇左县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190 合浦县廉州炮竹厂西汉晚期墓
190 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
191 全州县大毕头村唐代赵司仓墓
192 平果县红岩山崖洞葬

四川省

192 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
193 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
194 成都市西郊新一村隋末唐初窑址
194 宝兴县陇东石棺葬
195 邛崃县"邛窑"遗址
196 邛崃县文笔村北宋墓葬
196 重庆市小湾、桃子林宋代窑址
196 安县宋代骨灰盒丛葬墓
197 大足县红旗村两件宋代变色碗
197 西昌市北山宋代火葬墓
198 珙县麻塘坝"僰人悬棺"

贵州省

199 毕节县老鸦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199 毕节县海子街大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200 安龙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201 兴义县张口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云南省

202 永仁县维的新石器时代石棺墓地
203 广南县平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203 西畴县狮子山洞穴崖画
204 弥勒县金子洞坡崖画
205 碧江县大凹子崖画

西藏自治区

205 穷结县邦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206 扎囊县加日村吐蕃时期墓群
207 扎囊县斯孔村吐蕃时期墓葬
208 穷结县吐蕃时期墓葬
208 穷结县医院赤松德赞记功碑碑座
209 扎囊县城扎塘寺
210 札达县古格王国遗址
211 札达县多香村古格王朝城堡遗址
212 札达县古格王国托林寺
213 普兰县古格王国科迦寺
214 日土县三处岩画
215 扎囊县朗赛林封建领主庄园

陕西省

216 汉中龙岗寺旧石器文化地层
217 大荔旧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早期遗址
217 扶风县案板新石器时代遗址
218 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
219 宝鸡市石咀头东区龙山文化遗址
220 宝鸡市石咀头西区新石器时代至秦遗址
221 华县南沙村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222 长武县碾子坡仰韶文化及先周遗址
222 长安县沣西张家坡井叔墓地
223 凤翔秦公大墓
224 汉长安城
225 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
226 商县张嘴头村西汉墓
226 耀县草滩汉代大型铁釜
226 耀县药王山隋墓
227 临潼县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
228 淳化县唐代石窟
228 西安唐长安西明寺遗址
229 铜川黄堡耀州窑址
230 宝鸡市宋代古钱

甘肃省

230 天水市师赵村半坡类型大房屋
231 庆阳县疙瘩渠新石器时代遗址
232 武威市五坝山古代墓群
232 敦煌祁家湾汉至唐代墓群
233 武威市九墩乡汉与明代长城及其烽燧遗址
234 武威市旱滩坡西晋、前凉时期墓群

青海省

234 西宁青海砖瓦厂汉代墓葬
235 都兰县吐蕃祭祀遗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

235 海原县菜园新石器时代墓地
236 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墓群
236 盐池县张家场汉墓
237 海原县胡湾汉墓
238 盐池县窨子梁唐墓
238 灵武县磁窑堡西夏窑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39 轮台县群巴克两汉时期墓群
240 温宿县包孜东突厥墓葬群

台湾省

241 苗栗县新发现十二处史前文化遗址
241 屏东县南和村石棺群
241 澎湖白沙岛南宋汉人房基
242 台南县北门乡铜鼓

文物工作 展览 学术会议

文物工作

243 文化部文物局召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座谈会

国内展览

243 安徽省文物普查暨珍品展览
243 镇江文物精华展览
244 中日货币展览
244 陕北东汉画像石刻艺术拓本首次在西安展出
244 江苏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
245 澎湖县出土宋元陶瓷片展览

国外展览

245 中国历代陶瓷展在日本闭幕
245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在挪威、奥地利、英国和美国展出
245 中国湖南省出土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
246 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展览在

香港闭幕
246 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在欧洲展出
246 紫禁城宫廷艺术展览在日本四城市展出
247 紫禁城文物展览在美国展出
247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及湖南省历代珍品展览在香港开幕
247 中国江西宋元明清瓷器珍品展览在罗马尼亚展出
2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
247 中国敦煌展在日本展出
247 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在香港展出
248 广东晋至唐文物在香港展出

学术会议

248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250 内蒙古自治区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
250 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学术讨论会
251 北方五省区辽、西夏、金、元货币学术讨论会
251 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
251 金牛山人类化石鉴定会
252 内蒙古考古学会召开鲜卑考古研究会
252 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
252 故宫博物院举行六十周年院庆
253 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
253 晋文化研究座谈会
253 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254 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
254 南阳汉画馆建馆五十周年和鲁迅搜集南阳汉画拓片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254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5 年年会
255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255 山东省考古学会理事扩大会议
255 安徽省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其他

2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

对外学术交流

257 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好太王碑专题讨论会在东京举行
257 庄敏等考察印度文物和博物馆工作
257 日本田边昭三等来我国访问
257 刘军出席印度——太平洋史学史协会第十二届大会
258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258 爱尔兰驻华大使沃尔德伦先生及其夫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
258 夏鼐出席英国史前学会年会及该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报告会
258 罗哲文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国际学术讨论会
259 日本考古学者饭岛武次等来我国访问
259 安志敏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出席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259 荷兰教育科学大臣底特曼率领学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59 安志敏去联邦德国访问
260 费斯特为首的奥地利科学院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0 夏鼐出席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年会
260 民主德国文物博物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0 瑞典北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诺埃尔·布罗德本特来我国访问
260 日本出光美术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陶瓷标本
261 坪井清足为团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1 法国人类学专家哥伦拜等来我国参观
261 周保中出席漆器保护研究国际会议
261 汪宁生去联邦德国讲学
261 以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好太王碑学者参观团来我国访问
262 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等来我国访问
262 西谷正为团长的第二次西日本吉林省友好访中团来我国访问
262 岸俊男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中团来我国访问
262 美国考古学家谢瑞尔教授来我国讲学
262 日本考古学者坪井清足等来我国访问
263 朝鲜文物工作者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3 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汉密尔顿·雅姆来我国访问
26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来我

国访问
263 王丹华等考察法国文物保护技术工作
26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J·赫尔曼院士来我国访问
263 捷克斯洛伐克文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3 奎亚松为团长的菲律宾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264 日本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专家护雅夫来我国访问
264 美国人类学硕士哈尔波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关于水下考古的报告
264 安志敏荣获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信院士称号

本年逝世考古学家

265 夏鼐 王仲殊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考古学书目

270 壹 总类
273 贰 田野考古资料
274 叁 考古学分论
276 肆 考古学专论
276 一 甲骨卜辞与古文字研究
276 二 商周铜器及铭文
278 三 碑刻
279 四 简牍、文书、帛书
280 五 其他
281 伍 美术考古
281 一 通论
281 二 古代雕塑与佛教美术
283 三 古代建筑
286 四 陶瓷与窑址

288 五 古代绘画
289 六 古代书法
289 七 古代工艺美术
290 陆 古代科学技术
291 柒 古代文化生活
291 捌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294 玖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

295 壹 总类
295 一 通论
296 二 考古学史与考古学家传记
297 三 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
298 四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
299 贰 考古学分论
299 一 人类起源问题与旧石器时代
300 二 新石器时代
300 综论
301 黄河流域
302 长江流域
302 华南地区
303 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303 三 夏文化探索
304 四 商代
305 五 西周
305 六 东周
306 七 秦代
307 八 两汉
308 九 魏晋南北朝
309 一〇 隋唐五代
309 一一 宋辽金元明
310 一二 其他
310 叁 考古学专论
310 一 甲骨文研究
311 二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313 附：其他古文字研究
313 三 简牍、写本与帛书
314 四 碑刻
316 五 玺印
318 六 钱币
320 七 铜镜
321 八 铜鼓
321 九 玉器
321 一〇 其他
322 肆 田野考古资料
322 一 综论
322 二 北京
322 三 天津
322 四 上海
322 五 河北
323 六 山东
325 七 河南
327 八 山西
327 九 内蒙古
328 一〇 陕西
330 一一 甘肃
330 一二 青海
331 一三 宁夏
331 一四 新疆
331 一五 辽宁
332 一六 吉林
333 一七 黑龙江
333 一八 江苏
334 一九 安徽
334 二〇 浙江

334 二一 江西
335 二二 福建
335 二三 湖北
336 二四 湖南
337 二五 四川
338 二六 贵州
338 二七 云南
338 二八 广西
338 二九 广东
339 三〇 西藏
339 伍 美术考古
339 一 雕塑
340 二 画像石(砖)
341 三 陵墓雕刻
341 四 造像
342 五 石窟寺艺术
342 六 古代建筑
343 七 陶瓷器与窑址
343 论述
344 窑址调查发掘
344 窖藏及墓葬瓷器
345 藏品介绍
346 八 绘画
346 九 古代工艺美术
347 一〇 法帖与书法
347 陆 古代科学技术
347 一 农业
348 二 饲养业
348 三 水利
348 四 交通
348 五 天文、历算
348 六 化学
349 七 纺织
349 八 矿冶
350 九 其他
350 柒 古代文化生活
351 捌 宗教遗迹与遗物
352 玖 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与民族志
353 拾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354 拾壹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355 拾贰 书刊评介
355 拾叁 外国考古概况
356 拾肆 学术消息

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

357 一 金文
357 殷代
359 西周和春秋
361 战国
362 秦
362 汉
363 三国
364 宋
364 辽
364 元
364 明
365 清
365 二 玺印
365 战国
365 秦
365 汉至魏晋

367　　六朝
367　　宋辽金
369　　元明清
370 三 墓志（附一：墓石刻铭　附二：买地券）
370　　南北朝
371　　隋唐五代
373　　宋
374　　元明清
376 四 碑刻（附一：造像刻铭）
380 五 有铭砖
381 六 瓦当和瓦削文字
382 七 陶器文字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52

考 古 学 研 究

旧石器时代考古

张森水

1985年发表文章三十六篇，专著两种，其中属于理论性、综合性和区域性综述的九篇，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十五篇，专著两种，中期二篇，晚期九篇和书评一篇。新发表的材料出自河北、山西、辽宁、山东、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和青海等九省区；多数为零星的采集品，少数发掘地点出土物则相当丰富。依以上统计，这一年旧石器考古的进展不太大，文章数量不如过去两年，研究工作很不平衡，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没有发表新材料；在时间上，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新材料，寥若晨星，新技术的应用几无成果。

一 理论性、综合性和区域性的旧石器文化研究成果

这部分涉及问题较多，如关于木器时代问题（《北方论丛》3期，《陕西师大学报》1期），原始思维的进化（《齐鲁学刊》6期》），两广在我国旧石器发展中的地位（《历史知识》2期，《史前研究》4期），遗址含义及分类（《山西大学学报》2期）以及我国在旧大陆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讨论热烈，思想活跃，各抒己见，间有新意。

我国旧石器文化在旧大陆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 P.）先提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停滞的和落后的”论点（德日进，1941），继而提出“与早已热气腾腾的西方相反，在迅速前进的人类世界中，东亚的早更新世，由于其处于边缘的地理位置，似乎代表一个静止而保守的角落”（德日进，1943）。在西方考古学界，赞同此说者颇多。有人依我国发现的古猿类及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与上述见解迥然相异的看法。潘利等指出“我们可

以看到自上新世（现改为中新世晚期——笔者）禄丰腊玛古猿以来，一直到距今三至二万年左右的人种形成阶段，中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处在最基层的位置上。她象一个巨大的母体孕育着整个太平洋地区最古老的人类和文化的基因。她对整个太平洋区域文明进入全新世以后，向更复杂的人种间的基因交流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史前研究》3期)。

戴尔俭则从砍砸器和手斧在类型学上的关系及两类工具的地理分布和历史等方面，探讨了亚洲大陆在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指出，手斧是从砍砸器中派生出来的，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局限，而砍砸器几乎占有整个旧石器时代和地球上"古人类所占领过的所有地区"。"砍砸器应是旧大陆旧石器文化的主流和根源，亚洲南部和非洲都有可能是源头。"他还指出，手斧工业则是支流，"只不过是砍砸器工业系统分化出来的一个特化的旁支"(《人类学学报》4卷3期)。

我国第一本《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出版(英文本，美国学术院出版社出版)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件喜事，对国际学术交流会起促进作用，也是国内从事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学研究的必要参考书。本书由吴汝康和J·奥尔森（John W. Olsen）主编，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家吴汝康、贾兰坡、吴新智、邱中郎和韩德芬等十七位同志参加撰写。全书共分十五章，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古猿类、人类化石、旧石器文化、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年代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本书特点之一是系统地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例如，在系统记录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主要研究成果外，又有文化传统和中国细石器工业等专题，古人类学方面大体也是如此。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虽自成章节，但与其他各章有机地联系成一体。

二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成果较丰硕。这一时期可再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后期属中更新世。

(一)前期

前期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发表了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地点(N. 40°13′，E. 114°40′）的资料。此外，对其附近小长梁地点发现的材料进行了再观察(《人类学学报》4卷4期)。

东谷坨地点于1981年进行试掘，于"灰绿色砂质粘土和黄绿色粉砂互层"中，发现了一千

多件石器，一些打击过的碎骨和哺乳动物化石。在已发现的石器中，石核占10.5%，石片占58.2%，工具占31.3%。

其石器组群的特点是：(1)打片基本上用锤击法，偶尔用砸击法；(2)在用锤击法打片时，常用转向打法，双台面和多台面石核占石核总数的77.6%；(3)石器基本上是小型的；(4)工具毛胚以片状毛胚为主，占85.2%，块状毛胚者占14.8%；(5)工具类型简单，分三大类：刮削器占86.5%，尖状器占11.5%，砍砸器约占2%；(6)工具的修理比较细致，且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具有细石器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的某些风貌"(《人类学学报》4卷4期)。

原作者依附近的古地磁测定的年代和地层对比，认为将东谷坨旧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置于早更新世末期较为合宜"。引人注目的是与石器一起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计有中华鼢鼠(*Myosphalax cf. fontanieri*)狼(*Canis* sp.)、熊(?)(? *Ursus* sp.)、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 sp.)、齿脊频率为7—8、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是接近E. przewalskyi的E. sanmeniensi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野牛(*Bison* sp.)(依臼齿形态和嚼面上珐琅质光滑、无褶曲等特点，原作者认为与原始牛(*Bos primigenius*)"有些相象")、羚羊(*Gazella* sp.)等(《人类学学报》4卷3期)。

据上述化石名单，既没有早更新世有代表性种属，也没有见到中更新世的典型动物，却具有较清楚的黄土期动物群的性质。若从动物群对比，与许家窑地点动物群接近或稍年轻，因之，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个地点时代的古老性。依动物群，把它归于许家窑文化，不是没有考虑余地的。

元谋猿人地点的年代问题，自刘东生等提出"可能为距今50—60万年或更晚一些"的看法(《人类学学报》2卷1期)后，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钱方撰文提出商榷。他重新核对了有关资料、考察了地层，再次对元谋组第四段的古地磁年代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元谋人化石产于元谋组的第四段25层中。地层层次清晰，没有紊乱，磁性地层重新研究，得出第四段的磁极性相当于松山反向期中的奥都维事件附近，元谋人的年代仍为距今170万年左右。"(《人类学学报》4卷4期)。

(二)后期

后期发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均比前期丰富，其中以辽宁营口金牛山A点发现的材料比较重要。上述材料发现于1984年。

当年发掘分四个探坑：西南为T_1、西北为T_2、东南为T_3、东北为T_4，发掘层位为1978年划分的第6层之一部堆积，时代仍依过去的结论："大体上与周口店第1地点中上部地层相当"（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6），即"晚中更新世"。这次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早期智人化石（原报告称"猿人"，经鉴定，属于"早期智人"。——笔者）、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

人化石，除一件脊椎骨和指骨发现于T_2和T_3外，其余均发现于T_1的1.6平方米的范围内，包括保存较好的头骨一个（缺下颌骨，面骨和颅底基本保存完好，上颌齿弓完整，牙齿原位，但左P^2缺失），脊椎骨五个，肋骨二根，左尺骨一件，左腕骨四件，右腕骨五件，左第二和右第三掌骨各一件、近端指骨四件，中间指骨二件，远端指骨一件，残左髋骨一件，左髌骨一件，左跗骨五件，右跗骨六件，左第一蹠骨一件，残第二蹠骨一件，近端趾骨六件，中间趾骨一件和远端趾骨六件。

全部人化石属于同一个个体。依髋骨大切迹较窄，闭孔呈三角形和髂骨窝较深等性状判断，系男性个体；据头骨缝愈合的情况和第三臼齿刚萌出而基本上未磨耗分析，这个个体当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

早期智人化石，在我国虽已发现过一些材料，但只限于头部骨骼和牙齿，因之，金牛山A点的人化石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他的面骨和颅底保存的情况比大荔人要好，完整的上颌骨和全部体骨则是我国这个阶段人类化石的新资料，有助于了解我国早期智人的形态特征。

此外，在T_2和T_4发现两处灰堆，其一由三个直径为50—60厘米的圆形灰堆连接在一起。在灰堆中发现烧土、炭屑和烧骨。两灰堆之间7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动物碎骨，有些则可见人工敲砸痕迹。

人化石的性质与通常所理解的地层时代的不协调，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与A点地层复杂性有关（《瞭望》1期）；另一是人的体质发展不一定与地质时代保持一致性，即在中更新世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存在平行发展时期，犹如晚莫斯特文化与早奥瑞纳文化同时并存一段时间一样。

新报道的这个时期的旧石器有山西永济介峪口地点找到的十多件标本，发现于汾河第四阶地后缘的"具桔黄色条带的中粒砂层和棕黄色砂质粘土层中"，同层出土的还有三门马和纳玛象等七种化石，时代"应为中更新世"（《人类学学报》，4卷4期）。云南元谋小横山地点采到七件石器，时

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后一阶段”(《史前研究》4期)。

山东省报道了两个地点，其一是日照县秦家官庄，发现二十多件石器，绝大多数采自地表；另一地点是沂水县南洼洞，石器和葛氏斑鹿化石发现于被扰乱的土层中，两地点均被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5、8期)。

依现有材料所确定的这两个地点的年代显然是难以置信的。姑且将秦家官庄地点脱层石器搁置勿论，以个别出自地层的石器言，发现于“粘质砂土”(被认为是离石黄土)之上的砂砾层中，应晚于中更新世。即便葛氏斑鹿与石器属同一层位，也难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因为晚更新世不乏发现葛氏斑鹿的记录。笔者认为，以暂将它们归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为宜。

和县猿人地点的古气候的研究，依孢粉和依哺乳动物化石，所得结论略有不同(《百科知识》10期)。陨西猿人地点从碎骨中找出五件标本，被认为“是陨西猿人有意为之，即为制造骨器而敲打的，只不过尚未制成而已”(《考古与文物》1期)。从插图看，仍难排除敲骨吸髓之嫌，因为基本上是由外向里打的。至于肋骨质脆易碎，更难作工具之用。

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研究有新的成果问世，出版了《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下简称《综合研究》)和《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下简称《石器研究》)两本专著(北京猿人和中国猿人系异名同“人”，均指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

《综合研究》共收论文十七篇，是从1977年以来对周口店第一地点进行多学科研究的结集。在地层研究方面，采用了生物地层学和气候地层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周口店地区晚新生界地层进行了划分，将上新统划分成上下两部。更新统的研究则以“猿人洞”为重点，将在遗址内挖的探井地层编为第14—17层，将第16和第17层定为下更新统，其年代可能大于100万年；将第14层(原称“底砾石层”)及第15层定为中下更新统，称“龙骨山组”，其年代为70万年以前；1—13层仍称“周口店组”，其年代为23—70万年(《综合研究》，iv)

从地层构造、岩性、岩溶洞穴发育特征及洞穴堆积物的沉积学特征和洞穴充填等方面的研究，弄清了猿人洞及其附近岩溶发育的地区条件、时代和类型及其发育过程，分析论证了猿人洞的充填过程和周口河的关系及对猿人活动的影响，探讨了猿人洞穴的发育阶段，形象地绘制了猿人洞的演化史。

通过孢粉、古土壤、沉积环境（沉积物的结构、构造、沉积物的理化特征和洞穴角砾风化度）等研究，对周口店地区猿人生活时期的“总的古气候状况及气候序列的演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周口店地区“中更新世以后，已具备了东亚季风区的特点，干凉与湿暖交替”。但对周口店第一地点各层的气候的解释，则不一致。

《综合研究》也收集了对中国猿人自身及其行为研究的新成果，如将中国猿人脑量范围改为1015—1225毫升，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中国猿人的脑量，最初以五个头骨求出平均值为1043毫升，1966年新发现一头骨，则以六个头骨计，脑量平均值为1059毫升。新的研究认为，Ⅲ号头骨是8—9岁的幼童，不宜加入成年人脑量计算之中，以五个成年人的脑量来计算平均值，即得出平均脑量1088毫升的结论。同时还指出：魏敦瑞根据股骨所得出的北京猿人身高：男性156、女性144厘米的数值，“显然是偏低的”(《综合研究》91页)。

通过对大型哺乳动物的分析，探讨了它们与中国猿人的关系及中国猿人的狩猎行为。原研究者指出：北京猿人并不是第一地点洞穴的唯一的、连续的居住者，穴居的食肉类动物特别是鬣狗也曾以这里作为自己的“家”。“从总的趋势看，在中下部地层堆积期间，洞穴似乎较多地为食肉类动物所占有，而到第四层以上的上部地层堆积期间，食肉类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表明这个洞穴已主要为北京猿人所控制。”(《综合研究》100页)

关于中国猿人狩猎行为，新的研究指出，中国猿人主要是狩取食草动物，特别是肿骨鹿和葛氏斑鹿。但仍须具体分析：在发现食肉类化石集中区，这些食草动物骨骼应是食肉类所掠取遗留的；而在中国猿人居住层中，则可能代表中国猿人的狩猎行为。

《石器研究》一书，为裴文中、张森水合著。该书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猿人石器进行分层的研究，从中概括出它的工业特点，对文化发展趋势和它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石器研究》中列举了中国猿人工业的十五个特点，并指出其中两点最重要，即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存在大量的砸击石片和石核，以及一套砸击工具；工具是用石片做的、且以向背面加工为主的小工具居主要地位。

中国猿人石器新的研究表明，它显示出既具同一性，又有发展性，并大体可分早、中、晚

三期。早期的石器出自第11—第8层，中期的石器出自第7（包括QⅡ）和第6层，晚期的石器出自第5层至顶各层，并列举各期的特点，指出在原料、打片方法、工具毛胚、工具尺寸、工具类型、修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均显示出差异。还据此批评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停滞的和落后的"看法。

《石器研究》将中国猿人石器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石器作了对比，探讨了其在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猿人文化"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以石片做的小工具为主的文化传统的华北代表，在时空上有着广泛联系，在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其影响是相当大的，其在华北比在华南作用更加直接，更加明显，以小的工具和两端石片为纽带，把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环节联接起来"。"中国猿人文化与华南早期旧石器文化属同一文化传统，既有许多相似点，也有若干明显的差异，构成了同一文化传统的不同文化类型"（《石器研究》251页）。

三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本年仅发表了两个地点的、时代尚可研究的零星石器和一篇综合研究的论文。

新报道的材料之一是四家村地点新的采集品。据称，石器出自龙川江第二级阶地粉砂、粘土砾石层中，阶地高出河水面10-30米，"它的时代为晚更新世初期，在旧石器文化分期中应归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研究》4期）。这个地点以前文本亨同志曾工作过，采到一批石器，经他研究，这个地点石器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晚"（《古人类论文集》1978）。

四家村新采集品中有六件标本，其一是多面体石核，系用锤击法打片，其余五件是小砾石两面加工的刮削器、小砾石复向加工的刮削器、两端石片单面加工精致的缓弧形凸刃刮削器，刃缘匀称，复向加工的双直刃刮削器和左侧被加工成凹刃的平端刃刮削器。

1984年8月，在清理马坝人洞堆积土中，发现了两件石器，均为砍砸器。其一长17、宽8.5、厚5厘米，刃口长13.5厘米；另一呈扁圆形，直径9.5厘米，刃口长5.5厘米。与石器一起采自黄色粘土堆积的有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和中国犀（*Rhinoceros sinesis*）等十二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化石的组合与1958年马坝人化石层中出土的动物群的成份基本一致。"这次新的发现，就填补了马坝人石器文化的空白，同时也填补了广东旧

石器文化的空白。"(《人类学学报》4卷2期)

我国北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自1920年有记录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张森水《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初探》一文简略地回顾了研究史，记述了已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文化的一般性质，讨论了文化类型和其渊源关系，初步排出了这个阶段主要遗址的年代序列。

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发现于东经107°29′—119°50′北纬34°52′-41°15′的广大地区，已有四十多个地点。在这些地点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相当丰富的用火遗迹，约三十件人化石和大量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这个时期文化的一般性质与其前期大体相仿，差别最明显的是砸击技术极度衰落和石球的作用有较明显的上升。

这个时期的文化清楚地存在两个类型，即周口店第15地点——许家窑地点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类型和丁村地点群的以大石器为主的文化类型。以往归于丁村文化中的交城和曲沃等地点的石器，其性质介乎两者之间，称"非典型的丁村文化"。"典型丁村文化"与中国猿人早期文化以及匼河石器的类型和测量值的对比，"典型丁村文化与中国猿人早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至于非典型丁村文化很可能是在丁村文化衰落中，受到强大的、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文化类型"(《史前研究》1期)。

四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发表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新资料，大体有四种情况：(1)人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一起出土；(2)只发现石器或石器与哺乳动物化石一起；(3)人化石、石器、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共出；(4)石、骨、角器、装饰品、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共存。

(一)新报道的人化石有两处，一是在广西田东县祥周公社定模洞，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一起，发现了一枚人的右上第一或第二臼齿，齿冠近中远中径为10.3毫米，颊舌径为11.0毫米，"此牙性质与现代人者相同"；另一是在云南昭通新田公社唐房大队的一洞穴内已胶结的黄褐色砂质粘土层中，发现一枚左下第二臼齿，并发现剑齿象(Stegodon sp)等五种化石。化石人牙"具有较多的接近现代人的进步特征，应属于智人的牙齿"(《人类学学报》4卷2期)。

(二)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的有山西榆次贾鱼沟地点，在棕黄色及薄层紫红色粘土层中发现了

六件石核、三十一件石片和六件刮削器及一些用火遗迹，"初步认为产出石器的地层为更新世晚期之末，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的后一阶段"；辽宁大连古龙山洞穴中，与哺乳动物化石一起，发现了一件多面体石核和一件半边石片。该地点的^{14}C年代为 17,160±240 B.P.。文章报道，据对马牙的切片研究，推测马是夏季被猎取的(《史前研究》1期)。

青海省首次发现了有可靠层位的旧石器。它们发现于柴达木盆地中部靠近祁连山脉南坡的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1984 年6月再次工作的结果是，"找到了石器原产于晚更新世湖滨砾石层的直接证据。根据同地区可对比地层的^{14}C年代测定，石器地点的时代大约为距今30000 年"(《人类学学报》4卷1期)。

云南省报道了一些新材料：在路南县原羊角基地点从地层中采到六件石器，另采到脱层石器七十多件；新地点的零星石器采集于昆明野猫洞、安宁县的大天窗洞和呈贡县的三家村，在这三个地点与石器一起还发现少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4卷1期)。

(三)既发现人化石，又找到文化遗物和遗迹的地点只有一处——云南省呈贡县龙潭山二号地点。它位于山的西南坡。石器、人化石、用火遗迹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于第4层，但在第2层也找到石器和化石。因两层所含动物化石种类和沉积物岩性相同，故"把它们看成一个时代的堆积物"。用第4层灰土中采得的炭粒和烧骨做^{14}C年代测定，"距今30500±800 年"。这个地点发现的化石计有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等四种。

人牙系一枚左下第二乳臼齿，属六岁或小于六岁的幼童。依其形态，它与现代人的有不同，与北京猿人的也有差别，但带有早期智人下第二乳臼齿的一些形态特征"。

被记述的石器一百零七件，其中有石核三件、石片五十七件、工具九件，残断片三十八件。这批石器大小中等，用锤击法打片，工具包括刮削器和砍砸器两类。其修整技术，从一件凸刃刮削器来看是相当熟练和高水平的"(《人类学学报》4卷3期)。

小孤山遗址（1983 年的报告，称为仙人洞——笔者）公布的初步研究成果是很重要的。这处遗址位于辽宁省海城县东南30 公里处（北纬 40°35′，东径122°59′），系一洞穴遗址，其中第1至4层（从下而上）均发现石器和化石，第2层曾发现用火遗迹，第3层发现骨、角器。不同

层位的遗物,"可能稍有先后,也可能是同期异相"。同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三十八种,时代总的看来可归于晚更新世",所反映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温和、湿润的"。

文化遗物丰富而多样,石器数以万计,还有角器、骨器和装饰品。

从石器上可以看到,打片用砸击法和锤击法,且以前者为主。工具毛胚主要是石片。工具类型多样,有刮削器、尖状器、短尖石锥、砍砸器、手斧和石球,其修理工作以向背面加工为主,多数显得相当粗糙,少数尖状器修理得较好,可能使用了指垫法。

骨角器五件(文章第7页又作六件):鱼叉一件、骨锥一件和骨针三件。"鱼叉是用鹿角制成的,表面有锯、切、削、刮的痕迹,两侧有倒刺,根部作了一定的修理以便装柄和固定。骨锥是用动物肢骨磨制而成,根部残缺。骨针是用动物肢骨磨制,针眼是用对钻的方法制作。"

穿孔兽牙的装饰品七件。"这些牙齿多为小食肉类犬齿,也有鹿的犬齿。小孔一般位于齿根。先将齿根磨薄,再从两面钻孔。还发现了一件可能用一种较厚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它原先是一个轮廓呈圆形的扁片,中心是一个由两面对钻而成的小孔。在一面的边缘上,有一道道短短的刻沟。它们围绕着中心,呈放射状。刻沟里保留了红色染料。这件器物出土时已缺失了一部分。"(《人类学学报》4卷1期)

小孤山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依新公布的资料及笔者参与该地点试掘材料的整理,它确有特点,工具类型和制造技术远承中国猿人文化,尤其是以砸击法为主要打片方法这一点。与同时代文化相比,它保留了较多的大型工具。骨、角器和装饰品表明它与山顶洞文化的密切关系,它的丰富的石器填补了山顶洞文化之不足。发现石器的洞穴当地叫"仙人洞",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它命名为"仙人洞文化"。它与山顶洞文化可归于同一文化类型,代表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文化变体。

附录:禄丰古猿及其动物群研究

禄丰古猿及其动物群的研究,共发表十篇论文。本年主要研究禄丰古猿牙齿,对一千多枚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牙齿进行概括的形态描述和比较,对它们之间的分类关系和系统地位作了初步的探讨。动物群的[illegible],记述了门类众多的动物,其中大多数是首次记述的。同时还研讨了当地古猿生存时代的古气候和

古环境。

对禄丰古猿牙齿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看法："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牙齿有许多性状是一致的，但在犬齿和下前臼齿的形态上则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可能是两性的差别。它们与现代大猿相比，表现出与猩猩比较相似，而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差别较大，因而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与猩猩有较近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与南方古猿类牙齿相比，禄丰腊玛古猿又显示出较多的相似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和非洲种的性状，而西瓦古猿的犬齿与南方古猿类差别甚大，因此另一种可能性是，禄丰腊玛古猿与西瓦古猿是不同的类型，前者是向南方古猿方向进化的早期人科成员。"(《人类学学报》4卷3期)

由禄丰古猿产地发现的新研究的动物化石包括鱼类化石的鲤属（*Cyprimus* sp.），"由形态特征看，相近于现代广泛分布的鲤(*C.Carpio*)"，并认为，"这一发现为鲤属起源于亚洲提供了化石依据"；龟鳖类化石的古猿闭壳龟(*Cuora pitheca*)；鸟类化石六种，其中有四个新种。(《人类学学报》4卷2期）哺乳类化石，灵长目除禄丰古猿外有二种，其中有一种属新种——厚齿中国兔猴(*Sinoadapis carnosus*)，食虫目十种，翼手目六种，啮齿目二十二种，兔形目一种（以上四目小哺乳动物由原先报道的六种增加至三十八种)，食肉目二十七种（新增加二十个种)，偶蹄目二十二种（新增加十种)。此外，对禄丰古猿产地的地层和地貌也进行了研究(《人类学学报》4卷1期)。

通过禄丰古猿产地不同门类的动物的研究，对当时当地的古气候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该动物群具有与现代热带、亚热带以森林为主的特征"(《人类学学报》4卷1期)。

新石器时代考古

谢端琚

1985年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不仅有新的重要发现，而且在一些课题上又有新的研究成果。这一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与研究文章共有一百五十余篇，其中，约有半数是关于黄

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有关问题的论述，其次是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北方地区与西南地区也有比较重要的新发现。

一 黄河中游地区

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文化类型也较多。1985 年发表的文章，涉及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新发现，主要有临汝县境的纸坊乡中山寨、城北槐树阴、尚庄乡安沟等六处(《中原文物》 4期)。其中，中山寨遗址保存最好，文化遗物亦较丰富。该遗址位在县城东部，遗址面积较大，达十五万平方米。出土物有石铲、石镰、石磨棒和双耳陶壶、深腹罐等陶器。其中，石磨棒多呈不规则椭圆形，器形较小，多经磨制，但较粗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这类文化遗存在豫西地区还是首次发现。因此，它的发现对于探讨该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分布、特征，以及与其它地区同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

对裴李岗文化进行研究的有赵世纲《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 2期) 一文。他根据已发表的五十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分析，把它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为代表的裴李岗类型，多分布在山丘地带；二是漯河翟庄、舞阳贾湖为代表的翟庄类型，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王吉怀的《从裴李岗文化的生产工具看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农业考古》 2期) 中，从裴李岗文化的生产工具分析，说明我国不仅有发达的原始农业，而且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1985年发表的仰韶文化新资料，有河南渑池仰韶村、新乡洛丝潭、河北正定南杨庄，偃师二里头(《考古》 3期)、山西垣曲宋村(《考古》 10 期)、陕西镇安赵湾等多处遗址(《史前研究》4期)。其中，仰韶村、洛丝潭、南杨庄等遗址的发掘资料比较重要。仰韶村遗址从 1921 年发现以来，曾经做过多次调查发掘。1980 年至 1982 年揭露的，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史前研究》 3期)。这是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规模最大、收获较丰富的一次发掘。发现有房屋四座，窖穴四十一个，出土陶器、石器、骨器与蚌器等遗物共六百多件。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进一步弄清楚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并发现有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出土物可分为四期：一期为庙底沟类型，即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二期为西王村类型，即仰韶文化晚期；

三期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四期为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即龙山文化晚期。这就更加澄清了过去因该遗址所造成的混乱。因此，它的发掘为探索以这个典型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有关课题提供了可靠而有价值的资料。洛丝潭遗址是1982年进行发掘的。该遗址以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为主（《考古》2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陶器有明显的地方特点，以素面陶为主，约占全部陶器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为彩陶，绘有红彩或黑彩，花纹有网状纹、竹叶纹、弧形三角纹、平行条纹、“～”形纹与“X”字纹等。器形主要有侈口鼓腹罐、折腹罐、曲腹盆、钦口钵等。由于遗址处于豫中、豫北的交接地带，因此，其文化内涵具有这两地区的因素。南杨庄遗址发现两件陶蚕蛹，呈灰褐色，长2厘米（《史前研究》3期）。同时还发现四片质地硬表面有彩釉的“陶片”，经鉴定，确认其中三片为原始瓷片，另一片为硬陶。作者认为它们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原始瓷器、育蚕织绸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文章发表的不少，主要讨论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源流与社会性质等问题。李仰松的《试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编年与社会性质》（《史前研究》4期）一文，对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提出仰韶文化大体相当于整个原始社会的晚期阶段，其社会组织、婚姻形态，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对偶婚阶段。而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期大体是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晚期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对偶婚阶段”。

关于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与文化渊源等问题的讨论，看法不一。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3期）与《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类型及特征》（《考古与文物》6期）两文，认为一般所谓的“仰韶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支各具特征，渊源不同，并分布在不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遗存。他主张：仰韶文化这个概念，只能包含分布在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河南和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则应另行命名。鉴于西安半坡遗址和郑州大何村遗址发掘面积大，出土物丰富，分布在两个地区最具有代表性，建议把河南的仰韶文化命名为“大何村文化”，把陕西的仰韶文化命名为“半坡文化”。同时，还提出把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分为“点军台类型”与“秦王寨类型”。刘习祥与张新斌合写的《新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考古与文物》6期）一文，提出新乡地区仰韶文化可分

为仰韶早期、仰韶晚期前段、仰韶晚期后段等三期。王志俊《试论姜寨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史前研究》3期)一文提出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为：半坡类型——姜寨二期类型早期——姜寨二期类型晚期——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李友谋的《试论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州学刊》3期)与《东庄村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分析》(《中原文物》4期)两文，对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相互关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认为东庄村遗存是晋南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其年代相当于庙底沟类型早期。西王村晚期的文化面貌与半坡类型晚期的比较接近，但还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李昌韬《试论"秦王寨类型"和"大何村类型"》(《史前研究》3期)中，提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也存在多源问题，决非源于某一文化类型，而是几个文化类型发展到同一阶段的综合产物，其中一部分是正宗，其余的是受其影响而成为庙底沟类型的变异。文启明《略谈河北仰韶文化南阳庄类型》(《考古与文物》4期)，在分析了南阳庄资料后，认为南阳庄类型分布广，文化特征明显，但与磁山文化可找到很多共同点，表明仰韶文化南阳庄类型渊源于磁山文化。

这一年还陆续发表了几篇书评和相互商榷的文章。苏迎堂的《评"宝鸡北首岭"——兼论上层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2期)一文中，对北首岭全部房基和百余座墓葬定为"上层"并称为"半坡晚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报告所选定的晚期墓葬随葬品典型组合中，可清楚地看出大部分晚期墓是属于半坡类型的。晚期地层及房址中所出的一些标本也具有鲜明的半坡类型特征。马洪路《元君庙墓地的分期与布局——〈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中原文物》1期)与伊竺《关于元君庙、史家村仰韶墓地的讨论》(《考古》9期)两文，对《元君庙仰韶墓地》中所分析的墓地布局、分期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异议。张忠培:《答〈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中原文物》4期)一文，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陈铁梅《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考古学中相对年代的研究——兼论渭南史家墓地三种相对年代分期方案的比较》(《史前研究》3期)一文，采用多元分析方法，提出史家墓地相对年代的分期方案。

为了总结交流仰韶文化的研究工作，于1985年11月6—10日在河南渑池县召开第一次全国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就关于仰韶文化的分期、类型、文化渊

源与社会性质等方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对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问题，有人提出仰韶文化晚期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认为仰韶文化的渊源是磁山与裴李岗文化。这次会议无疑有助于仰韶文化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光明日报》1985年11月8日、《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7日)。

龙山文化包括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1985年发表的调查与发掘遗址有山西石楼岔沟、安阳后冈、临潼康家、凤翔大辛村(《考古与文物》1期)、临汝柏树圪垯(《考古》3期)、镇安前湾(《史前研究》4期)、垣曲龙王崖等多处(《考古》10期)。其中，岔沟、后冈、康家等遗址都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均发现了一批较完整的房屋，有助于对这个时期建筑遗存的深入研究。

岔沟遗址位于石楼县城东约4公里。发现保存较好的白灰面房屋十九座(《考古学报》2期)。这一批房屋都建在半山腰上，平面呈凸字形窑洞式建筑，用白灰涂抹居住面与墙壁，室内设有圆形或方形的灶，灶面略高出居住面。有的可复原成穹窿顶的生土洞穴房屋。其文化性质属庙底沟二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300—2500年。安阳后冈遗址发现房屋三十九座，灰坑五十八个，墓葬二十八座(《考古学报》1期)。房屋以圆形的为主，多属地面建筑，墙壁用土坯或木棍中夹黄粘土筑成，地面抹一层白灰面，中间设一圆形灶。墙基外设有散水或堆放石块。有十五座房基下埋有儿童骨架，最多埋四个儿童。这些儿童非正常死亡，应是为建房进行的某种宗教活动的牺牲。康家遗址位于临潼相桥康家东北部。发现白灰面房屋三十余座，灰坑二十一个，陶窑与墓葬各二座(《史前研究》1期)。这些遗迹均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

襄汾陶寺遗址是一处比较完整、规模较大的龙山文化氏族公共墓地。从发掘简报发表后，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李民的《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4期)提出陶寺的考古资料可与传说中尧舜时期的情况进行对照，从地域上看，它与尧舜部落活动的地区一致，从年代上看，若把陶寺遗址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那么尧舜时代与陶寺早期的后一段至陶寺晚期前一段时间大致相当，从社会状况上看，两者也有不少相仿之处，应该说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有其内在的联系。利用考古资料结合古文献研究是值得重视的。

二　黄河上游地区

马家窑文化的田野工作，主要是调查发现了秦安焦家沟、民和杨家泉、肖家和循化审利、西沟坪、苏合扎等二十多处遗址。这些遗址虽属调查资料，但发现的地点与搜集的标本都比较重要，有的属新发现，有的填补了某一地区的空白。如在民和转导马营河两岸发现的杨家泉等遗址，既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而且还发现一种独具特点的古文化遗存(《史前研究》3期)。从杨家泉出土物分析，有些器物如双唇尖底瓶、曲腹盆等与庙底沟类型基本相同，但彩绘花纹又接近于石岭下类型，并有别具一格的灰陶盆等质地坚硬的陶器。从文化内涵分析，把它暂划入马家窑文化早期遗存为宜。在循化县调查中，新发现了西滩、仓库、伊马亥、苹果园、棺尸沟、乙日亥等六处遗址(《考古》7期)。其中西滩遗址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它位于红庄西滩清水河西岸台地上，发现有半山类型的灰层与墓葬等遗迹，这是一处居址与墓葬区兼有，并保存较好的遗址。它的发现为证明半山类型存在聚落遗址提供了又一个实例。

在秦安焦家沟遗址发现一件罕见的马家窑文化人面饰彩陶壶，器高34厘米，小口圆腹平底，彩绘花纹有月牙形纹、网格纹及变形鸟纹，引人注目的是在壶的颈部雕塑出人的耳、鼻、口、眼等人面五官形象，眼睛的睫毛用黑褐彩勾画。在造型艺术上系用了雕塑、绘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堪称陶制艺术佳作(《考古与文物》3期)。

齐家文化的资料仅发表《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1期）一文，杏林遗址位于岷县境内洮河东岸台地上，遗址范围较大，长约150米，宽100米。发现有白灰面房屋和墓葬，出土有石、骨器和陶、铜器等器物，其中，弧刃红铜刀与长方形红铜斧保存完好，实为难得的铜器标本。从陶器的组合与特点看；这个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齐家文化秦魏家类型，同时，还有少量器物属马家窑类型和寺洼文化。

综合研究方面，谢端琚《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1期)，把马家窑文化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并论述了各类型的文化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指出诸类型的相对年代序列，即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蒋书庆的《彩陶锯齿纹试解》(《美术》12期）一文，对锯齿纹的寓意、历史渊源等问题作了分析，

认为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锯齿纹是由半坡类型彩陶上的三角纹经庙底沟的弧形三角纹通过石岭下、马家窑类型演变而来的，并以为其火焰形的形象，是当时人们对火焰强烈崇拜的结果。李最雄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考古》8期）一文，对秦安大地湾遗址F901、F405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做了探讨。首次提出建造房屋地面的材料，系大量应用了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以料姜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制成轻混凝土，厚达15至20厘米。这种轻混凝土经物理力学性能试验，证明它有较高的抗折、抗压强度。并具有良好的防潮性与保温性。这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科学史上的一项发明创造。这种轻混凝土在原始文化居住建筑中的应用，还未曾有过报道，因此，它的发现，无疑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 黄河下游地区

这里介绍的主要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包括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等。1985年山东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资料发表的比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为显著。比较重要的有邹县野店、潍县鲁家口、茌平尚庄、南陈庄、泗水尹家城、日照尧王城、广饶博家、济南大辛庄(《考古》8期)、海阳司马台等遗址的资料(《考古》12期)。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所编著的《邹县野店》(专刊）是继《大汶口》后的又一部比较重要的发掘报告。该书主要介绍1971—1972年发掘的野店遗址的全部资料。作者对该遗址的九十座墓葬材料进行仔细的排比，把大纹口文化分为五期，提出这五期的不同器物组合、特点及演变。鲁家口遗址位于潍县张氏鲁家口村之西南部(《考古学报》3期),共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二座、龙山文化房屋十一座。这是迄今为止，在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房屋较多的一处。房基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地面建筑，墙中立柱，墙壁抹一层羼合礓石粉的泥土,室内面积较小,一般为4—10平方米，房中一般用一根立柱支撑屋顶，门朝南。

茌平尚庄遗址发掘的面积较大，达1125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十七座，龙山文化灰坑一百三十九个，灰沟与房屋各一座(《考古学报》4期)。这是鲁西黄河以北地区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为探讨该地区提供了新的资料。南陈庄遗址发现房屋三座，平面呈方形，出土一批龙山文化晚期的器物。这里是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

1142424

接触地带，因此它是探索两者关系的重要地点(《考古》4期)。

尹家城发现龙山文化墓葬十二座(《考古》7期)，墓内设有二层台，在M4二层台的西南部与西部分别放置陶器三十八件、猪下颌骨六件，这批资料对研究山东龙山文化居民的葬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的土坯砌墙房屋，较为罕见(《史前研究》4期)。房屋呈方形和长方形，地面建筑，土坯采用平铺错缝砌筑法。这种土坯砌墙的房屋在山东龙山文化是首次发现的。该遗址中还出土一些铜渣，再次证明山东龙山文化已使用铜器。

广饶傅家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其独自的特征，以罐形、釜形鼎为主，其次为假圈足碗、圈足豆等，纹饰除镂孔外，彩陶较盛行，为黑、白、赭三种色彩相间施绘。有的器物通体施彩，在鼎、豆等器物的口沿或圈足近底部施一周黑彩，还有少数钵与单把杯系烧好后绘彩的，彩绘作风别具一格(《考古》9期)。砣矶岛大口遗址发现的墓葬与兽坑比较罕见(《考古》12期)，墓葬共二十二座，在人骨架上压有一层马蹄螺、海蛎壳、小石子和石块。兽坑九个，内埋猪、狗等动物，这可能是当时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

专题研究的文章有吴汝祚《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期)，杜在忠《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述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3期)，孙华铎、于之友《山东兖州史前文化遗存概述》(《史前研究》2期)，何德亮、竟放《试论杨家圈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与文物》1期)等。

四　江汉地区

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等。这一年度发表的调查发掘资料有天门潭家岭、大悟吕王城(《江汉考古》3期)、宜都石板巷子(《考古》11期)、华容车轱山(《农业考古》2期)、随州莲花寺、房县翁家店(《江汉考古》4期)等。潭家岭遗址发现一种以红陶系为主的新文化遗存，以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阶段的文化堆积。红陶系遗存位于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的下层，而屈家岭晚期遗存上叠压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这样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同时得到解决。红陶系文化遗存中的圈足盘、彩陶碗、瓶等与大溪文化同类器物相似，可能与大溪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吕王城遗址下层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物颇有特色，对研究鄂东北地

区古文化的内涵，提供一批新资料。

综合研究方面，围绕着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及湖北龙山文化的命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是前后承袭的关系，有的却认为两者不是一个文化系统，分别各有自己的渊源。如卢德佩的《论鄂西大溪文化》(《江汉考古》1期)，向绪成《屈家岭遗址下层及同类遗存文化性质讨论》(《考古》7期)，王杰《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中的问题探讨》(《江汉考古》3期)等，都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湖北龙山文化的命名问题，方酉生的《论湖北龙山文化》(《江汉考古》1期)一文中，提出鉴于湖北龙山文化内涵比较复杂，目前还没有那一个遗址能全面地反映出它的内涵，因此，还是称湖北龙山文化为宜。并认为该文化下限时期较晚，可与二里头类型连接起来。李龙章《浅议石家河文化》(《江汉考古》3期)认为，用“石家河文化”称谓取代以往的叫法，能比较贴切地反映出这类遗存的实际情况。根据地层对应关系的器物群早晚之间的演变及屈家岭文化遗留因素的多寡变化，可分为青龙泉、季家湖、尧家林、石家河四个类型。李文杰与黄素英的《浅说大溪文化陶器的渗碳工艺》(《江汉考古》4期)一文，对大溪文化陶器的渗碳工艺做了模拟试验，对渗碳的原料、方法，及其基本原理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了解当时制陶工艺的有关问题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长江下游地区

在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对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做了较多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发表的资料有丹徒磨盘墩、松江汤庙村、金坛北渚荡(《考古》8期)、丹阳王家山(《考古》5期)、句容城头山(《考古》4期)等。磨盘墩遗址位于镇江市东部地处长江南岸的台地上，遗址中发现有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灰坑与石、陶器等遗物(《史前研究》2期)。其中石制品发现最多，计有五千多件，有石核、石钻、石片、刮削器与石锛、石斧、镰、镞等，以石钻占绝大多数。从石钻头未见使用痕迹与大量的石核、石片、废料等方面分析，可以认为这是一处古代石器制作场。汤庙村遗址在1980—1982年间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比较罕见的水井、墓葬与石、陶器等遗物(《考古》7期)。水井四座，保存较好，略呈直筒形，中腰微鼓，残深2、径0.7米。墓葬四座，皆单人仰身直肢葬。从出土器物分析，文

化性质属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年代经 ^{14}C 测定，距今为4860年。这是一批探索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演变的极好实物资料。

安徽肥西县古埂遗址位于该县上派镇东部，1983年进行发掘，发现有房屋两座，灰坑一座，出土一批陶、石器等遗物（《考古》7期）。按文化内涵可分为古埂早期文化与古埂晚期文化两种。前者以夹砂红陶为主，其次是灰陶，黑陶很少，器形有钵形豆、直壁尊、鸟首耳陶罐等，彩陶的花纹与江苏邳县刘林所出相同。后者即晚期文化，红陶显著减少，黑陶明显增加，器形主要是鼎、杯等，纹饰斜篮纹为主，其次是细绳纹与弦纹等，在鼎的腹部饰有细绳纹，这是安徽地区首次发现的。其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或薛家岗文化四期。

专题研究方面，有何平的《苏南浙北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点和相关问题》（《南开学报》5期）一文，就该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点作一论述。据文化性质与地理特点，把它分为宁绍区、太湖区与宁镇区，阐明各区古文化面貌的异同，并认为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苏南湖北的新石器文化则渐趋统一。吴汝祚《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考古与文物》2期），根据河姆渡与罗家角两遗址出土的稻谷，论证在距今七千年以前，太湖地区以及钱塘江两岸的宁绍地区已经种植了水稻。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5期），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做了分析与归纳。闻惠芬《从考古材料试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与古地理的关系》（《史前研究》4期）中，认为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分布特征和古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新、古陆地时代的先后和陆表面的起伏不平，加之海浸的多次发生，对古文化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影响。

六　华南与东南沿海地区

华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发表的调查与发掘资料较少，而专题研究方面的文章却较多。较引人注目的发掘资料是广东珠海拱北遗址（《考古》8期）。该遗址位于拱北区滨海一带，南部与澳门相连。出土有石斧、锛、环、网坠与陶罐、钵、尊、釜等器物。这个遗址是珠江口西岸发现的最南端的遗址之一，说明我国古代先民的活动范围已达澳门半岛。因此，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探索澳门陆连岛形成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丘立诚的《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史前研究》1期）一文，通过对洞穴出土的

遗物分析比较，归结出：一批打制砾石石器与绳纹陶片共存，是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杨式挺的《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期）中，对西樵山文化的特征、年代、葬俗、经济生活等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西樵山文化因1958年于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首先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的陶器除夹砂陶与泥质陶外，还有几何印纹陶与彩陶，印纹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等，彩陶较为罕见，器形有陶罐、杯、豆、盆与镂孔圈足盘等，陶器的纹饰造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人死后实行瓮棺葬，葬具系两件折肩粗陶瓮相套成，并在陶瓮上刻划符号。人骨从头至下肢有序地叠置于瓮内。这种葬式较为特殊。经济生活以渔猎捕捞业为主，兼营原始农业。上述表明西樵山文化在器物特征、经济类型与葬俗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杨另在《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学术研究》5期）一文，对解放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做一总结。全省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共五、六百处，清理墓葬二百座，窑址二十余座。他把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早、中、晚期，早期主要分布于粤北、粤西的石灰岩洞穴；中期主要分布于韩江、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以贝丘、沙丘遗址居多，也有土墩和山岗遗址；晚期数量多分布广，以山岗、土墩、贝丘、沙丘为主，也有台地和洞穴遗址。并认为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和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是这里划分晚期与中期陶器特征的重要标志。

张之恒写的《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史前研究》4期）与《华南地区的前陶新石器文化》(《考古与文物》4期）两文，分别对华南地区与台湾新石器时代做了较有系统而简要的论述。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分前陶新石器文化和大坌坑文化，按地区分述，则西北部有圆山早期与圆山晚期文化，西海岸中部有牛鼻头文化、营埔文化与大邱园文化，西海岸南部有牛稠子文化与大湖文化，东海岸有麒麟文化与卑南文化等。台湾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类型较多，可在东南沿海地区找到相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台湾早期的新石器文化即大坌坑文化和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有很多相同的特征。台湾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与福建地区的几何印纹陶相似。考古资料有力地说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和祖国大陆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七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首先是西藏自治区

在考古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为了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除《文物》9期特辟为西藏自治区考古资料与论文的专集外，还出版了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专刊——《昌都卡若》。昌都卡若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发现的房屋共二十八座，保存较好，有的还可以复原。各种遗迹或遗物都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年代据^{14}C测定距今为5555—4315年。通过卡若遗址，不但使我们对西藏地区远古居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情况等有所了解，而且为探索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原始氏族的分布、相互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作者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并合理地提出它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拉萨市北郊曲贡村附近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9期)，发现了窖穴、石棺墓与石器、陶器等遗物。石器有双肩石铲、敲砸器、网坠、石磨盘等。陶器中泥质陶与夹砂陶各占半数，还有泥质黑皮陶，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堆纹与三孔形镂孔等。器型只见圜底器与圈足器，不见平底、三足器，以陶罐、碗、钵、豆、壶较为常见。这一批器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又是在拉萨首次发现的，目前又无法归属于现有的某一种文化，因此，作者建议把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原始文化命名为“曲贡文化”。另在乃东县钦巴村遗址清理一个灰坑(《文物》9期)，出土有石锛、石斧与玉锛等遗物。乃东地处雅鲁藏布江及支流雅隆河、温河的河谷地区，这里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是本民族的发祥地。

在云南永仁菜园子与怒江州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出土石器与陶器等器物(《考古》11期)。菜园子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元谋大墩子相似。怒江州发现的双肩石斧、长方形石斧等遗物(《史前研究》4期)，材料较为难得。它的发现填补了从澜沧至雅安之间的考古空白区。还有在镇原岔河乡，秀山彝乡，维西哥登村，鲁甸野石，广南八宝铜木犁洞，沧源丁来等地均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和陶器等遗物(《云南文物》17、18期)。其中鲁甸野石遗址还发现半地穴式房屋、墓葬和单耳陶壶、罐等器物，这是一处较大的聚落遗址(《云南文物》18期)。在《云南文物普查的主要收获》一文(《云南文物》18期)中，对云南文物普查工作进行总结，发现古文化遗址共七百一十七处，古墓葬

七百二十八座。初步弄清新石器时代的诸文化面貌，在云南境内计有：鲁甸马厂文化，晋宁石寨山文化，元谋大墩子文化，宾川白羊村文化，云县忙怀文化，耿马石佛洞文化等。李昆声的《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一文(《史前研究》1期)，认为黄河中、上游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氐族部落，不断由西北通过横断山脉河谷向西南地区迁徙，带来了氐羌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固有文化不断交流融合，产生了云南滇西北、洱海、金沙江中游地区这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

八 北方地区

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主要的收获是，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和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兴隆洼遗址隶属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1983年在该遗址发掘中，发现有七间房址、三座灰坑和一段围沟，出土一批自具特征的石骨器与陶器等遗物(《考古》10期)。陶器均为夹砂灰褐陶或黄褐陶，纹饰多交叉纹、网格纹、席状纹与横排的之字纹，其中多是线形之字纹，纹道深细清晰。器类简单，主要是斜壁敞口筒形罐，其次是曲腹钵等。石器中以双肩石锄最富特色。年代据 ^{14}C 测定为公元前5290年。这一类文化遗存是西辽河流域与内蒙古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它有一定的分布区，又有特征鲜明的器物群，并且也无法划属现在已知的某一文化类型，因此把它称为“兴隆洼文化”是必要的。

沈阳新乐遗址的发现是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突破。1973年曾予发掘，并发表了报告(《考古学报》4期)，这次报道的是1978年发掘的新资料(《考古学报》2期)，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为F_2，居住面达95.5平方米，屋内未设隔墙，出有很多细石器，并有二次加工剥下的小石片，作者推测它是制作细石器的劳动场所。这个遗址的器物有自己的特点，细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陶器以深腹罐与异形罐为典型代表器，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与弦纹为主，是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在辽宁本溪山城庙后山发现三个洞穴遗迹(《考古》6期)，其中有两个洞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洞内发现墓葬二十三座，火葬、仰身葬与二次葬共存，有陶器与猪、鹿下颌骨做为随葬品，陶器以假圈足和圈足器为主，不见三足器，可见这里的葬制及随葬品都有地区特点。在黑龙江街津口地区采集一批细石器、陶器、陶网坠等(《史前研

究》3期),这在赫哲族聚居地还是首次发现，因此，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郭大顺、马沙的《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一文(《考古学报》4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以辽河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的分区、分期、文化关系诸问题。把西辽河、大凌河流域诸文化分为红山、小河沿、富河三个类型，下辽河流域分为新乐文化与偏堡类型，旅大地区包括小珠山（下层)、郭家村下层、郭家村上层、于家下层等类型。还论述了同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该文材料搜集全面，论述条理清楚，对进一步研究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问题是必须参考的。

张泰湘的《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论》一文(《北方文物》2期),对嫩江流域原始文化的划分、分期、族属以及与毗邻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把这个地区的原始文化排出了发展序列，即昂昂溪——小登科——白金宝——官地等。其中,昂昂溪文化的年代最早，距今为6080年，与新开流文化相若。

对内蒙古地区进行综合研究的有马耀圻《内蒙古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6期),崔璇《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年代试探》(《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文物》5期)等。马文对河套文化、札赉诺尔、红山、小河沿、富河、阿善一、二期与大口一、二期文化等诸文化内涵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作了综述，由此可看到内蒙古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崔文依据现有资料，把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排成以下序列：即阿善一期与白泥窑子第一种,阿善二期与白泥窑子第二种,阿善三期与白泥窑子第三种，老虎山早期、老虎山晚期与白泥窑子第四种等。还根据阿善和白泥窑子遗址出土的资料，确定了各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和相对年代。阿善一期为内蒙古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陶器中的小口壶、彩带钵、彩陶盆和弦纹罐等与后岗一期文化接近，约当半坡类型时期。白泥窑子第一类遗存，晚于前者，小口尖底瓶、圜底钵、夹砂罐等，具有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特征。白泥窑子第二遗存，彩陶中常见红黑彩两色相间，并有发达的内彩，还有篮纹尖底瓶、双耳彩陶罐、鸡冠耳夹砂罐等，反映了仰韶晚期的特征。这三类文化遗存基本上与陕、晋、冀地区同时代文化类型无大差别，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九 综合研究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遗址已发表的大约有七千余处，其中，经正式发掘的也有四百处左右，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国，并且文化内涵复杂多样。因此，如何把这众多的古遗址进行归纳研究，就成为考古学界所关心的课题。佟柱臣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考古与文物》2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独自的见解。他把新石器时代分成阴山山脉、秦岭山脉、南岭山脉三个接触地带，这三带山脉都是东西走向的，每条山脉的北侧和南侧，分布着不同的文化，故名为接触地带。在北纬40°—42°之间东西横亘的阴山山脉，是阴山以北狩猎类型诸文化和阴山以南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的接触地带。在北纬30°—34°之间的秦岭山脉以南及其余脉桐柏山脉和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的接触地带。在北纬25°—27°之间的南岭山脉以迄武夷山脉是长江流域诸文化与珠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关于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研究文章较多，曾骐《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综述》一文(《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址和墓葬所出的生产工具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厚重粗犷，多有使用及磨损痕迹，后者扁薄轻巧，精工制作，甚至选用罕见的玉石。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考古》9期)，对石钺的定名、分布、型式、演变及与商周青铜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石钺最初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出现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私有制的出现，很快便成为战争中的武器或礼仪中权杖之物。张寿琪《仰韶文化盘状器用途考》(《农业考古》2期)，对盘状器的用途进行考察，认为盘状器具有多种用途：大型的盘状器做砍砸器；小型有锋刃的做刮拨器；也有做为狩猎“投石”或攻击的武器用。

对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有计宏祥的《从哺乳动物化石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遗址的自然环境》(《史前研究》2期)一文，作者通过哺乳动物化石的分析，阐明新石器时代气候及气候的变迁情况。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同现在不是一样的，在六千年前的气候是处于最温暖的时期，当时南、北方的动物群区别不大。并说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此时已有比较原始的农业，同时饲养家畜与从事渔猎以及采

集等生产活动。

曾骐《我国史前时期的墓葬》一文(《史前研究》2期),对史前时期氏族墓地、墓葬结构、葬式、随葬品与埋葬习俗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归纳,通过近万座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墓葬的特点:如氏族有公共墓地,不同的埋葬形式反映了他们的观念形态;随葬品的多寡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大体说来,新石器早、中期墓葬随葬品差异不大,发展到晚期,大小墓之间随葬品多寡悬殊较大,反映贫富差别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原始社会的墓葬与阶级社会的墓葬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反映血缘关系和比较平等的社会情况,后者则明显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关于^{14}C测定年代方面,有蔡莲珍的《碳十四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一文(《考古》3期),介绍新校正表的制作、特点、使用和它的意义。通过新校正表可将^{14}C年代比较可靠地校正到真实年代。魏京武的《碳—14测定年代与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史前研究》1期)一文,根据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14}C测定的四十五个年代数据,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类型排出以下发展序列:老官台文化北刘下层(距今7300—8000年)——北首岭下层(距今6800—7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6000—6800年)——庙底沟类型(距今5000—6000年)——龙山文化(距今4000—5000年)。

严文明写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3、8期)、《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考古与文物》4期)等文章,对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新石器时代的年代学等一些重要课题做了探索。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研究工作,把建国以来的考古工作分为四个时期:(一)1949—1954年,为准备时期;(二)1955—1965年,较大发展的时期;(三)1966—1976年,基本停滞时期;(四)1977年至今,全面发展时期。现在田野工作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不但黄河流域不断有新的发现,而且其它地区也开展了许多工作。随后,又提出今后需要探索的问题,如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新石器时代如何向青铜器时代过渡、考古学文化同经济类型以及居民族属的关系等等。

夏商周时期考古

李伯谦

1985年夏商周考古研究十分活跃。据初步统计，出版有关专著和论文集七、八种，发表考古资料和研究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召开了多种学术会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有新的进展。

一　夏代

夏代是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夏文化探索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为推动夏文化的讨论，郑杰祥选编出版了《夏文化论文选集》。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将半个世纪以来探索夏文化的有关论著归纳为十种意见，指出当前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方面。关于夏文化和夏、商文化分界问题，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殷墟上溯二里头，简明扼要地勾画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但“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李先登《偃师尸乡沟商城与登封王城岗》(《史学月刊》3期)同意安金槐提出的王城岗城堡禹都阳城说，认为王城岗一至七期（一——五期属龙山阶段，六、七期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代表了当地夏代时期物质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亦即夏文化。”新出版的杨育彬《河南考古》夏商一章，除对王城岗城堡是否禹都阳城未表示明确意见，其他观点基本相同，都坚持夏、商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赵芝荃原来也曾主张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二、三期是夏、商分界。尸乡沟商城发现后，改认此为西亳。由于未能肯定其始建年代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抑或四期，故已不再坚持夏、商分界在二、三期之间，认为二、三期或三、四期之间均有可能(《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是以原来发现的属于三期的1号宫殿基址为标志的，自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现二期大型夯土基址后(《考

古》12期又发表了二里头遗址九区发现的二期大型残夯土基址资料)，又出现了将夏、商分界提早到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意见。牛克成《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的性质问题》(《中原文物》2期）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二里头一、二期只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二里头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为“早期华夏文化”，二里头一——四期是夏文化。关于夏族的起源，孙华认为“禹居阳城”之阳城本为山名，系夏民族起源地之名山，夏在这里首先建都完全可能。夏人初居伊、洛一带，至启始征西河，占有晋南(《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期)。牛克成上文的看法与此相近，认为东下冯类型即少康之子杼越黄河进入晋南创造的文化。李民《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期）则认为禹初居安邑，至中康始南迁伊、洛居斟鄩，二里头三期宫殿“极可能是夏桀都城和宫殿的历史见证”。杨升南通过对汤伐桀进军路线的考证，亦主夏桀之都应在豫西伊、洛之地(《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对夏朝始年，历来有不同的推算。赵恩语《夏初年代的勘定》(《安徽史学》5期）认为国际天文学界推定《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所记中康日全食发生在公元前2137年是可信的，推测夏初之年决不应在公元前21世纪，至少是前22世纪，更可能是前23世纪。1985年还出版有先秦史研究会编辑的《夏史论丛》。所收二十篇文章中，王克林提出东下冯类型早于二里头类型，它是由晋南的龙山文化直接发展来的，是夏代早期文化，而二里头类型为其派生而成，是夏代晚期文化；杜在忠则提出，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应在黄河下游一带，后来始向中原发展。

青铜器、城市和文字是进入文明的标志。中国何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主张河南龙山文化亦属夏文化的李先登、杨育彬、李京华（李文见《文物》12期）等认为始自河南龙山文化，华泉则认为龙山时代“很可能仍处在红铜时代”，至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史学集刊》〈吉大〉3期)。关于中国城市的起源，以讨论中国古代都市问题为主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进行过热烈讨论，俞伟超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还在《文物》2期发表了专门研究文章。一种意见认为龙山时期已出现城市，登封王城岗、淮阴平粮台的夯土墙遗迹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市。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东周时期，王城岗等遗址只能称为

城堡，郑州商城等可称为都邑，但都不能称为城市。张光直则认为“城市型聚落在龙山晚期已具雏型”，“二里头文化期将是讨论中国城市初期问题的一个焦点”。

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时期，商的先公、先王也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探索夏文化必然涉及到灭夏以前商族创造的文化即先商文化的问题。主张豫西龙山文化为夏早期文化的赵芝荃、李先登、杨育彬等看法基本一致，不同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文化和豫东、鲁西南不是先商文化发源地的意见，认为豫东、鲁西南和豫北、冀南是夏时期商族活动的地域，该地区的龙山遗存是先商文化，先商文化与夏文化大同小异，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对夏、商文化同源论说得最明确的是田昌五，他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夏文化与商文化三者是先后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它们之间有发展阶段上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民族文化”（《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郑伯昂又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是先商早期文化，是先商文化的主支，漳河型和辉卫型是王油坊类型向北逐渐形成的先商晚期文化，是先商文化的分支，而王油坊类型应来源于山东滕县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商丘师专学报》2期）。与此同时，商文化东北起源说复又活跃起来。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2期）和蔺建新《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物》2期）从文献记载的商先公、先王活动的有关地名的考证出发，推定商族起源于东北，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系统文化。前者认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咀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文化遗存，小河沿文化约处于夏代，应属先商文化遗存，夏家店下层中、晚期属早商和晚商文化遗存。后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由北而南的趋势反映了商人由北而南的事实。至于他们所认为的先商文化即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如何与以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衔联起来，则未作具体的分析。看来，先商文化与夏文化一样，是仍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作为探索夏文化主要对象之一的二里头文化年代基本相当的岳石文化又有新的发现，在山东海阳县新发现有东村镇柳树庄和司马台两处遗址（《考古》12期）。在茌平县南陈庄采集到岳石文化的素褐陶罐口沿，与之一起的尚有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长颈花边口沿罐和平口瓮（《考古》4期），证明这一带大约是岳石文化分布

的西界。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又发现了不少岳石文化的遗迹与遗物和其与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冈上层商文化的先后叠压关系(《考古》7期)。由于岳石文化的发现，夏鼐认为，“这样看起来，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

二　商代

1985年发表的商代考古资料，以1984年发掘的尸乡沟商城内的D4宫殿基址最为重要(《考古》4期)。研究的中心课题仍然是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关系等问题。

D4基址是尸乡沟商城内钻探发现的三处大面积夯土基址建筑群之一（YSJI）内的一处小型基址。J1位于城址南部居中，平面近正方形，长、宽各约200米，四周环绕2—3米厚的围墙，南面正中有一座宽敞的门道，形成一座独立的小城。D4位于J1内东部，是一处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庑，中有庭院的封闭式宫殿建筑，东西长约51、南北宽约32米。南庑偏东有门道，西庑有西侧门，正殿东北不远处有水井和排水设施。整个基址的建筑程序与二里头、盘龙城、郑州商城的宫殿建筑相同。基址被二里冈上层文化层叠压或被二里冈上层时期的灰坑、水井打破。这是迄今所知商代早期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组宫殿建筑基址。

关于尸乡沟商城的性质，继续1984年的讨论，赵芝荃、徐殿魁和黄石林又分别著文重申了汤都西亳说（赵、徐文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文见《中原文物》3期)。支持西亳说的有田昌五、李民、彭金章和晓田（以上均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先登(《史学月刊》3期)、杨育彬(《河南考古》第三章）等。主张西亳说自然要否定桐宫说。黄石林认为桐宫地望诸说均晚出，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或文献记载，在偃师境内实无法确指桐宫所在地，即依《晋太康地记》所记方位，桐宫亦应在商城之东。对该城的始建年代，西亳说者均认为早于二里冈下层。不同的是，有的认为在二里头三期，有的认为在二里头四期。支持桐宫说的有陈旭和董琦。陈旭分析了已发表的城墙与宫殿基址的地层资料，认为《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提供的地层可靠，对地层中包含的陶片的断代基本可信，“城墙的始建年代最早当在二里冈期下层”，郑州商城早于尸乡沟商城，“把郑州商城定为亳都，偃师商城定为离宫，是符合二者之间年代关系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4期)。董琦

也主张尸乡沟商城“始建于二里冈下层，绝对年代不会超出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原文物》1期）李德方、张振宇对《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中一些地层现象的分析和器物断代提出疑义，认为城墙附属堆积不与城墙夯土同时而应晚于城墙夯土，城墙夯土内的最晚包含物不是稍晚于二里头四期而是属于二里头三期，因而推定商城始建年代当在二里头三期与二里冈下层之际，不同意始建于二里冈下层的分析(《中原文物》3期)。尸乡沟商城西亳说者原来多是主张二里头遗址为西亳的，这一看法的改变，必然涉及尸乡沟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问题。赵芝荃、徐殿魁认为“两地相距不远，应同属于西亳的范围，只是建筑形制和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已。”杨育彬说的直接了当，“二里头为宗庙，尸乡沟商城为宫殿。”黄石林一方面肯定尸乡沟商城始建于二里头三期，一方面又主张二里头是桀之斟鄩。尸乡沟商城的始建年代不仅关系到其性质的推断，而且也关系到何种考古学文化是最早的商文化的确定。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有助于判定其年代的材料发表。

尸乡沟商城的讨论，促进了郑州商城的研究。陈旭继提出郑州商城城垣有可能始建于南关外期之后；又对城内宫殿区的房基和夯土台基进行了研究。她将这些基址分为时间早晚不同的三组，认为以C8G9为代表的第一组皆被二里冈下层的遗存叠压或打破，基址夯层内包含的少量所谓二里冈下层陶片，皆甚碎小，断代是否准确值得讨论，即使年代确切，但数量不多，也可以视为洛达庙晚期存在的文化因素，其始建年代和城垣一样应在南关外期(《中原文物》2期)。高煦在商城始建年代上与此观点相同(《中原文物》2期)，也认为商城始建于邹衡所分的先商文化第Ⅱ组，即南关外期。不过他并不同意邹衡的汤都郑亳说，他认为以CIH9为代表的二里冈第一段文化特征与二里头四期相同，与二里头三期有着延续发展关系，二里头是早商文化的政治中心，商汤都亳似与二里头三期较合，而郑州商城是继二里头遗址三期之后兴起的商代中早期的都邑，而非汤都“郑亳”。杨育彬是郑州商城隞都说的主要支持者，他的《郑州商城初探》一书是迄今最全面、系统介绍和研究商城的新著，在客观介绍各家观点之后，重申二里冈期商文化是商代中期文化，郑州商城是仲丁所迁的隞都。该书提到郑州商代遗址发现有铸造青铜车轴头的陶范，如属二里冈时期，则是我国已发现的有关车

子和青铜车构件的最早的资料。田昌五在谈偃师商城时也对郑州商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同意汤都郑亳说和仲丁隞都说，认为郑州商城是汤灭昆吾后所建，与灭夏后建的尸乡沟商城是同时并存的商代都城，商时称“官”，即官城，不称亳。仲丁都隞之隞文献记载不在此地，与商城始建年代已相距较远，郑州商城亦非隞都。但又说“仲丁迁隞，也可能都于官城”，似乎又在郑州了。从讨论可知，郑州商城与尸乡沟商城是有机联系着的，因此，它们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也必须联系起来一起研究解决。

盘龙城商城是商代早期的又一处城址。高大伦《论盘龙城遗址的性质与作用》(《江汉考古》1期）不同意方国说和居民点说，而力主军事据点说，并据甲骨文中“雀”的地望，推测其可能是商代侯伯雀之故地。起着沟通中原商王朝与江南诸方国关系的作用。

商代后期考古，新发表的资料不多，比较重要的有山东寿光“益都侯城”内发现的一批纪国铜器。铜器上多有“己𠀠”铭文，清理者认为铭文只有“己”而无侯字，应是封爵之前纪国之器。此二字亦见于甲骨文，这批铜器的出土，对研究商时纪国及其与中央商王朝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文物》3期)。

“盘庚迁殷”的讨论引人注目。上引彭金章、晓田谈偃师商城的文章和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期）均认为盘庚所迁之殷不是安阳小屯，而是尸乡沟商城。不过，彭金章、晓田认为丁山在《商周史料考证》中关于“武丁始居小屯”的推断可信。秦文生则认为殷墟只是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的王陵区和祭祀场。李民则调和两说，认为盘庚初迁小屯，后又迁偃师。在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讨论中，主持殷墟发掘的郑振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小屯东北地和三家村发现的比大司空村一期略早的遗存，应属盘庚时期，而尸乡沟发现的遗存与大司空村一期（武丁时期）相距较远。因此，既不能否定盘庚迁殷说，也难以证明曾迁偃师尸乡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青铜器》一书，对殷代铜器研究有重要意义。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方便，该书比较齐全地收录解放以来殷墟所出有代表性的二百多件铜器（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系首次发表)，不仅在图版之外附有较多的线图、拓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而且冠以三篇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论述的长篇论文：郑振香、陈志达的《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杨

锡璋、杨宝成的《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张孝光的《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在殷墟铜器的具体研究中，对妇好墓铜器的探讨又有新进展。郑振香、陈志达《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考古》10期)，根据《殷墟妇好墓》出版以后进一步修整的资料，对此墓出土的各种不同铭文的觚、爵和两套"妇好"铜斗，依据铭文的形体结构进行书体分类，认为书体不同者似为不同人所书写，也可能与分批铸造有关。而"妇好"铭文书体的多样，反映殷王室拥有为数较多的长于书写者。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殷墟第二期（约相当于武丁晚期至祖甲）的铜器上较为普遍的铸有铭文。张亚初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进行了剖析，认为妇好之好即商人子姓之子字，加女旁乃子姓的女化字。妇好与武丁同姓，表明商王族是实行父系内婚制的。司即妃，训为匹配，即配偶。它不能"解作祭祠之祠，不能等同于祖妣，它绝非君后之后，也不能理解为女姓和长妇"。司母辛应即妃母辛，司母戊即妃母戊，加上司娉癸（即妃娉癸)，即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考古》12期)。张桂光同意唐兰释司为后，据司母戊方鼎上三字的配置主张读作"母后戊"，认为卜辞及殷金文中的"后"是时王法定配偶的专有称谓，"母后"则只能是太子对其身为王后的母亲的称号，故母后辛、母后戊应是武丁之子祖庚、祖甲对其母的称号，当时武丁未死，故母后戊方鼎和母后辛方鼎俱为武丁时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周永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1期）对包括小屯M18、M17出土的四十九件带"韦"字铭文铜器进行了分组和分期，认为韦即曾作贞人的武丁之子子韦，武丁晚期已封侯。武丁—祖甲时，韦是私名，以后则是族徽。M18晚于妇好墓，M17又晚于M18，可晚至祖甲或更晚一些。李学勤、杜廼松对邲其三卣分别进行的研究，再次肯定其为帝辛时期的标准器（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考古两研究所共同编著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收录台湾海峡两岸几位考古人类学者关于殷墟头骨研究的十二篇论文，其中，杨希枚等对抗战以前发掘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陵祭祀坑头骨的研究，韩康信、潘其风对解放以来发掘的殷墟中小墓头骨的研究，分别就殷墟头骨的种系问题发表不尽一致的看法。另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农业考古》1期和《全国商史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等，还曾发表一些同志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商代青铜农具、手工业，城市经济、货币等方面的文章，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商代史的研究。

有关商文化分布范围以外其他青铜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年代和性质问题进行的。孙力《试谈辽宁地区的商周文化》(《北方文物》4期）分五个小区介绍了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及魏营子类型，辽南的双砣子类型，辽东的庙后山文化和望花文化，沈阳和辽宁北部的新乐上层文化及康平顺山屯遗存、高台山文化等。认为除辽东地区不见三足器外，其他地区均以鬲、甗、鼎为主要器物，证明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就商文化的形成而言，起码是较多地吸取了辽西地区古代文化的先进成份”。李恭笃《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6期)着重分析了庙后山类型和望花类型，认为庙后山类型土著色彩较浓，与辽东地区普遍存在的石棺墓文化有明显承袭关系；望花类型是地方土著文化受中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等北方诸原始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一支青铜文化，与辽北广泛分布的新乐上层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的不同阶段。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青铜文化过去知之甚少，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一文(《文物》5期)，对伊金霍洛旗含青铜文化的朱开沟遗址作了介绍。该遗址可分五期，一期相当于龙山晚期，二、三期可进入夏纪年范围，四、五期最晚可到殷墟一期。各期主要器物的发展一脉相承，变化规律清楚，从第三期开始产生许多新因素，四、五期中胖袋足“蛇纹鬲”大量流行，青铜短剑、铜刀、铜戈与早商铜器伴出，构成强烈地方特征，为探索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在1984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苏秉琦就朱开沟的青铜文化遗址提出，“如果这一阶段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可以赤峰附近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那么，西部地区则可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

相当于商代和西周初，我国北方和西北方陆续出土过不少青铜武器和工具。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2期）在对其分类、分期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分布、源流以及与中原商周文化、苏联卡拉索克文化的关系。认为是由当地发展起来的，既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影响了商周文化；至于和卡拉索克文化的关系，显然是我国北方青铜文化影响了后者。我国北方青铜器尽管有自己的共同特点，但不一定属于一个文化系

统，西北黄土高原和燕山南北就有区别。西北地区，《考古与文物》5期发表了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依据打破关系，分为三期，约与大通上孙家寨类型晚期相当。这批墓葬在墓坑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与湟水中游及黄河河曲以南的墓葬有较大的区别，作者认为应称为大华中庄类型。1963年在西宁市西郊鲍家寨修渠工程中出土一件青铜鬲，形制与郑州白家庄二里冈上层铜鬲相似，出土地点附近有卡约文化遗址和墓葬，赵生琛认为当属卡约文化遗物，这对卡约文化的断代无疑是重要的参考材料（《考古》7期）。

南方地区，《考古》1期报道了湖南岳阳费家河发现的商代遗址和陶窑。窑分两种：一种为圆形竖穴，推测是上、下置谷壳等植物燃料，中置陶坯，敞口燃烧；另一种平面呈“∞”形，类似中原同期有窑室、火膛的密闭式窑。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另有红胎黑皮陶、硬陶和釉陶，器形有大口缸、缶、鼎、圜底罐等，纹饰以方格纹为主，次有绳纹、梯格纹、附加堆纹等。作者认为是代表湘江下游商周之际的一种地区性文化。《江汉考古》4期发表了《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这是一处以陶鼎为主要炊器的属于周梁玉桥类型的遗址，是江汉地区一种有别于中原同期的文化。

东南地区发表的资料，重要的有江苏句容城头山发掘简报（《考古》4期）。该遗址文化层分四层，第1层为西周层，第2A层相当于二里冈上层，第2B层相当于二里头晚期，第三层相当于崧泽晚期。第2B层材料虽少，但却是第一次发现，对探索早期湖熟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线索。句容白蟒台遗址下层出土的鬲与城头山2A层出土的鬲有一定区别，时代可能略晚（《考古与文物》3期）。另外，福建省光泽县1981—1983年的调查发现有许多商至西周初的几何形印纹陶器，与江西、浙江邻境地区的同期遗存均有相似之处，对研究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值得注意（《考古》12期）。关于南方印纹陶与中原印纹陶的关系，彭适凡发表了探讨文章（《中原文物》1期），认为中原地区的印纹陶出现较晚，数量又少，它的产生应是受到南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三 西周

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灭商以前的周文化称为先周文化。自武功郑家坡遗址和扶风刘家墓地发现以后，先周文化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考古与文

物》2期）不同意将刘家墓地称为姜戎墓地，他根据对器物组合、形制、纹饰的排比，认为以刘家墓地为代表的刘家类型是由石嘴头、晁峪类型演变来的。石嘴头、晁峪类型又是由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演变来的，继刘家类型之后的是斗鸡台类型，斗鸡台类型之后就是先周文化，因此刘家墓地应是早于斗鸡台类型的先周墓地。先周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寺洼文化的一些因素，“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有可能是先周文化形成的重要源流之一，而齐家文化则可能是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乃至先周文化的祖源”。“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看不出客省庄二期文化同先周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对寺洼文化，尹盛平认为是允姓之戎的文化，允姓之戎亦即迁三危之三苗。而寺洼文化的晚期类型——安国式文化，其族属则是穆王时迁至“太原”(今固原、平凉、庆阳一带）的犬戎，即猃狁，也就是氐族(《人文杂志》1期)。

西周考古，重要发现不多，发表的文章以铜器及铭文的研究占多数。刘启益《西周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献研究》)是作者近年来系统研究西周铜器的又一篇力作。他通过对七十六件铜器的器形、花纹和铭文中字体、人名、事类的讨论，确定属于康王时期的有六十六件。其中有些与其他学者意见相同，但有些则是作者新提出的，如作者认为铭文中的王姜即康王之后，故由王姜系联起来的“王姜组”铜器如令簋、令彝、旟鼎、作册睘卣与尊、疐鼎、作册翻卣及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折器等，一般定为成王或昭王，作者则均归之于康王。另有一些有人定为康王者如庚赢卣、庚赢鼎、寓鼎、伯寓盉、它簋、小臣宅簋等，作者则归之于其他王世。何幼琦《论康宫》(《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期）继陈佩芬之后，对唐兰康宫乃康王之庙的说法也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西周一代，“宫是起居室而不是庙，宗庙叫太庙，二者毫不含混”，“所谓说到‘康宫’的铜器，不能列在康王以前”的康宫原则是不存在的。宗德生对西周金文中的“周”进行了分析，认为周非指成周、王城和丰、镐，而是岐周，周是西周时期的真正的都城(《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期)。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7期）纠正自己原定夨簋为穆王时器的意见而改从唐兰康王说，认为铭文中的夨是周章子辈，器是吴器。《鲁方彝与西周商贾》(《史学月刊》1期）解铭文中的齐生鲁为齐国乙公之子名鲁者，贾为商贾之贾，证明齐生鲁是经营商业的。

张亚初《解放后出土的若干西周铜器铭文补释》(《出土文献研究》)对二十余件铜器作了考证和论述，如释宜侯夨簋铭文中夨原来的爵称为虎侯，地在今陕西一带；释柬鼎铭文“王来奠新邑”之奠为祭奠之奠以及对裘卫四器和𫜪簋等铭文内容的阐释等均有新意。

其他方面的研究，刘敦愿《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江汉考古》2期)通过对饰有虎纹的商周铜器分布范围的考察，推测其可能是古代虎方的遗物。古代从黄淮平原到江汉有一条迁徙路线，云梦泽正处于枢纽地位，古文献记载的周公践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可能反映了虎族等被周人逐向南方的历史。叶万松、余扶危《洛阳北窑西周遗址陶器的分期研究》(《考古》9期)，依据地层关系，细致地分析了陶器的演变规律，将遗址陶器分为两期，认为一期相当于西周初年至成康，二期相当于穆王或稍晚。洛阳是西周王朝的东都，这批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为与丰镐宗周地区陶器的对比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外，有关西周考古的研究文章，尚有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3期)、徐锡台《西周陶文试释》(《人文杂志》3期)、《周原出土卜辞选释》(《出土文献研究》)、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4期)等。

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江汉考古》3期发表了湖北大悟吕王城调查简报，基本排出了从西周初至春秋的陶器发展序列，面貌与淮水流域相似。周厚强分析了孝感地区的西周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孝感地区的西周文化“既不同于中原西周文化，又不同于鄂西和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文化”，而有着明显地方特征(《江汉考古》4期)。《考古》7、8、11各期和《文物》12期分别发表了浙江义乌平畴、江苏溧水、丹阳西周土墩墓和江苏溧水宽广墩、丹徒磨盘墩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小型铜器墓资料，增加了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认识。刘兴在搜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南地区的青铜器进行了分期，从相当于郑州二里冈上层的商代早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共分为五期，认为东南地区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吸收中原青铜器的形式与纹饰，另一条是独创的地方形式与纹饰(《考古与文物》5期)。《江汉考古》1期报道的新发现的宜昌覃家沱遗址有可能早到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应属较早的楚文化遗存。关于早期楚史，陈昌远《“周公奔楚”考》(《史学月刊》5期)认为河南汝、颍一带是楚人最初

活动的区域。王光镐《论楚族的始称国年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4期)认为商代无楚，楚之有国始于鬻熊，至西周成王熊绎时立为诸侯。唐嘉弘《试谈周王和楚君的关系》(《文物》7期)认为周原甲骨“楚子来告”之楚子非五等爵制之子，而是周人的养子部落的首领或豪酋。《考古》8期《广东揭阳华美沙丘遗址调查》报道采集有青铜钺和方格纹陶罐、盂、尊、豆等，遗址时代可能早到西周晚期，是岭南较早的青铜文化遗存之一。有关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林沄建议将图们江流域新安闾下层、新安闾墓地等早于江清百草沟遗址时代相当于商代的一类遗存，以延吉柳庭洞遗址为代表称为柳庭洞类型，而牡丹江流域以莺歌岭上层为代表的遗存，则应从团结文化中另立一新的类型(《北方文物》1期)。张泰湘勾画了嫩江流域小登科——白金堡——官地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发展过程，小登科约为距今三千年的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白金堡约为西周中期，官地墓葬出有铜扣，约为春秋、战国至汉(《北方文物》2期)。

四 春秋、战国

中原地区，1985年发表了洛阳西工区发掘的十八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和长治市小山头九座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资料(《考古》5、4期)。叶小燕《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考古》2期)是近几年所发表的有关中原地区战国墓葬研究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篇论文，分墓葬形制综述、陶器墓分期、铜器墓分期和结束语五个部分，认为“战国墓葬较多地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传统，是处在前一种葬制的最后发展阶段。如墓圹形制流行竖穴土坑，随葬品崇尚礼乐器等。但另一方面也蕴育了一些新葬制的因素和出现对旧葬制的破坏，如洞室墓礼器组合的不完整，夫妇同穴墓的出现等”。文中对有些墓葬的分期提出了与前不同的意见，有助于讨论的深人。

秦国考古有新的突破。在德公元年始迁的雍城，继钻探出秦公陵园之后，又发掘了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钻探出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和雍城城垣。据《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期)，城垣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方向北偏西14°，东西长3300（以南垣计)、南北长3200米（以西垣计)，西垣保存较好。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基址方向北偏东28°，长326.5米，北端宽86、南端宽59.5米，面积21849米。平面布局规整，四周有围墙，可分五进院落，五座门庭。韩伟《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考古与文

物》2期）以其与礼书比较研究，推断此即秦公朝寝，而五门三朝之制则反映秦公作为诸侯僭越天子之制。据《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期)，该基址“大门、中庭、朝寝及亭台由南而北依次排列，形成中轴线；东西两侧配置厢房，左右对称，东、西、南、北四面环以围墙，形成一个全封闭式的建筑群”。方向北偏东20°，平面长方形，北墙长87.6米，西墙残长71.1米，在中庭部位发现有一百八十多个牛、羊、人、车祭祀坑。韩伟对此也作了考证，认为是秦之宗庙，始建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还在使用(《文物》2期)。近几年秦长城遗迹不断有新的发现，史念海以自己亲身的调查，对《史记·秦本纪》等记载的秦简公时“堑洛，城重泉”之“堑洛”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蒲城县和大荔县隔洛河垂直修筑的秦长城即是(《文物》11期)。另外，王慎行据秦国兵器铭刻研究了战国时代秦之冶铸手工业，认为秦国有严格的三级管理和监造制度，在铸器上“物勒工名”乃由秦国首开先河(《人文杂志》5期)。

楚国考古，《考古》2期发表的湖南麻阳战国古铜矿是继铜绿山之后又一处重要发现，调查表明，在矿井设置、开采形式和采矿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对研究楚国的矿冶和江南青铜器的矿源有重要意义。盛定国执笔的《益阳楚墓》(《考古学报》1期）发表了自春秋末至战国晚期的九十三座楚墓资料，在随葬陶器为绳纹圜底罐、钵矮足豆组合的一早期墓中出一铁剑，为研究楚国铁器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这批墓中不出陶鬲，与长沙、江陵等地似有一些区别。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有两种丝质绦带，彭浩对其结构作了专门研究，认为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纬线起花的丝织物，纬线起花技术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并非后来由西亚、欧洲传入(《考古》1期)。本年度还出版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为研究先秦丝织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淅川楚墓二号墓墓主究是何人？过去曾有令尹子庚、薳子冯两种看法。新发表的有关文章，张亚初认为“楚叔之孙倗”不可能是薳子冯，而应是王子午（令尹子庚）之孙、王孙诰之子(《文物》4期)；顾铁符支持墓主为令尹子庚的意见，认为子庚、子午和王孙诰是一个人，而楚叔之孙倗则可能是子庚的儿子，(《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迄今发掘的楚墓已有千座左右，但时代明确属于春秋的不多，高崇文《春秋楚墓特征及其形成诸因素初探》(《中原文物》1期）通过对春秋时期各类型楚墓

的分析，认为就墓葬而言，“战国时期是独特的自成一系的楚文化的成熟时期”，“春秋时期则是吸收多种文化因素，处于逐渐形成的过渡时期”，“周文化因素对于东周楚文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等级不同对周文化接受的多少亦有区别，“贵族墓从葬制到随葬品制度基本上是承受周制”，平民小墓和小贵族墓的部分特征则主要来源于西周时期楚人原有文化传统。有关楚文化的研究，还有马世之《关于楚之别都》（《江汉考古》2期）和曹锦炎《楚帛书〈月令〉篇考释》（《江汉考古》1期）等文。

与楚相关的地区，随州擂鼓墩，继曾侯乙墓之后，又发掘了二号墓，《文物》1期发表了简报和刘彬徽对出土铜器的研究文章。该墓墓口长7.3、宽6.9米，出土青铜礼乐器、生活用器二百五十余件，在四件大甬钟隧部铸有神人操蛇图象，为钟上首见。刘彬徽认为墓中除“盛君縈之御簠”和两件方壶较早，其他如盖鼎、升鼎、豆、圆壶等均晚于曾侯乙墓，时代属战国中期偏早。和曾侯乙墓一样，该墓亦随葬九鼎八簋，有可能是曾国末代国君之墓。襄阳蔡坡屡有东周墓葬发现，《江汉考古》1期发表的四号墓规模较大，出有“蔡公子□姬安缶”和“徐王义楚剑”及其他铜器和陶器，时代为战国早期，据特征分析，疑为邓国墓葬。对过去发掘的河南固始侯古堆东周墓，王恩田据出土铜器铭文定为春秋末年勾吴夫人墓，勾吴夫人因改嫁于固始潘国的潘子成周，故葬于此（《中原文物》2期）。对光山黄国墓，李学勤对有关铜器铭文作了考释，并就墓制和铜器花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考古与文物》2期）。

吴越地区，《文物》8期报道的浙江海盐出土的原始瓷乐器是越国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乐器出于一座被破坏的土墩墓，计有甬钟、勾鑃、錞于和泥质灰陶的纽钟、磬等三十多件，另有原始瓷质的鼎、罐、碗及陶坛、罐、羊角状器等。吴越地区也是齿刃铜镰发现较多的地区，云翔《齿刃铜镰初论》（《考古》3期）在分型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源流、年代、分布和用途。认为早至春秋早中期，下限至春秋中晚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其渊源为商周流行的齿刃蚌镰，后发展为齿刃铁镰，是收割稻子的专用工具。

岭南地区，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报道了四会高地园、怀集拦马山和佛岗旗岭山发掘的四座铜器墓，认为拦马山墓出土的饰勾连雷纹、夔纹的陶器是春秋夔纹陶阶

段的典型器物，与以前发表的四会鸟蛋山墓所出相同，因此鸟蛋山墓的时代以定为春秋晚期为宜。汪宁生《试论不对称形铜钺》(《考古》5期)对这种钺的发现、分布、年代、类型、用途、使用方法及起源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记述和分析，认为是常用于仪式性活动的武器，它的年代、分布地域和铜鼓基本一致，其起源地区有可能是发现最普遍的云南和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

巴蜀考古，《考古》1期、《文物》5期分别发表了四川涪陵小田溪和成都金牛区、彭县、蒲江县及大邑县五龙发掘的墓葬资料。小田溪四座墓有的有木椁，五龙M1和M2有木椁，而五龙M4和彭县、蒲江等地的墓葬则为船棺葬，这种船棺与昭化、巴县、广汉等地的翘首船棺不同，而是两端截齐，未砍出斜翘的头、尾，赵殿增、胡亮认为这类船棺应是一个新类型，可以称为“独木舟式船棺”。研究文章有杜廼松的《论巴蜀青铜器》(《江汉考古》3期)，他认为新繁水观音M1晚于M2，M2出的细长援直内戈与郑州白家庄M2出土者相同，可早至二里冈期；新都木椁墓出土的铜印上有双铎图形，据《周礼·夏官司马》“两司马执铎”，故墓主人应为司马一类武职人员，而不会是蜀王。

有关燕国的考古资料，《考古》1期和8期分别发表了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和北京通县中赵甫、顺义龙湾屯发掘的墓葬与出土的铜器。眉眼沟两座墓均为木椁墓，随葬鬲、鼎、豆、壶等陶器组合，为典型的战国前期燕文化墓葬，但墓中殉有羊牲，则是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燕国境内多有铁器出土，石永士《战国时期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期)在对燕国铁农具的形制、功用研究基础上全面论述了燕国农业生产的状况。

对燕国疆域以北的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的研究，安路《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期)认为内蒙敖汉旗周家墓地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墓中出土的覆面当为东胡族覆面葬俗的证明。刘景文、张志立《西团山文化及其族属》(《北方文物》2期)认为西团山文化不是肃慎遗存，而可能是涉貊族系中的一支的文化。关于团结文化，贾伟明分为两个类型：团结类型由春秋至东汉，东康类型由战国初至西汉，两者均是北沃沮的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1期)。林沄认为东康类型不应划归团结文化，团结文化应以团结下层等遗址为代表，时代约为东周至西汉。苏联在绥芬河下游发掘的遗址与团结下层类似，称为克罗乌

诺夫卡文化，由于两者属一个文化系统，故建议命名为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北方文物》1期)。

春秋、战国考古的专项研究有所扩大。孙机《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考古》1期)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剑的各个部位以及剑和剑鞘上的玉具重新作了定名，对玉具剑的起源及贯璏（剑鞘上穿带子佩剑的鼻钮）佩剑法即璏式佩剑法的发明与传播作了详尽的考证。王学理《长铍春秋》(《考古与文物》2期) 考证了铍与东周流行的折肩扁茎短剑的区别，认为铍是以茎插入长柲的长兵，"春秋早期的吴、越一带（包括楚地）铍确实已从短剑中分离出来，流传开去"，至汉代仍在流行。何清谷《战国铁兵器管窥》(《史学月刊》4期) 对战国铁兵器的发现作了介绍，认为"直到战国中晚期，铁兵器在战争中使用的程度，远不及铁农具在农业中普遍"。刘一曼继1984年与孔祥星合作出版《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之后，又发表了《试论战国铜镜的分区》(《考古》11期)，依据科学发掘资料将战国铜镜分为四区，认为四区各有自己的特点。至战国晚期，除流行多钮镜的辽宁、吉林地区，当时的三晋两周燕齐地区及楚地、秦地，铜镜类型、纹饰渐趋一致，都以蟠螭纹和连弧纹镜为主要形式，这与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渐趋统一的历史潮流是相适应的。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3期) 系统地对带钩的年代、形制、用途、分布、分期、演变及源流进行了研究，认为带钩乃由中国本土产生，非由域外传入，文献中提到的"犀比"、"鲜卑"等应是带扣而非带钩。

钱币的研究在专项研究中占有较大的份量。佟达、张正岩《辽宁抚顺县巴沟出土燕国刀币》(《考古》6期) 对六百六十二枚完整刀币的形制、铭文作了排比，找出了由早到晚的变化规律。徐秉琨《说"阳安"布》(《中国钱币》1期) 据辽宁建平水泉燕国遗址出土的"阳安都王氏鍴"陶文，推测东周平首尖肩平足布上的二字应即"阳安"，地点即在水泉附近之战国古城。高英民据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金贝、银贝和遗址出土的石质布范，推断当时中山国是铜质刀币和金银贝币一起通行的(《中国钱币》1期)。张颔对一种平首方足圆肩弧裆布上的字作了考释，认为是陕字，带此字的布币应即魏国"陕"邑所铸，地望在山西南部平陆一带(《中国钱币》4期)。唐石父《先秦半两钱的发现及其他》(《考古》6期) 认为《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战国钱币》一文所报道的大型半两钱

应为秦统一前(即始皇廿六年前)所铸，并与刀、布一起流通。朱活《古币续谈》(《中国钱币》2期)认为出土的商代无文铜贝应为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青铜贝货分黄河流域和江淮两大系统，楚国"贝化"(蚁鼻钱)不仅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受东夷文化的影响更深。

关于铜器等铭刻资料的研究，张政烺《庚壶释文》(《出土文献研究》)依据台湾张光远摹本对庚壶重新作了考释，于字、义多有阐发，同意张光远定为齐庄公(前553—前548年)时器。李学勤《晋公𥂴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不同意过去定为晋定公三十六年(前475年)器的意见，认为据铭文内容定为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为宜。黄盛璋《关于鲁南新出㝵工剑与齐工师铜泡》(《考古》5期)对铭文作了考证，认为剑为赵国所铸，齐工师铜泡则证实疑为伪印的《陈簠斋手拓古印集》中之"十四年十二月师绐"印非伪。俞伟超、李家浩《论"兵辟太岁"戈》(《出土文献研究》)对1960年湖北荆门出土的一件异形铜戈铭文重新作了考释，认为原释"兵闭大武"者实为"兵辟太岁"，意为打仗要避开岁星，此乃战国时期兵阴阳家学说盛行的产物。由铭文联系图象，推测戈援的神人为蚪龙，即太岁别名"青龙"，从戈的形制分析当为巴蜀文化遗物。张松林《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的东周陶文》(《文物》3期)对"亳"字陶文作了分析，认为亳、京二字古时相近，但还是能区别的，此字是"亳"而非"京"，亦非"亭"。

另外，1985年出版了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共收入文章二十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先秦两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等级制度、手工业经营方式和思想信仰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羌戎文化、楚文化的发展系列、区域类型及族属问题。书中，作者就我国奴隶制发达阶段的特点、封建制产生的生产力条件、西北高原地区青铜文化曾发生由锄耕农业向畜牧业转化、某些族属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发生综合多种文化因素的规律性现象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秦 汉 考 古

叶小燕

1985年发表的秦汉考古资料和研究论著有一百四十多篇，在田野发掘、整理、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 秦 代

本年中，有关秦始皇陵的文章较多。秦咸阳故城西南隅是秦都的手工业作坊区。在发掘过程中，清理出水井八十一口、灰坑十三处、窑一座、小孩墓九座(《考古与文物》3期)。水井分布范围较广，东起西农村，西及摆旗寨，南临渭河，北过咸铜公路。东西长4125、南北宽1750米，井均呈圆形，结构可分陶圈井、瓦井、上瓦下陶圈井共三类六种。有的井深可达3米左右。小孩墓在一竖穴坑中，以陶瓮或瓦管、瓦槽、陶鬲、板瓦、陶釜为葬具，在瓮、鬲、釜棺上盖有折腹盆。有的无随葬品，有的只有数件盆、鬲、釜、罐之类陶器。遗迹和遗物的年代与咸阳故城相当。

秦汉芷阳故城，位于今临潼县油王村一带，东倚骊山，西濒灞河。近年来对城址进行了勘查，并试掘了水池一处、地下建筑一处，陶窑四座、建筑夯土基一处(《文博》3期)。所谓地下建筑，是一座长17.2、宽12、深约4米的长方形坑。坑壁是3米宽的夯土墙，上架梁。室内面积为9×5平方米。底部上铺木板，中垫石块，下作夯土，在石层中间设排水小沟，说明修建时很注意防潮。室内堆积中发现有肩刻“茝”字的陶罐和猪、羊、鹿等骨骸。该建筑可能是秦芷阳宫内储藏食物的库房。

在对秦始皇陵园周围遗迹的调查中，发现窑场遗址多处。它们分布于赵背户村、上焦村、西黄村、阵沟村、下和村和鱼池村。这些陶窑遗址应是当时修筑秦始皇陵园时烧制砖瓦、水道管和器皿的地方。共清理了七座窑址和十二座位于窑场的墓葬(《考古与文物》1、5期)。窑皆建于地下，由前室（包括斜坡道、燃料堆放池）和后室（包括火门、火膛、窑室、窑床、烟囱等组成。窑室平面形状可分二型四式。燃料是劈柴树枝。窑的结构比战国时期

有所改进，窑室普遍增大，窑床升高，火膛降低，将原来的立焰变成半倒焰，增加了焙烧量，又使火候均匀提高。墓葬位于陈家沟窑址范围内。墓呈长方形竖穴状，两端或设生土二层台，有的二层台为多层台阶式。一座在坑底留一条生土隔梁，分成东西两个墓室。这些设置，以往较为少见。

在陵园东侧、上焦村以西，继1972、1976年后又发现四座马厩坑(《考古与文物》2期)。历年累计已发掘马厩坑一〇二座。这四座中，有俑马坑二座，马坑二座，形制与过去的相同。

在始皇陵园内外城之间的建筑基址上，先后发现三枚秦铜权(《考古与文物》4期,《文博》4期)。大小基本相同，形制为上小下大的空心圆筒形，平顶上有小钮，器表有十七个棱面，高7厘米左右，其上镌刻秦始皇廿六年诏和二世元年诏。肩上分别刻“首”、“左”、“右”字。除“首”字权锈斑未除，测重失准外，余二枚分别重254.6克和256克。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的标准衡器。

程学华、郭兴文《秦陵周围出土的铁器》(《文博》1期) 较全面地介绍了在始皇陵园遗址、郑庄打石场、鱼池遗址、刑徒墓地等处出土的三百多件铁制生产工具。其中以手工业工具居多，多为铸件、锻件次之。这批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秦代的冶铁技术有重要价值。

秦始皇陵园中兵马俑坑和铜车马的相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1984年是秦兵马俑发现十周年，在陕西临潼召开了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有二十余篇关于秦陵研究的论文在各类刊物上发表。

杨宽《秦始皇陵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3期)、刘炜《秦始皇陵布局浅谈》(《文博》2期)对秦始皇陵作了全面的研究。杨文指出，秦始皇陵园继承了战国君主陵寝制度，并在布局上有重大发展。它以国都咸阳为设计蓝图，布局反映出墓主至尊至高的地位。陵园居于咸阳以东的正东方向，而山东朐县的“秦东门阙”又正居于咸阳和陵园以东的正东方向。显然骊山园的位置选择并非出于偶然。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对历代帝王陵园有深远的影响。

曾有人提出秦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并且认为秦始皇陵的修建是在二世之时(《大自然探索》1984年3期)。最近又有人提出秦俑坑不是始皇陵园建筑的一部分，而是秦始皇为了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物“封”(《文博》

1期)。秦鸣《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一文（同上）针对前说进行辩正。该文否定了秦俑坑属于宣太后的可能性，分析了秦俑坑出土的文字资料、遗迹、遗物的特征，考察了陵园的建筑布局以及时代背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秦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整个陵园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许多论文从军事史、兵器史的角度来研究秦俑坑。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文博》2期）依据秦俑坑与杨家湾汉俑坑的不同，探讨了秦汉军队装备、军阵和作战形式的变化，以及秦汉兵器的发展和使用。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俑爵级考》(《文博》1期）继《秦陵兵俑衔级试解》之后，进一步以秦二十爵级对兵俑身份进行辨识。提出在秦陵兵俑中，有爵战士和军吏的爵位均属一至八级，八级以上的俑目前尚未发现。聂新民《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同上)对俑甲的编缀方法、类型、各部位的结构、质地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王玉清《秦俑的发髻》(《文博》4期)、刘占成《秦俑带钩浅述》(《文博》6期）是有关秦俑服饰的分类研究。呼林贵《秦俑艺术的流派及渊源》、李鼎铉《秦兵马俑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文博》1期）则从艺术角度探讨秦俑。上述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张仲立《秦陵二号铜车车舆纹饰仿衣蔽属性初探》一文(《文博》1期)指出，二号铜车所施彩绘装饰图案中，呈条带状的几何纹边缘装饰，纹样、色彩、造型和用途都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绒圈锦十分相似。而主题纹饰的耳杯菱纹和云夔纹也都见于马王堆出土的丝织物中。前者多施用在以经斜纹组织为特色的纹绮织物上，后者图案性布局亦都具有锦绣绫绮织物的特点。因此，铜车车盖上下、车舆内外及茵轼表面的纹饰，象征着覆有一层丝锦织物，这和古文献记载中所谓容、帷裳、盖衣、衣蔽等名目亦相符合。王子今等《关于秦陵二号铜车御者俑》(同上）一文认为，从御者俑戴冠、佩剑、佩璧来分析，身份并不很高，推定为“车郎”较妥。“车郎”属郎中令管辖，归于宫廷警卫部队。党士学《关于秦陵二号铜车马》(《文博》2期)，对二号铜车马的复原，提出了商榷意见。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4期)一文，分析了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两种《日书》竹简，确定这两种《日书》都与日者的

建除家流派有关。而且每种《日书》都包括两套建除，一是秦人的建除，另一属于楚人。在秦人的建除简中，有许多关于奴隶、奴隶买卖、奴隶逃亡的文句，在楚建除简中却无这类言词。结合其它睡虎地秦简的法律内容，作者指出，秦律中有关奴隶制的条文，反映了秦奴隶制关系的广泛存在。这涉及到秦国固有的社会制度与东方列国相比，是相同还是落后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变化的认识，会有不小的改变。

张占民《试论秦兵器铸造管理制度》(《文博》6期)，根据题铭兵器并结合云梦秦简，详细论述了秦统一全国以前，在兵器铸造方面，中央和地方的铸造官署制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取消地方的兵器铸造权，收归中央管理。秦的兵器生产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并用法律形式予以保证，推动了兵器生产的发展，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王学理《长铍春秋》(《考古与文物》2期)对长铍的起源、兴衰作了综合考察。作者推论，春秋时期的折肩扁茎剑可能是长铍产生的雏形。至少在春秋早期的吴越一带，铍已从短剑中分离出来，并被各国仿制，铍的盛期当在战国中晚期。至汉初，长铍被弓弩、长剑、刀等所代替。

二 汉代遗址和墓葬

本年度发表的汉代考古资料比较丰富，并有重要的考古发现：

内蒙昭乌达盟对位于境内的汉长城进行了调查(《文物》4期)。该段长城遗址分布在昭盟南部喀喇沁旗、宁城县境内。它以坤都河和黑里河为塞，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接辽宁省朝阳地区，西南延向河北省承德县境，全长225公里。长城地带地势较高，是内蒙古高原大青山的东延，在军事上利于控扼据守。城墙采取堑壕、筑内外墙的方法。沿线内侧发现烽火台约八十余座，嶂塞三处，城址一处。烽火台呈圆形，台间距离平均约3公里，可遥相呼应。嶂塞为长方形或方形土筑小城，设有角楼、护城河等防护措施。城址位于老哈河北岸冲积平原上。城周长约9公里，城内汉代遗物丰富，特别是发现了“白狼之丞”、“渔阳太守章”的封泥，为确认右北平郡望提供了新的资料。

栎阳故城是秦汉时代的重要城市。秦献公、孝公时，栎阳是秦的都城，刘邦徙都长安前亦曾都此，后为太上皇居地。1964年曾有同志对此进行短期的初步勘探（《文物》1966年1期），1980—1981年对该城址重新进行了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3期)。故城位

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关庄和玉宝屯一带。城址东西长约2500、南北宽约1600米。城内通贯三条东西向、三条南北向大街。东西城墙应各辟三门，南北城墙应各辟两门。大型建筑基址集中在城中部，手工业作坊分布在城内东北和东南部，一般居址比较分散，有的与手工业作坊杂处。墓区位于城郊。在故城西北为汉太上皇万年陵区。陵前有清毕沅书立的汉太上皇陵碑。封冢呈覆斗形，边长68、高17米。经钻探，墓四边正中各有一条斜坡墓道，以东墓道最大，长82、近墓端宽35米。陵之西北120米，有太上皇后妃墓，封土存东西22、南北26、高8米。墓室东西26、南北27米、探深9米未及底。两墓共有一陵园，园内外有建筑残址多处。故城东南为秦汉时代的平民墓葬区。共发掘八座墓，时代分属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从故城内涵和墓葬时代分析，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是栎阳故城的鼎盛时期，东汉以后逐渐废弃。

崇安故城的勘探和发掘是汉代考古的一项重要收获(《文物》11期)。故城位于福建省崇安县城南35公里。城因丘陵地形营建，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48万平方米。城墙夯筑，墙外挖护城壕，在东、西城墙南段各辟城门一座。城的西南角有乌龟山烽火台遗址。城内按地形分南、中、北三部分。大型建筑基址主要集中在中部，是宫殿区所在。宫殿区以高胡南坪建筑群规模最大，基址面积达两万平方米，有甲、乙两组建筑。高胡北坪建筑基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五座大型房基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南坪甲组建筑位宫殿区南部，是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发掘表明，它属高台建筑形式，台面东西长120、南北宽79.2、东部最高达7米。由东大门、西大门、西(东)门房、庭院、殿堂、西(东)厢房、西(东)廊房、西侧殿和东西天井等组成。整体呈以庭院、殿堂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四合院”式。此外，城内外还发现多处居住遗址、冶铁遗址、制铁作坊区和制陶作坊区。东、南郊有墓地两处。从城址内涵可知，该城始建于西汉前期，下限可及西汉末或东汉初。根据建筑群规模、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推测，崇安汉城是西汉闽越国时所建的“王城”。

在西汉都城长安遗址，发现了窖藏铜器(《考古》5期)和裸体陶俑(《文物》4期,《文博》3期)。窖藏位于长乐宫西北的窦寨村西。窖坑呈椭圆形，内置三个陶瓮，其中一瓮中纳铜器二十六件，有灯、博山炉、盉、盒、长颈壶、货泉等。长安城内发现窖藏铜器

尚属首次。埋藏时间应在王莽时期。男女裸体陶俑发现于长安城西北隅的六村堡东南。共十余件，俑的形制与杜陵陪葬坑、西安东郊西汉墓(《文博》3期)所出一致，当为随葬明器。该地以往曾有相同发现，推测是一处专制陶俑的作坊遗址，其繁盛年代在西汉后期。

《后汉书·郡国志》载：定襄郡辖有善无、中陵、骆、桐过、武成五县。善无、中陵在今右玉县(《文物》1963年11期)。李逸友结合文献和实地勘察，考证桐过县在今浑河汇入黄河处南约1公里的上城湾汉城址上。骆城在浑河流城的清水县古城坡。而武成县的地望，是通过分析和林格尔壁画墓的“武成图”壁画，结合考古调查推定的。作者认为在该墓之东约3公里的浑河北岸，现称榆林城的古城下，压有一座汉城，此即为东汉之武成县址(《考古与文物》1期)。

广西北流铜石岭发现了一座汉代冶铜遗址(《考古》5期)。在发掘的250平方米探沟内发现炼炉十四座。炉体小，结构简单，分布密集，可见炉的使用时间不长。在炉的附近有用作备料池的灰坑九个，炉群右上方有排水沟两条，是为疏导山上雨水、保护冶炼场地而设的。经定量分析，采集的铜锭含铜量达96.64%，出土铜渣含铜量仅0.65%。这说明炼炉构造虽原始，工匠掌握冶炼提纯技术却很熟练。冶炼以木炭为燃料。木炭标本经^{14}C年代测定距今1870±80年，故遗址年代应是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

六十年代以来，对西汉诸帝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古工作，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为西汉帝陵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初步条件。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5期)和刘炜《西汉陵寝概谈》(《中原文物》2期)即是对西汉帝陵的探索。两文阐述了西汉帝陵形制的变化、陵园和都城的关系、陵庙和寝殿制度。认为汉初帝陵形制承袭秦代，从文、景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提出，汉初及秦、先秦之帝王陵墓与景帝至东汉诸帝陵是陵制发展的两大阶段。

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尚未开展。根据文献记载和普查得知，在孟津县东，北讫新庄、南到平乐以北的洛孟一路两侧是东汉洛阳的北郊兆城。此地座落五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在偃师县今大口和高龙乡一带为南郊兆城。此地座落六陵：明帝显节陵、和帝慎陵、章帝敬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这些陵的具体位置，大都不能确指。近年在洛孟一路西侧的刘家井村

征集到黄肠石两块。据云该石出自村西北大冢之东南。石上分别隶刻:“第百五十一，广三尺一，厚二尺一，长尺八寸，建宁五年二月，省椽刘宫主”;“熹平六年二月，省椽邵慎主，第一百卅，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三寸”。李南可著文考证，刘家井村西北的大墓应是汉灵帝之文陵(《中原文物》3期)。

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器物坑的发掘颇为重要(《考古学报》2期)。齐王墓位于临淄故城西南35公里。墓上封土现存高24米，底径约250米，占地面积计24市亩。墓口长约42、宽41、深约20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约63米，接墓端宽35米。其规模之大在已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中应列前茅。在两墓道侧共发现随葬坑五个，并进行了发掘。南墓道两侧各两个，从南往北、先东后西依次为车马坑、兵器仪仗坑、兵器和器物坑、狗坑。北墓道西侧为器物坑。坑内均构筑木椁。车马坑中置车四辆、马十三匹、狗二只。狗坑中殉狗三十只。五坑共出土器物一万二千一百余件，其中有铭刻铜器、银器五十三件，铜器多刻“齐大官”、“齐食官”铭。器物具西汉初年作风，推测此墓为西汉第二代齐王，即哀王襄（惠帝七年——文帝元年时在位)之墓。

江苏铜山龟山楚王墓的规模亦很宏大(《考古学报》1期)。它位于徐州市西北约9公里的西麓,其北5米为1972年发掘的一号墓(原名小龟山西汉崖墓，见《文物》1973年4期)。该墓（二号墓）为横穴式崖洞墓，由两条墓道、两条甬道、十二个墓室构成。东西全长83.5、南北最宽处33米，墓内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甬道内用两层“塞石”封堵，墓室之间有过道相通。除两个耳室外，各室原有仿木结构建筑，墓内并有排水设施。从结构看此墓是夫妇合葬的两座墓葬，南面一组属主墓，应葬男性;北面一组处从属位置，当葬女性。墓的形制和满城中山王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相同，属西汉时期诸侯之墓。据了解，墓中曾出土一枚“刘注”龟钮银印(《考古学报》3期)。刘注系西汉第六代楚王，死于元鼎二年。

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物》1期)。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式，椁外填青膏泥。竹简、铜器、漆木器出于头箱残边箱中。竹简共一千余枚，内容包括:(1)汉律，(2)《奏谳书》,(3)《盖庐》,(4)《脉书》,(5)《引书》,(6)《算数书》,(7)《日书》,(8)历谱,(9)遗册，以汉律为主。这三座墓年代相若，据两座墓出土的《历谱》推算，它们

大概分别葬于吕后二年和文帝前元五年(《考古》12期)。

在辽阳和偃师各发掘了一座壁画墓。辽阳是发现壁画墓较多的地方，解放以后已发掘了汉晋间壁画墓二十余座。这座墓位于辽阳旧城东墙内侧(《文物》6期)。墓室由石板石条构筑，前部为并列双棺室，后部为横向明器室。长3.6、宽3.1、高1.54米。棺室内支石板尸床，以席敛尸。现存三具骨架，推测是家族墓葬。墓内两壁、横枋、立柱及墓顶石板上绘有彩色壁画，内室有门卒、小史、出行、宴居、日月星座等。根据其它壁画资料，该墓年代在东汉中期偏后。偃师壁画墓座落在杏园村(《考古》1期)，是一座东汉晚期的横前室砖墓。壁画作于前室，绘有车骑出行和作坊宴饮两幅。出行图绘有九乘安车、七十余个人物、五十四奔马，以前导属吏、墓主、随从三组布列。这为研究东汉车骑导从制度提供了生动资料。

此外，还发表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一百余座汉墓资料。它们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陕西勉县老道寺东汉墓出土的陶四合院模型(《考古》5期)由十九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平面126平方厘米，分主、副两院，主院有宅门、院墙、左厢、右厢和正楼；副院是具有偏门、佣人房、家禽家畜圈的偏院。这种结构的建筑模型过去不曾见，无疑是汉代建筑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四川荥经城西、严道古城南面水井坎沟山坡上岩墓密集，是一处族葬墓地。发掘了五座，其形制和乐山、彭山、成都、新津、昭化等地岩墓一致。墓均单室，由墓道、墓室、棺台、龛室组成。年代约当东汉初中期(《文物》5期)。

河南、山东和江苏、陕北、四川是汉代画像石墓的著名分布区。那里的考古工作都有新的发现和进展。《中原文物》3期发表了在新野前高庙村、唐河湖阳镇、城内针织厂、禹县十里村、南阳建材试验厂、王庄、独山西坡发掘的八座画像石墓与南阳市散存的二十幅画像石画。墓室都属砖石混作结构。画像内容很是丰富。年代上起西汉晚期，下迄魏晋年间。而三座魏晋时期南阳墓葬实际上是利用了汉人的筑墓材料，这可从墓内画像的位置和内容不合规律得到证明。这种魏晋时人毁汉墓，利用画像石建墓的现象并不罕见，过去在南阳和山东都有发现。

江苏新沂和赣榆也发现了画像石墓。新沂墓亦系改建，有浮雕六龙蟠绕的一条石柱被弃之墓

外未用。墓的初建年代约为东汉晚期(《考古》7期)。赣榆墓的画像石共三十二石三十九幅画像，是东汉晚期产品(《考古》9期)。蒋英矩《略论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考古》12期)阐述了对一组发现于曲阜城东的画像石进行复原研究的成果。这组共有七石十一幅画面的画像石，按石块形制和画像内容恰好组成了一具长方形双棺室的石椁。椁长2.77、宽2.46米。根据椁上刻铭，作者考释后提出该组画像石应称为“安汉里画像石”或“安汉里禺石画像”。李发林撰文介绍了山东大学旧藏的汉画像石拓片十二幅，其中某些图像内容是过去未见的(《考古》11期)。此外，考释山东画像石墓的文章有：李发林《山东苍山元嘉九年画像石墓题记试释》(《中原文物》1期)，王恩田《诸城凉台孙琮画像石墓考》(《文物》3期)。

陕北子洲县发现三座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3期)。画像内容、风格和技法与绥德四十铺、苏家圪坨出土的十分接近，故年代应在东汉和、顺帝时期。陕北画像石墓多在绥德、米脂两县的无定河岸发现，子洲淮宁湾画像石墓的出土确系可嘉收获。由此可知陕北画像石产区在北伸古圁水(今秃尾河)，西延古奢延水(今无定河)、走马河(今淮宁河)，东临黄河的范围内。

在四川长宁县岷溪河岸调查发现二十八座崖墓，对其中七座俗称“七个洞”的墓进行了发掘(《考古与文物》5期)。这七墓均系无墓道的单室结构。在墓内就石岩凿成一或两具石棺。石棺外壁、室壁用浅浮雕技法刻有神话故事、祥瑞、舞乐百戏等画像，墓门和崖壁上阴线刻伏羲女娲、双龙，以及纪年铭。纪年铭有“延光四年”、“喜平元年”、“喜平十年”诸处，反映了墓的年代。这批崖墓属汉族墓葬，然和四川其它地区汉族崖墓比较，具有一些地方特征。

报道的画像砖墓都属画像空心砖构筑。它们发现于河南郑州和宜阳县诸处。画像内容亦很丰富。时代约在西汉中期以后(《中原文物》1、2、4期)。

有关画像石(砖)的研究文章，如吴曾德、肖亢达《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闪修山《南阳汉画像石墓的门画艺术》、魏仁华《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幻日图象试析》、苏健《汉画中的神怪衔蛇和龙壁图考》等都有新的见解(均见《中原文物》3、4期)。曾、肖文重点分析了唐河郁平大尹冯孺人墓、襄城茨沟、沂南等几座大型汉画像石墓，得出结论：墓葬在平面布局和空间

立体造型两个方面的第宅化，就是墓葬形制上的汉制。这是墓葬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发端于杨家湾大墓，刘胜墓是其初级形态，嘉峪关三号晋壁画墓乃是汉制的下限。

在凤翔发现了西汉晚期的窖藏铜器二十六件，漆耳杯四百件左右(《考古》8期)，潼关征集的“阳平顷侯”鼎、“宁陵侯”行灯等铜器(《考古与文物》5期)，高密、杨州、舞阳发现的汉代铜镜(《文物》10期，《考古》11期)，介绍考释的临潼、安康、凤翔所收藏之汉印(《考古与文物》6期，《文博》6期)，淳化出土圭、撮、大半龠三件汉代铜量(《考古》11期)，河南、陕西等地出土或征集的汉钱范(《文物》6期，《考古与文物》4、5期，《文博》6期)，凤翔和安康出土的秦汉瓦当(《考古与文物》4期)等都有重要的文物研究价值。

三　汉代简书整理和专题研究

马王堆汉墓和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简，它们的珍贵价值已为学术界所知晓，整理小组一丝不苟地缀合、系连，认真细致地考释、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更为众人所称道。这批资料陆续公布和集合成书出版，1985年与读者见面的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和《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汉墓帛书》(叁)一书包括两种古佚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的全部照片和释文。这两种古佚书的释文前曾分别发表在《文物》1977年1期和1975年4期。《春秋事语》绢广约23、长约74厘米，存97行。全书分十六章，记述的大部历史事件可以查明年代，有的和《春秋》三传、《国语》等古书相近，还有从未见过的资料，极为珍贵。《战国纵横家书》绢广约23、长约192厘米，共325行。全书分二十七章，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史记》和《战国策》，余不见于现存的传世古书，对战国历史有不少补充和纠舛的地方。两书抄写年代当在汉初，《春秋事语》不避邦字讳，或更早一些。

在银雀山一号汉墓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同时出土《守法》等十三篇竹简。这十三篇的篇题同书于一木牍上:“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扁(篇)、下扁，凡十三”。《兵令篇》与传本《尉缭子》的《兵令》相合，《王兵》篇与《管子》的《七法》、《兵法》等篇，已分别发表在《文物》1977年2、3期和1976年12期上。《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4期)发表的是除《兵令》和《王兵》以外的十

一篇释文和部分简的照片及摹本。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向大家提供的是一份未经缀联、注释的全部简牍释文，从中可以窥知银雀山汉简的本来面貌。一号墓出土竹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木牍五方，大致分为现今还有传本的书籍和古佚书两大类，以后者居多。现有传本的书籍包括：(1)《孙子兵法》以及四篇佚文，(2)《六韬》十四组，(3)《尉缭子》五篇，(4)《晏子》十六章。佚书类有：(1)《孙膑兵法》十六篇，(2)《守法守令十三篇》十篇，(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4)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5)其它类十三篇。二号墓出土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三十二枚。根据墓葬年代、《元光元年历谱》和书体推断，这批简大约是在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期内书写的，是今天传世本最早的写本。因此在对先秦、秦汉历史和哲学、兵法、历法的研究上，在对古籍的源流、校勘及古文字的研究上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专题研究也取得不少成绩，有多篇文章是探讨汉代金币的。张先得《记各地出土的圆形金饼——兼论汉代麟趾金、马蹄金》(《文物》12期）一文根据发表资料，将全国出土的金饼三十二批次、二百一十六枚统一分为九型，对每型的时代、铸造情况、流通使用特点及形制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重点论述了麟趾金和马蹄金。认为武帝太始二年诏铸麟趾金和马蹄金只是颁赐和进奉的标准样版，未能推扩流通，所以不算是金币。汉代使用的仍是称重计量的金版和金饼。黄盛璋《关于马蹄金、麟趾金的定名、时代与源流》(《中国钱币》1期）亦对相同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他分圆形金币为三式，即饼金、麟趾金、马蹄金。三式先后相承，但都出现于战国之时，汉代才广泛流行。武帝诏铸麟趾、马蹄以易它旧式，更名以协符瑞，并非创造新形。张维持、胡晓曼《试论金版和金饼的几个问题》(《文物》12期）不同意把楚金版和汉金饼看作是两种黄金铸币。作者认为“铸币”一词在货币经济学上具有确定的涵义，它是指具有一定形状、重量和额面价值的，充当法定流通手段的金属货币。就这涵义说，我国战国时期的金版——“郢爰”、“陈爰”和汉代的金饼——麟趾金、马蹄金，都不具备黄金铸币的条件，我国古代没有黄金铸币。

朱活《三铢钱考——兼谈山东莱芜出土的三铢钱范》(《文物》12期）对山东出土和收藏的三铢钱的形制作了分析，同时考察了

三铢钱及范往往与四铢半两同出，而数量比半两少的现象，认为《汉书》中有关三铢钱的记载是可信的。

孔祥星、刘一曼合著《中国古代铜镜》一书据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把我国古代铜镜的发展演变归纳为六个阶段：(1)早段起源阶段，(2)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和流行，(3)汉代的繁荣鼎盛，(4)魏晋南北朝的中衰，(5)隋唐的高度发展，(6)五代至元的日趋衰落，从而阐明了铜镜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四 少数民族考古

吉林省榆树县鲜卑墓地的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物》2期)。该墓地位于老河深村南一处岗地的西缘。其上有靺鞨时期的土坑墓和石圹墓，其下为西团山文化遗址。鲜卑墓地面积大，数量多，排列有序，随葬品也很丰富。发掘一百二十三座，有单人墓、男女异穴合葬墓和一男二女异穴合葬墓。合葬墓的墓坑并列，方向一致，男居右，女居左，或男居中，二女居两侧。墓坑长方形，以木棺为葬具，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品置死者四周，多系生前用物。男性墓随葬品较多，女性墓较少。男女皆佩玛瑙珠等组成的颈饰和金、银、铜质耳饰。男性多随葬大宗兵器及马具，女性则有银质或铜质之腕饰。少数墓实行火葬，有的则殉以马。这是一处部族的公共墓地。其文化内涵与辽宁西岔沟、内蒙扎赉诺尔古墓群有着密切联系，但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发达，时代应较晚，即在东汉初期或略晚。

新疆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发现一处姑师人墓地(《考古》5期)。墓地选在戈壁滩稍凸起的高岗上，墓上堆积卵石标志，计约三十座。墓坑长方形，口部用直径约10厘米的圆木棍排列封闭，其上铺厚约15厘米之芦苇杂草，再堆沙石封土。从采集的彩陶壶、素陶罐、细毛绳、毛布、皮革制品分析，与吐鲁番县艾丁湖、鄯善县苏巴什古墓葬同属姑师文化。标本经^{14}C测定年代（树轮校正）距今2000±95年。这为该墓地的年代提供了参考数据。

新疆新源县巩乃斯草原北部有一处古代墓地(《考古与文物》2期)。墓地地表排列簇簇封土墩，计约三十余座。最大封土高达10米以上，底周近300米。一般高在0.5—2米左右，底径约7—24米。封土内夹有石板和卵石，有的土墩顶上铺一层石块或卵石，底周嵌出圆形石圈，有似茔圈。发掘十五座，其中十三座为石棺墓，棺室用天然石板层层垒砌而成，以原砾石戈壁层为底，上用数块长条形大石板覆盖。有单室、

双室和三室并列之分。葬式有仰身直肢、侧身直肢和二次葬。随葬品贫乏，但都有羊骨随葬。反映出他们的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并且有了阶级分化，年代大致在汉代。伊犁地区广为分布的土墩墓，其墓室结构多样，有石棺墓、土坑墓、木椁墓、竖穴填石墓、竖穴洞室墓。文化内涵也很复杂，即有汉时居此的乌孙人遗存，也有汉以前游牧于天山北之塞种人的墓葬以及其它文化的因素，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去认识。

在云南呈贡天子庙发掘了四十四座滇墓，其中以41号墓最大也最重要(《考古学报》4期)。墓全属长方形竖穴状。41号墓以一棺一椁为葬具，椁的上下及四周用青膏泥封固，四层填土中一层铺石。除墓主外有一儿童殉葬。出土器物三百一十多件，海贝一千五百多枚，绿松石珠以万计。随葬品中以青铜器为主，具有浓厚的滇文化特点。标本经^{14}C年代测定（树轮较正）分别距今2229±70，2280±120，1820±130年。根据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特征分析，作者认为以属战国中期为宜。墓主身分应是当时滇池区域的大奴隶主贵族。其它墓可分中小两型，时代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

大石墓是我国古代西南民族中一种土著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渡口的安宁河流域，即越西、冕宁、嘉德、普格、西昌、德昌、米易等县。刘世旭《试论川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6期)对该遗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大石墓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晚期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虽曾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但仍具有独特的风格。这地区汉代属於越巂郡。其族属当是《史记》所载的邛都夷。大石墓普遍实行二次丛葬。墓的构筑确实不易，它的产生显系对大石的宗教崇拜——即石神崇拜。大石墓的演变可分早中晚三期，即相当于春秋早、中期，春秋末至战国中晚期，战国末至西汉晚期。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考古

段鹏琦

1985年，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考古新资料和论述文章，

共计发表二百七、八十篇，反映了这个时期考古工作取得的进展。为叙述的方便，将瓷器和瓷窑遗址、石窟寺和宗教遗物两个方面集中起来，另立专题附之于后。

一 魏晋南北朝

1985年有关这一时期的报道，数量最多的是各个朝代的墓葬。

三国墓葬，以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卧马凼发掘的十五座蜀汉崖墓最为重要(《文物》7期)。这批墓葬的形制，有单室、前后室和多室三种，出土文物近三千六百件，除陶器皿、陶模型、陶俑、铜铁器及其他小件饰物外，还有五十二件青瓷器。据初步研究，这批墓分属蜀汉前期和后期，墓主可能是盐商或盐官家族。其葬俗与东汉无大差别，一些随葬品同东吴有某些关系。曹魏墓，历来所见不多，较大型者更少。1984年在河南偃师杏园村南清理一座较大的砖室墓，由墓道、前甬道、前室及南北耳室、后甬道、后室五部分构成。随葬品虽被盗掘，仍出土不少。发掘者认为，此墓从墓葬形制到内容均与洛阳16工区正始八年曹魏墓相近，其时代也应相去不远。这再一次表明，曹魏墓的形制虽与东汉晚期有所不同，但生活用具和模型器依然大量沿袭东汉晚期的作风(《考古》8期)。

两晋墓葬，有河南偃师杏园村西晋墓(《考古》8期)、山东诸城西公村西晋墓(《考古》12期)、江苏江宁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0期)、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9期)和江苏无锡赤墩里东晋墓(《考古》11期)。四处西晋墓中，除山东诸城2号墓为单室墓外，诸城1号墓及其他三处西晋墓皆为前后室墓。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各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同时，有的墓有明确的纪年，如江宁张家山的封门砖模印“元康七年”，广州沙河顶的券砖刻“太熙元年”，诸城西公村2号墓墓砖模印“太康八年”等，为研究当地晋墓的编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于广州沙河顶墓出土的青釉器，发掘者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广州晋墓所出年代最早的一批。多数器物釉层剥落，说明尚未完全达到瓷化的程度，然与东汉陶器相比，制作和烧造技术显有较大进步。这一突然变化，与中原人民南迁及先进技术的传播不无关系。关于江苏江宁墓出土的瓷器，发掘者认为，它们按质地优劣大致可分为两类，应出自不同的窑口：有的属越窑系统产品，有的可能出自宜兴均山一带。无锡赤墩里东晋墓为单室券顶砖墓，甬道顶一楔形砖上刻划“太

和五（年）八月”的纪年铭文，属于一般士族地主的墓葬。出土瓷器三件，其中的黑釉鸡首壶显系德清窑产品，为研究德清窑黑釉器的造型及烧造年代提供了新的实物标本(《考古》11期)。

南朝墓葬有：①南京马群南朝墓，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券顶单室砖墓，约属刘宋时期。随葬品中有青瓷器六件，其中的盘口壶，似为婺州窑产品(《考古》11期)。②南京童家山南朝墓，形制与马群墓相近，随葬器物四十二件，以陶瓷器为主，约属南朝中晚期(《考古》1期)。象这样随葬品丰富、品类齐全，而且未被盗扰的墓葬，在南京地区实属可贵。③江西高安南朝墓，为平面作长方形的券顶单室砖墓，约属宋齐时期。随葬品中有胎釉，造型俱较精美的青瓷器二十四件(《考古》9期)。④福州屏山二墓，1号墓平面呈凸字形，2号墓平面呈刀形，分属南朝早期和晚期，所出青瓷器（十二件和六件）釉色青绿，青中闪黄，质料到制作都具有浓厚的福建当地风格(《考古》1期)。

北朝墓葬也有四批，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①1973年和1978年在辽宁朝阳市及其附近，先后清理四座北燕石室墓，形制与冯素弗墓有若干相似，其中大平房村1号墓和北庙村1号墓为壁画墓。随葬品有陶质日用器皿、金银饰品、铜质带具、铁杆头以及远道输入的漆器等。大平房村1号墓墓主可能是北迁的汉族士族，其余三墓墓主同为北燕的鲜卑贵族。从壁画和随葬品中，既能看到鲜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典型文物，又可明显看出中原文化的深广影响(《考古》10期)。②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是当时著名的族葬墓地之一。继1973年发掘之后，1983年又发掘北魏至东魏时期的石筑单室墓五座，墓室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皆穹隆顶。出土二十九件瓷器和一批泥俑、泥明钱、铜器，还有崔猷墓志一方(《考古》3期)。根据两次出土的墓志，现已基本整理出东清河崔氏东清河鄃地和东武城两大宗支的世系。③山东济南马家庄和益都县各发现一座北齐石室墓，分别保存了一批壁画和线刻画像(《文物》10期)。④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及方形墓室皆绘彩色壁画。从北周柱国西河公李贤的墓志看，李氏乃陇西望族，兄弟子侄辈多为西魏、北周以至隋代的显赫人物。此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制度等方面都有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为探索隋唐时期多天井土洞墓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墓中随葬的数百件陶俑，色彩鲜艳，塑工精细，神态各异；部分陶俑无论体形、面

貌、衣着皆有突出的少数民族特征，展示了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墓中壁画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北周绘画作品，所出鎏金银壶、金戒指、玻璃瓶等西方传入的手工艺制品，还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文物》11期)。

南北朝时期窖藏文物的报道甚少。江苏镇江市金山园艺场的十三件铜器，一件铜熨斗残留梁“太清二年”的朱书纪年文字，是较重要的一批(《考古》6期)。较有价值的零散出土文物有：浙江余杭的陶质“蜀五铢”钱范(《文物》3期)；陕西岐山县的“魏率善氐佰长”铜印(《考古与文物》4期)；河南伊川县的魏晋“石工司马”铜印(《考古与文物》5期)；安徽肥西县的吴太平元年神兽镜(《文物》3期)；河南淇县的晋泰始九年神兽镜(《考古》4期)。

1985年发表的论述文章，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对于三国吴镜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王仲殊在《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考古》7期)一文中，通过对流散海外的几面佛像夔凤镜和近年南方一些地方新出同类镜的分析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看法：①佛像夔凤镜主要流行三国时代吴的中期和后期，到西晋，此类镜已开始出现“变形”，标志着它的盛期快要过去。东晋时，此类镜佛像纹样退化，使人难以辨别，说明已经衰落。②此类镜的分布地域，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即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最发达地区。③以佛像作图纹是吴镜的重要特点之一，这无疑是佛教在当地广泛传播的结果。作者还特别提到，夏鼐先生曾根据以往的资料指出，中国的黄道十二宫名称以隋代耶连提耶舍译《大乘大方等日藏经》中出现的最早，黄道十二宫的图形以新疆吐鲁番所出唐代写本中所见的最早。今天，由于许多佛像夔凤镜的天象图中存在巨蟹的图形（可能还有宝瓶、天称)，不能不使人觉得，早在三国时代，黄道十二宫图形已由印度传入中国了。王仲殊还在《吴县、山阴、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1期）一文中，根据对各地所出铜镜铭文的分析研究，论证了吴郡的吴县（今苏州)、会稽郡的山阴（今绍兴)、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城）是三国时代吴的三大铜镜铸造业中心。关于南朝文物及墓葬的研究，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3期)，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将南朝墓葬分作两期：第一期，南朝前期，即宋齐时期；第二期，南朝后期，即梁陈时期。文中并详细陈述了各期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主要特点。对南朝墓

葬的分类、分期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关于北朝文物的论述，有周伟洲《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一文(《文物》5期)。文章首先根据茹茹公主墓志考证了柔然和东、西魏的和亲关系，并指出，从陶俑及壁画看，茹茹公主采取了汉族的习俗和服饰；墓中出土萨满巫师俑表明，柔然除信佛外，还盛行原始巫术。其次，依据北齐尧峻妻吐谷浑静媚墓志和洛阳旧出吐谷浑玑墓志，考证了他们的世系，认定此二人有密切关系。有关高句丽考古的报道，公布了两处新发现的山城遗址。辽宁新宾县四道沟的黑沟山城，由八个高达数十米的狭长山脊环绕而成，山脊间豁口则以人工修建的石墙连接，平面略作长方形，周长 (8段峭壁墙、9段人工墙) 1493 米，面积5万平方米。在东城墙和北城墙上各发现城门一处。城内见到六处建筑遗址。邻近此城的富尔江，古称沸流水，是记载中高句丽民族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域，因此，此城的发现，为探索高句丽早期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物》2期)。吉林省柳河县的罗通山城，由紧密相连的东西二城组成，周长共约 7.5 公里。山城凭借着起伏跌宕的山脊构筑，东城环抱着一个较大的盆地，周围多以山脊为壁，只在地势低洼处垒起短墙，有城门两座；西城包围着几座小山和由这些山脊分割开来的盆地，除东墙的一段借用绝壁外，大部分城墙都是在山脊上石砌而成，有城门三座。据研究，东西二城属同一时期，其建筑年代，应在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之后、筑建国北新城 (抚顺高尔山山城) 之前(《文物》2期)。

对高句丽文物的研究，近年来正在不断深入。林至德、耿铁华《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及其年代》(《考古》7期) 一文，将迄今为止集安境内出土的数百件高句丽瓦当，分作铭文瓦当、莲花瓦当、兽面纹和忍冬纹瓦当三大类，类下又区分为若干式，并分别考证了各式瓦当使用的年代。他们认为，大约在三世纪的中晚期，高句丽建筑才开始使用板瓦、筒瓦，并逐渐使用瓦当。高句丽建筑的这一进步肯定是接受中原影响的结果；现知年代最早的是中原式卷云纹瓦当 (铭文瓦当)，其制作年代大都在四世纪初期。四世纪末，高句丽开始烧制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瓦当。瓦当的出土地点还表明，在高句丽，使用瓦当有较严格的等级界限，王公贵族生前的宫殿、居室、官府和死后墓上的享殿、祭祀的殿宇都以瓦盖顶，而居住郊外或边远地区的庶民百姓只能以草为庐，决不能用瓦的。魏存成所写的《高句

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5期),以此类壶所从出的集安高句丽封土石室壁画墓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归纳出四耳展沿壶本身形制、纹饰的演变规律，认为这种四耳展沿壶流行的年代当在五世纪前后。过去日本学者认为石墓流行于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作者以为,从墓葬形制及所出马镫、四耳展沿壶来看。石墓的年代应与封土石室壁画墓基本相同。

1985年,杨泓相继发表的《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考古》1期)、《新罗“天马冢”马具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论述了中国古代马具对古坟时代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马具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古代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

二 隋唐五代

1985年发表的隋唐陵墓资料，包括隋唐帝王陵墓调查和一般隋唐墓发掘两部分。

新调查的隋唐帝王陵墓有：①隋泰（太）陵，系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扶风县东南的王上村旁。陵台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66、南北宽160米，现存高度27.4米。据钻探，陵园东西长756、南北宽652米，四面垣墙中部及陵园四角皆有大量砖瓦残片，当分别为门道和阙楼之所在。在陵东南0.5公里余的陵角村和陵东村之间的一片高地上，原有隋文帝祠庙遗迹，1982年复查时，尚可看到整体作长方形的院墙残迹，院内有倒卧螭首圭额石碑一通(《考古与文物》6期)。②唐兴宁陵，乃高祖李渊之父李昞之墓，位于咸阳市后排村北原上。除陵台外,陵园范围均已成为耕地，无陵垣痕迹。陵台呈圆形,底部直径13、高约5米。陵台南列置石刻，自南至北有天禄一对、鞍马两对、石狮一对；据当地人介绍，鞍马南旧有石人三对，今皆没于地下(《文物》3期)。③唐恭陵，系高宗太子李弘之墓，位于河南偃师县南部的景山上。陵台呈覆斗形。陵园整体作方形,每面各辟一门,四角皆筑角台；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南门外夹神道自北至南有石人三对、石马一对、华表一对。东侧第二、三石人间并有唐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一通。调查者认为，此陵和顺陵一样，神道不修在陵台正南方，而是向东偏，可能含有较其他帝陵降一格的意思(《文物》3期)。④唐惠陵，是玄宗之兄让皇帝李宪之墓，位于陕西蒲城县三合村的东北，其陵台呈圆椎形，底部直径81、高约14米。陵园有双重道围墙，里

边一重，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800米，南门及北门外皆有东西相对的土阙。陵园内外有许多建筑，如陵台东南有献殿遗址，西南有下宫遗址等。陵前大型石刻群同样集中在神道两侧，有华表、天马、朱雀各一对，石马五对，石人十对（《考古与文物》2期）。这些陵墓，除隋文帝陵外，皆非事实上的皇帝的陵墓，但有关资料，对隋唐陵墓制度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一般隋唐墓葬的报道，内容颇为丰富。湖南郴州发现的两座隋墓，每墓仅随葬一至三件青瓷器，但其中均有一盘口壶。M_5之后壁砌出一个马鞍形浅龛，龛内砌一宝塔。作法十分特殊（《考古》8期）。浙江衢州市近年清理了八座隋唐墓，属隋至唐代中晚期。M4和M20分别出有"仁寿元年"和"武德八年"铭文砖，是难得的纪年墓。整理这批墓葬资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当地隋唐墓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品演变规律的认识。这批墓（包括纪年墓）出土了一些具有婺州窑釉色特征的青瓷器，为婺州窑断代增添了实物依据。M5还出土了在浙江省尚属首次发现的唐三彩马和骆驼（《考古》5期）。江苏镇江唐墓，共二十三座，分属唐代中期和晚期，出土墓志、买地券十六方，还有相当数量的越窑、铜官窑、北方白瓷等精美器物，以及造型、纹饰俱佳的银梳背、钗簪、铜带饰，无疑是当地唐墓分期、断代的重要资料。

这一年报道的还有四座唐开元以前的纪年墓：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路家湾的司马睿墓（《考古与文物》1期），湖北安陆王子山的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2期），宁夏固原王涝坝村的史道德墓（《文物》11期），河南偃师城关的李元璥墓（《中原文物》1期）。其中，司马睿曾在晋王府及太子宫中供职，一直追随后来成为皇帝的李治，他和吴王（恪）妃杨氏都是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人物。这些纪年墓大多出有一定数量的陶俑、陶瓷器皿，对各自所在地区的唐墓断代颇有裨益。唐吴王妃杨氏墓，是一座大型砖室墓，分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和后室五部分，并有排水设施。该墓早期即遭严重破坏，然所出器物之丰富，仍非上述诸唐墓可比。关于杨氏埋葬的时间，发掘者根据《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认为可能是贞观年间吴王恪任安州都督时。至于其墓被毁的原因，发掘者推测或与高宗时吴王恪参与"谋反"被诛一事有关。宁夏固原史道德墓，从墓志看，史道德只是一个八品给事郎，任兰池正监这样的马政官，

其墓居然有长斜坡墓道和七个天井，这在长安及中原一带唐墓中是很难看到的。是僭越行为，还是另有原因，确是一个应该研究的问题。关于死者的身份，发掘者将死者使用覆面、墓中所出圆形金饰和罗马金印都是西方传入品等同墓志结合起来分析，认为他可能是昭武九姓中史姓胡人的后裔。

长沙唐太和六年王清墓，是长沙五百余座唐墓中唯一有纪年的墓葬，发掘于1952年，所出青瓷器早已为学界所知，但1985年才第一次报道了该墓的完整资料。此墓的碗、碟、罐等十四件青瓷，以往或以为是岳州窑制品，或以为与长沙窑有密切关系。简报作者则认为，王清墓瓷器多属长沙窑制品，但又具有岳州窑的特点，表明长沙窑与岳州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考古》7期)。

此外，在西安东郊堡子村和郭家滩，还分别发现唐代宦官许遂忠和李敬实的墓志(《考古与文物》6期)，从志文可以窥知中唐以后吏治腐败、宦官擅权的黑暗社会现实。

报道中所见零散出土的隋唐文物，较重要者有河南遂平出土的唐代透光镜(《中原文物》2期)、安徽怀宁出土的唐代马球镜(《文物》3期)、新疆哈巴县出土的唐人物花卉纹带柄手镜(《考古与文物》4期)；四川什邡县所出唐或五代的金腰带(《文物》5期)，河北宽县所出的唐代银盘、银执壶(《考古》9期)，苏州市郊出土的唐三彩扁壶(《考古》9期)等。再有浙江舟山(《考古》10期)、河北石家庄市(《考古》4期)发现的唐代窖藏铜钱和广州市东山梅花村发现的南汉窖藏铅钱(《考古》6期)。

对渤海国的考古工作近年又有新收获。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一宫殿的东西廊庑遗址，三十年代日本人曾作过发掘。1981和198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再次清理了这两处遗址。在两廊东西向段的中部各发现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单元，可能是楼、阁之类的附属建筑；两廊的南北向段，日本人曾称其为二十八间，这次清理发现，日本人漏清一列柱础，实际应为二十九间；清理中还弄清了廊庑建筑内墙柱、地面以及柱础的结构，从而纠正了日本人以往资料的错误，使两廊的布局、结构完整地呈现出来。发掘者认为，两廊的建造年代可能晚于第一宫殿的主体建筑(《文物》11期)。上京龙泉府宫城南垣的城门遗址，1979年已清理过一处，即午门址东侧的1号门址，1982年和1983年，又相继清理了午门台址和台址西侧的2、

3号门址，1号门址东侧的4号址，取得了对渤海宫城城门形制和建筑结构的新认识。诸城门均采用长安城门习见的以排叉柱支撑的大过梁式结构；门枕石、门槛石也近似于唐代建筑的形制。1、2号门应为上层统治者进出的通道；3号门址供运输及宫廷其他人员出入；4号门为假门，大约是为取得城门设置的均衡布局而特意修建的(《文物》11期)。

五代时期，报道了1983年杭州市内江城路立交桥工地发现的钱氏捍海塘遗址(《文物》4期)。

三　宋辽金元

1985年有关宋辽金元考古的报道，主要涉及墓葬、窖藏、瓷窑遗址诸方面。

北宋墓葬，以王拱辰夫妇合葬墓最为重要。此墓位于洛阳龙门南10公里的伊川县窑底村西，由主室和二个侧室组成，三室均以青石条构筑，平面皆呈方形。随葬品仅有少量铜钱，但主室内出土王及二夫人的墓志三合。王拱辰乃一代名臣，平生所为，与北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以至民事皆有密切关系，史籍记载简略，而墓志叙述颇详：既有王五次出使辽邦的事迹，又有王关于加强东南边备以及宋与西夏、吐蕃关系的论议，还有王在重大内政事务中的奏议和行事，很有史料价值。王拱辰墓志由安焘撰文，苏辙书丹，文彦博篆额，文词、书法、刻工俱佳，堪为文物珍品(《中原文物》4期)。浙江兰溪北宋石室墓，也是一座纪年墓，以条石砌成，平面呈长方形，中间加砌石墙一道，将其分为二室，分葬墓主夫妇。墓中出土青白瓷及青瓷器十余件，既有制作精细的景德镇湖田窑上等产品；又有工艺较差的当地宋窑产品。这些器物在纪年墓中出土，为同类器物断代提供了依据(《考古》2期)。福建尤溪北宋墓，是一座券顶砖室墓。最可贵的是，墓室左右壁和顶部都有墨笔描绘的壁画。宋代壁画墓发现得不多，在福建更是罕见，故而弥足珍贵(《文物》6期)。在河南新乡县丁固城清理北宋早期到晚期墓葬十九座，有竖穴土坑墓、券顶砖室墓和叠涩攒尖顶砖室墓三类。前二类是当地常见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甚少；第三类为迁葬墓，一般没有随葬品。第三类墓中有一种鸭身形墓，规模最小，形制特殊，为以往所未见。它们密集地聚合在一起，被认为是一个家族或某一种宗教徒的迁葬墓群(《中原文物》2期)。

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发现的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应是近年南宋墓的又一较重要发现《考古学报》3期)。该墓为同坟异穴合葬墓，以红砂岩石条和石板筑成。

二墓室平面皆呈长方形，由墓门、享堂、棺室、腰坑等部分组成。墓早年被盗，随葬品存留较少虞公著夫妇墓志，皆作碑形，志文所载公著父允文事迹，与《宋史》允文本传相符，但较本传为详，可资补充。然该墓的真正价值，是墓室内保存的一大批高浮雕和浅浮雕的石刻作品，为研究宋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新报道的辽墓也有数处。1971年在辽宁建昌县下五家子村北龟山南坡发现辽代墓地一处，共有五、六座砖墓，龟山1号辽墓即其中之一。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东西耳室、主室五部分组成，有石门两道，主室平面呈六角形，其北、西、东三面均发现有已倒塌的柏木方子"墙栅"。此墓为火葬墓，墓主应为日益汉化的契丹贵族，所出景德镇窑系影青瓷、定窑系白瓷和两件银杯，应是由中原传入的手工业制品。此墓从未被盗，年代可能属于乾统年间。是研究辽代墓制和宋辽文化交往的一份完整资料（《文物》2期）。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为平面作圆形的穹隆顶砖室墓，墓门外有八字形护壁，墓室西部残存的腐朽木屋棺罩，形制与法库叶茂台辽墓所出相似。随葬品比较丰富，均属典型的契丹文物，墓主无疑是辽代官员或贵族，其埋葬年代，可能在圣宗前期。从带铸和鎏金铜双鱼所表示的官秩品阶不符推测，当时辽代可能在职官中实行了"借鱼之制"。发掘者还通过对新出带具的研究，对革带的用法提出了新的意见（《文物》3期）。

辽夏蕴石棺（亦即骨灰盒），出自内蒙宁城县辽中京故城内，石棺盖上刻有石棺记一篇，记述夏蕴的官职、姻媾及迁葬的时间、地点。曹汛在《辽〈夏蕴石棺记〉考述》（《文物》5期）一文中，考订夏蕴的迁葬时间应为重熙二十年四月十一日早晨6—8点。并指出，夏蕴石棺记以蓂荚生凋记日，以甲乙丙丁记时，迁葬日期选择太岁日等等，不仅反映出辽代文化受神仙道教、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而且表现了辽代文化与唐代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嵇训杰在《辽〈耶律加乙里墓志铭〉补释》一文中提出，志文"六节度司王口宁"一语中的"王口宁"当指奚王筹宁，亦即奚和朔奴。他还认为，辽代契丹族兼行部落内婚制和部落外婚制，耶律加乙里盖出自辽代"三耶律"之一的遥辇部族，而嫁奚王筹宁为妃，这正是契丹族实行外婚制的事例（《文物》5期）。

新报道的山西长子石哲金墓、甘肃静宁张家湾金墓都是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长子石哲墓

壁画的主要内容是孝义故事，墓室东壁有“正隆三年二月十六日了，壁画匠张琼、程经”墨书题记(《文物》6期)。静宁张家湾金墓，画砖及模制浮雕砖所刻画的内容除孝义故事外，还有推磨、舂米等生活画面，象征吉祥的画面和花卉装饰图案。时代约为金代初期(《考古》9期)。山西永济发现金代券顶砖室墓，出土一具前档装有可开启小门的青石棺，棺的左右帮上刻有孝义故事，棺上还有“贞元元年”题记(《文物》8期)。

新发表的元代墓葬。三门峡上村岭元墓是一座竖穴墓道横室土洞墓，墓室四角和中间，各放涂彩不同的卵石一枚，是一种与五行思想有关的葬俗。随葬品中有一件记事颇详的元贞二年买地券，不仅说明该墓的确切年代，而且明确将所买土地划作坟地和赡坟地两部分，对研究当时的墓地制度是非常有用的实物依据(《考古》11期)。长治捉马村两座元墓，都是仿木结构砖室壁画墓，2号墓有“大德拾壹年”墨书题记，壁画的主要部分同样是孝义故事(《文物》6期)。辽宁凌源富家屯三座元墓，墓室皆呈方形或长方形，叠涩穹隆顶。1号墓用黄色泥板岩和青砖砌成，其余二墓全部以黄色泥板岩构筑。2、3号墓墓室中部及四角也放有涂色砾石。墓葬壁画的内容与前述金元墓不同，没有孝义故事，突出的题材是柳荫别墅、游乐图、探病图、行猎图。它们的时代，约属元代早中期，墓主人可能是蒙古人(《文物》6期)。

1985年报道的宋元窖藏文物，除瓷器见下外，有金银器、漆器、钱币和印章等。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的三件银器，内有鱼龙提梁壶二件、鸡冠壶一件，均鎏金錾花，具唐代金银器的工艺风格，又体现契丹文物的造型特征，堪称辽代金银器的珍品(《文物》2期)。北京市延庆罗家台窖藏中的一件朱素圆形漆盘，底部有朱书款识三行，中行“内府官物”；右行“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左行“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是建国以来北京市出土的唯一带款识的漆器(《文物》4期)。新报道的宋元钱币窖藏较多，其中出土钱币数量最多的是吉林九台的一批，总重160余公斤，(《文物》1期)；而新鲜品类较多的却是宁夏银川所出，其二十一枚金代篆文“泰和重宝”和二十五枚元代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其中不少是饰花纹的压胜钱，它的出土对研究金元货币经济及宗教习俗俱有一定意义。

各地发现宋元时期铜印，尤其是金代铜官印甚多，仅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品就公布十一枚之

多，辽宁丹东发现有金末耶律留哥大辽政权官印，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还发现有元末红巾军明玉珍大夏政权所属鄂西地方政权机构的印章均见(《文物》5期)。

碑刻材料应该提到以下两件：一是福建莆田发现的王禹偁撰陈仁璧墓碣，它记载了陈说服闽南军阀陈洪进纳土归宋的史实，并留下了一篇北宋名家的散文作品(《文物》5期)。二是河南开封陈留乡发现的一块宋嘉祐楷篆二体石经残石。宋嘉祐石经残石遗物历来甚少发现，这次出土的残石，体积较大，属《周礼》的第一块碑，更为可贵(《文物》1期)。

1982年冬，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大街北首发现一处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遗址内玻璃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仅在清理的403平方米内，就有大炉一座，小炉二十一座。大炉，底呈方形，用以溶化矿石、生产玻璃料条；小炉，底作凸字形或亚葫芦形，用以生产玻璃制品。地层中出土大量玻璃炉工具、玻璃原料、玻璃料、丝头、玻璃制品等。据遗址情况，这是一处工匠集中，分工较细，以制造珠、簪、环饰为主的大型手工工场遗址。这类遗址，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考古》6期)。

新发表有关宋元时期考古的论述文章，涉及到铜镜、碑刻等方面。

陈柏泉《宋代铜镜简论》一文(《考古与文物》4期)，列述了宋镜的各种形制及其装饰花纹，并逐一论述了湖州镜、饶州镜、建康镜及其始铸年代。关于湖州镜，作者指出，浙江湖州是宋代最著名的铸镜中心，产品冠绝一时。从镜铭看，当时湖州铸镜铺及工匠众多，民营手工业的小商品生产有了突出发展，商品竞争激烈。至于湖州镜的铸造年代，以往均定为南宋，但出土实物表明，其始铸年代可以上溯到北宋中期。作者认为，饶州是次于湖州的宋代又一铸镜中心，然饶州镜的铸造年代目前尚难论定，如考虑到当地的冶铸史，且饶州镜又与湖州镜的造型、铭记风格一致，可以推断其铸造时间可能同于湖州镜。作者还认为，建康也是宋代铜镜铸造业的重要地区，建康镜的铸造年代，似与湖州镜、饶州镜同。作者举例说明，某些常被指为“宋镜”的铜镜，实际是明代镜。

另外，1980年在新疆阿图什县牙尔干还发现一批窖藏的喀喇汗朝铜质货币，共一万八千枚左右，重约130公斤。据抽样研究，其中90%以上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在位时所造，其次是

“迪尔赫姆”式样钱币和“桃花石可汗”钱币，与其同出的还有九枚北宋铜钱，大约是十一世纪上半叶至中叶的遗物。这是迄今新疆地区发现此类货币数量最多的一次(《文物》12期)。

浙江宁波市天一阁内，保存着三块宋孝宗乾道三年三名居住日本太宰府博多津的华侨在明州舍钱修砌“礼拜路”的刻石。顾文璧、林士民著文加以介绍，指出它们是已知的我国国内所存最早的华侨文物，为中日两国学人共同关心的太宰府与明州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把关于日本华侨聚居区的历史记载推前了四百年(《文物》7期)。

四 明清

1985年报道的明清考古资料，有遗址、墓葬和一些同历史名人有关的文物。

吉林省梨树县的叶赫故城，是明代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都城，由东西两座城址组成。东城位于一座椭圆形台地上，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城垣沿台地边沿修建，土石混筑，周长900米，城西部和东北部各有一城门，西门外有不大规整的瓮城。城垣外发现马面三处。城内东南部有圆形高土台两座，台西北有一较大型建筑遗址，或即当年叶赫部首领居住的地方。西城建于一座自然山丘上，城垣依山势而筑，有内外两重。内城呈不规则形，周长850米，城垣亦土石混筑，西垣及城西北角、东北角各有一城门，门外皆筑瓮城门。城内中部偏北处，散布建筑构件较多，应是一处较重要的建筑群。外城破坏较甚，从残迹看，可能也是椭圆形。证诸文献，此城最晚也应筑成于明万历十二年以前(《文物》4期)。从明代起，广州之铁即以质佳著称，据记载罗定大塘基是明清的冶铁基地之一。在1978年考古调查中，于分界公社炉下村发现了冶铁遗址，附近还发现了采矿和粉碎矿石的场所，应是一所较大型的手工工场，其建炉年代不会晚至康熙以后。1982年又在船步公社铁炉村发现一处冶铁遗址，其建炉年代可能在清代中期(《文物》12期)。1982年在西安市新城西南部发现一批青花瓷器，一些瓷片或器物上有青花书写的文字，诸如“典膳所造”、“秦府典膳所造”、“大明年造”等，似为民窑的产品，并出嘉靖通宝四枚。据考证，应是明秦王府嘉靖或稍晚时期的遗存(《考古与文物》4期)。

新公布的明墓，最有价值的是上海浦东陆氏墓，这次被清理的陆氏墓共两座，一座为明代词臣陆深墓，另一座即其子陆楫夫妇墓。两墓都以糯米浆三合土

浇筑成圹穴，内置髹漆棺椁，青石板封顶。据陆深墓志和陆楫买地券，两墓的年代为万历年间。所出一百五十余件珍贵文物中，发饰多将金、银、玉融为一体，并嵌以红蓝宝石，表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那块刻有阿拉伯数码的玉幻方，为“纵横图”中的“四四图”，比“九宫图”繁复，但比元安西王府所出“六六图”简单，它的发现，不仅为明代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数学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是研究明代伊斯兰教徒民间信仰的一件宝贵实物。三件玉刚卯，为继亳县汉墓之后的又一次发现。陆深墓志因系文征明晚年所书，亦是一件值得珍视的文物(《文物》6期)。洛阳东郊史家湾明墓，为一明嘉靖年间的券顶砖室墓，出土器物三十件，瓷器制作精美，铜器多仿古器，最受人注意的是那十一件青花瓷盘，同江西、浙江等地的青花迥然不同，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在洛阳周围一带烧制的(《中原文物》4期)。江苏江阴明墓，随葬品中有带纪年铭的明代戗金人物花卉漆盒一对，工艺水平很高，被认为是明代前期戗金漆器的代表作品(《文物》12期)。洛阳出土的明刘相墓志，记载了嘉靖三十二年由于“蒲城大饥”而“县官催科苛急”，冯勇、冯铎等农民被迫起义的史实，是一方有史料价值的墓志(《考古与文物》3期)。

对于明代埋葬制度的研究，有孔繁峙的《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制度》一文，文章认为，梅瓶是皇帝、皇后、皇妃、公主和皇子得封的郡王所专用的一种随葬品，它可能是一种“风水瓶”。从实例看，明初即已有了对随葬梅瓶制度的规定，依出土情况应是，皇帝陵墓随葬青花梅瓶四个，后妃墓二个，公主和皇子得封的郡王墓一个(《文物》12期)。

为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有关刊物还报道了宝船厂遗址、南京天妃宫及天妃宫碑、郑和铜钟、周闻夫妇墓志铭等有关遗址和文物(《文物》1、6期)。

五　西藏考古及其他

建国以来，西藏的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在考古学领域内长期以来仍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地区。十分可喜的是，近年随着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广泛开展，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85年集中发表的新资料颇多，现列专条予以叙述。其中，仅吐蕃时期的墓葬即发现二十余处，有墓葬近两千座。较重要者，有穷结县藏王墓、贡觉县香贝区石

棺墓、林芝县红光三队墓地、朗县列山墓地、乃东县赞塘村墓地及结桑村石棺墓群等。通过调查和试掘，现已掌握了吐蕃墓葬的基本特征，并发现各墓地之间可能存在着文化类型和时代早晚的差别。已可确认，四川西北部石棺墓建造者的后代与吐蕃之间有着历史文化的联系(《文物》9期)。列山墓地，位于西藏山南朗县东嘎区列村东北,分东西二区,两区共有封土墓一百八十四座。1982年对此墓地进行了两次调查和试掘,并调查了东区现存的三处建筑遗迹——房屋、祭祀场所、石碑底座，取得了关于该墓地的丰富资料。列山墓地以大、中型封土墓为主，座落于山脚中央，居高临下；小型封土墓则分散在大墓周围及墓地边缘。封土平面多呈梯形，也有方形、圆形、亚字形者。封土及墓穴皆为土、石、木结构。葬具有两种，一是石板拼成的无底石棺；一是直接将尸体陈放在石板叠砌的半圆形穴内。葬式，仅于小墓内发现屈肢葬一种。研究认为，列山墓地的年代可以初步定为吐蕃王朝（七——九世纪）或更早。列山墓地的墓葬布局，反映了吐蕃奴隶社会的严重阶级对立；小型墓显然处于从属地位，且为屈肢葬，有可能是殉葬墓；墓地上的祭祀场所，则可能同吐蕃殉牛马的风习有关(《文物》9期)。在山南地区乃东县还清理了切龙则木墓群G组M1的殉马坑，1号坑有马骨五具,2号坑有马骨三具,进一步为吐蕃盛行殉牛马的风习提供了物证(《文物》9期)。

1984年清理了树于穷结县藏王墓的赤德松赞碑，了解到此碑的完整形制，并发现过去从未见于著录的十二行碑文，碑文追述了先祖的功德，列举了赤德松赞的成就以及吐蕃与周围邻国的宗属关系。但关于赤德松赞的去世地点却与文献所载不同(《文物》9期)。1985年清理大昭寺前广场时，还发现了有名的唐蕃会盟碑碑座(《文物》9期)。这两通碑，都是吐蕃时期极其重要的石刻珍品。

在1985年，还报道了一大批与元明清时期西藏的政治、宗教等社会情况有关的收藏及传世文物，如西藏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僧俗印章(《文物》9期)，布达拉宫藏明成祖画像(《文物》11期)，明清唐卡，大昭寺藏永乐年间太监杨瑛碑、唐卡、菩萨造像，萨伽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哲蚌寺藏明清瓷器上，西藏地方明封八王的诰书及印章，拉萨的两部明永乐版《甘珠尔》,布达拉宫的五世达赖灵塔(均《文物》9期)，布达拉宫东侧的清代摩崖刻铭，有关清代驻藏大臣的文物均

(《文物》 11 期) 等等。王海燕在其所撰《清代在西藏流通的剪碎的尼泊尔银币》一文中，还论述了明末清初至十九世纪中叶尼泊尔银币在西藏使用的情况(《文物》 11 期)。

另外，四川叙南崖葬的调查又有新的发现。1984 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发表的调查简报表明，四川宜宾地区的岩墓盛行于宋，至元代仍然存在。1985 年报道了在对珙县、兴文、高县、筠连四县所属洛表、兴晏、罗扬、政治等四十二个公社的普查中,发现的崖葬点一百二十处、崖棺二十七具、石刻十五处、岩画七处，但未明确交代它们的年代(《考古与文物》1期)。根据调查资料,他们将叙南崖葬分为五式,即崖墓葬（直穴墓)、崖龛葬（横龛墓，此式又分二种)、崖洞葬、崖墩葬、崖桩葬，并研究了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石刻、岩画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在叙南地区崖墓葬和崖龛葬的第一种关系密切，往往共存于一壁，墓口周围或内壁多有颇具特色的石刻，但绝不见岩画；主要集中在南广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另在宜宾县境内横江下游、岷江下游及金沙江、长江南岸也有少量分布,应是川南僰人孑遗的遗存。崖龛葬的第二种和崖洞葬、崖墩葬、崖桩葬关系紧密，亦往往共存于一壁，不少与岩画相伴，但基本上不见石刻，主要分布于南广河上游兴文、珙县、筠连及高县南部，这一现象证实，崖葬同岩画不仅同时代，而且应是同一民族的遗存。从岩画和崖葬看，畜牧业和狩猎在此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民族应即史籍所载的僚人。

六 瓷器和瓷窑遗址

1985年发表的瓷器研究文章、瓷器窖藏和瓷窑遗址的报道，数量比往年为多。

南北朝时期有吴凤妹、吴志红所写《江西南朝墓出土的青瓷综述》(《考古与文物》 4期),首先指出江西制瓷业在南北朝时期已有很大发展，不仅文献记载当时景德镇已有较为发达的制瓷业，而且在九江、丰城、临川等地都发现了南朝时期的制瓷窑场；继而根据对建国以来江西省内所出南朝瓷（包括纪年墓出土一百零三件瓷器）中一批典型器物所作分析，总结出江西南朝青瓷在胎质、釉色、造型、装烧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江西地区青瓷的发展状况。

新报道的隋唐时期瓷器窖藏，以山东博兴张官大队一处寺院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这批瓷器共六十余件，有罐、瓶、碗、

豆、杯等，绝大多数为青瓷，个别为素烧器。据研究，其烧造年代不晚于隋，可能是隋末寺院受到农民起义冲击时埋入的。它们应是当时山东本地的产品(《文物》8期)。再有浙江东阳南市塔塔身夹墙中出土七件青瓷器，被认为是五代末属婺州窑系的当地产品(《考古》1期)。

近年在唐代扬州城的考察中，发现不少精美的唐代瓷器，其中有些还是长沙窑、岳州窑、寿州窑、越窑、邢窑、定窑、巩县窑等名窑的产品，然而最为引人瞩目则是三元路一带唐代地层出土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盘、壶等。据研究，这些青花瓷的烧造时代，应为中唐至晚唐，个别器物最迟也不会晚于五代；极有可能是河南巩县窑或邻近巩县之某窑的产品(《文物》10期)。关于我国青花瓷产生的时代，是个争论已久的学术问题，有人以为产生于宋或更早，有人则认为产生于元。扬州唐代青花瓷的发现，将使讨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至于《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器和一些残片，不仅体现了我国唐代同古代伊朗之间的密切交往，而且雄辩地说明了扬州在唐代海外交通史上的突出地位。

1979—1982年，山东大学在山东曲阜、泗水两县的泗河及其支流两岸调查，发现古代瓷窑遗址十余处，并对曲阜息陬、宋家村、徐家村和泗水尹家城、大泉等五处窑址作了重点调查。结果查明，这些都是隋唐时期窑址，以烧青瓷器为主，有的窑兼烧褐釉、黑釉、黄釉和酱釉瓷器，主要产品为碗、盘、罐、杯、盘口壶等，装饰手法有刻花、贴花、模塑。烧制瓷器用圆窑，装烧用叠式裸烧法；窑具主要是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垫圈、垫钉等，也见有匣钵。这些瓷窑中，时代较早者多分布于曲阜县境内，以宋家村窑最重要；时代较晚者多集中于泗水县，以尹家城窑延续时间最长，釉色最丰富，器类也最多。调查者认为，从宋家村窑产品看，隋代工匠已能比较熟练地掌握烧制青瓷的基本工艺。到唐代晚期，这一带瓷器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已有发展(《考古》1期)。

新报道的宋元瓷窑遗址有江西景德镇柳家湾窑、江西南丰白舍窑、江西铅山盏窑、湖南衡山窑、山西浑源界庄窑等处。江西景德镇柳家湾窑，窑址分布范围东西约1.5、南北约1公里，是景德镇窑系的一处著名窑场，盛产青白瓷。器形以碟、盏、碗、盘为大宗，胎壁平薄，成形规整，瓷釉细腻光洁，釉色早期泛白、晚期泛青，以多种手法美化瓷器，产品装饰颇具特色。瓷窑或平地起建，或依山而筑；所用窑具有

荡箍、匣钵、垫柱、垫饼等。其制瓷时代，大约起于五代，全盛于北宋，衰落于南宋中期(《考古》4期)。

江西南丰白舍窑，又称南丰窑，素以产青白瓷著称，产品主要是碗、盏、碟、壶等。现存堆积三十处，东西蔓延2公里，东部和西部窑址产品的造型、釉色均有所不同。由调查、试掘得知，白舍窑始烧于北宋初年或稍早，兴盛于宋代中叶，衰落于南宋中晚期。多以龙窑烧制瓷器，一钵一器仰烧是大宗器物的主要装烧方法，但也采用过涩圈叠烧、芒口组合式覆烧及套烧法。其早期产品，流行葵瓣厚唇器，圈足低矮，器形稳重，装饰朴素无华；中期器皿多葵口、侈唇、瓜棱腹，圈足增高，装饰图案多为作等腰三角形排列的成组朵花；晚期器物，多曲颈弧腹，斜壁小底，器表多施划花装饰，也用印花图案。白舍窑釉色，早期多艾青，中期则偏白，晚期釉色滋润，有的略现灰色。此窑还喜用褐釉点缀瓷器，犹如给瓷器镶上一圈金边，在装饰上独树一帜；瓦子山的曲颈盏，内壁剔刻月梅纹，也别具特色(《考古》3期)。

江西铅山盏窑，位于铅山县丁家村后山坡上。它是一处民窑，因盛产黑釉茶盏而得名。窑址范围东西约100、南北约200米。据调查，其产品确以茶具为主，有盏、碟、罐、汤壶等，釉色有青黑、绀黑、酱、酱褐、茶青多种，有的釉面出现窑变兔毫纹。烧制瓷器用龙窑，所见窑具有匣钵、垫饼、垫柱等，据推断，它应是南宋时期的瓷窑遗存(《考古》11期)。

湖南衡山窑，是这批窑址最值得注意的一座。该窑也以龙窑烧造瓷器，窑具有圆形墩式垫座、支珠等，主要产品有碗、盏、高足杯、盘、钵、罐、瓶、坛、尊等。器胎多呈灰色或褐色，表面往往涂白色化妆粉。器釉有透明薄釉、半透明釉、不透明釉三类。透明釉作无色玻璃状；半透明釉呈酱、青、绿诸色；不透明釉呈粉绿、乳灰、浑黑诸色。所有器物中，除素胎者外，几乎全施半釉，以施单色釉、两色釉、粉上彩釉绘花、釉下彩、釉下粉彩等手法装饰瓷器，也用印花、刻划、雕塑等技法。其烧造年代，上限可早至北宋末南宋初，下限可晚至明初。此窑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粉上彩釉绘花瓷器，在工艺上，它既不是釉上彩，也不是釉下彩，而是在器胎表面之化妆粉上，直接用彩釉绘花，外表不再施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色彩对比强烈，花纹活泼生动，艺术效果独特。同类窑址在湖南的衡南青冲、耒阳遥田、邵阳及长沙窑一带均

有发现，调查者提出，应将以衡山窑为代表的此类窑址定名为“衡山烧系”(《考古》3期)。

山西浑源界庄窑，是一座民窑系统的瓷窑址。窑址范围东西200、南北150米。其产品最大量的是粗白瓷和黑瓷。白瓷用玻璃釉但透明度差，使用刻划和剔地手法装饰瓷器，主要器形有碟、碗、罐、缸等。黑釉器胎多呈白色，部分为缸胎，釉质优劣不一，流行剔花装饰，黑白对比强烈，主要器形有罐、瓶、碗、灯等。还生产少量细白瓷、青瓷、钧瓷以及与辽三彩类似但更粗糙的釉陶器。其烧造年代，约始于辽代晚期，最盛期可能是金代，下限应晚至元代(《考古》10期)。

新发表的宋元窖藏瓷器，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哲里木盟奈曼旗发现的四十四件，多数为白瓷，最为珍贵的有三件紫定印花碗，属北宋时期的定窑产品(《文物》8期)。另一处是山东淄博市淄河店村出土的六十八件，其中五十九件白瓷器为北宋晚期定窑所产，一件天蓝釉盘为北宋钧窑所产，一件黄釉盘似为北宋晚期安徽肃窑所产，其余应为北宋晚期当地瓷窑的产品(《考古》3期)。再有成都出土二十件元代龙泉窑系青瓷(《考古与文物》6期)，山东茌平出土十二件晚唐至元代瓷器(《考古》9期)，其中也有一些精品。

江西吉州窑是宋代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李辉炳在《略谈吉州窑》(《文物》8期)一文中，论述了吉州窑的烧造历史、产品类型及工艺特征。指出，“吉州窑风格”的形成是从南宋政权建立以后开始的。他还认为，吉州窑的发展，是我国民间瓷器烧造业从北方转到南方的一个集中表现。在我国陶瓷史上，吉州窑是沟通南北并创造了许多新品种的一处极其重要的瓷窑，它的烧瓷史同景德镇窑有密切关系：在景德镇青白瓷生产优势的强大压力下，吉州窑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被迫放弃专烧青白瓷的传统，而闯出烧制多品种瓷器这条新路；在景德镇窑由单烧青白瓷转向生产彩瓷的过程中，吉州窑起了一定的促进和桥梁作用。陈定荣《吉州窑彩绘艺术及其影响》(《文物》8期)一文，根据1980年对吉州窑进行全面调查和试掘所获标本，分析了吉州窑彩绘瓷的典型纹样和艺术特色，指出，吉州窑彩绘的写实表现手法，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关于吉州窑彩绘瓷的生产时代，他认为，北宋晚期吉州窑已有彩绘瓷，晚至元代中叶仍在生产，历二、三百年而不衰。说到吉州窑彩绘的影响，他以为，吉州窑彩绘瓷的装饰纹样，虽不象元代晚期青花瓷

的纹样成熟和定型，但已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图谱，为后来青花、釉里红瓷的纹样奠定了一个基础。

李知宴的《从南朝鲜新安海底青瓷的发现看龙泉青瓷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期）一文，对过去一些学者将元代龙泉窑青瓷列为龙泉窑的衰落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以为，北宋后期龙泉青瓷生产虽有了初步发展，但工艺尚不成熟，生产不很发达。南宋时期，龙泉青瓷得到更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薄胎厚釉、艺术性强的青瓷约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元代龙泉青瓷发展很快，据推测当时建窑的数量要比宋朝增加四倍以上，薄胎厚釉这种高档青瓷在大窑等许多窑址都有发现。根据这一看法，他认为，新安海底龙泉青瓷属于薄胎厚釉一类，数量又大，只有元代才有这样多优质青瓷供外销之用。他还认为，新安海底龙泉青瓷并非一个作坊的产品，当时整个龙泉地区都应以外销服务为其生产的主要目的之一。至于龙泉青瓷的衰落，他以为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考古与文物》2期)。

陶瓷学家一向认为，南宋官窑有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两处，沙孟海在《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6期）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最先记述官窑有修内司窑的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和叶寘《坦斋笔衡》，所述皆属误传，于史实不符。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只有宋理宗咸淳四年所纂《临安志》较为可靠，据此书所述，修内司是官署而非窑场。他因而推断，南宋官窑窑址应该只有凤凰山南麓郊坛附近的一个，别无所谓修内司窑址存在(《考古与文物》6期)。

七　石窟寺和宗教遗物

1985年报道的石窟寺遗址，数量不多，但都很有学术价值。甘肃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是陇南地区规模仅次于麦积山的一处较重要的石窟寺遗址，分布于榆盘乡鲁班峡丛山之中，由拉梢寺、千佛洞、水帘洞、显圣池等四处遗址组成。千佛洞现存北周佛龛二十九个；拉梢寺现存大型浮雕式摩崖造像一铺、木构遮雨檐一处；水帘洞和显圣池，各有就天然石洞建成、满壁彩绘的石窟一处。这些窟龛的造像和壁画，多以一佛二菩萨为基本组合，塑像基本上仍是北周原塑，壁画大部分也是北周所绘，拉梢寺摩崖造像旁边並刻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尉迟迥造像题记，像这样以北周造像和壁画为主要内容的石窟，在我国现存石窟寺遗址中十分少见。水帘洞石窟群的

造像，多采用摩崖悬塑的作法，在壁画布局、壁画与塑像关系的处理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文物》5期)。

新疆库车附近的库木吐喇石窟，近年发现一批早年掩埋、封闭或不易登临的洞窟，其中沟口区第20窟、21窟，窟群区第75、79窟，保存情况较好，从中得到不少有关洞窟形制、题材内容以及年代演进方面的新资料。大约开凿于公元五、六世纪的第20窟，门道西侧龛中的坐佛，为目前所知龟兹石窟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塑像，塑造技艺较高，代表了龟兹塑像艺术的水平；窟室中央坛基的坐佛和双狮塑像残迹，还为了解龟兹方形窟中方坛的设置提供了线索。窟群区第75窟，凿于四鹘占领时期，其正壁绘有一幅轮回图，从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所存同类图像的制作年代得知，从公元五世纪至九世纪前后，这一题材在龟兹地区一直盛行不衰。窟群区第79窟，窟内壁画有三次重绘的历史。下面两层壁画的年代相近，均绘龟兹风方格千佛；而上面一层，系回鹘占领时期所绘，壁画内容及人物形象与下层壁画判然有别，是汉风洞窟利用龟兹风洞窟重绘壁画的一个宝贵实例(《文物》5期)。1978年及1980—1981年曾两次对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洞窟维修，施工中新发现洞窟十二个、佛塔三座、阶梯式通道一处，出土文物也相当丰富。新发现的洞窟，有十一至十二世纪建造的礼拜窟，有十至十一世纪建造的纪念窟，还有建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僧房。其中纪念窟在吐鲁番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既非地宫，又不是一般影窟，而是新疆地区所特有的一种为纪念高僧而修建的窟形建筑。出土文物中，计有晋——元代的汉文及回鹘文、梵文、粟特文、西夏文、婆罗米文等不同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文书、壁画稿本八百余件；泥塑和壁画残块数以千计；还有大型斗拱等木建筑构件、釉下彩莲花方砖等等。这些珍贵历史文物，对研究回鹘高昌时期的语言文字、绘画、宗教传播、经卷版本、印刷技术以及商业交通等都有一定的意义。高昌建昌五年（559年）姚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萨普门品》写本的发现，还为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开凿年代增添了可贵的实物依据(《文物》8期)。

西藏地区，对吐蕃著名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凿的查拉路甫石窟和第五代赞普赤德祖丹时期始建的寺院扎玛尔吉如拉康也作了调查与报道(《文物》9期)。

由著名学者担任编委、旨在介绍我国各地重要古代石窟艺术

遗存的多卷集《中国石窟》正在陆续出版，这是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迄今为止，业已出版的有《巩县石窟寺》及《敦煌莫高窟》第一、二卷。《巩县石窟寺》一书，共有图版255幅，实测图40幅，文中插图百余幅，并收入该石窟全部石刻题记及拓片；书中还有著名学者撰写的论文数篇，对巩县石窟寺的开凿年代、形制、造像特点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和考证。《敦煌莫高窟》共五卷，有上千幅精美图版和近七十万字的研究论文资料。在敦煌艺术研究领域中，它是迄今最丰富、最完备、学术水平较高的图集。新出版的有关石窟寺研究的专著还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等。此外，新发表的石窟寺艺术研究文章，有李文生撰写的《我国石窟中的优填王造像》一文，文章探讨了优填王造像的缘起和传入中国的历史、优填王造像在我国的分布、优填王造像龛的形制及造像特点，作者指出，按文献记载，优填王造像汉代已传入我国，但优填王造像作为石窟寺艺术的造像题材而加以雕刻或绘画，则是玄奘自印度返回长安以后的事。我国石窟中的优填王造像，仅发现于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其中尤以龙门石窟的造像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像龛通常呈规则方形或不规则方形。其造像的发髻、面相、衣饰、坐姿、手印都与一般造像有明显区别，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作者还指出，过去人们常常将此类造像误认为是优填王之像，当予以纠正(《中原文物》4期)。

见于报道的造像碑及零散出土的造像，有河南偃师北魏正光四年造像碑(《中原文物》2期)、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4期)、陕西临潼的一批北朝造像碑(《文物》4期)和山东、河南、甘肃、江苏的一些北魏至元代铜、石造像，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南郑州和陕西临潼发现的铜造像窖藏。河南郑州的窖藏铜造像，出自郑州西郊自来水厂内，共有铜佛及观世音造像十件、鎏金铜造像一铺，在七件造像上刻有带纪年造像题记。这批造像的时代均属北朝时期，它们不仅揭示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和要求，而且在造型、服饰、铸造工艺、艺术风格等方面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原文物》5期)。陕西临潼的窖藏铜造像，出于武屯乡邢家村村外，俱为鎏金铜像，计有完整造像二百九十七件，残像四十二件，另有背光、足床、残片等八十余件，题材有单身佛、菩萨、罗汉、力士、菩提树形七化佛、佛龛以及老子造像等，以观世音菩萨造像为最多，佛像次之，

两件造像上刻有纪年铭记，据推断，它们是唐武德至天宝年间的遗物(《文物》4期)。对于临潼这批窖藏鎏金铜造像的时代及学术意义，丁明夷在《关于临潼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像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唐代是中国佛教史上以建立宗派、传译佛经、发展寺院经济为主的新时期。单纯造出金、石佛个体像较前减少，木雕及铸铁佛像渐次流行，鎏金铜佛造像已失去了前此的势头。这批鎏金铜造像大部分仍是武则天后期至玄宗开元时期唐代造像盛期的风貌，天宝年间的观世音造像则已呈现出末流的趋向。他指出，这批造像中的金属捶锞佛像残片，数量虽不多，却较为珍贵，它们或许用于装饰佛殿，其中的精品，表现了唐代金属工艺的纯熟技巧。这批造像以观世音立像居多，结跏趺坐佛像中一部分应为阿弥陀佛，倚坐佛当是弥勒，其造像题材反映了当时对净土信仰的崇祠，展现出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侧面。他还指出，临潼发现北魏至唐代道教造像较多，当与陕西以及长安地区的特殊历史环境、与初唐至玄宗时期重道教的宗教政策有密切关系(《文物》4期)。

1985年阮荣春发表的《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辩》一文(《考古》1期)，对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时代提出新看法。他认为，无论从文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和造像风格的时代精神，或者是客观条件的可能来看，孔望山佛教造像的时代都应属于唐代前后而不是东汉。

有关隋唐时期宗教文物的报道，除石窟寺及造像外，还涉及塔和塔铭、舍利棺椁、碑刻等。陕西扶风县凤泉寺所出的舍利塔下铭(《考古与文物》4期)，说明凤泉寺应是隋文帝仁寿元年于三十州内修造舍利塔的诏书下达后，奉诏修建的三十塔之一。浙江杭州发现的隋禅宗三祖僧璨塔铭砖(《文物》4期)，明确了僧璨的卒年，对隋唐之际禅宗的传授历史有重要价值。陕西长安县终南山天子峪口发现的唐智该法师碑(《考古与文物》4期)明言，法师贞观十三年六月八日圆寂于长安灵化寺，生前活动有“又于京师诸寺讲涅盘、维摩、般若等经，摄大乘、中百、唯识等论”一语，报道者提出，一般认为，我国唯识宗的创始人为玄奘，而玄奘由天竺回到长安已是贞观十九年，是时智该已死五年。智该生前既已讲唯识，可见唯识宗开创的年代还应提前。此外，见于报道的还有河南林县阳台寺的唐代石塔(《考古与文物》2期)，江苏句容朱隍村发现的一组套装唐代铜棺银椁(《考古》2期)等。洛阳龙

门镇寺沟村发现宋元丰七年所立《龙门山天竺寺修殿记》碑一通，过去一直被视为佛教文物，温玉成《龙门天竺寺与摩尼教》一文，(《中原文物》4期) 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件摩尼教碑刻。他通过碑文考证提出，摩尼教在我国立寺应始于唐代宗宝应元年，比公认的大历三年始立法堂要早六年，断言“龙门山的西竺寺是我国最早建立法堂的摩尼教寺院”。如此，《龙门山天竺寺修殿记》碑则是新近发现的又一摩尼教文物。

有关宗教文物的论述文章，有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一文(《文物》7期)，文章首先论证了蓟州玉田韩家之兴衰概与有辽一代相终始。自入辽后，韩氏一族既多任南面官，又兼执北面两府枢要，且多任皇族四帐和北面边防要职，其与耶律、肖氏之关系，远非其他汉官所能比拟。因此作者认为，独乐寺观音阁采用规格较高的形制是不难理解的。独乐寺观音阁系韩匡嗣死后其子女奉其遗志而营缮，除一般功德外，立佛寺于乡里应是主要目的。鉴于五代以来，建立家寺之俗盛于辽境，由韩家重建后的独乐寺，疑亦具有韩氏家寺的性质，故其与韩家兴衰之关系特为紧密。徐金星《关于齐云塔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原文物》4期)，根据洛阳白马寺齐云塔现状及有关碑刻，讨论了此塔的历史。作者认为，今塔乃大定十五年重修之砖塔，在砖塔建造之前，此处原有一座九层木塔，过去流行一种说法称木塔创于五代，实际上木塔建于宋太祖开宝八年。保全根据旧存和新出土的宋、明碑刻，写了《从几通碑石看荐福寺、小雁塔的变迁和修整》(《考古》1期)，考证了唐长安荐福寺的变迁及小雁塔在历史上的损坏、修整情况，为小雁塔的修整复原提供了依据。

考古文物新发现

北京市

平谷县上宅新石器时代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保管所

上宅遗址位于北京市东部100公里的平谷县上宅村。遗址在金山南麓的山前台地上，南临泃河。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今年发掘500平方米。

遗址包含有三个时期的遗存：

1.唐辽至明清时期，包括唐辽时期的地层、灰坑及明清墓葬。

2.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只发现三座墓葬。出土陶鬲、陶罐、折腹盆等陶器十多件及一对铜耳环。

3.新石器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共分六层(③—⑧层)。分布在一条东西向的大灰沟内。共出土器物近千件，其中陶器三百多件，石器六百多件。第③层陶器多为细泥质红陶，素面。第④至⑦层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器型以钵、罐、圈足钵(豆)、支架为主；纹饰有抹条纹、刮条纹、之字纹、篦点纹、划纹、素面等。石器有石斧、磨盘、磨棒、盘状器等；还有一些细石器。另外还出土了几件陶、石雕塑艺术品：有陶猪头、陶羊头、陶空心小圆球、石羊头、陶、石异型器等。第⑧层出土陶片极少，皆为夹砂黄褐陶，棱形网状纹。

上宅遗址中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为研究北京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及墓葬形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上宅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大量器物，从早至晚，有较明显的演变规律，不仅为遗址本身的分期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研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空白。(赵福生　郁金城　王武钰)

房山县琉璃河西周墓

发掘时间：1985年4—7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继续发掘琉璃河乡黄土坡村西周燕国墓地。发掘面积1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大、中、小型墓葬二十五座，灰坑十五个，车马坑四个，出土器物主要有鬲、罐、簋等陶器和玉玦、贝等装饰品。有一座一条墓道的大墓，墓道南敞，填土夯筑。北部墓室为长方竖穴土坑，因盗掘严重，主要随葬品已洗劫一空，仅散见二百多片长条穿孔、长条节状和穿孔圆沧等蚌饰，几十件青铜小马饰及一件玉戈。另外，坑壁还残留椁板二块。在该大墓正北不远有一个车马坑，当为此墓的附葬坑，也已盗乱，实际车马数量不详。坑内残存三辆车的辕、衡、铜车饰以及部分马骨。车轮被拆下倚于坑壁放置。中型墓亦被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小型墓仅出陶器及少量玉饰和货贝，大都单棺无椁。与前几年发掘的小墓别无二致。

发掘的另一收获是，清理了一批灰坑，找到了几处灰坑与灰坑，灰坑与墓葬，墓葬、灰坑与文化层的叠压或打破关系。1981至1986年发掘区，因靠近京广铁路，其文化堆积层在修建铁路取土时被全部破坏，给墓葬的分期造成很大困难。这次的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关系，为墓地的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龚国强)

延庆县葫芦沟山戎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9—12月
工作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葫芦沟墓地座落在军都山脉狼牙墩南麓，距古城村北约300米。整个遗址现存面积约3600平方米。西侧为遗址残余部分，有大量的灰坑遗迹，很少发现墓葬。墓葬稠密区集中在中部、南部和东部。

这次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发掘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一百零七座，清理同类文化灰坑二十五个，并发现同期祭坛一座。出土各类陶、石、骨、蚌器及各种青铜器物千余件。

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多无棺椁，排列密集，很少相互打破。葬式大多数为仰身直肢，少数仰身屈肢；殉牲情况较普遍，

主要是殉犬，也有牛、犬同时殉葬的，其中殉牲组合的繁简及其数量的多寡，多依死者身份的高低而各有差别；此外，死者多有佩戴项链和弹簧式铜丝耳环的习俗。

祭坛设在墓区南部近于中心位置，由十五块立置的自然石块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靠近中央的一块立石较高。祭坛的设置，是这个少数部族信仰原始宗教的实物见证。这样完整的祭祀遗迹，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它可能与这个少数部族的祭山或祭祖一类活动有关。

从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看，葫芦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以各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其最显著的特色；工具则是以数量繁多的各式青铜削最具特点；青铜饰件中尤以铜带钩最富特色，不仅出土次例多，而且造型别致、款式新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亦兼有泥质灰陶器。在两系陶器中，均不见鬲、甗。夹砂红褐陶系，主要器类为短颈鼓腹平底罐和饰有指甲纹或锥刺纹的双环耳鼎形罐；泥质灰陶系的代表性器类为长柄浅盘豆和折肩罐。

上述青铜器和陶器群的特征和一些埋葬习俗方面的特征，与燕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属东胡）均判然有别，应属山戎文化的遗存。

葫芦沟墓地的发掘，使学术界初步了解到春秋战国之际山戎文化在北京地区分布的地理特点及其基本内涵特征，为今后考察山戎文化的分期编年和埋葬制度、原始宗教、经济生活、军事活动、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力水平，以及深入探讨山戎文化与燕文化和东胡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靳枫毅　崔学谙）

海淀区太平路唐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3月27日

墓葬位于海淀区太平路附近，施工中发现。墓为单室，穹窿顶，平面略呈圆形，墓室门南向。墓葬早年被盗，墓顶大部分不复存，随葬器物也几乎全无。墓内西部和北部是一个连成一体的砖砌棺床。墓壁上绘有壁画，由墨线勾勒而成，其中一幅绘的是置于方形案几上的炊食器皿。墓室壁上还饰有砖雕门窗、灯座、柱子和斗拱等，皆涂以朱彩。出土墓志两方，其一是志盖，篆刻“纪公墓铭”和十二

个形态各异的人物肖像；其二是志文，记述的是纪公夫人张氏事迹。由志文可知，纪公系“游击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曾“出总偏兵，汗马行边”，张氏随夫戍边，于大中元年(847年)卒于潞邑(今通县附近)“葬于蓟城西幽都县幽都乡石槽之原”。(据《北京日报》1985年5月26日)

天 津 市

静海县东滩头汉墓

发掘时间：1982年—1985年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墓地位于静海县西南15公里的东滩头村东侧，村西为南北流向的黑龙港河。1982年发现，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九座(汉墓七座、宋墓二座)，出土文物二百余件。

墓葬早年被盗，地面封土皆已不存，有的墓室顶部坍塌或变形，墓室结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部分墓葬坐北朝南，排列有序，一般间距为5至14米，均由墓道和砖砌墓室组成。按墓室多寡和结构异同，可分为砖砌徼道墓、多室墓、单耳室墓三神形制。

砖砌徼道墓一座，规模宏大，形制特殊，保存比较完整，南北长39、宽10.4米，由四条墓道和二十二个墓室构成。墓室按庄园建筑的布局修成，在四周徼道的包围中分前、中、主、后四室和左右耳室。均为四角攒尖顶，顶部砌成后灌注白灰浆和碎砖块，使其更加牢固。墓室间以过道，券门相沟通，墓道、券门和过道顶部大部分都有朱书或墨书题记，标明墓道方向和墓室用处。在围绕墓室四周“回廊”式建筑的券门上大部分墨书“徼道”等字。

多室墓两座，由一条墓道和前、中、主、后室和四、五个耳室构成，长13、宽6米左右。墓壁和券门顶部施黑、白、红色几何形彩绘，色彩鲜艳。

单室墓四座，结构比较简单，一般在墓室的一侧建一耳室，墓室狭窄，只能容一人，长2.7、宽0.6米左右。

各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不等，徼道墓和多室墓内的随葬品，制作精致，种类繁多，器形高大。单室墓内的随葬品比较少，制作

粗糙，有的根本无随葬品。出土的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前室或耳室内，少部分位于棺木的周围。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包括灰陶、红陶，彩绘陶和釉陶，规模比较大的墓以釉陶为主。器类有方形楼、扁楼、瓮、罐、壶、盆、盘、鼎、钵、熏炉、案、耳杯、勺、连支凤鸟灯、镂孔堆塑车马人物灯座、碓、井、水磨、灶、厨夫俑、鸡、鸭、鹅、狗、猪、猪圈等。另外在棺木的周围还出土"五铢钱"多枚以及骨簪、玉珠、铜泡、蚌片等装饰品。器物形制与已往东汉晚期墓中的遗物基本相似。(赵文刚)

蓟县逯庄子乡东汉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5月4日

工作单位：蓟县文物保管所

墓葬位于逯庄子乡境内，由苗圃场工人发现，为一座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陶灶、猪、狗、仓、香炉、奁等五十八件陶器和一百多枚汉代五铢钱。(摘自《天津日报》1985年5月17日)

蓟县明代长城

调查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蓟县北部的明长城遗址，东接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关，西接北京市平谷县将军关，总长约40多公里，部分城墙与河北省兴隆县接壤。这次调查关城一座，水关一座，墩台七十四座，烟墩八处二十七座。

黄崖关建在泃河西侧，建于明永乐年间。呈刀把形，北墙周长858.5米，东、西、南三面设门，北墙不设门，只有一城门洞。城内有一南北向子墙，长211米，将关城分成东西二部。东城墙外有一小瓮城，东墙已毁，南墙残长47.5米。瓮城北墙亦即边墙，设门，是关外进入关城的必经之道。城内路面多以丁字形排列，纵横交错，当地称作"八卦街"。

水关位于城东北角，控扼泃河，已毁，仅存河两岸敌台遗迹各一。

长城墙体有石砌和包砖二种类型。石墙居多，结构分干垒和白灰沟缝两种，使用天然石块，就地取材。石墙马道较窄，单面女墙。

包砖墙主要在黄崖关两侧，初筑石墙，内填碎石及黄土夯筑，后包条石和青砖。在一些险要地段，除主体城墙外，另设外边墙，均石砌。在山势险峻之处，利用悬崖峭壁作天然屏障，不筑边墙。

墩台大部分跨墙而建，只有十六座远离边墙。跨墙墩台分实体和空心两种。空心敌台下部为数层条石筑成石基，其上用砖砌，部分用原墩台加高、加大，每面箭窗一至五个不等，顶部有女墙，有的建有铺房，多分布在黄崖关两侧。实体墩台散建于长城沿线，一般间隔几十米或百米，石砌较多，少数用砖包砌。离开边墙的墩台，多建于长城内侧的山脊上，均石砌。

黄崖关北1公里泃河谷地中的一小山上，有圆形空心敌台一座，名凤凰楼。直径16.5米，高5米，有石墙和边墙相连。原有一门、十一箭窗和铺房。

烟墩发现八组二十七座，每组二——四座不等，每座2平方米，高1米余，中空，四面各一点火孔，石砌。分布在长城沿线各制高点上。

清理长城墙基和墩台时，出土一些明代遗物，有铁剪、铁刀、顶针、青花瓷碗、酒杯、黑釉灯碗、象棋子及两尊铜炮等，并搜集到一批与长城有关的碑刻资料。(王同立)

天津市区出土大批清代铁钱

发现时间：1985年11月

工作单位：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天津市区海河以东(即原三岔河口附近地带)，在修建工程进行中，距地表深1.8—2.2米处，发现大量的清代铁钱遗存。现场暴露铁钱堆积范围长7.6、宽6米，迭压厚度25—60厘米不等。据估计已出土的铁钱约达十吨左右。这批铁钱大部已锈蚀凝固成堆。初步观察该钱形质大致相同，多数为串可辨。正面钱文“咸丰通宝”。背面满文二字，均属咸丰年间福建“宝福”局所铸。(敖承隆)

河北省

武安县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7月26日—12月5日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化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武安县文物保管所

今年发掘面积共925平方米，清理灰坑和窖穴一百二十三个。共出土文物五百六十九件，其中包括陶器一百六十九件；石器二百八十六件；骨器九十六件；蚌器十七件。

陶器有盂、支架、小口壶、三足钵、舟形盆、盘、杯等。石器以石铲为多，还有石斧、砺石、敲砸器、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鱼镖、镞、针、锥、笄等。另外还出土了一些植物标本，如小叶朴、核桃(炭化)、蚕豆(?)等。还有一些动物骨骸(待鉴定)。在一些探方内发现一些先商灰坑打破了磁山文化层。

这次发掘中发现两座长方形土坑(H95、H97)、内置成组器物。H95长1.45、宽0.56、深0.25米(上部被先商文化层扰乱)。器物全部置于坑底部。H97，长1.4、宽0.8、深0.2米，器物置于坑内东端。H95出有石磨盘、石磨棒、陶支架、小口壶、小陶支架、小陶壶、圈足罐、深腹罐、石斧、石铲等二十件。H97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陶支架、小口壶、圈足罐等七件。在这两座坑内没有发现任何人骨遗骸，是否墓葬尚难肯定。(孙德海)

涞水、易县新石器时代至西周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春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管所

今年在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涞水、易县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三十二处，试掘五处，获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八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大大丰富了以往对该地区的认识。主要收获如下。

一、前仰韶期的遗存是这次工作的重要收获。这时期有甲、乙两类遗存在易县北福地遗址共存。甲类以夹砂素面红陶为主，炊器是釜和支脚的配套，陶器组合有釜、支脚、小口壶、钵、碗、器盖。这类遗存与仰韶时期河北境内以釜形鼎为炊器的文化遗存有谱系上的渊源关系。乙类均夹云母陶，炊器为盂和支脚相配套，另有石碗、磨棒等石器，刻划纹相当发达，整体面貌与磁山文化的某些因素接近，年代大体相当。值得注意的是石容器的首次发现。上述两类遗存表明了前仰韶时期的河北境内至少存在两个文化系统。

二、认识了该地区相当二里头时期的四种因素、三类遗存的主要特征，明确了鬲的谱系差别是诸类遗存分野的根本标致。如涞水县庞家河遗址的陶器以筒形鬲、尊、瓮和有腰隔的甗为主，并共存有细绳纹瘤耳鬲，前者当系西辽河水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河北的地方变体型；后者则属北方因素。又如，易县下岳各庄遗址以实足根圜底袋足鬲数量最多，同时共出少量模制的无实足根漏斗状袋足鬲，前者因陶鬲的形态而与先商文化有直接的联系，是太行山东麓有地域性特征的类型；后者则明显属燕山南麓型。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地方变体型已达易县南缘，是迄今所知这类遗存最南的分布地点。

三、获得了西周时期本地土著文化的线索。与已知的京津唐地区同期的诸类遗存均有显著差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有：夹云母红褐陶，堆纹口高领鬲，通体遍布细密绳纹的大尖锥状鬲足，柱状鬲足，无隔大孔甑、罐等。这些特点与本地早商和晚商的遗存联系密切，与春秋战国时期以“燕式鬲”为代表的遗存有共性，因而可确定是本地土著的文化遗存。这种遗存与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左近见到的以典型周文化为主体成分的遗存截然不同，有可能就是西周时期土著燕人的物质文化。它的发现为研究燕国早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卜工）

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7—12月；1985年6—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台西队

去年在遗址西北台地发掘了203平方米，清理战国小型墓三座，商代墓六座，灰坑十五个，灶二个，井一口（j_3）。

今年将西台中断发掘十年的T16、T17、T18、T19四个探方清理到底，另在西台南端开T24探方，发掘面积共360平方米。清理出商代墓三十三座，灰坑五十八个，房子二座，灶十九个，井三口(j4，j5,j6)。

战国墓只有M131出有磨光暗纹陶鼎、豆、壶一组。商代墓皆为小型长方土坑，竖穴。其中，M164、M168较大。M164长2.98米，宽1.5米，朱漆黑彩棺椁均朽，遗痕明显。活土二层台上有狗骨架三具，羊骨架一具，陶鼎一件。棺内墓主人头向南，仰身直肢，其右侧有侧身直肢、屈肢殉人骨架两具。随葬的青铜器有瓿、鼎、斝、觚、爵、壶、戈、刀、凿等十件；玉器有大玉戈(长0.48米)、玉璜、玉玦、玉柄形饰、笄、青玉匕形器等十一件。铜壶和青玉匕形器为台西遗址发掘以来的新发现。铜壶有盖，子母口，器身上附有织物系带穿过颈部双耳，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瓿、斝、爵、觚等铜器上包有多层织物。M168稍大于M164，除椁前二层台上出陶盆一个，墓底残存人肢骨三节外，其它随葬物均被盗扰一空。

清理的四口商代水井，j5开口在该遗址的最下层。经解剖发现，当时挖井先挖长宽各5米余的方形大井口，内收下挖至井底，做好木井盘后填土筑平台，再填土筑成圆形井筒至井口。其独特的结构在于井盘外四周还有横竖两层密排的细木椿以防淤塌；井底平铺直径约0.05—0.13米粗的木柱十一根（柱距为0.03—0.15米）以防淤塞。这一发现，不仅为商代造井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台西遗址早期绝对年代的测定找到了实物标本。

在两年的发掘中，台西遗址出土商代陶、石、铜、骨角，蚌等类遗物近一千五百件。陶器主要以夹砂灰陶和红褐为多，泥质灰陶、黑陶次之。白陶及酱、青两色釉原始瓷片亦有不少发现。纹饰以细、粗绳纹为主，也有方格纹、网状纹、圆圈纹，涡纹等，个别磨光陶豆残片上刻划有精美的饕餮纹图案。在一些陶片上新发现了陶文和符号。主要器型有：鬲、鼎、甗、豆、簋、盆、瓮、盘、碗、人面器纽、纺轮、网坠、将军盔等。特别是新发现的一件陶人，虽无甲胄，但在头顶的一端和两耳部有圆孔，似是插鹖尾类装饰用的，这和过去安阳殷墟所出带甲胄陶俑显有不同。石器均为磨制，有斧、锛、凿、镰、锤、刀、铲等，其中一件有孔锤斧是夏家店上层的典型遗物，这个发现进一步说明台西商文化与夏家店上、下层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蚌器有镰、刀、铲等。卜甲、卜骨发现较多，上有

钻或钻、凿、灼痕。这些发现为台西遗址的断代分期补充了新的资料。(孟繁峰　郭瑞海　王会民　刘超英)

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灵寿城址

发掘时间：1985年7—12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中山国的考古发掘，今年继续在平山县的中山国后期都邑灵寿城址内进行。全年发掘遗址面积1512平方米，清理春秋至战国中期各类墓葬十六座。

在第9号遗址(居住遗址)内出土一件较为完整的战国中山国建筑上的实用陶质交互斗。这是继1983年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陶盘斗和陶交互斗之后的又一件陶斗。此件陶斗为细泥灰陶，火候较高，陶斗呈长方形，通长18.7，宽15.3、高9.4厘米。其耳高1.8、长4、宽3厘米，平高4.5、欹高3.3厘米，十字斗口宽为9和6.9厘米，斗中心径为0.9厘米的拴孔。按材和契的比例计算，则为2:1.1。在灵寿古城址内，发掘出土和采集的陶斗已达七件，反映中山国的建筑已普遍采用陶斗。

在第6号遗址中发现的一座已被废弃的铸铁炉之南约2米处，发现相向的各有三个高约5厘米的座山形陶器，相排连在一起，中间一个稍高，呈“山”字形，对着南面约1米的一个高约10厘米的手制男性陶俑，陶俑头后部为一束髻。经观察，周围近处无其它遗迹，这种现象可能与铸铁生产有关，为祭祀之类的活动遗存。

这里春秋到战国早期的墓葬，均为东西向；灵寿城时期的族葬墓，几乎都为南北向。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凡属中型以上的墓葬，大都是在椁室外堆满山石的土圹竖穴积石墓，但是个别小墓中，也发现一些积石墓。经初步分析，这种积石墓似属中山鲜虞族的墓葬。(陈应祺)

阳原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5—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

为配合国家重点项目——大(大同市)秦(秦皇岛市)铁路的施

工，对阳原县境铁路沿线的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十四座墓葬，西汉中期两座(阳原西城镇北关)，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十一座(阳原东堡乡三汾沟墓区)，东汉晚期砖室墓一座(阳原西城镇南关)。

墓葬形制以土圹竖穴洞室墓为主，按墓道可分二种，竖井式和斜坡式(包括斜坡阶梯式)。竖井长宽各墓不等，但长均在2米以上，宽1米以上。南北向的向南掏墓室，东西向的向西掏墓室。洞室长2米以上，宽1.5米以上。深度4米以上。每座墓都有木椁结构，木椁内置一棺或二棺不等。二棺的为男女合葬，一棺的为男性葬。值得注意的是在椁两侧(即墓室两壁)有成排柱洞和石柱础，椁上与柱洞相对处有横木，估计可能是椁外的木构架结构，这在目前汉墓材料中是少见的。

十四座墓共出土随葬品三百多件。陶器有：壶(素面和彩绘)、罐、甑、釜、碗、灶、熏炉等。铜器有锺、钫、博山炉、虎师镇、带钩、刷把、铜镜、印章、车马饰件、五铢等，铁器有锸、刀、镍等。玉器有蝉形唅、眼挡、耳塞、鼻塞等。还有骨器、木器、漆器、玻璃器和大量丝织物。尤其是出土的刺有绣绣龙、鹿、羽人等图案的织物，对于我国古代刺绣的发展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李恩佳)

临漳县曹魏北朝邺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继1983、1984两年对邺北城进行的初步勘探、发掘后，今年4月开始对邺南城遗址进行勘探、发掘。

邺南城是北朝时东魏、北齐的都城。在城址的地面上已见不到城墙和台基等遗迹。经勘探初步了解城址的形制和布局情况。目前已发现东、南、西三面的城墙，并在东城墙发现门址两处，南城墙发现门址三处，西城墙发现门址三处，在城墙外侧，筑有排列整齐的“马面”。同时还探明邺南城中轴大道及大道以北的十余处夯土台基。在勘探的基础上，现已着手对城墙及“马面”进行发掘。(朱岩石)

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11月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今年在曲阳定窑遗址发掘的面积共计985平方米。其中在北镇村发掘两处面积385平方米，涧磁村北发掘600平方米。北镇村发现的主要遗迹有窑炉七座，作坊三处，水井一眼，碾臼一个，灶坑十二个，灰坑七十个，墓葬一座。出土遗物除大量陶器、窑具外，还有铜器、铁器、石器、骨器和钱币等，共获器物四千五百一十三件，陶瓷残片等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片。这些发现表明，这一区域乃是当时的瓷器生产区。

遗址上层遗物有大量覆烧瓷器和窑具支圈等。出土的瓷器以白瓷器为主，青瓷很少。白瓷种类有刻划花、印花、剔花和素面等。这里还大量烧制粗瓷如鸡腿瓶，也烧三彩器。上层出有一枚金代"大定通宝"，其余钱币均为宋代或唐、五代的。下层遗物与上层明显不同：无覆烧瓷器和覆烧窑具；白瓷虽仍很多。但不出刻划花、印花和剔花器，只有素面白瓷或黑白、黄白二色及白釉下加酱褐色点彩瓷器；青瓷器占有相当比例；实足平底和玉壁底碗、短流执壶等是典型器物；钱币概为唐代遗物。总之，遗址上层的年代约属北宋后期到金代，下层不晚于北宋早期。

这次发掘再次证明，定窑瓷业早在唐代即已相当发达，在它成为名窑之前已烧制相当精良的瓷器，而且长久不衰，直到金代仍有创新和发展。这次发掘，发现早期定瓷即有釉下彩器，也有黑釉器、紫定器和绿釉、三彩器片，这是值得重视的。（刘世枢）

明蓟镇边长城的考察

考察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今年河北省长城考察工作，重点仍以明代蓟镇边为主，同时对昌保镇紫荆关一带长城进行了调查，对于尚未作最后确定时代的抚宁县到绥中一带的石头边(和明长城不同)也作了调查。

明长城的考察，从抚宁到秦皇岛市山海关分为九个区进行，包括青山口、界岭口、箭杆岭口、东峪口、孤石峪、柳罐峪、苇子峪、拏子峪、义院口、板厂峪、平顶峪、城子峪、董家口、大毛山口、小河口、无名口、黄土岭、夕阳口、庙山口、九门口、山海关、南北翼城等。紫荆关一带考察了奇峰岭，关道岭、紫荆关、小金日城、

蔡家峪、瓦窑关、浮图峪等。

一年来的明长城考察，共调查长城主体墙65430.7米、以山代墙240.80米，复边41000米，以上三项总计长度130510.7米(折合261华里强)。调查城堡四十三座、瓮城四座、敌楼二百二十五座，战台一百一十八处、墩台(烽火台)十五座、房基四十一处，台基十一处、大的关口六处(小关未计)、炮台十六处、石炮一门、石碑八通、戳记印文砖一部分。对于研究长城城体的等级、结构、敌楼种类、关隘和卫所城的布局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根据记载，在明长城线附近，从东到西有北魏和北齐长城，但一直找不到遗迹，目前在黄土岭到辽宁绥中的秋皮沟一带有一条石砌长城，石城垣的结构及小城堡，都和明长城不同，继续进行工作，进一步搞清时代，有助于对这一带古长城情况的了解。(郑绍宗)

山 西 省

襄汾县柴寺村细石器地点

发掘时间：1985年4、5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

柴寺细石器地点是1977年发现的，位于襄汾县柴寺村南约2公里的汾河右岸。文化遗物分布于汾河二级阶地底部砂砾石层中，文化层厚约0.2—1.5米，其上为泥灰质土状堆积，厚20余米。动物化石主要有马、鹿、牛、羊、象、鼠类和河蚌等，为华北地区晚更新世所常见。石器包含两类，一类是粗大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由黑色角页岩制作，此外还发现有大量石球，均石灰岩质；另一类是由燧石制作的细石器，其类型主要有锥形石核、楔形石核、细石叶、石核式刮削器、端刃刮拇指盖刮削器、直、凹刃刮削器、琢背小刀及雕刻器等。其文化内涵性质，和下川遗址可作对比，文化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向前　占扬)

榆社县赵王村细石器地点

发现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赵王村附近、河流第二级阶地中，经试掘出土有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石片、刮削器、蚌饰和骨珠等，还有马、鹿等骨化石。初步推测，这个地点的地质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之末期，即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卫奇)

侯马市东呈王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3—10月

工作单位：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侯马市北约1.5公里，东呈王村西北约100米处，面积为35000平方米。发掘探方二十个，面积为500余平方米。地层从上至下共分七层，文化遗迹和遗物主要发现在第4层和第5层。清理出圆角方形的白灰面房子一座、陶窑二座、灰坑四十一个(其中有两个圆袋形坑内埋散乱不全的人骨。

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陶器七十六件，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制法以手制为主。纹饰以斜直篮纹和绳纹为主，也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和方格纹。器形有鼎、瓮、罐、大口尊、盆、盘、豆、碗、杯及纺轮、刀等。其中鼎足形式多样，薄胎磨光黑陶小罐和白陶片别具一格；引人注意的是也出土了饰篮纹的尖底瓶和一些红陶的杯、碗、罐、盘等，尚存饰紫红色陶衣的红陶碎片及绘有黑彩的彩陶片。石器二十余件，器形有斧、铲、凿、单孔石刀、纺轮等。另有细石器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各一件。骨器三十余件，有针、锥、笄等。蚌器有刀和环。玉环仅一件。

东呈王遗址首次发掘，面积不大，却获得了一批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不同阶段的重要实物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晋南地区龙山文化的分期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山西大学考古教研室)

垣曲县古城东关新石器时代及东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

遗址的发掘工作连续进行了四年，本年度主要发掘第Ⅳ区，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第Ⅳ发掘区主要包含有仰韶早期、龙山晚期、东周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了属于这三个时期的灰坑、房屋、墓葬、壕沟等遗迹，共清理灰坑一百九十七个，房址一座、墓葬十一座、壕沟十一条。

仰韶早期遗存是这一遗址的新发现，主要遗迹是灰坑，有少数房址、墓葬和壕沟。这一期的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少量为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主要纹饰有弦纹、剔刺纹等，彩陶一无所见。器形中以红顶或灰顶圜底钵、弦纹夹砂罐为大宗，其他还有平底碗、宽沿盆、深腹弦纹盆、小口平底瓶、圆锥足鼎、环形捉手器盖、器座、陶锉等。石器常见有斧、刀、铲、锤、球、盘状器等，另有少量匕、锥、针、凿等骨器。这一期遗存是晋南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龙山晚期遗存发现了不少较大的平底袋形坑。陶器多为轮制、薄胎，以泥质磨光黑陶为主，纹饰中绳纹、篮纹较庙底沟二期减少，方格纹增加。主要器类有釜灶、鬲、甑、斝、双耳罐、单耳罐、圈足罐、双腹盆、单耳杯等。晋南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和豫西龙山文化的部分因素在这一期中都有所反映，为探讨黄河南北龙山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新的资料。

东周时期的遗存较少，陶器主要有鬲、豆、罐、盆、筒瓦、板瓦等。（佟伟华）

垣曲县古城南关商代前期城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

古城址发现于1984年秋季，位于古城镇南关的高台地上，北、

东、南三面有亳清河、沇河、黄河环绕，西部为平地。本年度对这一城址进行了钻探调查和小型试掘，钻探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试掘面积100平方米，初步了解了城址的轮廓、范围、布局及年代。

城址的北墙保存着地上部分，其余三面墙存在于地下。形状略呈平行四边形，西墙方向为5度，北墙79度。南北墙各长350米、335米，东西墙各长390米、395米，周长1470米，总面积约为12万5千平方米。西墙偏北发现缺口一个，宽6—8米。西墙及南墙外6—9米均发现与内墙平行的二道墙，宽3—6米。西墙外15—20米处还发现与西墙平行的城壕一条，宽6—10米，深4米，长440米。城墙基槽呈阶梯状内收的斗形，口宽约11—12米，底宽约5米，深约2米。基槽以上筑墙体，较基槽略宽，墙基和墙体均系夯土筑成，土色棕红，质极坚硬，夯层一般厚8—10厘米，夯窝圆形尖底，排列紧密，直径约2厘米，深1—1.5厘米。城垣内东南部分布有密集的灰坑遗迹，灰坑区以北即城址中部偏东发现有一组夯土建筑台基，初步分为六块，最大者为长方形，长约50余米，宽20米。同时在南城墙东段还发现了打破南城墙的墓葬一座。长2.6米，宽0.8米，墓内出鼎、斝、爵等铜器三件，鬲、盆等陶器二件，笄形玉器一件以及蚌饰、石饼等。

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城墙的地层叠压关系判断，叠压和打破城墙夯土的文化堆积及打破城墙的墓葬均属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因此，初步认为城址的下限当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这一发现为黄河中游地区提供了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前期城址实例，进一步解剖这座城址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佟伟华）

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1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

发掘商代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玉器等一百三十八件。

1号墓的葬具有棺和椁。椁室内同时安放三具棺木。葬制为一夫二妻，男性墓主居中，两侧的女性都面向男性。并有殉人一具，没有葬具。墓坑填土中东西两侧各安放狗一条，南端有牛头骨骸，作为殉祭。椁室下有腰坑，中间埋有狗骨骸。出土青铜器四十余件，有酒器觚、爵、卣、罍、尊、觯，炊器鬲、鼎，食器簋，武器矛、

戈、镞，车马器弓形器、管状器等。生产工具有石镰，玉器有虎、鱼等，陶器有鬲。其中以焦叶纹、饕餮纹的尊、饕餮纹簋和蚕纹、蝉纹鼎制作精细，镂刻细腻。

2号墓的葬具有棺椁，椁室内放棺木两具，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面向男主人，填土中用奴隶殉祭，东端有牛腿骨和鬲。椁室下有腰坑，埋有狗骨。随葬青铜器和玉饰共达八十五件，特别在男者上身周围安放有矛十八件，戈十一件，还有爵、觚、鼎、卣、簋、罍等，玉器有虎、兔、鱼等。

这两座商墓是山西省第一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中以“[illegible]”族徽为主，估计灵石旌介村地区在商代可能是这一方国所在地。这两座墓的墓主应是这一方国的首领。（陶正刚）

侯马上马村两周墓地

发掘时间：1984年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墓地位于侯马市上马村东北，在浍河南岸第一台地上。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58年发现，自1961年至1984年春前后，共进行了十次发掘。已发掘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共发掘墓葬一千一百余座，马坑两座。

均为长方形竖穴墓，根据形制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墓发现十五座，长4—7米，宽3—4米，深4—6米。其中除一座被盗外，其余均保存完好，一般为两椁单棺，也有一椁两棺的。在椁、棺之间出土大量铜礼乐、兵、车马器。棺内出土多件鎏金、玉、石等装饰品。中形墓发现四十座，长3—3.5米，宽2、深4—6米左右。一般为一椁一棺，也有一椁双棺的。随葬铜器多置于棺、椁之间，玉、石等装饰品多置于棺内。余者均系小形墓，发现数量最多，一般长2—2.5，宽0.7—1.0，深6—7米。多数用一陶鬲，或一罐随葬，随葬陶器成组者甚少。方向有东西、南北两种。多为仰身直肢，少数为侧身下肢微屈。小墓中也有少数随葬小型铜兵、乐器。从出土器物看，少数墓葬属西周中期和晚期，多数墓葬属于春秋早、中、晚期到战国初期和中期。（吴振禄）

侯马呈王东周古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冬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呈王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侯马市北约1公里，西距晋国遗址牛村古城群约1公里。从1965年起，开始对古城址进行探测，1984年冬进行了复查与发掘，基本弄清城墙基址范围、城址内的文化堆积及建筑基址的分布。

古城平面呈 ⊟ 形，两座城南北并列。北城东西长440、南北宽160米，面积为70400平方米。南城东西长220、南北宽110米，面积24200平方米。城内文化堆积很薄，且大部分遭受破坏。在北城内部发现二处建筑基址，因破坏严重，原貌不清。可能是古城中心建筑的基址。

根据文化层出土遗物及城墙遗迹所处的地层关系观察，该城遗址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绛都古城时期的一个附属性质的城堡。(吴振禄)

侯马东周祭祀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9月—1985年3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侯马市北部，西距呈王古城、南距侯马盟誓遗址各1000米左右。现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五十余处。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

这些建筑址的木构件无存，部分瓦块散置于四周文化堆积中。仅存建筑基址，上部覆盖约30—50厘米的表土层。揭露基址两座，夯Ⅰ号南北长25、东西宽10米，有两条道路与西部一座长方形房子遗迹相通；夯13号东西长40、南北宽30米，两处基址厚约1.5—2米。分布在这群遗迹西部的一座建筑址，南北长70、东西长60米。此外，邻近西部和南部附近有布局十分规整的附属建筑遗迹。

如此大面积，数量众多且布局严紧的庙堂建筑群体，在侯马晋国遗址中属首次发现。根据对两座建筑址的发掘资料分析，其时代大约早于春秋晚期，与侯马盟誓遗址的时代大体相当；初步认为可

能与盟誓活动有关。目前勘察与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吴振禄)

原平县刘庄东周墓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忻州地区文化局

墓葬因原平县刘庄塔岗梁群众取土时出土青铜器而发现。四座古墓都是土坑竖穴，用卵石砌棺，横木盖顶。方向北偏东20度。墓的北壁设壁龛，内置屈肢葬人骨架，出土青铜器盖豆，豆形器，单耳壶，舟、匕等五件，铁锛一件，金耳环二件。这批器物同浑源李峪墓情况相似。(李有成)

朔县赵什八庄一号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6—8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平朔考古队

一号墓位于赵什八庄汉墓群的东侧，东距朔县城约3公里，为长方形土圹竖穴木椁墓，斜坡墓道，方向3度，封土剖面为覆斗状，单人仰身直肢葬。椁室结构保存较完整，大部分器物保存较好。陶器有瓮和罐两种，铜器主要有衔鱼鹅灯、鼎、卣、戈、鸭形熏炉、甗、匜、盆、镫、钫、洗、嵌贝龟形镇、封泥筒、弩机、“东门延寿”印章、星云纹镜、昭明镜和重圈铭文镜，五铢钱(形同洛阳烧陶Ⅰ型)。其中衔鱼鹅灯的结构原理与长信宫灯相同，造型精巧，全身彩绘，较为珍贵。墓葬时代约在西汉晚期。(宁立新)

朔县东汉彩绘骨尺

发掘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山西省平朔考古队

骨尺出土于85SSGM224，位于朔县北旺庄汉墓群的东缘。墓葬为长方形土圹竖穴木椁墓，斜坡墓道，方向100度，早年被盗。尺长22.9、宽1.65、厚0.4厘米，淡黄色，保存完好。正面和背高的边沿、两侧面均用墨色等分画出十寸，其中正面和背面的部分寸格中又刻分格，每寸七或八分，尺的一端钻有小孔。彩绘施于正反

两面，划分三段，边缘两段较短，饰菱形纹；中段较长，饰流云纹，以黑色勾勒，中间涂朱，具有浓厚的汉代彩绘风格，时代约在东汉早期。该尺与宁夏固原大坑堰东汉墓中出土的彩绘骨尺在形式作法上大致相同，应为同时期作品。（宁立新）

内蒙古自治区

敖汉旗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10月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今年的发掘，获得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十七座房址和一些灰坑，同时还发现了一处打破兴隆洼聚落址围沟的红山文化房址，这再次证明此处的兴隆洼文化早于红山文化。本所实验室对兴隆洼文化的房址F119(1984年发掘)居住面上及房内倒塌层所出木炭做碳-14年代测定，分别为距今7240±95年和7470±80年(半衰期5730年，均未校正)。

到现在为止，兴隆洼遗址已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13000平方米，相当于该聚落址面积的二分之一，除红山文化的两座房址、个别灰坑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零散墓葬外，其余尽属兴隆洼文化的遗迹。发掘所获兴隆洼文化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动物骨骼。陶器除极个别的器形外，其余皆可纳入罐、钵两类，前者显多于后者。石器中最常见的是打制锄形器，磨盘、磨棒和磨光石斧亦占一定比例，细石器仅见用于嵌粘在复合工具上的石刃。骨器数量不多，较常见到的有骨锥、鱼镖，此外还有复合工具。这些收获进一步丰富了对兴隆洼聚落址的认识。（朱延平）

包头市西园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8—9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西园遗址位于包头市东郊色尔沁村东北约1公里的大青山山阳

台地上。台地北依高山，南为高出土默特平原80—90米的断崖，东西两旁均有深沟环绕；地势呈东南低，西北高的斜坡状，唯东南部坡度较小，地面平缓；地表多碎石，植被较繁茂，平缓地段曾为耕地。这次发掘，揭露面积260平方米。发掘区在台地东南部，文化层厚约1米，含有五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西园一类遗存，有不少陶片，能辨器形的有素面或宽带纹黑彩泥质红陶钵、花草纹黑彩泥质红陶盆、敛口或侈沿的弦纹夹砂红陶罐。遗物散见于各层位，尤多出自第5层，未见它的遗迹，也未找到它自身的文化层。此类遗存属阿善一期或白泥窑子第一种。

西园二类遗存，在西园遗址是主要堆积层(第5层)，所含遗迹、遗物也最为丰富。主要遗迹有房址四座(B×F5、6、3、8)和灰坑五个(H40、41、45、44、51)等。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较复杂。遗物中特征明显的工具，有横断面呈椭圆形的打制磨刃舌状刃石斧、陶铲和两侧缺口陶刀；陶器有泥质小口双耳瓮、大口厚唇沿夹砂绳纹瓮、颈部施附加堆纹一周通体绳纹或篮纹的侈沿夹砂罐、折角起棱或有一周凹纹的折腹钵，以及纹样繁缛的彩陶片。此类遗存属阿善二期或白泥窑子第二种，陶器面貌似乎更多接近于白泥窑子。

西园三类遗存，在西园遗址第4层，主要遗迹有F4、7、12和H19、28、30。其中，F4为半地穴式，长方形，门向南偏西，后壁左右两角各有一龛，有灶坎的地面方形灶靠近门，柱洞在穴壁内，面积超过40平方米。遗物也较丰富。属阿善三期或白泥窑子第三种。

西园四类遗存，在西园遗址的第3层，该层仅存于发掘区西北部。主要遗物，陶器有火候甚低的泥质红陶瓮(矮直领、领部划纹、肩部磨光、腹部篮纹)和砂质或夹砂的红陶或灰坑陶罐(侈口、长弧颈、颈部光素、腹部线条纹、颈腹间多有指甲横切纹一周)，以及带把的小石杯、豆形器和环首短体铜刀等特殊品。此层遗迹有设二层台的殉牲土坑墓，墓主仰身直肢，牲畜头置于墓主身侧二层台上。均未见随葬陶器。此类遗存，以往在内蒙古中南部尚未曾见到。

西园五类遗存，在西园遗址第2层，该层亦仅存于发掘区西北部。属于此层的遗迹有H1、2、4、23，坑内积有类似第2层的黄沙土，杂有许多石粒或碎石块，及不少西园二、三类遗存的陶片，但几乎未见它自身的陶片；只在个别灰坑内见到两片砖灰色素面陶片，且过于碎小，辨不出器形。

通过发掘，再次验证了阿善二、三期之间的层位关系；同时发

现以往在内蒙古中南部未曾见到过的此类殉牲墓；第五类遗存只见灰坑，内含遗物少而碎，时代不清。(崔璇)

察右前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10—11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墓地位于乌盟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东南的台地上，北距黄旗海1.5公里。墓地因砖窑取土，部分已遭破坏，现有范围近1000平方米。

今年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清理墓葬三十座，均为土坑竖穴墓，无葬具。墓葬分布均匀有序，无打破关系。据墓口形制，分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长方形墓口长2.2—3.2、宽1.4—2.8、深1.0—1.6米，有的墓坑底部又沿一侧墓壁挖下一小方形坑，内置人骨；圆形墓口一般直径在1.2—2、深0.7—1.5米，坑壁多略呈袋状，有的底部成方形。墓内尸骨放置零乱，葬俗主要是二次迁葬，有单人、双人与三人葬。约半数以上的墓葬没有人骨或仅有少量残骨。有的墓出有狗和其它动物骨骼。葬式分仰身直肢，侧身屈肢和俯身曲肢等。有的墓内有红烧土块和灰烬。

出土随葬品一百余件，其中陶器近六十件，余为石器、骨器和贝类装饰品。随葬品往往散乱置于墓底或填土中，有的墓将陶器打破叠放于墓室一角。陶器以泥质和类砂灰陶和红褐陶为主，多素面，少量绳纹和附加堆纹，有少量彩陶。器形以带双桥状耳器最具特征。泥质陶的有小口鼓腹双耳罐、直口双耳壶、折沿深腹盆、双腹盆、折腹钵，夹砂陶有直口罐、折沿鼓腹罐等。皆手制。石器有磨盘、磨棒、大型石斧、单孔石铲、双孔石刀、石凿和打制的细小石器等。骨器出土较少，主要是一种用较粗的骨腔加工而成的尖状骨铲。

从庙子沟墓地出土的随葬物判断，其时代当属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庙子沟墓地的墓葬结构、葬俗和随葬器物都独具特征，与我们目前已发现的中原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同时代遗存相比，虽然有着某种一致性的因素，但是差别则是主要的，因此很难将其划归某一考古学文化。这一发现为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魏坚)

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9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遗址位于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西南2公里的老哈河南岸小黑石沟村东侧台地，总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

今年4月取土时发现夏家店上层大型石椁墓一座，出土铜礼器、生活用具、车马器、兵器及金、铜、料珠装饰品等随葬品达七百余件。随后进行了大面积钻探和发掘，共揭露面积370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左右，可分三层，均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灰坑十六个，祭祀坑一处，墓葬十三座。灰坑多为袋形，少数锅底形、筒形。陶片以红褐色和灰色最多，次为红色，少量黑色，大多数磨光，极少饰纹饰。器形有鬲、甗、罐、豆、盆、钵、碗、杯、纺轮等。石器多磨制，石祖一件，余皆生产工具，有斧、刀、盘状器、环形器、纺轮、杵、磨石等。骨器磨制，有针、锥、镞、匕、管、牙饰等。祭祀坑为椭圆形，位于大墓之间，内有做挣扎状人骨架一具及零散的牛、马头残骸。墓葬除一例单人仰身直肢外，全系单人侧身直肢，多数头向南；大型墓二座，石椁木棺，随葬品丰富，小型墓多有椁无棺，个别墓无随葬品，其余多寡不一。随葬品包括金、铜、骨、石、蚌器、料珠等，分属兵器、车马器、工具、装饰品。

根据墓葬与文化层叠压和打破关系，该遗址应为废弃后用做墓地，而二者的文化性质是相同的，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塔拉　齐晓光）

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

发掘时间：1985年6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墓葬位于赤峰市阿鲁旗柴达木乡正北1.5公里，周围为地势平坦的草场。1985年4月发现，6月正式发掘。该墓系石砌六角形单室，长12.1、宽4.8、高2.46米，方向南偏东45度，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为斜坡式；墓门以石片券砌，并用石块封堵；墓室石砌呈六角形内收作穹庐顶，内装有柏木护壁板，路面铺石板，

后部横置棺床，仰放一成年男性骨架，头向东北，无葬具。该墓早期曾被盗，残存随葬品十一件，分布于棺床内外，位置多移动。计陶器二件，为挂绿釉鸡冠壶；瓷器有花式口白瓷小碗一件；铜器有鎏金面具一件，鞋垫一双，饰梅花图形铜饰五件。根据墓葬形制、典型器物、器物组合等方面的特点，该墓年代应在辽代中期之后。（齐晓光）

达茂旗明水金、元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墓地位于乌兰察布盟达茂旗大苏吉乡西北4公里，明水村北坡地上。

1978年秋，发掘墓葬四座，均有封土痕迹，其中三座为竖穴土洞，一座竖穴土坑，出有相当数量随葬品，包括不同质料的生活用具、武器、马具及完好衣物等。这次清理墓葬三座，编号为M5—M7。M5为火葬墓，位于墓地北端最高处，残留封土，面积约20余平方米，原封土内盖石板一层，已破坏；无规整墓圹，掘进约1米深，出火化人骨并铜饰二件，用皮草包扎。M6为竖穴土坑墓，长1.68、宽0.8、深1.3米，墓向290度。墓穴留二层台，内置木棺，已朽，葬一未成年小孩，仰身直肢，头向西，着棉上衣、裤，已朽烂，出绿松石串珠一件，铜耳坠二件。M7竖穴土坑，长2.65、宽1.45—1.34、深2.7米，墓向270度。穴内留二层台，上盖松木板，内置木棺，保存较好，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向西，尸身外套棉袍，残甚；内黄缎夹袍、革带；下身穿绿色内裤。棺内随葬品有：金耳坠一对，铜扁壶、高圈足铜盏各一件，均装一皮袋内，置于头右侧；桦树皮箭筒一件，装成束带铁镞箭羽，已朽。棺外足下置马具、包括鞍、镫等。

这些墓保存较好，材料比较完整，根据墓葬特点、衣饰及随葬品风格，该墓地应为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家族葬地。（郭治中 齐晓光）

辽 宁 省

绥中市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位于姜女坟海边的石碑地秦汉“碣石宫”建筑群，在去年试掘之后，今年进行了勘探和局部发掘。

经初步铲探，遗址四周残存着围墙的夯土墙基，探知围墙的西南角、即南墙的西段160米、西墙的大部300余米、东墙中部一段100余米及北墙的东段130米。墙子里村的最后一排民房，恰巧建在北墙的墙基之上。整个围墙呈长方形，南北长500余米，东西宽260米。南墙与主体夯土台间距40米，方向一致，为南偏西5度，正对海中巨石——“姜女坟”。

经发掘，南墙与西墙呈直角相交。墙基宽2.8米，高0.8米，系用黄粘土夯筑，内、外两壁陡直，皆用细黄沙护面，除掉细沙则露出清晰板筑痕迹，每板筑高0.31米。墙基内外两侧皆有夹棍洞，内侧发现五个，其中内转角处一个；外侧发现四个，在外转角处两个。夹棍洞间距相等，都在1.5米左右，棍洞圆形，直径0.2米。棍洞亦用黄粘土填塞。

在围墙内还探出纵横交错的夯土带和多处夯土台，在夯土台上都有瓦、红烧土、础石等遗迹。但尚未找到路和门的迹象。

在遗址的中部，发掘探方八个，共800平方米。继去年出土的大瓦当之后，今年在F14和F15各挖出一件同样形制的夔纹大瓦当。在F14挖出两件大型空心砖，虽破碎，但未扰动，长1.35米。从出土状况看，似呈阶梯式布列，南高北低，北面接一排（五块）小方砖，推测是一处三级踏步。在F13的东南角出一件双孔筒瓦，带羊角形云纹瓦当，直径0.2米，筒瓦后半部匀布两孔，间距0.26米，筒瓦通长0.95米，在此类瓦中是罕见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变形夔纹半瓦当，直径0.2米，这类瓦也只见于秦始皇陵出的一件。

经过勘探和局部发掘，初步确认该建筑遗址的面积近15万平方米。探掘出的遗迹、遗物为进一步确定该建筑群的年代及性质提供

了实物资料，但其布局、各建筑之结构较为复杂，尚待以后工作。（王成生）

东辽县石驿乡汉代透雕铜牌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东辽县石驿乡文化站

铜牌是1967年左右在七队西山南坡出土的。铜牌为长方形，浮雕式镂空铜铸而成，长13、宽6.1、厚0.3厘米。铜牌两端图案为两匹站立骏马，两马后面均有树木相衬托，中间系两人摔跤图，摔跤者下身穿扎腿肥裤。

此铜牌与辽宁省西岔沟汉代墓群1956年出土的基本相似，透雕的画面显示出汉代东北少数游牧民族一种独具的透雕艺术风格。和铜牌一起出土的还有三件铜扣、一件圆形鎏金卷云麦穗纹铜饰件等。（摘自《城市日报》1985年12月19日）

抚顺市高尔山城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尔山城内地下文物的情况，在东城的东、西、北三面的坡地上，先后发掘多条探沟。在东城的东坡，清理出一座方形房址，近北、东两壁有一双曲尺形烟道。在房址的东北角，出土了近二百片各式高句丽甲片，经修复为一完整的头盔和部分胸甲。共存的还有一残铁锸和犁镜。这对研究高句丽的建筑、军事器械和编制情况，都是难得可贵的资料。

在南门的近西处，发掘5×5米的探方五个，发现了辽代文化层，出土有辽代的陶器、瓷器、铁器、北宋铜币以及精美的建筑饰件和建筑遗迹。这是第一次在高尔山城内发现辽代的文化层，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高尔山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孙力）

吉林省

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6月3日—7月24日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元宝沟遗址位于农安县城西南30公里敖宝图泡西北岸，东北距元宝沟村500米，发掘面积380平方米。遗址地层可分为三层，即耕土层、黑灰土层、灰褐色土层。发现灰坑五个，均开口在灰褐层下，内堆积大量的鱼骨、鱼鳞和动物骨骼。此外还发现不规则的红烧土（可能是篝火遗迹）。

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石器、骨器、角器以及装饰艺术品。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均手制，火候较高，器壁较薄且坚硬，器表褐色，器里黑灰色抹光。纹饰绝大多数是划纹，可分为单直线、双直线、单曲线、双曲线、单直席划纹、单曲席划纹、扭曲纹、斜小格纹等。此外，还有极少的陶片上饰有压印的“之”字纹和划的“之”字纹。器形以小底、直口圆唇或方唇罐为主，有两件斜口器和一件漏水器。石器可分为磨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种。磨制石器主要有小型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石网坠。细石器有指甲形刮削器、尖状器。打制石器主要有石球，在遗址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它利用河卵石或自然石块打制而成，可能是捕猎动物的工具。骨器，全部用动物骨骼做原料，主要器物有笄、锥、针、匕、柄。角器多数是用鹿角、狍角磨制成的矛、锥。在灰坑内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许多骨骼有经过火烧的痕迹。主要动物有野猪、羊、狍、鹿等，可能是当时人们捕猎的主要对象。装饰艺术品有钻孔的野猪牙。在H5中发现一个用石磨制的人的半身雕像，雕像较为粗糙，属女性。（庞志国）

农安县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春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左家山遗址位于农安县城郊乡两家子大队高家屯村南约500米，伊通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文化遗存分为四期。

第一期出土陶器以砂质灰褐陶为主，夹蚌黄褐陶较少。纹饰多呈平行条带或阶梯条带状分布。图案多为尖、圆头工具刻划而成的菱形纹、弦纹、平行线纹和戳压而成的弧线之字纹、连点纹。器物均为小底侈口，部分为厚唇（唇外突棱明显）。器形种类单一，主要为筒形罐，鼓腹罐和钵较少，另见有陶“支座”残块。还发现骨铲一件。未见遗迹。

第二期出土陶器以砂质灰褐陶为主，夹蚌黄褐陶其次。纹饰和器形大部分同于一期。新出现的纹饰有尖、圆头工具刻划而成的席纹、人字纹、纽曲纹和戳压而成的菱形内填篦点纹、指甲纹等。新出现了直口器，厚唇器的唇外突棱不甚明显。并见斜口器。此外还见有针、锥、笄、镞、梭、凿、矛等骨角器，斧、刻刀、磨盘、磨棒、琢制石叶等石器和少量蚌器。发现房屋一座（F 1）。

第三期出土陶器砂质灰褐陶和夹蚌黄褐陶比例大体相当。陶器表面主要施有由刻划之字纹和压印之字纹构成的组合纹饰及少量带状篦点纹、波浪纹和附加堆纹。多直口器，唇部均不加厚。器物种类主要为筒形罐和钵。此外还见有针、锥、匕首等骨器，锛、环、小石叶、小石龙等石器及少量蚌器。

第四期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夹蚌黄褐陶。纹饰主要有人字纹、三角形内填斜平行线纹、网格纹、斜平行线纹、鱼鳞纹和花边口沿。器物多直口，一部分为大底器。器形主要为筒形罐、斜口器，钵（碗）和带流器。另有“支座”、纺轮、陶塑兽头。此外尚有锥、针、笄、刀、凿、刀梗、镖、刻纹骨等骨器和斧、镞、矛、磨盘、磨棒等石器。蚌器仅个别见到。此期发现两处烧土遗迹。

第二期^{14}C测定的年代数据为距今6100±80年，早于第二期的一期文化遗存与新乐下层文化以F 2 为代表的遗存有一定共性，年代也应大体相当。第四期^{14}C测定的年代数据为距今4375±80年。据此可推断，左家山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在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年之间。第一、二两期之间文化面貌共性较多，似应属于同一文化性质。至于第三、四两期之间以及第三、四两期与第一、二两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还是分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类型，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陈全家　赵宾福）

柳河县大通沟乡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柳河县文物普查队

遗址位于北大岭山。在红砂土耕作层地表上采集到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三十多件，根据出土物推断，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摘自《吉林日报》1985年8月20日）

镇赉县向阳南岗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6—7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镇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向阳南岗地处嫩江右岸，跨镇赉县坦途、哈吐气、嘎什根诸乡，是吉林省北部草原中一条较大的沙岗。岗呈东西向，绵长十余公里，周围是草场、碱片和泡泽。自沙岗的中部以西。岗上都散布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大致可以划成七个相对集中的遗址和墓葬区。其中第一地点年代稍早，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第七地点出土有铁器，其他地点属于青铜文化范畴。

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地点，总面积为800余平方米。

第一地点遗迹已大部被破坏殆尽，遗物多散露在地表和沙坑中。发掘中仅T3、T4底部发现有成片分布的陶片、蚌壳、灰烬等物，可能是房址的残迹。这里的陶片均为杂有蚌粉的类沙陶，器壁粗厚疏松，素面为主，个别饰有简单戳点纹，器型有罐、钵、盆等。大量的鱼骨、蚌壳表明了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其中一些长达30多厘米的大蚌壳，也可能被用作某种盛装的容器。

第二地点发掘了二座房址和一座灰坑。房址均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四壁用木柱加固和支撑屋顶，斜坡形门道，长约2米，门向西南。居住面一律用黑土铺垫平整，未经夯实，中部有一灶址，周围鱼骨、兽骨堆积较多。室内遗物以陶，石器为主，陶器主要是一种火候较高的沙质陶，器型有罐、碗、盅、鬲等，施纹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主要是划纹和压印指甲纹。有大型器，F2出土的一件

鬲，直径近40厘米，鬲身上有刻划和戳点组成的条带图案，口沿切割成齿轮状，装饰较为繁缛。石器有半月形砍砸器和穿孔石器等，均为磨制，灰坑中出土一件骨甲片。

第四地点清理了土坑竖穴墓五座，一座为夫妻合葬，其余为单人葬，均为仰身直肢葬。墓中皆随葬陶器，一般只有一件陶壶，合葬墓中随葬有二壶一钵共三件陶器，男性身上有成串的青铜佩饰，身份地位可能较高。陶器皆施红衣，烧造较为精细。

第七地点清理墓葬三座，均为单人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墓内不随葬陶器，但都出有刀、钉一类残锈铁器，年代可能稍晚。

镇赉县地处吉林省北部边陲，过去考古工作开展较为薄弱，文化面貌不甚明晰。这次向阳南岗遗址的发掘，是继1960年和1984年普查之后的首次科学发掘工作。尽管所获遗物有限，但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类型、序列，以及和邻近地区诸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工作，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洪峰)

珲春县新兴洞青铜时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6月30日—7月19日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管会、州博物馆，珲春县文管所

墓地位于珲春县城西北50公里的凉水镇新兴洞村南600米处东山西坡上，西侧有一南北向的公路。1983年发现，同年因修筑公路取土，墓区西侧被破坏，清理出八座墓葬。1985年6月对墓区东部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发掘墓葬三十一座，由南向北排列，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积石墓。可分为大小两种，以大者为多，小者一般为火葬或二次葬。葬式为头东或西向，仰身直肢。葬法有一次葬、二次葬、多人合葬、火葬较多。墓中随葬品多寡不一。男性墓葬多随葬一些生产和狩猎工具。出土遗物三百余件。以石器为最多。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镞、花冠状石器，还有富有特点的扁平石矛。陶器有褐陶罐、豆、钵、碗等，均为手制。骨器有长方形骨甲片。铜器有铜泡饰。墓葬出土的斜刃柱状石斧、花冠状石器、半月形带孔石刀、长条形锥状石镞、柳叶状短而宽的石镞等是这一地区较有特色的器物。这一墓群当是古代北沃沮人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约相当于中原战国前后，为研究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实

贵资料。

此外，在墓群西南公路转弯处，还清理了一处渤海时期的窑址和瓦场。窑址基本完整，有窑门、火膛口和烟道。在窑室内平铺一层陶片。这些陶片质地坚硬、火候很高。陶窑结构合理，简单实用，表现了早在一千多年前渤海居民的较高的制陶技术。这一渤海窑址在我省尚属首次发现，它为研究渤海时期的古文化及其手工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王建)

镇赉县黄家围子青铜文化及金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6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地区博物馆、镇赉县文管所

黄家围子遗址位于镇赉县北部的坦途镇新风村黄家围子屯西端的一个漫岗上。面积约6000平方米。东距嫩江25公里许。其北部、西南部地表散布着大量的蚌壳、鱼骨、陶片和少量细石器。发掘面积300余平方米。

该遗址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遗存。

在下层堆积中，是一种以沙质灰褐陶和夹蚌壳粉的沙质灰褐陶为特征的文化。其中发现灰坑三个，沟一条，两个规整的柱洞和小片红烧土。灰坑内有大量的蚌壳、鱼骨、兽骨等。陶器以直口罐、盆、碗等平底器为主。并多在口沿下饰一周带按压纹的附加堆纹，其火候较低，皆手制。骨器中有锥、骨鱼，骨鱼的嘴、脊、鳍、尾雕刻得古朴逼真。从出土的器物分析，应属青铜文化早期。从文化面貌看，为吉林省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上层发掘了七座竖穴木棺墓，皆为单人一次葬，多为仰身直肢，亦有侧身曲肢者。墓葬排列有序，头向多在10—25度之间，横向排列三行，间距3—4米。可能为一家族墓地。主要随葬品有铜镜、铜钱、铁镰、刀、镞、环、马、衔、马蹬、带扣等。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两件桦皮箭囊，其中一件完整者内盛铁镞，桦皮上刀割的痕迹清晰可见。每座墓的墓圹中都随葬有羊的肢骨、矩骨、肩胛骨。这一墓群的另一特点是没有陶器随葬。墓群的时代可能为金代。(刘景文)

集安县禹山高句丽墓葬

发掘时间：1984年6—11月、1985年6—8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县博物馆

墓区位于集安县城东北禹山南麓，是洞沟古墓群六个墓区中最大的一个。此次发掘的区域呈长条形，东西长近5公里，南北宽40米，恰好从墓区中部穿过。两年共发掘古墓一百一十五座，其中石墓四十四座，土墓七十一座。石墓多分布在发掘区的西部，靠近县城，土墓则多分布在发掘区的东部，中部为石墓与土墓混葬地区。石墓可分为积石墓，有坛积石墓，有坛积石串墓，方坛阶梯积石墓。土墓可分为封土石室墓，有坛封土石室墓，封土洞室墓等。石墓随葬器物较多，出土遗物少则几件，多则几十件，甚至上百件。土墓大都不见随葬器物，仅有少数墓出土一、两件遗物。出土遗物主要有：金头饰、金环饰、金叶、金针、银饰、鎏金头饰、鎏金钉鞋、鎏金马具、铁矛、铁刀、铁镞、铁甲片、铁马具、铁鱼钩、陶罐、陶釜、陶甑、陶钵、陶网坠、釉陶釜、釉陶盆、板瓦和石斧等。

此次发掘是近年来集安高句丽古墓发掘中最典型、最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首先是发掘古墓数量多，而且处在洞沟古墓群的重点保护区域内。墓葬类型繁复，其中几座有坛积石串墓，结构颇具特色，墓室两两成组，还有器物随葬室，整个墓葬规模宏大，是过去高句丽古墓发掘中不曾见过的。此外，石墓、土墓中也发现一些结构特殊者，为高句丽古墓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其次，出土器物相当丰富。M3296、M3105是两座较大的有坛积石串墓，分别出土成组陶器十二件和八件。出土时或三件，或五件为一组。M3283是一座方坛阶梯积石墓，墓室出土陶网坠二百五十多件，完整者一百六十七件，铁鱼钩四十一件。高句丽古墓中出土成组完整陶器及出土器物中的金头饰、金针、铁鱼钩等都属首次发现。(耿铁华)

集安县通沟河口辽、金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8月至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考古研究所、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遗址位于县城南0.25公里的鸭绿江岸第一台地的边缘，长750米，宽6米，坡度为25度。发掘面积为9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1米左右，最厚处3米多，距地表深约5米。遗址中一般都是金代的遗存，个别地方可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金元层、下层为辽代层。遗址中共发现房址八处，其中仅两处较为完整，余均暴露局部，未暴露部位有的已被破坏，有的为现代耕地所压。在遗址中曾出有宋代均、龙泉、汝、定等窑的精美瓷器，还有辽、金的白瓷，宋、辽的货币。陶器主要有泥质红、灰、黑陶。器形以罐、盆为最多，器表多带暗纹。

这类辽、金时期的遗址在集安县还是首次发掘。(张雪岩)

延边地区东夏边墙

调查时间：1981—1985年

工作单位：吉林省延边州博物馆、延边日报社

边墙南起和龙县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东北向纵穿和龙西城、龙门乡和延吉细鳞河、铜佛、八道乡境，在双凤村往东折延，经烟集至长安乡磨盘山止，全长约150公里。

边墙营造方法，平原间多为土筑，山谷段则以土、石混造或用石块垒砌，现残高1—2、顶宽2—3、底宽4—5米。调查中发现烽火台（墩台）十四座，现残存高3、周长40—50米左右。

边墙筑造的年代，大约是金末年间蒲鲜万奴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所建东夏国的后期遗迹。因为从边墙地理位置看，它主要环绕以布尔哈通河为中心的延吉盆地和以东地区，为防范西敌东侵的一道屏障，这与元初“癸巳岁”(公元1233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蒙古东征东夏国“生擒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的历史记载较为相合。(绍维)

农安县镇金代窖藏

发现时间：1985年10月5日

工作单位：吉林省博物馆

窖藏位于农安县镇北城垣中段南约250米。在窖的底部有一个高48厘米的陶瓮和四个陶罐，在陶瓮陶罐里面及堆放在它们旁边的

藏品，计有陶瓷器、玉器、铜铁器和货币等一百五十余件。

窖中出土的铜钱最迟的是“大定通宝”。文献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始铸此钱，可知这处窖藏是在这一同时或以后时间埋入的，但这批文物应在铸“大定通宝”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就窖藏埋入和文物制作年代，距今都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

出有定窑、钧窑和湖田窑烧制的瓷器四十一件。其中属定窑烧制的三十九件，有白釉刻花莲瓣荷花或水草鱼纹钵八件，白釉刻花龙纹盘九件，白釉刻花缠枝荷花纹盘一件，白釉印花葵口六出双鱼或荷花纹盘五件，白釉印花蕉叶牡丹或花卉双鱼碟四件，还有白釉素面大小碗、双系罐、提梁壶等。其它窑系的有钧碟一件，湖田窑印花石竹纹影青执壶一件。

另外还出有青玉盏、盘、绿釉铺首兽足陶鼎和铜制的钏、剪、象棋子各一件，以及汉半两、宋政和通宝、大观通宝、铁制手工业用具等多件。

这处金代窖藏文物的发现，弥补了金代中早期定窑历史的空白，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和断代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英）

珲春县黄家店元、明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吉林省图珲公路考古队

黄家店墓葬位于珲春县凉水乡黄家店沟口西侧山脚向阳坡地上。墓葬南距图们江约150米，西北依山，西北高，东南低，面积约100平方米。一部分墓葬因修路遭到破坏，这次共清理七座。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1.95—2.2、宽0.57—0.67、深0.15—0.45米。墓口距地表深约0.15—0.25米。个别墓在开口处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墓向在230度—240度之间。有的墓的葬具为木棺。有的墓则在尸骨上部或底下附有木板，但不见两侧木板。均未见棺钉、棺环等类遗物。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南。

随葬品十七件，采集品六十件。有瓷器、陶器、铜铁器等。瓷器有碗、碟、高足杯、长颈壶，陶器有碟，铜器有汤匙、指环，铁器有小铁刀、铁镞。小铁刀出于死者腰部，铜指环戴在指骨，瓷器与铜汤匙出于下肢内外侧。

各墓随葬品数量不同，多达五件，少则二件。随葬品以瓷器为

多数，釉色以青白色为多，还有米黄色、灰色。皆无纹饰，釉不及器底，有泪痕。胎质粗糙呈灰白色，足部多为铁锈色。器内外底上多见三至五个支垫痕。

黄家店墓葬在结构、形制、葬具、葬俗方面，有一定特点，可能是元末明初东北女真族平民墓地。(李正凤)

黑 龙 江 省

亚布力镇北沙场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6月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遗址位于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处的岗地上，南距蚂蚁河2公里。遗址所在地为亚布力林业局沙场。这次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清理出居住址一座，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居住址保存基本完好，为半地穴式，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南北宽3.3、深0.25米。在南面有一阶梯状门道。出土遗物有陶、石、玉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黄褐陶，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均为手制，火候低，质地疏松。有的陶器内壁经过打磨。大都有纹饰，素面少见；以压印篦点纹和绳纹为主，亦有少量坑点纹、压印几何纹和划纹。有的在同一器物上，施以两种不同的纹饰。器形单纯，主要是罐、瓮、碗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的两种；打制的主要是亚腰形石锄和石片刮削器，以后者居多；磨制石器有斧、锛、锄、凿、铲、镞以及磨盘、磨捧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尤其是几件玉佩饰，光滑明亮，制做得十分精美，在黑龙江省尚属少见。

该遗存同黑龙江省已发现的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明显区别，当属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李砚铁)

泰来县战斗青铜时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9—10月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墓地位于泰来县城东北约20公里，东南距平洋镇战斗村约1.5

公里，座落在一弧形沙丘上。

这次发掘二十一座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除四座带墓道的大墓（长4米余）外，其余平面均呈长方形（一般长2米余，宽1米余），未发现葬具。埋葬方式有下列几种情况：成年单人、多人葬；儿童单人、多人葬；成年与儿童合葬；一次葬较多，均为仰身直肢；二次葬仅一座墓中发现二成年头骨（另两人为成年一次葬）。

随葬品较为丰富，共出土二百八十余件，其中有陶器（红衣壶、罐和钵等）、铜器（铃、镞、锥、管饰、勺、扣、耳环等）、骨器（镞、弓弭、珠饰等）、蚌器（刀、刮削器等）、料珠和石珠等。此外有的墓中还随葬有狗头等。

这次发掘充实并丰富了黑龙江省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特别是带墓道的土坑墓，填补了一项空白。据判断，其年代及文化内涵与1984年发掘的平洋砖厂墓葬相近。（郝思德　李陈奇）

讷河县二克浅古代少数民族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博物馆

墓群位于二克浅乡，已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铁器、铜器等七十多件。发掘者初步认为，它可能是二千多年前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遗存。（摘自《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日）

黑河市卡伦山辽代女真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8月5—17日

工作单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墓地位于黑河市东南15公里，南1.5公里即卡伦山村，东距黑龙江仅1.5公里，座落在江右岸的二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社员推土取砂时发现。

这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十九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可分为大型墓和小型墓，墓向为东北——西南，部分墓置有木棺葬具，无棺盖和棺底，个别的铺置桦树皮为棺盖。埋葬方法流行二次迁葬和火葬，一次葬少见，亦有合葬。不少墓随葬有马、猪等动物骨骼，还发现一座殉马坑。

发现的随葬品多达一百五十五件，主要有铜器、铁器、陶器和珠饰件，生产工具较少。铜铁器多为马具中的辔具和前后鞧銮饰，如镳、当卢、衔、铃、带扣、环和各种泡饰等。陶器基本组合为泥质瓜棱壶、喇叭口高领壶和夹砂素面罐，其中泥质陶为轮制，夹砂陶为手制。另有少量银器、漆木器和骨器。铜马具和陶壶、陶罐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初步研究，这是辽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的一处文化遗存。墓葬的发现，为今后探讨黑龙江省古代女真族的分布、葬俗及其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李陈奇　郝思德)

上 海 市

青浦县金山坟新石器时代至南宋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2月10—23日
工作单位：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金山坟遗址位于青浦县蒸淀乡东团村，六十年代初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中心是一座大土墩，经历年取土现仅存1000多平方米。从附近采集及土墩四周的探坑情况分析，以土墩为中心的200多米半径内为遗址的范围，面积共约4万平方米。试掘面积110平方米。遗址内涵为宋、唐、晋、战国及商周时期的印纹陶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晚期遗存。

清理的两层良渚文化的墓葬，位于土墩西部，都是头向南，无墓圹。M1侧身葬，随葬有玉锥形器、玉珠、石斧、贯耳壶、浅盆豆、T字足鼎等十件。M2仰身直肢葬，随葬敞口直腹碗形豆，圈足杯、侈口平底盆、侧足鼎六件。M1人骨架肩部有一件制作精细的兽面纹玉锥形器，这在一般良渚小墓中罕见。M1人骨架呈灰白色，局部有焦黑的遗痕，联系江苏寺墩遗址良渚墓葬人骨架、石斧、玉琮、玉璧有烧黑、烧裂的现象来看，良渚文化时期，有埋葬时进行火烧的习俗。

清理的五口古井，有南宋西口，晋、战国、良渚文化时代各一口。战国井底一件施姜黄釉的泥质红胎黑皮双系陶罐，是我国早期施低温釉陶器的珍贵标本，宋井中发现的西瓜子、稻谷、木挂钩、

陶球等遗物，对宋代上海地区的农业及民俗风情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T5坑出土的一件方格纹黑釉小陶罐，是我国南方早期印纹陶器施黑釉的重要实物资料。(张明华)

江 苏 省

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2月2—12日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上海大学文学院、苏州市博物馆、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山岛在苏州市西南50余公里的太湖中，隶属江苏吴县东山乡三山村。遗址位于岛西北部清风岭下的石炭系灰岩溶洞前。1985年5月发现。面积约500平方米，发掘面积36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可分两层：上层为砾石层，石制品较多，厚0.3米；下层为粗砂层，石制品较少，厚0.2米。文化遗物均属人工石制品，计五千二百六十三件，包括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等。以刮削器为主，具有使用痕迹的石片也占有很大比例。石料为变质岩、燧石，加工方法主要采用锤击法，少数为碰砧法。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及器物的组合显示出较强的地方特色，人类生活可能以渔猎经济为主。这是长江下游首次发现的一处旧石器地点，它填补了我国旧石器分布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原始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太湖的发育史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张祖方　陈淳　王闽)

连云港市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2月4日—4月5日

工作单位：连云港市博物馆

遗址位于灌云县大伊山北麓。这次发掘，开5×10米探方三个，面积为150平方米，清理出用厚9～16厘米的薄石板砌作椁室的墓葬38座，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方向东或东偏北10度至30度。其中三分之二的墓中有扣于头部的红陶钵。随葬品计九十五件。陶器主要

是钵、盆、碗、鼎、釜、罐、壶、杯以及陶拍、纺轮等，以宽檐、圆椎形足的釜形鼎、红沿陶钵以及小口、球腹双耳罐最具特色。多红、红褐陶。器表多素面纹饰以附加堆纹、指甲纹、折线纹为主，有的器底刻有符号。此外骨器主要有锥及獐牙。玉器为璜、玦、耳坠及胸饰。石器有斧、锛、铲、凿、镰以及砺石等。

遗址中还有少量的西周遗存以及汉代墓葬。

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对鲁南、苏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类型、时代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石板墓是屹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椁墓葬。(李洪甫)

沙洲县徐湾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5日—8月20日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徐湾村遗址位苏州市北、沙洲县鹿苑镇东南约1.5公里。原为东西150、南北约300米的一处台地，现存500平方米，共发掘面积400平方米，遗址地层，除1、2层为耕土层和后期扰乱层外，3层黄褐土层为良渚早期文化层，4层灰褐土层为崧泽时期文化层，共发现灰坑十八个，居住遗迹一处，墓葬十四座，出土陶器、玉器、玉器三百二十八件、还有炭化稻谷遗存。

居位遗迹发现于3层，经火烘烤，杂有蚌壳末，甚坚硬，根据柱洞排列，门向朝东。十四座墓葬，一座为良渚时期墓，余均为崧泽文化墓葬，有平地掩埋和土坑浅穴两种，均单人直身仰肢葬，头向多数朝西南，人骨架都略有倾斜，头高脚低，骨架附近有木炭和朽木遗迹，大概已使用葬具。随葬器物最多的有三十二件，最少的七件。常见器形有盆形扁凿足、釜形扁蹄足、盆形扁短足、带盖扁三角足等鼎，高把镂孔豆，鼓腹葵瓣圈足杯，瓦棱折腹罐，折腹平底钵，盆等，少数墓葬並随葬穿孔石斧、长条形石锛和玉璜、瑗、玦、镯、纺轮等遗物。

史地学界都认为沙洲系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成陆较晚。徐湾村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而且对研究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形地貌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王德庆)

常州市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20日—1985年11月17日

工作单位：常州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实习队

遗址位于常州市戚墅堰镇西南的圩墩村。1972年、1974年、1978年先后发掘过三次。这次是第四次发掘，揭露面积5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分为四层，包括马家浜、马家浜——良渚过渡阶段的"崧泽"两个文化期。其中马家浜文化又可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清理墓葬三十九座，有一批崧泽时期墓葬，大多数是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墓葬，前者有两座大型墓，随葬品多达三十余件，后者多无或少见随葬品，有拔牙习俗。

遗址出土器物有陶、石、玉、骨、角器、编织物及木器近七百件，陶片五万余片。新的重要发现主要有：①崧泽期的两座大型墓，不仅随葬品多，而且包涵着过渡阶段的诸多因素。②木器的使用在品种、数量上突破同类型遗址的发现。大量木材、树木主、支干及木器大多保存在第4层，距今年代6000年前后，有船橹、桨、农业种植用的点种棒、铲、锥、凿、矛及穿孔木针、木楔、带孔的梢钉、榫卯构件等及众多砍削痕迹木料。③骨角器多，存留在3、4文化层。骨器有匕、鱼镖、针、锥、镞笄，笄形制品最多，制作精致，还有许多骨料；角器有锥及靴形器等，在劈断的木料及鹿角料中都发现断插其中的角锥，说明此类角锥是用以劈开角料的工具，角料中多有锯切痕迹。④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植物，初步鉴定有炭化米粒、稻粒、果核、水生植物的菱角，芡实、莲子等。炭化米粒为粳、籼混合体，可能与罗家角遗址的稻米相似，而与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有别。⑤在动物兽骨中，初步辨认有牛、猪、狗、貉、獐、四不象、梅花鹿和各种鱼类、龟鳖、鸟类。在一些探方中发现有厚达0.4米的多层螺壳堆积，引人注目。⑥此外又发现泥塑男性人面模型，绘白彩、褐彩，纹样别致的彩陶片等。

这次发掘对马家浜文化和对崧泽时期文化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为进一步探索太湖地区古代的人种和当时各阶段人类活动情况，以及人与生物圈的变化关系、植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迁、古地理的变化等，提供了可做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实物资料。（商志䃮　陈晶）

丹徒县东烟墩山西周墓

发掘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中山大学、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县文化局

东烟墩山位于大港东约5公里，1954年出土过著名的“宜侯夨簋”墓（1号墓）。这次发掘为2号墓，正北距1号墓约70米。

墓葬封土为馒头状土墩、土墩依原来的低洼地势堆封，无坑。墓葬发现在生土层上，由石块叠砌成“棺床”，方向正东西。“棺床”底部由七十九块大石顺缝平铺而成，东西长3.6、南北宽2.4米。底部东、南、北另有一圈纵横连续接砌的石壁。石块大小不等，厚度一般在25—40厘米之间。

随葬品共计三十六件，其中原始瓷坛三件，豆十六件；印纹硬陶坛一件，瓿二件，罐一件；泥质灰陶豆三件、钵一件；夹砂红陶鬲八件；另有骨笄一件。原始瓷及硬陶器上皆有纹饰，计有变体复线夔纹、菱形复线回纹、折线纹、回纹等数种。

根据出土物，墓葬的年代可定在西周前期。该墓地处“夨簋”墓附近，它的发现为探讨“夨簋”墓的葬制和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谷建祥）

镇江市谏壁王家山东周青铜器墓

发掘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镇江市博物馆

墓葬位于谏壁电厂王家山工地，是一座土坑竖穴墓葬。墓底东西残长6米，南北宽3米，深距地表约6米。青铜器集中出于东部二层台上，另，十三件设盖陶瓮出于西部方坑内。

墓中出土青铜器近百件。容器有盉、虎子、炉、匜、盘等；乐器有錞于和勾鑃；兵器为戈、戟、矛、镞等；车饰有軎、辖、环饰等；生产工具有锯、镰、锄、锛、削等。其中，匜、盘、舟（?）内线刻宴饮、乐舞、射侯、舟旅等生活画面，以及蟠龙（蛇）、鹤、鱼等动植物图象，画面上并出现有众多的短发者与戴冠者的人物形象，刻纹细如发丝，多以短虚线构成。另外，三件一组的人面纹錞

于，大小成序，形制为弧顶无盆边，上部稍大，肩突向一面倾斜，器体呈不等称形，顶设虎钮，通体饰三角云纹、变体云纹、螺旋纹、鸟纹等，尤以肩饰的人面纹和不等称的造型，在已出錞于中尚属首见。还有，青铜虎子，设提梁，呈伏虎形，亦较罕见。兵器的鼻饰及火焰纹斑戈、戟、矛、镞，车饰的几何形纹车軎、兽面纹车辖、设环鉴盖弓帽，以及各类青铜生产工具等，都具有浓郁的江南地方特色。此墓时代约为春秋末期。(刘建国)

苏州新庄东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2月5—18日
工作单位：苏州市博物馆

遗址位苏州市西郊，离城约4公里的长青乡路南大队新庄村村西南。原为一土墩，周围地势平坦。遗址地表因基建被扰乱，地层内涵比较单纯，第1层为黄褐土扰乱层，第2层灰褐土，第3层深灰土，两层出土遗物基本类同，发现水井三口，灰坑二个，烧窑一座。

水井全系土井，皆近圆形，J1井壁用芦苇编织加固，J3井壁以木桩加固，防止井壁松塌。灰坑均不规则圆形，敞口，圜底，H1满贮废弃碎陶片。烧窑断面呈椭圆形，前端尚存烟道一截，略向前倾，窑底有厚8—10厘米灰烬一层，伴出有黑衣陶、灰陶和印纹硬陶片。

出土遗物以泥质黑衣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印纹硬陶、夹砂陶和原始青瓷器。器形有釜、鼎、豆、甗、罍、罐、盆、盘、杯、壶、碗和角状器等。陶器纹饰除弦纹、方格纹、麻布纹外，还有圆圈纹、雷云纹、变形S纹等仿铜器纹饰，此外尚有石器、榫卯木构件，木臿等生产工具。这些出土物与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等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相同。(王德庆)

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兵马俑坑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徐州市博物馆

兵马俑坑位于徐州市东郊狮子山西麓。地处由东向西倾斜的山坡上，坡度3度，方向275度。已发掘的两坑互相平行，为竖穴土坑，

坑边经过处理，平整光滑，底部亦经修整但较粗糙，裸露凸起的岩石未凿除。填土为红褐色的粘土中夹杂较多的黑色礓石和少量的绳纹瓦片，未经夯打。顶部和东端长约2米，已被破坏。

1号坑长27.7、口宽2.1、底宽1.35米。坑内分前后两组兵阵，前后阵间距2.2米，以自然岩石为界。前阵全部为各种姿态的立俑，均已倒伏叠压。后阵前面为驷马战车一乘，车上立一将军俑。长0.4、宽0.3米的木质车仅存朽痕，应为军队的指挥所在。车后各类俑排列密集，有一定的规律。2号坑长29.4、口宽2.2、底宽1.4米，亦分前后两组兵阵。前阵为摩肩接踵的立俑和跽坐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队形和姿势，排列最为密集，前后阵间距2.3米。两坑实际发掘出兵马俑二千一百四十四件，其中将军俑一，仪仗俑一，马俑四，发髻俑四，发辫俑四百六十六、盔甲俑一百七十四，跽坐俑五百四十九，站立俑九百四十五。根据排列密度推算已经破坏的部分，全部数量可达二千五百件。

1、2号坑出土的兵俑，高度在25.5—54厘米之间，全部面向西方，极少数俑的手臂附近有涂朱木棒痕迹，但较多的背有箭箙。通体涂白彩，口、额、辫、领和袖等部位绘红彩，色彩保存较差。皆为模制，烧成火候高，损坏较轻。时代为西汉，性质应为墓葬的随葬坑。

经调查和钻探，在1、2号坑的南侧发现3号俑坑，东侧发现4号俑坑，北侧200米处发现5号马俑坑。还发现大量的瓦当、铺地方砖以及排水管等汉代建筑遗迹，其整体布局和墓葬的位置还待进一步勘探究明。(李银德)

仪征县烟袋山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23日—1985年12月28日

工作单位：南京博物院

墓葬位于仪征县东北约9公里处的烟袋山顶部。上为高大的封土堆，直径23、高4.6米；下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土坑的平面呈“凸”字形，最长处8.95、最宽处6.25、深8.2米。墓坑的填土经过夯打，夯层厚约0.3米，每一夯层之间撒有草木灰，局部有麻布痕迹，夯窝比较密集，直径5—6厘米，深约1厘米。墓葬由墓室和外藏椁两部分组成，上下及四周都填有0.5米厚的青膏泥，墓室的底部还铺

有0.3米厚的木炭。墓室的外椁为长方形，长4.4、宽2.6、高1.76米，内分为棺室、头厢、边厢和足厢，棺室内有并列的双棺，尸骨已朽，仅存骨渣，头向179度，棺盖上用铜泡钉镶嵌的北斗七星。

墓室早年被盗，棺内出土遗物主要有玉璧、玉瑱、铜璧、铁削、木杖、木握、五铢钱等。头厢内主要置木俑，有侍俑、侍女俑和伎乐俑三种，有的俑身上还残留彩绘痕迹。边厢和足厢内置陶器、铜器和漆器，陶器有鼎、盒、壶、钫、甗、灶等，铜器有钫、盆等，漆器有耳杯、奁盒等，有一器底上有“周氏”二字，隶书。外藏椁亦为长方形，长5.05、宽1.82、高1.12米，与墓室相互垂直放置。外藏椁内主要放置陶器、漆器和木俑，陶器有鼎、盒、壶、甗，漆器有描金龙纹大漆盒和描金云气纹小漆盒及耳杯，木俑主要为仪仗俑，另外还有木制车马，车马上的铜饰件全部鎏金。根据出土陶器及五铢钱来推断，墓葬的年代应为西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后，昭帝元平元年以前。(张敏)

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

发掘时间：1985年2月

工作单位：徐州市博物馆

墓葬位于徐州市西南屯里村拉犁山北坡的二层台地上，是一座平地砌建、上筑夯土的石室墓。封土南北长29、东西宽21、高5.1米，方向5度。墓室全长14.9、最宽处10米。分前中后和回廊四部分，计九室一廊。两扇石门可以启闭，外以一扇已断门枢的石门抵紧。前室长2.6、宽1.9米，两侧各有一耳室，耳室长1.95、宽1.17米。中室长3.35、宽3米。中室东侧室长3、宽2.9米。中室西壁、侧室东壁均有一耳室，耳室长1.9、宽1.4米。中、侧室间有一整石雕凿，高1.4米，有柱础和斗拱的十六棱柱。后室长3.6、宽2.6米。回廊长15.7、宽1.15米。后廊中部耳室最小，长1.19、宽1.15米。整个墓室面积达60多平方米，全部以大条石砌成，条石一般厚0.5、长3米余。条石朝室内的一面都经过精雕细琢，非常平整。九室都叠涩成盝顶，高1.85至3.6米。墓室地面均用石板铺砌，石板最大长2.62、宽1.04米。室内四周都凿有水槽排水，地面和壁基都铺抹白石灰。后室白灰厚达4厘米。灰面木板压印痕迹仍清晰可辨。

墓葬曾数次被盗，但仍出土铜耳杯、六博棋，五铢钱，琥珀蝉、

王猪、水晶珠、铁剑、金银饰件以及不完整的铜镂玉衣一具等文物近百件。中室及其西耳室壁上雕刻有卷云、瑞鸟等简单的画像图案。中室和侧室的顶部雕刻直径32、16厘米的二圆。后廊顶部雕凿“尹”和“周”字。在距墓葬（M1）西30米处有一稍小的封土堆（M2），尚未发掘。墓葬的时代为东汉。(李银德)

武进县湖塘乡南朝隋朝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武进县文化局

南朝墓一座，为画像砖墓。墓呈封门式，进洞口有一挡风墙，墓壁上有较精细的飞天、马车、图案等花纹。

隋墓一座，为壳体结构砖室墓。由两个并列的墓室组成，呈椭圆形，系由大型砖头盘圈建成。墓中出土物有石俑、石器、陶器、辟邪、盘口青瓷瓶、青瓷灯碗、铜镜和用朱砂写成的买地券等七十余件。(摘自《新民晚报》1985年3月19日)

浙 江 省

余杭县良渚荀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镇荀山周围分布着较多的古文化遗址。这次发掘区位于良渚乡吴家埭村钱粮自然村西。共开探沟三条，揭露面积66平方米，初步弄清了该区的地层堆积。

上层为良渚文化时期的堆积，出土的陶片有鱼鳍形和T字形鼎足、袋足鬶、泥质黑衣陶豆等。在良渚文化层之下，发现了相当于崧泽和马家浜时期的堆积，出土的遗物中有扁凿形鼎足、泥质灰黑陶高圆足镂孔豆和双目式圆柱形鼎足、腰沿釜、异形鬶，夹砂红陶豆等。(芮国耀)

嘉善县大往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月17日—2月6日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嘉善县东北11公里的姚庄乡莲花泾村南部的大往圩，1982年发现。初步探明遗址范围约6000平方米，南部已被新开河道破坏。

这次抢救性发掘面积140平方米。耕土层以下划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堆积层。下层以夹砂红灰陶的凿形足鼎、泥质灰陶的镂孔粗把豆、折腹罐（上腹部常有刻划编织纹）、腹部有数道附加凸弦纹的瓮等器物为代表，相当于崧泽时期。中层有鱼鳍形鼎足、双鼻壶、厚胎缸等，多素面，为良渚文化层。上层以夹砂红陶绳纹鼎和甗、泥质灰陶条纹、大方格纹、绳纹凹底罐、云雷纹大口盆、大圈足尊形器、细高把带突棱豆、硬陶条纹凹底罐、条纹鸭形壶等器物为代表，这些器物大多见于上海马桥4层，有些见于嘉兴雀幕桥上层。

大往遗址上文化层的确立，对于我省探索后良渚文化及其与马桥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王明达）

绍兴县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7日—10月30日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保所

遗址位于绍兴市西北18公里的马鞍乡寺桥村陆江下自然村，与1984年春发掘的马鞍遗址相距600多米。今年当地砖瓦厂取土发现，遗址范围约8000平方米，已遭到破坏。

这次发掘110平方米。发掘区的堆积分为上、下二个文化层。下文化层有夹砂红陶的鱼鳍形足鼎、泥质灰陶的圈足盆、罐、黑皮陶的镂孔竹节把豆，未见绳纹和印纹陶；石器有斜把破土器、台阶式有段锛、柳叶形箭头等，相当于良渚文化阶段。上文化层上部曾遭严重扰乱，仅保存较薄的文化堆积，有夹砂红陶的绳纹鼎、绳纹连体甗、绳纹釜支子，条纹、方格纹、云雷纹、叶脉纹等印纹陶。陶片多见绳纹和拍印各种编织纹的印纹陶，多见凹底器和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石刀等，相当于后良渚文化阶段。

仙人山遗址是宁绍平原古文化遗址探索中的又一发现，对研究河姆渡文化的后续和良渚文化的后续，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王明达)

温州东瓯窑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3—5月、10—11月

工作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处

今年两次调查，发现历代瓷窨遗址一百二十处以上，除洞头一县，其他各县均有发现。东瓯窑窑址集中分布在今永嘉县楠溪江下游之东岸、罗溪、黄田和仁溪四个乡，起始年代可推到汉代末期，延续时间可到达五代宋初。在瑞安县飞云江下游北岸之陶峰、丰和、荆谷和梅屿四个乡范围内，发现北宋窑址密集区。加上二区之间的温州市西山、杨府山和瑞安县丽岙寨盘山窑址，已发现东瓯窑遗址二十六处之多。

据野外调查的初步认识，瓯窑制品可划分为若干不同发展阶段，但其制品面貌和工艺特征均与越州窑有颇多共同之处，主要以其浅白的胎色和富有玻质感的淡青色釉而呈现为另一种制品类型，惟其盛于晚唐时期的粗瓷胎深腹钵形匣钵具为浙江青瓷其他诸窑系所未见。北宋中期以后窑场激增，烧造地域空前扩大，出现多种新制品，具有瓯窑传统特色的制品已销声匿迹。(任世龙)

绍兴市兰亭宋代古道遗迹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古道位于兰亭后面南侧的机耕路边，距地表2、残长7、宽2米多。路面由石板和砖块组合铺砌。石板呈长方形，铺路中央。砖块铺砌的路面中间微微隆起，两侧倾斜。所铺砖全为素面，呈青灰色，其形制比较规则，具有宋代砖的特征。这一古道的发现为确定北宋至道二年内侍高班等人建造的天章寺——宋兰亭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宝贵资料。(摘自《新民晚报》1985年5月9日)

南宋临安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10月—1985年1月
工作单位：临安城考古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组成

南宋都城临安位于今杭州市区，由于现代城市建于其上，仅能进行地面调查及配合基建进行小规模发掘，主要工作是勘测皇城的位置、范围。

据《临安志》记载："大内在今凤凰山之东，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经过钻探及试掘，在今万松岭路南侧，顺山坡发现皇城的北城墙，地面尚存2米高的夯土墙，宽约11米。城墙往东皆在现代建筑下，钻探发现其断续延长至200米左右。北城墙的城门和宁门，东城墙的东华门皆压于道路及建筑之下，无法发掘。在今馒头山麓至铁路局机修厂一带发现了东城墙，宽10—11米，长390余米。城墙皆为夯土墙基，夯层厚度约20厘米，夯层呈红黄色或灰色，夹薄层砖瓦碎块。在北城墙内侧曾发现有包砖，为长方形厚砖。

南城墙尚需继续钻探试掘，皇城西边为凤凰山，是否有墙亦需继续寻找。皇城内部经钻探，在现省军区库房院内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迹及一处大面积的池塘遗迹。(李德金)

杭州市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1985年12月
工作单位：临安城考古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组成)

南宋官窑遗址曾在1956年由浙江省博物馆进行发掘，仅清理龙窑形窑炉一座。自1984年开始又对该遗址进行全面钻探及试掘，今年发掘了另一座窑炉及全部作坊遗址。

窑炉仍为龙窑形，斜长40.5、宽1.4—1.85米。窑炉前后的火膛、出烟室尚存残迹，窑门残存四座。作坊遗址位于乌龟山及桃花山之间的小盆地上，已被附近现代建筑破坏大部分，残存房基三处，房内发现有贮存釉料的大缸，练泥池及制作瓷坯的轮盘基坑遗迹，并发现一座马蹄形的素烧瓷坯的窑炉，其周围有废弃的素烧坯堆积。

房基两侧有石块砌壁的排水沟，既可供制瓷用水，又可防止山水冲刷场房。在窑炉、作坊内外出土大量窑具、工具及瓷器，瓷器中既有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品，又有大量仿古的陈设用具及生活用具。如壶、瓶、罐、炉、簋、觚、琮等。（李德金）

安徽省

定远县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侯家寨遗址座落在定远县城西35公里七里圹乡袁庄村后的台地上，遗址高出周围农田2米左右，总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5米左右，遗物有陶器、石器、鹿角、猪牙以及其他家禽家畜等骨骼。遗迹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块等。陶器主要为夹砂粗红陶，陶质松软，器形有釜、盂、支架、鼎、壶、缸、钵、纺轮、锉等。石器主要是磨制的石锛、石斧等。从地层和器形分析，侯家寨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陶支架、粗红陶罐、钵等为主要特征；晚期以外红内黑夹砂罐和三足器为主要特征。

从出土遗物看，侯家寨遗址的文化遗存可能与大汶口早期文化有联系，其中鸡首耳陶罐则与安徽肥西古埂早期文化相似。因此，侯家寨遗址亦是江淮之间较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阚绪杭）

肥东县古城吴大墩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肥东县文物管理所

吴大墩遗址位于安徽肥东县东部，与全椒、定远、滁县三县交界。遗址总面积4万多平方米，文化堆积有3米多厚。发掘5×5米探方三个，文化堆积分为9层，分别为龙山，二里头、商周共四期。发现的遗迹有西周时期的房基和柱洞，房基被晚期地层打破，

范围不清。从柱洞布局看，其形状为长方形，进深二间。地面建筑，房基为黄绿色土。在房基周围发现有西周时期的灰坑，灰坑呈不规则形状，口大底小，坑内出土陶片较少。遗址出土大量陶片，龙山时期的有夹砂红陶鬶足、灰陶小平底碗、器耳等。二里头时期的有鼎、釜、觚杯、盆、罐等。商周时期的有鬲、豆、盆、罐、瓮、大口尊、簋、原始瓷豆等。工具有石锛、石斧、纺轮、陶范、残铜刀。遗址出土的陶器不论陶质、陶色和器形都与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反映了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特征，为研究江淮地区淮夷族文化提供了新资料。(张敬国)

岳西县祠堂岗、鼓墩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西县文物管理所

祠堂岗为一座台形遗址，座落在岳西城北6公里，遗址南约200米为合岳公路，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为0.5—1.5米；出土完整器物有陶壶，陶纺轮、石锛、石斧等。余皆为陶片。在陶片中以黑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可辨器形的有鼎、豆、碗、壶、鬶、缸、盆、钵等。纹饰有绳索纹、刻划纹、附加堆纹、镂孔等。在遗址上采集有石铲、石锛、石斧等生产工具。鸭嘴形鼎足、枫叶形鼎足、鸡冠耳碗、盆形豆等均与薛家岗二期文化相同，因此，祠堂岗遗址属薛家岗文化。

鼓墩遗址座落在岳西县城西25公里的山里，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遗址上采集到龙山、商（约当二里头)、西周三期文化遗物；其中商周文化遗物颇具地方特色，如锥状鼎足，通体饰细绳纹。短粗足尖平的鬲足亦通体饰细绳纹等，这类遗物既不同于中原商周文化，也有别于江淮之间的商周文化，很可能是当时这一地区土著民族的文化特征，值得注意。(杨德标　闻绪杭)

马鞍山市杨坝村商周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马鞍山市文物普查队

遗址位于市郊霍里镇杨坝村的小土岗上，高出地面5至10米，

现有面积5000多平方米，从土岗的剖面观察，20厘米的地表耕土层下面即为文化层。文化层层次清晰分明，有五层，堆积厚度在3米左右，保存完好。

整个遗址土层中包含物十分丰富。以陶器为多，有鬲、甗、豆、鼎、簋、匜、盆、罐等，还有少量原始瓷和石锛、石斧的残片。陶片上有席纹、绳纹、回纹等印纹和堆纹。还发现大量的红烧土，内含有稻壳。（郑新明）

南陵县千峰山周代土墩墓

发掘时间：1985年5—6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化馆

土墩墓位于葛林乡西面的千峰山，这里山峦起伏，在周围各个小山岗高垅上分布着一座座的土墩墓，除部分高岗被开辟成农田而遭受破坏外，现保存的土墩墓形制一致，排列有序，且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墓群集中密结，绵延5公里余。这次发掘，其中的十八座。

这类墓结构特殊，既无墓坑又无葬具，亦不见尸骨。在原上岗的地表上就地取土堆筑而成。堆土未经夯打，土质松软无层次。堆筑的形状一致，外形呈馒头状，底为圆形，一般直径12—24、高1.5—3.8米，大多数土墩为一墩一墓，个别土墩上下叠压两座墓。随葬品都放在土墩的中心位置。十八座土墩墓共出土器物四十余件，以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为主，印纹软陶较少。器形有鼎、豆、盉、壶、罐、坛、碗、钵、盂、鬲、甗、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土墩墓随葬品极少，最多的一墓为八件，少的仅一件，还发现一部分空土墩墓，无一随葬品。根据器物特征，初步分析这批土墩墓的时代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这批土墩墓的发掘，为研究皖南地区土著文化提供了新内容。（杨德标　杨鸠霞）

郎溪县宣郎广茶场西周铜鼎

发现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郎溪县文化馆

郎溪县在文物普查中，于十字乡废品收购站征集到一件铜鼎。据调查，该鼎出土于宣郎广茶场的山地里。

鼎为立耳，圆形，直口，深腹，圆底，扁锥形三足。耳呈绹索形连铸于口沿上，上部圆折，与足不对称，口沿稍折。沿下饰云纹一周。腹内中部偏下有舌状支钉四个，很似甗的箅承。腹底外部有“丫”形范缝，三足距离相等，稍外撇，其中一足铸成时即短1.5厘米。沿足中至口沿，均有三条云纹形突出扉棱。底、腹部稍锈蚀和破裂。通高28、口径27.5、耳高4、腹深15.5、足高8.5、壁厚0.7厘米，重3.1公斤。将它与同类器物比较，其绹索形耳同陕西长安新旺村的西周初期大鼎、山东费城春秋铜鼎极为相似，虽然纹饰、器形有别，但该鼎胎体较薄、铸造简朴，仅见单层云纹，且圆中略折，线条简约，是西周流行纹饰风格。又扁足形实足乃从商和西周早期的圆锥形空心足演变而来，上加突出扉棱，更具西周中晚期铜鼎的特点。据此，我们认为鼎的制作年代约当西周后期。

这件铜鼎在形制上除了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外，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即腹内有箅承，具有甑、鬲复合器——甗的同等用途，而在外形上又完全是鼎。可能为江南古代土著文化在形制上的反映。(宋永祥)

肥西县新仓乡楚铜贝窖藏

发现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安徽省肥西县文管所

铜贝窖藏位于新仓乡政府右100米处，农民挖沟时发现，为一灰色绳纹夹砂陶罐（已破烂)，内盛绿色圆状物一团，打碎后似蚕豆瓣样。铜币经清洗，净重48.5斤，基本完好的有八千六百枚，破烂能辨认的六百四十枚。这些楚贝大小不一，厚薄不同，有椭圆形、长圆形，有的洞为穿孔，小的重1.86克，大的重3.71克。钱的正面凸起，并有文字。这些铜贝为楚国的“蚁鼻钱”，在肥西尚属首次发现。(倪运熙　席为群)

南陵县、铜陵市春秋至唐宋冶铜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安徽省南陵县、铜陵市文物普查工作队

古代冶铜遗址主要分布在南陵县工山乡、桂山乡、戴镇乡、铜

陵市凤凰山矿区、朱材乡，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发现的遗物有采矿用的青铜镢、斧、凿、勺以及坑木、铜锭、铜碴、石范、大量的炼碴及印纹陶片等。从已发现的遗物推测，遗址最早的时代应为春秋，延续到唐宋时期。这次发现的冶铜遗址是继湖北黄石、大冶冶铜遗址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据《文物报》1986年2月21日）

当涂县双梅村孙吴地券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当涂县文管所

地券发现于龙山桥乡双梅村，券质料为铅，青色，呈长条形，长15.8、宽4.3厘米，重量为385克。券文三行，共九十三字，内容为：

“吴故夷道督，奋威将军，诸暨都乡侯会稽孟赟。

息男壹为赟贾男子周寿所有丹阳、芜湖、马头山冢地一丘东出大道，西极山，南北左右各广五十丈，直钱五十万，即日交毕，关连𢩦剌奸，齐谨破券，以解是为明。

“凤皇三年八月十九日对共破券”券文书写了孟赟的后人为其购买的墓地四至、地价等语，是买地的契约，文中并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祖籍。凤皇三年，是吴孙皓的年号，为公元274年。此地券是不易多得的文字资料，同时书体也是研究孙吴时期书法面貌的珍贵资料。（王俊）

福 建 省

平潭县南垅壳丘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12月
工作单位：福建省博物馆

今年发掘面积700平方米，文化层保存好的不及50厘米，清理灰坑二十一个和墓葬一座。完整器物少见，陶片以灰褐色砂陶为主，手制，胎厚，质地粗糙，火候较低，口部略经慢轮修整，有的口缘作成肉状，领部有旋纹数道，颈肩之间多压印贝蚶齿纹、篦点纹、

锥刺纹，可复原器形有釜、罐等，此外还出土一些泥质灰黑陶片，素面，火候低，圈足镂圆孔。石器多小型石锛，穿孔大扁平石斧、精磨石环各一件，此外还出有一部分鹿角、猪牙。从出土遗物初步观察，作风较闽江下游的贝丘遗址较为原始，与金门富国墩的遗物特征较为接近。(闵朴)

诏安县腊洲山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福建省博物馆

遗址位于闽南诏安县梅岭乡腊洲山。文化堆积层主要由贝壳类形成，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5米。采集的陶片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较少，陶质较粗糙，手制，口沿经慢轮修整，火候较低，可复原器形有罐、釜、豆等，纹饰有绳纹、叶脉纹、锯齿纹，生产工具有石锛、石镞和陶纺轮。在山下坡地上还采集不少石片、石核和打磨石器。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毗邻的粤东潮汕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类似。(闵朴)

崇安汉代城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福建省博物馆

今年在高胡南坪建筑群基址的东南部发掘900平方米，堆积层均被近代破坏扰乱，遗迹无存，出土大量板筒瓦、瓦当和陶器残件。解剖东南段城墙城濠一处，面积110平方米。城墙筑在山坡上，夯筑残墙高4、宽6—8米，墙表皮有一层经火烧烤的硬层。在城墙东南段外的北岗，发掘2000平方米，揭露三组并排的四廊合院式的建筑群基址，院子用河卵石铺砌，也有用几何纹花砖平铺的，出土物除大量陶制建筑材料外，还发现封泥一件，西汉初期的薄边残铜镜一件，铜盖弓帽一件。(闵朴)

福州市古城村汉代古城址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福州市郊区文管会

古城址位于新店乡古城村，古城山南麓，浮苍山以北的小盆地中。城址呈长方形，座向170度，东西狭，南北长。城宽294米，长残存268米，可辨认的城墙合计275米，西城墙残高约1米，厚约10.5米，夯土建筑。

七十年代初，在城址的东北角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深2米多处发现了用石板平铺的地面，伴随出土有粗陶器和布纹大板瓦。六十年代在城南侧近1000米的浮苍山巅出土一批汉代的建筑瓦件等文物，可能与古城遗址有关。这一城址的发现，为澄清汉代闽越古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摘自《福州晚报》1985年7月29日）

建阳县将口唐代龙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6、7月

工作单位：福建省博物馆

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龙窑窑基一条。窑基长53、宽2米，窑壁似用土块垒砌，残高约20厘米，窑壁内向表面抹平，有一层淡绿色亮泽的窑汗，不设窑门，窑底不见窑具罗列，底部为厚约30—40厘米的烧土层，窑身后半段微曲，底部倾斜度12—18度，窑头及窑尾受破坏，出土大量青瓷器物，以碗为主，还有盆、钵、碟、盘、壶、罐等。这座龙窑窑基已进行保护，并建盖了长廊式屋面。（闵朴）

山东省

广饶县付家、五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付家遗址位于广饶县城西南1公里。据地面踏查，面积达50万—60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今年春、秋两季发掘了近200平方米，出土墓葬二百零二座。墓葬分布相当稠密，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按墓葬露口层位，可分三个墓层，一般墓圹清楚，墓向按层位的不同而不同，如第二墓层多东西向，第三墓层以南北

向为主。多为方形土坑竖穴墓，有些为二层台结构并留有木质葬具，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有部分双人合葬和多人上、下叠葬、二次葬等。随葬器物不丰富，不少墓未见随葬品，一般墓仅有一、二件，最多五件。陶器绝大多数为泥质红陶，少有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陶，未见黑陶和白陶。陶器器类少，常见折腹罐形鼎、钵形豆、罐和单把罐式杯等，个别墓出有罐式盉和钵形鼎。器表多素面磨光，在豆类中饰有小镂孔或大镂孔，在鼎、罐上常有彩陶和彩绘。最突出的有以大红、黄、黑等覆彩绘以涡漩纹、卷云纹或曲尺纹等图案。从陶器来看与鲁南的汶泗流域大汶口文化有不少差异。

五村遗址位在广饶县城东2公里。今年秋季进行了全面普探，面积为75,000平方米，是一高出现地面1—3米的台形遗址，遗址北有一条古河道，现为沙土带，东西两缘为沼洼地。在工程范围内的遗址东缘，开5×5米探方二十八个，在遗址的中部现存最高处开了两个探方。东缘诸方上部淤土层一般在3米左右，以下始见大汶口文化层，中部的上部堆积早被破坏，耕土下即为大汶口文化层，发现较多的小灰坑、柱洞及路土、硬面等遗迹。陶片比较零碎，未有可复原的器型，其陶色、陶泥和彩陶等与付家墓地相似，均系大汶口文化中期偏后至晚期偏早阶段的遗存。

这两处遗址的发掘资料，提示出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为探索大汶口文化类型问题提供了线索。(郑笑梅)

章丘县邢亭山大汶口文化至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6日至11月4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遗址在埠村镇邢亭山村西500米左右，南北约200、东西约220米，略呈椭圆形，面积约38,000平方米。开探方四个，实际发掘面积约80平方米。发现了商、岳石、龙山和大汶口文化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

大汶口文化仅见两个灰坑，出土凿形足鼎、平底盆、篮纹罐和彩陶钵等，属大汶口文化晚期。

发现龙山文化灰坑三十三个，墓葬一座。陶器中有鬼脸式足鼎、素面鬲、甗、盆、带流盆、杯、碗、罐、瓮等，其特征与城子崖下层和仕平尚庄者基本相同。

发现岳石文化灰坑十五个，但出土器物不多，主要有鼎、罐、甗、豆和器盖等，有些罐上有横绳纹，其特征与益都郝家庄一致，城子崖下层也有这类遗存。

发现商文化灰坑十二个，出土鬲、簋、罐等陶器，年代约当商代中晚期。（严文明）

章丘县乐盘大汶口文化至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6年9月21日至10月14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遗址位于枣园镇季官庄东北，因修水库绝大部分已遭破坏，残余部分约40×20米。开挖探方六个，面积约150平方米。发现有大汶口、龙山、岳石和商代四个依次叠压的文化层次。发现大汶口文化灰坑五个，出土遗物有凿形足篮纹鼎、平底盆、三足盆、小口壶、彩陶钵等，属该文化晚期。发现龙山文化灰坑十九个，出土陶器有鬼脸足罐形鼎、盆形鼎、豆、杯、罐、甑等，与城子崖下层接近。发现岳石文化灰坑七个，乱葬坑一个。出土陶片甚少，仅有罐、豆残片及鼎足等。发现商文化灰坑六个，出土陶器有鬲、盆、罐、瓮等，当属商代中晚期之物。（严文明）

昌乐县邹家庄大汶口文化至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20日至11月23日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遗址在昌乐北岩乡，1983年秋曾进行第一次发掘。1985年秋第二次发掘，共开探方四十三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别发现有大汶口、龙山、岳石和商周四个时期的遗存。大汶口文化遗存是这次发掘的新发现，仅见个别灰坑，遗物数量亦不甚多。龙山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发现有许多灰坑和墓葬，墓中随葬有鼎、鬶、盆、杯、蛋壳高柄杯等陶器。岳石文化遗存亦甚少，仅见一座残房基及个别灰坑，所出陶器特征与益都郝家庄一致，应属郝家庄类型。商周时期的遗存有七座残房基，一座残窑、若干灰坑和墓葬，所出遗物中一部分属商周系统，多绳纹灰陶；另一部分则为素面红褐陶，其作风与首次发现于山东长岛的珍珠门文化相近，为探索商周与东夷文

化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严文明）

邹平县厂宫村大汶口文化至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8—12月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较厚。从时代上看，自大汶口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这次试掘，开了三个探方，目的是为今后全面发掘取得可靠的资料。经过发掘证明，这处遗址文化堆积厚达3.5米左右，其中龙山文化、商文化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刘凤君 于海广）

泗水县尹家城龙山文化至汉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8—12月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这次发掘开挖探方三十九个，面积近1000平方米。清理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以至汉代的房屋基址十六座，墓葬四十多座，水井一眼，灰坑近五百个。出土的石、骨、蚌、铜、铁、陶等各种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工艺品、货币等共两千多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全面认识尹家城遗址各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特点，补充了新的科学依据材料。（刘凤君 于海广）

滕县前掌大村商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1年10—12月、1985年3—5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前掌大村在滕县正南官桥车站东2.5公里处。1964年春我队调查时发现，当时定为龙山、商、周遗址。1981年在该村北大路两侧台地上选点进行发掘，同时对村南的“南岗子”进行了钻探。发掘面积为180平方米，其中Ⅰ区（大路东侧）出七座墓葬，Ⅱ区（西侧台地，俗称‘河崖头’）出二座墓葬。今年继续在第Ⅱ区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00余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为：第2层为东周文化层、第3层为商代晚期文化层、第4层为龙山文化层。在第3层中清理

墓葬九座。其中三座（M203、205、206）为较大的长方形土圹竖穴，都有南墓道，即所谓“甲”字形墓。

M205：墓口南北长约5、东西宽约3、口至底深约4米余。南壁有斜坡墓道，长约7、宽约2.3至2.6米。墓室底部有二层台、腰坑。该墓曾被盗。从底部残存情况看，椁与棺应有彩绘。出土有陶、铜、玉、骨、牙、蚌、松绿石、贝等百余件。

该墓构筑特点突出，墓室上口四角外围均筑有夯土（东南角夯土中垫有数块石头）。墓道东壁从上口至底全部加以夯筑成墙，夯层、夯窝极为明显。墓道南口东西两侧都残留有夯土与柱洞痕迹。在其它一些墓室上口外围也见到残留的夯土或柱洞痕迹，但都不及M205突出。

M203：为一座“甲”字形墓葬。二层台东侧竖有一块长约1.5米以上，高约60余厘米的嵌蚌饰漆牌。牌身红、黑漆鲜艳可见。蚌片抛磨平整，至今仍带光泽，刻成眉、眼、牙等各种形状，每片外围勾以红彩，以上述各种片块镶嵌成一兽面纹为中心，周围再配以其它的图案。漆牌的前后两面都镶着同样的图案。它的大小、色泽、图案都颇为壮观。在漆牌的下端还有装饰着云雷纹的红黑色漆杆子，应与漆牌子有关。

M210的东、西两壁各随葬一块漆牌，形制特点与M203所出者相近。

有些墓葬中随葬的釉陶，器形与色泽似与中原地区所见者不同，出土的印纹硬陶罐、铜牛头形“面罩”，是山东省境内所未见的。矛、带胡戈、陶器花纹、牛头饰以及玉器、骨雕，均可见于殷墟遗物中。这批墓葬的年代可定在商代晚期。

前掌大遗址并不是一孤立遗址，从地形上看，它与村北相邻的吕楼村是一处高大整体的台地，后人开凿了一条小苏河才把这块高地一分为二，吕楼村曾出土过平底铜斝、爵。村东约2.5公里的小康留、大康留也有商代遗存；村南约2.5公里处小黄庄也曾出土一批商代晚期铜器（觚、爵等）。吕楼、小康留、大康留等处经多次调查，都确有商代遗存。总之，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及其周围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商代遗址群。

前掌大遗址中还发现有岳石文化、龙山文化的遗物、遗迹。（胡秉华）

长岛县王沟东周墓地

工作时间：1985年春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烟台市长岛县王沟东周墓地，于1973、1975年为解决群众用土曾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今年配合王沟水库工程建设，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共清理东周时期古墓葬三十五座，均积鹅卵石。其中，春秋时期中型以上大墓两座（M7、M9），战国时期中型以上大墓一座（M8）。其余墓葬，多属战国时期的小型墓葬。

春秋时期最大的一座墓葬M9，方向270度，有墓道，残长5.2米，墓室5.6×4.4米，有石椁，石椁之内尚有木椁，殉人三具，放置于外木椁之内，内木椁之顶上。随葬遗物二百余件，其中青铜礼器有鼎、豆、壶、甑、簠、盘、匜，陶器有鼎、豆、罐、鬲，还出土有戈、剑一类铜兵器及玉石器一数小件装饰品。

战国时期较大的一座墓葬M8，方向西偏北9度，墓室7.1×7.8米，有二层台，台面宽2米，二层台上墓圹四壁交角处有壁龛，墓道残长3.2米。出土遗物中，铜器有盘、鉴各一，另有剑、戈、矛、镞等兵器，陶器组合为壶、豆、罐，在人架附近还发现一些玉石器小件。

小型墓葬多空无遗物，或仅随葬一豆盘。（王树明）

淄博市齐鲁石化乙烯厂东周墓

发掘时间：1984—1985年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齐鲁石化乙烯厂位于临淄齐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为配合乙烯建设工程，发掘清理了四座有封土的甲字型土坑竖穴石椁墓。其中M4、M5在同一封土下，两墓东西并列，相距7米。M4墓室长25.6、宽24.5、深7.5米，南墓道长49米。椁室在二层台中部，四周用自然巨石垒砌而成，并以卵石充填缝隙。椁室长6.9、宽5.25、高3.2米。椁室东、西、北三面的二层台上有十九个殉葬坑和一条兵器坑。每坑殉葬一人。有棺椁等葬具，殉人仰身直肢，头向椁室，随葬滑石、玉髓、水晶串饰。二层台上陈放鼎、方豆、莲花盘豆、

盖豆、莲花盖豆、壶、盘、匜、敦、舟、簠、方足簠、牺尊等仿铜陶礼器和陶制编钟、编镈一百余件。M5也有两个殉葬坑，每坑殉葬一人。M6墓室长29.5、宽28.25、深7.6米，南墓道残长12.5米。椁室四周的二层台上有殉葬坑二十二个，其中十七个殉葬坑各殉二人，总数达四十人之多。双人殉葬坑呈方形，人自一棺，共用一椁。殉人多有水晶、滑石串饰随葬。(郑同修　魏成敏)

临淄、益都县稷山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稷山位于临淄、益都两县交界处，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10公里。墓葬系开山凿石而成，由竖井式墓道和墓室构成。M 2 地处稷山之颠，墓道口长5.6、宽4.64、深23.3米。距墓道口7.86与14.96米深处各有一级收台，供铺设木板用。从发掘情况分析，二台以下至墓道底原无填土。墓室开凿在墓道北壁的东部，墓门高1.85、宽1.04、深0.7米。墓室长3.68、宽2.92米。六面磨光。该墓被盗，除一级台出土一批小型鎏金车马器物，墓室内随葬器物荡然无存。(罗勋章)

淄博市辛店两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地位于临淄齐鲁石化乙烯厂辛店生活区。在已勘探的70万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墓葬三千八百二十五座，在已发掘的一千三百二十九座墓中，大部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少量洞室墓、砖室墓和空心砖墓。出土陶器、彩绘陶器、铜镜、货币、印章近二千件。(张振国、朱玉清)

蓬莱县小迟家村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县文物管理所

墓葬位于崮寺店乡小迟家村，墓长4.35、宽2.75、深3.65米。

墓内安放四层棺椁，即两棺两椁，两棺的棺板内外全部涂有黑漆和红漆保护层。墓中出有铜镜、铜带钩、铜环、铁镢、铁钉、陶瓮、陶罐及质地细腻、编织精美的丝织品、草织品残片。（摘自《大众日报》1985年5月23日）

诸城县杨家庄子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诸城县博物馆

墓葬位于城关镇杨家庄子砖瓦厂附近，由砖瓦厂取土时在5米深处发现，为一座大型棺椁墓葬。墓南北长4、东西宽2.86米。墓中出土汉代玉器六件，铜器五件，漆器十四件，陶器二件，彩板画一件等，共四十二件。墓葬年代属西汉中期。（摘自《大众日报》1985年5月23日）

淄博市齐鲁石化乙烯厂东汉砖室墓

发掘时间：1984—1985年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葬位于临淄区齐鲁石化乙烯厂东部。墓口上部有10.75米高的封土。墓室用长方形和楔形砖构筑在长23.5、宽17.4米的土圹内，由墓道，东、西耳室，前、后室和回廊组成。墓道残长8.9米，墓道里口两侧有砖门垛，门垛间有两道封门墙。耳室长4.5、宽2.3、券高3米。前室长11.15、宽2.55米，券顶塌陷，高度不详。后室长6、宽3.5、券顶高6米。回廊在后室的东、西、北三面，全长31.5、宽1.5、券高3.5米。前、后室和回廊有低于墓室墙基的凹槽，深0.7米，槽底铺有木炭、细沙，然后用砖砌起与墙基平。凹槽上口砌有长条形石板，石板多镌刻吕、中等字，部分石板刻有画像。墓葬被盗。出土陶屋、陶器、瓷器、玉衣片、玉璧等一百余件。（郑同修）

枣庄市渴口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2—4月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博物馆

墓地位于枣庄市市中区渴口乡砖瓦厂。共清理汉墓六十三座。墓葬分布较为集中，有些墓葬有叠压、打破关系。

墓室的形制可分为单室石椁墓、并列多室石椁墓和石室墓三种。石室墓均由墓门、前室、后室组成，前室顶为叠涩式藻井，后室多为双室，室顶由长方形石板覆盖。石椁墓往往在椁外又砌一头厢或小边厢，以放置随葬器物。有些墓葬的墓壁刻有画像，为阴浅刻或浅浮雕，内容有车骑出行、人物、宴饮、楼阙、青龙、白虎、日轮、穿璧纹、双菱纹和连弧纹等。

墓葬有的被盗，十三座无随葬品。其余五十座共出土随葬器物六百二十三件，其中陶器四百五十四件，铜器九十八件，铁器四十八件，石、骨、玻璃装饰品等二十三件。陶器主要有鼎、壶、罐、豆、盆及楼房、仓、灶、磨、猪圈、井等，铜器主要有五铢钱、货泉钱、铜镜、带钩等，铁器有刀、削等。

从墓葬形制、画像石内容及雕刻技法和随葬器物分析，这批墓葬的时代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鲁南地区汉墓和画像石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吴文祺）

宁阳县西太平村唐宋瓷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8—12月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这次发掘共开5×5米的探方六个，清理窑炉三座、房基一座、墓葬两座。其中以三号窑炉保存较好。发现的窑具有支柱、三足支具、垫圈、锥形窑具、垫板和垫钉；出土的瓷器有碗、罐、盆、盘、钵、杯、瓮、执壶等，其中以碗的数量最多。这次发掘，为了解当时的陶瓷窑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刘凤君　于海广）

滕县薛国故城内发现一座小城

发现时间：1985年秋

工作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薛国故城位于滕县城东南约17.5公里，据文献记载：故城始建于周代，毁弃于魏晋之后，它作为侯王都邑和历史名城约历时1500

余年。1984年11月开始进行普探，于今年秋季在故城内的东南部发现了一座长期湮埋于地下的小城。

城墙：东、南两墙很直，钝角相交，约为95度。西、北两墙则向城外凸出，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约650、南北约600米。小城周长2750米，南墙长660、东墙长640、北墙长720、西墙长730米。墙宽10米左右，墙外有壕，壕宽15至20米。

小城的时代及大小城之间关系，有待今后发掘确定。(冀介仁)

河南省

临汝县槐树阴裴李岗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6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遗址位于临汝县城北约2公里，槐树阴村南，洗耳河东岸。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地势北高南低，临河的一边断崖暴露有灰层或灰坑。在靠近断崖处，开探沟两条。试掘结果表明，文化层很薄，厚约0.3—0.5米。出土遗物不多，仅见零星陶片。並对遗址又作了一些钻探，所见灰层也很少。估计这个遗址的主要堆积原来可能在临河一边，后来被河水冲刷或其它原因破坏掉了。此遗址1984年临汝县博物馆曾作过调查，见《中原文物》1985年4期。(郑乃武)

临汝县中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春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今年春季继续发掘，共开八个探方，揭露面积约200平方米。发现的地层情况与去年相同，即上部为仰韶文化，下部为裴李岗文化。遗迹有灰坑十一个，除少数属于裴李岗文化外，大部分都属仰韶文化。在村东发现仰韶文化陶窑一座，但保存不好，窑室部分多已破坏。

出土陶器仍以红陶为主，经复原的有裴李岗文化三足钵二件(其中一件腹部饰篦点纹)，仰韶文化碗、盆、罐和鼎等十一件。盆有素

面和彩绘两种，其中彩绘的一件，器形为大口折沿，直壁，平底，口沿和腹部都饰有错对三角纹。另外比较少见的还有一件敛口盆，在小平底的旁边附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足与底平，起稳定器身的作用。从形制上观察，仍与裴李岗文化的三足钵有一定的联系或受其影响。此外，还出有一些石、骨制的生产工具。(郑乃武)

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1985年秋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在1983年试掘的基础上，今年在遗址西部和西南部开5×5探方十五个，2×10探沟四条，揭露面积共485平方米（水位高的探方未挖到底)。

两次发掘的文化遗存分上下两层，均属裴李岗文化。共发现灰坑六十五个，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几种。墓葬三十八座，分布在墓葬中心区的西部边缘，均竖穴土坑墓，头向西或西南，个别向西北。合葬墓三座，为双人合葬，一人为仰身直肢一次葬，一人为二次迁葬；乱骨三堆，颅骨、上下颚骨和肢骨乱堆在一起；余皆为单人一次葬，多仰身直肢，其中有十八座墓主骨架部分零乱或残缺不全。随葬品有陶壶、罐、三足钵、骨针、镞、鱼镖、牙匕、石斧、铲、锛、砺石、磨棒、弹丸、绿松石饰及兽牙等。

地层和灰坑中有大量的鱼骨、兽骨、鳖、龟甲、骨器，及大量陶片。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红皮黑昭或灰昭的夹碳陶及少量的泥质黑陶、灰陶等。陶色多不纯正；泥质陶火候较高，多磨光，夹砂和夹碳陶火候较低，多素面。均手制。器形主要有壶、折肩壶、折肩三足壶、钵、三足钵、碗、勺、罐、鼎、缸、盆等。器表大多素面磨光，少量器物饰绳纹、线纹、划纹、附加堆纹，还发现个别的乳钉纹、之字形篦点纹、方格纹等。主要石器有斧、铲、锯齿镰、锛、凿、残磨盘、磨棒、砺石、刀、杵、矛、打制石器等。骨器有镞、针、锥、鱼镖、笄、牙器等，还有陶锉、网坠、陶塑品等。

从发掘的情况看，这里的文化内涵、埋葬习俗、经济手段等方面与长葛石固遗址比较接近，但也有不少差异，与已发现的裴李岗、莪沟等遗址差异较大。(张居中)

济源县苗店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至11月
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济源县文物保管所

苗店村在济源县城东7.5公里，遗址位于村西200余米处。北面1.5公里为猪龙河（古济水），再北5公里为太行山余脉孔山，南面2.5公里为溴河（漭河），西面15公里为王屋山。遗址现高出周围地面约1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

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南部，这次共开探方四个（5×5米），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2米，包括龙山文化中期及晚期的遗存，主要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共发现房基二座、灰坑二十二个，上部均已遭严重破坏，仅余坑底。房基及灰坑以圆形半地穴式为主。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锛、石刀、石镰、石镞、蚌镞及蚌镰等。生活用器主要是陶器，以泥质灰陶及夹砂灰陶为主，纹饰有篮纹、方格纹及绳纹等，种类有罐、甑、碗、杯、盆、瓮及澄滤器等，还有许多厚胎红陶缸。此外还出土了骨笄、陶环、陶纺轮、牛、羊卜骨以及大量的螺壳等。

《路史》后纪十三注引《纪年》："帝宁（或作杼、予，少康之子，夏代第七个王）居原。"《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原城在（济源）县西北十五里。"据此，济源地区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之一。苗店村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李先登)

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及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为了搞清城内的布局，找出该城址内的主要建筑基址，在城址内的中部和北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5至6米，共发掘各期墓葬二十二座，其中新莽墓一座，西汉墓十三座，战国墓二座、龙山文化的瓮罐葬三座。灰坑三十八个，其中战国至商代灰坑三十五个，龙山文化灰坑三个，龙山文化陶窑一个。出土各期文物总计五百四十四件。

主要收获：在一座西汉初年“甲”字形墓葬的墓道中，发现一尊泥塑镇墓兽，高1.2米，人首，人身，头上有角，兽耳，深目，高鼻，张口，纹面，赤袒上身，仅穿一件三角短裤，踞坐，双手向左右伸直，混身朱赤。这是继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之后发现的又一早期人形镇墓兽，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墓内出土鼎、壶、瓮、铜镜、玉璧、玉璜、半两钱等文物；在与其相邻的另一座“甲”字形西汉初年墓葬中，发现随葬青釉、酱胎的鼎、盒、壶、瓮，系早期瓷器；在一座“甲”字形战国墓中，出土陶鼎四、敦四、壶六、匜二、盆二和青铜剑、弩机、带钩、箭头等，从出土陶礼器的形制看，是战国晚期的楚墓。另外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的陶窑和三座瓮罐葬。(曹桂岑)

偃师县二里头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今年的发掘工作在Ⅴ、Ⅵ两区进行。

Ⅴ区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通过发掘，对于第1、2号宫殿遗址间的地层情况有了新的了解。这里既有二期、四期的遗存，也有五期的地层。五期地层较厚，又有上、下层之分。上层为质地较硬的浅褐色土，有数量不多的灰坑和墓葬，地层包含物较少，其年代相当于2号宫殿遗址的第3层，属二里头五期（二里岗期上层）偏晚阶段；下层，一般为灰褐色土，属五期偏早阶段。四期地层一般较薄，遗迹有灰坑和小房基等。二期地层为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片，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范围尚未完全弄清。其北面的一片，东西长在45米以上，南北宽在19米以上，上面普遍有一层黄路土，但未见墙及柱洞痕迹。

Ⅵ区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清理出两座三期的面积为80—90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基，均已残毁；另外还有小型半地穴房基。与建筑有关的遗迹现象还有：由九个直径约70—80厘米的红粘土圆墩或九个直径约30—40厘米的圆坑围绕成一个圆圈，这种现象比较奇特，意义不详。在此区发掘出的二十余座墓葬，皆为小型墓，时间为二至四期。其中有两座随葬品丰富的朱砂墓，一墓随葬有铜爵一件，制作精致的陶器一组以及币贝、绿松石饰等二十余件，属三期；另

一墓有朱漆棺，随葬有陶器一组，绿松石饰和若干件漆器，漆器中能看出器形者有觚、盒等，属二期。

Ⅵ区继1983年之后又有骨料坑和半成品骨器的发现，再一次证明附近有制骨作坊遗址。

此外，还在Ⅲ区采集到铜盉、铜爵（有花纹）各一件，属四期，是二里头遗址比较罕见之物。(郑光　杨国忠　张国柱　杜金鹏)

渑池县郑窑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春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

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城西1公里处，面积约13.5万平方米。为配合郑潼公路扩宽工程，在遗址北部开2×10探沟十条，5×5探方二个，加扩方共计发掘面积为290平方米，共发现二里头文化灰坑五十七个，灰沟三条，水井五眼，墓葬四座，陶、石、骨、蚌质遗物二百多件。

文化层堆积厚1—2米，可分为三期，与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大致相当，一、二期之间似稍有缺环，二、三期联系较紧密。一期仅见灰坑和水井，三期文化层破坏严重，有的地方已不存，唯二期保存较好。这里的灰坑有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几种；灰沟均呈不规则形；水井上口多圆角方形，下部为圆筒形；墓葬均属二期，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头向南或西南，多无随葬品，墓圹不明显。

陶器有泥质和夹砂的灰陶、褐陶、黑陶和少量红陶、棕陶、黄陶及个别夹细砂的灰白陶。器物以轮制为主，个别小型器用手制。器物造型有平底、圜底、三足、圈足几类。炊器有鼎、深腹罐、圆腹罐、甗、甑、釜灶、鬲等；食器和盛、储器有三足盘、圈足盘、豆、深腹盆、圜底盆、平底盆、小盆、瓮、侈口尊、大口尊、小口尊、附加堆纹缸、蛋形三足瓮等；水器有捏口罐、刻槽盆、圈足壶等；酒器及其它器物有爵、角、盉、器盖、小杯、小钵等。纹饰有绳纹、篮纹、素面磨光、附加堆纹、弦纹和少量方格纹、镂孔、刻划纹、云雷纹等；花边和鸡冠鋬作风盛行。

石、骨、蚌器和陶质工具主要有石斧、铲、刀、镰、砺石、凿、锛，骨针、镞、笄，蚌刀、镰、贝、陶纺轮、卜骨等。

上述特征表明这里与二里头遗址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特征，同时还受东下冯类型的某些影响。一期出现的个别釜灶表明，这个遗址可能存在接近陶寺类型的龙山遗存。(张居中)

偃师县尸乡沟商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

本年度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有三项：一、发掘宫城内第5号建筑基址（编号YSJID5)；二、在宫城西部清理了近百平方米的灰土遗址；三、在西城墙上开了一条探沟，再次对城墙进行了解剖。

第5号建筑位于宫城东南部，北邻第4号建筑。发掘出的平面现象表明，该基址仍是一处以正殿为主体、东有附殿（由于现代道路的障碍，正殿的西部尚未全部清出)、前有庭院、东、西、南三面有廊庑相围的封闭式建筑。正殿基址座北面南，东西长约51米，南北宽约14—15米，台基系夯土筑成，保存最高处尚高出庭院地面20—30厘米。台基的东、南、北三面近缘处，保存着排列规整的柱础石，有的尚存清晰的柱洞痕迹。柱坑有圆、长圆、长方、不规整等形状，直径一般在0.8—1米左右。础石多为青石，少数为红砂石。柱洞的直径一般35厘米，甚者达40厘米。以柱洞中心计，两柱间距一般为2.5米。台基东缘的柱础呈南北向排列，共五个，表明原台基应为进深四间建制。

台基前面发现七个小坑，每坑内均埋小狗一只。坑东西宽35—40厘米、南北长65—80厘米。头皆向南，有侧卧、俯卧、蹲屈多种姿式，坑距台基南缘1—1.2米，排列似有一定规律，应是当时礼俗的反映。

5号建筑的三面廊庑保存较差，上面的柱洞、础石等已基本无存。东、西庑台基较宽，约6—7米，南庑约4米。

发掘5号建筑的过程中，共清理了四个商代灰坑及较多的近代坑、井。商代灰坑时代均为二里岗上层。从近代坑井的壁面观察，在庭院路土下，还叠压有较之更早的建筑。5号基址本身也有早晚之别，这有可能具有分期的意义，也可能反映着建筑在使用中的不断修补、增建。

对西城墙的解剖，使我们对城墙的形制、筑法、年代等问题又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城墙夯土总深度2.1—2.3米，除去约1米深的基础槽，尚保存着1米左右的墙体。基础槽略大于墙体，厚分别为18.6米和17.4米。城墙解剖过程中，在城墙内外两侧共发现六座小型墓葬，墓葬均打破或叠压城墙两侧的路土或城墙基础槽。其中四座墓中有陶器随葬，时代为二里岗早、晚期。城墙系红褐色生土筑成，质地坚硬且纯净，发现数十块碎小陶片，多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城墙建筑的上限时代仍难准确确定，但墓葬情况表明城墙修筑的下限时代不会晚于二里岗下层时期。(刘忠伏)

安阳大司空村、花园村、刘家庄等地殷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今年在殷墟一般保护区基建控制线内外多处地点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二百多座殷代墓葬，其中以大司空村南地、花园庄南地、高楼庄南地及刘家庄北地发掘的殷代墓葬较多。

大司空村南地发掘地点在豫北棉纺厂附近。1953年以来已在此处进行了多次发掘。1985年的发掘地点在该厂西南角附近，共清理殷代小墓近四十座，其中有两座是东马坑。东坑打破了西坑，两坑又都被盗坑破坏，但西坑尚可据其残留部分了解其结构（两坑两匹马的躯干部、车箱东半部、东车轮及辕的中段已破坏）。此坑长4.27、北宽3.3、南宽3.29米，坑底在放车轮及两马处挖槽。车箱在北半部，两马相背而卧。车箱四边有立柱及横栏，门在后方。车箱残高0.44、进深约1米，宽度不明。两轮间距约为2.45、车轴长2.74、轴径约0.12米。轮径1.4米，有二十根辐条。辕长2.92米，衡在辕上约0.1—0.15米处，衡长约1.2米。自1953年以来，在此处已发现四座车马坑，1966年的一辆和这次的两辆已遭破坏，只有1953年的一辆保存较好。

在花园庄南地，发掘了四十多座长方竖穴墓，大多已遭盗掘。在一座墓的填土中，发现一块占卜用的牛肩胛骨，此骨经过整治，背面有钻凿痕及灼痕，正面有四个字。

刘家庄在小屯村南约2公里，我队在村北清理了一百余座殷代长方竖穴墓，大多数是殷墟文化二、三期的。同时，安阳市博物馆在刘家庄村南也清理了近六十座殷代长方竖穴墓。

现在的殷墟一般保护区基建控制线的范围是1960年时基于当时

对殷墟地下遗迹分布范围的认识而划定的。二十多年来，我队除在保护线内发现了许多殷代的遗址及墓葬外，在线外也做了许多工作。例如，1958年来，在安阳钢铁厂西区的北辛庄及范家庄南地发现的遗址和墓葬，1980年在三家庄东地发掘的殷墟早期阶段的遗址及墓葬，1982—1984年安阳市博物馆在戚家庄（梅园庄南）东南发掘的一百五十余座殷代墓葬及今年我队和安阳市博物馆在刘家庄南北清理的近二百座殷代墓葬等。这说明，殷墟地下分布的范围比我们原先了解的要大得多。(杨锡璋)

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本年度主要是配合新郑县直机关、厂矿、城关乡、镇的建设工程，钻探255,374平方米，发现东周夯土基址七处，面积17,400平方米；古墓葬三十四座，陶窑三座。发掘九处，面积1150平方米，墓葬十六座，其中春秋墓四座，战国墓四座，西汉墓三座，东汉墓五座。战国夯土基址640平方米，西周灰坑二个，东周灰坑八十一个，水井十九眼，战国陶窑二座，宋代陶窑一座，出土陶、骨、铜、铁、玉、石器五百一十五件，陶文字及符号六十四个。

在东城南部的五宅庄村西北角，初次发现一口西周晚期水井，为长方形，南北长2.14、东西宽1.33、深9.97米，出土一组较完整的鬲、豆、盆、罐、盘等陶器。在五宅庄村北发现的西周灰坑亦为长方形，出土有鬲、盆、罐等陶片。这些遗物的发现，为郑韩陶器分期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东城铸铜遗址南侧清理的二座战国窑，其中一座保存较好，平面呈椭圆形，窑室长1.96、宽1.58、残高1.2米，窑壁及底部有一层蓝色烧结面。烟囱位于窑室后部，火膛为椭圆形，在窑室前部火膛内还残存有黑色或灰白色的草木灰，火门残高1.82米，宽0.4米，下半部仍有土块塞封，火门外的窑道拐向窑的南侧。

在东城中部钻探中发现的大型夯土遗址，分布范围约20余亩。以其为中心，可将周围发现的一些夯土建筑基址联系起来，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对于“郑韩故城”的城市布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去年11月开始发掘、至今年春季结束的西城偏东侧的夯土建

筑基址，揭露面积近400平方米，从清理结果看，该夯基继续向北延伸。在夯基的西部发现六个圆形柱础，分两排，每排三个，为南北向排列。这些柱础是先在夯土上挖出圆形基础坑，然后一层陶片，一层花土夯打而成。根据地层和各种遗迹的打破关系判断，该房基为战国晚期韩国的一座大型建筑，位于1983年发现的大型夯筑基址的东北部，与其同属一个建筑群。

在城东马家墓地和双洎河南岸河梨村各清理两座春秋墓，其中有三座被盗一空，仅M7保存较好。为土坑竖穴墓，东西长2.7、南北宽1.2、深4.15米，一棺一椁，骨架细小部分已朽，头向西，仰身直肢，椁内随葬陶器七件：二鬲、一豆、二盂、二罐，另外还有泥塑狗头等，这是“郑韩故城”东周墓葬中较完整的器物组合形式之一。依据器形特征，时代可定为春秋中期。

在西城（今新郑二中操场南侧）南部，清理汉墓八座，战国墓一座。战国墓亦为土坑竖穴，单棺，器物组合是二壶、一盂、一盒。在东城中部（新郑县体委）T26内也清理出一座战国墓，仅随葬一陶鬲。在五宅庄村北T34内清出二座小孩墓，一座为四个板瓦合扣的瓦棺葬，另一座为瓮片覆盖的瓮葬。

新发现的陶文，除“南羊”、“肙瘍”、“骺祥”、“骺佳”等众多的陶工姓名外，还出有“韩”、“公”等地名和官署印记，另一些则是陶工的简写或数量文字和符号。这是继去年出土的大批陶文字以后的又一收获。

为了寻找郑韩两国国君墓葬，对“郑韩故城”内外的无名塚作了全面的调查，目前许岗四座大墓的调查已结束。许岗村位于“郑韩故城”西南10公里的丘岭岗地上，四座墓均为南北向，东西排列于村庄东侧，最大的墓南北长168、东西宽19米；最小的南北长117、东西宽14米，在这些墓的北侧，还探出四个长方形的陪葬坑。如此规模的墓葬在“郑韩故城”还是首次发现。根据墓葬形制、夯筑方法以及墓上所采集的陶片判断，应为韩国高级贵族的墓葬。（蔡全法）

上蔡县砖瓦厂战国墓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25日—12月17日

工作单位：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上蔡县文化馆

墓葬位于县城西北部4公里处的砖瓦厂东南角。是一座南北方

向的长方形土坑墓，口宽底窄，呈斗状。墓口南北10.3米，东西9.7米。墓底南北3.2米，东西2.4米，墓口至墓底有五层台阶，总深度8.6米，墓道仅存1.2米，坡度25度。墓内置一椁一棺。随葬器物大部分置于椁内，少部分在棺内，共三十三件，其中有铜戈、矛、剑、铜车器，玉、环、珠，骨贝，陶鼎等。(王胜利)

宜阳县牌窑村西汉彩绘空心砖墓

发现时间：1985年4月

墓葬位于寻村乡牌窑村，为大型空心砖墓。每块砖的正面都有阴刻彩绘的花案图样，赤色的斑豹、白色的奔马、操剑的武士、腾飞的赤龙以及赤山朱地、日月星辰、树木花果等等。(摘自《河南日报》1985年4月20日)

洛阳汉魏故城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

今年主要做了六项工作：

一、继去年钻探发现北魏外郭城西垣后，今年又探查到郭城东垣。其位置在今偃师县南蔡庄乡后张村至和村的南北一线上，断续长度已达1000余米。城垣系夯土筑成，宽度一般为4米左右，残存高度（厚）约0.5米左右。此工作尚须继续进行，沿城垣北探寻郭城东北角。城垣南段已被洛水冲毁，遗迹全无。

二、沿城西长分沟上源谷水探查河道流向，已发现谷水旧道遗迹数千米，这对于探明金谷园遗址提供了线索。

三、沿城北大夏门和广莫门向城外探查登邙山渡黄河的大路，发现了路土遗迹。这对于确定河阴古城及黄河渡桥的位置，提供了线索。

四、在城北约2公里处，邙山南坡上发现一处大面积建筑遗址，布局规正，四面垣墙及墙内建筑基址皆为夯筑，保存较好。这处遗址是否与汉魏时期的“北郊”兆域有关，有待进一步考察。

五、在城西部外郭城内1000余米处，发现里坊道路、房屋、水井、窖穴、脏土坑等现象，并发现一处布局整齐、保存较好的建筑基址。

根据已知资料推测这处遗址应与“洛阳大市”附近里坊有关。

六、发掘北魏建春门遗址，获得了汉魏时期京都城门基本形制、结构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记载的“一门三道”有了具体认识。(杜玉生)

偃师县杏园村汉唐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今年继续在偃师杏园村南清理、发掘古墓。截止年底共清理古墓一百九十五座。

东周墓　清理三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墓，长宽在2—3米以内，深10米计，葬具或为单棺，或上下加椁板，均为屈肢葬，随葬器物分别为鬲、盂、豆、鼎、壶等，一般存放在头前的壁龛中。

东汉墓　清理四十五座。几乎全是中型以上的砖室墓，盗掘十分严重。墓葬形制与洛阳烧沟五型墓十分接近，另外还补充了一种干字形墓（即横前堂、横后室墓型）和一种左右长耳室、宽大横前堂、双后室的大型砖室墓。其余墓型，烧沟均有发现。出土器物绝大部分与烧沟五型墓中出土物一致，有大小陶瓮和长方食盒、壶、案、仓、奁、樽、异形鼎、猪圈、镇墓罐等陶器。比较重要的墓葬有两座，一座为东汉壁画墓，壁画保存在夹壁墙内，是相互可以连接的长幅墓主车马出行图。详细情况可见《考古》1985年1期《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另一座汉墓，出土陶器一百六十九件，有瓮、罐、杯、盘、案、盒、奁、樽、钵等成套陶器，包括一块买地券砖，券砖上首墨写棣书“建宁元年……”，可知此墓下葬年代为东汉灵帝首年，即公元168年。此墓从墓葬形制到器物类型均为杏园村这批东汉墓葬断代分期提供了一幅对照的标尺。

魏晋北朝墓　清理四十座。包括曹魏、西晋、北魏几个时期。曹魏墓已发现数座，目前还仅能从墓葬形制及结构上与洛阳十六工区曹魏墓相近来判定，墓内至今尚未发现有纪年的遗物出土。西晋墓已清理二十余座，虽有一块残碑发现，但也没有带纪年的遗物出土，我们仅能借鉴洛阳西郊的元康九年徐美人墓和太康八年的方室土洞墓来判定这批西晋墓的年代。有关杏园魏晋墓的材料已在《考古》1985年8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一文中发表。

北魏墓　仅发现几座小型墓。出土盘口瓶、小陶壶等陶器，其中一件陶壶上有朱书镇墓题记“正始五年……”，查史籍可知，历史上“正始”年号被使用三次，一为曹魏邵陵历公曹芳（公元240—249年），一为后燕高云（公元407年），一为北魏宣武帝（公元504—508年），从出土器物和墓型上观察，此墓显系北魏墓。

唐墓　清理六十座，包括纪年墓三十三座，出土墓志四十合。从墓志纪载中可知，下葬最早的是唐武则天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最晚的是唐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其间180余年，除个别墓被打井破坏外，余均完整。墓主生前官品最高的为延州刺使和贺州刺使，官至四品，以下有左右千牛卫车骑将军、宁州录事参军、右台监察御使、猗氏县令、汜水县令等等下级官吏，可见这是一处中、小官吏及其族属的墓地。出土随葬品尚属丰富，有成组的贴金粉彩陶俑。有十数件三彩俑和三彩器皿，有几十面唐代铜镜，有十数件银勺、银盒、银筷，有錾花鎏金的小型金银器，雕刻精巧的滑石器，金银平脱漆器，制作颇工整的青铜器，工艺精良的白瓷罐、碗、盘、碟。这些出土器物，不论手工艺水准还是造型艺术，均堪称上乘之作，是唐东都物质文化史研究上的一次重要收获。

宋明墓　清理四十七座。均为小型墓，形制极不规整，随葬器物极少。宋墓发现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的完整石经幢一副。明墓发现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5年）张云霄墓志，官至文林郎。其余从略。（徐殿魁）

江西省

九江县神墩新石器时代与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秋冬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神墩遗址位于新合乡，1984年秋冬，进行过试掘，配合大冶沙河街铁路线的修建，今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两次发掘计开5×10米探沟十八条，合计面积90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和商代、西周水井等遗迹，以及出土了各种小件和可复原器物四百余件。（1984年试掘情况，在《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1期上

作过简单报道。)

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上、下两大层。在②B层之下，新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其棺或椁灰痕迹和骨殖尚存，随葬陶器有壶、罐、鼎，墓室结构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宽近1米，南北方向，头朝北，侧向东，仰身直肢。另在③A层之下，新出现③B层，1984年③层的出土遗物与③A层和墓葬的一致。因此，现将③A层和墓葬、③B层，划为下层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上层文化，包括②A、②B、②C各层，属商代和西周时期堆积。目前虽未正式发现商代层堆积，但在路基北侧属②B层的灰坑之下，叠压有小水井一口，直筒形，口径近1、深达8米，出土殷式鬲和万年类型直腹圜底罐等，年代与吴城二期相当或稍早。而西周时期堆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之不同，可划为早、中、晚三期，②A层属西周晚、②B层为西周中、②C层属商末西周早期；85T1②B层下之大井，从出土遗物看，开始于商末，主要使用年代是西周早期，中期废弃。

在上层文化堆积中，出现商代小井一口，主要出土有分裆、袋足、绳纹、高大于宽的殷式鬲七件，陶罍一件，与万年类型直腹圜底罐等共出，特别是木耜（?）的出土，尚属首次；西周大井出土殷式鬲、高颈撇足鬲和甗形器、木质水桶等。在下层文化堆积和墓葬之中，出土及采集有：有肩石钺、有棱座豆、折腹豆、高喇叭形镂孔豆、浅盘鼎、小壶及扁凿形足罐鼎等，其主要文化内涵，与樊城堆、筑卫城、永丰尹家坪等遗址和靖安墓地一致。(李家和)

宜丰县牛形山商代铜铙

发现时间：1985年3月12日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天宝乡辛会村农民在距乡集镇1.5公里的牛形山上植树时，挖掘出商代晚期青铜铙一件。

此大型乐器重达40公斤，通高56、柄长17、铣间相距41.5厘米，通体饰变体雷纹组成之兽面纹样；柄作圆筒状，与器体内腔相通，柄上有凸出的干带。商代大型铜铙在江西尚属首次发现，形制与湖南所出土颇为相似，时代亦应相近。(李家和)

遂川县洪门村商代青铜卣

发现时间：1985年夏

遂川县泉江镇知识青年王斌，在改建南昌—赣州公路过程中，于枚江乡洪门村地段江面河岸之上，偶然发现完整的青铜卣一件。

商代晚期青铜卣在江西出土，尚属首次。此卣保存完好，重达10公斤，通高39厘米，铸造精工，墨绿发亮，其整体造型，与湖南省宁乡县1970年出土的一件相似。该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与蝉纹、夔龙纹、兽面纹、重环纹及扉棱等相配组合，略呈浮雕状，高低层次分明，繁而不缛。尤为重要的是，在盖内和腹内器底之上，铸刻有铭文。从铜卣造型和铭体来看，似不是江西本地铸造的，或系中原流传来省，而后入藏的。(李家和改写)

高安县郭家山战国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高安县博物馆

墓葬一座位于筠阳镇北郭家山，保存完好，为一椁二棺的木椁墓。棺、椁均为大型优质柏木、梓木材制成。内棺外壁饰黑色油漆，内壁生漆鲜艳如新。棺内出土头发、金属丝带、雕花垫板等遗物，其中垫板表面刻有精美菱穿形插的几何纹图案。外棺盖板头部中央平置一把剑，剑柄露出棺头，长72厘米，棺边有长把戈、铜带钩等物。边箱出有连弧纹镜、漆盒、陶鼎、敦、盘、杯等器物，在陶鼎腹部有青铜片镶嵌的曲折纹。根据墓中出土二戈一剑等兵器推测，墓主系武将。(摘自《江西日报》1985年2月22日)

南昌市进贤仓唐代城墙基

发现时间：1985年

唐代城墙基位于南昌市城西南隅进贤仓，基建中发现。城墙基距现今地表4米，墙基厚0.63、残高2米，横竖交错平砌二十层砖、向东西两侧延伸。砖呈青灰色，质地坚硬，大部分长42.5、宽21、厚8厘米，每块砖重约15公斤。砖上铭“大唐庚子岁”，为凸印阳文，

字体有两种，一种较工整清晰，另一种则显得草率模糊。出土的还有唐代蟹壳青釉瓷碗。

唐代共有五个“庚子”纪年，这次发现的“大唐庚子岁”砖铭，很可能指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据《文物报》1985年12月10日)

赣州市七里镇古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1986年1月

工作单位：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赣州地区博物馆、赣州市博物馆

七里镇位于赣州市东南隅，濒临赣江，是唐、宋、元时期的产瓮地。为配合万安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对七里镇窑砂子岭堆积进行了首次发掘，开探沟一条，揭露面积206平方米。

在砂子岭的顶端和底部揭示出“龙窑”两座，底部4.2米深处所揭“龙窑”，残长5.7、宽1.5、残高0.63米。用红砖砌叠，顶呈券拱式。造型庄重，砌叠精细。伴出有衫块支烧的乳白釉瓷。

出土乳白釉、酱釉等各类瓷器和窑工具一千余件。其中包括有匣钵、瓷轮轴、火照、擂钵和乳白釉唇口碗、折唇碗、高圈足碗、高足杯、斗笠碗、盏；酱釉碗、盏和高足杯等。乳白釉瓷色质如玉。黑釉瓷清新绚丽。特别是瓜棱形器腹，细长弯曲的流嘴，栩栩如生的狮钮盖，扁平的曲柄把手壶，釉汁明净，胎质细腻，规整精巧，婀娜窈窕，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余家栋　程应林)

湖 北 省

宜昌县白庙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1—12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白庙子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宜昌县三斗坪镇境内的黄牛山脚下的坡地上，西距三斗坪镇旧址约4公里许。文化堆积的分布，从一座山梁的半山腰开始，向北延伸到长江的一级台地上，宽约80米。从河漫滩和一级台地的断面上调查，文化堆积断续分布于长约1000米的范围内。整个遗址的实际面积约2万平方米。过去，四川

大学考古专业、宜昌地区博物馆曾先后两次在此发掘。

这次在全面调查钻探的基础上，选择四个地点进行发掘，共布探方或探沟十六个(条)，发掘总面积为445平方米。四个不同的发掘点都属遗址受洪水破坏严重或边缘的部位，因此没有发现遗迹，而一部分探方的文化层还有“倒转”的现象。靠近江边，一般晚期淤土层都在2米以上，从江边到坡地的文化层一般逐渐减薄。据发掘，江边的文化层一般厚1—2.5米，坡地上的文化层厚0.2—1米。

东区发现了大溪文化层，但遗物极少。在河漫滩上采集到一些比较原始的遗物，其中有打制石器和粗陶片。可辨认的陶器器形有支座、釜、罐、钵、盆等，作风与城背溪类型的陶器相似。这些打制石器和粗陶片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但文化层已基本被水冲毁。

中区的文化层可分四层(除晚期层外)，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还有许多兽骨、鱼骨和蚌壳、螺丝壳等。石器中，有一部分形体细小的磨制钵形器，还有一种大型的坠形器(直径10—20厘米)。陶器中可复原的器物约三十件左右，器形主要有罐、圈足盘、豆、碗、杯、器盖和少量的鼎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以侈口罐为主要炊器，鼎仅见一件和少量的足尖。根据石器和陶器的基本特征，它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与湖北境内同期的其它遗存相比，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个发现对于长江中游地区新时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探讨，以及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都有着重要意义。(陈振裕　杨权喜)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区

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底—12月上旬

工作单位：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博物馆、南京大学

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大坝施工区内的十余处长江沿岸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长江三峡地区是连接四川东郊山地与湖北江汉平原的通道，历年工作表明，这里有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仅西陵峡一带就已

发现六十三处之多。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自成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

这一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代文化遗存距今约七千年以前。这次在朝天嘴遗址下层发现的大批遗物表明，三峡地区的早期文化十分发达，在制陶、渔猎技术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方式。这次发掘的大溪文化遗址较多，有朝天嘴、中堡岛、杨家湾等。这一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存与三峡地区以外的有所不同，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在中堡岛、下岸、朝天嘴、银街、白庙等地发现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前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过去发现的不多，具有较为浓厚的地方风格。陶器主要为圜底釜、灯座形器、羊角杯、鬶及压印有S纹、云雷纹、贝纹、方格纹的罐、瓮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鱼钩、靴形小铜刀等，表明这些遗存属于青铜时代。(王军)

宜昌乔麦岭新石器时代及商时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乔麦岭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南岸的一级台地上，地属宜昌县三斗坪区高家乡高家冲二队。遗址是一个伸向长江的山嘴，其南面为东西向的一条简易公路，北面是长江，面积约500平方米。但是，遗址的东、西部由于江水冲刷，仅在河漫滩上发现陶片、石器等遗物，河岸断面上已难找到文化层。经钻探，文化堆积所剩下的分布范围约100平方米，发掘时开5×5米的探方四个。

地层堆积可分四层：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间歇层(红褐色细沙层，无文化遗物)；第3、4层为龙山——商文化层。其中第3层可细分为四小层(包括有二小层间歇层)。地层自南向北作坡状堆积(南高北低)，坡度15—25度。地层中仅T2发现有冲沟，此外无其他遗迹。出土遗物中除龙山——商时期的外，还夹有晚期的东西。因此，地层属再生堆积。又因地层中存在着几层间歇层，表明这种“再生堆积”是经过几次反复的。

出土遗物不多，陶片也很残碎，能复原的器物极少。陶片中可辨器形的有罐、豆、盉等，初步判断其时代约当龙山晚期——商时期。(梁柱)

秭归县中堡岛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12日—12月14日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中堡岛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内。这次在遗址的西区发掘5×5米探方十八个，总面积450平方米。清理灰坑五十三个，灰沟二个，出土石器一千六百余件，骨器十八件，陶器五百四十六件。

遗址西区的文化堆积层一般厚达3至4米，主要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商代等四个时代的文化遗存。大溪文化遗存是中堡岛遗址西区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种文化遗存。该遗址的大溪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炭褐陶。器形有夹砂陶釜和支座，泥质陶的圈足盘、圈足碗、罐等。中期的陶系除早期已有的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外，开始出现泥质黑陶、黑皮红胎陶和彩陶。器形除早期已出现的陶釜、支座和圈足盘外，新出现的器形有圈足簋形器、曲腹杯、彩陶筒形瓶等。圈足盘、圈足簋形器、碗的特征是外壁为红色，内壁和外壁的口沿部分为黑色。晚期的陶系和中期的主要区别是，泥质黑陶的数量增多，器壁变薄，并出现一定数量的蛋壳黑陶。彩陶的数量比中期减少。器形，晚期和中期区别不大。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有泥质黑陶的三足盘、圈足碗、曲腹杯、蛋壳黑陶杯、双腹豆、泥质红陶高柄杯等。中堡岛遗址龙山时代的陶器具有特征性的器形有泥质灰陶圈足盘、夹砂灰陶缸和鬶、鬲等袋足炊器。陶器的典型纹饰是粗篮纹和绳纹。石器的典型器形是双孔石刀。商代陶器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主要有夹砂陶鬶、甗、鬲；泥质灰陶豆、黑皮红胎陶的灯形器、陶壶等。典型纹饰有云雷纹、双圈纹、方格纹、绳纹等。

中堡岛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很多，每个探方出土的石器都达一百件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石器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石器的特征是以河滩中的砾石作原料，用间接打击法将砾石劈裂成两半，选择较适用的一半进行简单的加工；用砾石制作的石器一般都比较粗糙，一面为砾石面，另一面为劈裂面。(张之恒)

宜昌县三斗坪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6月、11—12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三斗坪遗址位于长江南岸，三斗坪镇旧址东侧的一级台地上，原是三峡地区一处较大的重要遗址，面积约有5000平方米以上。后因修建码头，大部分被推入江中，现存遗址面积有1000平方米左右。为配合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今年进行两次发掘。第一次发掘仅开探沟二条，面积共40平方米，文化层比较厚，最厚处达3米左右，距地面最深处近5米，不但有商周文化层，而且有大溪文化层，特别是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第二次发掘，先后开5×5米的探方八个，总面积为200平方米。发现大溪文化的墓葬两座，葬式分别为卷曲肢葬和蹲式葬，还发现了大溪时期的灰沟一条，商周时期的灰坑一个。出土遗物主要有大溪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少量石器。

根据地层和遗物的初步观察，三斗坪遗址的大溪文化遗存，可以分两期，第一期的陶器以绳纹为特点，显然与近年来新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城背溪类型的文化关系密切。第二期的陶器以彩陶为特色，与附近的中堡岛、杨家湾、伍相庙和秭归龚家大沟的大溪文化陶器接近。所发掘的两座大溪文化的墓葬，也应分属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一期为卷曲肢葬，第二期为蹲式葬。三斗坪大溪文化遗存为丰富大溪文化的内容及追溯其渊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三斗坪商周文化遗存中，有一批重要的陶器群，具有同一特点的陶器，在三峡地区还有多处发现。三斗坪商周遗存，根据器物的初步排比和^{14}C测试，年代约为商末周初，它晚于这个地区的同类的秭归朝天嘴、宜昌中宝岛东区的遗存，而大约与杨家嘴遗存相当。因此三斗坪商周文化遗存，在三峡地区的商周文化分期中，具有重要作用。(陈振裕　杨权喜)

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及东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6、11—12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杨家湾遗址是长江西陵峡南岸二、三级台地上的一处古文化遗址，东距宜昌市约40公里，西距三斗坪镇旧址4公里，隶属宜昌县三斗坪镇高家乡杨家湾村二组。遗址北临长江，南倚黄牛岩，东、西分别以软沟和大沟为界，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便于大规模考古发掘布方，我们以今小路为界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又称雷劈石遗址)。

为配合三峡大坝施工工程,，第一次发掘，在西区布方十二个(探方编号85YLT1—T12)在已崩塌的一级台地(已成河漫滩)开探沟一条(85YLT13)，揭露面积320平方米。第二次发掘，在西区布方六个(85YLT14—T19)，又在东区开探沟二条(85Y．杨T1．T2)，揭露面积250平方米，今年发掘总面积570平方米。

遗址的地层堆积，北部已随原一级台地一起被江水冲刷贻尽，今河漫滩上文化遗物俯拾皆是，并有一些崩塌、倒装的次生文化堆积。遗址东区仅剩大溪文化堆积，厚0.6—1米不等，大体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与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一、二期的年代相当，晚期发现较多大溪文化彩陶和一些带刻划符号的磨光黑陶，年代可能稍晚，在东区大溪文化堆积之上，耕土和扰乱淤积层厚0.4—2.5米不等。遗址西区则仅剩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其上局部叠压有东周遗存，两个时代的文化堆积最厚处2.3米，一般厚1.2米，其上的扰乱淤积和耕土厚0.2—1.6米不等。

遗迹在西区发现不少，主要是灰坑和房址。东周的灰坑多呈方形，壁近垂直，个别方坑底部还有椭圆形或方形小坑。大溪文化的灰坑，早期前段多呈长方形圆角，早期后段多近圆形，皆口大于平底。其中早期前段的一个大灰坑，边上发现几个柱洞，坑底有砺石、石斧坯和不少石片，似为当时的石器加工场所。房址多残破，东周柱洞下常有础石，洞外有础穴；大溪文化的柱洞一般无础石，但个别柱洞内有完整石斧或可修复的陶碗。

出土的大溪文化生产工具，最常见的有：大中型打制石斧，有的刃部或侧边磨光；小型石锛选材讲究，制作精巧；圭形凿通体磨光，除角刃外，顶部常磨成锛形刃。斧、锛、凿等石器都未发现有钻孔的。另有少量陶纺轮。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碗、釜为多，此外有罐、盘、瓮、鼎、器盖、器座、支座、杯、碟、锛等，偶见豆而未

见筒形瓶和曲腹杯，其制作方法、陶质陶色、纹饰都与鄂西地区同时期的大溪文化陶器相似。东周时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器类有鬲、罐、豆等，还发现一件铁器。(林邦存)

宜昌县杨家嘴早商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12日—7月10日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杨家嘴遗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县莲沱区乐天溪旧镇，为一伸向长江的一处山嘴上，由于江水的冲刷，至少有150米已坍入江中。为配合峡区大坝施工，今年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40平方米。

第一层：耕土及表土，一般厚20—40厘米，最厚者可达1米以上。

第二层：扰乱层，多为近代房基，或近代扰乱坑。出有晚清的花瓶一对。

第三层：黑灰土层，大量的木炭屑、鱼骨堆满鸡窝状的凹坑后毗连成层，遗物丰富墓葬密集。

第四层：黑灰色土，质较纯，色较浅，遗物较少，有一个灰坑。

出土遗物有石器、骨角器、陶器和铜器等，石器主要有石斧，个体较小，或以扁平砾石磨制刃部，或先打制然后磨制，器身上仍有打制疤痕。石凿和石镞数量较少，制做较精。骨角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多，有骨镞和角锥等小件器物。陶器多圜底，尤以小圜底罐最为常见；纺轮多为灰色圆台状、器身较厚，一件为饼状、红衣黑彩，类似屈家岭文化的彩陶纺轮。小平底器及圈足器较少。在第二层扰乱坑中发现三件鬲足。多为灰陶，色不匀，均为手制，或慢轮修整口沿。纹饰以绳纹为主，有中粗和细之分，此外还有方格纹、戳印纹、S纹及颇类于铜器的雷纹及涡漩纹等。有些罐的肩部常见贝状的附加堆纹。青铜器仅有凿和鱼钩等三件。

发现土坑墓十座，仅一座开口于第四层底部，其余均开口在第三层底部。一座为侧身屈肢葬，其余均为仰身直肢葬。二墓有少量的随葬品：一为大中小三对石玦、分置于两耳下；另一墓随葬一件陶器。

从出土遗物看，遗址的时代约为早商，与鄂西川东的新石器文化有某些联系，陶器与巴文化的某些遗物也颇相类。(李天元)

盘龙城李家嘴商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今年发掘工作主要是配合当地修堤工程，在古城东部的李家嘴遗址清理灰坑十七个，出土一批陶器。

灰坑位于李家嘴遗址的西北部，北濒今盘龙湖滨。灰坑分布密集，最密处间距一般约5—6米。部分灰坑分布在一条线上，似有一定规律。形制为上圆下方，有的上大下小，有的中部成袋状，底部又内收。口部直径一般约在1.2米左右，最大达2米、最小1米。底部长宽为0.4×1.4米。方向以东西向为多。深度一般约1米，最深达2.5米。坑内堆积情况为：地表土之下，即露出黑灰土，厚约0.3—0.6米。出土陶器破碎；之下则为褐黄土，厚约1米，夹有一些黑灰。出土各种器物。以炊器为多，大部分比较完整。炊食器以鬲为多。鬲满布烟熏痕，周围伴出成块的兽骨。出土物中，陶缸占有一定数量。

从出土遗物特点来看：时代上限早至二里头晚期，下限至商代二里岗期。(陈贤乙)

宜昌县周家湾周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家湾遗址地处长江西陵峡中段北岸的一座山坳里，南背山梁，北向谷地，文化堆积分布于山坡的凹洼里，面积仅约100平方米。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发掘探方两个，面积30平方米。

地层堆积分为四层，第1层为耕土层，第2层为晚期冲积层，第3、4层属商周文化层。第3、4层中没有发现遗迹现象，也没有发现比商周更晚的文化遗物，却发现早期冲积的现象，出土的陶片虽然丰富，但较残碎，能复原的器物极少。因此，这类文化堆积应属于山区古遗址的一种特殊现象，即当时的居住基址往往要高于现存的文化堆积，由于当时的居住基址周围地势陡峭，后来经过扰乱和雨水的长期冲刷，遗迹一般已难以找到，而现存山坳中的文化堆积也

往往受过雨水的冲击，地层存在着混乱的情况，这也是器物破碎，完整器少见的原因。通过周家湾遗址的发掘，为今后山区考古发掘提供了经验。

周家湾遗址没有发现遗迹，出土的陶片中可辨的器形有大量的鬲、甗，还有鼎、豆等，时代约属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

根据陶鬲、甗、豆的质地、纹饰和形态，它基本属楚文化系统。(陈振裕　杨权喜)

秭归县怀抱石村的三件编钟

发现时间：1985年1月

三件编钟出自周坪乡怀抱石村，由农民取土时发现。三件编钟，小的高26厘米，大的高29.5厘米，一件为素面，另两件钟身为变形夔纹。(摘自《江汉早报》1985年6月9日)

随州市安居砖瓦厂东周墓群

发掘时间：1984年12月—1985年4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

墓群位于随州市安居镇安居砖瓦厂的取土场内，可分东西两个墓区。墓葬较多，这次清理三十二座，均为小型墓葬。其墓圹一般长2.5、宽1.5、深1.5米左右。墓中填土均为五花土，棺木已朽，仅有少数墓葬可见棺木印痕和人骨残迹。

出土随葬器物三百余件。一般以鼎、敦、豆、壶的仿铜陶礼器为主，陶罐也出土较多，鬲、钵、簠次之。其他还有铜剑、铜戈、铜矛、铜镞、铜匕首等兵器以及铜盘、铜环和残铁器等。一般陶器的腹部饰有细绳纹，也有个别器物采用朱砂在黑地上彩绘三角云纹。

这批墓葬的年代，除在东区的20号墓中发现一件春秋晚期的夹砂红陶鬲，应属春秋晚期墓葬外，其他均为战国墓葬。从出土器物形制看，楚文化特征较明显，但也呈现出一些地方特点。(王善才)

阳新县港下东周古矿冶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2月18日—1986年1月8日

工作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筹)

古代矿井位于阳新县富池镇港下大队，在露天开采铜矿时发现。发掘分东西两点进行，总面积约160平方米。共发现三个竖井(其中有一个主井)，二处采矿场(包括多条平巷)。主井是主要通道，用料既大又长，井断面呈“日”字形，西端有横木紧靠井壁，再以两端砍有凹叉的圆本顶紧、中间又以两端带有凹叉的圆木支撑，构成两个方框结构。这样的框架成间隔式支护，构成井筒。

竖井为方形，井口长宽约1.1—1.2米，以直径约15厘米的圆木作材料，四根为一节方框支架，一节节框架相叠，构成井筒，颇类于大冶铜绿山战国矿井的密集式井筒，但结构却完全不同。它不是在圆木两端都砍出台阶状的榫再相互搭接，而是在一根圆木的一端或两端砍出凹叉，相互抵撑。上一节框架与下一节框架可以上下衔接，也可以间隔排列。

采场为并列的平巷，或为低矮的“棚子”。支护结构的主体为二根主柱和一根横梁。主柱的上端砍成一个凹叉，承接横梁。横梁上敷设顶板。顶板上辅填厚厚的树叶。这种框架结构比铜绿山的战国平巷的支护少了两件——地梁与内撑木，稳固性也就差一些。为了加固，增加了立柱的密度，立柱与立柱之间有的仅隔10多厘米，形成一堵“木柱墙”。巷道外壁或以一端砍尖的木板作为背板。

古矿井内出有金属及木制生产工具和陶片。前者有铜锛、铜削。锛呈等腰三角形，凸弧刃，銎近卵圆形，直木柄。削的背部带有锯齿，环首。木制工具有木铲、绳耙等。木铲有双翼和单翼两种，短柄，柄与铲联成一体，整块木头砍削而成。绳耙为一块半圆形带弧的木板，两边各有一孔供穿绳，做耙矿石用。还有整棵大树做成的水槽，横置于地面的井口旁，供排水用。陶片有鬲足、口沿及腹片等。鬲足有平锥状、饰绳纹；有尖锥状，素面，均中高。陶片有分段绳纹，还有米字纹印纹硬陶。

从矿井支护结构和所出遗物分析，时代约为东周，可能在春秋战国之际。(李天元)

郧县砖瓦厂东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3月24—28日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郧阳地区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郧县砖瓦厂位于郧县县城东部约0.5公里，是一处高坡地，东面濒临汉江。唐代此处统称“马檀山”，现在当地人称其中的高大土堆(即封土堆)为“李王坟”。1973年以来，这里陆续发现古墓葬。经发掘的有唐濮王李泰墓、嗣濮王李欣墓。这次发掘的两座东汉墓，是1984年冬，砖瓦厂扩建窑场时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两座唐墓)。两墓分别编号为郧砖M3、M4(以前发掘的李欣和李泰墓，分别编为M1、M2)。

清理前，两墓的顶部都已破坏。清理时，墓内充满淤土和碎砖，为墓顶塌落所致。墓底距现地表深约1米。

两座汉墓一前一后，距离2.3米，属券顶单室单砖墓，由墓室、甬道、墓门、土质斜坡墓道等组成，有铺地砖。其中墓门作人字纹叠砌；铺地砖作人字纹平铺。M3平面呈“凸”字形，M4平面呈弧刃刀形，两墓都是先依墓形挖出墓圹，再用砖在其中筑室建墓。墓砖全系长方形青灰砖，在砖的一个长侧面和一个平面模印花纹。其中M3方向247度，墓室及甬道总长5.14、墓室宽2.56、墓道残长2.1米，坡度24度，砖墙砌法为顺砖错缝叠砌。M4方向252度，墓室及甬道总长4.23、墓室中宽1.62、墓道残长0.96米，坡度25度，砖墙砌法为一横一竖二横(自下而上)。两墓均为单人葬，头向西(即墓道方向)。

由于被盗，这两座墓的随葬器物很少，总共出有灰陶罐、甑、红陶瓮、五铢钱、琥珀串饰、料珠等五十多件，初步判断，两墓属东汉晚期(或末期)。

从墓葬的排列位置来看，两墓可能属同一家族之墓。墓葬虽小，但仍有其特色。如：都带一条斜坡墓道，出现钱纹砖(M3)和墓壁作弧形(M4)等，在本省同期同类墓中较少见。从总的风格看，它们较接近中原的特点。这可能与郧县地近中原有关。(梁柱)

郧县砖瓦厂唐墓

发掘时间：1985年3—7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砖瓦厂唐墓位于郧县县城东部约0.5公里，砖瓦厂扩建窑场时发现，清理了两座。

从墓志得知，该墓分别是新安郡王李徽(泰之次子)和閰婉(泰

妃)。

墓葬形制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墓室呈方形。因施工，墓道已破坏。

李徽墓，因早年被盗，随葬品所剩不多，共七十余件，以陶瓷器为主，器形多缸、钵、盆类等生活日用品。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几件三彩器，有瓶、杯、盂、角杯等，造型新颖别致，色彩鲜艳，是这批随葬器中的精品。墓室四壁绘有壁画，因年久潮湿，多已剥落，保存较好的是东壁，三个人物仍清晰可见。其中二女侍手中捧物，颔首肃立；一男侍双手拱于胸前，头戴幞头，身着红色长袍，作毕恭毕敬状。北壁除花草外，可见一男侍手执缰绳，立一高头大马之旁，可惜画面已残破，只见人物的胸部以上及马的上半部。用黑彩勾勒，填以红色，色彩鲜明。西壁及南壁残破过甚，仅见一部分花草图案，为红色，线条流畅。墓顶绘有星象图，但多已剥落。

闫婉墓较李徽墓略大，无小龛，有天井。墓葬不曾被盗，结构完整。但因闫氏墓系多次迁葬，故随葬品相对要少，仅十余件，绝大部分为铜银器，如铜镜、铜饰件、铜挂耳勺、银下额托等，陶器只两件。墓室四壁及顶部原绘有壁画，但多已脱落。墓室地上积有近10厘米厚的壁画残片。保存略好的是东壁，还隐约可见两个女侍形象，另外棺床的侧面还留有壶门形图案。均为黑线勾勒主体，填以红彩。甬道两侧的壁画最为完整，共有四个人物像，每边两个为文武侍臣，人物最高约1.34米，几乎与真人等高。甬道顶绘有星象图，还可看到部分红点、黑圈。

两座唐代壁画墓，都有墓志铭出土，它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卒月及家族历史，为我们了解李泰家族史及唐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全锦云)

汉川县马口镇明墓

发掘时间：1985年6月10—14日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汉川县文化馆

马口镇明墓，位于白石湖畔的三五〇九工厂围墙外面，墓向40度，墓室距地表约2米。墓口上面横铺五块长1.2、宽0.35—0.4、厚0.1米的石板，上有公母榫。室内四壁系用石灰渣砌成5厘米厚的围墙一圈。木棺及人骨基本已朽，仅残存极少部分。棺内长1.72、

内高0.52、头部内宽0.5、足部内宽0.44米。棺墙板厚5厘米。棺内仅见水银数粒和石灰坨两大块以及锈蚀的铁棺钉几件。墓室南面1米处出土青石墓志铭一盒，正方形，长宽各0.5、厚0.1米。盖上刻有楷书“明处士李公右川墓志”九字。志文三十九行，分志与铭两部分，总共近千字，有些内容与《汉川县志》等地方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墓主人姓李，名培，字祖司，别号右川，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卒于明万历十年(1581年)，享年45岁。据当地群众介绍，该墓原来地面建筑有一定规模，有石制牌坊、石香炉和大石碑等，都在兴建工厂时被拆除。

江汉地区的明墓墓室建筑，一般多为砖砌，富有墓主多采用石灰、砂子和糯米汁浇浆而成的“三合土”建筑，该墓系用长条石板封闭墓口，实为少见，因此，该墓的发掘及墓志铭的出土，对我们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墓葬形制及校勘地方文献资料等有一定的价值。(王善才)

黄梅县西池和孔垅明墓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湖北省博物馆、黄岗地区博物馆、黄梅县博物馆

黄梅县西池区赤土坡明墓墓室为石灰、砂子和糯米汁浇浆而成的“三合土”建筑，长2米余，宽、高均近1米。黑色漆棺保存完整，运黄梅县博物馆开棺，尸体已朽，骨架尚好，有一部分衣物和随葬品，计毛笔、墨块、折叠纸扇、帽子、被单、垫单、木梳、竹席、箅子形竹篾编织物、腰带、云头鞋、丝绸衣服和墓志铭等近二十件，还有木炭十余块和纸钱若干。

孔垅镇加工米厂的明墓，建筑材料和规模与赤土坡明墓相似，只是在“三合土”墓室建筑的外面还贴砌一层青砖。墓室及漆棺保存情况不及赤土坡明墓，就地开棺，尸体和衣物已朽，人骨架尚存。出土木篦一件，器盖纽一件，陶片一块，枕头包布一块，残竹席一块和墓志一方。

从墓志看，西池明墓墓主人姓王，名清，万历壬午年下葬，距今404年。孔垅明墓墓主人姓周，名本仁，嘉靖年间下葬，比西池明墓稍早。该两墓的发掘及其随葬品的出土，特别是西池明墓出土保存完好的毛笔、礼帽(外帽)、竹席和丝绸衣服等文物，不仅丰富

了明史资料，而且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王善才)

湖 南 省

临澧县六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4年11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湖南省博物馆

临澧县文物普查发现一百余处遗址，经整理和复查确认，在胡家屋场、邹家山、王家祠堂、余家铺、荷花台和金鸡岗六处遗址中有早期新石器遗存。

遗址多位于澧北平原，仅王家祠堂遗址地处九里丘陵边缘。胡家屋场和邹家山遗址保存较好。采集物为石器和陶器。石器除个别小型磨制石锛外，都是砾石或燧石的打制砍砸器和刮削器。陶器主要有双耳亚腰形釜、卷沿缓平底罐、镂孔高圈足盘和折腹钵；陶系多为夹炭红陶，有少量夹砂夹炭红陶；盛行绳纹、划纹和戳印篦点纹。

这六处遗存与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遗存文化面貌相同，与鄂西宜都城背溪遗存既有相似性，又有一定差异。这六处遗存的年代早于大溪文化，距今约为七千余年至六千余年。(王文建)

武岗县四季岩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10月17日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邵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武岗县文化馆

四季岩洞穴位于武岗县安心乡镇东北1公里的丘陵山脚，正南40米处有东洲河流过。洞穴相对高度约5米，洞口朝向220度。

1984年11月在洞口部位发现四件磨制石器，有斧、钵、铲。遗址已在1965年社员积肥取土时遭受破坏。现存文化层有四个自然层次：第1层黄土层，厚约3—4厘米，黄土系从洞外挑入夯实；第2层角砾层，厚约13—15厘米；第3层系棕黄土，厚约12—13厘米；第4层棕红色土，厚度不详。第3、4层均出有陶片，质地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有绳纹、篮纹，判断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我省能确定有文化层次的原始社会洞穴遗址过去发现很少，此次发现为湖南原始社会考古提供了新的线索。(袁家荣)

长沙县大塘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12月
工作单位：长沙市文物普查工作队

遗址位于长沙县南托乡大塘村湘江东岸的河滩上，距长沙城约20公里。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压在湘江大堤下，临江水一侧的堤脚和河滩上有文化层和灰坑暴露，分布范围长约200米，文化层最厚处约1米。调查时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片，石器有石斧、钵、凿及砺石，部分石器为卵石加工而成。陶器器形以高圈足的碗、盆、直腹圜底釜为主，也发现有带鼻形系的陶片，多红褐色泥质陶，少量泥质灰陶和夹炭黑陶。器表纹饰多为戳印篦点连成的细线组成的水波纹、横人字纹、圆圈纹、梯格纹、雨线纹以及山峰形、塔形、几何形等各种图案，陶釜的底部均饰细绳纹，亦有少量的红衣陶片。

总的看来，陶器的器形较简单，陶质细腻，纹饰精美。风格与澧县丁家岗等大溪文化早期遗存相似，但纹饰多为丁家岗等地的遗存中所不见。遗址的时代不晚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7000年，其文化性质尚待进一步调查发掘确定。该遗址是目前在湘中和湘南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黄纲正)

衡阳市杏花村商代提梁卣

发现时间：1985年11月26日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祁东县建筑队在衡阳市城南区杏花村修建房屋施工中，在离地表约2.5米深处，发现一件窖藏的商代青铜提梁卣，卣内盛有一百五十多件玉器。提梁卣为椭圆形，通高33、腹横径21、纵径16.5厘米。盖顶、颈下和足部各饰一周夔龙纹，夔龙纹上、下各饰两道弦纹，腹部素面，提梁两端装饰兽头形，全身锈化发绿。玉器质地有白玉和青玉，器形主要为管，计一百四十多件，玉管呈圆柱形，长短粗细不一，中间穿孔，两头斜面。此外，还有玉珮、玉玦、璇玑等器形。(唐先华)

浏阳县柏嘉镇商代铜铙

发现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铜铙发现于浏阳县柏嘉镇靠近浏阳河的一片台地上，出土于一处东周至西汉遗址的灰坑。保存完整，通高43.5厘米，重20公斤。钲部主纹为兽面纹，钲缘、鼓部及甬部均饰云雷纹，甬部的旋上饰涡纹，引人注目的是兽面的双目为浮雕的蟾蜍，蟾身亦饰云雷纹。商代铜铙在浏阳县是首次发现，此铙的蟾蜍装饰也是前所未有的。（黄纲正）

邵东县民安村商代铜镈

发现时间：1985年1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

邵东县民安村村民贺国荣在屋后土坡取土时，发现一件虎纹铜镈，出土后贺国荣捐献给省博物馆。此器氧化呈青黑色，铜质良好。通高32.5厘米，重13.4公斤。钲体两侧有双虎攀附，虎咧嘴卷尾，形象生动，钲中凤鸟伫立，兽面纹铺地，两面造型和纹饰雷同。此镈约为商代晚期或西周初的青铜乐器，造型之精美，为国内所罕见。（吴铭生）

衡阳县新平村商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普查办公室

遗址位于衡阳县呆鹰岭镇新平村的新屋组、蒸水河岸，分布在沿河一带的平地上，约600余米宽。文化层厚约0.5--1米，有些地方文化层较薄。

在遗址的蒸水河上游方向，采集很多标本，以夹砂陶为主，器形可辨有陶釜、罐、鼎口沿及腿。陶器纹饰主要饰篮纹，其次为绳纹、方格纹。石器有斧、钵、凿。还发现有红烧土。文化内涵和衡阳台源福溪金山岭商代遗址相似。

在遗址的蒸水河下游方向还采集有两汉时期方格纹、米纹的陶片以及唐宋时期陶片，米纹和方格纹陶片和衡阳地区两汉墓出土陶器纹饰相同，青瓷片和唐宋时期衡阳市郊蒋家窑青瓷窑址出土的陶器标本一样。(冯玉辉)

株洲县油圳村西周铜铙

发现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株洲县文化局

株洲县油圳村村民易进前在修建房屋取土时，发现一件窖藏的西周铜铙，保存完整无损，氧化成浅绿色，通高39.5厘米，器重9.1公斤，篆间饰云雷纹四组，缝部有两组对称式的变形夔纹，每面有枚六组，每组三个，两面共三十六枚。此铙与1981年该县昭陵出土的一件完全相同，均属于南方文化的青铜乐器。(吴铭生)

安乡县黄山头周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县文化馆

遗址位于安乡县与湖北公安县交界处的黄山头镇。为配合新建城镇而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共掘探沟四条，面积50平方米左右。另清理灰坑二个，因遗址的大部分已被所建房屋所压，发掘部位为遗址的边缘。文化层厚约0.3米，文化层和灰坑所出器物，大部分为残器，能复原的很少，可辨别器形的主要有陶鬲、钵、豆、罐、鼎、壶、器盖等。据器物形制特点来比较，该遗址的时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贺刚)

益阳陆贾山东周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6—7月
工作单位：益阳地区博物馆、益阳市文化馆

东周墓群位于益阳市南区陆贾山基建工地，北距资水0.5公里左右。共清理墓葬五十七座。

墓葬排列比较集中，封土无存，均系中、小型竖穴土坑墓，较

大的墓葬集中在山顶。部分墓葬有斜坡墓道，少数狭长形墓有生土二层台，多数墓坑底部有横枕木槽，个别墓底用少量白膏泥填筑，较大的墓葬墓壁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因葬具及人骨架均已腐朽无存，故葬式不明。五十七座墓共出土器物五百一十余件，其中陶器二百五十余件，器形有罐、钵、豆、鼎、、敦、壶、簠、勺等；各类铜器有二百余件，主要为剑、戈、矛等，不少墓出土两套或三套兵器。

该墓地的重要发现是出土了几组属于春秋晚期的楚式青铜礼器。器形有鼎、敦、簠盘以及罍形器，这些成组的青铜礼器在益阳是首次发现。有几座狭长形墓仅出兵器、生产工具和玉饰件而不出陶器，其兵器和生产工具均具有典型的越文化特点，推测这些墓主是土著越人。

值得注意的是，陆贾山东周墓群所出土的大多数陶器，造型特点与器物组合均与邻近楚都江陵的湘北楚墓类似。此外，铜器中不出铜镜和极少琉璃器，这也与过去益阳出土的东周墓不同。其年代约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对于研究湖南楚墓的分期有重要价值。(盛定国)

澧县新洲一号战国墓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文物管理所

墓葬位于澧县新洲乡车渚村二组的一座小山岗上，西北距县城约25公里，东距澧水约1公里多，墓葬朝向80度，平面是"甲"字形，东面是斜坡墓道，墓上筑有封土堆。封土堆残高4.3、墓道残长8米，墓口长15.8、宽13.2米，底长4.9、宽3.2、深7.5米。墓坑上部设二级台阶，以下为斜坡墓壁，南北二面坡度52度，近脚处壁面转折近陡直。棺椁全部倒塌腐朽，为一棺一椁，椁室高约1.9、长约3.9、宽约2.4米，内有头箱和边箱各一个。椁室四周填充少量青灰泥。

该墓椁室被盗，但棺内随葬物保全完好，其中玉器一套共十五件，形制有珮、璧、环、璜、管、条形饰等，多成对出土，尤以透雕龙形工艺最为精美。另外还有铜剑二柄，琉璃珠三颗。在椁室头箱内还获得一件光整的双耳硬陶罐，通体饰方格纹。

依据所出剑、玉器及硬陶罐的形制、纹样判断，该墓的年代当在战国晚期。引人注意的是该墓缓坡墓壁的特殊形制，与湖南楚墓

迥然不同。(裴安平)

桃源县三元村战国楚墓

发掘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桃源县文化局，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

墓葬位于桃源县三汊港三元村砖厂工地。形制为土坑竖穴，坑长3.68、宽2.36米，葬具为两椁一棺，在头箱和边箱内放置青铜器和漆木器三十余件。青铜器有鼎、壶、剑、矛(附镦)、戈(附镈)、镜等；漆木器有耳杯、壶、俑以及垫托遗体的空花"笭床"。其中一件长矛，保存十分完整，通长2.26米，矛头铜色黄亮，锋刃犀利。矛柲髹黑漆，色泽如新，与铜镦结合十分紧密，质料难以肯定。两件铜鼎形制相同，一件口沿有篆体铭文十一字，内容为年号、鼎名和容积。两件铜壶镂刻细密的卷云纹图案，铸工异常精美。三件铜剑中有一件保存漆鞘，一件格上和首部有错金的鸟篆文，工艺细致美观。有件铜戈的内部刻有猛虎和怪兽搏斗的图象和类似手心纹，形制与四川的巴人戈酷似。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有刻文，笔划纤细而不规则，内容似为工匠名字。

这座楚墓出土完整的长矛，为国内罕见的发现，对研究楚国的刺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依据葬具的重数和随葬兵器之多的情况来判断，墓主生前应是楚国军旅中一员武将。由于该墓有巴式戈共存，为研究沅水源域楚文化的特征以及楚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吴铭生)

湘乡县城关长桥战国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5—10月

工作单位：湘潭市文物工作队、湘乡县博物馆

古墓群分布在湘乡县城关长桥粮库工地，南面与湘黔铁路相距4余米，东面为乡湖公路。墓地面积约100亩。共清理楚墓二百零八座，元明墓七座，部分被盗。

战国楚墓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与遗骸均已腐朽无遗，有些墓底有枕木沟痕。小型墓长2—2.6、宽0.6—1.2、深1—25米；中型墓长3—3.6、宽2—2.8、深3—6.5米；大型墓长4—5.2米、宽

4—4.2、深6—7.8米，另有两座长10—12、宽9—10、深8.5—10米。中、大型墓有斜坡墓道。这批墓葬多为战国早、中期墓，共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等随葬物约七百余件，墓中出土剑、戈、矛、箭镞等兵器的墓四十九座；出陶鬲的墓四十一座，鼎、敦(豆)、壶组合的墓六十座；空墓二十九座。

陶器以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很多陶器饰有朱色彩绘。M75出土的一件铜矛有几何形隐花，与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纹饰基本一样，保存十分良好。

此外，在附近1公里的万家冲红砖厂清理了五十二座战国楚墓，七座汉、晋时代的砖室墓，大部分被盗，出土随葬物二百五十余件，楚墓的随葬物和墓葬形制均与上述长桥粮库工地出土的相同。(谭国才)

长沙市留芳岭战国木椁墓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墓葬位于长沙市北区留芳岭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内，为长方形斜坡墓道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8米、宽3.1米、墓底长3.2米、宽2.1米，挖深6米，葬具外有白膏泥填塞，为一椁一棺，椁长2.6、宽1.6米；棺长2、宽0.6米，为悬底弧形棺，棺上缚麻绳五道，插有木楔，上铺一床竹帘。棺内尸体已腐，还留有竹席包裹痕迹。棺外东端放置一件木剑椟，内装带鞘铜剑一件，棺外南侧放置长矛两件，均长2.2米，矛头、柲、镈皆保存完好，边箱内另有漆皮甲、木镇墓兽、木梳、木篦、竹弓各一件，彩绘漆耳杯两件，陶器无成套礼器，仅有钵、罐各一件，此外有铁鼎一件，大都残破、该墓的悬底弧形棺，长沙地区发现较少，为研究葬具的形制增添了资料。(何强)

临澧县姑儿山战国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5—7月

工作单位：湖南省博物馆、临澧县文管所

墓群位于临澧县城东北约2公里的九秭姑儿山上，已清理一百

五十余座。墓葬比较集中，均为中、小型土坑竖穴墓。可分为头龛或边龛墓，头龛及二层台墓，单纯土坑墓以及斜坡墓道墓等。少数墓底铺有白膏泥，遗骸和葬具大都腐朽无存，有几座有残破棺椁。在一百三十余座墓中，共出随葬物四百余件（内二十座空无一物），大部分为陶器和铜器。陶器组合常见的有鬲、盂、绳纹圜底壶或豆；盂、罐、豆；鼎、敦、（豆）、壶。铜器多为兵器，有剑、戈、矛、镞、戟等，不见铜礼器和容器。依据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的组合特征来判断分析，为东周时期的楚墓，年代的上限可在春秋晚期、下限约当战国中期。（贺刚）

攸县网岭镇东周、两汉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7、11月

工作单位：株洲市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古墓群位于攸县县城以北约25公里的新网岭、八鸡岭、驼背岭。两次共清理东周和两汉墓葬五十一座。出土器物约四百件。均不见葬具和尸骨遗存。

东周墓葬均为竖穴土坑，二十一座为小型窄坑墓。墓坑宽度均在1米之内，长2—3.5米。方向以东西向为主。其中，春秋早期越人的墓葬具有特色，如墓坑窄长，随葬铜刮削、矛，有石器无陶器。春秋晚期以及战国早、中期的小型楚墓中则多见头龛、生土二层台。出土的铜器以剑、矛为主；陶器多见鬲、钵、罐或钵、罐、盒。在一座深达5米的生土二层台小墓中，出土有饰云雷纹的越式铜鼎二件。宽坑墓十七座，长2.5—4.5、宽1.5—3.3米。多覆斗形，或有墓道。其时代为战国、汉代。墓葬部分被盗。战国墓中出土有鼎、敦、壶、豆、盘、匜、勺的陶器组合。铜器有剑、戈、矛、刀、镞等。在几个墓中还出有泥璧，这是其它地区同时代墓中所少见的。

汉墓中有陶鼎、壶、罐、盒、钫、灯、盂、灶、泥、金饼、泥钱、铜镜、五铢、铁刀等随葬器物。十三座东汉砖室墓最具有特色，近半数墓的墓砖上都发现有模印的年号，甚至月、日皆全。墓室平面多为刀把形状；方向多为南北向。室内随葬器物大部分都放置于墓口处（即“刀把”处）。出土器物有坛、罐、碗、灯、壶、灶、方盒（屋）等陶器。铜器以钱、镜为主。铁器有刀、三足架等。

这批墓葬的发掘，既为研究春秋时期湘东地区的古越族的文化

提供了新的资料，又为东汉墓的分期树立了年代标尺。(郑之日)

耒阳县城关战国至宋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1—12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墓区分布在耒阳县城关附近的东面与东北面的东鹿村鸡子山、鹿岐村窑场坳、金牌村面粉厂，枚桥村、三架祖坟山以及金星村大王山一带，共发掘古墓一百二十四座，出土文物一千零八十七件。其中陶器八百一十四件，瓷器十六件，铜器一百三十三件，铁器十九件，其它一百零五件。

战国墓六十一座，均为竖穴土坑墓，有头龛或生土二层台，部分墓葬有墓道。棺椁和遗骸腐朽无存，墓底仅见两根枕木沟和一些残存的漆片。出土随葬器物共二百七十四件，铜器六十九件，有鼎、剑、矛、戈以及镈、镦等兵器，还有少量的镜、印章等；陶器一百八十九件，其组合以鼎、盒、壶、豆较多，部分仅出土罐、钵；铁器六件，主要是刀、剑。其中耒东江M42出土器物较丰富，有铜矛二件，铜戈、铜剑、铜戈镈、铜矛镦、铜鼎、铜勺、料壁各一件，还有陶器鼎、敦、壶、豆两组。

西汉墓十四座，均为土坑竖穴，有的有墓道，较大的墓上大下小，形成覆斗状。出土随葬器物一百六十三件，陶器一百四十九件，以鼎、盒、壶、钫、罐为主，钵、坛次之。铜器九件，为鼎、滑石壁镜和“半两”钱。

新莽墓三座，券顶砖室和竖穴土坑墓均有。出土随葬器物八十件，陶器器形有鼎、盒、壶、罐、坛、钵、杯等，铜器多为“大泉五十”钱和镜。

东汉墓三十九座，有竖穴土坑和券顶砖室墓两类，土坑墓有阶梯式墓道，棺椁多腐朽，个别墓残存椁板。出土随葬器物五百四十四件，器形主要为实用陶壶、罐和模型器灶、井、仓、屋、猪圈等；铜器有镜、釜、“五铢”钱和碗、灯、奁等，此外有铁锸等生产工具。还出土有琉璃珠、滑石壁等器物八十六件。

晋墓二座、南朝墓一座，均为券顶砖室墓。出土随葬器物一十八件，青瓷较多，有碗、杯、壶、盂，还有铜镜、铁剪等。宋墓四座，土坑、砖室、石椁墓均有，形制较小，一般长2.4—2.8、宽0.

6—1.2米，随葬器物有铜镜、银口罩、瓷粉盒、多角坛、魂瓶等。(唐先华　冯玉辉)

郴州市战国至隋代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3—12月

工作单位：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

配合郴州市基建工程，一年来共清理战国至隋代墓葬五十三座。部分墓葬被盗，出土随葬物三百四十七件，有陶器、铁器、玉器、金银器以及琉璃器，其中战国墓具有地方特色，陶器常见的为鼎、敦、壶、罐、盘、匜、勺，铜器有越式鼎及剑、矛兵器，不见铜镜。墓主有的是土著古越人，有的是楚人，有楚、越文化遗物共存一墓的。郴州与广东邻近，在楚人未进入湘南之前，同属于百越。(龙福廷)

长沙市左家塘东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30日

工作单位：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墓葬位于长沙市左家塘郊区武装部内，共清理两座，位置并列，相距为90厘米，皆为长方形青砖券顶墓，两墓均长5.5、宽1.5米，皆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M1保存完好，M2被盗，随葬品主要分布在甬道和前室，计有金戒指、银戒指、银手镯、琉璃珠、玛瑙珠、石珠、铜镜、铜钱、瓷罐、瓷盂、瓷碗、硬陶罐、陶井、陶灶、陶灯、陶博山炉、陶桶、陶钵、陶甑、陶猪圈、陶猪共六十五件。

这两座墓出土的三种铜镜完整无缺，光彩照人。一件铜镜的背面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羽人的浮雕花纹，另两件分别为龙纹和柿蒂纹，皆铸有铭文。出土的瓷器胎质洁白，施青釉，胎釉结合力很强，至今未见剥釉现象。(肖席静)

衡阳县爱国村东汉古墓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墓群位于衡阳县的西北面福溪乡东庄爱国村的山头上。南面紧接金山岭遗址，西面距1公里有蒸水自北向南流去。该墓群绵延近2.5公里，有数百座古墓。这次清理已暴露的古墓十座。墓砖为东汉时期。砖长约35—36、宽14—16、厚5—6厘米。砖上纹饰为几何纹和叶脉纹等。墓中出土器物五十二件，其中陶罐二十六件，陶坛十件，纺轮二件，小口瓶一件，钵一件，铜碗一件，铁刀五件，铁釜二件，铁釜架两件，铁带钩一件。(冯玉辉)

永州市三座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10、12月

工作单位：零陵地区文物工作队

三座汉墓分别位于永州市东郊鹞子岭(M30)，南津渡新公路，市内省三监狱基建工地。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带斜坡墓道。其中M30较大，墓口长8、宽6.1、深4.9米。棺椁骨架均已腐朽，出土文物共计六十一件。铜器八件，有洗、豆、壶、镜等；陶器四十六件，有壶、罐、盒、钫、鼎等。另外还出土一批铜、陶五铢钱和水晶、玛瑙珠等。漆木器残破，器型不明。其它二座汉墓中还出土有铜鼎、锥壶、提梁壶、剑、带钩、甑等；铁器有剑、小刀等；铜镜有规矩纹、柿蒂纹、多乳丁神兽镜等；陶器有灶、釜、甑等。(刘华兴　王凤元)

衡阳县古重安城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6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普查办公室

城址位于衡阳县城西40公里，今渣江区鼓峰乡荫棠村境内的寺干上，遗址纵横约1公里，成正方形。在西南面，残存有长约200米的一段夯筑城墙，墙体现高3米，最宽处有13.5米，遗址周围现存水圹十二口，并四方相联。传说为当时的护城河。在初步调查勘探中，发现有很多废陶片，可辨的有大量的筒瓦、板瓦、素面半瓦当，还有很多和衡阳地区西汉古墓常见的方格纹、麻布纹、米字纹的陶罐和壶残片。

据同治年间的《衡阳县志》记载:“承水出自县西，流经重安城。”现该遗址的南面有“蒸水”自西向东流去。“蒸水”即古“承水”。因此，这次发现的城址当为古重安城。古重安城。古重安城的发现为研究衡阳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提供了新的资料。(冯玉辉)

郴州市文化路唐代水井

发掘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

古井位于郴州市文化路西侧的世界酒家基建工地,共清理六处。这批古井分布不规则。井的形制均为圆形竖穴，井的剖面为直筒形和瓶状形二种。井壁光滑，经过人工修整。未发现加固材料。井径为0.8—1.1米，残留深度为4.7—7.2米。污土中含有残木渣、牛牙齿和其他动物骨片等杂物。古井中共出土陶瓷器七十二件，器形有壶、罐、碗、盆、碟、砚、灯、坛等。其中属于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的陶瓷产品二十一件。器型有壶、灯、器盖、小陶塑、罐、碗。釉质有青黄釉、青绿釉、酱釉。以青黄釉居多，另有白釉瓷器一件。铜官窑的产品在郴州地区尚属首次发现。(龙福廷)

衡阳县新圹宋、元、明窑址

调查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普查办公室

窑址在衡阳县新圹乡境内,距乡政府约1公里,分布在该乡新圹、油溪、石圹三村。窑址散存着成堆的窑具和陶片，其中有三个小山包全为窑具与瓷片堆积层。有些山包文化层厚度达10米以上。

调查时，试掘油溪窑址一块，采集了很多瓷器、瓷片和窑具。这些瓷器的瓷釉有豆绿色、天青黄釉、黑釉几种。内满釉，有些釉不到底，个别出现釉泪。器物有碗、杯、罐、坛、壶等，制作方法均为慢轮抟制。纹饰有莲瓣、菊花、双鱼纹，还有“福、禄、寿、喜”,“长命富贵”,“加官进禄”等吉祥语。从现在采集的标本看，花纹种类已达二十多种，碗、杯多饰在内壁，罐、坛均饰在外壁。

根据这些瓷器的特征,它们可能是宋元明时期的产品。(冯玉辉)

沅陵县双桥元代夫妇合葬墓

发掘时间：1985年8月22日至9月8日
工作单位：沅陵县文管所

墓葬位于沅陵城关镇近郊一座山坡上，距地表2—4米。县机砖瓦厂在此取土时发现。

墓葬为夫妇合葬墓。两穴之间用石灰羼砂以及糯米泥作成隔墙，葬具各用两层套棺，棺上置以盖板，四周同样用石灰羼砂和糯米泥填塞封闭，墓穴非常坚固。套棺为长方匣形，内髹朱漆，外髹褐漆，两档彩绘龙凤图案，保存完好。

1号墓为女性，遗体已腐烂，但腹内有不少水银。2号墓为男性，遗体成鞣尸，身高1.78米，年龄78岁。棺内有棕色棺液。

随葬物共一百三十三件，全部出于棺内，主要是丝织物，有完好的衣、裤、袜、鞋、被等四十余件；有成幅的绢、锦、绫及刺绣，此外有金、银、铜、漆、木、瓷等类器物。在女棺内出土有“至元通行宝钞”纸币七张，票值有“贰拾文”、“伍拾文”、“壹百文”、“贰百文”不等，保存较好。另有用土纸印制的“广告”两张，系元潭州(今长沙)一家生产银朱的店铺为推销自家的产品而印制的。根据出土的木质灵牌的记载，其下葬时间为元大德九年。

这两座墓出土不少完好的服饰和成幅的丝织物，尤其是纸钞和“广告”的发现，对研究元代的丝织业、印刷以及商业的发展至为重要。男尸的保存，也显示了当时防腐技术的成就。(熊传新)

衡南县石塘湾元代银器

发现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衡阳市文物工作队

衡南县樟脚乡石塘湾村民在房后山上取土时，发现一批窖藏元仁宗时期的银器，共七件，重650克。纹饰均模制。器形有鎏金长方形银盘一件，身饰蟠云纹。高圈足银杯三件，身、足分制，有明显的接痕，花瓣形腹，喇叭形高圈足，两件腹底饰桂花，一件腹底饰梅花。银碟两件，荷叶形边，莲瓣形腹，一件饰菊花，一件饰葵花，整个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银瓢一件，近圆形，无流有尾，

尾部有两个钉痕，作安柄之用，素面无纹。

在这七件银器中，有四件刻有楷书铭文。银瓢沿下铭刻“延祐甲寅午月”，底铭“明枝”；银碟底铭“乙卯罗明叔置”；两件银杯足部分别铭刻“乙卯罗明叔”和“嵩伯置”，“陈智甫造”。这批银器为研究元代制银的工艺和技术，增添了新资料。(唐先华)

邵阳市汤家山明墓

发掘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邵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墓葬位于邵阳市城南汤家山地区中医院内，其中一座是明嘉靖江川王朱膺燧次孙誉桦之墓。出土墓志铭四块(内初葬与改葬时各二块)，详细记述了死者的生平、墓地范围和山向。有明洪武年间的龙纹青铜镜一件，仿唐海马葡萄镜及素面小铜镜各一件，铁剪二件，墨砚一件以及嘉靖通宝数枚。(刘伟顺)

广东省

南海县西樵区鱿鱼岗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海县博物馆

鱿鱼岗贝丘遗址位于南海县西樵区百西乡水边村，东南距西樵山新石器时代石器制做地7公里。遗址为高约7.9米的低岗，四周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斜庵塱河流经遗址东北部，向北注人官山涌。

1982年春发现，遗址总面积18000平方米。这次发掘面积255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为三个层次，是由遗弃的贝壳堆积而成。贝壳层中夹杂大量遗物，有夹砂陶釜、陶器座、泥质陶圈足罐、圈足盘、豆等陶器的残片，器表均拍印几何印纹。共存生产工具有石锛、石斧、石凿、石镞、骨镞、角锥、陶纺轮、陶拍等。装饰品有石、陶、骨臂环、骨梳、牙饰等。发现墓葬三十六座，除五座墓坑挖在3层下的生土层中，其余三十一座墓埋在贝壳层中，均为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骨架保存尚好，成人和儿童葬式（除一例外）为头东脚西，仰身直肢葬，双臂伸直压在臂部下，拔除上颌外侧门齿两例，上颌右前臼齿两例。多数墓中无随葬品或仅随葬一、二件。另外还发现两处倒塌的红烧土木（竹）骨泥墙和灰坑、柱洞、灰洞等。从陶器组合和形制、花纹特点分析，与南海大同灶岗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比较接近。（朱非素）

深圳市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深圳市博物馆

遗址位于大鹏咸头岭，为沙丘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锛、砺石和各种陶器，属新石器时代遗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一发现为研究广东沿海古人类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摘自《深圳特区报》1985年6月4日）

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新石器时代及宋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2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珠海市博物馆

淇澳岛位于珠江口伶仃洋的西南方，属珠海市唐家区管辖。东澳湾在该岛东南方，伸进陆地呈弧形状，湾内浪静风弱，是一处海产丰富的天然海湾。遗址位于海湾西岸的海积阶地第一级，即现代海岸线以上的古海滩，沙层厚达3—4米。

1984年发现并曾试掘。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次发掘200平方米。堆积厚度0.2—1.3米不等，包含新石器文化和宋代两个层次。其中新石器文化遗迹和遗物的发现，较为重要。仅属一期，堆积厚度为0.2—0.6米。随处可见当时炊煮用的灶坑，灶坑排列密集，无特定的形状，没有发现居住遗迹。有用两面扁平的山石竖排成两行的长条形灶坑，亦有用大块砾石和泥土随意叠砌成的灶坑，涂抹在灶坑里和附近的泥土，已成为坚硬的红烧土。出土大量的夹砂黑陶釜及少量红陶釜，器表饰绳纹、交错绳纹。还有夹砂陶支脚、陶器座。夹砂陶釜残片占陶片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器体较大，器类单一。少量泥质橙黄陶、灰陶圈足罐，器表拍印几何纹，花纹

有曲尺纹、云雷纹、双线方格纹等，还有素面圈足盘。石质工具中较常见的是长柄有肩石锛、有肩有段石锛。梯形锛、柳叶形石镞、河卵石制成的石网坠和陶纺轮、石臂环也有少量出土。宋代文化层厚0.5—0.6米，出土了大且厚的布纹板瓦、筒瓦和以白胎为主的青瓷碗、碟和黑釉碗盏，花纹多见刻纹，有云纹、篦划纹、莲瓣纹等，碗的器底厚重，圈足宽且矮。

东澳湾遗址的发掘，证明了距今四千多年前已有原始部落人群渡海到岛上捕鱼捞虾，但只是季节性的生产活动，直到宋代，岛上才开始有人定居。(朱非素)

曲江县石峡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8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曲江县博物馆

遗址在曲江县城马坝镇西南2.5公里，位于狮头山和狮尾山之间的峡地。1973年至1978年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曾在遗址西部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地点在遗址的东部，发掘面积340余平方米，清理出一批灰坑、墓葬和居住遗迹。

遗址文化堆积一般厚约1.5米，自上而下分为四个文化层，其中第1、2文化层的遗物最丰富。在第1文化层，出土有箭头、削刀等小型青铜器十多件。石器多达数百件，其中石镞、石锛的数量最多，还有石凿、石戈和石球。陶器多为泥质，夹砂陶较少，发现有青釉陶；器表多饰有云雷纹、方格纹、方格凸点纹、曲折纹、重圈纹、夔纹、条纹、绳纹和刻划纹等；主要器形有罐、釜、豆和器座。该层发现的与曲折纹组合的人物舞蹈纹陶片，在广东属首次发现。第二文化层夹砂陶数量增多，常见云雷曲折组合纹和其他组合纹饰，不见夔纹，主要器形仍为罐、釜、豆和器座。第3文化层为“石峡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橙黄陶和灰陶为主，纹饰有曲折纹、绳纹、条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主要器形有鼎、豆、盘、罐。第4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和“石峡文化”的器物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以饰细绳纹、刻划纹的夹砂灰陶罐，饰镂孔、刻划纹的泥质灰白陶圈足盘最具有特征，当属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存。这次发掘，为探讨石峡文化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资料。(李子文)

博罗县春秋时期编钟

发现时间：1985年5月

编钟一组七口，由农民在住宅旁挖沟时发现，附近没有发现其他遗物遗迹，可能为"窖藏"品。七口编钟总重量为35.7公斤，其中最大的重11公斤，最小的重1.8公斤。编钟为青铜质，钟面饰勾连云雷纹和变体蝉纹。（摘自《人民日报》1985年6月21日）

广州市西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4月

工作单位：广州市博物馆

墓葬一座，位于花果山的岗顶附近。基建时发现。墓葬为木椁墓，分前后室两部分，后室出有铜器、铁器、陶器。前室东西两面规则地排满了陶器，多为瓮和罐。墓中出土的一件小铜猴，高不到10厘米，作蹲状，一手挠头，形态逼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从墓葬规模看，墓主可能是西汉初年赵氏南越王国中的一个显贵。（摘自《广州日报》1985年4月10日）

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2月—1986年1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五华县博物馆

遗址位于五华县华城区狮雄山上，五华河在遗址西南面流经。继1984年试掘后，今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10平方米。在山顶东南平台上，发掘出一座建筑基址，在距地表15—25厘米的地层中，有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成倒塌状覆盖于基址上。

从保存情况看，该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坐东向西，南北总长34米。建筑的东缘尚见断断续续的用河卵石铺砌的散水。在建筑中部也有约1平方米的卵石堆积，用途未明。基址的东南角发现有两列南北向排列的柱础，每列七个，每个柱础用六至九块卵石铺垫，两排柱础之间相距40厘米，两个柱础的间距约为50厘米。整个建筑的中央部分面阔约22米，进深约5米。北边的横向建筑东西

残长 15 米，南北宽约5米；南边的横向建筑东西残长 15 米，南北宽约7米。建筑的西面边缘已被破坏，情况不明。

在建筑遗存的南北两端及中部共发现七个卷云箭镞纹瓦当。出土的陶片以方格纹为主，并有十多种戳印纹饰。出土了方格戳印纹饰的陶罐、水波弦纹陶器、陶网坠、石管饰、铜盖弓帽残件等。瓦的形制较大，板瓦长 51 、弧宽 41—42 厘米，陶质以红色为多，灰色次之，多属软陶；筒瓦长 39—40 、弧宽 22.5—27.5 厘米，陶质多为青灰色，少量灰白色，多为硬陶。

这一建筑遗存是广东目前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房屋建筑。据出土遗物分析，年代可确定为西汉早期，即属南越国时期。从规模来看，应是南越国的一所官府建筑。（刘建安　邱立诚）

梅县市水车晚唐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1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梅县市博物馆

窑址位于梅县市水车区署东北面约 1.2 公里瓦坑口杉山南坡，面临梅江，距江边仅约 30 米。发掘的两座窑平面呈椭圆形，外表呈馒头形，全窑均用土夯筑，一座总长 4.6 、宽 1.88 至 2.48 米，方向 155 度；另一座总长 5.3 、宽 1.6 米至 2.26 米，方向 157 度。窑由火膛、窑室、烟道三部分组成，其中火膛呈半圆形，平底，长 1.7 米，比窑室深1米，与窑室相连处砌有一排匣钵，用以加固窑室前端，使之不易倒塌，前端并开有一个高 10 、宽 17.5 厘米的火口，以便清除炭灰。窑室底部呈斜坡式，一座坡度为 33 度，一座为 35 度。

出土的瓷器有壶、碗、碟、研轮、枕以及圆筒形匣钵、饼形匣钵盖等窑具。瓷器胎质坚硬，呈青灰色；釉层均匀较厚，呈青灰色或青绿色，晶莹润泽，铁还原烧得极其成功。其中碗、碟类多作葵瓣形口，外壁压竖凹线，内壁起棱，圈足或璧形足；壶类作直把，多棱短嘴，平底，与越窑有不少相似之处。窑室作斜坡式，与过去发现的窑室作平底的唐代馒头窑不同，但却与龙窑相似。

梅县市瑶上南宋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1月

工作单位：广东省博物馆、梅县市博物馆

窑址位于梅县市瑶上区署北面约2.5公里的瑶上乡郭屋村后山上，为长条形龙窑，残长9.8、宽1.64至2.64米，窑向85度。窑壁用长方形砖错缝叠砌，窑室上段坡度为25度，下段为23度；中间有一道隔火墙，墙上留有一排十个火孔。

出土的器物有碗、盘、盏、盅、碟、壶和漏斗形匣钵等。瓷器胎质坚硬细白，有青白、青绿、酱褐等三种釉色。与北宋瓷器比较，虽然青绿和酱褐色釉瓷器制作较为粗糙，不饰花纹，但青白釉瓷器却制作十分精巧，胎质细薄。碗、碟内壁刻划或印有莲花篦梳纹、牡丹飞凤纹、荷花飞凤纹、莲花双鱼纹等图案。刻划花纹流畅奔放，印花花纹布局规整均称，花纹密而不乱，是仿定窑的产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些产品在广东南宋瓷窑中还是首次发现。

广西壮族自治区

靖西县宾山南洞人类化石

发现时间：1985年4月27日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靖西县博物馆

宾山，古称合掌山，位于县城（新靖镇）的东北面，距离县城约1公里。宾山高38米，海拔777.76米，其周围是一片较开阔的小平原，西南约200米处有龙潭河流过。宾山发育于泥盆系的灰岩，形成上、中、下三层溶洞。

上洞，1668年被修成祠庙，现洞内无堆积。中洞，洞口朝向西南，高出地平面约7米。洞口高约4、宽约3—5、深20米以上。洞内堆积胶结坚硬，呈黄色。出鹿牙等动物化石。下洞，洞口朝南偏西50度，高1.5、宽3.5洞深约25米左右。洞口距地平面约1.5米。洞内堆积呈黄褐色，较疏松。早年因战备已铲平，现残存不多。堆积可分两层，华盖板层，厚0.2—0.4米；黄褐色砂质粘土层，较松，出人类牙齿及动物化石。

人类牙齿计有：右下第一前臼齿、第二乳臼齿、外侧门齿、左上第一臼齿各一枚。牙齿齿冠保存均较好，磨蚀度较轻，石化程度较浅，呈浅淡黄色，这几枚牙齿代表两个不同的个体。

伴随人类化石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华南豪猪、板齿鼠、猕猴、亚洲象、大熊猫、巨貘等十八个种类，其中大熊猫，巨貘为绝灭种，其余均为现生种。

从出土的动物化石、洞穴位置高度及人类牙齿石化程度分析，宾山人属于晚更新世晚期或全新世早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周石保)

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靖西县博物馆

遗址位于靖西县新靖镇那耀村的谷地上，四周为石山环抱。地表一般见不到文化遗物，是当地农民挖土时偶然发现。从试掘的4×4米探方看，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薄，仅一层，厚约0.3—0.5米，出土的遗物有陶片和石器。陶片为夹砂绳纹粗陶，火候极低，一触即碎，器形不辨。颜色呈红褐或黑色。石器主要是磨制得较精致的石斧、石锛，分有肩与无肩两类，其中有一件束腰形大石铲共存。有肩石斧、石锛在广西左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很多，而大石铲则为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种特殊的器形，由于两者共存于一文化层之中，这对广西大石铲文化遗址年代的确定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梁旭达)

崇左县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遗址位于崇左县雷州乡崀别村南约1公里处，面积约100平方米。在遗址范围内，采集到一些完整的石铲、有肩石斧、石凿、砺石。试掘一个“T”字形探沟，东西长10、南北长7、宽各1米。

遗址堆积单纯，上为耕土层，下为文化层。文化层很薄，仅0.2米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层中发现的大量遗物，几乎全是石铲半成品、毛胚、残片和板岩块，而且堆放有一定规律：均为侧置或竖放；隔一段距离存放一堆；有些遗物旁边用石灰岩块间隔。这种有目的的堆放，似可说明它是一处石铲的加工场地。与这些遗

物共存的还有少量的夹砂绳纹红陶片、炭屑和红烧土。

出土的石器种类和类型，与过去在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以石铲为主的情形完全一致。因此，它们应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这类遗存，过去没有发现过陶片，吞云岭遗址发现的陶片，为这类遗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何乃汉)

合浦县廉州炮竹厂西汉晚期墓

发掘时间：1985年3月—4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

墓葬位于合浦县城东南约3公里风门岭廉州镇炮竹厂内。封土存高4.6米，直径47—56米。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带斜坡墓道。墓坑长8.06、宽5.76、深4米。椁、棺、人骨架均腐朽无存，椁外四周有白膏泥保护层。墓道下口开一个殉葬坑，长1.5、宽2.26、深1.4米，内存铁斧一件。

随葬器物以铜器和陶器为主。铜器有耳杯、高足杯、仓、臼、杵、盆、提梁桶、鼎、印、镜、灯、灶、釜、锅、镳壶、提梁壶、奁、盘、熏炉、魁、勺、案、甑、铺首等形器；陶器有瓮、罐、壶、双耳罐、屋等。此外，还出有五铢钱、铁环首刀、漆盘、漆耳杯、金饰珠、琉璃、玛瑙、琥珀。根据随葬器物的时代特征，该墓年代为西汉晚期。西汉晚期设有殉葬坑的墓，在广西属首次发现。(蓝日勇)

合浦县风门岭、望牛岭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5月29日—7月2日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

墓葬位于合浦县城南约3公里的风门岭和望牛岭。两座土岭相互连毗。合（浦）北（海）公路自北而南从风门岭墓区经过。两处汉墓共发掘十三座（土坑墓七座、砖墓六座），获得文物三百余件。

在风门岭发掘土坑墓三座，砖墓五座。土坑墓中有一座在同一个封土堆下设有两个并列的墓穴，其中一个墓穴带较长的斜坡式墓道，另一个墓穴无墓道，两墓穴之间也无隔梁相间，很可能是夫妇

合葬。其余两座墓都是单室长方形，带斜坡式墓道。随葬品以陶、铜器为主。陶器有罐、壶、鼎、井、屋、灶、灯；铜器有提梁壶、锥壶、盆、碗、杯、釜、灶、熏炉、奁、合、环首刀、臼、杵、罍、矛、戟、镜、五铢钱；铁器有剑、三脚架；滑石器有鼎、罐、灶、钫、井等器物。其中有一件铜锥壶肩部刻划“西于”二字。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这三座土坑墓可能是西汉晚期。砖墓五座，有三种形制：一是长方形；二是有一个单室，平面图呈“丁”字形；三是有两个耳室，平面图呈“十”字形。墓壁砖墙都是双层，其砌法是一竖一横，墓顶券形，墓底除一座平铺大型红色方砖外，其余的墓底均铺长方形青灰色砖，墓砖侧面印几何纹图案，随葬品绝大多数早年被严重盗扰，残留陶屋、陶灶、陶直身罐、铜弩机、铜铺首等器物。其年代为东汉时期。

望牛岭发掘的五座墓（土坑墓四、砖墓一），都位于该岭的东南面，墓葬封土尚有保留。四座土坑墓中，除一座为单室长方形墓外，其余三座都是在同一个封土堆下有两个并排的墓穴。穴与穴之间有隔梁相间，而且每一个墓穴都各自设置较长的斜坡式墓道。随葬品中，陶器有罐、壶、灯；铜器有提梁壶、井、罍、三足案、釜、盆、杯、熏炉、锥壶、灯、臼、杵、药量器、镜、五铢钱；铁器有剑、三脚架等。另外还有玛瑙、金珠、料珠等装饰品。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器物的风格与其相邻的风门岭所发掘的三座土坑墓相似，为西汉晚期。砖室墓为单室长方形，墓室砖墙及铺底砖均被盗墓者撬开，随葬品被盗一空，从墓砖和陶片的形制分析，该墓属东汉时期。(黄启善)

全州县大毕头村唐代赵司仓墓

发掘时间：1985年2月

工作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全州县文化局、全州县文物管理所、兴安县文物管理所、灌阳县文物管理所

赵司仓墓位于全州县凤凰乡大毕头村西约1公里的麻子冲，是一座单室长方形砖结构墓。方向南偏西25度，墓葬封土已在早年被铲平。墓室长5.37、宽1.63、深1.76米。墓壁砖墙双层，用长方形青灰色纪年砖和素面无纹砖错缝平砌。为了加固墓壁，在墓室内两壁还用青灰色素面砖叠砌成砖柱，每边八根，相互对称，高0.

8米。墓底平铺两层砖，下层顺列平铺，上层一横一纵平铺，平面呈“人”字形。墓砖铭文全都是模印阳文。有的在砖的正面印“太岁戊戌贞观十二年六月廿日　永州赵司仓参军墓　息云骑尉造　留传后世子孙知”。有的在砖的侧面印“赵司参军息云骑尉等造”或印“赵司仓参军息云骑尉”。葬具及骨骸均已腐朽无存。随葬品都是日用青瓷器，有盘口四系壶、碗、碟、砚共九件器物。(黄启善)

平果县红岩山崖洞葬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广西博物馆

崖洞葬位于平果县凤梧乡香美屯红岩山峭壁崖洞内。洞口距山脚高度约60米，该洞为宽敞的半椭圆形洞，于洞内各壁的洞龛上发现约二十具棺，其中十五具保存较完整，棺从圆木中间一分为二，挖空，上下棺为子母口相合。棺身均头大尾小。形制计有大牛角燕尾式、大牛角带横凸燕尾式、双燕尾式（头尾同形）。所葬个体老、中、少、幼齐全；均二次葬。有男女成人合葬，其中一棺内发现干尸一具，年龄约12岁，尸体残缺不全，下肢几乎无存，仅见几节脚趾骨，上身齐全，并有内脏及头发。棺内发现麻织品。该崖洞葬为广西目前所发现的、保存较完整的一处，为广西历史、考古及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族属、年代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周继勇)

四 川 省

巫山县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12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巫山县文化馆

遗址东距四川巫山县城45公里，西距奉节县城15公里，位于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的三级阶地上。遗址东西长100、南北宽45米，面积约4500平方米。地层关系从上至下可分三层：第1层，表土层，厚0.3—0.4米；第2层，黄褐色粘土，厚0.5—0.8米，含商周时

期陶片及遗物；第3层，深灰色砂质粘土，质较疏松，含大量鱼骨灰烬，愈靠底部尤甚。此层即大溪文化层，厚0.8—2米。除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外，还发现居住使用的白灰面、灶坑、红烧土、灰坑等遗迹。

此次调查共采集标本一百零五件。石器六十四件，质皆砾石，用料单一，色有青灰、青绿、粉绿、粉红、紫红、褐色、黑色等多种，加工手法多样，有打制、磨制两大类；器形较为复杂，有石斧、石锛、石锄、石凿、石刀、砍砸器、刮削器等。陶器残片三十五件，质有内黑外红夹砂粗陶，夹砂红陶，泥质黑陶和磨光红陶；器形有罐、球形罐、绳纹釜、豆、猪嘴形支座等；纹饰可分方形戳印纹、圆圈纹、绳纹、刻划纹等。骨蚌器六件，骨器四件，多磨光，器形有骨锥、骨针两种，蚌刀两件，已残。

大溪遗址的新发现，对探索当时大溪人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面貌及与邻近文化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至于遗址的范围、年代、内涵、房屋结构及与墓葬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工作。

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

发掘时间：1985年11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荥经县严道古城博物馆

墓群位于荥经县城北郊同心村，现已发现三十多座。今年清理七座。这批墓葬多为狭长形竖穴土坑，无墓道，船棺及尸骨多数腐朽无存，仅见残痕。墓葬排列整齐，坑位有序，方向一致，一般正南北向。墓坑皆狭长方形，长宽比例一般为6:1。如M_4长6.1、宽1、深1.23米；M_6长5.28、宽0.86、深1.29米。除尸骨腰部置铜剑、印章等小件器物外，随葬品一般放置墓底两端，有铜、铁、陶、漆器等几类。七座墓共出土一百零二件遗物。陶器以釜、罐、豆、钵、盂、盆为组合；铜器有戈、矛、剑、釜、鍪、斧、带钩、印章等；铁器有斧及环首刀等，还出土铜铁相结合的铜柄铁刀。

这批墓葬为研究四川地区船棺葬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等问题提供了资料。特别是一件有“成都”铭文铜矛的出土，联系当地同时期木椁墓中一批有“成亭”戳记的漆器，对于解决古代成都的历史沿革及相关的各种作坊，将有重要的意义。

成都市西郊新一村隋末唐初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12日—1986年3月1日
工作单位：成都市博物馆文物考古队

新一村小区位于成都十二桥西干道左侧，这次发掘清理了隋末唐初的窑炉一座，找到了窑址作坊区。

窑炉：为斜坡式龙窑，方向144度，窑床坡斜10度，由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组成。窑残长约10、宽2.75、火膛长2.44、宽1.52、左右壁深0.9、前壁深0.4、后壁深0.26米。窑床后段及烟道因距地表太浅，已被现代房屋基础破坏。该窑南北壁及火膛均采用比较厚重的青砖砌成，砖长0.35、宽0.22厚0.13米。窑床上面有0.29米厚的烧结层，内含有大量的窑具和青瓷片，其焙烧方法乃采用无匣钵的叠烧法。窑床下有五道隔梁，均采用长0.33、宽0.17、厚0.11米的长方形砖砌成，窑底建筑在黄粘土上。

作坊区面积达1153平方米，内发现有拌泥池、陶水缸、八角形砖井等遗迹。拌泥池在作坊的中部，直径约1.76、深0.3米，采用长方形的青砖竖立砌一圈而成。陶水缸分布在作坊的四周，共计有水缸十一口，多数已残，直径最大的1米，最小的0.5米，残高0.15米至0.55米。八角形砖井位于作坊的北面，直径1.1米，现存深度1.65米，残井口部距今地表3.8米，井的四壁用长0.4、前宽0.37、后宽0.39、厚0.08米的楔形青砖砌成。

出土各类器物数千件，主要以瓷器为主，品种有碗、高足盘、高足杯、盅、盆、罐、钵、炉、碟等，胎质有红色、紫色、灰白色三种，多数器物仅施半釉，釉色有豆青、米黄、酱黄、褐青色等。（王成）

宝兴县陇东石棺葬

发掘时间：1985年3—5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宝兴县文化馆

墓群位于宝兴县陇东乡老场大队，地处青衣江东侧的一级台地上。发掘面积约700多平方米，共清理墓葬一百零二座。墓群排列

有序，多南北向，除三座头南足北外，余皆头北足南。墓葬多用石板作盖，可分石棺墓、砖穴墓、砖石合造墓、土穴墓四种类型。多数穴内用砖是立砌而不是平砌，用砖的规格和品种亦很复杂，常常是一墓达十种以上，并且用残砖的现象也很普遍，可见非建墓而专门烧造，可能利用当地现成东汉花砖而按石棺葬形制营建墓穴。

葬式很有规律，多为仰身、屈肘、直肢。屈肢葬和二次葬较少。有九座墓出现上下层尸骨的现象，有的上下层尸骨方向相反，即南北各一头。从现场情况分析，应为叠压和打破的关系所致。部分墓葬还出现随葬羊骨和马腿骨的现象。各墓随葬品基本一致，多以陶罐、铁刀和戒指、纺轮为组合形式。共出土文物二百多件。器物虽然不多，器形却复杂多样，近乎一器一形。双耳罐仍然是该墓群的主要器物，但口沿多为马鞍形，双流，腹部常饰有牛头、羊头纹和牛眼纹，特别是带足双耳罐（三足或四足)，为其他石棺葬所不见。

通过对这批墓葬的结构及其内涵的分析，陇东石棺葬应是四川石棺葬文化晚期的代表，有的可到东汉晚期。它与四川茂汶、甘孜及泯江流域等地石棺葬文化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典型的地方民族文化色彩，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

邛崃县“邛窑”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3月—11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邛崃县文物管理所

在1984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邛窑”进行清理工作。共清理窑炉八座，其中龙窑六座，马蹄形窑两座，时代为南北朝至宋。出土文物计万件以上，可分七类：1、生活用具，有壶、罐、瓶、盆、钵、匜、碗、杯、碟、盘、盏、灯、豆、炉、盂等数十种。2、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杵、臼等。3、文娱用品，有响铃、弹子、象棋、骰、口哨、地转子等多种。4、俑类，有生动活泼、各种造型的人物俑和动物俑数十种。5、文化用具，有砚，水盂、水注、笔架等。6、建筑材料，有瓦，照壁、鸱吻等。7、其他如钱币和有年号题记的遗物、印模、窑具等。出土文物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各种器物都有很多变化。就壶而论，即可分四十多式，人俑更复杂，仅头形，发式即可分数十种。通过对“邛窑”的几次发掘工作，对“邛窑”的创烧和废弃年代，窑炉结构，装烧方法，造型艺术，装

饰工艺诸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清理5号窑仓的同时，发现了叠压其下的唐代建筑遗址。现已清理出遗址西、北两侧的砖砌排水沟两条，东侧石质围栏一段，砖石结构房屋基址七间，计正厅一间，厢房、侧室六间，已揭露面积约700平方米。七间房屋的墙基、柱础、地面、台阶、梯步等已暴露无遗。出土唐代文物也较丰富，还有“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钱币出土。

唐代建筑遗址的发掘，为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丰富了“邛窑”的内涵。目前，遗址还有一部分压在5号窑仓的南侧，其范围和格局及其与窑址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工作。

邛崃县文笔村北宋墓葬

发现时间：1985年5月6日

工作单位：邛崃县文物管理所

墓葬一座，位于邛崃县南河乡，由农民开荒时发现。墓长约4.9米，墓门宽约2.8米，墓室为砖砌卷拱结构。墓室两壁有二十四小龛，分上下两层。上层十二龛内置陶鼓两件、小陶罐三件、小陶鸡三件。下层十二龛内供十二生肖俑和文官俑共二十件。其中牛头、马面俑形象尤为生动。（摘自《农民日报》1985年5月23日）

重庆市小湾、桃子林宋代窑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1986年2月

工作单位：重庆市历史博物馆

窑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这次发掘窑址两座、作坊一处，获得以黑釉瓷为主的文物标本近千件。其中小湾窑址中清理出多件“曜变”纹釉瓷器（残损不一），属首次出土。（摘自《文物报》1986年2月7日）

安县宋代骨灰盒丛葬墓

发现时间：1985年夏

骨灰盒丛葬墓两座，在修筑公路通过一个山丘时挖出。两墓相

距1.98米，平行座落。墓壁、墓底、墓顶都用宋砖砌成。每座墓穴内安放着四百二十个骨灰缸，两墓穴共八百四十个骨灰缸。缸内装满火化后的骨灰，并用土陶瓦盖封口。墓穴中一次埋葬这么多人的骨灰，实为罕见，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墓葬，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考证。(摘自《光明日报》1985年9月15日)

大足县红旗村两件宋代变色碗

发现时间：1985年7月23日
工作单位：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两件变色碗出自在红旗村二组发现的宋代石墓中。一件高7、口大16、圈足直径5.4厘米；另一件高5.6、口大16.5、圈足直径5.7厘米。粗泥砂质，除碗底和圈足外，上均有白色釉彩，具有典型的宋代碗的特点。碗遇水变得油黑发亮，干后又变成白色。(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9月13日)

西昌市北山宋代火葬墓

发掘时间：1985年9—10月
工作单位：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墓地位于西昌市郊北山，这次共清理火葬墓一百七十一座，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钱币、海贝及不同质料的珠、环等各种装饰品，共一千余件。

西昌北山的火葬墓数以千计，是除云南大理、禄丰两县外，火葬墓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这次清理的火葬墓分布密集，相互叠压，墓葬间距一般为0.8米。墓葬形制：先挖一直径约0.8米的圆型竖穴土坑，坑一般深0.6米，坑内置火葬罐，不封不树。罐内放置烧过的骨骼，骨骼上用朱砂书写梵文，其上涂有金箔。随葬品置于罐内，部分火葬罐四周放置五个陶质板俑，少部分火葬罐为套罐，小罐内放骨灰。火葬罐主要有泥质灰陶罐与灰砂红陶罐两类，并发现少量肩部饰四立耳的泥质红陶罐。灰陶罐肩、腹部一般饰十二生肖图等或莲瓣纹，红陶罐均饰绳纹。其中M16火葬罐放在一高0.8、直径0.47米的石椁内。石椁呈球形，中空，分为可以打开的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顶部雕有仰莲托宝珠，下半部腹部四周浮雕十二生

肖。火葬罐为灰陶罐，罐身涂成黄色，肩、腹部用朱砂书写梵文一周。这种形制的墓葬在西昌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从这批墓葬出土的宋代铜镜、影青瓷器等随葬品来看，其时代基本可以定在宋代，下限不会超过元代。

两宋时期，今凉山地区属于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大理国在今西昌设置建昌府，是其重点经营的地方；大理国时期的地下文物出土不多，这批火葬墓的发掘清理，填补了凉山地区大理国时期文物考古的空白，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文化及其与中原的文化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刘弘　张昌皖)

珙县麻塘坝“僰人悬棺”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1985年1月

工作单位：四川省文管会、珙县文化馆

麻塘坝位于珙县西南65公里的洛表区，东连兴文，西接筠连，南邻云南威信县。该坝南北长约5.5、东西宽0.3公里，范围约1.65平方公里。坝之两侧峭壁林立，僰棺悬其上，现残存一百三十多具左右。

为配合对悬棺进行维修加固的工程，采用以楠竹搭脚手架在岩上就地清理的方案，清理九盏灯十二座，棺材铺十六座，珍珠伞三座，共清理悬棺三十座。

一、葬制及葬具　　棺多楠木，形制殊异，其葬制：1，以2—3根木桩插于方孔之内，置棺桩上，悬于峭壁；2，利用天然岩腔，置棺其内；3，人工开凿岩穴，置棺穴内，又分横陈、竖插两种；4，在大穴之中，重叠数棺，更有多达十具以上者；5，在两方孔之间，以一长桩作为桥架，上叠数棺者。

二、文化遗物　　随葬品不多，器形亦不丰富，计有丝麻织品、陶瓷器、竹木漆器、钱币、海贝及串珠等，共一百多件。

三、岩画　　岩画内容丰富，有车马、乐舞、动物、战事、渔猎、符号及反映民族风俗及经济生活的图案。

据棺材铺十六具棺的叠压关系和钱币等出土文物判断，其时代应在宋、明时期。多数尸骨有拔牙习俗，联系文化遗物及岩画所反映的民族习俗，对于研究悬棺的族属，增添了新资料，也有益于对悬棺的搁置方法、岩画与悬棺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贵 州 省

毕节县老鸦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11月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

老鸦洞遗址位于贵州西部的毕节县城北西面的青场区公所附近。与县城直线相距约26公里。地理位置在东经105°1′，北纬27°21′附近。1983年底调查发现。1984年5月复查。洞口朝西南，高出青场河水面约20米。洞外地貌属山间槽谷型。洞内堆积基本水平，且胶结坚硬。面积约120平方米。发掘面积20多平方米。堆积厚约1.7米，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九层。上部略呈灰色或灰黑色；下部为黄色；第7层为灰烬；底部为紫色砂砾层。除第9层之外，以上八层均不同程度地含有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发掘遗物有石制品近千件，动物化石十多种，以及用火遗迹和大量的动物碎骨。石制品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核和石片等，多以燧石为原料。石核有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之分。石片有天然台面、有脊台面、素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和极少的零台面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的加工方向多向背面；刃角有钝、有锐。可能出于原料硬、脆而节理较多的缘故，石制品多显得比较粗糙。动物化石有竹鼠、猕猴、熊、熊猫、犀、貘、野猪、鹿、牛、羊等种类。

根据发现的动物化石种类，初步推测该遗址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年代，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1984年在老鸦洞堆积中采集到的一些骨化石的测定，为距今18220±550年。(许春华　蔡回阳　王新金)

毕节县海子街大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1、12月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

该地点位于毕节县城东部的海子街乡周家桥村附近，一个半封

闭洼地的东侧，与县城直线相距约13公里。地理位置在东经105°23′，北纬27°22′左右。附近为丘陵型槽谷地貌。洞口朝西，高出当地河水面约15米。于1983年底发现，1984年5月复查，这次发掘面积约20平方米。洞口部位的堆积厚约2.5米，可分两层。下层略呈黄色。但上部层位已被扰乱。两层中都含有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出土石制品数百件，动物化石十余种，以及大量的动物碎骨和烧骨。

石制品有石核、石片、有坑疤的砾石和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石片有天然台面、素台面、有脊台面、有疤台面、点状台面、线状台面以及极少的零台面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多以燧石为原料，但节理较少。有的器物加工较为精细，轮廓明显。

动物化石种类计有竹鼠、豪猪、猕猴、熊猫、熊、剑齿象、貘、犀、野猪、鹿、牛、羊等，属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由此估计这个地点的石器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上部堆积中发现有陶片，因此也包含了一些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遗物。

在大洞附近有一小洞，名叫扁扁洞。相对高度与大洞约等。洞内堆积清楚，由堆积中找到了几件石片和一些动物化石。化石石化深，种类与大洞内发现的相似。该洞的堆积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许春华　蔡回阳　王新金）

安龙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3月
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观音洞遗址位于安龙县城西部的龙广槽谷盆地中一个溶蚀小峰丛南侧的半山上。与县城直线相距约28公里。地理位置大约在东经105°12′，北纬25°05′附近。洞口朝南，高出地面约20米。自1958年以来，当地居民常于洞内筛取泥砂，将洞口的部分堆积扰乱。在过筛后的粗颗中，获得石制品四百余件，骨、角器几件，动物化石十多种，以及大量的动物骨片和用火遗迹。

洞内堆积略呈棕色。在厚约3米的剖面上，可粗略划分为九层。表层为钙板；7、9两层为灰烬，分别厚约12和30厘米（后者未见底）。除表层之外，2至9层均能见到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石制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核、石片和有坑疤的砾

石等，大部分以砾石为原料。按台面存在的形式，见有天、素、有脊、有疤、修理、点状、线状、刃状、零以及台面破碎的石片和断片。以天然台面和零台面石片居多。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多以零台面石片为原料，以向破裂面加工为主。骨制品有骨器和角器。

动物化石大多为贵州晚期遗址中的常见种类，但螺壳化石的数量占有相当的比例。综其地层、古生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情况，其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王新金　蔡回阳)

兴义县张口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4月20日

工作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张口洞（俗名喳嘴巴洞）位于兴义城东南的丰都乡龙塘村营脚寨附近，营盘山孤峰的西南侧，与县城直线相距约6公里。地理位置在东经 104°56′，北纬 25°03′ 左右。洞口向西南，高出地面约 30 米。洞内堆积存于斗状的围岩之中，面积约 60 平方米，但大部分堆积已遭扰乱。在3米多厚的堆积上，从上而下粗略划分为十二层。第8层为灰烬，厚约 15 厘米。第2层以下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

目前所获的动物化石有螺、蜗牛、鼠、竹鼠、豪猪、猕猴、大熊猫、熊、虎、野猪、鹿、麂、牛、羊等十多种，以及大量的动物骨片。

石制品七百余件，包括石核、石片、有坑疤的砾石、打击砾石和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类型，大部分以砾石为原料。石片按台面存在形式分为十类，以天然台面的石片居多，零台面石片次之，两者之和占石片总和的半数以上。有坑疤的砾石在石制品中约占六分之一。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也有一定数量。这些石制品的时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王新金　蔡回阳)

云 南 省

永仁县维的新石器时代石棺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10—11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维的是个彝族聚居的村落，南距永仁县城18公里。石棺墓地位于维的村西北500米的山丘上，当地村民呼曰“麻地梁子”，彝语称为“俄刀摩”，南北向，长约300、宽约100米，顶部平缓，呈马鞍形。由于长期雨水冲刷和人为破坏，山顶露出少许墓穴。当地彝民将此墓穴呼曰“神人坟”或“鬼神坟”。他们认为这些死者不是自己的祖先，而是“没有膝盖的人”。

这次清理石棺墓六十座，约占整个墓地的五分之一。墓坑分布密集，间距不等，最远者相距2米，最近者仅隔0.2米。墓向均依原来地形，头朝山坡顶部，即位于东坡者头西脚东；位于西坡者则头东脚西；两者又非正向而略有偏差，一般在10—15度之间。墓室作长方形，头宽脚窄，一般长3.2—4.2、宽0.4—08、深0.3—0.6米。墓底均依山势而略有倾斜，头高脚低，一般在5—15度之间。建造材料均为红色砂岩。石板稍做加工，多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墓室的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挖一竖穴；又在坑底四周掘宽10—15、深15—30厘米的小沟；并将石板放入沟内，再行填土而使其直立；石板入土部分深15—20厘米。两壁或两端石板的数量不等，一般两壁各有五至十二块，两端各有一至二块。底部均铺石板，一般八至十块。墓口均铺盖板石，且大于墓室宽度，一般七至十块。盖板石距表土深度不等，一般深0.3—0.6米。石板厚2—5厘米。石板连接处均无粘合剂，少许墓坑为防止石板倾斜而在外侧加放一至二块石板或石块。四周石板多有不同程度的内倾。盖板石也有少许坍塌。人骨无存，似属单人仰身直肢葬。所有墓室和随葬陶器之内均有填土。有单室墓五十六座；另有结构独特者四座，即有头箱者一座（M28）、脚箱者三座（M20、46、47）。除三座人为破坏严重者外。其余均有随葬器物。

出土器物二百零五件（陶器一百五十四件、石器五十一件）。陶

器均夹砂灰陶，火候较低，制作粗糙，质地疏松，胎质较厚。陶器全系手制，个别口沿有慢轮修饰痕迹。类型简单，仅有罐、瓶、壶和纺轮。罐类又有双耳、单耳和无耳之别。石器均属生产工具。种类简单，仅有扁平梯形斧、钵和平圆式纺轮；制作精致，通体磨光。

永仁维的石棺墓出土的陶器、石器与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同类器物的质地、形制和制法基本相同，当属同一文化。维的石棺墓出土的双耳陶罐等与四川西部地区石棺墓，乃至甘青地区齐家、卡约等文化所出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阚勇)

广南县平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文山州文管所

遗址位于广南县平丰村的铜木犁洞内，发现有肩石斧、长条形石斧、凹刃石斧、石锤、石杵、切割器、石弹丸、网坠、砺石、研石以及不少石器工具残片；还发现三件刻有符号的骨饰品和一个陶制纺轮，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烧石、烧骨、炭屑和动物残骨。(摘自《云南日报》1985年3月16日)

西畴县狮子山洞穴崖画

调查时间：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博物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管所、西畴县文化馆

狮子山洞穴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蚌谷区，狮子山四周临水，属喀斯特地貌，溶洞离地面约8米。

崖画是使用赤铁矿粉调合动物脂肪绘制的，分布在洞穴外面石壁、洞穴内部左侧和正面石壁上。共有图像三十七个，有日月、人物、走兽和鱼类等。

洞穴外面石壁的图像，由于常年风雨冲刷，大多模糊不清，仅留有一高峰野牛，牛角锋利，尾部高翘。

洞内左侧是以渔猎为主题的图像。大约可分三组，月夜中的、白日的和水中的。动物形象多样，有尖耳、圆耳，有偶蹄利爪。其中长角鹿的造型非常生动。图中有月亮、太阳，在动物群的后面有

两个执着弓箭的人物。最下面是两条造型简练的鱼，在曲线组成的水波纹上荡游，左侧有一网状物，正等待着鱼儿。这些动物形象，不是崇拜物，没有神性的痕迹，而保留其原有的兽性。人物虽少于动物，但使人感到人是动物的主宰，动物是猎取的对象。这处崖画是原始宗教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多猎物，施以巫术的神圣场所。

洞内正面是描绘祖先崇拜的图像。最上面横卧一人，下面是倒立一人，四肢伸张，绘有男性生殖器，右边有一侧立人物，再下面是一个直立人物。作者用卧、倒立、侧身、直立等动态反复表现人物，可能是为了表现祖先灵魂不死，永远活于世上。人物下面是纷乱的家畜，有马、羊、猪等形象，也反映了人统治动物，但主要是祈求祖先保佑氏族子孙长久不绝，人畜兴旺。

整个崖画画面没有发现阶级社会的痕迹，主要反映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内容。造型风格古朴，是处于蒙昧时期的作品，经与沧源崖画、大王岩崖画等处比较，西畴狮子山洞穴崖画似属新石器时期遗存，是云南目前发现的崖画点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杨天佑)

弥勒县金子洞坡崖画

调查时间：1985年10月

工作单位：云南省博物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管所

金子洞坡位于南盘江东岸，距弥勒县城60余公里的独家村附近。这一带居住着彝族支系阿哲人。岩壁座东朝西偏东20度，成岩厦状，风雨不能直射。岩壁前有一平台，长14、宽约4米许。平台上遍布浮土，下面有木炭灰和兽骨露出，证实岩下平台有人类活动。

崖画全长11、高3米，系用赤铁矿粉调合动物脂肪或动物血绘制而成。由于常年风雨冲刷和岩浆浸蚀，已把画面分割成数组。有些图像已经模糊不清，可辨图像仅剩五十多个。崖画主要描绘的内容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和祖先崇拜。崖画中的人物造型非常简练、生动。头部仅画一圆点或一圆圈，不画五官等细部。身躯多为长方形，人物动态全靠四肢变化来表现。有舞蹈状的，有奔走跳跃状的。有几个人物造型更为奇特，将头、颈、肩和上肢简化成一个三角形，两脚分开，全身象一个箭头。这种高度简化的方法，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效果。

整幅画面没有发现阶级社会的痕迹，崖画表现的内容、造型风

格和作画的工具颜料等方面，与云南其它地区崖画比较，初步推测为原始社会时期作品。

崖画左边，留有古文字十七个。经州彝文工作者鉴定系古彝文已识别其中七个字。其意为：“炎热二月骑马至此，天天乐或舞。”经查看文字颜料与画不同，其中十二个小字是用没有调合过的赤铁矿直接写成的。所以，文字系后期书写的。

金子洞坡崖画的发现，把路南崖画与文山等地的崖画联系起来，形成了云南崖画滇东南部的一种风格。(杨天佑)

碧江县大凹子崖画

发现时间：1985年4月15日

工作单位：云南省博物馆、怒江州文物普查办公室、碧江县文化馆

大凹子位于碧江县南面约30多公里的群山之中，下距腊斯底村1公里，上离腊虎都村2公里。壁画座东朝西，共分为三个部分，全长12、高1—1.3米。图像系用经过调合的黑色颜料绘制，颜料具有极强的附着力，虽长年经风雨浸蚀、冲刷而不脱落。共有图像一百二十多个，其中有人物、动物、飞禽、日月和象形文字符号等。壁画造型生动，画风古朴，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画中有一些特殊的图像，如骑马的人物中有倒立于马背上的，有在两个太阳间作舞蹈状的，有鼎状图像，有腰部配有刀剑的武士等。经与我省其它地区崖壁画比较，明显属于晚期遗存。

在壁画上出现五十多个象形文字符号，这是我省古文字资料一项重要发现，具有珍贵的价值。

壁画产生的年代和族属有待进一步考证。(杨天佑)

西藏自治区

穷结县邦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遗址位穷结县久河区札林乡邦嘎村。海拔3700米。东西长80、

南北宽25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冲沟冲刷和村庄占压，估计原来面积不下5000平方米。试掘4×4米探方两个，发现祭祀坑四个。

祭祀坑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平均面积0.25平方米。四坑均用石料作边置筑，且与下面坑壁平直，口底等大。均深0.1—0.25米，出有兽骨、木碳、陶片、深色灰土。探方底层亦出有遗物，包括有石磨盘、磨石、石球、重石、双孔石器。出陶片二百多片，陶质为泥质和夹砂（粗、细砂）两种，分红、黑、灰三色。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包括菱形纹、平行线纹、三角纹、弦纹，剔刺纹等。可辨器形主要有罐，特征是侈口、鼓腹、宽带耳、圆肩或斜圆肩。有一陶片（器物腹部）中间穿孔，比较特殊。出土的六百多片（条）骨头大多损残，未见成型器物，主要为羊骨，另有动物牙齿、脊椎骨、肋骨等。

发现的祭祀坑在西藏少见，出土的陶器纹饰与西藏卡若、曲贡村遗址出土的有相同之处。未见打制石器，其时代较上两遗址为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康乐)

扎囊县加日村吐蕃时期墓群

发现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墓群位于扎囊县扎期区敏珠乡加日村东一片广阔的冲积扇上。冲积扇被两条东西濠沟切割成三部分，从现存封土堆观察，墓葬主要分布于南半部。共有四十三座，皆座东朝西，分大、中、小三类，大墓周围一般都分布有小墓。

这一墓群规模较大，但破坏严重，现存的四十三座仅是原来的一部分，且封土堆残缺不全。据墓葬封土堆结构、形制分为三种类型。1、梯形石砌封土堆墓，数量最多，共二十三座，较大的墓一般都属此类。其特点是先用土、砂夯打，内夹网状石墙，同时，在封土夯打过程中内加木椽，木椽一般是圆形或方形两种。有些墓在木椽之下还铺一层石板，这些都是为了加固封土堆内部结构。这种现象一般多见于大、中型墓，小墓很少见。2、塔形墓，在数量上仅次于梯形石砌封土堆墓。其特征是外观似塔，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封土外表砌石墙，层层内收，墙内为夯土，夯土内夹大量碎石块，很少有网状石墙。3、梯形夯打封土堆墓，此类型数量最少，封土堆

亦小。其特征是封土堆全用土、砂夯打而成，有些墓在夯层中每隔1—1.5米便夹铺一层石板，石板一般长0.3—0.6米。平面呈梯形，前高后低，前大后小，与第一种类型的墓在外观上大同小异。

加日村古墓群与吐蕃时期的朗县列山墓群的封土结构极为相似，列山墓群也具有加日村墓群以上这三种封土结构，形制完全相同。因此，加日村古墓群的相对年代当为吐蕃时期。(何周德)

扎囊县斯孔村吐蕃时期墓葬

发掘时间：1985年7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墓葬群位于扎囊县城附近的斯孔村，共十二座，皆属大中型墓。大型墓居高或处显要位置，中型墓分布其下或左右两边。

这次清理一座封土堆最小的梯形墓（编号为M5)。其封土堆位于一座小山岗上，由土砂夯打而成，座北朝南，方向140度，前边长15.3、后边长12、左右两边各宽12.5、高4.1米。墓顶略平。从封土堆顶部下挖0.3—0.5米处，发现网状石墙，系用大小石块垒砌而成，有些石墙已被扰乱，说明该墓已被盗掘。石墙宽0.8—0.9、高0.3米，其布局大致呈“亚”字形。在网状石墙外围、封土堆的边缘处，还有一周0.2米宽的石砌边框。封土堆中部下挖1.5米便出现小山岗的原始岩石。M5为竖穴洞室墓，由墓道、墓穴、墓室、耳室四部分组成。墓道和墓穴位于网状石墙中部偏后，呈不规则矩形。墓道为九级石台阶，落差大，台面狭窄。第九级台阶下有一平台，平台右边即是墓穴。穴内主要填有大小石块，尤以大石块为多，与少量的土砂相混杂，十分零乱。同时，在石块中还掺杂有少许人指骨、肋骨、肱骨及陶片等。在墓穴内还有七级石台阶，台阶下有一狭小的平面，平面上方1.55米处的墓穴墙壁上，有一周二层台面，原当盖有石板，现已倒塌，墓穴底部距封土堆顶部4.8米。墓室位于墓穴平面南部，墓门很小，但格外讲究，门框、门楣皆采用光滑的石条，石门是一块大石板，已被推翻在地。墓室作四面攒顶，平面呈长方形，长2.52、宽1.8、高2.75米，地面铺0.1米厚的细绵土，再下就是原始山岩。墓室均用大小石块叠砌而成，石墙外表还敷有一层很薄的纯净泥皮。墓室内零乱不堪，人骨架和乱石掺杂一起，有头盖骨、下颚骨、盆骨、肱骨及臼齿等，残缺不全，但系一人尸

骸。不见葬具，在墓室内发现一小堆腐烂的荞麦和青稞粮食遗物，还有一个小铁钉。耳室设于靠近墓门内的右边，与墓室相连。耳室较小，四面攒顶，平面略呈圆形，直径约1.25、高1.95米，室内乱石一堆，别无他物。在墓穴中发现有陶勺、陶罐、陶钵三件小器物，陶钵内还有一块鸽子骨。

根据墓葬的封土堆、墓室结构及陶器分析，其年代约为吐蕃时期。据《白史》记载："关于葬墓事，藏王之史记中有稀奇之记载，略谓墓内分九格，中央亦置赞普之尸体，以金涂饰，实以财物。"M5的网状石墙即为九格，墓室位于封土堆中部，这与文献记载的吐蕃藏王墓极为相似。M5这种具有完整的墓道、墓穴、二层台、墓门、四面攒顶墓室、耳室结构，截至目前，在西藏还是独一无二的。(何周德)

穷结县吐蕃时期墓葬

调查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墓葬位于白日村、王康村、拉龙沟、隆赤沟、汪姆村、井久沟、扎西村，共七处七十五座，大都依山面水，建在较大的冲积扇面地带。墓葬均有封土，平面可分为圆形、方形、梯形三种。封土一般夯实或为土石堆筑。特别是隆赤沟墓群，规模宏大，且具有藏王墓的封土特点，如有圆木柱隔垫物所留孔洞、石板层、边框夯墙等。

此外在久河区下林乡香达村，发现一包括圆锥形封土、石砌隔墙、祭祀房舍及整个围墙的墓地。这里的地望、遗迹及地名"香达"均与藏文史料《新红史》、《西藏王统记》等记载的仲年德如墓的情况相符。仲年德如是西藏吐蕃时期松赞干布之前的一代赞普(藏王)。这一发现为研究藏王墓增添了新内容。(康乐)

穷结县医院赤松德赞记功碑碑座

发掘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碑通高（由碑顶至基座平面）4.85米。碑帽高0.85米。碑身高4米，上端长0.75、宽0.3、下端长0.9、宽0.44米。平面作长方形，

下大上小，收分明显。碑下为石龟基座。龟高0.3、长1.5、宽1.1米。这个龟座造型简易，为轮廓勾勒，选用了原来一整块形如乌龟的自然石料而成，很少人工雕凿，不像“唐蕃会盟碑”、“赤德松赞墓碑”的龟形碑座那样精雕细刻。这座墓碑是藏王墓群中仅见的两座石碑之一。(康乐)

扎囊县城扎塘寺

调查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扎塘寺的整个建筑布局，是按照佛教密宗的曼陀罗建造成的，即所谓“坛城”。现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存主殿和残缺不全的围墙。

主殿座西朝东，平面呈不规则“十”字形，原为三层高的建筑，现只存第一层。第一层主要由门廊、经堂、密室、佛殿、回廊五部分组成。大经堂和佛殿内的柏木八棱柱皆属早期遗物，特别是佛殿内的第一期壁画，题材古朴罕见，主要内容是释迦像和各种形象的男女弟子半身像。根据壁画内容及组合，可分十组，但题材大同小异。以第五组为例，释迦像居中，有椭圆形头、背光，头、背光是用几道蓝、绿、红条带圈成；高发髻，发髻顶端有一矛头状装饰，面方圆，大耳，细眉间有一圆形毫相；内着翻领宽袖衫，外着袈裟，左肩前挂三条飘带，飘带上的花纹图案与袈裟的边饰一样，即扇形花朵；双手作转法轮印，脚穿黑底花筒靴，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在莲座之下，有莲茎、花盆和攀枝花草。

在释迦像左右两边共有男女弟子半身像三十五尊，其中左边十九尊，右边十六尊，男像居上，女像居下，皆有椭圆形头、背光。男像左边八尊，右边十一尊，一般为秃头或短发，多面向主尊，有八字胡、八字山羊胡和串脸大胡等，形象各异，具有回、蒙等许多民族或阿拉伯人的形象特征。这些男像均内著宽袖衫，外披袈裟，手势多合掌于胸前，个别手持笏板或单手置于胸前。女像左右两边各八尊，头皆戴高冠，垂发双披肩。高冠有三花和五花高冠两种，冠中后部突出一高圆筒，系用花布条缠包发髻而形成，这与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宝冠极相似。女像皮肤不一，有白、红、黄、棕、黑、绿、蓝七种颜色，面方圆但不臃肿，细眉和弯弯的眼睛恰到好处。著大翻领宽袖长裙，个别像有帔帛，腰间系垂珠腰带。还有双耳环、

耳坠、项链为饰。

在释迦佛像的莲座下方左右，各有一尊蹲狮和两尊站立女供养人像。

扎塘寺由扎巴、恩协巴（公元1012—公元1090年）于公元1081年创建，为息结教派之一的扎巴支派寺院。寺中这些珍贵的早期壁画，是研究已经失传的息结派和宋代西藏壁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研究西藏早期服饰、画风及外来影响提供了一些线索。(何周德)

札达县古格王国遗址

考察时间：1985年6—8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古格文物考察队（由西藏文管会、文物出版社、故宫博物院、四川大学电教室合组）

古格王国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扎布让区，东距札达县20公里。1979年，西藏文管会和新疆文管会曾对遗址进行过调查。今年的考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的考察，基本搞清了遗址总面积、遗迹数量、性质和分布规律，出土、采集、征集了一大批古格王国时期的实物资料。

“古格王国遗址”的废墟，实际上只是当时古格王国的都城。废墟大部分布在象泉河南岸一座高约180米的土山上，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左右。按照地形和建筑功能的不同，初步分为七个区，共计有房屋遗迹三百八十八座、窑洞八百二十三孔、碉堡五十一座、暗道十二条、各类佛塔二十二座。建筑遗迹中保存较好的是五座佛殿，以红庙、白庙规模最大，保存有近700平方米的壁画和大量天花彩绘图案，壁画内容有各类佛、菩萨、度母、护法、高僧像；吐蕃赞普世系；古格王及臣后礼佛；释迦牟尼传记等。天花彩绘大部分为种类繁多的装饰图案，有少量的飞天和瑞兽题材。这些壁画、天花题材丰富，色彩浓烈，线条流畅，借鉴了印度、尼泊尔中世纪艺术的手法，充分体现了古格王朝艺术独特的地方风格和时代特色。

新发现武器库一座、石锅库一座、大小粮仓十一座、儿童壁葬一处、木棺葬一处，采集、清理出土大批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佛教艺术品。生活用具中有方形石锅、小口大底石罐、绳纹陶罐、圜底陶釜、铜釜、铁釜等；生产工具中有铁锯、铁斧、铁犁铧、木锨、木马鞍等；兵器有竹、木箭杆、藤、皮盾牌、铁铠甲、头盔、

刀、矛、枪筒等；佛教艺术品有线刻石造像、陶塑造像、模制泥造像等。儿童壁葬发现在一区103号窑洞侧壁的一个拱形壁龛中，童尸已风干硬化，仰身微屈，无葬具，包裹在数层粗布中，手上带有铁镯、贝镯，这种葬俗属全国仅见。木棺葬已遭破坏，骨骸腐朽粉化，葬式不清，根据棺板灰长宽分析，应为屈肢葬，棺中清理出陶罐残片、海贝饰物和铁镞等物。

古格王国是吐蕃王朝崩溃后，由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后裔于十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小王国，十七世纪初毁于拉达克人的入侵。这次考察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对于研究古格王朝当时的社会经济、军事、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建林)

札达县多香村古格王朝城堡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阿里分队

遗址位于札达县西南约40公里的多香村北，东距古格王国遗址约20公里。遗址座落在多香东岸台地上的一个独立小山上，台地高出河床25米，小山高出台地约130米，呈鱼脊形东西横列，遗迹分布在山顶及西侧、南侧的山腰、山下，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

调查中将遗址分成西、南、山顶三个区，佛教殿堂、塔多在南区山下，西区、南区山腰、山顶区多为防御设施和民居。遗址共计有房屋遗迹七十三座、碉堡十六座、塔十一座、窑洞近二百孔。从城堡整体布局到殿堂、碉堡、塔、窑洞的营造方式、建筑风格来看，都与古格王国遗址完全一致。惜殿堂、房屋全遭破坏，无一完整。原集会殿只剩四周墙垣，墙上壁画经长期雨水冲刷已模糊不清，依稀可辨有佛、菩萨、胜乐金刚、六臂依怙等像，画像的线条和用色与古格王国遗址的相似。原依怙殿应由窑洞和洞前平房两部分组成，平房已毁，洞子保存较好。洞内壁画中以六道轮回地狱图最为奇特，在暗红底色上用黑色绘出牦牛、羊、狗、马、鹰等动物及人的残躯断肢，恐怖气氛强烈，而且设色厚重、形体简拙，这种手法为其它地方所不见。

遗址最下端的台地上有六大塔、三小塔，以最西端塔最大也保存最完整。塔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台基和“亚”字形基座，座的四面饰八吉祥、白狮和束腰卷草纹等图案；第二部分为三层内

收的圆台座；第三部分为钟形塔瓶；第四部分为圆锥塔刹，刹体外包红陶砖饰，这种形式的完整的塔，现在西藏已很难见到。其余几座塔均残，惟余方座。

山顶区为一狭长蜿蜒的山脊，最宽处10米，窄处仅2米，建筑遗迹均为小房间和碉堡，碉堡均建于山脊端头或转折处，墙体上有三角形或长条形箭口，房屋随山脊起伏，错落相连，由一条夹壁复道把所有建筑串通起来。碉堡和复道里有数堆拳头大小的卵石、岩块，是当时作为防御武器用的。

调查中采集、征集到铁镞、铁铠甲片、头盔片、竹箭杆、铁刀、模制泥佛像、铜佛像等文物，其中兵器和模制泥佛像与古格王国遗址所见到的基本相同。结合建筑遗迹的特征、风格，可以肯定多香遗址原为古格王朝的辖区，而且设有下属机构，驻有军队，当与古格王朝存亡时代一致。(张建林)

札达县古格王国托林寺

调查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阿里分队

托林寺位于札达县城，象泉河南畔。十一世纪初，古格王国第一代国王德祖衮长子意希沃创建，初为西藏佛教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译经场所。公元1036年，古格王强曲沃从天竺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进藏，驻锡托林寺弘传佛法，寺庙也不断得到扩建，并随着阿底峡的声望而闻名于卫、藏、康等地，成为中世纪西藏名寺。

寺的规模原较大，由六座大殿堂和僧舍、塔林等组成。现多已毁，保存较完整的有迦萨殿、集会殿和白殿，三座殿堂的年代以迦萨殿最早，集会殿次之，白殿最晚。

迦萨殿虽屋顶全毁，但存留的墙垣和四角塔还可反映出原有的早期建筑结构和风格。这座殿的独特建筑形式在西藏是罕见的，整体部局呈“亚”字形的坛城状，中心方殿表示须弥山，四向的四组佛殿分别代表“四大洲”，四角高耸的四座小塔代表四天王天。各小殿多有转经回廊环绕，中心方殿和周围殿堂之间也形成一个大的转经回廊，这种作法是西藏早期建筑的典型形式。据藏文典籍记载，托林寺当时系仿桑耶寺而建，但又把桑耶寺一组庞大群体所表现的设计思想和内容组织在一幢建筑中，堪称西藏古建艺术中的精品。

集会殿和白殿是仅存的两座完整殿堂，原塑像、藏经均已破坏或流失，但保存下来大量壁画和彩绘天花，这些壁画和天花的艺术风格、题材、构图、用色用线等大多与古格王国遗址的同类作品相似，应属于古格王朝艺术的范围。尤其是集会殿壁画中所表现的贵族礼佛图，从礼佛场面的布局到人物的服饰，都与古格遗址红庙壁画一致。集会殿的彩绘天花板除了在古格王国遗址常见的莲花、卷草、云团、棱形几何纹等图案外，还有一部分飞天、狮、龙、孔雀、摩羯鱼等图案的大幅画面，画面占满两格椽间天花板。画面中的飞天上身裸露，下著短裙，手执彩练或花串，在彩云中飞腾飘逸，这种造型不见于西藏其它任何寺院。瑞兽也被描绘得非常怪异，身体扭曲弯卷，叱咤风云。最为精彩的是集会殿门廊壁画中的十六伎乐天图，这十六个伎乐天舞姿各异，或举手过顶，或合掌胸前，体态轻盈，腰肢细软，面容较好，显出一种娇媚活泼的样子。伎乐天的服饰基本一样，上著紧身短袖衫，双乳袒耸，腹部微露，下著曳地长裙，赤足。这十六伎乐天均出自一人之手，所用线条为游丝描，细而蜿蜒流畅，设色轻淡，尤如白描，这种用中国传统线描技法表现浓郁的印度风格题材的人物画，在整个西藏是仅见的。(张建林)

普兰县古格王国科迦寺

调查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阿里分队

科迦寺位于阿里地区普兰县东南12公里处，是第二代古格王阔日于11世纪初始建的，亦是继托林寺之后，古格王族所建的第二座大寺院。科迦寺由强巴拉康、日松贡巴殿和僧舍组成。

强巴拉康座东向西，正殿两层，门楼三层。底层由门道、错钦大殿和殿两侧的侧室（左侧室还有一内室）及大殿里两耳室组成。错钦大殿共三十七柱，该殿使用替木独特，绝大多数替木与横梁呈十字交叉直角，与其它藏式建筑不同。殿内供像及壁画均已无存。三层主要有丹珠尔拉康、甘珠尔拉康。二层均为僧舍、过廊和小库房。

日松贡巴殿位于强康北侧，座北向南，整个建筑呈纵横轴对称的“亚”形，由殿堂、转经廊及殿堂两侧的侧室组成，殿堂平面呈“凸”形，凸出部分为供佛龛。主供文殊、观音、金刚三尊，均为

铜铸像。大佛龛两侧有壁画，题材为八弟子。凸出部分外围有转经廊。两侧室为小库房。由廊之左侧可上二层，二层有小护法神殿——索玛康，主供“多吉玉卓”。

强康大门门框、门楣上有精细雕刻，楣分六层，框分四层。楣最上层为一排二方连续的兽头，似虎又似牛，正中一凸出矩形上刻有菩萨及供养人；第二层为拱形龛，内刻有佛传故事；第三层为条状横向连续的佛传故事；第四层，为凸出方块的高浮雕飞天；第五层为尖顶龛，内刻有诸菩萨的浮雕像；第六层，凸出方块上刻有佛、菩萨诸像。框内层为环状缠枝龛，内刻诸菩萨；第二层为半柱形镂空的莲花卷草纹；第三层为梯框式的方龛，龛内镶有佛传故事的方形浮雕板（仅存两块），方龛外框亦有雕刻，内竖框刻有八吉祥、鸟兽、人物等，外竖框和横框均刻有佛传故事；第四层为外框，正面无雕刻，内侧雕卷草纹，下接人首鸟身兽。

从雕刻的形式看，门框、楣的雕刻有浮雕、半浮雕、高浮雕，也有近镂孔的多层次雕刻；从雕刻面来讲，有框楣的分块大面雕刻，也有大块间小格框上的小条形雕刻，亦有沿框厚侧面的雕刻，同时还有半圆柱形面的雕刻。从风格来讲，明显受到印度、尼泊尔雕刻、绘画艺术的影响，所刻人物造型修长、姿态优美，人物各具特色，雕刻十分细腻。这是西藏境内所见木雕艺术品中最漂亮、最珍贵的一件中世纪的艺术佳作。(仵君魁)

日土县三处岩画

发现时间：1985年9月—10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阿里分队

在搞对阿里地区七县进行文物普查时，于日土县日松区任姆栋山西侧、日土区鲁日朗卡山余脉北侧和多玛区恰克桑山余脉西侧分别发现古代岩画。这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首次发现古岩画。三处岩画画面个体图像多寡不一，以日松区最多，共四十三幅画面，个体图像有一百三十多个；日土区次之，有六幅画面，个体图像近四十个；多玛区最少，三幅画面，个体图像近四十个。三处岩画共计画面五十二幅，个体图像二百余个。每个岩面因面积大小不一，刻凿的个体图像多少亦不同，多者三十多个，少者仅有一个。

三处岩画分布的地理环境基本相同，即岩画面对较宽阔的草场，

中间有沼泽地，旁边有小河，草茂水清，现在仍是理想的放牧之地。

岩画的题材和内容，按其个体图像的数量多少，依次排列为羊、牦牛、鹿、狗、人、马、鸟、鱼、树、日、月、“反雍仲”(反万字)符号等。按画面分析，有刻记放牧活动和日常所见的物、景；也有反映祭祀场面和崇拜物的图；亦有表现狩猎活动和战争（抢掠）的画；……。如：日松区1号岩画，上方刻有日月和男女生殖器，中间刻有三条鱼，其中一条大雌鱼，首尾相接，腹内孕有七个鱼子，鱼下横列一排十个陶罐（饰有绳纹），鱼罐之间有四个戴鸟头面具正在舞蹈的人，陶罐下分九排横列了一百二十五个羊头。这幅图景，当是原始宗教中为乞求人畜快速繁殖而举行祭祀活动的宏大场面的反映。

三处岩画的表现手法有五种形式：1、矿物颜料涂绘法（仅存于多玛区一处）；2、勾划的细轮廓线（用硬石尖）；3、敲凿的麻点粗浅线轮廓线；4、敲凿麻点组成的形体面（在轮廓线内填以麻点）；5、深刻粗轮廓线（用硬石尖沿轮廓反复刻磨）。第5种的线条流畅，其它四种形式以古朴为主要特点。

日松区和日土区两处岩画的动物形体，比例基本合理，特征突出并适当夸张，这样就使得岩画形和神与原物较相象。这是此两处岩画的主要风格。如牦牛的大角、短粗脖、拱肩、粗腹腰、下垂大尾、短粗四蹄；鹿的高枝角、长脖、高抬头、短圆腹、壮屁股、上翘短尾、长高蹄子；绵羊的小扁头、外撇角、细脖、粗壮短腹、上翘短尾；狗的大头、粗脖、细腰、长腿、上卷大尾以及羚羊的细长直角等都得到适当的夸张。这就把牦牛的力度、鹿的机灵、绵羊的乖弱、狗的敏捷等本性刻划了出来。

根据这三处岩画的表现手法、风格特点以及重叠打破关系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可将岩画分为三期；根据西藏苯教特有的反“雍仲”(反万字，佛教正用）符号出现在第二期岩画中，可以基本断定岩画的刻制年代的下限是在佛教未大规模传入西藏之前或传入后不久，即西藏吐蕃前或吐蕃早期所刻制。(仵君魁)

扎囊县朗赛林封建领主庄园

调查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庄园位于扎囊县扎期区。因其布局和外观近似于朗赛神（财神）后住的地方，故名。传说为藏王朗达玛女婿所建，现存建筑群至少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庄园建筑有两重围墙，外围墙只存残迹，内围墙保存较好，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内围墙下部垒石为基，宽4.5米，上部夯土为墙，厚2米，高8米。在内围墙四角上，原建有碉楼，西侧围墙中间，设有望楼。内外围墙之间，有5—6米宽的壕沟，用为防御。

主楼高七层，十分壮观，平面呈长方形，外墙系夯土、石块砌筑而成。主楼底层是牲畜圈，二、三层为仓库，四层系管家佣人住房，五层为佛殿，六层是贵族居住的地方，七层房间较少，屋顶平台可俯览全村。

庄园内东、西、南三面有依围墙而建筑的家奴居住矮屋和马厩、奶牛圈、磨房、染房、纺织机房等。另外，还有为惩罚农奴而专设的牢狱，牢房阴森潮湿，备有木质脚镣和皮鞭、皮巴掌等各种刑具。

庄园的右前方，有一片葱绿的林卡，是领主的别墅。

朗赛林是一座有典型代表性的庄园，它的封建庄园经济是西藏农奴制度的一个缩影。(何周德)

陕西省

汉中龙岗寺旧石器文化地层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今年在龙岗寺汉江右岸三级阶地a_2地层中(旧石器中、早期)，发现了梁山文化的地层，并获得石锤、砍砸器、石球、石核尖状器等二百多件石器。

梁山文化位于南郑、梁山一带，过去因无地层，时代不明。这次发现的石器，制作原始，与石片石器为主的北京猿人文化有显著不同，而与以砍砸器为主的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接近。(张蓓)

大荔旧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早期遗址

调查时间：1983—1984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经两次调查共发现石器地点十四个。石器三千多件。这十四个地点多分布于洛河三级阶地的下部，少许分布于一、二阶地。新发现的78006A点1层为早更新世，在我国除泥河湾、云南元谋外还非常少见。洛河三级阶地上部为更新世中晚期，二级阶地为更新世晚早期，一级阶地为全新世早期，证明从早更新世直到全新世早期，大荔地区都有古人类活动。

大荔人文化属我国旧石器文化中期早段，绝对年代的上限与北京猿人相近。在一个地区内发现十多处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我国还是罕见的。

在大荔洛河沿岸对新石器遗址也作了调查，试掘了完白梁家坡遗址，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或庙底沟类型），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属老官台文化，其中的三足壶为老官台文化第一次发现。

此外还试掘了白村、赵庄两个商代早期遗址，试掘面积100平方米，出土有大口尊、鬲、甗等，含有二里岗文化因素。

扶风县案板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4年和1985年春
发掘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案板遗址位于扶风县城东约4公里，渭河的支流沣河和美阳河交汇处的黄土台塬上。遗迹分布范围达70万平方米以上。

1984年春第一次发掘，发掘面积为400多平方米，发现了依次叠压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计有房址二座，灰坑（多为袋状）十余座；出土陶器七十余件，还有大量的石、骨器（详见《陕西扶风县案板遗址1984年试掘的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2期）。

今年进行第二次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弄清案板龙山文化遗存的内涵。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灰坑十余座，出土陶器五十

余件和大批石、骨器。

根据出土物和地层关系判断，案板龙山文化遗存应属龙山文化早期，与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代大体相当，但文化面貌有明显区别。出土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红、褐陶；纹饰以篮纹和绳纹居多，条带状的附加堆纹也很盛行；制法以手制为主。主要器形有喇叭口束颈圆肩小平底瓶、深腹夹砂罐、单耳罐、双耳罐、双大耳罐、刻槽盆，还有斝、鼎、釜灶等。其中带耳的罐类占了很大比例。根据现有资料，可将这里的龙山早期遗存初步分为两个阶段。(王世和　张宏彦　王建新)

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10月27日—12月25日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临潼县东北部的相桥镇境内，距县城约30公里。西安半坡博物馆曾发掘过三年，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220平方米。

这是一处龙山时期的村落遗址，汉代曾为墓地。遗址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平均堆积4.6米。遗址的文化内涵颇为丰富，发现房址四十二座、灰坑十一座、窑址三座和汉代及其他时期的墓葬十座。

这个遗址的房子分布很有规律，东西成排，南北成行，上下成层。房子平面呈凸字状长方形圆角，门道向南，朝外伸出20厘米左右，圆形灶面位于房子中心，有的灶面是平的，微高于房面，灶面与房面间有一道圆形刻槽；有的灶面稍低于房面，中心放一件陶鬲或残鬲足等，发掘时，器内尚存草木灰。此处的房子上下叠压甚为突出，有些地方多达七、八层。柱洞均为圆锥状，分布无一定规律，房子里外都有。我们在上层还发现了一座“吕”字形房子，但有别于客省庄Ⅱ期文化的同类房子。

灰坑多为袋坑，也有方形圆角和圆形坑。坑内遗物有陶器、骨器、石器和蚌器，还有大量的兽骨、鹿角、鱼刺、蚌壳、螺壳等。

在三座窑址中，一座是陶窑，两座为石灰窑。陶窑属“非”字形，仅存火膛和火道，据估计，窑室直径约1.2米。石灰窑为椭圆形，口大底小，下部残深0.7米。

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和泥质褐陶次之，纹饰以绳纹和素面为主，篮纹次之，还有划纹、方格纹等。器形有

鬲、斝、甑、罐、盉、碗、瓮、器盖等。骨器有针、铲、锥、镞等。石器有斧、刀、镞、锛、且等。蚌器有刀和镰。(阎毓民　秦小丽)

宝鸡市石咀头东区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6月22日—7月17日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遗址位于宝鸡市石咀河乡石咀头制砖厂东面取土坡上。残存范围南北约50、东西约20—50米。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地层堆积情况简单，第1层耕土；第2层冲积红壤土。在第2层下为红壤生土。龙山文化的遗存就是在红壤冲积层下发现的。

六座房屋基址（F1—F6），只有三座保存比较完整。其特征：1、都是靠台级地或斜坡挖成平面呈凸字形地窖，坑口小底大，坑壁由里向外倾斜，以坑壁作墙壁。2、房址座南朝北，东西成行，上下两列，每座房屋间有一定距离，平面布局有规律。房屋分居室、门道和门甬道三部分。居室后窄前宽，平面呈梯形，东、南、西三面墙壁都高，北墙壁低矮，门道在北墙壁中部。四面墙壁立面都呈梯形。门道地面与居室地面水平。门道北端两侧各一门柱洞。门道北端与门甬道南端连接处有一台阶，门甬道地面比门道高出8—12厘米。门道、门甬道均呈长方沟形。门甬道口和屋外路面相连。3、居室中部有一圆形或椭圆形烧灶，烧灶面和居室地面水平，或作成圆台形高出地面。在烧灶东或东南侧，有一至三个圆形或椭圆形柱洞。在居室东北或西北隅近地面处，挖一烧火小龛。无烟道或烟囱设施。4、居室、门道、烧灶和小龛底面上，一般都先敷泥面，再敷白灰面。墙壁上一般只敷泥，不敷白灰面。门甬道地面系踩踏路面。有的房屋居室墙壁上敷设墙围（裙），系由地面向上等高度刻画水平线，线痕凹陷，在水平线下另敷抹白石灰浆面。5、六座房屋基址分别座落在两级台地上，其间的落差约10米左右，但都是同一时期的一个聚落居住遗迹。6、由房屋墙壁上部情况、柱洞位置和数目等，推测房屋顶部形状不是拱形窑洞式，而可能是藉坑壁上面架木梁，在木梁架上覆盖植物茎干，在其下用木柱支撑的一面坡形屋顶。这种房屋基址密集，平面布局有规律的聚落遗迹，在关中西部地区属首次发现。

墓葬M2打破F6的堆积层，系长方形竖穴，东西方向，墓底有

两具人骨架。人骨甲在墓底偏西处，人头向西，侧身屈肢葬；人骨乙在人骨甲腿骨右下方，仅有脊椎骨和肋骨，侧身，骨架陈列整齐，没有二次葬或被扰乱的痕迹，人骨乙可能是墓主人骨甲的殉葬牺牲，而且是被肢解后葬人的。随葬品有陶鬲、双耳大罐、无耳折肩罐、双耳小罐、三耳小罐、纺轮；石凿、纺轮；玉斧、锛、纺轮和绿松石饰等。在墓底还发现有朱砂和黑、红色漆器痕迹，黑、红色漆皮痕迹器形不能辨认。这种现象，在关中西部地区龙山文化墓葬中是前所未见的。

石咀头东区遗址所出陶器的陶质、陶色、形制、纹饰和制法等特征表明，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存与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基本相似，同属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戴彤心)

宝鸡市石咀头西区新石器时代至秦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3月27日—7月17日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石坝河乡石咀头上崖，距离宝鸡市区6公里。南北约500、东西约300米。发掘面积332平方米。地层堆积情况，第1层耕土；第2层黄土，为汉以后堆积层；第3层灰土，为西周文化层，发现有马坑、灰坑等；第4层黄褐土，为龙山文化层，发现有房屋基址、窖穴（灰坑）、墓葬等；第5层深灰土；第六层灰土，为仰韶文化层，发现有陶窑遗址、灰坑等。第6层下为红壤生土。

仰韶文化的两座陶窑均残破，有窑门、火道、火膛、窑箅、窑室等部分。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砂质红陶次之，砂质灰陶少，泥质灰陶亦少。纹饰除素面外，有细绳纹、素面磨光、附加堆纹等，还有少数白彩绘陶。器形有钵、碗、盆、罐、瓮、平口尖底瓶等。只在平口尖底瓶颈肩部饰白彩弧线纹。属仰韶文化晚期。

龙山文化的九座房屋基址，发掘清理了八座，其中三座保存较好。平面形状有方形和长方形，房屋基址有半地穴式、地面和低台形三种。长方形房址大者长6、宽5米；小者长4、宽2.6米。方形房址长、宽均为3.08米。房屋地面中部都有一个圆形或圆台形烧灶，在烧灶北侧都有一个柱洞。地面和烧灶面上敷多层白灰面，墙壁上敷泥面或白灰面。四座墓葬，除一座幼儿墓葬用陶罐片作葬具，埋于一个圆形浅坑中外，其余三座均无墓圹和随葬品，都是埋于文化

堆积层或废弃的灰坑中。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还发现三十九个灰坑。

出土的陶器和陕西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岐山双庵等遗址的发现基本相似，都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也可初步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另外，还发现西周时期的马坑一座、灰坑二个，春秋时期的秦墓五座。(戴彤心)

华县南沙村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3年、1984年

工作单位：西安半坡博物馆

南沙村遗址位于华县县城西约5公里的石堤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向南2公里为华县南塬，东南2.5公里为五龙山，石堤河从五龙山西的石堤峪口流出，向西北流经遗址东侧台地下方，同其支流安家河汇合后，向东北约4公里注入渭河。

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发现了商代早期及仰韶、龙山、西周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计有房屋、窖穴、灶坑、墓葬、陶窑等各种遗迹八、九十座；铜、石、骨、陶、玉等不同质地的工具和生活用具约六、七百件，其中工具有戈、镞、矛、铲、刀、凿、匕、针、锥、纺轮、钻、陶拍等，生活用具有鬲、鼎、斝、尊、簋、豆、盘、钵、甑、罐、器盖等多种，另外还发现数十片卜骨。

该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商代早期陶文和陶划符号若干，为我国古文字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商代早期残陶龟一件，虽陶龟头、背皆残，但仍能看出其古朴生动，不失为艺术品；在龙山文化层的一座圆形墓葬中发现两副保存完整的马骨架，骨架埋葬规则，头东，盆骨在西，椎骨在南，腿骨在北，无挣扎状，似属死后埋葬。这两副完整马骨架在全国龙山文化的田野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为龙山文化葬制葬俗的研究、马的驯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另外还在遗址南区发现仰韶、龙山、西周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王志俊)

长武县碾子坡仰韶文化及先周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春季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在遗址中的第一发掘地点继续进行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约675平方米。发现房屋基址、窖穴、灰坑和烧陶窑址等遗迹约二十座。

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计有窖穴（或灰坑）四座，烧陶窑址三座。窖穴多属于口小底大的土坑，上半部为圆形，下半部为圆角方形。烧陶窑址均属于所谓“横穴型”，窑室和火膛的分界明显，火膛位于窑室的前面，火膛底部低于窑室底部约0.6—1米左右。窑室的平面形状为正圆形，底部沿室壁附近挖有一道环形火道。

属于先周文化遗存计有房屋基址三座，灰坑十座。房屋基址的形制，分为以下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种为“土窑式”房基址，这是遗址中常见的；另一种是地面建筑房基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是初次发现。灰坑多为不规则形的土坑，其余为圆形土坑。先周文化遗物出土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主要是属于生活用具的陶质器皿及其残片，其次是各类石、陶、骨质的生产工具及人们食后残余物——各类兽骨。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个圆形灰土坑近底处普遍发现一层厚约8—10厘米的炭化粮食堆积。这类炭化粮食过去在房基址或灰坑里屡见出土，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分类研究室刘亮同志鉴定，炭化粮食为未去皮的炭化高粱。

发掘墓葬十三座，其中有六座是先周墓葬，六座是两周（西周、春秋）墓葬，一座是盛唐时期的墓葬。六座先周墓均挖破先周居址堆积，说明墓葬的年代晚于居址的年代，其中有一座墓出土的陶鬲，与岐邑刘家村第3号墓出土的AI式鬲（M3：1）相同(《文物》1984年7期图版贰，1)，由此可见二者是属于同时期的墓葬，年代约在周先王古公亶父迁岐前后。碾子坡先周居址的年代则应早于古公亶父时期。(胡谦盈)

长安县沣西张家坡井叔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

沣西张家坡位于“鄗坞岭”岗地西段，地势高平。从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丰镐工作队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张家坡村西，西至鄗坞岭西缘，南至西户公路，北至鄗坞岭北缘的东西约600、南北约200米的范围内，共探明西周墓葬一千五百多座，其中包括几组带墓道的大墓。建国三十多年来，沣西张家坡地区已探明和发掘的墓葬，累计总数已达三千余座以上。这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最大的公共墓地。

今年在张家坡村西岗地，又发掘数座带墓道大型土坑竖穴墓。这批大墓分布在1984年发掘的井叔大墓周围，墓室深且广大，南侧均带一条斜坡墓道。M170是一座甲字形大墓，与M157中字形大墓东西并列。墓上部总长20.48、墓室底部长8.76、宽5.6米，上口略小，呈覆斗状。墓底距现存地表9.3米。墓室中部有棺、椁多重，其中内棺绘有华丽纹饰。在墓道和墓室四周二层台上，放置许多木车的构件，有辕、衡木、车轴、舆箱、车轮等。木质构件上装饰有制作精美的青铜车饰。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器、玉器，其中有一些青铜礼器上铸有井叔作器的铭文。毫无疑问，这座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代井叔，与周围其它许多大、中、小墓葬及车马坑、马坑构成一片排列有序、布局完整、主次分明的西周井叔家族墓葬地。

在传世西周青铜器中，有许多铜器铭文涉及到井叔及其家族成员。西周时期，井叔家族居于丰邑，历仕王室，受到天子信用，是勋绩显赫的王朝重臣。现在，布局完整的井叔家族墓地在沣西张家坡地区发现，和西周金文资料相互印证，无论在西周考古、铜器断代、铭刻研究以及西周史研究诸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卢连成)

凤翔秦公大墓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凤翔秦公1号大墓，座落于南指挥乡，是第1号陵园中最大的一座墓葬。通长300米。墓室口部宽138.8、长59.4、底部长40、宽20、墓深24米。东基道长156.1、西墓道长84.5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是我国目前所知先秦时代最大的土圹木椁墓。墓室中环绕墓壁有三层台阶，宽度1.5—6米，第三台阶中部为椁室。

自1976年冬开始发掘，至今十个年头，下挖平均深度2 2米，今年下挖2米，即将进入椁室清理阶段。在发掘工作尚未进入椁室以前，已出土了二千多件文物。其中铁器（铲、镈、锸）三十一件，金器（金珠、金环、金泡）十二件，铜器（磬锤柄饰、铜削、铜铃等）三百六十七件，陶器二百二十六件，玉石器（璧、圭、璋、玦、鱼、磬）一千二百八十件，其它六百九十件。

大墓发掘到第三个二层台，开始显露出秦公大墓的布局情况。木椁在墓室正中部位的土圹内，范围约8×16.5米。木椁有三层椁板与诸侯王身份相符，至今大部保存完好。在第三个二层台上，有“箱殉奴隶”五十多个，有“匣殉奴隶”五十多个，填土中还埋有许多人牲。今年还发现石磬残块二十八块，其中带字的二十二块。磬上所刻“龚桓是嗣”及“高阳有灵”等文字，提供了秦人自称华夏民族及墓主人可能是秦景公的证据。

在陵区钻探方面，新发现四个陵园。尤其重要的是M37的墓室上，发现一座墓上建筑遗筑，为秦陵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长安城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今年主要对汉长安城未央宫、长乐宫和长安市布局进行了勘探。

已经勘探出的未央宫宫内主要道路有五条（其中两条南北路为1985年以前勘探出来的)。贯通未央宫的东西向干路发现两条，分别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南北两边。这两条路的东西两端分别穿过了未央宫的东西宫墙；从而这也就确定了未央宫东、西门的位置。1985年以前，曾在未央宫前殿遗址东侧，与其南北相对各探出一条南北大路，它们分别通至未央宫的南、北宫门。1985年，又在未央宫西北部，北宫门以西800米勘探出一条南北路，其北端穿过未央宫北宫墙，与直城门大街相交，南端与未央宫前殿遗址北边的大路相汇。这是未央宫内的一条重要的道路，为研究未央宫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

长乐宫的中部钻探出一条东西横贯全宫的干路，此路的宽度与过去勘探出来的汉长安城内八条大街相近。这条道路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确定长乐宫的东、西宫门（即东、西阙）位置。在这条东西干路以南，又勘探出南北向道路两条，以及大型建筑遗址群三组。

一条南北路是由复盎门，经过长乐宫南宫门向北与长乐宫的东西向干路相交；另一条南北路在长乐宫西宫墙以东600米，南端穿过长乐宫南宫墙，北端在长乐宫东西干路南邻。

已勘探出的长乐宫三组大型建筑遗址群，尤以最东部的一组建筑遗址群规模宏大。从其平面布局来看，建筑物坐北朝南，由阶、庭、朝、寝组成。它可能是长乐宫的主要宫殿建筑遗址之一。

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又对“长安市”的布局进行了勘探。通过进一步开展工作，更加确认“长安市”的地望就在汉长安城西北部。在横门以南已勘探出的一组大型建筑遗址群，其范围长、宽各约300米。主体建筑在此建筑群的中央，东西147米，南北56米。它应该是长安市的重要建筑物。以横门大街和这组建筑群为界，将长安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大概就是汉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从目前勘探已掌握的材料来看，西市之内有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址。(刘庆柱)

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

调查时间：1985年2月

陶俑作坊遗址位于六村堡村东南，面积约14000平方米，部分已覆压在现代建筑之下，历年来不断有陶俑、陶制动物模型以及陶范残件出土。

这次调查采集的有裸体陶俑躯干九件，其中可判定男俑者三件，女俑一件。俑头六件，均无冠，分三种发式。此外还有骑马武士俑残件，穿袍，右衽，袍上施红彩，腰束带；直立着袍小俑，右衽，全高约18厘米；通体上彩俑，陶俑手臂残部，平举，拳心空握，应持有兵器等。陶制动物模型有残马头、牛蹄。兵器模型有戈，全长5.8厘米。发现的钱范有无字的阴面范和有“五铢”二字正书阳文的正面模。

裸体陶俑的发现是这一遗址的特色，其形制、规格与杜陵1号陪葬坑出土的完全相同。推测，这些陶俑的制作地点有可能是汉长安西北区的陶俑作坊，其繁盛的年代当在西汉晚期。(摘自《文博》1985年3期)

商县张嘴头村西汉墓

发现时间：1985年4月18日

墓葬一座，位于商县孝义乡张嘴头村的“汉代古城文化遗址，由农民取土时发现。墓呈长方形竖坑，长2.1、宽1.7、深1米。墓主系男性，五十岁左右，头北脚南。头下殉枕一百枚新莽半两钱币，钱币中置一颗牛形纯金带钩，重66克。腰部悬挂飞龙型玉佩饰，玉环，玉带饰有一只龟形铜带钩。左上方置铜剑一把，长85厘米，至今不锈，右上方置铜戈一支。随葬器物还有铜壶、铜釜、铜钫、铜镜等。（摘自《陕西日报》1985年5月12日）

耀县草滩汉代大型铁釜

发现时间：1985年

铁釜七件，由农民在瑶曲乡草滩大队发现，其中两件保存完好，且形制各不相同。一件为侈口、平沿、反唇、平底，肩下有钉盖纹饰和四面花草图案，口径58、内深40厘米，肩部附铺衔双环，三蹄足。另一件为敛口、束肩、深腹、圆底，肩上至口沿有线圈纹饰，肩部附铺圈带平沿，口径49.5、内深42厘米。此外在发现地，还发现有红蓝两色烧土、冶炼铁渣和铁渣沾烧炉块状物等。推测这里是军辎炊器铸造之地。（摘自《陕西日报》1985年10月24日）

耀县药王山隋墓

发掘时间：1984年11月19日—1985年6月30日

工作单位：陕西省文管会、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墓葬一座，位于药王山南庵院中，座东面西，方向270度。墓由墓道、前室、甬道和后室四部分组成，东西长11.64、前室南北宽5.4米，墓上半部已被破坏。在墓道后部东口北端处，发现一石门墩，应是原来安置墓门的地方。前室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随葬品已被盗空。甬道连通前后两室，东西长1.8、南北宽1.68米。在甬道的中部偏后处发现凿有两个对称的方形框槽和圆形卷窝的石门槛。后室平面为不规则方形，其后部正中，放置石棺床。棺床为

长方形的须弥座形式，下有底座，上置石棺。在须弥座的前方及北部发现有被毁坏的残佛像一尊，残菩萨像三尊、菩萨头一个及残僧人像两个。后室东南角的南壁下部发现盗洞一个，中出有石棺盖残块一件和无头小菩萨像一尊。

发现的石棺，造型精致，体积比较小，是骨灰棺，棺内制作粗糙，没有经过磨制加工，应是骨灰棺的外棺，即套棺。须弥座和石棺上的花纹，华丽精美，雕刻内容丰富，花纹以串枝花纹为主体，雕刻成美丽的团花图案，在莲干和莲花枝叶上下，刻有人物、飞禽、走兽。根据墓葬形制比较大、棺床为须弥座及须弥座和石棺上的花纹佛教色彩浓厚等，可知墓主人系地位较高的一位和尚。在出土的一件残观世音像的底座前方立面上，刻有“大隋大业三年岁次丁卯三月己酉朔二十五日甲戌，……敬造观世音像一区，……”等八十三字，在底座左边立面上及右边立面上也分别刻有十四及十七字。说明了造这尊观世音像的时间和主人。

发现的石刻葬具是隋墓出土的石刻艺术的精华，为研究隋代的历史和石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摘自《文博》1986年1期）

临潼县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

发掘时间：1985年5月
工作单位：临潼县博物馆

精室位于县属砖瓦厂南原，取土时发现，为一座砖砌券室，据出土的“上方舍利塔记”碑，知这座券室原是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下安置释迦如来舍利的精室。

精室面骊背渭，正南北方向。平面呈甲字形，由斜坡道、甬道和主室三部分构成。斜坡道全长4.67米，甬道连接斜坡道和主室，在甬道的后段内壁绘着彩色壁画。舍利塔记碑竖于甬道口正中央，线雕石门安装于甬道和主室之间。主室南北长2.07、东西宽1.47米，面积3平方米余，北、东、西壁皆有壁画。主室和甬道地面全用35×35厘米青砖墁铺，砖面遍刷红丹。主室中间置一工字形须弥座，为宝帐棺床，石雕舍利宝帐置于其上。宝帐中空，内置金、银棺具。棺具由鎏金珍珠工字须弥座和镶以环宝的银椁金棺组，金棺置椁内，椁置须弥座上，通高28厘米。棺内有两个分别高4.5厘米和2厘米的绿色玻璃瓶，瓶内装有用小米粒大小的白色水晶石制成的

释迦牟尼骨灰代用品。宝帐前等距离地东西一字儿摆着三个三彩供盘，中盘内置一个三彩南瓜，两边盘内各置四个玻璃供果，盘间放两个彩绘陶瓶。陶、瓷器物置于宝帐东、西两侧，金、银、鎏金银、铜器均置于须弥座前的地面上。

出土器物总计一百二十七件，其中石质三件，白瓷器三十五件，黄瓷器二件，黑瓷器四件，三彩器六件，黑陶器一件，彩绘陶器二件，金、银器（包括鎏金、鎏银器）四十八件，铜器十六件，铁器三件，玻璃器七件。发现壁画五幅。

庆山寺是隋唐时期佛教在昭应（今临潼县）地区的名刹。释迦如来舍利精室，砌筑考究，出土文物丰富，弥足珍贵，它的发现，对研究佛教史、唐代绘画、线雕、建筑艺术、金属铸造工艺、玻璃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诸方面，有着极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摘自《文博》1985年5期)

淳化县唐代石窟

调查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咸阳市博物馆、淳化县文化馆

石窟位于淳化县石桥乡冶峪河南岸石崖中，窟室高8、宽9、进深5米。后壁正中，有残存身高5、座宽3米的半圆雕佛像一尊，两侧各有一尊胁侍像的残迹。佛像的背光沿上，有六尊浮雕小佛像。石窟左右两壁各分上下七层，刻满字径为1.5厘米的正书经文。左壁刻文除小部分被宋代政和年间游人的雕字题记破坏外，均清晰可辨。内容有《妙法莲花经》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右壁刻文内容为《佛说大方广轮经序品第一》字迹也较清楚，但窟壁的沉积细砂岩易被风化，部分石壁的表层已成粉末状，文字触指即毁。(摘自《陕西日报》1985年6月13日)

西安唐长安西明寺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

西明寺是唐代名刹，建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即现在的百庙村西南。配合今年开探方38个，发

掘面积7,500平方米。

从已发掘揭露出来的遗址平面布局上看，中部及北部是一个主要院落，在主院的南边，分列着东南院和西南院，两院之间由一条夹道隔开，院落的东边是寺院的东院墙。由于发掘范围的限制，三个院落都没有揭露完整。主院的中心建筑是一座殿址，现存殿址的夯土台基高0.9—1.29、东西50.34、南北32.15米。台基的南侧有两个踏步，当为"左右阶"。台基的北侧正中有一道北伸的夯土，东西宽6、残高0.9米，推测是与北面建筑相连的廊房。殿址的南边是院子，东西59.3、南北26.5米。院子中心偏北有石灯残迹。在殿址和院子的东、南、西三面围有回廊。东廊南廊的夯土基址宽6、西廊宽9.7米。主院内的排水设施齐全，南廊夯土中埋有两条排水陶管道，院内有砖砌的明排水道和渗井。主院的北部还没有揭露。发掘中除了出土大量的建筑材料和陶瓷片外，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佛教遗物，例如鎏金铜造像一百多躯，佛像贴面砖六十余块，碑刻残段七块，石造像残块多件和刻有"西明寺""石茶碾"六字的残石碾。

这次发掘，尤其是带有"西明寺"铭文的石碾的出土，证实了西明寺的位置。殿址及周围回廊的发现，证明了唐代寺院是以庭院为单位的建筑群构成的。这次发掘面积仅占西明寺遗址的十几分之一，搞清西明寺的全貌还需要继续发掘和全面钻探。

据记载日本平城京大安寺是按唐西明寺图样建造的，因此西明寺遗址的发掘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安家瑶）

铜川黄堡耀州窑址

发掘时间：1984年秋—1985年

工作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这次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唐三彩作坊一组三座，三彩釉试烧水炉灶一座，唐代瓷坯作坊一座；宋代瓷坯作坊和施釉作坊三组六座，瓷窑七座，贮藏瓷器的窑洞一座，以及加工原料的碾槽、堆料场、晾坯场等遗址。出土了唐三彩和低温单彩标本千余件，唐、五代、宋、金、元各代瓷器和瓷片二十万件片，其中完整和可复原器物及印花范模、支垫匣钵等近千件。发现的唐三彩和作坊遗址是目前在全国发现的瓷窑址中制作工序设施最完备、保存最好的.

标本类型也最丰富。从可复制的上千件遗物中，新发现了低温釉瓷、镶嵌及曜变等产品，弥补了国内瓷器研究方面的缺环，新发现的产品，不仅提供了唐、宋、金、元各代的断代标准器，还将耀瓷烧造年代提前到盛唐时期。过去国内外错定为龙泉、汝窑等窑口的瓷器，经与此次发掘的瓷片勘对，均属耀窑窑口。

宝鸡市宋代古钱

发现时间：1985年

窖藏古钱发现于人民印刷厂基建工地，总重量8400多公斤。古钱用细麻绳一串串穿起，放在窖内，出土时，成串凝结在一起，绝大部分已被腐蚀氧化。清理中发现有熙宁通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寅和通宝九个品种。其中崇宁重宝、崇宁通宝为宋徽宗亲笔御书楷体字，大观通宝为御书瘦金体字。(摘自《陕西日报》1985年11月16日)

甘 肃 省

天水市师赵村半坡类型大房屋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

今年继续对师赵村遗址进行发掘，新发现一座半坡类型的大房屋。

该房屋发现在T14探方内，被压在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文化层之下，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方向180度。

房屋分门道和住室两部分，门道在住室之南，平面长条形，南窄北宽，呈喇叭口状。长2.7、宽0.55—0.7、深0.2—0.7米。底部从南到北逐渐低下，质硬平坦，似经拍打。中部有路土痕迹。

住室平面长方形，壁略向室内倾斜。南北7.5、东西7、深0.6米。四壁和居住面涂敷一层草泥土，厚约0.05米。前者草泥土延伸到门道两侧壁，均光滑平整。室内经过人工火烤，故草泥土表面显得坚硬异常。近门处有一圆形平底灶坑，径1.5、深0.3米。灶

口围筑草泥土塄一周，高约0.1米。土塄北侧中央有一半圆形突出土台，台下置人火种陶罐一件。灶之南侧留有通风口，恰与门口相对。居住面上近四隅有圆形柱洞各一，尺寸相同，径0.3、深0.4米。从柱洞排列看，可复原成四面坡攒尖顶式房屋，它的发现为研究甘肃地区半坡类型房屋建筑提供了新颖的资料。(赵信　王吉怀)

庆阳县疙瘩渠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9—12月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遗址位于西锋镇西南15公里王咀村附近，文化层暴露面积约16000—20000平方米。这次发掘面积197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有12层，2—7米不等。已清理出房基八座，其中四座较为完整，灰坑十六个。

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和双间“吕”字形，面积多是16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一座为30多平方米，居住面和半地穴四壁均抹一层厚0.2—0.3厘米的白灰面（皮），表面平整光滑，白灰下施一层草拌泥土，草拌泥下为填平经夯打过的地面，土质十分坚硬，有的房屋地面还有柱洞。室内中央近门处都设置一个火塘，一般高出地面10多厘米，上面有火烧痕迹。有些房屋外边有夯土墙遗迹，被后期破坏，已不知其原高。门口多开在南边，宽约60厘米。有的在门口前建成“门斗”状。房屋遗迹堆积较厚，有的房屋居住面堆积三、四层（间隔为6—20厘米），说明人们曾有过长期的定居生活。灰坑为圆形，一般底部略大于坑口，有的较深，约4米余。

出土遗物有石斧、石刀、纺轮、骨笄、骨镞、骨针以及大量的陶器残片。陶器器类主要有平沿小口尖底瓶（纯角底）、宽平沿盆、盘、罐、缸、瓮等。通常在宽沿（盆）的里面画各种图案。陶器纹饰多横篮纹和绳纹，有个别方格纹陶片。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

此次发掘，对于陇东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建筑、文化特征以及它与“常山下层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赵建龙)

武威市五坝山古代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6—9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武威市文管会

继去年之后，今年又一次进行发掘，这次共发掘墓葬三十六座，其中马家窑文化墓葬一座，两汉墓三十四座，魏晋墓一座。出土各类随葬物三百余件。

马家窑文化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单人仰直葬，随葬品有彩陶罐、盆、石祖、服饰等。

两汉墓均为土洞墓，大多数为二人合葬，单棺无椁。从器物特征分析，以王莽时期的墓占多数，东汉墓次之。出土物有陶钟、罐、奁、盘，铜镜、车马器、货币、铁刀、金头饰等。陶器有组合规律。

魏晋墓也是土洞墓，但形制比汉墓小，出土物不多，以灰陶罐为主，单人葬，松木棺，棺板连接处用铁钉加固，棺盖上用墨笔画有简单图案。

这次发掘更加丰富了两汉时期的墓葬资料，对整理整个墓地的发掘报告增添了不少新内容。这里墓葬很密集，发掘尚未全面结束。（何双全）

敦煌祁家湾汉至唐代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8月2日—11月11日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祁家湾墓群位于敦煌县城以西7.5公里的戈壁滩上，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内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古墓葬，时代从汉至唐，是敦煌境内较大的古墓群。为配合基建，在墓群的东部即铁家堡大队以西进行了清理发掘。

清理的一百一十七座墓葬均为砂砾岩洞室墓，地面有封土，墓向有东、西、南三种。整个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狭长，呈斜坡状，宽0.9—1.35、长6—32米，一部分墓道还带有过洞、天井。甬道一般长约1米左右，墓门多用土坯垒封。墓室根据形制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双室墓，即前后两室，前室平面呈方形，长宽约3米，后室呈长方形，长宽约2×1.5米。顶均为覆

斗顶，顶部中央有藻井。前后室各置一棺，随葬品多置于前室。第二种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形，长宽约3米，一般都有耳室或龛，大部分都在右下角。顶为覆斗顶或穹窿顶。这种墓多为双人葬，墓室左右各置一棺，随葬品放在墓室前中央。第三种亦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刀形，长宽约 2×1.2 米，顶为拱形顶。这种墓墓道与甬道的界线不很明显，均为单人葬，随葬品多置于墓室右侧。这三种墓葬的葬具多为木棺，个别小墓用苇席裹尸。棺大部分置于用草木灰羼土和成并用木条隔成棱形块状的棺床上，棺木大部分已朽。

出土的随葬品有陶、铜、铁、银、木、石、骨、泥、画像砖等，共计一千一百余件，此外，还出有大量的铜钱以及料珠、丝织品、草席编织物等。随葬品以陶器最多，约九百三十余件，器形有碗、钵、碟、盆、壶、瓶、罐、樽、甑、盘、灯、仓、多子盒等。金属制品出土较少。发现的一些铜、铁、银器多是削、叉、镜、笄、簪、镯、指环、带钩等。

这批墓葬中有一部分出有朱、墨书纪年瓶，已初步辨认出太康、元康、升平、建兴、建元、建初、神玺、泰熙、玄始等年号，可以看出，这批墓葬大部分为西晋和五凉时期的，其延续时间从最早的太康六年（公元286 年）到最晚的玄始二年（公元413 年），前后约一百三十年。

敦煌境内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在此之前也有过几次发掘，但规模较小。这次发掘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出土器物也较丰富，加上墓葬年代清楚，为研究敦煌及河西地区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张珑）

武威市九墩乡汉与明代长城及其烽燧遗址

调查时间：1985 年5月28日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九墩乡位于武威市以北约 30 公里，紧连民勤县界，东面为腾格里沙漠。洪水河在沙漠边缘从南向北流过。武威市境内的长城均沿这条河修建。东起土塔，与古浪相接，西北止平乐，与民勤相连。河东岸的长城均用土质夯筑，大约1公里便有一座烽燧，其形制、建筑技术等方面与永昌、山丹等地的明代长城和烽燧相同。河西岸

的长城保存不好，部分地段已无存，仅有部分烽燧遗址，这些遗址的形制与河东岸的有所不同，遗址内出土物较为复杂，有汉代中期的五铢，唐开元通宝，也有宋代瓷片，但不见明清时期的遗物。故推测，河西岸的烽燧始建于汉代，河东为明时期的长城和烽燧。(何双全)

武威市旱滩坡西晋、前凉时期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5—8月
工作单位：甘肃省文物队、武威市文管会

墓群位于武威市以西7公里处的松树乡三畦村，地处祁连山山前坡地冲积扇上，地表全是砾石。坟土顶部和墓道口都竖立大石为标志。墓葬有土洞、砖室两种，结构大体相同，均由长方形单室、甬道、斜坡墓道组成。墓室顶有穹窿、拱形两种。不同之处是砖室墓的盖室为盝形顶，墓门外用砖砌成仿木建筑式的照壁。

这次共发掘墓葬二十八座，出土各种遗物七十余件，有陶器、铜器、木器、漆器、铁器和丝织品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朱书纪年罐如纪年木牍、铜镜、彩绘木马、连枝灯、屏风、俑以及绣花披巾、毛笔等。

这批墓葬根据纪年，确定为西晋初至前凉时期。它的发现对研究河西地区汉晋墓的分期断代和前凉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田建)

青海省

西宁青海砖瓦厂汉代墓葬

发现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墓葬一座，位于青海砖瓦厂内，取土时发现。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规模较大，出有尸骨一具，铜印一枚，象牙梳一件，玉簪一件，金鸟饰一件，包金蚌壳杯一件，还有金圈、铜饰、铁剑、玉珠、铜钱等。从铜印看，墓主系将军。(摘自《青海日报》1985年12月26日)

都兰县吐蕃祭祀遗址

发掘时间：1985年
工作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祭祀遗址位于都兰县热水地区唐代吐蕃墓群中一座大墓的南面，东西长85、南北宽40米，由二十七个祭祀坑和五条祭祀沟组成。坑和沟上面均用石块圈砌，部分石块显露地表。祭祀坑位列两旁，祭祀沟横列中央，遗迹排列整齐。坑内殉有牛头、牛蹄、牛鞍和完整的狗骨，共计十四头牛和八条狗的个体。沟内殉有完整的马匹近九十匹，在1号沟中部还发现金片制成的孔雀和装饰品等。

这处遗迹的发现，对于研究吐蕃贵族墓葬的葬制，制定大墓主室的规模等具有重要价值。(摘自《青海日报》1985年10月16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

海原县菜园新石器时代墓地

发掘时间：1985年7—10月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墓地在菜园村东约2000米南华山北麓的籍刀把。南依南华山，北有照壁山、龙背沟东西平行西去，东临龙背沟冲沟。面积约10000平方米。这次发掘探方七个，共175平方米。发掘墓葬十七座，出土随葬品一百八十余件，清理完整人骨架五，头骨二、下颌骨一，肢骨、牙齿等十余件。随葬器物与调查采集所获，可分为陶、石、骨器三大类，总计在二百件以上。一百八十余件陶器中，彩陶罐五件；骨器中有骨锥一件，骨角装饰品二件（其中一件附绿松石）；骨珠一颗（系采集）；石器中有石斧二件，石凿刀一件，刮削器1件，皆系采集。17号墓扰乱层中曾出土拇指盖刮削器一件。发现物表明，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董居安）

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7月31日—9月26日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这次发掘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同心县文管所的大力协助下进行的。开掘探沟六十六条，发现并发掘古墓二十七座，其中南北向二十六座，头皆向北，东西偏差均在20度以内；东西向一座，头向西。出土金、玉、玛瑙、绿松石、骨、石、陶、铜、铁等质料的遗物近千件，尤其是雕镂精美、造型生动的透雕铜牌和刻划波浪纹小口高领罐最具特色。

古墓分为竖穴土坑和土洞墓两种形式，土洞墓的竖穴墓道底部和填土中普遍用牛头和羊头随葬，兽头的分布极有规律，显示出浓厚的游牧民族风习。这些墓中，几乎全部发现用汉"五铢"铜钱随葬，从字形和铸造工艺上看，其时代不会早于汉宣帝。结合地望、历史文献和埋葬习俗可以基本推断这是一处汉代匈奴墓地。经鉴定，男女老幼均有，葬具完备，随葬品摆放秩序井然，毫无疑问，这是一处自然死后的墓地。

如此规模的汉代匈奴墓地，在本区还是首次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这次发掘对于揭示"匈奴文化"的基本内涵、探讨匈奴族的生产、生活和葬俗，以及与相邻地区汉民族的关系，无不具有有益的启示，同时对于解决考古界历来争论的透雕铜牌的用途问题，也提供了可靠的实证。(李进增)

盐池县张家场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8月27日—9月10日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墓葬位于张家场村西2公里许的红墩子沟。这次抢救性发掘了八座，出土文物九十余件。

八座墓分为砖室、石室、土坯、土洞墓四种类型。墓葬结构皆单室，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斜坡式，门呈拱形，墓室长3—5、宽2—3米。砖室墓券顶，顶部塌陷形制不明。墓室内置木棺葬具，棺均朽腐。葬法有单人葬、二人葬两种。墓内随

葬品多少不一，多者二十余件，少者二至四件。

八座墓早年被盗，加之严重坍塌，随葬物多被扰动，且破碎不全。陶器五十余件，计有罐、仓、灶、壶、鼎、博山炉、盘、焦斗等；铜器有釜、甗、勺、车马饰件和一枚印章；还残存有锈铁器、蛋壳、盐块、五铢钱和大牲畜骨骼等。

张家场古墓既有中原地区东汉墓葬的明显特征，如墓葬形制、陶器组合，同洛阳烧沟东汉墓几乎一模一样；又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造型独特的陶扁壶、铜甗等在中原地区极为少见。据史料记载，秦汉乃至南北朝时期，张家场一带一直是汉、匈奴、羌等民族杂居的地方。张家场汉墓的发现，不仅为史料记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研究这一地区汉代时期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何继英）

海原县胡湾汉墓

发掘时间：1985年8月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墓葬位于海原县城西北约20公里处，附近有大小坟十多座，估计这里是一处墓群，该墓就座落此墓群北边的半坡地段上。墓全长14.5米，由墓道、墓门、前后室组成，为砖室结构，墓道呈斜坡式，长7.8、宽1.4、深0.1—2.4米，方向315度。墓门有“人”字形封门砖，门为拱形，高1.15、宽0.9、厚0.74米，从高0.8米开始为双层券顶。墓室为前后室，发掘前已经严重盗扰，前室呈近似正方形，长2.85、宽2.65、残高2.1米，穹窿顶，顶部已残。室内四角距室底1米高处，有四块半圆形砖做成的灯台，室底以长方形砖铺为“人”字形地面，室内经过清理，未发现任何遗物。前后室之间为高1.05、宽0.9、厚0.43米的拱形墓门，后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8、宽1.9、高1.82米，纵券顶，铺地方法与前室同。后室内无葬具，骨架零乱无法辨认葬式，从发现的肢骨及盆骨等分析，估计可能为男性。

后室内出土器物有货币二十七枚，均为圆形方孔的五铢钱。七窍塞三枚，石质为蓝色透明状。粗白玉二块，一块呈方形，边长4.5厘米；另一块呈长方形，长60厘米，宽3厘米，厚2厘米，陶罐一个，已残。

据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判断，时代为东汉。(田建国)

盐池县窨子梁唐墓

发掘时间：1985年6月20日—7月15日
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窨子梁唐代墓葬群地处苏步井乡镜内。这次发掘的六座皆为平底墓道石室墓，依山开凿，形制较为特殊。六座墓中，有单室、双室和多室，都流行壁龛。龛内葬尸或放置随葬品。其中除一座墓内发现使用木棺外，其余各墓皆无葬具。

这批墓葬由于早年被盗，出土的随葬品不多。发现的主要遗物有：木俑二十余件，陶罐一件，石鼎一件，玻璃球二件，货币三枚，石刻墓门一对，墓志一盒。

从窨子梁唐墓的形制和出土遗物来看，时代为盛唐至中唐。据出土的各种人像俑和动物俑以及志文记载分析，估计这是一处唐代少数民族（可能是回纥族）的墓葬群。

唐代墓葬目前在我区还很少发现，窨子梁唐墓群的发掘，不仅为我区的唐代考古增加了新的资料，而且对研究我国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吴峰云)

灵武县磁窑堡西夏窑址

发掘时间：1984—1985年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1984 年秋，我队在瓷窑遗址上进行了试掘，开探方三个，发现作坊遗迹一处，清理窑炉一座，同时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和窑具。1985 年秋在此又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开探方五个，发现作坊遗迹三处，清理窑炉三座，出土了大量的遗物。

通过两次发掘，对此窑址有了初步的了解。1．此窑始烧于西夏时期并一直延续到清代。目前所开八个探方出土西夏遗物较为丰富，其时是此窑生产的重要时期。2．此窑产品种类繁多，有白釉瓷、褐釉瓷、黑釉瓷、青釉瓷、绿釉瓷等。在产品中既有生活用具，又有各种雕塑艺术品，还有建筑材料等。其中有些是当地民族所特有的产品。在宁夏、甘肃、内蒙等省区的很多地点均发现有此窑产

品，说明磁窑堡曾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生产瓷器的中心。3．此窑西夏时期的产品为西夏瓷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可靠的实物资料。西夏瓷将在我国瓷器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马文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轮台县群巴克两汉时期墓群

发掘时间：1985年9月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

墓群位于群巴克乡西北约2公里的戈壁岗丘上。1984年4月发现。这次发掘了位于墓地东北部的四座墓葬。它们都开凿于戈壁砾石层中，竖穴土坑。墓室平面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墓室顶部都铺有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圆木或芦苇、芨芨草等，其上再覆盖戈壁砾石或沙土，形或大小不一的封土堆。从已发掘的情况看，墓葬形制有两种：一是墓的规模较小，只有封土堆和墓室组成，四周也无附葬墓；另一种是墓的规模较大，由封土堆、墓室和墓道组成，墓室外侧的西、北两面有祔葬墓。

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木器、石器、骨器和毛织品、铁器等。陶器主要有罐、钵、杯、碟和纺轮。罐可分带鋬单耳罐、敛口或侈口单耳罐、双耳罐、直口罐。在少数陶器的口沿及肩颈部涂一层白色陶衣，其上用赭色绘三角形花纹。青铜器主要为小件，有镞和耳环等。木器有盘、盆和纺轮。石器有磨石、锥子、珠子。骨器有珠子和雕刻品。毛织品大多已烧成炭，但尚可辨认出平纹及斜纹布数种。铁器多已锈蚀，主要是小刀。

无论是随葬器物种类、主要器物特征，还是葬式、葬俗，该墓地同和静县察吾呼沟口1号墓地可能同属一个文化类型，但其年代稍晚于前者，相当于中原的两汉时期。

从地面上现存的封土堆看，这一墓地约有百座左右。在该墓地东侧约500米处的戈壁岗丘上，也有外形和该墓地相同的墓葬三十余座。在该墓地西约200米处，还有类似的封土堆墓近十座。(孙秉根　陈戈)

温宿县包孜东突厥墓葬群

发掘时间：1985年6—7月

工作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阿克苏文管所、温宿县文化馆

墓群位于温宿县包孜东乡包孜东村西北，东径80°45′，北纬40° 44′57″—58″，海拔高度2180米。墓葬沿一条冲沟边缘由东南弯向西北断续成组排列，最多聚集约十座，少者一、二座。就地表观察有五十八座，这次清理发掘两座。

M41为石堆树葬墓（或称丛葬），地表堆有少量砾石。墓室为椭圆形竖穴，长径3.4、短径2.6、深约1米左右，葬有二十余具不完全的个体骨架。随葬器物一百五十余件，其中陶器有带流圜底器、盂、、盘、杯、带流罐、单耳罐和鸭形壶，陶色多为灰色，器表抹光，带流器较多，许多器形在新疆尚属首次发现。铜器有贝、饰扣、笄、扣、戒指、珠、手饰、钉和镶饰片。铜器中动物饰扣较多，动物造型有鹿、羊、鸟、狮。铁器有镞、牌、三角器、刀、钉、饰片、带钩。骨器有各种刻花和雕刻的骨饰及贝、笄、珠、带扣和兽牙饰等。石器有石砺、小雕、玛瑙珠和玻璃珠。金器有耳环和金珠等。此类墓葬在新疆各地还未曾发现过。M1是石堆石人墓，已盗。墓前石人已被移至温宿县文化馆保存。据说发现于墓东约81米处，系用细砂石圆雕制成，通高1.25、最大宽0.37、厚0.115—0.2米。石堆平面呈圆形，高2、直径22米，周围还平铺着砾石和片石。石堆下部为竖穴长方形洞室，已盗空。在发掘石堆时，于石堆内东端距堆顶0.84米处又发现了一葬室，而且石堆系一次堆积，室壁及室顶均砌有石板，顶部石板刻有O、X突厥字母，显然是与下面墓室同时建成。这座墓室亦长方形竖穴，葬一男性成年个体，仰身直肢，无随葬品。（王博　常喜恩）

台湾省

苗栗县新发现十二处史前文化遗址

发现时间：1985年

在鲤鱼潭水库施工过程中，新发现十二处史前文化遗址，其中有一处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大都保存相当完整，出土文物主要有打制石斧、石锄等，与台湾其他地区出土的石器不同，近似于大陆东南部地区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距今约一万年以上。这是台湾地区继长滨和垦丁之后发现的第三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台湾北部山地系统文化内涵、分布和史前民族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潮边)

屏东县南和村石棺群

发现时间：1985年

石棺群位于屏东县来文乡南和村海拔约130米的山坡台地上，石棺朝向正东，长1.86米，两边宽分别为0.44、0.42米，高0.26米，石板质为细砂岩。石棺内的分布及平躺式的埋葬，不同于附近的蹲坐式埋葬，出土有石器。这处石棺可能是三千年前的遗存。目前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5年10月5日)

澎湖白沙岛南宋汉人房基

发现时间：1985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澎湖县白沙岛发现南宋时期汉人用卵石建造的一处房基，长约15米，宽5米。这是目前在台湾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汉人建筑遗迹。此外，在澎湖县的吉目屿、渔翁岛等三十二个岛屿的九十二个地点发现了古代文化遗迹、遗物，其中有史前时期的陶片、石器，还有宋、元时期的陶瓷器、铁器、硬币等。(潮边)

台南县北门乡铜鼓

发现时间：1985年

在台南县北门乡南鲲身庙发现一面铜鼓。铜鼓高46厘米，鼓面直径60厘米，中心部分著太阳纹饰，四周环踞立体的蛙饰。台湾文物工作者认为，这面铜鼓是三百年前由大陆南方作为战鼓的信物被带入台湾的。此种铜鼓在南方各地已多有发现。（潮边）

文物工作展览学术会议

文物工作

文化部文物局召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座谈会

1985年1月16日至1月22日，文化部文物局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区的代表及国家经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部分大专院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十四个省区1984年度考古发掘情况及近年来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并就配合基建工作如何与考古学术研究相结合、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程序及如何编造为配合基建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的经费预算等问题交流了经验。代表们认为：配合基建进行考古工作是当前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必须贯彻“两重两利”的原则，抓紧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主动及时地了解基建动向，同时要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尽快改变目前考古队伍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状况。

会上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作了讲话，苏秉琦、俞伟超就有关的学术问题作了报告。(王军)

国内展览

安徽省文物普查暨珍品展览 1985年2月1日，安徽省文化厅主办的安徽省文物普查暨珍品展览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展出。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历经两年的时间，查明各类文化遗址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三处，流散文物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件，获得了大批的实物资料。这次展出的是普查中的珍品，有古人类、动物化石标本和石、陶、瓷、青铜、玉、漆器，以及竹简、字画和契约，共约一千九百三十余件，按地市行政区分段陈展。这是我省解放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大型的文物珍品展览。

镇江文物精华展览 1985年5月27日至8月28日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镇江市文管会和镇江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镇江文物精华展览，在中国历史

博物馆展出。

展览反映了建国以来镇江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共展出自石器时代至明清的文物二百零六件。其中有富于地方色彩的西周、春秋时期青铜器，如凤尊、鸟纽盖壶等；有多姿多彩的六朝青瓷，如堆塑谷仓罐、鸡首壶、虎子等；有工艺精湛的唐代窖藏银器，如鎏金银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等等；有保存完好的宋代丝织物和釉色匀净的影青瓷等；还有传世的明清书画，如明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文征明的巨幅山水画轴、杨继盛的墨迹等。这些稀世珍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镇江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陈瑞德)

中日货币展览　1985年11月1日至20日，中国钱币学会、上海市钱币学会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日货币展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日本大藏省造币局泉友会顾问、原局长吉野实为团长、造币局泉友会理事长忍泰男和日本经济新闻事业部长松原秀行为副团长的日本货币展览代表团专程前来参加了开幕式，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吉田重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耿道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千家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文、上海市钱币学会名誉会长马飞海、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方行、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展出日本货币文物五百五十五件，其中日本飞鸟时代的无文银钱和奈良时代的开基胜宝金钱等都是日本国宝文物和重要文化财富。展出中国货币文物五百七十二件，有战国金版、莒刀币、金元时代的钞版和宋以后的母钱、样钱等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文物是第一次公开展出。

展览展出二十天，接待观众一万七千二百余人。展览结束后，全部日本货币文物展品运回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点交。(据《中国博物馆通讯》1986年2期)

陕北东汉画像石刻艺术拓本首次在西安展出　1985年11月中旬起，陕北东汉画像石刻艺术拓本展览在西安碑林正式展出。

展出的一百八十七幅东汉画像石拓本，是从历年陕北地区出土的六百余块之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了陕北画像石不同内容和不同艺术风格的各个类型，展示了汉代社会生产和人们丰富生活的广阔画面，体现了民间匠工们的高超技艺和杰出的才能。(摘自《文博》1985年6期)

江苏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　1985年12月20日，江苏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在南京博物院展出。全省十一个省辖市所属的各区、县都选送了普查珍品参展。展览以省辖市为单位，分十一部分，共展出文物一千二百七十件，古建、古迹等资料照片一百七十三件。展览展出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灌云大伊山遗址出土的红陶腰沿釜、豆形釜、石磨棒、石铲，盐城阜宁出土的玉器装饰用品及沙州徐家湾、南京营盘山、昆山少乡山等遗址出土的许多精品；有镇江访仙乡发现的西周尖顶方卣，盱眙发现的兽首铜匜，东海县春秋墓和镇江战国墓出土的成套编钟、錞于、青瓷；有秦代的，两诏铜量、汉代铜镜、刘注龟钮银印等；有六朝的青瓷、刘宋的玻璃杯及隋唐以后的各种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绘画、书法、玉器、漆器等。这些展品充分反映了江苏境内历史文化的连

续性及区域之间的融合性。(据《文物报》1986年1月7日)

澎湖县出土宋元陶瓷片展览 1985年秋，在澎湖县文化中心首次展出了一万一千多件宋元陶瓷片。这些宋元陶瓷片是由考古爱好者陈信雄近两年多来在澎湖县十八个岛屿上采集的。这批陶瓷片带有双鱼纹饰、莲花瓣纹饰等宋元陶瓷的特征，有异于澎湖本地区使用的褐釉陶器。这些宋元陶瓷片的发现为目前极为贫乏的宋元时期台澎史料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摘自《团结报》1985年11月30日)

国外展览

中国历代陶瓷展在日本闭幕 1985年2月17日，由上海博物馆、朝日新闻社、日本中国友好协会、西武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中国历代陶瓷展在日本北九州美术馆闭幕。此展是1984年7月10日在日本东京西武美术馆开幕的，然后在大阪、爱知—濑户市、福冈—北九州市依次展出，总共接待观众近十六万人次。这个展览共展出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陶瓷珍品九十八件，其中有原始社会黄河流域的彩陶，长江流域的刻纹陶，奴隶社会的原始瓷，封建社会的带釉明器、青瓷、唐三彩、著名窑口的代表性瓷器等，展现出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脉络。(晓能)

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在挪威、奥地利、英国和美国展出 由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和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于1985年内先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英国爱丁堡市展出。展品共计三十三件（套），其中有秦始皇时期的陶质兵马俑十一件。

在挪威展出的时间是3月2日至4月28日，接待观众共计七万人次。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首相维洛克和中国驻挪威大使张永宽等出席了开幕式，文化大臣朗斯莱特在开幕式上致词。

在奥地利展出的时间是5月23日至8月4日，接待观众共计十三万人次。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王殊的陪同下前往参观，科研部长海因茨·费舍尔在开幕式上致词。

在英国展出的时间是9月10日至11月1日，接待观众共计十二万人次。英国爱丁堡市市长约翰·麦卡、中国驻英国大使胡定一等出席了开幕式。

另外，1985年8月21日至10月3日，为庆祝我国陕西省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建立友好省州两周年，由陕西省组织的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参加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陕西友好月展出。展品八件，主要是陶质兵马俑和青铜武器。后又应美国文化使节基金会的邀请，于11月3日至12月3日在洛杉矶展出。接待观众共计十万人次。(晓能)

中国湖南省出土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 1985年3月8日至4月8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湖南分会、滋贺县、财团法人滋贺县国际友好亲善协会举办的中国湖南

省出土文物展览在日本滋贺县展出。展览以商周青铜器、马王堆汉墓遗物、长沙窑瓷器为主，共有新石器时代至唐代的展品七十件。（晓能）

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展览在香港闭幕 1985年5月31日，由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展览在香港中国文物展览馆闭幕。接待观众约五万人次。这个展览是1984年12月1日在香港开幕的，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此展共有展品一百余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江汉地区的古代文明。展览期间，还多次举办学术报告会，由谭维四、舒之梅、刘彬徽等先后讲演。（晓能）

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在欧洲展出 1985年5月12日至8月18日，在西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堡展览馆作为西柏林“地平线八五”世界文化艺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举办了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

展品分为六个部分：绘画、书法、青铜器、瓷器、玉器和宫廷用品，共计一百二十件（套）。绘画和书法均为明清两代的作品。明代的宫廷、“浙派”、“吴门四家”以及陈道复、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画派和画家均有佳作展出；清代以宫廷绘画为主，其中《康熙南巡图》展出三大卷，还有《万树园赐宴图》、《塞宴四事图》、《哨鹿图》等巨幅作品，清代其他画家如朱耷、龚贤、李寅、禹之鼎、王原祁、华喦、袁耀等也各有作品展出。书法有沈粲、祝允明、王铎、傅山、永瑆等人的楷书、行书、草书诸书体作品。青铜器中的春秋立鹤方壶，为观众所瞩目，对它典雅的造型、神秘繁复的纹饰和精巧的铸造工艺赞叹不已。瓷器有宋代官窑名瓷及元、明、清宫廷烧造的瓷器。在欧洲，德国是最早仿制中国瓷器的国家，普鲁士王室又素有收藏中国瓷器的传统，所以观众都以很内行的目光欣赏这些瓷器精品。展出的玉器有原始社会的玉琮到清代宫廷内的青玉盖炉等。宫廷用品中的宝座（包括宝座前的陈设）、金印、龙袍、朝珠等，也引起了观众的很大兴趣。

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轰动了欧洲，观众累计达到三十九万人次。“地平线八五”世界文化艺术节的秘书长齐伐尼希说：这个展览不仅将载入柏林的史册，而且也是今年欧洲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

展览随后又于10月1日至12月1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人文博物馆展出，接待观众二十三万人次。（聂崇正）

紫禁城宫廷艺术展览在日本四城市展出 1985年6月28日至1986年2月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宫廷艺术展览分别在日本的东京、长崎、名古屋、大阪四城市展出。以副院长于坚为团长的故宫博物院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

展出的文物共七十件套，二百七十二件。展品都是故宫收藏清代宫廷文物，包括宫廷绘画、帝后服饰、典章文物、宗教文物、文房四宝及各种珍贵艺术品。展览内容共分五个部分：（一）外朝与宫廷生活；（二）皇帝大婚礼仪；（三）清宫宗教与佛堂；（四）皇帝万寿；（五）时做文玩（即清代艺术品）。

展览深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接待观众共计三十七万人次。许多观

众反映，展览丰富多彩，极有吸引力，不仅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到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也深刻地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和智慧。展览对于促进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徐启宪)

紫禁城文物展览在美国展出 1985年，由故宫博物院与美国迪斯尼公司合办的紫禁城文物展览在世界上最大的游艺场所之一，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世界”的中国馆展出。展品共二十件（套)。这个展览是1984年4月在中国馆开幕的，展期将延续至1986年。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及湖南省历代珍品展览在香港开幕 1985年7月1日，由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及湖南省历代珍品展览在香港开幕。以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金汉川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这个展览的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展出文物二百余件，展览期间，放映了粤语配音的彩色录相片《考古新发现——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记》，并举办有关马王堆汉墓发掘与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展览受到香港各界的热烈欢迎，开幕一周即接待观众两万多人次。(摘自《文物报》1985年10月25日第5号)

中国江西宋元明清瓷器珍品展览在罗马尼亚展出 1985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根据中国与罗马尼亚政府文化协定，由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和江西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江西宋元明清瓷器珍品展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国家艺术博物馆展出。出席开幕式的有罗马尼亚国家文委副主席特玛拉·多布林、罗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于洪亮等。展览共展出宋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吉州窑所生产的瓷器珍品六十五件，反映了江西古代瓷器的生产水平及艺术风格。接待观众约一万人次。(晓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 1985年10月1日至11月19日，为庆祝四川省与日本广岛县建立友好省县一周年，由四川省博物馆、广岛县、广岛县教育委员会、中国新闻社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文物展览在日本广岛县县美术馆展出。展品有大溪文化的彩陶，商周青铜器，汉代陶俑和画像砖，南北朝至唐代的石造像，前蜀王建墓的玉哀册、玉大带和漆器，以及少数民族文物等，共计一百二十七件（套)。接待观众约四万人次。(晓能)

中国敦煌展在日本展出 1985年10月4日，由敦煌研究院、敦煌县博物馆、东京富士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敦煌展在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开幕。展览由北朝——西夏敦煌壁画摹本，西汉——明代敦煌出土文物；北朝——西夏的妙法莲华经等一百二十七件（套）展品组成。展览先后在东京、福冈、长野、奈良、静冈等地展出，于1986年3月26日闭幕。(晓能)

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在香港展出 1985年10月7日至12月7日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广东省唐宋窑址出土陶瓷展览。香港大学校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广东省文化厅派出的七人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

展览展出广东省博物馆提供的瓷器一百二十一件，这些展品出自潮州北郊、笔架山、梅县水车、瑶上、惠州北郊窑头山等五处唐宋窑址。展品丰富多彩，既有影青、青白、酱褐、青灰、青绿等釉色的碗、碟、盘、壶、灯、炉等日常生活用器，也有佛像、麻姑敬酒、立俑、狮子、狗等工艺品，还有匣钵、垫环、垫饼、压锤等窑具。(杨少祥)

广东晋至唐文物在香港展出 1985年11月6日至1986年1月26日，广东省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联合举办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展览。该展览是继广东在该校联合举办先秦、汉墓出土文物展之后进行的，共选展文物一百套，陶瓷、铜、铁、金、银器物一百八十余件，展出时间五十天，接待来自英、美、日、朝鲜、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台湾、港澳等国家及地区的观众八千余人次。(宋方义)

学术会议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1985年3月1日至6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次年会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古代都市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考古单位和十五所高等院校的代表一百二十人。

开幕式上，廖井丹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到会祝贺并先后讲话。他们高度赞扬建国三十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巨大成就，并对我国考古学界的艰苦奋斗作风和中国考古学会的良好会风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大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更好地完成自己担负的学术任务。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讲话中，提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号召广大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一心一意为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水平而奋斗。学会秘书长王仲殊作了会务工作报告。副理事长苏秉琦在闭幕式上也讲了话。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中国城市的起源，历代都市的形制、结构及其特征，古代都城的规划及其演变规律，若干城址的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广泛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有人认为距今四千余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城市，诸如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地发现的夯土墙遗迹，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市。由此并推断当时已经建立了国家，登封王城岗可能是禹都阳城。有人指出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夯土墙或石块垒起的围墙，说明原始社会传统的聚落形态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粮台发现的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管等遗迹，与一般村落不同，似已发展为最初的城市。但登封王城岗的夯土墙长宽不超过百米，过于狭小，又无重要的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似不能断定为城市性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城市出现于东周时期，因为当时的城里已

有独立的工商业经济；龙山时期的王城岗遗址只能称为城堡，郑州商城等遗址可称为都邑，它们都不能称为城市。

这里涉及对“城市”的确切含意的理解。有人认为凡有夯土城墙这种设防的即为城市。有人不同意把夯土墙作为判断城市产生的标志。认为城市是在人口、手工业生产、商业交换以及财富集中时才出现的，只有在出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时，城市才算真正形成。在通常情况下，这个时期是文物的初期。有人主张当有了独立的工商业、城内有了专门的商业活动中心时才能算为城市。但也有人提出：对于什么是城市，似不能从定义出发。有关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应从考古实践出发，在获得尽可能多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后才能回答。

㈡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形制及其演变规律；有文章对历代都城作了纵向比较，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都城往往没有城墙，或仅宫城有墙。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住地、手工业区等各种遗址分散于若干地点。东周、两汉的都城由于强化了专制主义政体，形成了密封式的城市规划。都城由宫城和郭城组成，有城墙包围。宫殿设在制高点上，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并出现了市。曹魏、隋唐时期采用棋盘格形封闭式格局，反映了当时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森严的情况。宋元明清时期改为开放式布局，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主义经济的产生。

有文章对同时期都市作了横向比较。如对隋唐时期各类城市的划分与研究，指出京都（长安）的布局特点是宫城、皇城位于城内北部正中，大部分坊以十字街分为四大区，每个大区又以十字街分为四个小区。其它一些有宫的地方城，布局上都将宫城设在西北隅，它们的坊的面积，多为半公里见方。州府城有大小之分，另作方形，每边正中开城门，内设十字街。大的州府有十六个坊，一般州府有四个坊，小州府和县城约是一个坊的面积。

有文章对燕下都，邯郸赵城、中山国的灵寿城从地势、形制、布局等方面进行比较，指出在布局方面三者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易守难攻”的原则下选址和设防，不仅筑有城墙，还有壕沟或河流作为防御措施。

㈢对一些古代城址的探讨：近年发现的偃师尸乡沟商城已经探明东、西、北三面城墙和七个城门，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和木石结构的排水设施，表明这是一座都城遗址。有关发掘情况的介绍，受到与会代表的很大兴趣。但在讨论过程中，发掘者鉴于它的位置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一致，力主汤都、西亳说。也有人认为它的年代与郑州商城一致，面积又比郑州商城小，因而推断为成汤时期的离宫——桐宫。不过也有人认为目前发掘工作开始不久，工作量有限，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西亳还是桐宫。

安阳殷墟历来被认为是盘庚所迁之都，此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次会上有人认为安阳迄今未发现盘庚时期的宫殿、王陵、甲骨文和青铜器，表明盘庚一辈尚未都此。殷墟为武丁以后的都城。盘庚新迁之都应即偃师尸乡沟商城，他在那里“复居成

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但主持发掘的同志指出安阳小屯东北地和三家庄发现的遗存比大司空村一期略早，应是庚盘时期遗存。而偃师尸乡沟发现的遗存与大司空村一期相距较远，因此既不能否认盘庚迁殷说，也难证明盘庚曾迁偃师商城"行汤之政"。

近年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发现的古城，仅东西两边有墙，南北两边利用无定河河道的峭壁作为防御屏障。东部"葫芦"颈状处为该城的唯一出口，很有特色。城墙为土石结构，也为它处所不见。城内已发现成组建筑。据说该城建于晚商，废于西周中期。

此外，有文章介绍了北京琉璃河古城近年发掘收获；论述燕下都的营建及其形制，布局也有的改定了蓟的地望。侯马呈王古城据发掘了解，它的第一期遗存为中村古城所未见，时代较后者略早，发掘者将它定在公元前550至公元前450年左右。四川广汉县发现的东汉雒城在夯土墙外用城砖包砌，为其它汉城所不见。福建崇安发现的汉代城址发掘者认为是西汉时期闽越人所建的一座王城，可能是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时的都城"东冶"。

在四川荥经县发现的严道古城，曾对开发西南起到重要作用。经勘察，证实该城建于春秋中晚期，繁荣于战国秦汉，衰于魏晋。具有"长安咽喉、西凉襟带"战略地位的汉代萧关，研究者经实地考察，认为应是固原东南古城乡之古城。

对辽宁境内高句丽小城的考察，为研究朝鲜族的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对青海境内古城址的勘察，证明青海湖南路的通道在东汉时已经开辟。有关元亦集乃路（黑城）的发掘，使这个古城的研究走上正常的轨道。现已搞清：它是元代将西夏的黑水城扩展筑成。原来的城区为百姓居住的街区，内有大量店铺和几个庙宇。扩筑部分的官署、府策、佛寺等，其间有街道相通。城外西南隅有伊斯兰教礼拜寺一座，附近有伊斯兰教徒的墓地。西北角有喇嘛教覆钵或土塔。大批出土文物中包括汉、西夏、蒙、藏文书写的文书。这些发现为研究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大量资料。

在年会收到的文章中有三分之一涉及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流；半坡氏族早期私有制的探讨，楚墓的发掘与楚国的葬制，周汉的货币及宋元都城用煤等等。其中，有关营口金牛山发掘猿人化石的介绍，也很受大家的欢迎。（据《考古》1985年6期殷玮璋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5年3月12日至16日，内蒙古自治区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各盟市五十三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耿道明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三十一篇。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内蒙古出土和收藏钱币展览，交流观摩了各自的藏品，其中如林西县文物站的天禄通宝，巴林右旗的通行泉货、太元货泉、大安通宝等钱都是稀世珍品。会上，代表们就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货币进行了讨论。（摘自《中国钱币》1985年2期）

褒斜道石门及其石刻学术讨论会 1985年5月17日至21日，褒斜道

石门及其石刻学术讨论会在汉中举行。陕西省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部分学术刊物、新闻单位和湖北省襄樊市的代表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收到论文三十多篇，内容涉及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历史渊源的研究；栈道的形制，结构及其变迁；石门摩崖的文字考释及其书法艺术；石门摩崖的科学保护等等。(摘自《文博》1985年4期)

北方五省区辽、西夏、金、元货币学术讨论会 1985年6月16日至19日，中国钱币学会在沈阳召开辽、西夏、金、元（包括渤海国）钱币学术讨论会，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五个省、自治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七篇。会上对辽、西夏、金、元货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的货币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货币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摘自《中国钱币》1985年3期)

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 1985年6月21日至25日，楚文化研究会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第三次年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七十三人，列席代表三人。除鄂、湘、豫、皖四省代表外，还有来自北京、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同志。

年会收到论文六十余篇，内容包括探讨楚文化的起源、特征及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楚墓和楚城址研究，以及研究楚国货币、工艺、文字、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楚文化研究会顾问顾铁符、俞伟超二教授、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应邀在大会上就楚文化研究如何深入的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安徽省博物馆和寿县博物馆，参观了该省文物考古所的出土文物和考古发掘现场。对新发现的寿县柏家台战国末期建筑遗址，给以高度的重视。不少同志认为这有可能是楚国迁都寿春后的宫殿性质的建筑基址。

会议期间，传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全体代表集会悼念并致唁电哀悼。

会议决定于1986年下半年在湖北省召开第四次年会，并决定编选出版本次年会论文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

金牛山人类化石鉴定会 1985年8月9日，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北京大学举行金牛山人类化石科学鉴定会，对1984年9月底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辽宁营口县金牛山发现的人类化石进行科学鉴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汝康担任鉴定会的主任委员，著名学者贾兰坡、苏秉琦、安志敏、宿白和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任委员。会上，委员们对金牛山人类化石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鉴定会认为，金牛山的人类化石是重要的发现。金牛山头骨化石的形态明显比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进步，而与陕西大荔发现的早期智人头骨更为接近，作为早期智人的一种类型，似较为合适。其生存的年代根据头骨特征估计在距今十多万年至二十万年左右。铀系法测定人骨出土层位的初步结果是三十一万年。准确的年代有待结合其他多方面的证据来确定。(摘自《光明日报》1985年8月

10日)

内蒙古考古学会召开鲜卑考古研究会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内蒙古考古学会在哲里木盟博物馆召开鲜卑考古研讨会。这是第一次以鲜卑考古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全区各盟市文化处（局)、站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及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辽宁省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北方文物》杂志社等兄弟单位的同志计四十余人。

会议期间展出了各盟市文物工作者带来的鲜卑文物、照片和线图。会议采用观摩座谈的形式，对鲜卑族的族源、演变、文化源流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讨论。代表一致认为，鲜卑是我国北方古代的一个重要民族，建立北魏王朝二百余年，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北朝文化，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关于鲜卑文化的源流。有些同志提出：北方草原诸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当以陶器作为研究的基础，金属器物外来的因素较多而不便区分。鲜卑文化当有自已的起源，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继承鲜卑文化的是契丹文化。一种意见认为，鲜卑文化当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南迁到大兴安岭东南部。另一种意见认为，拓跋鲜卑南迁西进过程中的一些遗迹，还缺乏科学的根据，其文化性质和族属还有待考古发现来证明。有些同志认为鲜卑民族作为东胡的一支，其文化当起源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我们应当努力寻找它们的中间环节。

关于鲜卑文化特点，一些同志认为，鲜卑早期的陶器当以夹砂陶罐和喇叭口细泥壶为最基本的组合。会议对北方草原动物纹牌饰、嘎仙洞遗址、历史地理、早期社会经济形态、体质人类学、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来自辽宁、黑龙江的代表介绍了本地区的鲜卑考古发现和各自的看法。(孙衷然)

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 1985年10月8日至12日，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五十人。会上，代表们就文博事业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

会议通过代表民主协商，并报请省社联批准，产生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选出理事二十四名，常务理事八名，于志耿为理事长，殷德明、孙秀仁、吴文衔、温野、郑秀山为副理事长。经第二届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请省社联批准，聘请苏力、柳彦章、赵善桐为学会第二届理事会顾问。

会议结束时，刘家琪代表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对学会今后的工作做了布置。(据《中国博物馆通讯》1986年4期)

故宫博物院举行六十周年院庆 198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故宫博物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中央负责同志杨尚昆、胡乔木、谷牧等出席了会议，还有有关部门领导、全国文博单位代表、文化艺术各界人士，美国、日本、香港地区的来宾，共五百余人。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

会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周谷城、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为故宫院庆题了词。

故宫博物院为纪念六十年院庆，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集中筹备了六个新的展览和专馆：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展览、铭刻馆、文房四宝馆、明清工艺馆——漆器、清代院画陈列、陶瓷馆。编辑出版了《故宫博物院院刊》和《紫禁城》的院庆专刊。发行了四种纪念币、一套纪念邮票，以及纪念邮折、明信片、纪念信封等。委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紫禁城》十八集系列纪录片。在报刊杂志发表纪念、宣传、报道文章七、八十篇。院内另组织了茶话会、舞会。(单国强)

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 1985年10月17日至10月23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室召集举办的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应邀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学勤，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武汉大学教授夏渌，吉林大学副校长、副教授林沄，中华书局副编审赵诚等。他们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提出不少新的见解。还就古文字学的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古文字学史、古文字工具书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这次研讨会是以杨振宁博士为董事长的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赞助的。(黄光武)

晋文化研究座谈会 1985年11月1日至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侯马晋国遗址召开了晋文化研究座谈会。

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常务理事张政烺，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副局长沈竹、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文物考古单位，以及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山西师范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晋和三晋地区考古工作的历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会上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介绍了侯马晋国遗址的钻探、发掘、整理研究等工作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河南、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的同志介绍了各省三晋文化的研究情况。出席会议的同志到发掘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观了出土文物，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搞好晋文化研究发表了意见。

会上，苏秉琦研究员就山西古文化的源流，和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之间的关系，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的研究、整理等问题作了指导性的发言。谢辰生顾问就当前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一些政策性问题作了专门发言。(陶正刚)

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1985年11月4日至9日，江苏省考古学会在常州市召开了第五次年会。会议是和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海岸线分委员会联合召开的。讨论的中心议题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海岸线和地貌的变化和人类活动。会议共收到论文、资料共一百零九篇，其中江

苏省考古学会会员提交的论文近四十篇。会议期间举行了两次学术报告，代表们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还组织代表们现场考察了古海岸遗迹和有关古遗址。代表们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互相渗透、共同提高的有益试探。(纪中庆)

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 1985年11月4日至10日，河南省考古学会与渑池县文管会联合召开了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十一个省市的一百五十三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田昌五，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副教授严文明等。会议共收到论文五十三篇，十九位学者在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会议对仰韶文化的分区、类型、分期、源流和社会性质作了广泛的探讨。(张维华)

南阳汉画馆建馆五十周年和鲁迅搜集南阳汉画拓片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1985年11月23日，纪念南阳汉画馆建馆五十周年和鲁迅搜集南阳汉画拓片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阳召开，全国十个省市的五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四十八篇，内容涉及画像石墓的起源、分期，画像内容、雕刻技法和艺术成就等问题。会上，对汉代画像石刻和汉代画像石墓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鲁迅之子周海婴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据《文物报》1985年11月30日)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年会 1985年11月25日至30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4年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有两会的理事和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报告、译文和资料共六十八篇。

年会重点讨论了禹县钧窑、临汝汝窑和巩县唐三彩，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禹县钧窑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五大名窑之一，传世品很多，历来被文物爱好者所珍藏，但对钧瓷的烧造历史、工艺特征及其具体窑口，尚缺乏统一的认识。近年来，经过文物考古部门和科技工艺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不仅找到了宋钧窑的官办窑场，而且出土的大量标本证实：钧瓷起源于唐代，盛烧于宋代，宋末金初虽一度遭到破坏和减产，金元时期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钧窑系。十年来对钧瓷的烧制工艺和窑变技术也得到一些新的认识，经过测试，对钧瓷釉色的形成机理也更加明确。

汝窑也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分布遍于临汝四乡，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仅在临汝县境内就发现三十余处汝窑址。汝瓷注重刻、印花卉装饰，釉色也较莹润。近年来，对汝瓷的造型和装饰艺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同时，在新安、宜阳、宝丰、鲁山、禹县、内乡、焦作等地也发现有与临汝古瓷相类似的窑址，这说明了汝窑影响之大，烧造范围之广泛。至于汝窑与陕西耀州窑的关系，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见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至于唐三彩，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在河南巩县的大小黄冶找到了烧制唐三彩的窑址，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证明：从唐高宗以后创烧，到了开元年间，唐三彩的烧制达到了极盛时

期。

目前，唐三彩在埃及、泰国、朝鲜和日本等国家的古遗址均有发现。此外，宋当阳峪窑、钧窑在朝鲜及泰国也有出土。上述情况表明：河南陶瓷曾对中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起过积极的作用。

会议期间，代表们观摩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举办的河南各窑口出土的古瓷标本，观看宋陵出土的定窑瓷器。会后，代表们还到禹县、临汝和巩县实地考察古瓷窑址和仿古瓷厂等。(叶文程)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1985年11月26日至29日，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朝阳市举行。辽宁省八十余名文物考古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九十六篇。

大会分考古、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三个组，代表们就学会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和学术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大会选举林声、战力光、杨仁恺为名誉理事长，朱子方、阎万章、曲瑞琦、刘谦、金培琨为顾问；选出理事四十名，常务理事十一名，郭大顺为理事长，沈长吉、徐秉琨、孙守道、曹汛、姜念思为副理事长。学会下设三个研究会：辽宁省考古研究会、辽宁省博物馆研究会和辽宁省文物保护研究会。(据《中国博物馆通讯》1986年4期)

山东省考古学会理事扩大会议　1985年12月18日，山东省考古学会在济南召开了理事扩大会议，与会成员共七十多人。会上，除了对近年来学会工作进行总结外，着重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考古学会工作的问题，并制定了1986年的工作规划，决定成立史前文化研究会、齐鲁文化研究会和秦汉考古研究会，并决定创办学会会刊。此外，还对1985年在文物考古战线上做出优异成绩的作者进行了表彰。截止1985年底会员增加到二百八十四人。(竞　放)

安徽省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1985年12月22日至24日安徽省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合肥举行。出席本次年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八十七人。收到论文五十篇，内容涉及古生物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古民俗研究、古代度量衡研究、科技考古、古城址考古与研究、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等。

年会采取分组会和全体会穿插进行的方式宣读论文。分组会上，代表们还围绕论文中提出的有关学术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年会期间，召开了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讨论了1986年的学会工作。(据《〔安徽〕考古简讯》1986年1期)

其　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现将奖金章程和评奖委员会名单公布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章程

第一条　本奖金以夏鼐同志捐赠的三万元人民币为基金，以银行利息作为奖金，基金不得动用。

第二条　本奖金授予对中国考古学作出成绩的中国境内的中国籍学者。近期内评奖时可适当照顾中青年学者。

第三条　每二年评选获奖著作一次。参加评奖的著作必须是在评选日期以前三年内发表的。

第四条　每次授奖名额至多为五人，无适当人选时可以暂停一次。

第五条　奖金暂定为一等奖一千元，二等奖五百元。

第六条　本奖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负责管理，聘请所内外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负责评选和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评奖委员会名单

夏鼐（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王仲殊（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安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苏秉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张长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张政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贾兰坡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徐苹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宿　白　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教授

（据《考古》1985年6期）

对外学术交流

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好太王碑专题讨论会在东京举行 1985年1月11—12日，应日本读卖新闻社和东方书店邀请，由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贾士金任顾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健群任团长的学术代表团一行四人，在东京参加了由读卖新闻社和东方书店主办的“以好太王碑为中心的四、五世纪的东亚和日本”公开讨论会。

讨论会是假东京读卖礼堂举行的。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致开幕词。贾士金、王健群、方起东分别以《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题》、《和好太王碑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高句丽石墓的演进》为题，在会上作了学术讲演。日方在会上讲演的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岛定生、成城大学教授佐伯有清、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东京大学教授武田幸男，此外，南朝鲜旅日学者明治大学讲师李进熙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听讲席上有六百多人，主要是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和关心好太王碑研究的各界人士。还有来自美国和南朝鲜的学者，我国赴日的部分研究人员和留学生也参加了讨论会。

讨论会先由各位讲师进行学术讲演，然后就碑文的部分内容、碑上涂抹石灰的情况、碑文所反映的当时国际环境以及倭是个什么样性质的实体等专题进行了公开讨论。我国对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的研究成果受到高度评价。讨论会的专题讲演和讨论记录，将由日本东方书店汇集出版。(起东)

庄敏等考察印度文物和博物馆工作 根据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计划，1985年1月4日，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庄敏一行三人前往印度访问。在印度期间，先后参观和考察了新德里、勒克脑、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奥兰加、巴德等城市的文物和博物馆工作及名胜古迹。于1月26日回国。(晓能)

日本田边昭三等来我国访问 1月26日，日本京都埋藏文化财研究所野外调查部长田边昭三等一行三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王廷芳、安志敏以及徐苹芳、马得志等同他们进行了座谈。田边昭三先生一行是应文化部文物局的邀请来华进行访问的。

刘军出席印度—太平洋史学史协会第十二届大会 1985年1月26日至2月2日，应印度—太平洋史前史协会秘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皮特·贝尔伍德博士的邀请，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军参加了该协会在菲律宾北吕宋卡格尼亚省的卡劳里棱特举行的第十二届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印度、丹麦、西德、印尼、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英国、美国和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多名代表，其中正式会员四十多名。

大会就东南亚岛上早期居民及其周围环境、澳斯特洛尼亚人的起源和发展、史前史晚期大陆与岛屿关系方面的考古、过去对东南亚人种史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刘军在会上介绍了河姆渡遗址的有关情况。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5年1—2月，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永久荣誉讲座教授冯先铭携同夫人赴港，在港期间，除为中文大学艺术系四名研究生主讲“青花瓷器”、“南朝鲜新安沉船问题研究”、“中国出土外国陶瓷资料”及“有关瓷器鉴定问题”四个专题之外，并应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及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之请，分别作了题为“南朝鲜新安沉船打捞的新资料”及“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谈近年出土的陶瓷新资料”的演讲。

爱尔兰驻华大使沃尔德伦先生及其夫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 3月20日，爱尔兰共和国驻华大使沃尔德伦先生及其夫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爱尔兰文化交流委员会根据伊俄干教授的建议，挑选出来的近七十册考古书刊赠送给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代表考古研究所接受了这批赠书，并向大使先生回赠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新出版的考古学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和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和专家王仲殊、安志敏、李文泉等赠书时在座。(子明)

夏鼐出席英国史前学会年会及该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报告会 3月26日至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夏鼐教授，应邀参加英国史前学会年会及该会为成立五十周年举行的特别纪念报告会。英国史前学会在国际学术界声望颇高，此次会议除英国学者外，还邀请中国、美国和澳洲的学者参加，从中聘请十二位著名学者在会上作报告。夏鼐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颇受听众欢迎。夏鼐教授除参加会议活动外，还应邀会晤了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伦敦大学名誉教授沃森及美国“新考古学派”领袖宾弗等著名学者。又在圣约翰学院考古系作了题为《谈谈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讲演。还参观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为表现中国古代铜器、瓷器和丝织物上的花纹而布置的特展室，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的彼特里博物馆以及牛津大学考古学和美术史系实验室等。(子明)

罗哲文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5年3月27日，文化部

文物局古建专家罗哲文应邀赴日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国际学术讨论会。于4月5日回国。(晓能)

日本考古学者饭岛武次等来我国访问 3月18日，日本考古学者饭岛武次等一行三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所长就日本学者感兴趣的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及商文化问题等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请他们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

安志敏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出席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 3月28日至4月10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安志敏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七人去意大利访问，并参加4月1日至5日在威尼斯市举行的"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举行的规模较大的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会议。意大利、中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会聚一堂，讨论自新石器时代至西汉末期，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若干专题。与会中国学者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论文题目是①安志敏：华北早期新石器的曙光，②宋兆麟：河姆渡的稻作文化，③张长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④洪廷彦：1982年郑州出土商代青铜器的重要性，⑤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⑥孙机：纪元前的中国古马车，⑦郑绍宗：汉中山王陵与玉衣葬制。论文以必要的实际材料，介绍了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的新成就，从各个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独创性，受到与会外国学者的好评。会议结束后，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了威尼斯大学和在罗马的东方学院，参观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塔奎尼和罗马的一些教堂、古墓和博物馆等。(子明)

荷兰教育科学大臣底特曼率领学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3月29日，由荷兰教育科学大臣底特曼先生率领的学术代表团一行七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王廷芳以及徐苹芳、卢兆荫、乌恩等接待了他们。王仲殊向外宾详细介绍了我国考古研究的设置和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并向底特曼先生赠送了我新近出版的考古书刊。该团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院长邀请于3月28日至4月4日来华访问的。他们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并到西安参观游览。(子明)

安志敏去联邦德国访问 4月10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安志敏，应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在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之后，到联邦德国进行学术访问。他访问了德意志考古研究所总部和它的分支机构普通与比较考古学委员会、罗马—日耳曼委员会、科隆大学史前史研究所、海德堡大学史前和早期历史研究所以及艺术史研究所。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著名的史前遗址和考古发掘现场，同许多考古学家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子明)

费斯特为首的奥地利科学院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4月12日，以副院长费斯特为首的奥地利科学院代表团一行五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所长王仲殊和有关专业人员同他们进行了座谈，请他们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和实验室。该团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前来访问的。他们还到西安、济南、曲阜、泰山、上海等地参观游览。(子明)

夏鼐出席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年会　4月17日至29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教授，赴美出席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年会并接受该院外国院士证书。这是夏鼐教授1984年被选为该院外国院士后第一次参加院士年会活动。4月22日举行大会，向上年度当选者授予院士证书或外国院士证书。当夏鼐教授走上主席台同大家见面时，受到热烈欢迎，普瑞斯院长介绍说“夏鼐教授是中国卓越的考古学家。他的早期发掘工作，阐明了华北新石器文化的新序列，揭发了前所未知的商代文明的早期，并发现了楚国文化。他的后来研究工作，证明了波斯和唐代早期的商业交通，并且为中国科学史奠定了考古学方面的基础。”除年会活动之外，夏鼐教授还参观了华盛顿的费利尔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子明)

民主德国文物博物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1985年5月16日至6月4日，根据中国与民主德国文化交流计划，以民主德国文化部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局局长威尔纳·沃尔夫为团长的民主德国文物博物馆代表团一行三人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其间，他们先后参观了北京、西安、上海、苏州、南京、扬州等地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晓能)

瑞典北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诺埃尔·布罗德本特来我国访问　5月20日至6月2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学术交流协议，瑞典厄默奥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北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诺埃尔·布罗德本特来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5月21日，他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副所长安志敏及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标本室和实验室。5月25日，他应邀在考古所作了题目为《斯堪的纳维亚史前考古学》的学术报告，名誉所长夏鼐、所长王仲殊等三十多位学者出席听讲，报告会由安志敏主持。在北京期间他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等。布罗德本特先生还到西安、上海参观访问。(子明)

日本出光美术馆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陶瓷标本　1985年5月11—25日，以日本著名陶瓷专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出光美术代表团一行六人，应文化部文物局的邀请来我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活动，先后参观了北京、南京、扬州、杭州、上海等地的博物馆及名胜古迹。

访问期间，冯先铭、李辉柄代表故宫博物院，与出光美术馆代表团就

交换陶瓷标本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书条款，冯先铭与李辉柄于1985年10月下旬携带陶瓷标本去日本履行正式交换手续。双方交换数量各为一百片，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为河北、河南、陕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七个省十二个瓷窑标本，出光美术馆提供的为埃及福斯塔特及日本冲绳岛出土的我国瓷片标本五十五片及埃及、伊朗、伊拉克出土的伊朗釉陶标本四十五片。(冯先铭)

坪井清足为团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6月3日至18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以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坪井清足为团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一行五人来我国进行学术访问。6月4日，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所长王仲殊、副所长王廷芳、安志敏和有关学者同他们进行了座谈，请他们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实验室、古物修复室等。6月17日，坪井先生作了题为“现代的日本考古学”的报告。报告会由王仲殊主持，出席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一百多位学者。在北京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等。此外，他们又到安阳、洛阳、西安参观访问。(子明)

法国人类学专家哥伦拜等来我国参观 1985年6月6日，法国人类学博物馆哥伦拜一行两人来华访问，为时约一个月。在华期间他们参观了北京、西藏、成都等地的文物古迹，并在成都与四川省文博方面的学者进行了座谈。7月3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见了他们。(晓能)

周保中出席漆器保护研究国际会议 1985年6月10日—2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周保中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由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和美国保罗、格蒂保护协会联合召开的漆器保护研究国际会议。(晓能)

汪宁生去联邦德国讲学 1984年底至1985年6月，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室汪宁生受聘为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方艺术史系客座教授，为该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南方青铜文化”，并去法国、瑞士、埃及、希腊等国作短期考察、访问。(熊兴)

以三上次男为团长的日本好太王碑学者参观团来我国访问 1985年7月，应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省博物馆学会的邀请，日本方面组成以三上次男为团长的“好太王碑学者参观团”一行十五人来集安进行参观访问。7月7、8日下午，中日两国学者再次就好太王碑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本年1月参加东京公开讨论会的中日双方学者，除佐伯有清外全部到场。与会的还有参加参观团的其他日本学者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博物馆学会的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

会上就好太王碑文中的“辛卯年

纪事"、"倭的实体"以及"太王陵的墓主人"、"丸都城与国内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使东京讨论会上争论的许多问题进一步明确。

代表团在北京访问期间，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生前工作室，向夏鼐遗像献花致哀，并与考古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安志敏、王廷芳等进行座谈。(方起东 张子明)

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等来我国访问 8月22日，著名考古学家、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会长江上波夫等一行三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著名考古学家、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教授的不幸逝世再次表示悼念。所长王仲殊以及安志敏、徐苹芳等接待了他们，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子明)

西谷正为团长的第二次西日本吉林省友好访中团来我国访问 8月27日，以九州大学文学部助教授西谷正为团长的第二次西日本吉林省友好访中团一行二十一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以及安志敏、徐苹芳等同他们进行了座谈。该团是于8月19日至29日来华访问的，他们先后访问了北京、长春、集安、沈阳等城市。(子明)

岸俊男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中团来我国访问 8月31日，以岸俊男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中团一行二十四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王仲殊、徐苹芳、马得志、卢兆荫、王世民、杨泓就古代都城的考古调查发掘情况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和实验室。该团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于8月20日至9月1日访华，先后访问了北京、济南、淄博、曲阜、太原、大同等城市。(子明)

美国考古学家谢瑞尔教授来我国讲学 1985年8月31日至9月21日，应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谢瑞尔访问我国，在北大考古系讲授中美洲考古学。全课分为八讲：1、引论，2、美洲的早期移民，3、中美洲文明的起源，4、古代城邦，5、玛雅文明，6、古代玛雅的文化艺术，7、古代玛雅的社会政治组织，8、西班牙征服以前的中美洲。听课的有考古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研究生和部分年轻教师，一些兄弟单位的年轻学者也参加听课。(严文明)

日本考古学者坪井清足等来我国访问 9月2日至30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坪井清足、专修大学文学部教授五井直弘、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宇都木章、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伊藤道治一行四人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们对著名考古学家、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夏鼐教授的逝世，再次表示哀悼。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张长寿、徐苹芳以及王世民接待他们，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除北京之外，他们还先后到太原、侯马、西安、郑州、武汉、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对我国古代城市遗址进行考察访

问。(子明)

朝鲜文物工作者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1985年9月3日至9月18日，根据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计划，以朝鲜文化保护指导局副局长洪起善为团长、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金信淑(女)、朝鲜文化保护指导局科长崔元洁、平安南道文化局责任指导洪应星为成员的朝鲜文物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我国。在华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观了北京、西安、成都、桂林等地的博物馆及文物古迹等。(晓能)

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汉密尔顿·雅姆来我国访问 9月14日至10月13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汉密尔顿·雅姆，根据中法社会科学交流项目，来华作为期四周的学术访问。在北京期间，雅姆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张长寿、徐苹芳以及卢兆荫、王世民等同他进行了座谈，请他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和实验室。他还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央民族学院，参观了考古遗址和博物馆。此外，还到内蒙古、新疆进行参观访问。(子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来我国访问 1985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访问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古室，就中国云南青铜器的有关问题同考古室有关学者交换了意见。(熊兴)

王丹华等考察法国文物保护技术工作 根据中法文化交流计划，1985年11月5日至11月20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丹华、蔡润等一行三人前往法国考察文物保护技术工作。在法期间，他们曾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等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晓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J·赫尔曼院士来我国访问 10月10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古代史和考古研究所所长J·赫尔曼院士，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以及安志敏、张长寿、徐苹芳等同他进行了座谈，并请他参观了研究所的标本室和实验室。J·赫尔曼是以副院长卡尔魏特院士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之一，该团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于10月8日至22日来华访问的，除北京之外，他们还到西安、广州、深圳等地参观访问。(子明)

捷克斯洛伐克文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1985年10月22日至11月3日，根据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交流协定，由捷克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雅克伍别克、斯洛伐克民族博物馆哈博什洼克、捷克民族技术博物馆馆长姆拉滋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在华期间，他们先后参观了北京、西安、上海三个城市的文物和博物馆单位及名胜古迹，并与我国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座谈。(晓能)

奎亚松为团长的菲律宾代表团来

我国访问　1985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根据中国与菲律宾文化交流协定，以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奎亚松博士为团长的菲律宾代表团一行六人来我国访问。在华期间，代表团先后参观了北京、西安、洛阳、郑州、长沙、广州、厦门等城市的博物馆、纪念馆及历史文化古迹。(晓能)

日本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专家护雅夫来我国访问　11月28日，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专家护雅夫，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副所长徐苹芳同他进行了座谈。护雅夫先生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员之一，该团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著名戏剧家杉村春子率领，是应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邀请于11月27日至12月11日来华访问的。代表团除访问北京外，还到大同、昆明、苏州、上海参观访问。(子明)

美国人类学硕士哈尔波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关于水下考古的报告　12月16日，目前在华短期工作的美国人类学硕士哈尔波恩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关于水下考古的报告。报告会由王仲殊所长主持，三十多位学者出席听讲。(子明)

安志敏荣获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信院士称号　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同志，荣获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称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冯·德尔·海顿先生，受本国考古研究所和大使先生的委托，将通讯院士证书授予安志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和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王仲殊、张长寿、姜汉章等出席了上述仪式。(子明)

本年逝世考古学家

夏鼐

王仲殊

夏鼐同志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1985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夏鼐同志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对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设、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4年，夏鼐同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并考取该校公费留学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作为出国前的准备，他于1935年春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发掘。同年夏，他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受教于田野考古学权威惠勒教授。在留学期间，他参加了由惠勒主持的梅登堡遗址的发掘。他还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和巴勒斯坦参加调查发掘。在巴勒斯坦，夏鼐同志会见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同志由英国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夏鼐同志在该所从事考古研究。从1941年到1945年，他在四川省的彭山和甘肃省的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等地发掘古代遗址和墓葬，有许多收获。1945年在宁定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早，纠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夏鼐同志继续在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9年春，该所迁往台湾。他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解放后，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授。

1950年夏，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夏鼐同志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到任不久，便率领一个考古队，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发掘。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这一年的12月，他亲自手执小铲，在辉县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同志率领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岗遗址为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1951年秋，他又率领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们到湖南省长沙开展发掘工作，究明了战国至两汉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征也得到初步的究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同志确认它们是汉墓。

在各处的调查发掘工作中，夏鼐同志将田野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授给许多年轻的助手。他身体力行，坚持亲自操作，为初学者示范。他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发展，配合各种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对付这一严重的局面，并为了使新中国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壮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至1955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同志与裴文中、向达等一同主持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计划。他还亲临洛阳、郑州等地的实习现场，讲授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使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员从此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

1956年至1958年，夏鼐同志在北京昌平主持明定陵的发掘。他以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观

察力准确地判定当初入葬时的隧道所在，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他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连续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高度的忘我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能顺利完成。

1962年，夏鼐同志继郑振铎、尹达之后，任考古研究所所长。繁忙的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夜以继日地从事学术研究。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他先后写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晋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许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表现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等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重要的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

夏鼐同志懂多种外国语文。他博览外国的书籍，通晓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动态和研究成果。他从事考古研究，从调查发掘出发，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对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外国的）各种古代文献又几乎无所不通。他将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等与从外国传入的近代考古学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坚持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依靠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他确信

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更反对以空论歪曲事实的真相。同时，他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把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的欣赏、鉴定和考据。

夏鼐同志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在他的筹划和指导下，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建成碳14实验室，至今已测定约1000个数据，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可靠的。1977年，夏鼐同志利用大量的测定数据，结合丰富的发掘资料，写了题为《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就全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在他的部署下，考古研究所还在实验室里开展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项的工作，都收到一定的效果。由于他的努力，考古研究所还与各有关单位协作，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考古学上的问题，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成绩。

作为研究所的所长，夏鼐同志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还主持各项编辑工作。长期以来，他亲自担任《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期刊的主编。考古研究所的许多专刊，除《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由他参加编写并任主编以外，其他如《洛阳烧沟汉墓》、《西安半坡》、《沣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都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和修改。总结建国十年和建国三十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两部专刊，也都是由他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编写成的。1979年以来，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领导这部巨卷的编纂，并使其顺利完成。

1979年4月在西安举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夏鼐同志被选举为学会的理事长。在以他为首的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不断增多，学术活动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到现在为止，已举行了五次年会。每次年会开过之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4年还开始出版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的《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年会上，夏鼐同志号召考古工作者要有献身精神，不怕艰苦，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全心全意为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他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并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长期以来，夏鼐同志在国内接待来自五大洲的各国学者和代表团，通过交谈、讨论，使主客双方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他也接受邀请，多次到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每次都满载知识和友谊而归。他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使中国考古学界从外国吸取经验，也使外国的同行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考古的工作。

夏鼐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他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称号和职位，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

1983 年 8 月，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学会议在北京和西安举行。到会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代表和英国、美国、瑞典、日本、朝鲜等国的观察员。会上讨论了亚洲各国考古学的现状和今后协作的前景。1982 年夏鼐同志辞去了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接受了名誉所长的职位，并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国际盛会。他被全体代表推选为会议的主席。代表们和观察员们一致认为，在他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通过广泛的参观访问和在会议上的深入讨论，大家齐声赞扬，在夏鼐同志的领导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名不虚传的巨大成果。

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考古学书目

壹 总类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131页 插图27幅 黑白图版32页 大32开

本书是作者1983年3月在日本所作三次公开讲演的讲演稿：一、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论述了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历年来考古重大发现、最新成果和著者的评价。二、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综述了中国丝织物的出现，汉代丝织物的发展及其品种，以及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唐代丝织物。三、中国文明的起源，包括文明起源于何时，小屯殷墟文化的特征，中国文明的独特风格等。书后有“中国考古、发掘简略年表”，附录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等文。

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 冯汉骥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214页 插图49幅 黑白图版16页 16开

本书共收论文二十二篇。内容涉及我国西南地区考古发掘与研究、民族民俗问题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等方面。其中有关于云南石寨山出土文物研究的一组文章和《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等。书前有徐中舒的序。书后附录童恩正所写：冯汉骥小传。

考古学概论 易漫白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年2月 206页 插图7幅 大32开

本书分为三章：一、绪论，对考古学主要概念作了阐述；二、中国考古学简史，论述了考古学在中国产生的基础和考古学的分期；三、田野考古略说，介绍了田野考古方法论和田野考古技术以及文物保护与宣传教育等问题。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杨宽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263页 插图41幅 彩色图版4幅 黑白图版28幅 大32开

本书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中编：关于古代陵寝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下编：古代陵寝和陵园布局的研究。书后附有：西汉

帝陵后陵规模表、东汉陵寝规模表、南朝陵寝现存石刻表、唐代陵寝规模表等。

文物工作手册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5年8月 292页 32开

本书汇集了建国以来我国有关文物保护、文物鉴定、文物市场、博物馆工作的政策、法令、规定。书后附录第一、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京部分）、北京市第一、二、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及中国历史纪元表等共十种。

文物史话 阎立川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4月 文118页 黑白图版34页 20开

本书是一本介绍文物常识的书籍，选取有代表性的艺术文物，论述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和石刻彩塑等的发展、演变及其成就，从而介绍了中国的文物史。

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建国以来的出土文物 史树青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5月 29页 插图35幅 32开

本书是"伟大祖国"历史讲座丛书之一，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出土的重要文物作了重点介绍。

上海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丛书第八卷） 上海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日本讲谈社 1985年2月 文74页 彩色图版135幅 黑白图版60幅 8开

本书选录上海博物馆藏文物精品一百九十五件，分为上海地区出土文物、青铜器、雕刻造像、陶瓷、工艺品、绘画书法，共六个部分。每部分均有概述性的图版说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撰写的序言载于卷首，对该馆的文物陈列情况作了概述。

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45页 彩色图版103幅 黑白图版306幅 8开

本书选择有代表性的新疆古代民族文物三百余件，每件均附有较详细的图版说明。书前有穆舜英、王明哲的研究论文——《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概要回顾和探讨了新疆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

西夏文物研究 陈炳应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 文508页 插图82幅 彩色图版17幅 大32开

本书按文物、遗址的性质分为十二章，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了迄今所知的全部西夏文物资料。对有争论或不同认识的问题，本书都作了介绍，以便深入研究。书后附《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的节译。

河南考古 杨育彬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689页 插图58幅 黑白图版104幅 大32开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建国三十五年来河南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和收获。全书以时代先后为序，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等八章。书后附录一：

河南古代遗址、城址、窑址、墓葬统计表；附录二：建国以来河南考古记事。

出土文献研究 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253页 插图22幅 16开

本书汇编有关历年出土的殷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书、帛书、六朝隋唐五代文书、历代碑碣墓志等方面的论文，共二十五篇。

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 刘进宝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 163页 32开

本目录收编了有关敦煌学的书目和报刊资料，包括“论文”和“专著”两大部分，以公开发行的书籍、报刊为主，兼收内部资料。

敦煌学论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3月 293页 大32开

本书选编敦煌学学术论文十七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第二部分专门对敦煌文学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利用敦煌文献进行语言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

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日）周藤吉之等著 姜镇庆、那向芹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4月 1233页 大32开

本书是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论文集。共收论文十篇。

敦煌学概论 姜亮夫著 中华书局 1985年10月 118页 32开

本书分为六讲：一 我与敦煌学，二．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三、四．敦煌经卷简介，五．敦煌艺术内容简介，六．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郑和史迹文物选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48页 彩色图版40页 12开

本书搜集了郑和下西洋在国内的遗迹文物资料三十二篇，按云南、江苏、福建、陕西、山东、北京等地域排列。每篇资料从遗迹或遗址的名称、位置、形制、历史沿革、具体内容及研究价值等方面进行考释。每幅图版均附有中英文说明。书后附录：郑和下西洋大事记。

传拓技法 纪宏章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69页 插图52幅 黑白图版16页 32开

本书对传拓起源、应用范围、拓印方法、需用的工具、材料和工具制作、拓片装裱等均作了具体说明。书中附有我国罕见的古代碑文、刻石、器物全形和平面拓片二十二张和插图五十二幅，有助于掌握拓印知识和技法。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适用技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5年10月 153页 插图46幅 大32开

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博物馆与文物技术手册之七”，选编了五篇论文，分别根据尼泊尔、突尼斯、埃及、印度、秘鲁等第三世界国家中文物保护和古迹修

复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2月 文295页 插图91幅 黑白图版12页 16开

本书收入1983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的论文共三十篇。中心议题是"商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和"中国各地的青铜文化"。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中国考古学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2月 450页 大32开

补1984年

北京地震考古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163页 插图14幅 黑白图版12页 16开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考古组即在京、津、唐地区展开了地震考古工作，集中考察约三年之久。本书发表的五篇论文和资料，就是这次地震考古的科研成果。

贰 田野考古资料

邹县野店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月 文190页 插图98幅 彩色图版2幅 黑白图版88幅 16开

本书主要介绍1971—1972年发掘的山东邹县野店遗址的全部资料，并依据其中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材料，探讨了有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的转变过程。书中文字内容包括概论、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综述、大汶口文化典型墓例、大汶口文化墓葬分期与年代、结语。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213页 插图101幅 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104页 16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是继殷墟、郑州、邢台等遗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台西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文化堆积和年代分期、遗址、墓葬和结语。苏秉琦、邹衡为本书作序。书后附录对遗址中的兽骨、龟甲、植物等的鉴定报告和有关文章。

殷墟妇好墓（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三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4月第2版 文288页 插图110幅 彩色图版40页 黑白图版188页 16开

本书是妇好墓的一种全面综合性的报告，曾于1980年12月出版。这次再版对初版的个别疏漏之处作了补正，并增加了四篇重要附录：夏鼐的《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郑振香、陈志达的《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所实验室的《妇好墓铜器成份的测定报告》及张培善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123页 插图78幅 彩色图版32页 黑白图版48页 16开

本书记述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

现的重要文物。其中棺内所出保存较好的衣衾包裹和丝织品，是研究先秦丝织业的宝贵资料。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墓葬形制，二、随葬器物，三、年代和死者身份，四、关于葬俗的几个问题。书末附录：一、丝织品色彩的测定，二、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人骨的人类学研究。

昌都卡若（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二十九号）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月 文179页 插图78幅 彩色图版4页 黑白图版64页 16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加卡区卡若村，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本书即卡若遗址的发掘报告。全书共分五章：一、自然环境和工作概况，二、文化堆积，三、建筑遗存，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五、结论。书后附录一：卡若遗址兽骨鉴定与高原气候的研究，附录二：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与栽培作物的研究。

叁 考古学分论

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吴汝康等著 科学出版社 1985年1月 文267页 插图77幅 彩色图版9页 黑白图版20页（另附图表1袋） 16开

本书是自1978年以来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全书由八部分论文综合组成：地层、古人类、动物化石、孢粉、岩溶洞穴、沉积环境、古土壤、年代学。这些论文既独立，又互有关联，互相补充或互相论证。通过本书，读者对于北京猿人遗址各方面的情况，会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劳动创造了人——闻名世界的“北京人” 黄慰文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5月 37页 32开

本书内容包括：“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北京人”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研究；“北京人”的相貌、文化、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等，共八个部分。

原始农业史话（中国农学普及丛书） 倪波、陈日朋编著 农业出版社 1985年5月 70页 插图31幅 32开

本书结合出土文物通俗地介绍了我国原始社会的农牧业情况。

夏文化论文选集 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3月 395页 插图32幅 大32开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发表了五十多篇探索夏文化的论文，本书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二十六篇，按发表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大致勾勒出我国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在探索夏文化研究中所持的各种观点。书后附有“探索夏文化论著目录”。

殷墟漫话 郭胜强、郭万青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 124页 插图3幅 32开

本书简要介绍殷朝繁盛与衰亡的历史以及近代人们发现殷墟和对这一古遗址的发掘、研究情况。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九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377页 插图38幅 黑白图版88页 16开

本书发表了两批安阳殷墟的人头骨材料。第一批是1928年至1937年间发掘安阳殷墟王陵区出自祭祀坑的人头骨材料；第二批是1950年以来采自殷墟中小墓葬的人头骨材料。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论文、图版和附录。在十二篇论文中，《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和《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两篇系新著；《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和《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是据旧著补充改写，或就个别章节加以修正而成的；其余八篇都是重印旧著。作者主要是杨希枚、潘其风和韩康信。附录部分包括西北岗区和大司空村等地两组头骨的各项测量数据及其它统计资料。

郑州商城初探 杨育彬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9月 文143页 插图22幅 黑白图版117幅 32开

本书分为十五章，系统地介绍了郑州商城的发现经过及出土文物，阐述了商城的布局、营建、社会经济、手工业、商业、交通、宫殿建筑、住所、墓葬、文化艺术等情况。书中对于郑州商城到底是商代哪一个时期的都城，也进行了较细致的考证。书末附录有：郑州商城沧桑、郑州商城的文物考古文献目录、郑州商城考古记事

大葆台汉墓（中国文物小丛书）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34页 插图35幅 32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一些图片介绍了大葆台汉墓概况及出土文物。书后附有“西汉燕（广阳）王世系表”和英文内容提要。

补1984年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贾兰坡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245页 插图28幅 黑白图版8页 16开

本书选编贾兰坡有关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论文或专著片断共二十三篇。其中包括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综述，对一些重要遗址的研究报道，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以及与其他学者进行的学术讨论等。书后附录：“贾兰坡著作部分目录”和黄慰文、卫奇的“编后记”。

楚史论丛（初集） 张正明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10月 306页 大32开

本书选编近年来楚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共二十一篇，其中包括关于铜绿山古铜矿、曾侯乙墓铜器、楚帛书和江陵古墓等方面的考古论文多篇。

东周与秦代文明 李学勤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6月 383页 插图

181幅 大32开

本书用大量文物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资料，综述东周与秦代考古研究成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迄今出土的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的历史问题；第二部分，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丝织品及其制造技术和货币、玺印、简牍、帛书、文字等。

肆 考古学专论

一 甲骨卜辞与古文字研究

古文字学初阶（文史知识丛书） 李学勤著 中华书局 1985年5月 87页 插图20幅 32开

本书是一本学习古文字学的入门书。曾在1984—1985年的《文史知识》上连载。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什么是古文字学；文字起源之谜；甲骨学基础知识；金文的形形色色；战国文字研究；方法与戒律等等。

古文字趣谈 陈炜湛著 花城出版社 1985年1月 145页 32开

本书是一本短篇集子，共收文章三十一篇，通俗地介绍了古文字的来龙去脉及有关古文字学的基本知识。

中国甲骨学史（中国文化史丛书） 吴浩坤、潘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12月 文407页 黑白图版20页 大32开

本书共十一章，包括：甲骨文的发现、搜集与流传；殷墟发掘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卜甲与卜骨；卜法与文例；文字；文法；断代；辨伪与缀合；甲骨文与诸学科的关系（上、下）；甲骨文研究的回顾。胡厚宣、戴家祥分别为本书作序。书后附录：一、甲骨大事简表，二、甲骨著录简表（已刊部分），三、甲骨论著目录。

小屯南地甲骨考释 姚孝遂、肖丁著 中华书局 1985年8月 彩印本 373页 16开

本书吸收近几十年甲骨刻辞研究的新成果，将《小屯南地甲骨》（1980年10月出版）进行了考释。另外，还将这批甲骨的释文全部附在后面，便于直接引用，也便于对照原片阅读复查。

补1983年

汗简、古文四声韵 （宋）郭忠恕、夏竦撰 中华书局 1983年12月 227页 16开

《汗简》四卷，宋郭忠恕撰，《古文四声韵》五卷，宋夏竦撰。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分别用冯恕本和宋刻配抄本影印并附有“出版后记”和“通检”。又将《碧落碑》附于书后。

二 商周铜器及铭文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青铜器〈上〉）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100页 彩色图版240幅 10开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分上下两册，上册选录商、西周等时期的青铜器精品二百余件，其中以考古发掘品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重要传世品。上册

卷首刊载李学勤的《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作为综述。每幅图版均有较详细的文字说明。

殷墟青铜器（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二十四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169页 插图23幅 墨线图及拓片91页 彩色图版84幅 黑白图版161幅 16开

本书是关于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学术性著作。收录建国以来殷墟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二百余件，其中约四分之一系首次发表。凡属比较重要的青铜器在图版中均有细部特写，其中大部分绘制有墨线图，有些还有纹饰和铭文拓片。文字部分除前言和图版说明外，还收录三篇论文，即郑振香、陈志达的《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杨锡璋、杨宝成的《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张孝光的《殷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

金文编 容庚编著 张振林、马国权摹补 中华书局 1985年7月 影印本 1505页 16开

本书是一部金文字典。1925年初版，1939年和1959年曾两次修订再版。全书引用器目共三千九百零二器，正编字头二千四百二十号，重文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个，附录一千三百五十二文，重文一千一百三十二个。书末附"器目"和"检字"。

啸堂集古录（宋人著录金文丛刊） （宋）王俅撰 中华书局 1985年6月 影印本 221页 16开

本书据宋淳熙三年以前刻本影印，并附容庚所作述评。

钟鼎款识（宋人著录金文丛书） （宋）王厚之辑 中华书局 1985年7月 76页 插图66幅 16开

本书据嘉庆七年阮元刻本影印，并附容庚所作述评。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南宋）薛尚功编著 辽沈书社 1985年7月 影印本 488页 大32开

本书据缪荃孙旧藏康熙五十八年虞山陆友桐抄本影印。

说文古籀三补 强立开编 武汉古籍书店印行 1985年6月 影印本 2册 32开

补1984年

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1984年8月 文65页 彩色图版12页 黑白图版326页 8开

本书是殷周时代有铭铜器资料的集成性汇编。所收资料包括殷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各类有铭铜器，年代下限断至秦统一以前。预计将达一万余件内容包括铭文、图象、释文和索引，而以铭文为主体。全书以器类为纲，排列的先后顺序是：乐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他。各类器物的铭文，按照字数从少到多排列，用原拓、原大制版。全书共计二十册左右，每个分册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第一册为"钟类铭文（一）"，收器二百八十五件。夏鼐的"前言"列于卷端，并有王仲殊的"出版说明"和全书的"编辑凡例"等。

殷周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

二号）容庚、张维持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新1版　文152页　插图104幅　黑白图版158页 16开

本书是一本系统研究中国殷周青铜器的著作。全书共十章，结合器物的制作、形制、用途、铭刻、埋藏和发现、年代的考订，论述了青铜器对历史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探讨了青铜器的制作上和整理研究上的技术问题；最后对历代著录青铜器的重要书籍作了评介。本书曾由科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这次重印，作者对全书作了校订，改正了若干明显错误。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四册〕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文物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41页　彩色图版8幅　黑白图版197幅　16开

本书选编宝鸡和咸阳地区出土的西周铜器一百九十七件，凡有铭文的均附拓片，并作释文。"图版说明"对每件器物作了详细著录。书后附有参考资料和英文内容提要。

青铜装饰纹样选　邵大地编绘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5月　文4页　图90页　32开

本书收人的纹样，侧重于历代流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纹样。大部分是根据青铜器出土文物上的纹样，经过重新加工整理绘制而成。

三　碑刻

八琼室金石补正（附：金石札记、金石祛伪、元金石偶存）　（清）陆增祥撰　文物出版社　1985年8月 970页　16开

碑别字新编　秦公辑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482页　32开

本书收录历代近两千种碑石的别字，又援引了《增订碑别字》和《碑别字续拾》两书内容。上起秦汉，下迄民国，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以及历代书法艺术的工具书。全书按笔画次序排列。书后附"笔画索引"。

石鼓斠释　邓散木著　中华书局 1985年5月　40页32开

本书对《石鼓》中一些问题作了简明考释。

六朝墓志检要　王壮弘、马成名编纂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年2月 441页　大32开

本书是一部检索墓志的工具书，收录汉至隋墓志近千种。对各志真伪、时代、尺寸、行数、书体、原石出土时地及版本等情况，均作简要介绍。书后附有"检索书名简繁对照表"和"目录索引"。

避暑山庄碑文释译　杨天在编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8月　文120页　彩色图版4幅　黑白图版3幅 32开

本书对避暑山庄现存十一座碑刻上的二十六篇诗文分别作了说明、注释和翻译。对了解避暑山庄当年的自然风貌，园林与古建的营造情况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外八庙碑文注译　齐敬之编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8月　文102页　彩色图版4幅　黑白图版10幅 32开

建于避暑山庄外的八座寺庙，均有康熙或乾隆帝撰写的碑文，多

数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分别记述了外八庙修建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本书为这些碑文一一作了注释，并附译文。

补1984年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年11月 文236页 黑白图版220幅 16开

本书收录已发现的泉州伊斯兰教碑刻二百余方，分为教寺建筑石刻和墓葬建筑石刻两大类，对这些碑刻的来源作了记录，对其造型作了描述，对碑上的外文作了全文翻译，并附原碑古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现代书写体，以便读者对照，并对碑刻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书前有白寿彝、庄为玑的两篇序文。

四 简牍、文书、帛书

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9月 文172页 彩色图版2幅 黑白图版94页 摹本122页 8开

本书第一辑收录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包括图版、摹本、释文三部分。

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 吴九龙释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2月 246页 大32开

本书主要包括：叙论、银雀山汉简释文、元光元年历谱（复原图））、银雀山汉简校注本分类目录。共四个部分。其中"银雀山汉简释文"是按原简出土顺序号排列的，共四千九百四十二号。

楚帛书 饶宗颐、曾宪通编著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5年9月 文334页 黑白图版47页 大16开

本书包括六篇论文，其中饶宗颐的四篇：楚帛书新证、楚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楚帛书之内涵及其性质试说、楚帛书之书法艺术。曾宪通的两篇：楚帛书研究四十年、楚帛书文字编。

马王堆汉墓帛书（四）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167页 插图4幅 彩色图版2幅 黑白图版116页 8开

本书共收入古医书十五种。全书分为"图版"和"释文注释"两大部分。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596页 黑白图版4幅 大32开

全书共分十册，前五册已经出版。第六至十册为唐代文书。这批文书有随葬衣物疏、地契、功德录、告身以及契约、帐簿、名籍、符牒、典籍等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秦汉魏晋出土文献） 林梅村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2月 133页 插图16幅 大32开

本书所录文书，系本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潜入新疆楼兰地区和尼雅河流域，进行考察时所获，

绝大部分是魏晋时期的遗物。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前言，二、楼兰尼雅遗址概述，三、楼兰尼雅出土文书释文，四、文书出土地点编号与著录编号一览表。书后附“参考文献要目”。

补1983年

敦煌吐蕃文献选 王尧、陈践译注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8月 文209页 黑白图版4页 大32开

本书根据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的影印件选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吐蕃律例文献，二、社会经济文书，三、古代藏文译文，四、藏文记载的吐蕃周边其他民族情况，五、早期藏医藏药文书。是藏人记录藏事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五 其他

铜鼓（祖国丛书） 蒋廷瑜著 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 135页 插图38幅 32开

本书原名《铜鼓史话》，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次经作者修订后改为现名，收入“祖国丛书”。内容包括铜鼓的历史记录、铜鼓的发现、用途、溯源、铸造工艺、装饰及铜鼓的研究等。

中国钱币论文集 中国钱币学会编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5年9月 文356页 插图104幅 彩色图版9幅 黑白图版7页 16开

本书收入论文四十篇。书前是千家驹的代前言，题为《开拓一条研究中国钱币的新路》。

补1984年

中国古代货币史 萧清著 人民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328页 插图22幅 黑白图版24页 大32开

本书联系历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吸收了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成果，运用大量出土实物和发掘报告的资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货币的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中国货币的起源”，第二章为“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确立”，第三至八章分别论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货币与货币流通。

中国古代铜镜 孔祥星、刘一曼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212页 插图99幅 黑白图版64页 大32开

本书主要依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古代铜镜作了概述。全书将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即早期阶段、发展与流行、繁荣鼎盛、中衰、高度发展及日趋衰落阶段，明确了各个阶段铜镜的类型及特点，并将国内外研究中国古镜的一些成果作了介绍。

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 叶其峰主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321页 图版303页 24开

本书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肖形印打本。选品分春秋前、战国、秦、汉四个时期，按时代先后及印纹内容分类编排。每方印均包括印纹、印纹封泥、形制三部分。每方印均注明时代和尺寸，印纹内容可考者均加扼要说明。书后刊有叶其峰的《故宫博物院藏肖形

印述略》专文。

伍 美术考古

一 通论

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丛书） 田自秉著 知识出版社 1985年1月 文384页 插图99幅 彩色图版13幅 黑白图版125幅 大32开

本书是一本比较详尽系统地汇集和整理我国古今工艺美术史料，阐述我国各种工艺美术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分析艺术特色，介绍制作工艺的史论著作。全书按年代顺序编写，分为原始社会、商代、周代、春秋战国、秦汉、六朝、隋唐、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及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共十三章。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龙宗鑫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377页 插图51幅 彩色图版28幅 黑白图版47幅 大32开

本书按朝代分为原始社会、商周、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九章。把各个时期、各类品种的沿袭继承关系及各品种之间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了解我国各种工艺美术的发生、发展、衍变的资料和大体概况。

丝绸之路造型艺术 《新疆艺术》编辑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年9月 372页 插图132幅 大32开

本书收入石窟寺艺术、绘画、雕塑、岩画、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三十五篇。书前有常任侠的“序言”。

补1983年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3月 文133页 插图34幅 彩色图版59幅 黑白图版113幅 大32开

本书根据社会发展史的顺序分为五章，分别概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百年和新中国的工艺美术时代风格的形成和演变，介绍了重点工艺品种的特点、成就和它们的继承关系。书后附有“中国历代器皿造型简表”、“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简表”。

二 古代雕塑与佛教美术

南阳汉代画像石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63页 插图64幅 黑白图版679幅 8开

南阳是我国出土汉代画像石较多、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本书收录南阳汉代画像石刻共五百四十三幅，画中反映的内容包括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文字部分为《南阳汉代画像石概论》，论述了汉代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画像石墓及画像内容与艺术风格。

河南汉代画像砖 周到等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4月 文17页 黑白图版323幅 16开

本画册共选收三百余幅作品，系统地介绍了河南出土的汉代画像

砖纹样。全书共分四编：一．阴线及阳线刻，二（甲）、浅浮雕，二（乙）、阳线刻、阴线刻，二（丙）阴刻兼阳线，三．高浮雕，四．小砖图案花纹。附录：画像砖造型选。

徐州汉画像石　徐州市博物馆编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16页　插图10幅　黑白图版270幅　12开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汇集了新近取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选收了汉画像石原石照片及拓片二百七十幅，较全面地反映了徐州画像石的面貌。书前有张道一的序文。

陕北东汉画像石（陕西古代美术巡礼2）　陕西省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12页　黑白图版28幅　16开

本书是一本简明的图录，收录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一带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书后有图版说明，注明出土地点及画像风格特点等情况。

霍去病墓石刻（陕西古代美术巡礼3）　陕西省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5月　文5页　彩色图版17幅　16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图版及图版说明，介绍了霍去病墓石刻概况。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5月　375页　32开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是一项新的考察研究成果，它按现行大足文物保管所的龛窟编号加以勘察、考定后整理编写而成，所列项目包括名称、时代、形制、内容、石质、附注等六个部分。

大足石刻研究　刘长久等编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4月　文576页　彩色图版10幅　黑白图版46幅　线图4幅　16开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大足石刻研究文选”，收录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的重要研究文章二十七篇，并附录“大足石窟考察研究文献目录索引”；中编“大足石刻志略校注”；下编“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是对大足石窟的最新考察成果。

少林寺石刻艺术选　苏思义等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14页　黑白图版108幅　16开

本书选取少林寺保存完整的唐、宋、金、元、明、清的线刻及宋代浮雕作品作了介绍。

补1984年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二卷）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　1984年10月　文72页　插图108幅　彩色图版192幅　16开

本书第二卷收录隋代计四十九个洞窟的彩塑和壁画及四篇论文，其中包括：李其琼的《隋代的莫高窟艺术》，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的《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萧默的《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和高田修的《佛教故事画与敦煌壁画》。书后附有《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二）。

奉先寺　龙门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6页　彩色图版3幅　黑白图版35幅　16开

本画册介绍了洛阳龙门著名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文字部分对大像龛的开凿历史及造像艺术作了简要叙述。书后附有英文提要。

安岳石刻 安岳文物保管所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年11月 30页 插图26幅 32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照片介绍了安岳石刻概况及圆觉洞、千佛寨、卧佛院、毗卢洞、茗山寺、玄妙观的石刻概况。

南朝陵墓雕刻（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林树中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19页 插图12幅 黑白图版39页 16开

本书对南京附近的南朝陵墓石刻作了全面介绍，书前为八十八幅图版，书后为林树中的综述性文章:《南朝陵墓雕刻》，全文分五个部分：一、概述，二、石刻名称，三、石刻的分期与时代、风格特点及其艺术成就，四、陵墓石刻艺术的渊源与中外文化交流，五、南北朝石刻的比较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宋陵石雕 林树中、王鲁豫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7月 文13页 插图4幅 黑白图版29页 16开

本书作者经过实地调查，从宋陵石雕中精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介绍。书前为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永昭陵、永厚陵、永裕陵、永泰陵的部分石雕图版，书后为林树中、王鲁豫的文章:《宋陵石雕》，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宋陵石雕的概况，二、宋陵石雕的继承与前瞻，三、宋陵石雕的分期及各期的代表作品，四、宋陵石雕的艺术特色。

武威汉代木雕（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张朋川、吴怡如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年3月 文6页 黑白图版31页 16开

本书收录武威汉代木雕图版五十二幅，每幅图版均附有文字说明。书后有张朋川、吴怡如写的《雄浑简洁的武威汉代木雕》一文，详细介绍了木雕的出土情况和艺术风格。

三 古代建筑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 许永全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5年8月 文193页 插图53幅 黑白图版42幅 32开

本书1924年初版于伦敦。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第二章：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第三至八章：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结构作了详细记录，附有大量的照片和五十多幅城门实测图，史料价值较为珍贵。

中国的古名桥 潘洪萱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152页 黑白图版24幅 32开

本书是“神州风物丛书”之一，内容主要介绍我国古代桥梁的历史、发展、类型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除深入浅出地介绍有关桥梁的常识外，还从数以万计的古桥中，择其最有代表性的名桥三十

余座，按年代、功能、类型为顺序，一一详加介绍。

妙应寺白塔（中国文物小丛书） 北京市白塔寺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6月 34页 插图43幅 32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较多的图片，介绍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的建筑年代、形制与结构、及白塔寺现存建筑和主要文物。书后附有“妙应寺平面图”和英文内容提要。

布达拉宫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28页 彩色图版155幅 16开

本画册系统地介绍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和宫内陈设。包括塑像、壁画、唐卡、灵塔和文物等古代藏族艺术品。全部图版彩色精印。书前有前言一篇，叙述布达拉宫的历史、建筑特点和艺术风格。全部文字用藏汉文对照排印。

萨迦寺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14页 彩色图版110幅 16开

本画册主要介绍创建于南宋末年的西藏佛教萨迦教派的主寺——萨迦南寺。该寺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各种佛像、壁画、唐卡、经籍图书、瓷器等珍贵文物。全部图版彩色精印。前言、说明用藏、汉两种文字排印。

大昭寺 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年5月 文24页 插图28幅 彩色图版108页 12开

大昭寺始建于唐代，是汉藏两族人民长期友好团结的象征。全书以图片为主，文字部分分别论述了大昭寺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雕塑（刻）、壁画艺术以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书前有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序文。

罗布林卡 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年5月 文40页 插图68幅 彩色图版136页 12开

本书是西藏古建筑丛书之一。全书以图片为主，文字部分对罗布林卡的兴建和历史发展、建筑艺术、园林风格、以及各主要建筑物的结构、功能、特点等作了分析和研究。

圆明园 黄韬朋、黄钟骏编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年6月 文32页 插图23幅 彩色图版87幅 黑白图版180幅 大16开

本书是一部以图片全面介绍圆明园的画册，以大量彩色照片、珍贵的彩绘、铜版图、历史照片等，展示了圆明园的现状、盛时及被毁初期的景况。并有专文详述圆明园的建造历史、造园艺术特点、被焚毁的经过等。

避暑山庄园林艺术 孟兆祯编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85年4月 110页 插图28幅 32开

本书分为二章，探索了“避暑山庄的兴建”，并从七个方面分析了“避暑山庄的园林艺术”。

清东陵大观 于善浦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5月 文299页 插图30幅 黑白图版2页 大32开

清东陵是我国现存的体系完整、

规模庞大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之一。本书介绍的是：顺治帝孝陵和顺治后孝东陵，康熙帝景陵和景陵妃园寝、景陵双妃园寝，乾隆帝裕陵和裕妃园寝、咸丰帝定陵和两后定东陵、定陵妃园寝，同治帝惠陵和惠陵妃园寝，以及风水墙外的昭西陵、和太子、公主坟墓等。

秦汉瓦当（陕西古代美术巡礼 5）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23页 彩色图版140幅 16开

本书是一本图录，精选了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秦汉瓦当百余面，以时代为序编排，并附有小注，注明瓦当时代、尺寸、出土地点、特征等情况。书前有傅嘉仪撰写的序文。

补1984年

建筑史论文集（第六辑） 清华大学建筑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年8月 184页 插图228幅 16开

本辑与考古有关的内容有：宋《营造法式》术语汇释，魏晋南北朝园林概述，现代摄影测量在古建筑测绘中的运用等。

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三、四辑）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2月 254页 插图144幅 16开

本书收录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论文共十七篇。其中有罗哲文的《略论古建筑的保护》、陶复的《建筑考古三十年综述》、萧岚的《试谈中国古代建筑的抗震措施》，此外还包括中国古代城市、古代园林、古代桥梁等方面的内容。

北京古建筑掠影 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编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1页 彩色图版46页 12开

本书以精美的彩色照片和简要的文字说明，介绍了北京的宫殿、坛庙建筑、园林建筑和四合院住宅建筑。

中国名塔 张驭寰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51页 彩色图版30幅 黑白图版23幅 大32开

本书文字部分主要包括：一、中国名塔概说，二、五十二座名塔的分析。

崇圣寺三塔（中国文物小丛书） 邱宣充、姜怀英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33页 插图53幅 32开

崇圣寺三塔是我国著名佛塔。本书以大量照片和简要的文字简介三塔的建筑与维修，并对塔内出土文物作了介绍。书后附有英文内容提要。

佛光寺（中国文物小丛书）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34页 插图53幅 32开

本书简要介绍佛光寺概况及其东大殿、文殊殿、墓塔、石雕像等文物。书后附有英文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名园（神州风物丛书） 刘策等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年11月 文169页 黑白图版24幅 32开

本书阐述中国古典园林的渊源、类别、特色以及不同的造园艺术技巧。并根据皇家、府宅、宗教

祭祀和公共游豫等四类园林，列选我国各地古典名园三十处，详加介绍。书前有陈从周和赵光华的两篇序文。

中国江南园林访古（中国旅行知识丛书）　周沙尘主编　杨鸿勋、王贵祥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　160页　插　图26幅　彩色图版8幅　32开

本书主要描写江南私家园林的湖山、庭院、山石、水池、亭阁等等，同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产生与发展，中国造园艺术对国外造园艺术的影响和皇家宫苑的建造知识等，也作了形象的描述。

北京园林名胜　北京市园林局、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编辑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1984年10月　文1页　彩色图版44页　12开

本书以精美的彩色照片和简要的文字说明，介绍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北海、天坛、香山、十三陵、国子监、圆明园等古典园林和名胜古迹。

圆明园（第三集）　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年12月　219页　插图164幅　16开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圆明园学术研究论文五篇，圆明园资料二篇，圆明园钩沉录五篇及园林、古建筑、风景区研究方面的文章七篇等。

圆明园资料集　舒牧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年12月　409页　插图99幅　32开

本书以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并广泛搜集了其它一些单位的文献资料编辑而成。书中除收入有关圆明园的景物、建筑、历史、掌故以及帝国主义毁园暴行等文献资料外，也选收了一部分记写圆明园的笔记和诗歌作品。书末附有《圆明园大事年表》和《圆明园文献目录》。

古莲花池　孟繁峰等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11月　文119页　插图20幅　彩色图版12幅　32开

保定市古莲花池始建于金末，是北方现有实景名园中较为古老的一座。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一、沿革概说，二、初建始末，三、圮后重建，四、城市蓬莱，五、莲池书院，六、古园今貌。书后附录有“古莲花池大事摘记”、“临漪亭与古莲花池始建年代考”等共六项。

昭陵（中国文物小丛书）　昭陵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32页　插图41幅　32开

本书简要介绍唐太宗昭陵概况及其出土文物。书后附“昭陵陪葬墓位置示意图”和英文内容提要。

四　陶瓷与窑址

中国陶瓷·长沙铜官窑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24页　彩色图版194幅　8开

本书是一部大型陶瓷图录，选收东汉至现代长沙铜官窑陶瓷器物一百八十五件，每件器物均附有图版说明。书后的文字部分包括两篇文章：肖湘的《长沙铜官窑》和罗平章、肖利民的《现代铜官陶瓷》。

中国陶瓷·广西陶瓷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22页 彩色图版244幅 8开

本书是一部大型陶瓷图录，选收新石器时代至现代广西陶瓷器物二百三十八件，每件器物均附有图版说明。书后的文字部分包括两篇文章：韦仁义的《广西出土陶瓷》、平有舜的《广西现代陶瓷》。

中国陶瓷 华石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212页 插图54幅 彩色图版225幅 黑白图版180幅 16开

本书收录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不同窑口的陶瓷器四百余件，其中大多数系全国各地博物馆珍藏的出土文物，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代表性。李知宴为本书撰写的《中国古代陶瓷概述》一文，对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的概述。书后附有较详细的图版说明和英文提要。

瓷国游历记 路易·艾黎著 轻工业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134页 插图87幅 彩色图版25幅 16开

本书分三十四章，介绍了中国古窑址的历史沿革、产品的独特艺术风格和精湛的制作技艺。书中有多幅珍贵插图和有关古窑址发掘的记载。书后附有著者在上海“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上的演说词。

中国彩陶艺术（中国文化史丛书） 郑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12月 文81页 插图47幅 彩色图版141页 黑白图版39页 大32开

本书从现有的资料出发，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发现的彩陶，按其地区范围、纹饰主题和类型等加以排比分类和分析研究。并从彩陶制作工艺、艺术风格出发，探讨了各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及渊源。

彩陶与彩绘陶器 张孝光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5页 彩色图版12页 黑白图版138页 24开

本书是根据各地出土的彩陶和彩绘陶器摹绘的摹本。以新石器时代彩陶为重点，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的彩陶，以及辽宁、陕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新疆等地出土的彩绘陶器。

日照两城镇陶器 南京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20页 彩色图版9幅 黑白图版87幅 16开

山东日照两城镇是1936年尹达主持发掘的典型龙山文化遗址。为了纪念尹达同志，南京博物院将其收藏的这次发掘所获部分陶器，选拍九十六幅照片，编辑成册。书前有夏鼐所写悼念尹达的文章。

洛阳唐三彩 洛阳博物馆编 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11页 彩色图版104幅 12开

本书是一本彩色图录，收录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器物百余件，每件均著录器物通高和出土地点。文

字部分是苏健的文章《艺海瑰宝——唐三彩》，介绍了唐三彩产生的背景、制作工艺、艺术成就、外传与演变等。

唐三彩（陕西古代美术巡礼1） 陕西省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12页 彩色图版26幅 16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图版及图版说明，介绍了陕西省西安、咸阳、乾县、富平等地出土的唐三彩。

补1984年

四川古陶瓷研究（一） 《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年6月 315页 大32开

本书收入论文、资料共四十七篇，以发表的先后为序，分综合、专题论述两个部分。其中包括四川瓷器的化学分析鉴定、四川陶瓷概论、四川古代窑址、邛窑、青羊宫窑、磁峰窑、广元窑等内容。

甘肃彩陶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第2版 文25页 彩色图版39幅 黑白图版168幅 16开

本书是一本图录，收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甘肃仰韶文化的遗物，主要是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器。大致按早晚发展顺序编列，尽量将同地和同墓区的彩陶编在一起。每件器物均有图版说明列于书后。书前是张学正、张朋川写的前言。本书初版于 1979年12月。

五 古代绘画

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张朋川、张宝玺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2月 文8页 插图2幅 黑白图版61幅 16开

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是研究魏晋时期绘画的重要资料。本画册从六百余幅壁画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六十余幅画，书后有张朋川介绍壁画内容和分析其艺术性的文章一篇。

北魏孝子棺线刻画（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 黄明兰编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4月 文8页 黑白图版12幅 16开

北魏孝子棺画像原石，解放前出土于河南洛阳，当时即被盗卖国外，国内从未完整出版。本书的图版是根据原石拓片照相制版印制的。

永泰公主石椁线刻画（陕西古代美术巡礼4） 陕西省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4页 黑白图版23幅 16开

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图版及图版说明，介绍了永泰公主石椁线刻画的概况。

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 汪宁生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133页 插图117幅 彩色图版8页 黑白图版16页 16开

云南沧源崖画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它对研究我国西南边疆及东西亚地区古代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形象化资料。全书共

分七章：一、绪论，二、一般特征，三、崖画地点，四、内容和题材，五、作画目的和社会作用，六、年代与分期，七、人类学的考察。书后作者的"后记"，将当今世界上崖画艺术研究情况作了介绍。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　山西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3月　文41页　彩色图版181幅　黑白图版2幅　8开

宝宁寺是山西省右玉县的一座大寺，寺内有水陆画一堂，为明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共计一百三十九幅。这本图录以彩色图版、图版说明和书前吴连城的文字叙述，全面介绍了宝宁寺水陆画的内容。

补1984年

毗卢寺壁画　河北省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编　河北美术出版社　1984年7月　文10页　彩色图版52幅　黑白图版72幅　8开

毗卢寺壁画是研究古代"水陆画"形成和发展的一处有代表性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壁画遗存。本画册收入壁画图版124幅，全面展示了壁画的题材内容、技法特点等。王海航、陈耀林写的"代序"，对毗卢寺和毗卢寺壁画作了全面介绍。

六　古代书法

颜真卿（第五册）　（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编辑组编辑　文物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5页　插图7幅　黑白图版284页　8开

本册包括《夔州都督府长史颜勤礼碑》、《尚书左仆射扶风王马璘碑》、《钱塘县丞殷君夫人颜君碑》、《颜氏家庙碑》、《赠和州刺史张敬因残碑》。

碑帖鉴别常识（书法知识丛书）　王壮弘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年4月　文121页　插图82幅　黑白图版64幅　32开

本书以介绍碑帖版本知识为主，是一本知识性的书籍。全书包括：碑贴概论、石刻文字概论、拓本、碑帖鉴别举例等章节。书后附有：影印本历代墨迹真伪表（元以前）。

补1983、1984年

西安碑林书法艺术　李域铮等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10月　文160页　插图29幅　彩色图版14页　黑白图版210页　16开

本书全面系统的对西安碑林的历史、现状、藏石情况，均作论述和介绍，重点精选历代名碑百余种，计二百余幅图版，详加说明。文字部分包括《前言》、《中国书法发展历史撮要》、《西安碑林概说》。附录《西安碑林藏石细目》、《历代建置增修记碑》等共四项。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山东省泰山风景区管理局、山东省泰安地区文物管理局藏拓　齐鲁书社　1984年3月　61页　8开

本书据泰安地区文物管理局所藏1965年拓本缩小影印。

七　古代工艺美术

中国历代鸟纹图案　濮安国编绘　轻工业出版社　1985年12月　文5页　黑白图案250页　16开

本书收集整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历代的鸟纹图案，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鸟纹图案的各种形式和艺术特点，内容较为丰富。

故宫博物院藏雕漆　故宫博物院编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55页　彩色图版88幅　黑白图版308幅　8开

本书收录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元明清时期的精美雕漆工艺品三百余件，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发表，系统反映了这一时期雕漆工艺的发展概况和辉煌成就。书前有李久芳的文章:《元明清雕漆工艺概论》。书后附有“图版说明”。

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图案选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5年　文5页　图95页　10开

本书是为满足广大工艺美术工作者的需要，便于对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纹样、图案进行研究而选编的。选材与所绘的纹样、图案从工艺美术要求出发，与一般的考古绘图不同。本书《前言》对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纹饰作了概要介绍。

补1984年

怎样鉴定古玉器　栾秉璈著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0月　152页　插图52幅　32开

本书是一本知识性的文物鉴定小丛书，目的在于向广大考古工作者提供一些鉴别、研究古玉器的线索和方法。全书共分四章，先介绍我国传统的玉石特点和玉器的基本知识，然后介绍运用矿物学和宝石学中的一些科学鉴定方法来鉴别古玉的方法，最后介绍我国重要的传统玉石产地。

陆　古代科学技术

科技史文集（第13辑金属史专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技术史研究室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152页　插图85幅　黑白图版20页　16开

本文系汇集了采矿史、冶金史、金属工艺史方面的论文，共十七篇，从几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根据考古资料进行中国古代金属史研究的成果和学术动向。书后有华觉明的“编后记”，对所收论文作了概略介绍。

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　赵匡华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8月　683页　插图55幅　大32开

本文集选编了全国自1977年至1984年止公开发表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论文，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医药与炼丹术化学、古代冶金化学、古代化学工艺等方面共五十四篇。

中国古代书籍史（文物考古知识）　李致忠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2月　197页　插图27幅　32开

本书包括五个部分：一、绪论，二、文字的起源与书籍的产生，三、书籍的生产，四、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五、中国古代对书籍生产和流通的管理。

补1984年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国家计量总局等主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37页　插图4幅　黑白图版189页

16开

本书从新出土和传世的度量衡器物中，选择了二百四十件，分度、量、衡三部分，每部分器物以时代先后为序，每件器物都有简要的图版说明。“前言”着重阐述我国度量衡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能够说明一时代量制的记容、记重器物，选收了十四件，作为附录。本书曾于1981年10月出版8开本，现改为16开本，编排作了适当的改变，文字说明略作删改和订正。

金属文物鉴赏　金永林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年6月　160页　插图35幅　32开

本书以通俗的笔调，通过典型的金属文物，把我国古代金属工艺方面的成就及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联系，系统地作了介绍。

柒　古代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　《新疆艺术》编辑部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年9月　378页　插图46幅　大32开

本书收入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的文章共三十二篇。书前有常任侠写的“序言”，对丝绸之路的艺术研究作了概述。

补1984年

中国古代服饰史　周锡保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　542页　插图842幅　彩色图版29幅　16开

本书按照中国自古以来至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分为十五章，系统地阐述中国服饰的形成、服饰特色和服饰制度的演变发展。每一章皆以文献和图例分述男和女的官定服饰和日常服饰，并附述历代礼仪习俗。

中国服饰五千年　上海市戏曲学校中国服装史研究组编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学林出版社　1984年3月　256页　插图452幅　大16开

本书是一部图谱性质的服饰简史，全书按时代顺序，分为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共九章，分别论述各个时期的服饰特点和演变过程。书后附录五种：一、历代服饰沿革表，二、服饰部位名称图释，三、本书服装展示图尺寸表，四、参考书目，五、图版索引。

中国舞蹈史（明、清部分）　王克芬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8月　203页　插图122幅　大32开

本书是在原中国舞蹈史教材编写组编著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篇》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的。其中“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西夏元”部分已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出版。“明、清部分”共分三章：一、戏曲舞蹈，二、民间舞蹈，三、礼仪、宴乐舞蹈。

捌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万里长城　刘金柱编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年4月　113页

插图51幅 32开

本书是一本介绍长城的普及读物，重点介绍长城的形成历史、关隘情况、军事特点、建筑构造与材料等内容。

金山岭长城（中国文物小丛书） 河北省滦平县文化局编 文物出物社 1985年6月 34页 插图39幅 32开

金山岭长城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乡东南处，是我国现存长城的杰出部分。本书以简要的文字和大量的图片对它作了介绍。书后附有英文内容提要。

北京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编 北京出版社 1985年8月 380页 插图85幅 大32开

本书分为八章，从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全面介绍了北京的变迁与发展的历史。

北京史苑（第二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 北京出版社 1985年6月 349页 插图23幅 大32开

本书包括：文学论丛、经济史话、历史地理、水利史话、王府丛谈、园林山水、坛庙寺观、名胜古迹等栏目，共三十三篇文章。

北京史苑（第三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史苑》编辑部编 北京出版社 1985年11月 442页 插图31幅 大32开

本书分为：燕京春秋、经济史话、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坛庙寺观，风景名胜等共十五个栏目，收文章四十六篇。书后附《北京城宫殿之图》。

北京名胜古迹图 芦盛美绘图 知识出版社 1985年2月 1幅 全开

五台山史话 史旺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 144页 插图13幅 32开

本书从五台山纵横各方面，包括地理、地貌、史实、风物、宗教沿革、寺院变迁、历史名人等，共列三十七个专题进行论述。

南山寺 郝晓丽编写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7月 19页 32开

本书是一本通俗性小册子，简要介绍了山西五台山南山寺的主要建筑。

菩萨顶 降青松、郝玉林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7月 16页 32开

菩萨顶位于山西五台山，创建于北魏，现存建筑均为康熙年间所建。本书对该寺的历史沿革、建筑特色等作了通俗的介绍。

古都洛阳纪胜 任华光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2月 171页 32开

本文包括：九朝故都——洛阳、历史上的洛阳五城、洛阳八大景、洛阳八小景、洛阳远郊揽胜等，共十四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古都洛阳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名胜古迹。

洛阳白马寺（文物考古知识） 徐金星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2月 124页 插图54幅 32开

洛阳白马寺是我国佛教的发祥地。本书分为五个部分：一、白马寺名称的由来，二、白马寺的创建，三、白马寺与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四、饱经沧桑的白马寺，五、白马寺现存文物。

相国寺考（修订本） 熊伯履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5月 238页 大32开

本书初版于1963年，共十一章，分别叙述该寺从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和民国，迄止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概况，是一部经过科学方法整理的相国寺的综合历史文献。书后附录："大相国寺碑"、"重修相国寺并建行馆小记"等。

武侯祠揽胜 章映阁等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10月 文221页 插图41幅 彩色图版8页 32开

本书将武侯祠的殿、堂、楼、亭的建筑风貌及碑刻、泥塑、古墓、匾额、楹联等珍贵文物作了真实的描述。

扬州史话 朱福烓、许凤仪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7月 文220页 黑白图版8幅 32开

南诏史话（文物考古知识） 李昆生、祁庆富著 文物出版社 1985年3月 154页 插图52幅 32开

本书利用古代文献、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编写而成。全书分为九个部分，以时间先后为基本线索，对滇洱地区的原始社会、南诏崛起之前西南地区的形势以及南诏崛起，直到南诏国的灭亡，作了系统的叙述。其间，对南诏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民族、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综合阐述，并将南诏国时期遗留至今的文物也择要介绍。书后附有："南诏世系纪年表"。

补1984年

中国名胜词典（江西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69页 插图18幅 黑白图版4幅 32开

本书共收江西名胜古迹二百三十九条。书前有"江西名胜古迹简介"一篇。

中国名胜词典（陕西分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45页 插图21幅 黑白图版4幅 32开

本书共收陕西名胜古迹一百九十六条。书前有"陕西名胜古迹简介"一篇。

名胜古迹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1984年4月 298页 插图105幅 32开

本书内容包括：《长城史话》、《故宫史话》、《颐和园史话》、《避暑山庄史话》、《西湖史话》、《敦煌艺术》、《秦兵马俑》和《赵州桥》。

名城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1984年6月 2册 548页 插图93幅 32开

本书包括《西安史话》、《唐代长安》、《洛阳史话》、《南京史话》、《开封史话》、《杭州史话》、《北京史话》、《苏州史话》、《太原史话》、《天津史话》、《广州史话》和《桂林史话》。

中国历史名城巡礼（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梁筠、何扬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297页 彩色图版25幅 大32开

本书介绍了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置沿革、历史掌故、风土

人情、古代文物和革命胜迹。每一名城既有概貌的综合介绍，又有分项的单篇描绘。并对一些名词术语作了注释。

北京风光（中国名胜地质丛书） 王兴岩等编著 地质出版社 1984年7月 180页 插图100幅 大32开

本书是一本科普读物，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地区的山水风光和名胜古迹，并运用地质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地理、历史、考古方面的知识，说明北京山水的形成与发展，"北京人"的出现和演化，北京城的诞生和发展，名胜古迹的分布及其与山水地质条件的关系。

五台山 山西省商业厅旅游供应公司编 文物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29页 插图2幅 彩色图版198幅 16开

本书以文物古迹为重点，全面介绍了五台山的历史、建筑和文物的艺术价值。

吉林史迹 吉林市博物馆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年1月 169页 插图15幅 32开

本书所录史迹，只限于清末以前之遗存，涉及的范围以吉林城为中心，兼顾其所辖五县。其中包括："西团山探古"、"猴石山原始村落遗址"、"东团山古遗址"、"富尔哈辽金古城"、"完颜希尹及其墓地"、"阿什哈达摩崖刻石"等内容。书后附有"吉林历史大事记"。

西安历史述略 武伯纶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2版 文353页 插图51幅 彩色图版10幅 大32开

本书1979年8月第一版，这次增订，增加了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扩大了篇幅。除对各章作了若干修订外，又增写了《秦始皇陵与秦俑》、《唐长安的奴碑》两节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长安》一章。

丝绸之路漫记（甘肃分册） 田恒江、周德广撰文 新华出版社 1984年8月 文423页 插图7幅 彩色图版7幅 黑白图版18幅 大32开

本书是一部游记作品，集中记述和描写了甘肃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演变、政治沿革、地理概貌、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和今昔变迁等情况。书后附有:《丝绸之路大事记》。

丝绸之旅 车慕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12月 文466页 插图12幅 彩色图版8幅 32开

本书是一本游记。作者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出发，沿着玄奘、马可·波罗和古代骆驼商队的足迹踏访，行程万余里。书中生动地记叙了沿途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古城今貌和民族风情等。

玖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陶瓷之路 （日）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高喜美译 文物出版社 1984年9月 文160页 插图7幅 黑白图版24页大32开

本书是一本通俗著作，记述了作者在东非、北非、中亚、西亚、

南亚各地考察中国古瓷的收获，论述了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另有胡德芬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4月)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朱培初编著　轻工业出版社　1984 年8月　文 208 页　黑白图版 64 幅　大 32 开

本书是一部具有历史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明清陶瓷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中国陶瓷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附记

本书目主要根据我室1986年4月底以前入藏和《社科新书目》等资料编辑而成。以版权页注明 1985 年出版者为主，每类之后附录 1984 年之补遗。

(编辑者：徐　荣)

考古学论文资料索引

(刊名后第一个数码是期，第二个是页)

壹　总类

一　通论

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在1985年3月1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的讲话　夏鼐　考古6: 481—484; 光明日报3月10日1版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　文物8: 1—8

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综述　曲英杰　中国史研究动态7: 8—14

关于中国古代都市遗址问题的研究　殷玮璋　光明日报4月3日4版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　俞伟超　文物2: 52—60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美〕张光直　文物2: 61—67

略论先秦时期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　曲英杰　中州学刊3: 115

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　〔美〕张光直　史前研究2: 41—46

骨骼人类学的鉴定对考古研究的作用　韩康信　考古与文物3: 50—55

简谈考古文献的重要价值　李更旺　考古与文物4: 28—30

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　严文明　考古与文物4: 30—40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　容观夐　中山大学学报3: 94—99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论"民族考古学"》一文读后　容观夐　社会科学战线4: 299—303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　杨泓　文物8: 16—24转页

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　佟柱臣　社会科学战线2: 133—142

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　陈长安　中原文物4: 72—77

为什么要研究几千年前的盆盆罐罐?　佟柱臣　文物天地1: 52—54

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而作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9：1—8
西藏考古综述 童恩正 文物9：9—19
新疆考古三十年 穆舜英 新疆社会科学3：86—97
敦煌研究所四十年 段文杰 敦煌研究2：1—7
吉林省考古历史述要 陈相伟 东北地方史研究2：60
三十五年来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回顾 王士伦 浙江学刊6：95—99
建国以来考古事业的十项重大成就 姚喁冰 文史知识1：55—60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 徐自强 北京日报6月5日3版
充分认识黑龙江省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张向凌 北方文物1：3—5
西行考古散记（一） 刘士莪 文博3：57—61
西行考古散记（二） 刘士莪 文博4：19—23
对《陕西省珍贵文物展览巡礼》的一点意见 木桴 文博3：85
现代考古学中的物理技术——物理考古学 金国樵、潘贤家 中原文物3：102—108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考古7：654—658

补1984年

考古学与当代新兴学科 刘新 南京博物院集刊7：116—121
谈谈实验考古学 贺云翱 南京博物院集刊7：121—126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新探 姚政 南充师院学报3：97
"干栏文化"和云南古代的"干栏"式建筑 赵永勤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3：90

二 考古学史与考古学家传记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京逝世 人民日报6月21日3版；光明日报6月20日2版
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 人民日报6月30日3版；光明日报6月30日1版
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逝世首都隆重举行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本刊记者 考古8：673—674
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 胡乔木 人民日报6月30日3版
沉痛悼念夏鼐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 考古学报4：403—406；考古8：675—677
夏鼐先生传略 王仲殊 考古学报4：407—415；考古8：678—685
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 王仲殊 人民画报12：16—17
忆田野考古工作中的夏鼐同志 王仲殊 人民日报7月5日3版
沉痛悼念夏鼐同志逝世 石兴邦 考古与文物5：1—10
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沉痛悼念夏鼐同志 安志敏 中原文物3：1—2
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周星 史前研究4：1—5
忆夏鼐先生对湖北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怀 湖北省博物馆 江汉考古3：1—3
夏鼐的足迹

他是献身精神的典范 张天来 光明日报9月7日1版
他在田野上辛勤耕耘 金涛 光明日报9月8日1版
无私的奉献 张天来 光明日报9月9日1版
碳十四和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金涛 光明日报9月12日1版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金涛 光明日报9月13日1版
俭朴和慷慨之间 张天来 光明日报9月14日1版
他的心中只有国家利益 金涛 光明日报9月18日1版
顽强的探索 张天来 光明日报9月20日2版
模范党员 张天来 光明日报9月28日1版
永恒的纪念 金涛 光明日报9月30日1版

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日〕樋口隆康 社会科学战线1：199—202
夏鼐同志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称号 考古研究所科研处 考古6：575
金石志趣学人风范——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与文物事业 于中航 文物天地2：47—50
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 蔡尚思 历史研究4：98—105
罗振玉与甲骨学 冯涛 人文杂志2：97—102
杨树达传略 白吉庵 文献21辑：191—206
马衡先生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 傅振伦 故宫博物院院刊3：119—121
忆父亲唐兰 唐复年 故宫博物院院刊3：125—126
于省吾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陈公柔等1：1—8
陈梦家小传 皮远长 武汉大学学报6：116—118
陈直先生和他的《摹庐丛书》 直生 文博4：24—25
访甲骨学专家胡厚宣教授 孙心一 中州学刊1：114
敦煌之光——访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 裴健等 甘肃日报7月8日4版
缅怀张云鹏同志 陈贤一、郭德维等 江汉考古4：42—45

三 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

祝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 苏秉琦 江汉考古3：4
略论我国文物保护法 陈明华、董克 文博4：57—59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李正平 博物馆研究1：119—120
浅谈馆藏文物的保护 张腊梅 文博3：81—82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与开发文物资源问题《在河南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 侯志英 中原文物1：1—4
五十多位学者专家提出建议，北京古代水利工程遗迹亟待保护管理 光明日报2月22日2版
地震前后古代建筑的检查方法和加固维修措施 杨焕成 中原文物2：96—98
古建筑基础的加固 赵怡元 文博3：76—80
莫高窟壁画保护的若干问题 孙儒僩 敦煌研究2：169—173

应用PS—C加固风化砂岩石雕的研究 李最雄 敦煌研究2：156—168
石门汉魏摩崖石刻的保护 刘最长、郭荣章等 文博1：79—83
秦俑坑隔梁上低等植物的根除 单晔 博物馆研究1：120
故宫博物院的六十年 袁方 故宫博物院院刊3：6—10
故宫建筑维修 古建管理部 故宫博物院院刊3：35—44
六十年陈列话沧桑 陈列部 故宫博物院院刊3：11—21
认真做好百万件文物藏品保管工作 保管部 故宫博物院院刊3：22—34
浅谈青铜器的保管 王海文 故宫博物院院刊2：74—78
书画藏品的保护与保养 岫雯 博物馆研究3：98—99
文物志初探 王建中 中州今古5：2—5

补1984年

浅谈文博科研 唐云俊 南京博物院集刊7：127—135

四 考古学方法与技术

新型考古钻探工具——装配式钻探铲 许自然 考古与文物3：111—112
碳十四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介绍新校正表的使用 蔡莲珍 考古3：279—281
铅同位素比值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彭子成、邓衍尧等 考古11：1032—1037
中子活化与古瓷研究 李虎侯 百科知识4：31—33
中国古陶瓷标准样品（KPS—1）的仪器中子活化分析 孙用均等 核技术6：9
磁州窑古瓷中微量元素的中子活化分析 李虎侯 分析实验室 4卷8期：17—21
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古陶片的穆斯堡尔谱研究 孙仲田、金国樵等 中原文物1：83—85
从考古遗址中哺乳动物的牙齿测定死亡季节——一种新的切片方法 B.J鲍尔奎 K.莫里斯 A.司佩斯 谢政译 尤玉柱校 史前研究1：109—110
宏观物理测量技术在殷商考古工作中应用初探 申斌 殷都学刊2：6—8
青铜病的防治 赵晋保、张建华等 中原文物1：86—88
半坡遗址风化问题浅析 张万学 文博4：54—56
炳灵寺、麦积山和庆阳北石窟寺风化研究 李最雄 文博3：66—75
莫高窟壁画修复初探 李云鹤 敦煌研究2：174—184
莫高窟烟熏壁画清洗再分析 段修业 敦煌研究2：185—195
西安出土唐代绢画的修复 赵力光 文博6：48—49
低空摄影仪简介 姜言忠 考古11：1038转1043
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男性头像复原 左崇新 史前研究2：99—103

补1984年

考古学与情报工程学 〔日〕小泽一雅著 常伟、高洁译 刘兴国校 博物馆研究4：81—84
考古数据分析 〔英〕莱斯利·艾德金斯、罗伊·A·艾德金斯著 贾莹译 周洪力校 博物馆研究4：

85—89
科学在考古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英〕格林·丹尼尔著 贾莹译 周洪力校 博物馆研究4：90—92
日本对古物质料的化学分析 〔日〕山崎一雄著 李云铎译 博物馆研究4：95—102
考古中应用的浮扬选择法 〔美〕M·罗宾斯等著 王则译 博物馆研究4：93—94
河姆渡和甑皮岩陶片热释光年代的测定——兼论粗粒石英断代技术 王维达 考古学集刊4：321—327
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 李敏生、黄素英等 考古学集刊4：328—333
秦俑坑出土彩俑颜料鉴定 单玮、赵雨亭等 考古学集刊4：334—341
激光全息文物无损检验 贾德芳、戴培钧等 考古学集刊4：372—378
化学与考古 王一川、王立群 科学实验3：20—21
水下考古 姚彭生 百科知识9：18—19

贰 考古学分论

一 人类起源问题与旧石器时代

对我国中新世新发现的几种古猿的研究 雷次玉 地质学报59卷1期：17
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关系——牙齿的形态与比较 吴汝康、徐庆华等 人类学学报4卷3期：197—204
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祖先吗？ 徐庆华 化石4：1—3
禄丰粗状池猿头骨的初步观察——兼论池猿的系统关系 吴汝康、潘悦容 人类学学报4卷1期：7—12
禄丰古猿化石地点地层概述 祁国琴 人类学学报4卷1期：55—69
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 陈恩志 史前研究4：6—11
太平洋文明初创时期的中国因素 潘利、张小华 史前研究3：87—94
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传统 戴尔俭 人类学学报4卷3期：215—222
我国人类史应从何时写起？专家们的研究表明：元谋人是现知最早人类 光明日报1月20日2版
元谋人研究有新发现 人民日报5月3日3版
“元谋人”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人类 张兴永 云南社会科学4：43—46
元谋猿人生活年代距今170万年 黄象洪 文汇报2月18日2版
关于元谋人的地质时代问题——与刘东生等同志商榷 钱方 人类学学报4卷4期：324—332
元谋盆地的旧石器 黄慰文、卫奇等 史前研究4：19—22
云南昭通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 郑良 人类学学报2：105—108
贵州省首次发现的猿人化石 吴茂霖 贵阳师院学报1：16
猫猫洞的发掘成果及其意义 曹泽田 史前研究2：47—55
昆明呈贡龙潭山第二地点的人化石和旧石器 邱中郎、张银运 人类学学报4卷3期：233—241
广西——古人类的摇篮之一 覃彩銮 历史知识2：39

广东旧石器文化及其若干问题 莫稚 史前研究4：23—27

湖北陨西白龙洞打击骨片的初步研究 李天元 考古与文物1：59—62

我国南方猿人遗址——安徽和县龙潭洞猿人及动物化石的发掘与研究 黄赐璇 百科知识 10：24—25

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初探 张森水 史前研究1：8—16

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相互关系 李壮伟、石金鸣 史前研究1：17—23

北京人化石发现记 贾兰坡 文史知识1：14—20

小长梁石器再观察 黄慰文 人类学学报4卷4期：301—307

东谷坨旧石器初步观察 卫奇 人类学学报4卷4期：289—300

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 吕遵谔 北京大学学报2：109—111

金牛山猿人化石发现记 吕遵谔 文史知识4：85—90

金牛山猿人化石发现侧记 黄蕴平 化石2：1—3

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 龙玉柱、李毅等 史前研究1：68—73

沙女遗址——巨大的史前石器制造场 王向前、陈淳等 化石2：3—4

山西榆次贾鱼沟旧石器的发现 吴志清、孙炳亮等 史前研究1：53—55

我对下川遗址出土石磨盘的看法——兼与黄崇岳、陈文华二先生商榷 卫斯 中国农史4：97—100

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 何乃汉、覃圣敏 人类学学报4卷4期：308—313

介绍新发现的白莲洞遗址 周国兴 文物天地1：42—44

居址与非居址——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类 尤玉柱、李壮伟等 山西大学学报2：97—101

原始墓葬 贾兰坡、甄朔南 史学月刊1：13—17

论木器时代之存在 任凤阁、阎瑞生 陕西师大学报1：88—93

木器时代再探 张鸿奎 北方论丛3：103—108

补1984年

卢嘉锡宣布解放以来已发现十一个新的猿人化石地点，我国正成为人类起源研究的新中心 光明日报12月21日1版

周口店洞穴堆积物的粘土矿物组合及其在古气候上的意义 彭补拙等 自然地理30：35

江淮古猿化石的发现 顾玉珉 科学实验9：12

二 新石器时代

综论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严文明 文物3：20—27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 严文明 文物8：9—15

史前考古学中的时代划分问题 吴耀利 史前研究1：1—7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 佟柱臣 史前研究2：1—11

略述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杨杰 内蒙古社会科学4：46—48

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的再认识——从考古发现看我国农业、牧业起源和发展的多样性 杨阳 安徽师大学报3：37—44

碳—14测定年代与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魏京武 史前研究1：29—35

从我国史前期的铜器看文明的开端 杨东晨 郑州大学学报4：17—24

试论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 刘敦愿 史前研究4：12—18

我国史前时期的墓葬 曾骐 史前研究2：18—26

从哺乳动物化石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遗址的自然环境 计宏祥 史前研究2：85—89

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 傅宪国 考古9：820—833

中国史前人类的一风俗——有意识的改形颅骨 张振标、尤玉柱 史前研究3：81—86

为"史前"正名 段立生 史前研究3：73

早期人类怎样"住"？ 苏君砚 百科知识2：34—36

早期人类怎样穿？ 苏君砚 百科知识9：38—39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 李启予 黄河史志资料2：18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新发现 仰韶文化的渊源是磁山和裴李岗文化 人民日报11月17日3版

裴李岗文化的几个问题 赵世纲 史前研究2：27—40

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 丁清贤 史前研究3：1—6

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类型及特征 丁清贤 考古与文物6：44—47

新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 刘习祥、张新斌 考古与文物6：47—55

试论"秦王寨类型"和"大河村类型" 李昌韬 史前研究3：16—26

元君庙墓地的分期与布局——《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 马洪路 中原文物1：35—41

答《(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 张忠培 中原文物4：30—39

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考古学中相对年代研究——兼论渭南史家墓地三种相对年代分期方案的比较 陈铁梅 史前研究3：101—108

关于元君庙、史家村仰韶墓地的讨论 伊竺 考古9：813—819

试论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相互关系 李友谋 中州学刊3：110

《鹳鱼石斧图》考 牛济普 中原文物1：46—53

略谈河北仰韶文化南阳庄类型 文启明 考古与文物4：47—52

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 陈德珍、吴新智 人类学学报4卷3期：205—214

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续） 陈德珍、吴新智 人类学学报4卷4期：314—323

试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编年与社会性质 李仰松 史前研究4：28—33

关于半坡遗址F6与F7两座房屋的层位认识问题 胡顺利 史前研究1：108

评《宝鸡北首岭》——兼说上层遗存的文化性质 苏迎堂 考古2：158—160

试论姜寨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 王志俊 史前研究3：7—15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文化层的孢粉分析 王开发 考古与文物2：103—106
西安半坡博物馆十多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巩启明 史前研究1：102—107
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述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 杜在忠 史前研究3：27—33
山东兖州史前文化遗存概述 孙华铎、于之友 史前研究2：63—70
试论杨家圈遗存的文化性质 何德亮、竞放 考古与文物1：75—82
东庄村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 李友谋 中原文物4：40—49
关于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讨论 隋裕仁 中原文物4：50—55
山西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 陈哲英、王清诗等 史前研究2：56—62
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 李民 史前研究4：34—38
甘肃古人类研究概况和存在的问题 张行 兰州学刊3：68
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 谢端琚 考古与文物1：63—74
从柳湾古墓发掘出来的大量遗物看：几千年前青海社会的一角 光明日报5月19日2版

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是远古人类栖息之地 计宏祥 化石1：23
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藏（1955年—1965年）张云鹏 江汉考古4：38—41
论鄂西大溪文化 卢德佩 江汉考古1：71—76
屈家岭遗址下层及同类遗存文化性质讨论 向绪成 考古7：627—632
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关系中的问题探讨 王杰 江汉考古3：34—40
论湖北龙山文化 方酉生 江汉考古1：77—81转页
江汉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命名问题——"石河文化"的特征、年代与分布 王红星、胡雅丽 江汉考古3：50—55
浅议石家河文化 李龙章 江汉考古3：41—49
略论江淮地区的古文化及其与吴楚文化的融合 杨国宜 安徽史学3：57
苏南浙北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点和相关问题 何平 南开学报5：9—16
从考古材料试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与古地理的关系 闻惠芬 史前研究4：84—93
河姆渡文化 龚若栋 历史教学问题1：52
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 吴汝祚 史前研究2：12—17
试论马家浜文化的分布和分期 耿曙生 苏州大学学报2：104
浙江罗家角遗址的孢粉研究 王开发、蒋新禾 考古12：1136—1138

华南地区

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丘立诚 史前研究1：24—28
华南地区的前陶新石器文化 张之恒 考古与文物4：41—46
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戴国华 史前研究2：95—98
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 杨式挺 学术研究5：67—72
广东高要茅岗新石器时代干栏式建筑

遗存 杨耀林 史前研究1：43—47
试论西樵山文化 杨式挺 考古学报1：9—32
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 张之恒 史前研究4：39—45
云南怒江州发现的新石器 张兴永、包秀芬 史前研究4：67—70
石碉文化初探 邓廷良 重庆师院学报2：60
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李昆声 史前研究1：36—42
根据沧源崖画颜料中的孢粉和硅藻化石推论云南沧源地区古人类生活时期的自然环境 雷作淇、史普南等 史前研究2：90—94
云南保山蒲缥全新世早期文化遗物及哺乳动物的遗存 宗冠福、黄学诗 史前研究4：46—50

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内蒙古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马耀圻 内蒙古社会科学6：45—51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 文物5：77—78
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年代试探 崔璇 内蒙古社会科学5：30—35
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 郭大顺、马沙 考古学报4：417—444
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论 张泰湘 北方文物2：11—15
吉林延边出土的环状石器及其用途 王培新 文物4：65—68
东北地区的石镞 贾伟明 北方文物2：2—10
吉林骚达沟石棺墓人骨的研究 潘其风、韩康信 考古10：948—956

补1984年

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 金则恭 考古学集刊4：222—251
河南临汝仰韶陶缸彩绘图象考略 马世之 中州学刊6：128—131
试论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张瑞岭 考古学集刊4：208—221
初步剖析大汶口文化私有制的起源——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吴汝祚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3—8
试论青莲岗文化 马洪路 考古学集刊4：252—277
崧泽文化初论——兼论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文化相关问题 王仁湘 考古学集刊4：278—306
长江下游的水田农业 宋兆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9—14
良渚文化的"玉敛葬"——兼谈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 汪遵国 南京博物院集刊7：32—45
试论中原和江汉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李绍连 考古学集刊4：307—313
图腾制度反映的古代部落与考古文化的关系 陈江 南京博物院集刊7：1—18

三 夏文化探索

夏初年代的勘定 赵恩语 安徽史学5：1—3
关于夏商史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徐中舒 郑州大学学报1：30—34

《禹贡》"豫州"与夏文化探索——兼议夏代的中心区域 李民 中州学刊1：117—121

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 李民 郑州大学学报2：75—82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遗存的性质问题 牛克成 中原文物2：38—47

探索晋西南"夏墟"的重大考古发现 高炜 人民画报3：32—35

夏文化的发掘与夏王朝的建立 孟世凯 文史知识7：14—19

夏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田继周 民族研究4：27—34

夏代有文字吗 李先登 文史知识7：51—52

补1984年

夏代国家起源初探 尹振环、尹彦 贵州文史丛刊4：18—24

关于平粮台古城址 裴明相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27—30

关于夏都阳城 安金槐、陈绍棣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20—23

淮阳"龙山城"与登封"小城堡" 李绍连 中州学刊4：125

登封王城岗小城堡质疑 许顺湛 中州学刊4：125

四 商代

先商文化探源 蔺新建 北方文物2：16—21

商先起源于幽燕说 于志耿、李殿福、陈连开 历史研究5：21—34

《史记·殷本纪》中一条史料的辨正 聂玉海 殷都学刊1：10—14

河南发现的夏商古城 杨育彬 中州今古5：12—15

关于偃师商城的几个问题 黄石林 中原文物3：85—91

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之管见 李德方、张振宇 中原文物3：92—94

对讨论商汤都亳问题的一点看法 胡顺利 中国史研究2：26

偃师尸乡沟商城与登封王城岗 李先登 史学月刊3：12—16

偃师商城年代可定论 董琦 中原文物1：54—56

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 陈旭 郑州大学学报4：28—34

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陈旭 中原文物2：31—37

最早的中国古城究竟建于何时——谈郑州商城的发现 郭伯南 文史知识8：109—113

略论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分期和商城年代——兼谈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 高煦 中原文物2：48—58

论盘龙城遗址的性质与作用 高大伦 江汉考古1：82—89转页

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 郑振香 百科知识8：18—20

浅论殷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关系 唐云明 殷都学刊3：6—10

妇好墓及其相关的问题 陈志达 考古与文物4：53—56

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 张亚初 考古12 1119—1123

殷墟非殷都考 秦文生 郑州大学学报1：35—39

安阳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批商代青铜武器 杨新平 中原文物2：99—104

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 王贵民 史学月刊3：6—13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商周刖刑 陈安利 文博6：17—21

殷商时期白种人在中原的足迹考 罗益群 河北学刊4：73

商周历史文物概说 杜迺松 历史教学8：27—31
从商周考古资料谈我国史官制的几个问题 张殿民 北方论丛2：38—41
试谈辽宁地区的商周文化 孙力 北方文物4：17—20

五 西周

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论先周文化 卢连成 考古与文物2：37—48
周原 常武 文博4：60—64
洛阳北窑西周遗址陶器的分期研究 叶万松、余扶危 考古9：834—842
孝感地区西周时期文化初析 周厚强 江汉考古4：65—74
浙江义乌县平畴西周墓——兼论原始青瓷器的制作工艺 金华地区文管会 考古7：608—613转页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 韩伟、吴镇烽等 考古与文物3：55—84
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初步研究 焦南峰 考古与文物3：85—103
洛阳西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 赵振华 考古4：371—379
扶风出土西周兵器浅识 罗西章 考古与文物1：92—100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李学勤 文学月刊1：31—32
东北地区镜形器之管见 张锡瑛 博物馆研究3：76—79
人鬲辨正 聂新民 文博4：10—11

六 东周

战国物质文明概说 陈绍棣 中国史研究4：13—27
中原地区战国墓初探 叶小燕 考古2：161—172
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 孙机 考古1：48—59
战国铁兵器管窥 何清谷 史学月刊4：12—17
初论吴文化 肖梦龙 考古与文物4：61—72
灿烂的吴文化 王文清 南京史志2：17
吴越文化特征初探 陈剩勇 浙江学刊2：60—65
绍兴306号"越墓"辨 林华东 考古与文物4：84—88
关于楚灭越的年代 李学勤 江汉论坛7：56—58
浅析山西曲沃出土的晋国青铜剑 段士朴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2：86
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 王恩田 中原文物2：59—62
春秋时期楚国上层文化面貌初探 张君 学术月刊12：61—66
春秋楚墓特征及其形成诸因素初探 高崇文 中原文物1：60—66
关于河南淅川楚墓的若干参考意见 顾铁符 故宫博物院院刊3：79—90
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与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 张亚初 文物4：54—58
《楚屈叔沱戈》考 何浩 安徽史学1：56—59
关于曾侯乙墓的年代 王人聪 江汉考古2：3—4
春秋战国时期人殉制度的演变——兼

论曾侯乙墓的时代 刘先枚 江汉论坛8：73—76
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 陈振裕、梁柱 考古与文物6：85—96
有关曾国遗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 时学颜 江汉考古3：31—32
曾侯乙墓出土鼎钩的启示 张光裕 江汉考古3：33
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 李学勤 考古与文物2：49—52
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 韩伟 考古与文物2：53—56
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 韩伟 文物2：30—38
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 史念海 文物11：31—36
临淄国子墓和郎家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 王恩田 考古与文物6：80—84
关于鲁南新出赵导工剑与齐工师铜泡 黄盛璋 考古5：460—465
辽宁东部地区青铜文化初探 李恭笃 考古6：550—556
论团结文化的类型、分期和相关的问题 贾伟明 考古与文物1：83—91
论团结文化 林沄 北方文物1：8—22
三门峡上村岭秦人墓的初步研究 刘曙光 中原文物4：78—80
试论不对称形铜钺 汪宁生 考古5：466—473
试论中原印纹陶及其与南方印纹陶的关系 彭适凡 中原文物1：42—45

补1984年

关于淅川下寺楚墓 顾铁符、张亚初等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30—40
关于固始侯古堆一号墓 赵青云、傅振伦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23—27
燕王铜戈研究 石永士 河北学刊6：107—112

七 秦代

凤翔雍城出土的秦汉瓦当 曹明檀、赵丛苍 考古与文物4：3—8
秦始皇陵 雒长安、文博1：91—92
秦始皇陵布局浅谈 刘炜 文博2：20—24
开拓前进、推动秦俑研究的深人发展 吴梓林 文博1：1—2
近年秦俑研究述评 张文立 文博1：61—66
秦俑之谜 林剑鸣 文博1：3—7
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 秦鸣 文博1：8—13
秦陵兵俑爵级考 陈孟东、卢桂兰 文博1：14—20
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 聂新民 文博1：21—27
观秦俑谈方阵 庞齐 文博1：28—29
秦俑艺术的流派及渊源 呼林贵 文博1：30—32
秦兵马俑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 李鼎铉 文博1：33—36
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军阵的比较 田旭东 文博2：76—79
秦俑步兵的射击技术 白建钢 文博2：63—71
试论秦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张占民 文博6：63—68
秦俑坑长铍试探 张占民 文博2：

72—75
秦俑的发髻 王玉清 文博4：35—39
秦俑带钩浅述 刘占成 文博6：69—74
秦始皇陵区出土的铜车马 郭长江 陕西交通史志通讯2：31
关于秦陵二号铜车马 党士学 文博2：80—84
再谈秦始皇陵区出土的铜车马 王开 陕西交通史志通讯3：43
秦陵二号铜车车舆纹饰仿衣蔽属性初探 孙仲立 文博1：37—42
关于秦陵二号铜车御者俑 王子今、高大伦等 文博1：43—51
郦山徒考 刘云辉 文博1：52—54
秦陵周围出土的铁器 程学华、郭兴文 文博1：55—60
秦俑坑年代考辨——与陈景元同志商榷 张占民、何欣云 人文杂志1：94—98
秦俑坑的主人究竟是谁 刘修明 社会科学（上海）2：66
秦始皇陵园发现的斤权与秦代衡值 程学华 文博4：33—34
试论秦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璧纹方砖 秦栈 文博3：93—94
杜虎符真伪考辨 陈尊祥 文博6：25—29
“蜀月”、“蜀守”与“皋月”小议——涪陵廿六年秦戈两关键铭文释读辨正 陈平 文博5：48—51
临潼出土的秦代陶马考察 祖国庸 农业考古1：302—305
秦刑徒刑期辨正 李力 史学月刊3：16—21
秦长城究竟有多长 胡大贵 历史知识5：47
秦尚水德无可置疑 林剑鸣 考古与文物2：57—59
鞭策小议 孙机 文物1：87
蒜头壶考略 李陈奇 文物4：51—53

补1984年

陇上秦长城调查之二——静宁至华池段 陈守忠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66
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陈景元 大自然探索3：121
秦俑马尾巴琐谈 郭兴文 陕西日报12月11日3版
鎏金铜凤与史载金凫 赵康民 陕西日报12月11日3版

八 两汉

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 刘庆柱、李毓芳 考古与文物5：102—109
西汉陵寝概谈 刘炜 中原文物2：65—68
汉武帝茂陵与霍去病墓 梁佐 文博3：83—85
南越王墓解开了千古之谜 张荣芳 历史大观园 创刊号：14；2：26
临潼出土的汉彩绘陶俑 赵康民 文博2：94
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 李南可 中原文物3：81—84
茂陵园宝藏 王志杰、李森 人民画报4：24—25
略论西汉的随葬特征 蔡永华 考古与文物2：68—73
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陈耀钧、阎频 考古12：1124—1129

略谈长沙象鼻山一号汉墓陡壁山曹孆墓的年代 宋少华 考古11：1015—1023

《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 尤振尧 考古学报3：352

武威雷台墓主人再探 辛敏 兰州学刊6：73—75

东辽县石驿公社古墓群出土文物的研究 刘升雁 博物馆研究1：91—94

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 吴曾德、肖亢达 中原文物3：55—62

两汉大铁犁研究 张传玺 北京大学学报1：76—89

辽阳西汉村落遗址 王恩芳 历史知识2：35—36

汉代农田布局的一个缩影——介绍淮阳出土三进陶院落模型的田园 骆明、陈红军 农业考古1：159—161

汉代的车骑出行 吴曾德 文物天地2：44—46

宋云石收藏的汉代瓦当 李启良 考古与文物4：8—15

阳平顷侯铜石鼎及其它 赵康民 考古与文物5：40—42

秦"十二字瓦当"时代质疑 刘庆柱 人文杂志4：93—94

河南淇县石磨年代能到西汉吗？ 李发林 考古10：874

诸城凉台孙琮画像石墓考 王恩田 文物3：93—96

缪宇不是彭城相 宋治明 文物1：83

若非"天马"，又何以称其名——兼答伍德煦、陈守忠二先生 牛龙菲 西北史地2：85—88

对"王甲大吉"的商榷 何广键 考古10：884

补1984年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葬制、人殉诸问题刍议 麦英豪等 广州研究4：68

说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天马" 牛龙菲 敦煌学辑刊1：93

九 魏晋南北朝

邺城铜雀三台 张子欣 文物天地6：26—27

无锡赤墩里东晋墓 无锡市博物馆（冯普仁、钱宗奎） 考古11：1005—1007

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 冯普仁 考古3：269—278

嘉峪关魏晋墓室"制醋"画砖辨 牛龙菲 中国农史3：53—54

浅析北朝墓葬形制 黄河舟 文博3：44—45

李柏文书出土于LK析疑——兼与孟凡人同志商榷 侯灿、奚国金 考古与文物3：36—44

魏晋楼兰屯田概况 孟凡人 农业考古1：349—354

赫连勃勃的大夏帝国和统万城 张泊 文物天地6：47—48

陕西勉县红庙出土"堂狼作"铜盆的时代辨析 胡顺利 考古与文物5：101

"人面鸟"考 王恺 考古与文物6：97—101

透雕龙马纹金牌饰 邹眘佬 北方文物1：7

关于李贤氏姓、门望、民族的一些看

法 顾铁符 美术研究4：57—58
北周李贤夫妇墓若干问题初探 王卫明 美术研究4：62—71
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题 贾士金博物馆研究2：29—32
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及其年代 林至德、耿铁华 考古7：644—653
高句丽石墓的演进 方起东 博物馆研究2：33—36
集安出土的高句丽金饰 孙仁杰 博物馆研究1：97—100
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 魏存成 文物5：79—84

一〇 隋唐五代

隋文帝陵、祠勘察记 罗西章 考古与文物6：25—28
唐让皇帝惠陵 王仲谋、陶仲云等 考古与文物2：107—108
隋唐时代的僧俑和佛教的门僧制 刘铭恕 中原文物1：79—80
国外学者研究唐代金银器情况介绍 陈英英、贾梅仙 考古与文物2：74—81
关于金银器的几个问题 卢兆荫 文物天地6：54—61
唐代家具的初步研究 韩继中 文博2：47—51
贞惠公主墓与贞孝公主墓 王侠 学习与探索4：138—143

一一 宋辽金元明

南宋六陵考略 何忠礼、俞观涛 杭州大学学报2：104—116
西夏文字的创制，失传及其发现 邢强 历史教学6：30—31
辽墓初探 杨晶 北方文物4：26—32
辽庆陵的盛衰和契丹文哀册的发现 闻黎明 历史知识2：34
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 项春松 文物2：94—96
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 安路 北方文物1：42—46
吉林省发现的契丹文银质符牌 王则 博物馆研究2：70—72
介绍大同金代剔犀奁兼谈宋金剔犀工艺 陈增弼、张利华 文物12：79—81
长安凤栖原元墓建筑结构 袁长江 文博2：12—13
"元代铜权"略考 姜涛、李秀萍 中原文物3：96—98
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 郝苏民等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4
记北京市拣选的几件西藏文物 程长新、张先得 文物11：74—78
大昭寺藏永乐年间文物 张仲立 文物11：66—71
明代第一陵——明祖陵 蔡述传 文物天地2：20
明孝陵琐谈 罗哲文 文物天地2：13—14
十三陵之冠——长陵 吴梦麟 文物天地2：6—7
嘉靖登宝座，王墓改帝陵 单士元 文物天地2：19—20
定陵发掘始末 赵其昌 文物天地2：8—9
亡国之君的思陵 王秀玲 文物天地2：12
第十四座明帝陵的由来 吴梦麟 文物天地2：18
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 孔繁峙 文物12：90—92

明秦王府遗址出土典膳所遗物 王长启 考古与文物4：25—27

简述江苏几处有关郑和的文物遗迹——纪念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 罗宗真 文物6：80—83

郑和铜钟小考 刘东瑞等 福建地方志通讯2：33

郑和铜钟小考 刘东瑞、卢保康 文物1：74—76

补1984年

内蒙古契丹考古工作的回顾 李逸友 内蒙古文物考古3：8—12

契丹考古对中国通史研究的贡献 陈述 内蒙古文物考古3：6

最近十年我国契丹文字的研究状况 刘凤翥 民族研究动态4：12—17

契丹大字与传世的女真文字 和希格 内蒙古大学学报3：1—6

杨州出土元代圆牌八思巴文和波斯文释读 郝苏民、刘文性 西北民族研究论文辑106—112

元应昌路遗址 刘志一 内蒙古文物考古3：113

一二 其他

大同火山群是不是活火山? 张畅耕 文物天地5：62—63

50万年的死角——"北京人"奇案追踪记 伴野朗著 丹东译 新观察6：30

叁 考古学专论

一 甲骨文研究

甲骨学基础知识 李学勤 文史知识1：50—54

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一） 仁言 殷都学刊1：15—19

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二） 仁言 殷都学刊2：10—13

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三） 仁言 殷都学刊3：15—18

殷墟甲骨文基础七讲（四） 仁言 殷都学刊4：14—17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胡厚宣 殷都学刊1：1—8

记日本京都大学考古研究室所藏一片片胛骨卜辞 胡厚宣 考古与文物6：56—58

甲骨文简说 唐复年 书法2：18—21

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 崔志远 殷都学刊2：9

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 （日）贝冢茂树 杨升南译 殷都学刊4：5—10

从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养牛业 卫斯 中原文物1：57—59

从甲骨文字中考中国商业的起源 潘锡庆 江苏商论2：45

殷墟出土的一些病类卜辞考释 徐锡台 殷都学刊1：8—10

读《小屯南地甲骨》札记 詹鄞鑫 考古与文物6：61—65

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君长的探讨 齐文心 历史研究2：63—78

商代的"井方"与"祖乙迁于邢"考 杨文山 河北学刊3：81—84

鬼方舌方考 李毅夫 齐鲁学刊6：12—15

商代的四风与四时 李学勤 中州学刊5：99—101

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 夏渌 武汉大学学报5：79—

85

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 杨升南 中国史研究3：3—16

殷商时代的语文教学 何深 河南大学学报6：107—112

商殷林考 张钧成 农业考古1：180—186

古文字释丛 陈汉平 考古与文物1：103—108

释“家” 郑慧生 河南大学学报4：39—42

释《 彭林 考古8：736—740

释甲骨文“久”字 詹鄞鑫 中国语文5：384—388

卜辞中“众”与周之“国人”比较 聂玉海 殷都学刊4：11—15

甲骨卜辞中语气词“唯”与“惠”的差异 张玉金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6：73—75

正足不同源楚楚不同字补正——兼答段渝、张君二同志 王光镐 江汉考古2：58—68

二论商代无楚——兼答张君《“商代无楚”析》 王光镐 江汉论坛6：73—78

周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微型刻字 曲儒 陕西地方志通讯1：47

周原卜辞中的“蜀”——兼论“早期蜀文化”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之二 林向 考古与文物6：66—74

试谈周王和楚君的关系——读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札记 唐嘉弘 文物7：8—12

出土甲骨小记 谭风 纵横3：126—128

北京出土的甲骨文字 闻凌 北京日报10月7日2版

辛为凿具之说不可信 王玉堂 湖南师大学报4：106—109

补1984年

试论商王朝的谷物征收 徐云峰 中国农史4：9—17

释甲骨文中的“巫”字 陆思贤 内蒙古师大学报4：61

二 青铜器与铭文研究

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华泉 史学集刊3：72—78

中国青铜时代的时空范围如何 李学勤 文物天地2：38—39

最大的先秦青铜器是什么？ 李学勤 文物天地2：39—41

铭文最长的先秦青铜器是什么？ 李学勤 文物天地2：41—42

怎样辨识青铜器的制作年代 李学勤 文物天地3：52—53

古代青铜器为什么今天还这样珍贵？ 李学勤 文物天地3：54—55

金文的形形色色 李学勤 文史知识2：68—72；4：81—84

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徐鸿修 文史哲4：61—67

殷周青铜器埋藏意义考述 张懋镕 文博5：43—47

新乡馆藏殷周铜器铭文选 唐爱华 中原文物1：26—31

介绍首都博物馆藏的六件商代青铜器 刘俊琪 文物8：82—84

邲其三卣铭文考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杜迺松 故宫博物院院刊4：36—43

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 郑振香、陈志达 考古10：940—947转页

母后戊方鼎及其它 张桂光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35—38
小臣缶方鼎与箕子 李学勤 殷都学刊2：1—5
无教鼎的发现及其意义 史树青 文物1：72—73
商大禾鼎与古代农业 石志廉 文博2：14—17
“保卣”铭文释疑 孙斌来 松辽学刊3：65
利簋铭文与牧野之战 初闻 文物天地3：55—56
宜侯夨簋与吴国 李学勤 文物7：13—16转页
大盂鼎新论 李学勤 郑州大学学报3：51—55
西周卫尊 徐鉴梅 江汉考古1：103
墙盘新释 刘楚堂 殷都学刊2：20—23
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 李学勤 中国史研究1：95—102
论“康宫” 何幼琦 西北大学学报2：10—16
测定多友鼎的年代 〔美〕夏含夷 考古与文物6：58—60
鬲从盨所反映的西周契约关系 冯卓慧 考古与文物6：75—79
关于西周监国制度的几件铜器 耿铁华 考古与文物4：57—60
西周监官制度浅说 陈昌远 河南大学学报4：45—48
试论西周金文中的“周” 宗德生 南开学报2：55—58
对“肈淇”解释的再商榷 张懋熔 考古6：557—558
史惠鼎与史学渊源 李学勤 文博6：14—16
《中子宾缶》初探 陈千万 江汉考古3：56—61
哀成叔鼎铭考释 蔡运章 中原文物4：56—62
娄君盂小考 曹锦炎 中原文物2：63—64
徐国汤鼎铭文试释 刘广和 考古与文物1：101—102
随县出土铜器铭文考释 夏渌、黄敬忠 江汉考古2：80—81
铭文所见楚王名字考 夏渌 江汉考古4：52—59
《鄂君启节》简论 彭荣洲 公路交通编史研究3：31
齐侯宝盂鉴的年代及其史料价值 张剑 中原文物4：63—64
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 刘彬徽 文物1：37—39
读盛君簠——随州擂鼓墩文物展侧记 饶宗颐 江汉考古1：57—59
中山王墓好蚉壶铭中的“𢍰”字小议 陈长安 中原文物3：95
平阴鼎盖考释 曹锦炎 考古7：633—635
鄢陵君与春申君 何浩 江汉考古2：75—78
金文试释二则 宾晖 江汉考古1：60—62
释𨽸𡍮 刘先枚 江汉考古2：82—83
释䍜 刘先枚 江汉考古3：73—74
释饔、𩟄、饋、䜌、湌 陈汉平 人文杂志3：98—99
猪尊、铜禁、大型铜镜 杜迺松 文物天地4：43—44
读《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启示 赵丽雅 民间文学论坛2：94
笱虡之饰与青铜器兽面纹的审美感 刘道广 学术月刊5：61

夔纹簋　杜迺松　故宫博物院院刊1：78—79
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　乌恩　考古学报2：135—156
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　刘兴　考古与文物5：90—101
论巴蜀青铜器　杜迺松　江汉考古3：62—65
滇池地区几件青铜器的科学分析　何堂坤　文物4：59—64

附：其它古文字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　李学勤　文史知识5：44—47
纸以前的书籍　李学勤　文史知识6：53—57
方法与戒律　李学勤　文史知识8：66—70
学习古文字学最低限度书目　李学勤　文史知识9：77—80
十五个课题　李学勤　文史知识11：73—76
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　李先登　天津师大学报4：75—79
周原出土陶文研究　陈全方　文物3：63—75
西周陶文试释　徐锡台　人文杂志3：91—93
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的东周陶文　张松林　文物3：76—79

补1984年

禹鼎集释　李先登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10—119
季姒簪罍跋　许青松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20—123
中山王●鼎铭"五年复吴"的史实考释辨　胡顺利　中国史研究3：165
青铜饕餮纹　杜迺松　紫禁城5：30
敧器　胡德生　紫禁城3：10
投壶　董燕　紫禁城4：38

三　简牍、写本与帛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注商兑　孙晓春等　史学集刊2：70
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　李学勤　江汉考古4：60—64
读秦简牍发微　张平辙　兰州大学学报2：48—51
秦简词语札记　陈玉璟　安徽师大学报1：75—83
试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同音假借　刘方　宁夏大学学报4：80—86
"小城旦、隶臣作者"辨误　张昌倬　史学月刊 4：112—113
略论秦代隶臣妾的身份问题　张传汉　辽宁大学学报4：63—64
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林剑鸣　学术月刊9：62—67
从秦简看战国时期秦国保护"人力"的措施　施伟青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1—6
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文物1：9—15
奇迹中的奇迹——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记　饶正州等　湖北日报1月17日2版
银雀山竹简出土记　刘心健　历史知识6：36—37
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文物4：27—38
瀚海珍宝——二万三千枚汉简出土记　郭汾祥等　瞭望14：41
《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校字　冻雍　史学集刊1：59—63

《塞上烽火品约》诠释 何双全 考古9：843—847

“车”、“居”同音可以假借 胡念耕 文物3：92

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 林剑鸣 中国史研究动态12：24—25

楚帛书《月令》篇考释 曹锦炎 江汉考古1：63—67

帛《易》初探 刘大钧 文史哲4：53—60

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 陈广忠 复旦学报6：78—81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王永兴 文史知识6：48—52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 高自厚 西北史地2：73—79

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周一良 文物7：17—25

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论递变字群的规律 施安昌 故宫博物院院刊4：58—66

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 邓文宽 敦煌研究2：71—98

唐代两件申请过所的文书 侯灿 考古与文物2：27—29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厮田 程喜霖 武汉大学学报6：72—80

补1984年

《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评议 谢桂华等 敦煌学辑刊2：155

居延简《永始三年诏书》册释文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居延简整理组 敦煌学辑刊2：171

论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简册 （日）大庭修著 姜镇庆译 敦煌学辑刊2：174

汉简所见信符辨析 徐乐尧 敦煌学辑刊2：145

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吴九龙 史学集刊4：14

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考辨 刘忠贵 敦煌学辑刊1：45

《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考略 张鸿勋 敦煌学辑刊1：55

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 高国藩 敦煌学辑刊1：64

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 王继光 敦煌学辑刊2：25

敦煌唐写本《二圣序文》校记 伍德煦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49

跋唐人写本《大般涅槃经后分》 秦明智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55

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 赵吕甫 中国史研究4：105—112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和纪年及有关史实 柳洪亮 敦煌学辑刊1：51

四 碑刻

石刻文字的著录与分类 刘昭瑞 文博5：52—58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十四）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文献 21辑：153—160

漫话古碑 张星道 历史知识1：35—36

碑林中的图案装饰 何正璜 文博1：68—70

秦石鼓历经沧桑 希文 文物天地6：42—43

汉博望侯墓碑跋（附碑文） 孙浮生 文博3：95

熹平三年残碑补释 陆锡兴 文物3：91—92

关于东汉任尚碑考证的商榷 胡顺利

考古与文物1：102
南朝石刻文字概述 汪庆正 文物3：80—90
河南邓县题名石柱考 吕品 中原文物1：76—78
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 李献奇 中原文物4：89—97
北齐造像题记 任博文 中原文物4：62
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它 刘永智 社会科学战线1：179—183
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 吴琦幸 社会科学战线4：201—205
和好太王碑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 王健群 博物馆研究1：49—54
好太王碑文中"倭"的实 王健群 博物馆研究3：41—46
隋刻《重修定州七帝寺记》 施安昌 故宫博物院院刊2：71—74
唐代景教碑的发现和研究 覃光广 百科知识9：19—20
唐李孟常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四 孙迟 考古与文物5：56—60
长安发现唐智该法师碑 秦珠 考古与文物4：21—24
唐褚亮碑考释 叶妙娜 中国史研究4：139—149
南诏德化碑 金石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50—53
《南绍德化碑》碑文作者王蛮盛质疑 王宏道 云南社会科学5：80—88
唐蕃会盟碑碑座出土 王望生 文物9：77—78
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 索朗旺堆、张建林 文物9：73—76
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下） 王承礼 博物馆研究1：55—64
一通和尚碑分清两座上京城 景爱 文物天地1：48—49
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 张子英 文物1：63—65
王禹偁撰陈仁壁墓碣 蒋维锬 文物5：71—72
宁波现存日本国大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之研究 顾文璧、林士民 文物7：26—31
十三经碑林 张量 文物天地5：36—37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 王连起 故宫博物院院刊1：36—47
赵孟頫临跋《兰亭序》考（续） 王连起 故宫博物院院刊2：60—70
1257年释迦院碑考释 胡斯振、白翠琴 蒙古史研究1：11—20
辽宁朝阳发现元"柳城耆老"碑 李宇峰 考古3：288
究竟谁是永宁寺碑最早的著录者 李兴盛 社会科学辑刊5：78—79
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汉字碑铭补释 傅朗云 博物馆研究1：83—87
朱元璋的皇皇大著"皇陵碑文" 王惠铭 文物天地2：16—17
阿什哈达摩崖考释 李澍田 社会科学战线1：174—178
浚县明清碑刻中的明初迁民资料 王兴亚 中原文物2：26—30
从《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看明清之际边疆寺院庄园土地问题 秦佩珩 许昌师专学报3：67
《庆兴府赤岛纪迹碑铭》的发现与略考 许泰一 延边大学学报1：82—85
布达拉宫东侧的四处清代摩崖刻铭 仵君魁、达嘎 文物11：88—91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选注之八——千佛阁碑记　齐敬之　承德师专学报1：87
汤阴县发现扁鹊墓碑　刘道清、王波清　中原文物3：62
先秦的石刻文字——仙字潭原始图象文字　李蔚　光明日报3月24日2版
释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　韩明祥　文物10：55—57
李贤夫妇墓志考略　罗丰　美术研究4：59—61
唐梨园弟子"张渐墓志"铭诠注　李尤白　人文杂志6：101—102
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　关双喜　考古与文物6：32—36
西安东郊出土唐许遂忠墓志　李域铮　考古与文物6：29—32
北宋杨承信墓志跋　赵世纲　考古与文物1：55—58
辽《耶律加乙里墓志铭》补释　嵇训杰　文物5：61—62
辽《夏蕴石棺记》考述　曹汛　文物5：57—62
龙岗辽代墓志考释　姜念思等　东北地方史研究2：66
周闻夫妇墓志铭，　吴聿明　文物6：86—88
明刘相墓志考略　梁晓景　考古与文物3：32—36
新发现林则徐撰写的墓志铭和室名题额　宫桂铨　文物12：10—11转页
晏殊《光禄寺丞仲容公墓志》一文的发现及其价值　谢先模　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54

补1984年

先秦石鼓简说（续完）　韩长耕　史学史研究4：73
《缪宇墓志铭考》的一点补正　周晓陆　南京博物院集刊7：76
魏碑书体源流浅探　傅斯松　书法研究3：27
谈国学《兰亭》石刻　张振新　杨文和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33—137
欧阳询《姚辩墓志》跋　王玉池　美术史论3：193—195
书北宋拓本《鲁峻碑》后　朱家濂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64—67
跋临海新出宋人墓志四种　丁伋　台州师专学报2：99
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照那斯图等　民族语文6：49
跋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陈智超　民族语文6：53
新发现《新建昭应寺碑记》简释　杨延福　民族调查研究4：71—73
合江发现记录石达开来合石刻　合江县志办公室　四川地方志通讯3：63
南华新发现清乾隆年间封山碑　杨春茂等　云南地方志通讯2：12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选注之七——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齐敬之　承德师专学报3、4：73
《段宝摩岩碑》琐谈　杨延福　大理文化5：54

五　玺印

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　曹锦炎　考古与文物4：81—83
《关于几方汉印的考释》一文的商榷　宋治民　文博3：32—34
广州南越王墓印文释　余天炽　学术论坛3：39
西汉楚王刘注银印　金澄、夏凯晨　文物天地4：41

陕西旬阳发现一枚汉代银印 徐信印、鲁纪亨 文物12：32
海南岛出土“朱庐执刲” 人民日报4月28日1版
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小考 陈高卫 人民日报6月10日8版
关中侯金印在宁发现 人民日报1月24日1版
流播西域的汉代肖形印 王伯敏 新疆艺术1：43
关于荆山西汉墓一枚印章问题 （日本）末次信行文物11：36
新莽官印三方试释 王人聪 故宫博物院院刊3：187—188
凤翔博物馆藏印识考 赵丛苍 文博6：30—33
介绍陕西、河南出土的几枚印章 邓城宝 考古与文物6：37—40
吉林集安出土的几方铜印 华岩、杰勇 北方文物4：37—38
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 傅天佑、彭锦华 江汉考古2：84—85
介绍一方“石工司马”印 贾旭敏 考古与文物5：110
山东枣庄市出土石印母及铜官印 李锦山 文物5：91
千阳出土的立义将军印不是庞德的印 贾靖 考古与文物5：10
岐山县博物馆收藏两方官印 庞怀靖 考古与文物4：16—18
旬阳县发现稀世珍宝——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李启良 陕西日报1月17日1版
旬阳出土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张沛 文博2：95—96
依兰三方古印考释 张连峰 学习与探索3：143—144
吉林出土金代农牧官印和铜镜 张绍维 农业考古 1：144—145
新安县文化馆收藏一方金代印章 董书林 中原文物4：49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金代铜官印 赵新来 文物5：85—86
关于“中书门下之印”的断代 王则 文物4：41
山东聊城地区出土的古代官印 刘善沂 考古2：187—188
河北盐山县出土金代官印 李超峰 考古2：188
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金“上京路万户印” 陈青柏 文物12：38
河北兴隆县发现金代“签宣抚司事印” 成常福、王峰 考古2：184
吉林省德惠县天台乡出土“都提控印” 邹世魁 考古11：1047
元“崇文监簿行印” 王燕飞 博物馆研究3：106
西藏文管会收藏的元代印章 程竹敏 文物9：79—84
丹东地区发现金末耶律留哥大辽政权铜印 许玉材 文物5：87—88
西夏文“元德二年”和“首领”印 罗显清 博物馆研究2：106
淳化县出土两枚元代铜印 姚生民 文博6：89
北元“中书右司都事厅印”考略 陈炳应 西北史地2：82—84
鄂西自治州收藏的元、明铜印 邓辉 文物5：89—91
浙江宁波出土明代铜印 林士民 考古10：907
贵州道真县出土南朝将军印 王其珍、潘言敏 文物8：48
新疆和硕特蒙古札萨克印考述 马大正 蒙古史研究1：69—72

补1984年

宝玺源流　琦枫　紫禁城5：28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考释　陈小平　社会科学参考20：29
监国公主铜印与汪古部遗存　丁学芸　内蒙古文物考古3：103

六　钱币

从中国货币的发展看中国经济的发展　潘汝瑶　中国钱币4：41—45
试论贝币的职能与殷商时期的商品经济　卫斯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12
从周原出土文物试论西周货币　罗西章　中国钱币2：14—21
《春秋代布考》商榷　蔡运章、韩维亚　中国钱币2：22—23
日本银行及上海博物馆所藏博山刀考略　汪庆正　中国钱币3：3—6
先秦半两钱的发现及其他　唐石父　考古6：572
古币续谈——谈我国先秦货币中的铜币　朱活　中国钱币2：5—13
先秦钱币名词浅释　阿祥　中国钱币2：58—62
楚国金币流通地域的考察　赵德馨　江汉考古3：66—72
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　高英民　河北学刊2：87—90
战国中山国金贝的出土——兼述“成白”刀面文诸问题　高英明　中国钱币4：36—37
山西运城出土战国布币浅析　朱华　中国钱币2：26—28
释战国货币中的“全”　刘宗汉　中国钱币2：24—25
魏币㝬布考释　张颔　中国钱币4：32—35
说“阳安”布　徐秉琨　中国钱币1：6—10
宝鸡市博物馆所藏的几件钱范　王桂枝、延晶平　文博6：83—85
西汉货币职能研究　张南　安徽师大学报2：84—93
试论西汉货币制度的两个特征　余谦　江西社会科学5：92—96
三铢钱考——兼谈山东莱芜出土的三铢钱范　朱活　文物12：33—38
西汉吉语五铢钱　智龛　中国钱币3：63
汉代的剪钱工艺　谢世平　中原文物1：89—90
关于马蹄金、麟趾金的定名、时代与源流　黄盛璋　中国钱币1：11—17转页
试论金版与金饼的几个问题　张维持、胡晓曼　文物12：50—53
记各地出土的圆形金饼——兼论汉代麟趾金、马蹄金　张先得　文物12：39—49
陕北靖边县杨桥畔乡出土窖藏新莽钱币记略　张泊等　陕西金融8：36
定平一百质疑　齐珊　中国钱币1：61
试谈萧梁四出五铢范　戴国兴　中国钱币　4：75—77
广西桂林新发现铅“开元通宝”考　刘敬扬　陕西金融4：34
唐朝中后期的钱币紧缺问题　张祖国　中国钱币3：32—36
志海苔出土古钱的金属成份　（日）水上正胜著　阿祥译　中国钱币3：17—27
渤海国货币初探　刘林章　中国钱币4：27—31
试谈广西桂林新发现铅开元钱　刘敬扬　中国钱币2：49—50

南唐开元对钱试析　徐渊　中国钱币1：58转页
唐国通宝、正隆通宝与宋代铜钱　陈颖　文博6：81—82
关于两宋川峡铁钱产量的考察　郭正忠　南充师院学报3：55—62
北宋铜钱金属成份试析　戴志强、王体鸿　中国钱币3：7—16
谈西塞山出土的宋代银锭　陈上岷　中国钱币3：28—31
大观小平钱介绍　孙仲汇　中国钱币2：56—57
大宋通宝当拾大钱　智龛　中国钱币1：57转页
钱币上的宋太宗三体书　金志伟　文物天地5：41
钱币与纸币的起因——关于交子起源的研究　郭正忠　学术月刊4：35—39
契丹字钱币考　贾敬颜　中国钱币4：3—6
关于辽代钱币契丹字的释读情况　陈乃雄　中国钱币4：6—10
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　牛达生　中国钱币4：11—15
西夏铁钱小议　金申　中国钱币4：16—17
大安通宝浅析　吴宗信　中国钱币4：68
浅谈金代的窖藏铜钱及其货币制度　王禹浪　中国钱币4：23—26
吉林金代窖藏铜钱的几个问题　黄一义　中国钱币4：18—22
"大定路课"银锭小考　郝思德　求是学刊1：95
吉林九台卡伦金代窖藏铜钱　谷潜　文物1：88—91
关于金代交钞的产生和演变的初步探讨　穆鸿利　中国钱币1：27—32
贰拾伍文铅钱小议　月民　中国钱币2：76
关于"面拉丁文背中文纪值钱"的讨论　海雄、金望　中国钱币2：75—76
壹拾文中统元宝交钞考说　卫月望　中国钱币4：38—40
元代发行的纸币及其历史意义　李干　内蒙古社会科学4：49—52
元钞膨胀贬值之原因　李桂茂　内蒙古社会科学4：53—55
元钞价值的变动　（日）前田直典著　姚朔民译　中国钱币4：46—53
九江出土元代烧钞库印　户亭风、王少华　中国钱币3：61
元代"昏烂钞印"的补充　赵人俊　考古与文物4：104—105
"阿力麻里黑"银币质疑　柳用能　文物1：91
记元末徐寿辉"天启通宝"钱　邱思达　中国钱币1：72
明代珍钱——永乐通宝折三　马传德　中国钱币4：67
崇祯通宝背**平钱浅析　秦连江　中国钱币1：62
永昌钱浅议　田荣　文博4：17—18
谈遵义铸的兴朝通宝与永历通宝　钱存浩　中国钱币4：54—56
吉林最早铸造的银币　马国晏　博物馆研究1：109—110
罗汉钱探源　余榴梁　中国钱币1：70转页
"太平百钱"的铸行问题　管维良　重庆师院学报1：44
天福镇宝不是五代后晋的钱　李献奇　中原文物1：22

为什么要研究古代钱币？ 朱活 文物天地5：60—61
怎样识读中国古钱币？其铭文和纹饰中有什么学问？ 朱华 文物天地5：58—59
我国金属铸币开始于何时？盛行于什么时代？ 朱华 文物天地5：55—57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 刘森 中国钱币1：68

补1984年

考古释“十金” 翟振业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93
浅谈中国钱币发展历史的分期 刘承镶 陕西金融增刊：31
中国古钱文字与书法 唐石父 陕西金融增刊：1
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秦） 吴镇峰 陕西金融增刊：10
秦墓出土的半两钱 尚志儒 陕西金融增刊：30
试谈背文“行大万泉”王莽“大泉五十”阳文铜范 吴琪荣 陕西金融增刊：41
关于兴平县下官道村出土唐代铜钱的几个问题 李绥成 陕西金融增刊：34

七 铜镜

中国古代铜镜述略 杜迺松 电大文科园地7：22
宁城早期铜镜及其科学分析 何堂坤 考古7：659—661
试论战国铜镜的分区 刘一曼 考古11：1008—1014
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 王勤金等 文物10：90—96
河南舞阳发现东汉乐舞百戏铜镜 朱帜 考古11：1024
清江发现东汉青盖神兽镜 黄颐寿 文物5：6
东汉诗经铭文镜 徐鉴梅 江汉考古4：77
河南淇县高村发现秦始九年铭文神兽镜 耿青岩 考古4：352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 王仲殊 考古3：267—268
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风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 王仲殊 考古7：636—643
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 王仲殊 考古11：1025—1031
安徽肥西县发现吴太平元年神兽镜 马道阔 文物3：32
安徽望江发现一件四神镜 宋康年 文物5：88
安徽怀宁县发现唐人马球图铜镜 许文、金晓春 文物3：42
新疆哈巴河县出土唐代铜镜 赵养峰 考古与文物4：105
遂平县又发现一面唐代透光镜 遂平县文化馆 中原文物2：30
宋代铜镜简论 陈柏泉 考古与文物4：96—103
北京发现宋《满江红》词菱花铜镜 程长新 文物1：82—83
陕西蒲城县延兴村发现宋代铜镜 刘占成 考古3：266
缠枝牡丹花式铜镜 罗显清 博物馆研究3：105
金代双鱼龟纽铜镜 士良 学习与探索4：封三
金代双龙纹铜镜 许俊臣等 考古与文物2：112
海船镜 张英 北方文物1：47—48

补1984年

中国古代青铜镜铸造技术的分析研究 田长浒 成都科技大学学报3：145

中国古代青铜镜和青铜剑表层组成的测试研究 李树贞 成都科技大学学报3：145

大庸古彝文铜镜刍议 李敬忠 广东民族学校学报1：5

八 铜鼓

铜鼓源流的再探讨 李伟卿 贵州文史丛刊3：68—72

中国古代铜鼓的制作技术 吴坤仪等 自然科学史研究4卷1期：42

铜鼓制造及其花纹的探讨 黄现璠等 学术论坛3：43

铜鼓的纹饰、造型和壮族祖先的宇宙观 梁庭望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59—63

台湾传世铜鼓及其有关问题 李伟卿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1

补1984年

中国古代的铸造铜鼓 韩丙告 机械工程学报20卷3期：43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铜鼓现存情况及其它 焦文武 贵州民族研究4：170

试论五铢钱纹铜鼓 蒋廷瑜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23—127

东南亚铜鼓装饰纹样的新解释 凌纯声著 石钟健译 贵州社会科学4：68—72

九 玉器

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周南泉 考古与文物5：74—89

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用途、名称考 薛理勇 复旦学报2：108

战国玉龙佩分期研究——兼论随县曾侯乙墓年代 杨建芳 江汉考古2：5—8

补1984年

治玉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三件玉制品弃余物的研究 周晓陆、张敏 南京博物院集刊7：46—51

关于良渚文化玉器的若干问题 （日本）林巳奈夫著 黎忠义译 南京博物院集刊7：52—61

商代玉雕（一） 郑德坤著 殷志强译 南京博物院集刊7：62—74

一〇 其他

带钩概论 王仁湘 考古学报3：267—312

我国古代的青铜削刀 陈振中 考古与文物4：72—80

我国古代灯具概说 熊传新、雷从云 中原文物2：73—81

床弩考略 孙机 文物5：67—69

长铍春秋 王学理 考古与文物2：60—67

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 郑雅坤 西北大学学报1：56—62

隋唐时期的服饰 朱睿根 江苏画刊4：38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西藏服装 （匈）西瑟尔·卡尔梅著 胡文和译 西藏研究3：85—90

明万历皇帝的龙袍——缂丝衮服 孙佩兰 中国工艺美术3：42—43

封泥简介 味琴 书法2：28—30

明式家具的装饰 胡文彦 故宫博物院院刊1：80—82

从历史资料看我国酒具的发展 陆肇鸿 酿酒3：20

补1984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五、六） 沈从文 广东工艺美术1：26；2：25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摘录连载七、八） 沈从文 广东工艺美术3：36；4：39

肆 田野考古资料

（题目后有*的，为简讯）

一 综论

近年我国考古发掘简介 徐元邦 历史教学 1：50—53

我国五大考古新发现 人民日报 3月11日 1 版

二 北京

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在平谷北埝头和上宅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光明日报 1 月21 日

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 程长新 考古 8：694—700

北京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 程长新 考古 8：701—703

一处罕见的古代墓葬 李森 百科知识 2：16

元代"内府官物"漆盘* 高桂云 文物 4：96

元代仿古龙纹三足索耳鬲炉* 高桂云 文物 12：87

三 天津

天津蓟县邦均两座古墓的清理*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考古 6：568—570

四 上海

上海松江县汤庙村遗址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考古 7：584—594

废铜堆中拣选出千余枚战国刀币 陆松麟 中国钱币 4：71—72

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 上海博物馆（王正书） 考古 6：540—549

补 1984 年

上海发现一门古大炮* 光明日报 12 月 16日

五 河北

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 卫奇·孟浩等 人类学学报 4、3：223—232

河北正定南杨庄发掘一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为研究我国原始瓷器、育蚕织绸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唐云明 史前研究 3：108

河北正定南杨庄发掘一处重要仰韶文化遗址——为研究我国原始瓷器、育蚕织绸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唐云明 史前研究 4：70

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 陶宗治 考古与文物 6：13—21

涞水县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存* 光明日报 4 月 17 日

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陶宗冶） 文物 10：23—30

河北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启明） 考古 11：980—984

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云明） 文物 10：31—35

河北省营坊村出土兽面石人 赵志厚

文物 2：93
河北唐县出土西周归父敦* 王敏之 文物 6：15
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车马坑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永士） 考古11：1042—1043
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启明） 文物 6：16—21
河北阳原发现大型汉代墓葬* 人民日报 9 月 14 日
河北晋县唐墓 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 考古 2：149—151
石家庄市郊发现唐代窖藏钱币 李胜伍 考古 4：382
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 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刘兴文） 考古 9：857—858
河北兴隆发现窖藏明刀币* 张双峰 文物 6：89
河北省宽城县出土明代铜铳* 陈烈 考古 8：759

补 1984 年

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文启明） 考古学集刊 4：96—110
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孙德海、陈光唐） 考古学集刊 4：162—195
（河北）抚宁发现明代石炮和礌石* 人民日报 12 月 17 日

六 山东

山东日照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日照县图书馆（徐淑彬、杨深富） 考古 5：385—388
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 徐淑彬等考古 8：748—749
山东沂水县发现旧石器、细石器地点* 徐淑彬、马玺伦等 人类学学报 4、3：288
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 山东省潍坊地区艺术馆（韩榕） 考古学报 3：313—351
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诗池、吴文祺） 考古学报 4：465—505
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饶县博物馆（何德亮、颜华） 考古 9：769—781
山东省海阳县史前遗址调查 王洪明 考古 12：1057—1067
山东省茌平县南陈庄遗址发掘简报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马良民） 考古 4：303—321
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 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日照县图书馆（李玉亭） 史前研究 4：51—64
山东省长岛县砣矶岛大口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吴汝祚） 考古 12：1068—1084
山东发现四千年前的古城堡遗址* 人民日报 1 月 3 日
寿光县发现龙山文化城堡遗址* 光明日报 1 月 9 日
泗水尹家城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济宁地区文物科（于海广等） 考古 7：595—601
山东寿光火山埠遗址出土一件黑陶罍* 贾效孔 文物 10：89

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 任向宏 考古 8：753—755
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 寿光县博物馆（贾效孔） 文物 3：1—11
平邑寨上出土二件青铜器* 李常松考古 12：1152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 济阳县图书馆（陈骏） 文物 12：15—20
山东海阳嘴子前村春秋墓出土铜器 滕鸿儒、王洪明 文物 3：12—19
山东费县出土"陈爰"* 刘家骥、刘心健 文物 12：85
临淄出土的几件青铜器* 李剑、张龙海 考古 4：380—381
山东栖霞出土一批齐刀化 李元章 文物 1：84—87
山东博兴发掘出战国时期齐国刀币* 王世让 考古与文物 1：82
鲁南出土两件铭文铜器* 李锦山 考古 5：476—477
山东莒南小窑发现"左徒戈"* 蕴章、瑞吉 文物 10：30
山东昌邑发现"oy"字刀币* 姜尤启文物 6：93—94
山东临沭县发现战国楚币* 王亮 考古 11：1041
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 贾振国 考古学报 2：223—266
山东高密发现一批汉代铜境、铜钱 潍坊市博物馆 高密县图书馆（李储森、曹元启）文物 10：84—89
（山东）诸城蓬莱发现大型汉墓 人民日报 5 月 28 日
莱芜市出土"三铢"钱范 王其云 中国钱币 2：63—64
山东沂水县荆山西汉墓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马玺伦） 文物 5：47—52
山东日照县发现窖藏铜钱* 杨深富 考古 3：287—288
山东微山县马陵山出土一批汉代文物* 宫衍兴文物 5：94—95
诸城蓬莱发现大型汉墓* 人民日报 5 月 28 日
山东沂水县发现一件西汉铜熏炉* 马玺伦 考古 12：1067
烟台市区发现殉鹿汉墓 林仙庭 考古 8：762—763
山东苍山县出土一批古铜币* 李玉生、林茂发 考古 5：475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 淄博市博物馆 淄博区文管所（张光明、李剑） 考古3：216—221
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 诸城县博物馆（韩岗） 考古 12：1114—1118
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 济南市博物馆（韩明祥等）文物 10：42—48
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 夏名采 文物 10：49—54
山东沂水宋墓* 马玺伦 考古 2：185—186
山东茌平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 聊城地区博物馆（刘善沂等） 考古 9：861—862
山东沂水发现元代铜权* 马玺伦 考古 2：190
山东博兴发现元代铜权* 李少甫 考古 3：240
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 淄博市博物馆（于加方） 考古 6：530—539
山东冠县发现明初铜铳* 刘善沂

考古 10：914

七 河南

临汝县裴李岗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临汝县汝瓷博物馆（赵会军、杨小栓等） 中原文物 4：1—3

渑池仰韶遗址 1980—1981 年发掘报告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 史前研究 3：38—58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杜金鹏） 考古 3：193—196

河南新乡县洛丝潭遗址试掘简报 新乡地区文管会、新乡县文化馆（刘习祥、汪秀峰） 考古 2：97—107

1979 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杨宝成、徐广德） 考古学报 1：33—88

河南临汝柏树圪垯遗址出土遗物* 杨澍 考古 3：282—283

河南省新乡县丁固城古墓地发掘报告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乡市博物馆等（孙新民、张新斌等） 中原文物 2：1—10

1984 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赵芝荃、刘忠伏） 考古 5：332—335

1982 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刘忠伏、杜金鹏） 考古 12：1085—1093

我国商周墓葬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 信阳发现一商代息族墓地 殴潭生、刘开国 光明日报 10 月10 日

安阳三家庄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 孟宪武 考古 12：1139—1140

河南临汝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 临汝县文化馆（杨澍） 考古 7：664—665

河南临汝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 杨澍考古 12：1141

平顶山市出土周代青铜器* 张肇武考古 3：284—286

1983 年洛阳西工区墓葬发掘简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杨焕新） 考古 6：508—521

临泉出土一批鬼脸钱 中原文物 1：97

固始县发现楚国金币——郢爰* 学文、振芳等 江汉考古 4：64

洛宁故县秦墓发掘简报 洛阳地区文管会（张怀银、赵安杰） 中原文物 4：3—4

洛阳市西工区 212 号东周墓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孙新科、李德方） 文物 12：21—22

郑州市博物馆征集一批货币 陈立信 中原文物 1：95—96

河南淇县发现一批战国铜币* 耿青岩、李树长 考古与文物 1：112

郑州市郊沟赵乡出土一批战国布币 赵新来、陈娟 中原文物 2：11—16

南阳市西郊刘洼汉墓发掘简报 南阳市博物馆（李陈广等） 中原文物 3：40—42

唐河县湖阳镇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赵成甫） 中原文物 3：8—13

郑州又发现一批汉画像砖 张秀清 中原文物 2：17—20
豫发现西汉阳刻彩绘空心砖墓 光明日报 5 月15日
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 洛阳地区文管会（黄士斌、赵安杰等） 中原文物 4： 5—12
郑州市乾元北街空心画像砖墓 郑州市博物馆（张松林） 中原文物 1：5—9
孟县出土汉代太医药罐 尚振明 中原文物 1：13
河南征集的"五铢"及"大泉五十"钱铜范* 刘东亚 文物 6： 9 5
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柴中庆） 中原文物 3：14—20
禹县东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孙新民） 中原文物 3：51—54
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徐殿魁） 考古 1：18—22
洛阳市东郊东汉"对开式"砖瓦窑的清理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李德方） 中原文物 4：13—15
新野县前高庙村汉画像石墓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新野县文化馆（赵成甫） 中原文物 3： 3—7
南阳市建材试验厂汉画像石墓 南阳市博物馆（魏仁华） 中原文物 3：21—25
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 南阳市博物馆（陈长山）中原文物 3：26—35
南阳市独山西坡汉画像石墓 南阳市博物馆（李陈广） 中原文物 3：36—39
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赵芝荃、徐殿魁） 考古 8：721—735
偃师唐李元暾夫妇墓发掘简报 洛阳行署文物处，偃师县文管会（张怀银、任留政） 中原文物 1：19—22
河南伊川发现一座唐墓 伊川县文化馆（杨海钦）考古 5：459
唐恭陵调查纪要 若是 文物 3：43—45
汤阴宋墓发掘简报 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文物保管所（杨松山） 中原文物 1：23—25
北宋王拱辰墓及墓志 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赵安杰）中原文物 4：16—23
登封县雷村发现宋金时期犁镜* 栗玉西 中原文物 1：88
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元代墓葬 洛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宋会群） 考古11：1053—1055
洛阳东郊明墓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徐治亚、赵振华） 中原文物 4：24—26
临汝县发现明代桥梁 临汝县汝瓷博物馆（杨澍） 中原文物 4：27—29
农民杨根法献出七百余枚古币 光明日报 5 月 6 日

补1984年

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赵芝荃） 考古学集刊 4：40—63
新郑县发现汉代珍贵文物——铜鸠车 乔志敏 河南日报 11月26日

八 山西

山西永济发现中更新世动物化石及旧石器地点*魏海波、石金鸣 人类学学报 4卷4期：399

山西右玉丁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右玉县图书馆（陈哲英） 考古 7：662—663

山西垣曲古文化遗址的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张岱海、徐殿魁） 考古 10：875—884

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张长寿等） 考古 9：848—849

山西吉县出土商代青铜器 吉县文物工作站（阎金铸） 考古 9：848—849

山西新发掘两座商代古墓* 人民日报 7月19日

山西省长治市小山头春秋战国墓发掘简报 长治市博物馆 （王进先、朱晓芳） 考古 4：353—359

太原市尖草坪汉墓 山西省博物馆（祁慧芬、乔淑芝） 考古 6：527—529

朔县发现珍贵文物——鹅鱼彩绘铜灯 光明日报 9月15日

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李奉山） 文物 6：45—54

山西永济发现金代贞元元年青石棺 张青晋 文物 8：94—96

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 王进先 文物 6：65—71

九 内蒙古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杨虎、朱延平） 考古 10：865—874

内蒙古发现西周时期少数民族古墓群* 人民日报 9月29日

昭乌达盟汉代长城遗址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队（项春松） 文物 4：69—79

嘎仙洞调查补记 吉发习 内蒙古师大学报 1：71

包头出土天盛元宝背“西”钱钱* 师宝珍 中国钱币 2：64

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 张柏忠 文物 3：56—62

补1984年

内蒙古锡盟贺斯格乌拉的细石器文化遗存 马秀 考古学集刊 4：64—75

内蒙古翁牛特旗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 3：13

敖汉旗范仗子古墓群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 3：22

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器 项春松 内蒙古文物考古 3：120

介绍一件青铜阴阳短剑* 青松 内蒙古文物考古 3：119

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 3：26

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时期文物 伊克坚等 内蒙古文物考古 3：55

辽怀州怀陵调查记 张松柏 内蒙古文物考古 3：67

辽怀州城址出土窖藏陶器 韩仁信等 内蒙古文物考古 3：72

敖汉旗范仗子辽墓 内蒙古自治区文

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 3：75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 项春松 内蒙古文物考古 3：80
巴林右旗查干坝十一号辽墓 董文义 内蒙古文物考古 3：91
兴和县五甲地古墓 盖山林 内蒙古文物考古 3：109
敖汉旗范仗子辽墓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 3：75

一〇 陕西

陕西南郑龙岗寺发现的旧石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尹申平） 考古与文物 6：1—12
陕西山阳县古文化遗址普查简报 董雍斌 考古与文物 2：1—7
陕西扶风县案板遗址1984年试掘的主要收获 历史系考古专业八一级实习队（王世和、王建新等） 西北大学学报 2：35—40
镇安县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董雍斌 史前研究 4：65—66
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 西安半坡博物馆（魏世刚） 史前研究 1：56—67
陕西省发掘出一处新石器时期墓地 人民日报 2月26日
陕西风翔县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 雍城考古队（吕智荣、曹明檀）考古与文物 1：1—11
宝鸡发现辛店文化陶器 刘宝爱 考古 9：850—852
宝鸡下马营旭光西周墓清理简报 王桂枝 文博 2：1—3
陕西岐山王家嘴，衙里西周墓葬发掘简报 巨万仓 文博 5：1—7
兰田县出土一组西周早期青铜器*樊维岳 文博 3：88
扶风齐家村七、八号西周铜器窖藏清理简报 周原扶风文管所（罗西章、傅升岐等） 考古与文物 1：12—18
陕西武功县征集到三件西周青铜器 康乐 考古与文物 4：1—2
扶风发现一铜器窖藏 高西省、侯若斌 文博 1：93—94
长安县新旺村出土的两件青铜器* 陈颖 文博 3：89—90
风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等） 文物 2：1—29
淳化县出土春秋时期文物* 何汉南 姚生民 文博 3：90—92
陕西铜川发现战国铜器 卢建国 文物 5：44—46
安康出土一件虎钮錞于 徐信印 江汉考古 4：78
芷阳遗址调查简报 张海云 文博 3：5—13
安康出土的一件战国虎钮錞于* 徐信印 文博 5：93—94
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 光明日报 3月29日 北京日报 4月1日
秦始皇陵考古工作有新突破 人民日报 3月31日
秦皇安眠两千载 项羽不是盗墓人《汉书》有误：掘墓焚陵是讹传《史记》可信：水银江河在地宫 文汇报 3月30日
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焦南峰等） 考古与文物 2：7—20
我考古工作者揭示出秦故都——雍城遗址面貌白建钢等 光明日报 6月24日

咸阳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 咸阳秦都考古工作队（陈国英） 考古与文物 3：12—24
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刘庆柱、李毓芳） 考古学报 3：353—381
临潼县陈家沟遗址调查简记 秦俑考古队 考古与文物 1：19—22
秦始皇陵园发现一枚铜权* 占民 考古与文物 4：105
始皇陵东侧又发现马厩坑* 程学华 考古与文物 2：110—111
汉中杨家山秦墓发掘简报 何新成 文博 5：8—11
陕西安康地区出土秦汉瓦当 李启良 考古与文物 4：106
陕西扶风石家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罗西章 中原文物 1：10—13
汉长安城发现西汉窖藏铜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李遇春） 考古 5：400—403
陕西凤翔出土"五铢"和"大泉五十"铜钱范 赵丛苍 考古与文物 4：107—108
陕西凤翔西河发现汉代青铜器窖藏 赵丛苍 考古 8：704—707
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 周苏平 王子今 文博 3：1—4
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量器 姚生民 考古 11：1044—1045
陕西靖边县发现大量王莽币* 王邦福 考古与文物 5：39
陕北出土一批古钱币* 张泊 胡城 文博 5：92—93
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 毕初 文物 4：94—96
西安东郊西汉墓出土一批裸体陶俑* 尔东 文博 3：65
陕西发现汉代鎏金蚕* 人民日报 11月1日
陕西旬阳汉墓出土的石砚* 张沛 文博 5：90
陕西子洲出土东汉画像石 吴兰、张元等 考古与文物 3：24—25
淳化县发现东汉铜碟* 姚生民 文博2：46
陕山勉县出土一件三国弩机 人民日报 7月23日
勉县出土一件三国魏弩机* 郭清华 文博 5：91
西安东郊出土的一批汉唐文物 关双喜 师晓群 文博 6：86—88
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崔汉林 夏振英 文博 2：4—11
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 郭清华 考古 5：429—449
唐兴宁陵调查记 咸阳市博物馆（王丕忠） 文物 3：46—47
唐司马睿墓清理简报 员安志、王学理 考古与文物 1：44—49
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 李域铮 文博 6：1—4
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 临潼县博物馆（赵康民） 文博 5：12—37
临潼唐庆山寺塔基出土百余件珍贵文物* 本刊通讯员 文博 4：67
西安发现唐代庆山寺遗址 人民日报 5月16日
临潼发现唐代著名庆山寺遗址* 文汇报 7月23日
陕西临潼发现唐代著名庆山寺遗址* 人民日报 7月23日
陕西临潼出土一批唐代佛教珍贵文物 人民日报 5月25日

华清池发现唐玄宗杨玉环浴池遗址 北京日报 6 月 5 日
西北大学发现唐代砖垒渗井 贾麦明 文博 1：94
唐杨谏臣墓出土的几件文物 关双喜 刘向群 文博 4：66
耀县发现宋代鎏金铜酒杯* 张世英 刘合心 文博 4：59
凤翔出土一批宋金时期铁造像 赵丛苍 文博 2：55—56
西安东郊元刘义世墓清理简报 陈安利 文博 4：5—9
杰出的艺术 重大的发现* 省文化文物厅拴马石艺术考察组 陕西日报 6 月 27 日
(陕西) 渭北发现大批古代民俗石刻 人民日报 5 月 20日
渭北发现罕见的古代民俗石刻* 光明日报 5 月 20 日
陕西韩城发现古代大地震遗址 文汇报 2 月 4 日

补 1984 年

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李遇春） 考古学集刊 4：1—39

一一 甘肃

堪与半坡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媲美 甘肃发现大地湾文化遗址 文汇报 5 月 11 日
甘肃秦安县发现马家窑文化人面饰彩陶壶* 郭晨晖 考古与文物 3：82
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杨益明） 考古 11：977—979
甘肃宁县宇村出土西周青铜器 许俊臣、刘德祯 考古 4：349—352
甘肃省华池县发现透雕金带饰* 黄晓芬、梁晓青 文物 5：40
河西走廊出土两万多枚汉简* 人民日报 10 月 10 日
甘肃永昌乱墩子汉墓 武威地区博物馆 考古与文物 1：38—43
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 董玉祥、臧志军 文物 5：7—16
甘肃正宁县出土北周佛像 陈瑞琳 考古与文物 4：109—112
甘肃省漳县出土一批古铜钱* 李兴华、田向农 考古与文物 1：112
甘肃静宁发现金代墓葬 平凉地区博物馆（刘玉林）考古 9：806—809
甘肃庆阳县出土元代银锭* （田秀茂、任彦辉）考古 2：189—190
兰州发现一批古货币* 人民日报 11 月 1 日

补 1984 年

我省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发现，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规模宏大 甘肃日报 11 月 18 日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等（郭德勇、孟力）考古学集刊 4：111—161

一二 青海

柴达木盆地发现旧石器* 黄慰文 人类学学报 4 卷 1 期：103
民和县转导公社古文化遗址调查 青海省文物考古队 史前研究 3：60—66
1980 年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考古调查 卢耀光 考古 7：602—607
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

海省文物考古队等考古与文物 5：11—34
青海西宁发现卡约文化铜鬲* 赵生琛 考古 7：635

一三 宁夏

宁夏发掘二十七座西汉匈奴墓 光明日报10月17日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宁夏固原博物馆（韩兆民） 文物11：1—20
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 宁夏固原博物馆（韩兆民、韩孔乐） 文物11：21—30
银川首次出土篆书光定元宝平钱 牛达生 中国钱币 2：42
银川市出土金代和元代铜钱 许成 考古与文物 6：41—43
宁夏发现一批古遗址和古文物 人民日报 2 月 26 日

补1984年

宁夏发现西夏火葬墓* 人民日报12月6 日

一四 新疆

新疆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古墓群调查*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柳洪亮、张永兵） 考古 5：478—479
新疆伊犁地区发现的大型铜器 张玉忠 文博 6：79—80
新疆新源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玉忠） 考古与文物 2：21—26
新疆木垒县拣选回收古钱币* 戴良佐中国钱币 2：6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 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柳洪亮） 文物 8：49—65
新疆库木吐喇石窟新发现的几处洞窟 梁志祥、丁明夷 文物 5：1—6
新疆巩乃斯河畔出土石面具* 张玉忠 文物 1：65
库车县古遗址简介 梁志祥 新疆大学学报 1：53—56
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新疆社会科学 4：60—67
新疆阿图什县喀喇汗王朝钱币窖藏清理简报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蒋其祥） 文物 12：26—32
阿尔金山首次发现石刻佛经 顾正勤等 新疆青年 8：13

一五 辽宁

金牛山遗址的新发现 傅仁义 辽宁大学学报 2：封三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 张镇洪、傅仁义等 人类学学报 4 卷 1 期：70—79
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故宫博物馆（于崇源） 考古学报：2：209—222
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发掘简报 辽宁省博物馆 本溪市博物馆等（李恭笃等） 考古 6：485—507
辽东半岛石棚的新发现 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考古 2：108—112
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 辽宁省博物馆（马云鸿） 考古 2：125—130
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 朝阳地区博物馆 喀左县文化馆（徐基） 考古 1：7—13

辽宁抚顺县巴沟出土燕国刀币 抚顺市博物馆(佟达、张正岩) 考古 6：522—526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冯永谦、邹宝库等 文物 6：25—42

一农民发现窖藏铜钱二万多枚* 光明日报 4 月 4 日

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 朝阳地区博物馆 朝阳县文化馆（徐基、孙国平） 考古 10：915—929

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 抚顺市博物馆 新宾县文化局（佟达、张正岩） 文物 2：46—51

辽宁建昌龟山一号辽墓 靳枫毅、徐基 文物 3：48—55

辽宁阜新县白玉都辽墓*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袁海波） 考古 10：958—959

辽宁一农民发现汉至金代窖藏铜钱三万多枚 人民日报 4 月 4 日

凌源富家屯元墓 辽宁省博物馆 凌源县文化馆（冯永谦、韩宝兴） 文物 6：55—64

一六 吉林

集安浑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孙仁杰、董长富等） 博物馆研究 3：61—68

吉林省德惠王家坨子北岭发现的古代遗存 刘红宇 北方文物 1：39—41

吉林省农安德惠考古调查简报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北方文物 1：30—38

吉林海龙原始社会遗迹调查 王洪峰 博物馆研究 2：60—67

金谷水库南山遗址试掘简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朴润武） 博物馆研究 3：69—72

吉林汪清考古调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郑永振、朴润武） 北方文物 4：2—11

吉林德惠县出土陶器* 佟阿伟 考古 3：283

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王洪峰、张志立） 考古 4：336—348

吉林市骚达沟石棺墓整理报告 段一平等 考古 10：885900

吉林市骚达沟山顶大棺整理报告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段一平、李莲） 考古 10：901—907

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 吉林市博物馆（董学增） 考古 6：497—507

吉林永吉学古汉墓清理简报 尹玉山 博物馆研究 1：95—96

吉林地区近年出土大批铜钱* 中国钱币 2：66

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长春市文管会等（张英等） 文物 2：68—82

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徐翰煊等） 文物 2：39—45

吉林抚松新安渤海遗址 王志敏 博物馆研究 2：68—69

吉林和龙高产渤海寺庙址 何明 北方文物 4：21—23

吉林集安发现一处渤海时期遗址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董长富） 北方文物 4：24—25

吉林省博藏“大康六年”纪年铜钱

谷潜 中国钱币 2：41
吉林同发辽墓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刘景文） 考古 7：668—669
吉林桦甸出土金代窖藏铜钱 张立明 文物 1：92—93
叶赫古城调查记 刘景文 文物 4：80—84

一七 黑龙江

街津口地区的细石器遗存 时墨庄 史前研究 3：34—37
黑龙江省东部发现的几件磨制石器* 云薇 北方文物 4：14
黑龙江林甸牛尾巴岗发现青铜时代墓葬 金铸北方文物 4：12—13
讷河县发掘出青铜器时代古墓群* 人民日报11月1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卡路遗址调查 樊万象 北方文物 4：15—16
渤海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刘晓东、程松） 文物 11：48—51
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赵虹光等） 文物 11：52—61

一八 江苏

金坛北渚荡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址 刘兴、刘建国 考古 8：750—752
江苏句容城头山遗址试掘简报 镇江市博物馆（刘建国） 考古 4：289—302
江苏丹阳王家山遗址发掘简报 镇江博物馆（刘建国） 考古 5：389—399
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发掘报告 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教局（张祖方、周晓陆等） 史前研究 2：7184
江苏句容自莽台遗址试掘 镇江博物馆（刘建国、刘兴） 考古与文物 3：1—11
江苏溧水、丹阳西周墓发掘简报 镇江市博物馆（刘兴） 考古 8：690—693
江苏溧水宽广墩墓出土器物 刘建国、吴大林 文物 12：23—25
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 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张祖方等） 考古 11：985—989
一艘罕见的古独木舟在宜兴出土* 人民日报 3月24日
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 南京博物院 铜山县文化馆（尤振光等） 考古学报 1：119—133
连元港出土大批窖藏“半两”钱 李洪甫 中国钱币 1：73
江苏吴县窑墩汉墓* 张志新 文物 4：91—92
江苏赣榆金山汉画像石 徐州博物馆、赣榆县图书馆（王恺） 考古 9：793—798
江苏新沂瓦窑汉画像石墓 徐州博物馆、新沂县图书馆（王恺、夏凯晨） 考古 7：614—618
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 南京博物院（张敏） 考古 10：908—913
江苏梁太清二年窖藏铜器* 刘兴 考古 6：571
南京马群六朝墓 南京博物院（党华、张敏） 考古 11：1002—1004
南京童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 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钱峰） 考古 1：23—27
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 扬州博物馆 文物 10：72—76

扬州司徒庙镇清理一座唐代墓葬 扬州博物馆（李久海、王建平） 考古 9：859—860

江苏镇江唐墓 镇江博物馆（刘建国） 考古 2：131—148

江苏句容行香发现唐代铜棺、银椁* 刘建国、杨再年 考古 2：182—184

江苏省江阴县明墓出土戗金漆盒等文物 孙宗璟、姚世英 文物 12：88—89

江阴发现古钱币之王——咸丰重宝 人民日报 3 月 13 日

苏州铜材厂从废旧杂铜中拣选二十余万枚古钱币全部交给文物部门 光明日报 4 月 28 日

补 1984 年

长江下游考古工作又一重要发现——南京营盘山氏族葬地遗址的发掘 魏正瑾 南京史志 5：3

徐州发现兵马俑* 人民日报 12 月 16 日

一九 安徽

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德标、杨立新） 考古 7：577—583

安徽颍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 阜阳地区博物馆（刘海超） 文物 10：36—41

安徽临泉出土大批楚国铜贝* 冯耀堂 文物 6：88—89

安徽临泉出土一批鬼脸钱* 冯耀堂 考古与文物 2：112

安徽定远谷堆王九座汉墓的发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 考古 5：423—428

安徽桐城杨山嘴东汉墓的清理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 考古 9：855—856

二〇 浙江

浙江萧山杜家村出土西周甬钟* 张翔 文物 4：90—91

浙江海盐县发现吴国青铜块* 周荣先 中国钱币 4：58

浙江省江山县发现战国墓 毛兆廷 文物 6：22—24

浙江余杭沾桥出土陶质五铢钱范* 沈德祥 文物 3：62

浙江衢州市隋唐墓清理简报 衢州市文物馆（崔成实） 考古 5：450—458

隋禅宗三祖僧璨塔铭砖* 陈浩 文物 4：8

浙江舟山发现唐代窖藏钱币* 王一平 考古 10：957

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 文物 4：85—89

浙江兰溪县北宋石室墓 金华地区文管会（贡昌） 考古 2：155—157

浙江瑞安发现三件元代铜权* 俞天舒 文物 5：31

二一 江西

江西青山湖台山嘴遗址调查 许智范 考古 8：757—759

江西瑞昌墩北张出土战国铜器* 刘礼纯 文物 5：96

江西高安清理一座南朝墓 高安县博物馆（刘翔） 考古 9：803—805

江西瑞昌范镇高丰发现窖藏铜币 刘礼纯 考古 11：1052

江西宜春市发现宋墓* 谢志杰、黄颐寿 考古 5：480

江西驻军在营区发掘一批窖藏文物* 光明日报12月23日

二二 福建

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 福建省博物馆 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林忠干） 考古12：1095—1108
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 福建省博物馆（张其海）文物11：37—47
武夷山下的汉代古城 张其海、林忠干 文物天地5：52—54
福州屏山南朝墓 福建省博物馆（梅华全） 考古1：28—32
闽西发现古闽越族图腾石刻 光明日报6月27日
福建尤溪宋代壁画墓 福建省博物馆 尤溪县文管会（严晓辉） 文物6：43—44

补1984年

汀州发现双"阴塔"* 人民日报12月16日

二三 湖北

1976年清江下游沿岸考古调查简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林春） 江汉考古4：20—23
大悟吕王城重点调查简报 孝感地区博物馆（熊卜发） 江汉考古3：5—16
天门谭家岭遗址发掘简讯 茂林 江汉考古3：82
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古城址 李俊 江汉考古4：76
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宜都考古发掘队 考古11：961—976
随州几处古遗址调查 襄阳地区博物馆 江汉考古2：9—13
赫家洼遗址的调查简报 湖北省博物馆 宜昌地区博物馆（田海峰、卢德佩） 江汉考古2：14—26
汉口东西湖首次发现古遗址* 刘俊安、汪腊初 江汉考古1：101
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湖北省博物馆（杨权喜、陈振裕） 江汉考古4：1—10
宜昌县杨家嘴遗址简况 湖北省博物馆 江汉考古4：24—26
浠水县出土西周有铭铜盘 叶向荣 江汉考古1：104—105
宜昌覃家沱两处周代遗址的发掘 湖北省博物馆（王善才）江汉考古1：38—56
随州旭光砖瓦厂出土青铜器 左得田 江汉考古1：106—107
湖北发现两处春秋时代炼铜遗址* 人民日报7月7日
鄂城县发现一处古冶炼遗址* 徐献国 江汉考古4：80
黄陂县作京城遗址调查简报 黄陂县文化馆（鲍方铎） 江汉考古4：11—19
利川县出土一件虎钮錞于* 江汉考古3：40
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 湖北省博物馆（杨权喜） 江汉考古1：1—37
江陵李家台楚墓清理简报 荆州博物馆（王毓彤）江汉考古3：17—25
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 湖北省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刘彬徽等） 文物1：16—36
随州出土两件铜兵器* 左德田 江汉考古4：75
湖北秭归又发现一件巴式剑* 王家

德 江汉考古 3：78

宜昌市前、后坪古墓1981年发掘简报 宜昌市文管处 湖北省博物馆（朱俊英、陈夏涛） 江汉考古 2：27—33

湖北江陵发现一批珍贵的西汉竹简久已失传的萧何汉律得以重见 人民日报 1 月17日

继云梦竹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湖北江陵出土西汉早期竹简 光明日报 1 月 18 日

沉睡地下二千余年 西汉早期珍贵竹简重见天日 鄂记 文汇报 1 月17日

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大批珍贵竹简 彭浩 江汉考古 2：1—3

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荆州地区博物馆 文物 1：1—8

1978年宜昌前坪汉墓发掘简报 宜昌地区博物馆（卢德佩） 考古 5：411—422

潜江县发现王莽货币 罗仲全 江汉考古 4：79页

崇阳县台山乡出土东汉墓葬器物 崇阳县文化馆（刘三保） 江汉考古 4：27—28

湖北通城县出土一批古钱* 徐胜民 中国钱币 2：65

郧县发现汉、唐古墓* 王正华 江汉考古 3：55

大冶瓦窖塘村南朝墓清理简报 大冶县博物馆 余为民、王富国 江汉考古 4：29—32

天门赵家岭三座残墓的清理 程欣人、刘安国 江汉考古 1：108—109

武昌县郑店乡关山村发现隋墓* 杨锦新 江汉考古 4：28

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 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宋焕文等） 文物 2：83—93

武昌石牌岭唐墓清理简报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魏航空） 江汉考古 2：34—38

罗田县汪家桥宋墓发掘记 罗田县文管所（江立宗） 江汉考古 2：39—46

孝感市郊发现宋墓 孝感市文化馆（李端阳） 江汉考古 4：33—34

襄阳磨基山宋墓发掘简报 襄樊市博物馆（李祖才） 江汉考古 3：26—30

汉川马口明代石棺墓 汉川县文化管（张远栋） 江汉考古 4：35—37

应城发现明砖 刘志升 江汉考古 2：74

补 1984 年

湖北郧县和均县考古调查与试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刘勋） 考古学集刊 4：76—95

湖北江陵楚冢调查 江陵县文物工作组（杨明洪） 考古学集刊 4：196—207

二四 湖南

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 湖南省博物馆等（何介钧等） 考古 1：1—6

湖南衡阳出土两件西周甬钟* 周新民 文物 6：83

临澧县又发掘一楚墓群* 汪国飞 人民日报 7 月 4 日

湖南辰溪出土东周剑形铜兵器* 陈启家 向开旺 文物 6：21

耒阳春秋、战国墓 湖南省博物馆

耒阳县文化局（郑元日） 文物 6：1—15
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 湖南省博物馆 麻阳铜矿 考古 2：113—123
常德县官山战国墓清理简报 湖南省常德地区文物工作队（刘廉银） 考古 12：1109—1113
益阳楚墓 湖南省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盛定国） 考古学报 1：89—117
湖南攸县发现战国和东汉古墓群 人民日报 2 月 26 日
攸县发现战国和东汉时期墓群* 光明日报 2 月 26 日
湖南保靖粟家坨西汉墓发掘简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宋谋年） 考古 9：782—789
湖南郴州汉墓清理简报 湖南省郴州地区文物工作队（李荆林） 考古 8：708—720
民族交流的见证——麻阳发现古钱窖藏 舒向今 中国钱币 1：71—72
湖南郴州发现两座隋墓 李荆林 考古 8：764—765
湖南祁东出土窖藏钱币 唐先华 考古 8：766—768
湖南邵阳县出土宋代窖藏铜钱 邵阳县文化馆（杨平怀） 考古 11：1051—1052
湖南沅陵出土一具完好的元代男尸* 人民日报 11 月 1 日

二五 四川

四川首次发现巨猿化石* 人民日报 11月 12 日
蒲江县战国土坑墓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蒲江县文物管理所（陈显双） 文物 5：17—22
成都市金牛区发现两座战国墓葬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张肖马） 文物 5：41—43
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 四川省文管会 大邑县文化馆 文物 5：29—40
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涪陵地区文化局（张才俊） 考古 1：14—17
四川彭县发现船棺葬* 赵殿增、胡昌钰 文物 5：92—93
大渡河南岸发现蜀式青铜剑 宋治民 考古与文物 6：107
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七八级实习队 长宁县文化馆（王子岗、罗伟先等） 考古与文物 5：43—55
四川荥经水井坎沟岩墓 四川省文管会等（赵殿增、陈显双） 文物 5：23—28
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张才俊） 文物 7：49—94
四川广元县皇泽寺石窟调查纪要 负安志 侯正荣 考古与文物 1：50—54
四川什邡县出土金腰带* 胡昌钰 文物 5：93
四川出土一条唐代金腰带 人民日报 5 月 5 日
安县发现宋代骨灰盒从葬墓* 光明日报 9 月 15 日
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彭山县文化馆（匡远滢） 考古 3：383—401
四川叙南崖葬调查纪略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8级实习队（王和

平、霍巍等） 考古与文物 1：23—37

二六 贵州

贵州发现古代崖壁画* 光明日报 9月 8 日

开阳县顶趴村发现古代岩画 邓一平 贵州日报 8 月 3 日

贵阳北横巷清代银锭窖藏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宋世坤） 考古 7：670—672

二七 云南

云南省发现古人类化石 人民日报 2 月 11 日

昆明新发现一批旧石器地点* 胡绍锦 人类学学报 4 卷 1 期：103

云南永仁菜园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云南省博物馆（肖明华、张兴永等） 考古 11：1039—1041

呈贡天子庙滇墓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学报 4：507—545

补 1984 年

云南文物考古资料简介㈠ 杨玠 云南地方志通讯 2：13

云南文物考古材料简介㈡ 杨玠 云南地方志通讯 3：10

云南文物考古材料简介㈢ 杨玠 云南地方志通讯 4：26

二八 广西

广西田东县祥周公社定模洞调查报告 李有恒、彭书琳等 人类学学报 2：127—131

广西扶绥县山地崖画的调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扶绥县文化局（覃圣敏、梁纯业等） 考古与文物 6：21—25

柳州地区发现铜角和铜卣* 刘文 考古与文物 2：109

广西贵县北郊汉墓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黄启善） 考古 3：197—215

合浦县出土一批西汉时期文物* 光明日报 4 月26 日

广西蒙山县出土窖藏古钱* 何秉 中国钱币 2：65

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覃彩銮） 考古 5：404—410

广西合浦出土一批西汉文物* 人民日报 4 月 27 日

柳州市郊东汉墓 柳州市博物馆（刘文等） 考古 9：790—792

广西贺县发现一批古代铜钱* 覃光荣 考古与文物 1：112

广西防城潭蓬出土唐、元、明代文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仁义） 考古 9：810—812

桂林发现铅开元通宝和铅五五钱* 周庆忠 中国钱币 2：50

广西发现崖画群考察表明世所罕见* 人民日报 11 月 29 日

二九 广东

十二万年前人类生活在这里——访曲江县狮子岩马坝人洞穴 陈树生、张如喜 文汇报 10 月 13 日

马坝人化石地点发现石器* 宋方义、黄志高 人类学学报 2：195—196

珠海市沿海线发现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李汀等 光明日报 7 月 28 日

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广东省博物馆 珠海市图书馆（杨耀林、徐恒彬） 考古 8：686—689

广东揭阳云路出土一批石器、陶器（吴诚） 考古 8：756

广东揭阳华美沙丘遗址调查 丘立诚、吴道跃 考古 8：760—761

广东出土罕见的春秋编钟 文汇报 6月21日

广东出土一组罕见的春秋编钟* 人民日报 6 月21 日

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 何纪生遗作 考古 4：360—364

广东首次发现齿刃铜镰* 陈大礼 农业考古 1：69

粤北南雄发现汉墓 南雄县博物馆（雷时仲） 考古 11：990—993

广州沙河顶西晋墓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黄淼章、冼乐） 考古 9：799—802

广州东山又发现一批南汉铅钱* 丘立诚、李一峰 考古 6：567

广州赤岗发现一明代女尸 光明日报 4 月26日

广东罗定古冶铁炉遗址调查简报 广东省博物馆（曹腾騑 李㝡） 文物 12：70—74

补 1984 年

重大的考古发现——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 黄淼章 中国建设 11：57

三〇 西藏

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张建林、更堆） 文物 9：20—29

西藏乃东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张建林、旦扎） 文物 9：30—31

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 索朗旺堆、侯石柱 文物 9：32—38

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张建林、更堆） 文物 9：39—46

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G组M_1殉马坑清理简报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张仲立、王望生） 文物 9：47—50

西藏乃东结桑村发现古墓葬 西藏西治区文物普查队（何周德、索朗旺堆） 考古 12：1142—1145

西藏文管会藏吐鲁番时期鎏金铜钵* 更堆 文物 11：81

西藏古格王国遗址考察记 李蔚、小丁 光明日报 11 月 3 日 2 版

补 1984 年

西藏发现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人民日报 12 月24 日

西藏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光明日报 12 月 24 日

伍 美术考古

一 雕塑

洛阳古代世俗石刻艺术概说 宫大中 中原文物4：107—114

灿烂的艺术瑰宝南朝石刻 胡舜庆 南京史志3：44

岩画——人类远古历史的图解 方辑 内蒙古社会科学1：96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岩画的发现 陈兆复、蒋振明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2：封三

内蒙古阴山以北草原上的古代艺术画廊 盖山林 内蒙古社会科学1：33—37

内蒙古草原上的千里画廊 盖山林 文物天地5：45—46

蒙古高原史前“围墙”岩画新解 盖

山林 史前研究1：48—52
贺兰山新发现岩画述评 李祥石 宁夏社会科学2：107
哈密岩画 董苏宁、刘一明 新疆大学学报1：50—52
昆仑山的岩画 胡邦铸 新疆艺术2：54
云南古代岩画艺术 李伟卿 美术研究2：51—59
花山崖画的民族学考察——也谈广西花山崖画的性质、年代的族属 黄惠焜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42
壮族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花山崖壁画 谭秀芳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108
谈谈左江流域崖壁画 黄增庆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204
草仔山村蛇形石刻浅析——古闽越族图腾探索 林焘 闽西方志通讯1：34
山东博兴发现石兽 李少南 考古7：653
闲说海州摩崖画像石刻 王树村 新疆艺术3：42
中国石狮 徐华铛 历史知识1：33—34
上海古迹——石狮子 静观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封二

补1984年

内蒙古西部畜牧岩画初探 盖山林、盖志毅 中国农史4：76—85
阴山岩画演化历程初探 盖山林 美术史论4 41—68
夏勒口岩画 盖山林 内蒙古文物考古3：39—45
新疆天山以北的岩画 成振国等 新疆艺术5：24
多功能的山川祭——广西花山岩画民俗性质试探 肖兵 美术史论4：1—40
左江原始崖海的几个问题 万里云 三月三6：139
连云港将军崖崖画试探 李福顺 美术史论4 61—69
山东史前雕塑浅谈 何德亮 美术史论4：80—89
秦俑雕塑艺术 郭淑贞 新疆艺术5：29
安岳石刻 汪毅 龙门阵6：113
安岳石刻 汪毅 四川地方志通讯4：25
安岳石刻漫笔 汪毅 四川地方志通讯4：31
罕见的唐代道教造像——安岳玄妙观 唐承义 四川地方志通讯4：36
省文物考古队在玉树县巴塘公社勒巴沟发现唐代岩刻 汤惠生 青海日报11月10日1版

二 画像石（砖）

汉画中的神怪御蛇和龙壁图考 苏健 中原文物4：81—88
南阳汉画像石艺术 赵建中、李陈广 百科知识9：36—37
南阳汉画像石墓兴衰刍议 赵成甫 中原文物3：71—74
南阳市散存汉画石选汇 李陈广等 中原文物3：43—50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画像 赵成甫 河南大学学报4：70—74
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幻日图象试析 魏仁华 中原文物3：63—65
南阳汉画像石墓的门画艺术 闪修山 中原文物3：66—70
浅谈南阳画像石中牛的艺术形象 张晓军 中原文物3：75—80

略论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 蒋英炬 考古12 1130—1135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试释 李发林 中原文物1：72—75
从费县刘家疃东汉墓的画像石刻看秦汉楼台亭阁的建筑 刘心健 临沂师专学报1、2：13
记山东大学旧藏的一些汉画像石拓片 李发林 考古11：994—1001
广汉所出永元八年砖跋——关于古代鹰猎的一则札记 闻宥 四川大学学报2：61—62
从几方画像砖看四川汉代教育 袁曙光 文物天地1：40—41

补1984年

孝堂山石室画像旧拓校勘和墓主问题 李发林 考古学集刊4：314—320
陕北东汉画像石刻 康兰英 陕西日报12月11日2版
画像石中的音乐感——有感于陕北出土画像石 马丽群 北京工艺美术3：26
汉代舞蹈形象的丰富宝库——汉代乐舞画像石、砖简介 刘思伯 舞蹈艺术1：147
苏南六朝砖画初探 陆昶 南京博物院集刊7：88—95

三 陵墓雕刻

从霍去病墓石刻看汉代的美学思潮 包亚明 复旦学报6：69—71
唐乾陵及其石人群像 陈国灿 文史知识2：125—128
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 王仁波 文博3：46—55
明中都皇陵石象生之绝 哲闻 文物天地2：15
剑川墓地石雕 杨均 民族调查研究3：83—85

四 造像

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 李献奇 中原文物2：21—26
青岛市新征集一件北魏石造像 孙善德 文物1：47
山东阳信县征集一件东魏佛像 常叙政，刘少伯 考古11：1046—1047
西魏大统六年吉长命造像碑题记记录文正误 李玉昆 文物8：84
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 赵康民 文物4：15—26
隋造像碑 刘心健、林茂法 考古6：484
西安唐代礼佛奏乐图石刻佛座内容浅议 赵峄桐 文物3：19
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辨 阮荣春 艺苑4：44—52
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辨 阮荣春 考古1：78—87
泉州宋代石刻老君像 林胜利 历史知识6：38—39
飞来峰“救度佛母”造像考 劳伯敏 浙江学刊1：128—130
泸州的“孙孙打婆”石像 赵永康 历史知识6：38—39
郑州出土一批北朝铜造像 张秀清 中原文物1：14—18
江苏徐州发现北齐铜造像 王恺 考古7：666—667转页
西藏文物商店征集的一件鎏银铜佛像 西藏文物商店 文物11：61
关于临潼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像的若干问题 丁明夷 文物4：9—14
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 临潼县博物馆 文物4：1—8

风穴寺“七祖塔”内发现一尊铜佛 吴元忠、邓贻富 中原文物1: 53

五 石窟寺艺术

略论中国石窟艺术的形式美和内容美 季崇建 上海广播电视（文科月刊）1: 23

关于克孜尔118窟《娱乐太子图》 吴焯 新疆艺术1: 46

克孜尔千佛洞发现一新窟三身残佛象 人民日报1月23日3版

也谈克孜尔——一人窟壁画内容 秦志新 新疆艺术4: 36

关于敦煌石窟和敦煌学 丁果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 70—72

麦积山石窟历史散论 徐日辉 西北史地3: 88—93

须弥山石窟艺术 牛达生 宁夏艺术2: 47

我国石窟中的优填王造像——龙门口窟优填王造像之早之多为国石窟之最 李文生 中原文物 4: 102—106

龙门石窟的创建年代 温玉成 文博2: 34—35

唐高宗立大卢舍那像龛 温玉成 中国史研究2: 155—156

四川石刻造像艺术概述 刘长久、胡文和 社会科学研究6: 68—73

四川大足宝顶摩崖造像的若干问题 洪惠镇 美术史论1: 39—51

丰富多彩的石刻造像——四川安岳毗卢洞调查纪要 贠安志 文博4: 1—4

宝顶山石窟寺 李己生 美术研究4: 80—82

辉煌的大足石刻 周倩萍 瞭望17: 40—41

（陕西）刻满经文的唐代石窟＊人民日报6月21日1版

拉萨查拉路甫石窟调查简报 何周德 文物9: 51—64

拉萨药王山摩崖造像浅说 何周德 索郎旺堆 西藏研究4: 113—118

西藏拉萨发现石窟寺＊ 周德 文博4: 67

试论浙江新昌大佛的历史文物价值 陈百刚 浙江学刊3: 116—120

北京新发现的石窟＊李文 北京日报11月7日3版

六 古代建筑

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关于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 李最雄 考古8: 741—747

略论中国古代高层木结构建筑的发展（一） 王贵祥 古建园林技术1: 2—9

略论中国古代高层木结构建筑的发展（二） 王贵祥 古建园林技术2: 2—7

中国古代建筑构图引言 陆元鼎 美术史论1: 52—58

几种古建瓦屋面专用脚手架 张家骥 古建园林技术1: 10—13

中国古建筑中的廊（庑、副阶） 罗哲文 文史知识5: 65—69

话说大吻 李全庆 故宫博物院院刊2: 95—96

正吻 路长 古建园林技术2: 58—59

木牌楼构造初探 马炳坚 古建园林技术1: 33—41

明清官式灰背作法 刘大可 古建园林技术2: 18—26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板屋建筑初探　陈宗祥、江道元　西藏研究3：91—101
西安钟楼　狄钟秀　文博6：75
河南省古代建筑的全国之最　杨焕成　中州今古3：6—8
小雁塔　小雁塔保管所资料室　文博2：92—93
大雁塔级数考　保全　文博6：34—36
河南林县阳台寺唐代石塔　张增午　考古与文物2：29—32
松江斜塔——比“比萨斜塔”更早、更斜的古塔　应朝　古建园林技术1：28—30
辽中京塔的年代及其结构　郑怀英、杨玉柱等　古建园林技术2：32—37
辽阳白塔创建年代质疑　金殿士　辽宁大学学报5：95—96
关于齐云塔的几个问题　徐金星　中原文物4：115—117
布达拉宫内的五世达赖灵塔　平措次旦　文物9：95—96
太原晋祠　朱希元　古建园林技术2：38—42
试谈摩尼殿的建筑构造与修缮原则　李士莲　古建园林技术1：42—49
元大都钟鼓楼考　王灿炽　故宫博物院院刊4：23—29
江陵县太晖观金殿　吴晓　江汉考古3：79—80
兴城文庙　沐雨、陈白　辽宁大学学报4：封三
京西法海寺山门殿的明代彩画　高成良　古建园林技术2：31
徽派古建民居彩画　姚光钰　古建园林技术2：27—30
承德外八庙与西藏寺庙建筑　阎学仁　西藏研究1：113—115
嘉应观　崔秉华、尤志远　中原文物1：32—34
赵州小石桥　杨玉柱　古建园林技术1：20—27
隋代石拱小商桥　李颖霖、胡达和　历史知识1：34—35

补1984年

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　孙机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41—47
大理石塔简介　智明　云南地方志通讯3：40

七　陶瓷器与窑址

论述

陶器起源新释　邹文　工艺美术参考1：27
瓷器谈往　李辉柄　故宫博物院院刊3：171—177
我国瓷器是何时发明的？何时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李知宴　文物天地4：56—57
原始先民是怎样烧制陶器的？　孙淼　文物天地1：55—56
我国的陶器起源于何时？　孙淼　文物天地1：54—55
我国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何时？它是否陶器的一种　孙淼　文物天地1：57
中国瓷器在世界上占有什么地位？中国古瓷为什么越来越贵重？　冯先铭　文物天地4：60—61
什么叫官窑，什么叫民窑？宋代有哪些著名的官窑和民窑？各有什么特色？　李辉柄　文物天地4：58—

59
浅谈大溪文化陶器的渗碳工艺 李文杰、黄素英 江汉考古4：46--51
江西南朝墓出土青瓷综述 范凤妹、吴志红 考古与文物 4：89—92
略谈赫家洼和梁子湖的青白瓷 田海峰 江汉考古3：75—78
论唐代制瓷业的大发展 卢建国 文博2：36—46
巩县黄冶“唐三彩”窑陶瓷玩具 刘建洲 考古与文物2：33—36
洛阳唐三彩纵横 韩于西 中原文物2：69—72
略谈长沙窑瓷器的几个问题 李辉柄 故宫博物院院刊1：70—73转页
略谈长沙唐王清墓与出土瓷器的窑口问题 周世荣 考古7：619—622
论耀州窑的历史地位 杨东晨 中国陶瓷1：36—41
耀州窑发展史浅探 杨东晨 河北陶瓷1：46
吉州窑彩绘艺术及其影响 陈定荣 文物8：75—79转页
略谈吉州窑 李辉柄 文物8：80—81
汉阳出土的北宋瓷器 张吟午 江汉考古3：83—84
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 沙孟海 考古与文物6：105—106
辽瓷古今琐谈 潘溪浔 中国工艺美术3：43—44
山西浑源县界庄窑 李知宴 考古10：930—939
从南朝鲜新海底青瓷的发现看龙泉青瓷的发展 李知宴 考古与文物2：96—102
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 冯先铭 故宫博物院院刊3：112—118
从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文物看元代我国陶瓷器的发展与外销 叶文程、丁炯淳 海交史研究2：37—42
明代青花瓷器风格特征述略 王斌 博物馆研究2：72—75
从出土实物谈陈曼生和他的“曼生壶” 王正书 文物12：82—85
“广窑”说误 陈玲玲 中国陶瓷1：41—43
太行陶瓷话沧桑 程在廉 河北陶瓷1：40
古代窑炉与铜红釉 杨文宪 中国陶瓷1：30—35
古代窑炉与铜红釉（续完） 杨文宪 中国陶瓷2：33—39

窑址调查发掘

秦代陶窑遗址调查清理简报 秦俑考古队 考古与文物5：35—39
山东曲阜、泗水隋唐瓷窑址调查 宋百川、刘凤君 考古1：33—41
陕西省发现烧造唐三彩的窑址 光明日报2月9日1版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 妙济浩、薛增福 考古7：623—626
湖南古窑址调查之二——彩瓷 周世荣、郑均生 考古3：241—256
江西南丰白舍窑调查纪实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文化馆（陈定荣） 考古3：222—233
江西景德镇柳家湾古瓷窑址调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陈定荣） 考古4：365—370
江西铅山县盏窑调查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陈定荣） 考古11：1048—1050

窖藏及墓葬瓷器

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陶壶 贾麦明 文博4：65
浙江慈溪西晋墓出土一组青瓷器 慈溪县文管会（袁舒若） 文物10：81—83
（山东）淄博市北朝墓内出土精美青釉莲花瓷尊 人民日报1月23日3版
山东博兴县近年出土的青瓷器 常叙政、李少南 文物8：73—74
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张浦生、朱戢） 文物10：67—71
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 顾风、徐良玉 文物10：77—80
扬州发现的一件唐青花瓷片 马富坤 文物10：96
苏州市郊出土唐三彩扁壶 钱公麟 考古9：842
浙江东阳南市塔出土青瓷 贡昌 考古1：96
窖藏"紫定"印花碗 刘燕平 文物8：93—94
福建晋江草庵发现"明教会"黑釉碗 黄世春 海交史研究1：73
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 张光明、杨英吉 考古3：234—240
浙江定海金塘岛发现宋代青瓷粉盒 王一平 考古5：388
河南内黄县出土"张家造"宋代瓷枕 张毅力 考古与文物5：110
天津新发现一批宋金时期瓷陶枕 田凤岭 文物1：77—81
遂平出土宋代卧童瓷枕及铜镜 李芳芝、黄耀丽 中原文物1：98
成都发现一批元代瓷器 刘平、王黎明 考古与文物6：108
汉中市出土明清青花瓷片 杜凤鸣 文博1：95

藏品介绍

平陆县征集到一件西汉釉陶"池中望楼" 卫斯 文物1：8
晋代青釉谷仓 杨清秀 中原文物1：9
南北朝四系莲花瓣青瓷壶 王佐才 文物5：16
介绍一件吉州窑彩绘瓷枕 李家和、章琳 文物8：15
宋墨竹纹虎枕 赵榆、章津才 文物1：96
周口市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虎形瓷枕 孙本书 中原文物2：104
宋代精雕瓷枕 陈继宗、桂仲德 文物天地4：42
金代磁州窑系卧女瓷枕 耿青岩 文物10：83
元代青花双兔盘 马占盈 文物5：22
明代宣德白釉酱彩花果盘 华义武 文物5：70
青花云龙海水寿字坛 黄颐寿 文物10：41
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 胡昭静 文物11：72—73
记首都博物馆藏的几件明清青花瓷器 刘秀中 文物8：87—89转页
拉萨哲蚌寺藏两件明清瓷器 王望生 文物11：96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几件清宫用瓷 徐静修 文物1：41—42
记一件清嘉庆粉彩山水紫砂壶 陶富海 文物12：86—87

补1984年

中国陶瓷史话 张锡秋 山东陶瓷2：57
唐宋时代四川陶瓷装饰艺术特点 陈丽琼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4：51

北宋官瓷的艺术风格 何浩庄 中国工艺美术3：16

南宋龙泉青瓷的研究 叶宏明 考古学集刊4：342—371

吉州古窑址出土原料及具有生釉的坯体 敖镜秋、许作龙等 中国陶瓷6：49—53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两件元代瓷器 陆思贤 内蒙古文物考古3：123—124

论建水青花的起源 徐国发 中国陶瓷6：44—48

青花釉裹红"岁寒三友"瓶 富春 紫禁城6：18

雍正期的景德镇五彩瓷器 耿宝昌 景德镇陶瓷4：60—63

王府款瓷器 冯小琦 紫禁城6：14

八 绘画

漫话中国古代的壁画（上） 潘絜兹 文史知识11：96—101

北齐娄睿墓壁画与莫高窟隋唐之际画风 谢稚柳 文物7：1—2

娄睿墓壁画及作者考证 史树青 中国艺术1（创刊号）

娄睿墓壁画略说 王天麻、邓林秀等 中国艺术1（创刊号）

北宋绘画遗珍 金维诺 中国艺术1（创刊号）

敦煌早期壁画的动态传情 孙鸿利 美苑1：20

论敦煌绘画艺术 （英）劳伦斯·秉雍著 张德明译 敦煌研究2：196—199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萧凡 中国建设4：68

飒然风起——苏州瑞光寺塔四天王像对吴道子画风的继承 李嘉 美术12：60—61

山西寺观壁画 柴泽俊 美术研究4：72—76

打开又一个研究领域——谈敦煌遗画研究 张德明 西北史地2：80—81

曲阳北岳庙壁画 李长瑞、周月姿 美术研究4：77—80

社科院民研所王静如教授发现现存最早的唐僧取经壁画 李蔚 光明日报1月13日2版

古代少数民族美术中的杰作——固原北魏漆棺绘画 王泷 宁夏艺术1：31

明末金陵版画 周芜 美术2：24—28

补1984年

克孜尔118窟壁画内容辩释 刘松柏 新疆艺术5：31

龟兹风壁画初探 袁亭鹤 新疆艺术6：27

明初的木刻画——《中国古木刻画史略》选刊（4） 郑振铎 版画世界6：34

九 古代工艺美术

图案美学探源 雷圭元 新美术2：68—72

彩陶锯齿纹试解 蒋书庆 美术12：62—66

古代织物的印染加工 高霭贞 故宫博物院院刊2：79—88

浅谈湖北出土的战国、秦、西汉漆器 陈振裕 文物天地6：40—41

试论元末明初西塘派剔红工艺的发展 张理萌 故宫博物院院刊2：89—94

补1984年

从原始时期看原始艺术之功能——兼谈对彩陶纹饰来源图腾的不同看法　王小倩　工艺美术研究6：35
江苏新石器时代艺术考古综述　钱锋　美术史论4：90—101
青铜艺术　黄能馥　工艺美术研究6：1
谈谈山西古代青铜工艺　晋博　山西工艺美术2：12
秦汉漆器价格考辨　余华青　中国史研究4：97—104
试谈唐代"宝相花"艺术的表现风格　马洪忠　北京工艺美术3：21
浅谈"莲花"纹样与陶瓷装饰——兼论"莲花"的缘起　曹志强　工艺美术研究6：50
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　成恩元　贵州民族研究4：162
景泰蓝史话　梁秀伟　中国科技史料5卷3期：28

一〇　法帖与书法

碑帖常识　王壮弘　书法1：30—32
书法艺术的宝库——西安碑林　雒长安　文博5：78—82
关于楷书源流　雒长安　文博2：57—62
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　马子云　故宫博物院院刊3：95—104
《群玉堂苏帖》及其他　段成桂　书法3：18—19
虞世南的书法　汪谷兴　书法1：18—20
薛绍彭及其书法艺术　崔尔平　书法2：22—23
试论王铎的书法艺术　牛光甫　中州今古1：41—45
欧斋石墨题跋（节选）朱文钧遗作　故宫博物院院刊3：152—153
《张忠烈公墨迹》刻帖考　周铮　文物10：11—18

陆　古代科学技术·

一　农业

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何炳棣　农业考古1：90—99
中国古代农具史分期初探　荆三林、李趁有　中国农史1：40—44
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　杜葆仁　农业考古　1：336—343
史前农业研究的新道路　何兆雄　史前研究1：82—93
谈谈我国原始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和农业起源问题　冉光瑜　历史教学7：6—9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综述　曾琪　考古与文物5：61—74
浅谈鄂西原始农业　卢德佩　农业考古1：110—112
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　吴汝祚　农业考古1：103—109
红山文化发现的石农具　李宇峰　农业考古1：52—54
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　白云翔　农业考古1：70—81
殷周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察　王克林　农业考古1：82—87
战国时期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石永士　农业考古1：113—121
齿刃铜镰初论　云翔　考古3：257—265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农业生产　陈振

裕 农业考古1：127—136

从考古资料看汉初南越国的农业 覃彩銮、兰日勇等 农业考古1：122—126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农业生产技术 陈文华 文物8：41—48

从陶俑看四川汉代农夫形象和农具 史占扬 农业考古1：66—69

河南古代铁农具（续） 李京华 农业考古1：55—65

中国古代有没有西红柿？——"西汉番茄"出土后的探索、研究情况 余震 四川日报1月23日1版

二 饲养业

中国原始畜牧业的起源和发展 谢崇安 农业考古1：282—291

从甲骨文看商代养猪技术 卫斯 农业考古1：292—293

夏代养蚕业的传播与发展——三论中国养蚕业起源于长江三角洲 魏东 中国农史4：85—92

补1984年

我国养猪历史综观——从出土文物与史籍看我国养猪业的发展进程 王剑农 湖南农学院学报3：93

三 水利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 柳红亮 中国农史4：93—96

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水利考 柳红亮 新疆社会科学2：112—115

千年古堰木兰陂 薛世平 历史知识6：42

四 交通

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 孙机 文物8：25—40

郑和宝船研究的进展 席龙飞 上海大学学报2：64—69

关于郑和宝船尺度问题的探讨 郭之笏 海交史研究2：88—92

补1984年

中国古代指南车的原理和构造 颜志仁 上海机械学院学报3：31

宋代航海技术综论 孙光圻 中国航海2：69

郑和宝船尺度考辨 文尚光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4：13

浅谈独木舟 车广锦 南京博物院集刊7：19—25

五 天文、历算

盱眙汉墓木刻星象图考 周晓陆 南京大学学报增刊：141—147

契丹文天干名称考 黄振华 考古与文物4：93—95

式盘综述 严敦杰 考古学报4：445—464

论楚国之历 何幼琦 江汉论坛10：76—81

史前时期的数学知识 富严 史前研究2：104—110

中国数学史上重大发现——江陵张家山汉简一瞥 李学勤 文物天地1：46—47

六 化学

中国古代建筑琉璃釉色考略 杨根 自然科学史研究4卷1期：54

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 周庆基 河北大学学报3：83—87

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 后德俊 江汉考古1：90—96

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

高至喜 文物12：54—63

七 纺织

中国古代的暗花丝织物 包铭新 华东纺织工学院学报11卷1期：89
两周蚕丝科技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蒋猷龙、赵丰 丝绸史研究2卷2期：1—6
绚丽的楚国丝绸珍品 彭浩 文物天地3：40—41
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两种绦带 彭浩 考古1 88—95
秦汉的丝绸与刺绣 高汉玉 丝绸史研究3：1—6
马王堆汉墓丝绸珍品选介 侯良 文物天地5：38—39
古代绫织物的起源及演变 李英华 故宫博物院院刊1：74—77
说绨 赵丰 丝绸史研究3：10—15
新疆出土地毯研究 贾应逸 考古与文物2：82—86
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 贾应逸 考古2：173—181
古代越人的纺织业 林蔚文 民族研究2：37—41
罕见的元代丝织品 内蒙古博物馆供稿 内蒙古社会科学2：92—93
补1984年
我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发展规律的初探 周启澄等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1、
中国古代丝绸精练技术的发展 赵丰 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卷3期：59
中国古代手工棉纺织工艺分析 刘峰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53
中国古代的五锭棉纺车 包铭新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46
古代织锦纹样浅探 谢锋 丝绸史研究1卷2期：23
古代织锦的研究 屠恒贤等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7：85
春秋至汉代蚕桑丝绸技术迅速发展的原因 史文训 丝绸史研究1卷4期：37
略论马砖一号墓出土的几种丝织品的织造方法和产地 彭浩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6：38
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及其织造技术初探 戴亮 丝绸史研究1卷3期29—34
试论汉——唐期间中国丝绸纹样风格的演变 缪良云 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25
从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看十六国和麹氏高昌时期的纺织品 孔祥星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52—60
敦煌壁画纺车织机浅谈 王进玉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9：24
敦煌壁画纺车织机浅谈 王进玉 丝绸史研究1卷3期：15
唐代以前丝绸花色品种概述 汤池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8：7
唐代丝绸染色之染料与助剂初探 赵丰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7：69
宋代四川的丝绸业 苏杭 丝绸史研究1卷2期：15
明代丝绸科技发展初探 区秋明等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8：30
我国明清时期的起绒丝织物 包铭新 丝绸史研究1卷4期：21—29
湖南蚕丝业的起源和发展 沈汝禄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8：1
缂丝 区秋明 丝绸史研究1卷4期：5—8

八 矿冶

古代青铜器是怎样冶铸的 李学勤

文物天地3：50—51

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李京华） 文物12：75—78

河南古代青铜冶铸业的兴起 陈旭 中州今古2：58—60

中国古代失蜡铸造刍议 谭德睿 文物12：66—69

东周时期我国的青铜铸造工艺试探 叶万松、余扶危 中原文物4：118—121

贵池东周铜锭的分析研究——中国始用硫化矿炼铜的一个线索 张敬国等 自然科学史研究4卷2期：168

从兵器铭刻看战国时代秦之冶铸手工业 王慎行 人文杂志5：76—83

汉代的铜器铸造手工业 宋治民 中国史研究2：13—25

秦汉时期山东制铜业的发展 逄振镐 东岳论丛6：58—64

中国古代开始冶铁问题刍议 金家广 河北大学学报3：88—93

秦汉铁范铸造工艺探讨 李京华 史学月刊5：1—14

古汉铁器中球墨成因初探 钱翰城等 大自然探索1：171

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 赵青云、韩汝玢等 考古学报2：157—183

洛阳坩埚附着钢的初步研究 何堂坤等 自然科学史研究4卷1期：59

补1984年

试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发掘的意义 张为民 黄石师院学报4：109

文明古国的又一见证——黄石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寻踪 黄博文等 湖北日报12月6日2版

九 其他

从考古新发现看造纸术起源 潘吉星 中国造纸4卷2期：56

从造纸术的发明看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 刘青峰等 大自然探索1：163

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 刘建国、徐铁城 文物1：40—47

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初探 刘建国 文物1：48—52

中国古代的几种记时器 管成学 文史知识6：62—67

对我国原始社会医疗保健的初步考察 彭曦 史前研究3：67—72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医疗器械 刘树林 文物8：85—86

补1984年

蔡伦发明造纸的历史不能否定 韦承兴 中国造纸3卷4期：58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探讨 谈青霖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3卷3期：9

中国古代火炮发明时间初探 刘旭 大自然探索4卷2期：175

柒 古代文化生活

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 芮国耀 文物8：66—72

古代的磬 高野 文博5：95—96

略论曾侯乙青铜编钟在音乐史上的价值 郭曼曼 史学月刊5：20—24

从曾侯乙墓的竹笛看宋玉《笛赋》的真实性成绩 江汉论坛7：59

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 李纯一 音乐研究2：62—70

敦煌东汉元嘉二年五弦琴谱研究 牛龙菲 敦煌研究2：8—28
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 郑珉中 故宫博物院院刊3：154—170
四川省广元县罗家桥一、二号墓伎乐石雕的研究 李成俞等 音乐探索1：50
垣曲宋墓杂剧雕砖考证 常之坦 晋阳学刊4：107—108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乐器 周菁葆 中国音乐2：47
从出土文物看金代女真族的乐器 庞志国 博物馆研究3：73—75
山西洪洞明应王殿戏曲壁画新探 周国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100—109
殷商时期的武术 习云太 中华武术4：42
两汉时期的河南杂技 马紫晨 中州今古5：36—39
汉代角抵戏与体育 刘秉果 体育教学与科研1：21
汉代的角抵百戏 孙景琛 文史知识5：60—64
打马钱与李清照的《打马图经》 于中航 文物天地3：42—43
金代象棋 李士良 学习与探索1：封二

补1984年

春秋时期古墓在当阳重现异彩，出土文物中有首次发现的最早的古瑟和金属弹簧 湖北日报12月23日1版
敦煌壁画中的隋唐乐器及其组合形式 蒋咏荷 乐府新声3：9
南朝模印砖画释义 王少华 舞蹈艺术6：222
王建墓石刻伎乐与霓裳羽衣舞 秦方瑜 音乐探索3：82
段文杰谈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 王克芬 舞蹈艺术2：90
温县宋杂剧雕砖摭谈 周到 戏曲艺术2：56
戏曲文物的奇珍异宝——稷山、新绛金、元墓杂剧砖雕之研究 郭桃 戏剧学习4：25
遂昌又发现一座古戏台 纪勤 戏文4：48

捌 宗教遗迹与遗物

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 杜玉生、徐金星 历史知识2：40
宝丰香山寺 董润兴 中州今古2：28
五台山显通寺、佛光寺创建年代考 崔正林 晋阳学刊3：78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纪 樊增华 古建园林技术2：48—52
高原古刹大昭寺 欧朝贵 文物天地6：1
千年古寺扎玛尔吉如拉康 张仲立 文物9：65—72
金棺银椁 稀世珍宝——庆山寺舍利塔精室 赵康民 百科知识10：26—29
临潼新近出土的佛教珍贵文物 安克仁 百科知识10：15—16
龙门天竺寺与摩尼教 温玉成 中原文物4：98—101
法门寺调查简报 西北大学历史系，扶风县博物馆联合调查小组 文博6：5—13
天枢——我国古代一种纪念碑样式 李松 美术4：41—45
少林寺北宋舍利石函艺术试析——兼谈函题记与面壁塔诸问题 蔡全法

中原文物2：82—87
从几通碑石看荐福寺 小雁塔的变迁和整修 保全 考古1：42—47
热振寺述略 高禾夫 西藏研究3：101—108
辉县白云寺踏察记 温玉成 中原文物3：99—101
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 宿白 文物7：32—48
辽应历五年石幢题记初探 刘精义、齐心 北方文物4：33—36
记曲江南华寺北宋木雕罗汉像 黄玉质 岭南文史1：145
淅川香岩寺 吴云贵 中州今古4：54
古代库车的佛教与佛教遗址 买买提·木沙著 朱英荣等整理翻译 新疆大学学报2:47
凤泉寺隋舍利塔下铭 罗西章 考古与文物4：19—20

补1984年

北魏幽州光林寺考 史树青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28—130
独乐寺千年乐无恙 光明日报12月16日2版

玖 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与民族志

猃狁、鬼方的族属及其与周族的关系 尹盛平 人文杂志1：69—74
白石崇拜遗俗考 沈仲常、黄家祥 文博5：61—65
长沙树木岭出土战国铜匕首的族属问题 高至喜 文物1：39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匈奴铜饰牌 予平、戴戈 文博5：38—42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拓跋鲜卑迁徙 田中华 文博3：41—43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 周伟洲 文物5：53—56
勿吉和靺鞨的物质文化 孙进已、干志耿等 博物馆研究1：65—69
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 干志耿 北方文物1：23—29转页
西团山文化及其族属 刘景文、张志立 北方文物2：22—27
关于西团山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 李健才 社会科学战线2：160—165
悬棺葬是怎么一回事 方令 文汇报10月7日4版
神秘的“武夷船棺” 黄贤庚、杨瑞英 文汇报 2月28日3版
福建武夷山的船棺之谜 林忠干 旅行家5：28
“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 梁钊韬 思想战线6：66—69
从民族调查看茂汶石棺葬的白石随葬 邓廷良 考古与文物6：102—104
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 刘世旭 考古6：559—567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 韩康信 新疆社会科学6：61—71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王炳华 新疆社会科学4：50—59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王炳华 新疆社会科学1：48—58
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 王明哲 新疆社会科学1：59—64
是古楼兰国时代的墓葬吗？ 韩康信 化石3：16—18
广西壮族与云南贵州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关系 黄增庆、张一民 贵州民族研究3：145—153
从越族图腾崇拜看夏越民族的关系

吴绵吉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校）1：44—49
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 宋恩常 史前研究4：78—83
寻求照叶树林文化和稻作文化之源——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文化学术调查之行 （日）佐佐木高明著 尹绍亭摘译 民族译丛1：40
福建省惠安县“长住娘家”婚俗初探 林蔚文 贵州民族研究3：112—118
关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父系家庭公社的比较研究 刘达成 思想战线2：68—74
关于文身的几个问题 陈启新 史前研究4：71—77

补1984年

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覃彩銮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3：35
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兼论我国古羌人的起源 周庆明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5—19
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渊源初探 阚勇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75
云南省盐津县“僰人坟”族属初探——兼说滇东北“僰”人的族属源流——周裕栋 研究集刊2：205—219
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镳略论 翟德芳 内蒙古文物考古3：33
内蒙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 崔璇 内蒙古社会科学6：70—75
对另皮窑与讨合气金饰牌的几点认识 陆思贤 内蒙古文物考古3：56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等 内蒙古文物考古3：52
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与“白道”有关的文物古迹 汪宇平 内蒙古文物考古3：61—66
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 金永田 内蒙古文物考古3：94
海南岛伊斯兰古墓群考察简记 中元秀 民族研究动态4：28
贵州清镇、平坝宋墓族属试探 席克定 贵州民族研究4：143
新疆哈密古尸研究综合报告 徐永庆等 考察与研究4：51

拾 历史地理与名胜古迹

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 刘敦愿 江汉考古2：47—57
西周畿内地名小记 王辉 考古与文物3：26—31
关于楚之别都 马世之 江汉考古2：68—74
越国勾践小城遗址及其保护规划 钟华华 城市规划1：48
踏察春秋战国时秦晋武城遗址 呼林贵 陕西师大学报3：110
平阳、雍都地望确定与秦先公徙都迹略 卢连成 文史集林1：270—281
陕西华阴境内秦魏长城考 夏振英、呼林贵 文博3：35—37
焉耆尉犁危须都城考 陈戈 西北史地2：22—31
和林格尔壁画墓所反映的东汉定襄郡武成县城的地望 李逸友 考古与文物1：109—111
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 魏存成 北方文物2：28—36
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考察记 景爱 博物馆研究1：101—103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 景爱 学习与探索3：141—142
元阿力麻里古城地望再考 成振国 西北史地3：52—56
叶赫部东西两城小考 李君 博物馆研究1：88—90
颛顼陵与帝喾陵 桑朝峰 中州今古1：57
大禹陵和禹王庙 金经天、林子龙 浙江学刊2：封一
云水苍茫章华台 罗仲全 江汉考古3：81—82
滑县明福寺塔 朝凤 中州今古2：30
大兴寺塔 张毅力 中州今古5：55—56
安阳文峰塔 宋明堂 中州今古4：40
河南现存的五代塔 杨焕成 中州今古5：10—11
两座罕见的地下阴塔 邓永华、谢镇成 文物天地4：45
辽代农安古塔 许彦文 文物天地6：43
汤阴岳飞庙 王波清 中州今古1：54—56
布达拉宫 王望生 文博6：76—78
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古遗址规划的意见 贺梓城、王翰章 文博6：22—24

补1984年

汉光禄城的考察 李逸友 内蒙古文物考古3：46—51
呼和浩特西白塔古城 张郁 内蒙古文物考古3：98

拾壹 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与中原的文化关系——旧石器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 吕光天 北方文物1：59—67
从考古资料谈“丝路”的开拓与作用 王炳华 公路交通编史研究2：35
从考古资料看“丝路”的维护及局部路段变迁 王炳华 公路交通编史研究3：1
东海“丝绸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东海航路和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陈炎 海交史研究2：5—14
海上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人民画报10：2—17
海上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人民画报11：2—13
沟通东西文化的“陶瓷之路” 陈桥骄 天津社会科学1：91—95
晋宁石寨山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的比较研究 张增祺 云南社会科学2：55—60
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 杨泓 考古1：61—76
新罗“天马冢”马具复原研究——兼谈中国古代马具对海东的影响 杨泓 考古与文物2：87—95
闲话朝鲜高丽青瓷 耿宝昌 博物馆研究3：91—94
波斯萨珊朝鎏金铜瓶 董宏征 文物天地1：39
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 周长源 考古2：152—153
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瓶的来源问题 陈存洗 海交史研究2：43—45
胡人牵马俑与宋代阿拉伯商人的活动 彭适凡 文物天地1：38—39
天津巴布韦与中国瓷器 马文宽 海交史研究2：31—36

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又发现一块基督教叙利亚文刻石 成振国 文物4:50
日僧邵元撰《息庵禅师道行之碑》王雪宝 中州今古3:19
福州仓山区琉球墓初探 徐恭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3:100—106
郑和与海上交通 (日)寺田隆信著 田树茂译、吴杰校 上海大学学报2:77—84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高蒙河 上海大学学报2:93—99
德州苏禄国东王墓散记 夏春江 文物天地2:55—57
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 张维持、胡晓曼 学术研究1:75—80
希腊科孚岛上的中国文物 李成贵 文物天地2:62—63
首都博物馆藏痕都斯坦玉器 薛婕 文物天地8:90—92转页
清代在西藏流通的剪碎的尼泊尔银币 王海燕 文物11:92—95

补1984年

“海上丝绸之路”应称为“瓷器之路” 王建辉 求索6:123
丝绸之路考察报告 叶妙娜等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2:126
中国丝绸传入东南亚及其影响 陈炎 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17:15
蜀锦对丝绸之路的贡献 余涛 丝绸史研究1卷2期:11
日本延长三年道贤法师经筒 石志廉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6:131—132
关于浡泥国王墓和墓碑碑文问题——与史原同志商榷 季士家 福建论坛5:73

拾贰 书刊评介

介绍《周口店发掘记》 作铭 考古4:383—384
《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 梁岩 考古2:191—192
评《甲骨文合集》 晁福林 中国史研究2:157—161
何四维《秦律遗文》评介 李学勤 中国史研究4:161—163
评介《汉简研究文集》 瓯燕 考古11:1056
《汉简研究文集》评介 张大可 社会科学评论9:62—64
《好太王碑研究》介绍 刘凤翥 民族研究动态1:92
评介《中国陶瓷史》 朱全 考古9:863—864
简评《铜鼓史话》陈绍棣 江汉考古1:97—98
介绍两本中州金石志 关文 中州今古3:12—13
评介《第一次全国[illegible]学术会议文集》 求真 考古10:960
《湖北文物考古文献目录》已出版 小雷 江汉考古3:3

拾叁 外国考古概况

日本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 蔡凤书 文史哲5:35—41
当前美国和英国考古概况 张光直 考古与文物3:104—110
苏联考古学的成就和问题 (苏)B.A.切尔金 LEQ、C、克伦 J.C.列别杰夫 刘茂译 黄纪苏校 楼宇栋审校 史前研究4:95—104

拾肆　学术消息

中国考古学会举行第五次年会讨论中国古代都市问题　殷玮璋　考古6：573—574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举行　林　史前研究3：59

纪念北京猿人发现55周年　青石　化石1：6

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林玉芬　人类学学报2：196

元谋人发现廿周年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在元谋召开　张兴永　人类学学报4卷3期：288

金牛山人类化石科学鉴定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人民日报8月13日3版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简介　张天周　中州学刊1：129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杨新平、周慧杰　中州今古1：58—59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略述　聂玉海　历史教学2：60

吉林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集安召开　蜀春　史学集刊1：10

湖北省考古学会召开第五次年会　省考古学会秘书处　江汉考古2：79

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述要　陈秉新　安徽史学5：79—81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胡振东　云南社会科学1：108—114

在长春召开的好太王碑讨论会　高洁译　博物馆研究4：156—160

好太王碑专题讨论会——中日学者讨论、探讨古代史之谜　高洁译　博物馆研究4：149—156

少数民族货币研究大有可为——北方五省区、辽、西夏、金、元货币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　月氏　中国钱币3：80

内蒙古自治区钱币研究会学术讨论综述　乔晓金　中国钱币2：80

“轻工系统古陶瓷研究座谈会”会议纪要　轻工业部科技局供稿　中国陶瓷1：44—46

绚丽的展览　珍品的荟萃——记“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　方国锦　故宫博物院院刊2：49—52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巡礼　孟宪珉、赵力华　文物1：67—71

香港《中国文物展览馆》揭幕　首展湖北出土文物　刘彬徽　江汉考古1：99

香港史学界应邀座谈祖国出土文物　刘彬徽　江汉考古1：100—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　考古6：576

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　光明日报12月1日2版

补1984年

契丹考古学术会议纪要　本刊记者　内蒙古文物考古3：1—5

新发表古代铭刻资料简目

(原形字用“口”号代替。期刊名称后第一个数码是期，第二个是页)

一 金文

殷代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戈

内上铭一族徽。

(以上河南省安阳市博物馆藏品 中原文物 2：99—100)

鼎

口沿内壁有铭，原文未交待字形。

(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鼎

器内底铭一字：“口”。

(1952 年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方鼎

腹内壁铭二字：“父已”。

(1950 年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出土)

殷

器内底铭二字：“子口”。

(1950 年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出土)

斝

器内底铭一字：“口”。

(1952 年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斝

鋬下铭一字：“戈”。

(1952 年河南省辉县褚邱村出土)

觚

圈足内壁铭三字：“卫父已”。

(1950 年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出土)

觯

盖内铭三字：“卫父已”。

(1950 年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出土)

卣

盖、器同铭二字：“祖辛”。

(1965 年河南省辉县褚邱村出土)

爵

鋬内铭二字：“亚牧”。

(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爵

鋬内铭四字：“己并父丁”。

(1952 年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以上 中原文物 1：26—29)

鼎

腹内底有铭，原文未交待字形。

殷
器内底铭一字："车"。
斝
器内底铭一族徽。
觚
铭二字："口子"。
觚
圈足内壁铭一字："告"。
觚
圈足内壁铭一字："并"。
觚
圈足内壁铭一字："羊"。
觚
圈足内壁铭一族徽。
觚
圈足内壁有铭，原文未交待字形。
盘
器内底铭二字："父甲"。
爵
鋬内铭一字，原文未交待字形。
爵
鋬内铭一族徽。
爵
鋬内铭一族徽。
爵
鋬内铭一族徽。
爵
鋬内铭一族徽。
爵
鋬内铭一字："禾"。
爵
鋬内铭一字："克"。
爵
鋬内铭二字："弟延"。
爵
鋬内铭二字，一字模糊不清："口子"。
爵
鋬内铭二字："父丁"。
爵
鋬内铭三字："子口口"。
爵
鋬内铭三字："口父已"。
爵
鋬内铭四字："己并父丁"。
爵
鋬内铭四字："已并父丁"。
戈
内端两面均有铭二字："火矛"。
戈
内端两面均有铭一字："生"。
戈
内端两面均有铭一字："克"。
戈
一面有铭二字，似是"龙子"。
戈
柄上有铭一字："◇"。
戈
内端铭二字："口家。
（以上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中原文物1：26—31）
鼎　五件
沿下腹内均铭二字："已並"。
尊
圈足内铭二字："己並"。
觚　三件
圈足内均铭二字："己並"。
卣
圈足内铭二字："已並"。
爵　五件
鋬内均铭二字："已並"。
甗
两耳之间铭一字："门"。
镈　二件
靠近銎部均铭一字："己"。
刀

靠近背部铭一字:“己”。

(以上1983年12月山东省寿光县“益都侯城”故址出土 文物3：2—5)

爵

鋬内铭二字:“祖庚”。

爵

鋬内铭二字:“口父”。

(以上近年来河南省临汝县李楼出土 考古7：664)

爵

鋬内铭二字:“月己”。

(1972年春安徽省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墓葬出土 文物10:38—39)

爵

鋬内铭二字:“月己”。

爵

鋬内铭一字:“酉”。

(1971年至1972年安徽省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出土 文物10:40)

鼎

腹内壁铭一族徽。

簋

腹内铭一族徽。

觚

圈足内铭一字:“旅”。

爵

鋬内铭一字:“守”。

(以上北京市首都博物馆藏品 文物8:82—84)

无敄鼎

腹内壁铭三行十一字:“无敄用乍文 父甲宝隮 彝口”。

(1969年上海市金属供应站拣选 文物1：72—73)

西周和春秋

鼎

腹内铭三行十一字:“口口乍飤鼎其万年永宝用”。

邓公簋C

盖、器同铭三行十二字:“邓公乍应 嫚毗媵簋 其永宝用”。

邓公簋D

盖、器同铭三行十二字:“邓公乍应 嫚毗媵簋 其永宝用”。

(以上1984年4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镇义学岗出土 考古3：284)

簋

腹内底铭三字:“光父辛”。

(1983年底河南省临汝县骑岭乡大张村出土 考古12:1141)

甗

口沿内壁铭五字:“矢伯乍旅彝”。

觚

圈足内壁铭一族徽。

铸

器一面铭一字:“子”。

(以上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中原文物1：28—31)

仲枏父鬲甲

腹内壁铭七行连重文二字共三九字:“唯六月初吉 师汤父有司 仲枏父乍宝 鬲用敢飨孝于 皇且考用祈 眉寿其万年 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仲枏父鬲乙

腹内壁铭七行连重文二字共三九字:“唯六月初吉 师汤父有司 仲枏父乍宝 鬲用敢飨孝于 皇且考用祈 眉寿其万年 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内考父簋盖

盖内铭三行连重文二字共十六

字："伯考父乍宝　簋其万年　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1962年陕西省永寿县好畤河出土　考古与文物4：1）

周我父簋盖甲、乙、丙　三件

盖内均铭四行连重文二字共二五字："周我父乍交䵼　簋用享于皇且文考用锡眉寿　子子孙孙永宝用。"

（1984年3月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窖藏出土　考古与文物1：17）

鼎

腹内铭三字："囗父丁"。

（1980年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王家嘴墓葬出土　文博5：4）

史惠鼎

腹内铭五行连重文二字共二七字："史惠乍宝鼎　惠其日囗月　雁祭化诬囗　寺屯鲁令惠　其子子孙孙永宝"。

史惠簋

盖、器同铭三行连重文二字共十六字："史惠乍宝簋　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1980年3月陕西省长安县沣西新旺村发现　文博3：89）

甗

腹内壁有铭文，字形不清，恐为作器者族徽。

（1984年5月陕西省宝鸡县下马营乡旭光村墓葬出土　文博2：1—2）

鼎

腹内壁铭二行五字："王季乍鼎彝"。

簋

腹内底铭二字："争彝"。

（以上1982年冬山东省济阳县姜集公社刘台子村墓葬出土　文物12：17—18）

归父敦

盖内铭二行十一字："鲁子中之子归父为其膳敦。"

（河北唐县东岗 宠村出土　文物6：15）

䜌伯盘

腹内底铭六行连重文二字共五六字："佳八月既生霸庚申辛　囗囗囗囗䜌伯囗邑邦　囗囗囗三国内吴囗囗西　囗鼎位邑乃田囗余自乍　朕盘其（万）年霝寿黄　考子子孙孙宝用于囗邑"。

伯硕夆盘

腹内底铭二行十五字："白硕夆乍楚姬賸盘其万年子孙永用"。

（以上1975年湖北省浠水县朱店出土　江汉考古1：104—105）

中生父鬲

颈部内面铭一周连重文二字共十八字："中生父乍孟姬宝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盨

腹内底铭二行六字（行款不明）："䏊伯乍仲姞䵼"。

（以上1983年9月甘肃省宁县宇村墓葬出土　考古4：349）

爵

鋬内铭二字："鸟且祭"。

（1981年8月甘肃省庆阳县温泉公社韩家滩庙嘴出土　考古9：854）

爵

鋬内铭二字："子丁"。

爵

鋬内铭二字，尾部铭一字："口凵凵"。

簋

腹内底铭一动物形族徽。

（以上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中原文物1：31）

卫尊

腹内底铭四行二四字："唯四月乙卯公锡臣卫宋嗣贝 三朋在新京用乍父辛宝尊彝"。

（1974年武汉市文物商店在武汉市铜材厂拣选 江汉考古1：103）

缶

铭二行六字："中子宾 之越缶"。

（1983年8月湖北省谷城县禹山庙嘴出土 江汉考古3：56—61）

战国

鼎

盖刻铭四字："正立下官"。

鼎

一耳侧錾刻铭二字："笱止"。

（以上1979年初陕西省旬邑县出土 文物5：44）

戈

胡上铭三字："左徒戈"。

（1983年3月山东省莒南县小窑发现文物10：30）

铜泡

里面铭三行八字："十四年 十一月 师绐"。

（山东省枣庄市齐村区刘庄墓葬出土 考古5：477）

剑

剑身铭二行连重文一字共二〇字："十年皇二啬夫杜相汝左 皇工师韩阳冶尹朝执剂"。

（据云出自山东省莒南县路镇 考古5：476）

鼎

腹部近口沿处铭四字："中脯王鼎"。

矛

纽下刻铭二字："少府"。

（以上1978年湖南省溆浦县马田坪秦墓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2：50—51）

矛

骹部正反面两侧均有铭，一侧为"廿年寺工口攻(?)口丞口口工目"，另一侧为"口郡武库"。

（1978年冬湖南省岳阳市郊东风湖畔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2：28）

缶

盖内铭三行九字："蔡悃子 口姬安之口口"。

剑

格上两面镶嵌六字，一面为"徐王义楚之元子口"，另一面为"择其吉金自乍用佥"。

（以上1972年冬湖北省襄阳县蔡坡墓葬出土 江汉考古1：14—18）

簠

盖、器同铭二行六字："盛君萦之御簠"。

（1981年7月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二号墓出土 文物1：16—36）

鼎盖

刻铭五行二〇字："十七年叚 工师王马重视事鐙 冶敬才 坪阴口

四分”。

（1952年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 考古7：633）

秦

斤权

斤权两件，分别刻有相同的秦始皇廿六年诏文。

（1975年和1978年春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园内发现。文博4：33—34）

铜权

权刻秦始皇廿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文。

（1980年10月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封土发现 考古与文物4：105）

鼎

鼎一耳傍刻“子鼎一斗”四字，另一耳傍刻“赵主家”三字。

（1973年陕西省临潼县斜口公社岳沟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42）

汉

鼎

鼎十二件，盖面或上腹部有铭：“齐食大官畜口”，“大官”、“尚志”、“木”、“齐食官畜”、“齐食大官北宫十”、“大官”、“南宫鼎”、“南宫鼎齐食官朱”、“南宫官鼎 朱齐食官”、“齐大官食右般者”、“大官北宫”、“齐食官朱”、“齐大官尚志十”、“南宫鼎”、“左容二斗重九斤”、“齐大官畜粲人”、“大官北宫”、“齐大官畜 南宫鼎”。

壶十件，口外或外底有铭。有八件的口部均铭“上米”二字。壶十件的容量和重量分别为：“十斗廿八斤十四两西”、“十斗廿七斤十二两东”、“十斗一钧九斤西”、“十斗一钧五斤西”、“十斗廿八斤八两东”、“十斗一钧五斤七两西”、“十斗一钧五斤十五两东”、“十斗廿七斤七两东”、“十斗一钧八两西”、“十斗一钧二两东”。

钫三件。一件唇部铭“齐食官上米”，颈部铭“齐大官右般”，盖缘铭“重二斤十五两”。一件唇部铭“齐食官上米”，颈部铭“齐大官右般”。一件盖缘铭“左三斤六两”。

罍十件。一件腹铭“淳于重一钧六斤十两容十斗 今皃容九斗五升”。一件腹铭“口官右般”、“下米”、另一处浅刻铭“大官南曹”、“大官北宫”。一件腹铭“大官南曹”，腹部三处铭“下米”。一件腹部两处铭“下米”。一件腹部铭“齐大官右般”。一件腹部铭“齐大官畜粲人 下米”，另一处浅刻铭“大官曹”、“下米”、“大官一钧五斤”。一件肩部铭“齐大官右般”，另一处刻铭“下米”、“大官”。一件腹部铭“齐大官”、“齐大官右般”，两处铭“下米”。一件外腹三处铭“下米”。一件腹部铭“齐大官畜上”、“下米”、“上米”、浅刻铭“大官南曹”、“畜官”。

盆二件。一件口沿铭“上左 容十斗 重十九斤十二两”，另二处铭“北木”。一件口沿铭“齐大官右般者”、“容十斗西”。

匜二件。一件腹部铭“六斤二两”、“食官”。一件腹部铭“六斤十两”。

勺五件。一件外底铭“朱鼎”。一件外底铭“齐大官右般北粲人”。一件外底铭“木鼎”。一件外底铭“鼎容半斗”，其余诸字模糊不清。一件外底铭“尚米”。

鎏金熏炉二件。一件座底外缘铭“今二斤三两”，以下尚有诸字已模糊不清。一件腹部铭“左　重三斤六两　今三斤十一两”。

骰子二件。在十八个面上分别错出“一”至“十六”以及“骄”和“䴥”字。

银盘三件。一件外底铭“容二斗重六斤十三两　御羞　工”，口沿底面铭“三十三年左工口　名吉七重六斤十二两廿一铢　奇　千三百廿二斩　六斤十三两二斗名东”。一件外底两次刻铭“容五升大官南右般木”、“大官　木”，外腹铭“左工一斤六两”。一件外底铭“南般　朱容五升”，外腹铭“左工一斤…两”。

银盒一件。盖内面铭“木南”二字。

（以上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出土　考古学报2：223—266）

铁器铭

铲、犁铧、斧等八件铁器均铭“河三”字样。

（河南省巩县铁生沟冶铸遗址出土　考古学报2：182）

鼎

鼎口沿铭“阳平顷侯冢上铜石鼎重七十三斤”。

（1983年春陕西省临潼县关山公社苏赵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5：40）

灯

灯口沿铭“宁陵侯重十三两半”，隶书。

镳壶

壶颈上倒刻铭二行，首行“黄氏”二字，二行“铜镳口有口”五字。此壶与宁陵侯灯同时伴出，说明黄氏乃宁陵侯吕臣之妻。

（以上1983年陕西省临潼县洪庆某军校出土　考古与文物5：42）

大铜洗

口沿铭“孙氏口”三字。

鎏金小铜洗

口沿铭“重五斤四两容四斗第二百廿八”十三字。

（以上1981年10月山东省微山县马陵山墓葬出土　文物5：94）

弩机

弩机栓上刻铭“河内工官二千二百四十二丙”十一字。

（1980年9月　至1984年1月福建省崇安县城村汉城出土　文物11：43）

铜方牌

牌两面均刻篆书“申”字。

（1981年至1982年江苏省铜山县龟山墓葬出土　考古学报1：128）

铜碟

碟外底铸三行十一字“建武十年三月丙申周仪造”。

（1979年11月陕西省淳化县十里原庄子村出土　文博2：46）

三国

弩机

弩机铭三行二十七字“黄初七年六月一日，口口口监作吏萧诗已，口口口师张倌耳师造口”。箭相右侧铭“才廿三”三字。

（1984年11月陕西省勉县

温泉乡牟营砖厂出土 文博5：91）

宋

犁镜

鼻下部铭三行九字："韩家哲 真钢犁耳使司"。

（1980年河南省登封县雷村出土 中原文物1：88）

辽

银符牌

正面铭契丹小字："主宜速"。

（1983年12月吉林省德惠县征集 博物馆研究2：70—72）

元

铜权

正面铭"瑞安州"，背面铭"延祐元年造"。

（近年来浙江省瑞安县横山出土。文物3：31）

铜权

一面铭"泰定元年"，一面铭"益都路造"。

（1985年春山东省博兴县窝孙村出土 考古3：240）

铜权

正面铭"温州路总管府"，背面铭"至顺二年造"。

（近年来浙江省瑞安县仙降出土 文物3：31）

铜权

正面铭"至顺三年"，正右侧面铭"T"字，背面铭"益都路"。

（1983年12月山东省沂水县土产杂品公司拣选 考古2：190）

铜权

一面铭"元统口年造"。

（近年来浙江省瑞安县白象出土 文物3：31）

铜权

正面铭"至元八年"，背面铭"南京路造"，背侧铭"寸七"。

（1985年河南省平舆县射桥乡征集 中原文物3：96）

银锭

大小两锭。大银锭正面中心从上到下铭三行字："宁口口三家票箫记刘肇王郁八中使司亢伍拾两贰钱行人秤库李元"。大银锭下方有"使司"、"检印"等字样。小银锭至上而下刻有三个字及押记："税使司口口"。小银锭下方盖有戳记，左刻"行人"和刻押符号。

（1982年10月甘肃省庆阳县彭原发现 考古2：189）

单耳金瓜金杯

柄底有一篆文，似"寿"字。

单耳银杯

刻铭"花银"及"龙国瑞造"字样。

团花平底银杯

刻铭"谢"字。

合金银碟

刻铭"瑶溪彭善卿造"。

双螭捧花金钗

末端刻铭八思巴文。

银条脱（臂钏）

有的刻铭"元勿造"，有的刻铭阿拉伯文，有的刻铭未识文字。

（以上1978年4月湖南省临澧县龙岗窖藏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 2：113—119）

明

铳筒

铳筒中部铸铭四行二十九字："横海卫教师祝官孙 司学军人王官保

铳筒重廿五斤洪武十一年月日造"。后座另镌铭一个"海"字。

(1964年初山东省冠县辛集公社大王庄村发现 考古10:914)

铳筒

铳筒铭:"永平府洪武十八年三月八日铸□□□铳铜重六十斤匠造官□□□□铸匠□保子"。

(1972年河北省宽城县宽城镇邮电局院内出土 考古8:759)

郑和铜钟

钟下部铸一周铭文:"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迴平安吉祥如意者"。

(1981年春福建省南平市拣选,据云此钟原置南平市郊雪山寺三宝殿内 文物1:74)

铜佛

须弥座上铭:"汝州伍院保一图信人李鉴、妻赵氏、长男李九章、李九功,嘉靖卅九年四月造"。

(1983年9月河南省临汝县风穴寺中发现 中原文物1:53)

刚卯

刚卯铭:"庶使刚瘅 莫我敢当□日刚卯 帝令尊化 顺尔□化伏兹灵□ 既正既直 既□既方"。

(1969年上海市浦东区海兴路典当弄墓葬出土 考古6:545)

铜炮

两门"流星炮"分别铭"胜字八百十八号","胜字八百二十二号"。

(1984年河北省赤城县古长城脚下北京军区某团营建中发现 文物天地1:64)

清

铜炮

炮身上铸铭"振远将军"、"两江总督陈化成"和"大清道光二十年间"等字样。

(1984年11月上海市吴淞口蕴藻滨建造码头发现 文物天地1:64)

二 玺印

战国

王×

(1980年底四川省涪陵市小田溪墓葬出土 考古1:17)

秦

赵忠

(1982年春陕西省汉中市沙沿乡杨家山村墓葬出土 文博5:10—11)

汉至魏晋

井相私印

李邦私印

屈相

皇广明

王趧

姚长益印

刘平印

诏假司马

(陕西省凤翔县博物馆藏品)

五威司命领军

(1983年4月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屯头村出土)

军司马印

(1974年陕西省凤翔县农副公司铜库征集)

别部司马

(1958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化原村出土)

(以上文博 6：30-33)

蓼万

(1983年陕西省临潼县西安第二炮兵学院汉墓中出土)

别部司马

(1982年陕西省临潼县韩峪公社出土)

蒋子文印和蒋文喜印

印文为“将（蒋）子文印”和“将（蒋）文憙（喜）印”。

(1979年陕西省临潼县新丰镇出土)

(以上考古与文物 6：37—38)

杨常安印

(1981年3月陕西省安康县城关出土)

庄细夫印

(1984年3月陕西省安康县白家梁出土)

高志印

(1984年3月陕西省安康县一里坡出土)

高志

(1982年7月陕西省旬阳县黄坡岭出土)

赐

(1981年11月陕西省旬阳县金洞公社出土)

军曲侯印

(陕西省安康县博物馆旧藏)

军司马印

(1984年10月陕西省安康县恒口上店村征集)

部曲将印

(1982年11月陕西省旬阳县大岭乡航行队出土)

(以上考古与文物 6：38)

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

印为银质。

(1980年6月陕西省旬阳县小河北砖厂发现 文物12：32)

徐术之印

(1974年1月山东省沂水县荆山汉墓出土 文物 5：50)

武原令印

两面皆刻“武原令印”四字。

(1979年夏山东省枣庄市涧头出土)

虎牙将军之印

(1979年山东省枣庄市徐楼村出土)

(以上文物 5：91)

宜官

仇中翁印

假司马印

部曲将印

(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黑城出土 文物 4：78)

苏伉私印

(1978年5月广西贵县北郊墓葬出土 考古 3：210)

刘注

该印是西汉楚国第六代楚襄王刘注的私印。

(1985年2月江苏省铜山县拾屯乡征集 据调查 刘注私印出自徐州市北九公里的龟山二号墓第六室中 考古学报 3：352 文物天地 4：41)

朱庐执封

(近年海南岛出土 文物天地 5：64)

魏率善氐佰长

(1979年1月陕西省岐山县蒲村乡南庄村墓葬出土 考古与文物 4：16—18)

关中侯印

印为金质。

(1985年1月江苏省南京市郊工地上发现 文物天地 3 63)

六朝

独孤信印

印为煤精制品。

在十六个正方形印面中，有十四个印面刻有印文，分别为“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臣信启事”、“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独孤信白书”、“信白笺”、“信启事”及“耶勅”、“令”、“密”。

(陕西省旬阳县出土 文博 2：95—96)

清河口章

印为铜质鎏金。

(1983年4月山东省临淄市窝托村墓葬出土 考古 3：218)

高句丽印

印文一面为“口天如郎固中”，另一面为“癸亥年正月中”。

推断为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印

(1962年3月吉林省集安县台上乡东明村出土 北方文物 4：37—38)

宋辽金

西夏文印

“元德二年”印

(1951年于北京征集)

“首领”印

印背两侧款为“天盛乙酉十七年”、“正首领兀西×玉”。

(吉林省博物馆藏品 博物馆研究 2：106)

宋丞相忠定赵周王印

(1979年夏湖南岳阳市城陵矶粮管站基建工地墓葬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 2：190)

大辽尚书吏部之印

背款左“天统三年四月日造”，右“大辽尚书吏部印”。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文化局藏品)

克剌阿邻猛安所之印

左边款“天统三年四月 日造”。

(辽宁省凤城县凤山出土)

萌夺果大猛安合里太谋克印

左边款“天统三年四月日造”。

(1973年5月辽宁省宽甸县红石砬子供销社收集)

(以上文物 5：87—88)

都统所听字印

背款右“兴定元年九月”，左“口口礼部造”，侧款“都统所听字印”。

(1965年3月河南省南阳县出土)

都统之印

(1976年河南省延津县胙城十八里庄出土)

副统之印

(1952年河南省开封市采集)

提控所印 两枚

(1957年河南省开封市收集)

提控之印

(1950年河南省开封市收集)

副提控印

(1970年河南省南阳县李庄出土)

行军万户丁字子印

(1955年河南省开封市收集)

行军副万户印

背款“行军副万户印”。

(1952年河南省开封市收集)

招抚副使之印

背款“天兴二年”和“口部造”。

(1972年河南省渑池县常村出土)

招抚副使之印

背款“天兴二年”和“口部造”。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李村出土)

省差顺字号印

背款右“泰和八年十月”，左“礼部造”，边款“省差顺字号印”。

(1970年河南省禹县城内出土)

公府收支局印

(1973年河南省延津县胙城十八里庄出土)

(以上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文物 5：85—86)

都统所印

边款右“恒山公府天兴元年”，边款左“造都统所印”。

(河南省宝丰县县城北四十里汝河南岸赵庄村出土)

都统盈字之印

右边款“兴定四年七月”，左边款“林州行部造”。

(河南省宝丰县关帝庙村出土)

(以上考古与文物 6：39—40)

麻谷镇商酒务记

两侧边款为“正隆二年五月”、“内少府监造”。

(河南省新安县文化馆藏品 中原文物 4：49)

都统之印

(1983年12月陕西省岐山县祝家庄公社社成大队后东生产队征集 考古与文物 6：39)

签宣抚司事印

(1983年5月河北省兴隆县农民捐献 据云为七十年前兴隆县榆木林村发现 考古 2：184)

招抚使印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地区征集 考古 2：187)

元帅之印

背款左“元帅之印”。

(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地区征集 考古 2：187)

万户之印

(1985年辽宁省岫岩县雅河乡甸子村出土 文物天地 4：64)

都统府弹压印

边款右“天赐二年”，边款左“弹压”。

(1976年6月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村发现 北方文物 3：42)

都提控印

(近年来吉林省德惠县天台乡天台古城址内出土 考古 11：1047)

都统所印

(1961年吉林省集安县太王乡民主村出土 北方文物 4：37—38)

堂厨公使酒库之印

(1982年9月黑龙江省依兰县迎兰公社永和大队屯北一里许出土)

都统所印

(1978年吉林省白城市出土)

副统之印

(1977年黑龙江省汤原县城镇公社东江大队出土)

(以上学习与探索 3：143—144)

副统之印

背款右“猪儿年八月”，左“日口造”。

（1984年春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乡顺和村出土 文物天地 3：62）

古州之印

左侧边款“应辨所造”，右侧边款“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

（1984年7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北郊八达沟口公路左侧坡地上发现 北方文物 3：41）

元明清

囗国公印

印文中间两行为八思巴文，两侧各一行印文待考。

（1984年北京市废铜中拣选 现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文物 11：74）

扶风务印

印面为八思巴文“扶风务之印”，背款右“扶风务印”，左两行“中书礼部造”、“至元四年十月日”。

（1974年陕西省岐山县益店乡宋村学校房基出土 考古与文物 4：16—18）

屯田百户印

（1980年夏陕西省淳化县夕阳公社冯寨村出土）

河中府知事印

（1982年12月陕西省淳化县夕阳公社汉寨村出土）

（以上文博 6：89）

东平路宣抚司奏差黄字号印

背款右“奏差黄字号”，边款右“东平路宣抚司”，边款左“中统元年七月日造”。

（1973年山东省阳谷县徐集出土 考古 2：188）

中书右司都事厅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边款“宣光二年五月日”、“中书礼部造”。

（甘肃省博物馆藏品 西北史地 2：82）

崇文监典薄行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左侧款“中书礼部造”及“至正廿九年五月日”。

（五十年代吉林省长岭县龙凤乡沙坨子发现 博物馆研究 3：106）

西边界社长章

（1976年10月吉林省集安县热闹乡文字沟村出土 北方文物 4：37—38）

董寿

印为银质。印文为八思巴文。

（1978年4月湖南省临澧县龙岗窖藏出土 湖南考古辑刊 2：117）

宣政院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

门国公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背款右“国公之印”，左“中书礼部造”、“至正廿二年正月”。

桑结贝帝师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两方。印文为八思巴文。

灌顶国师之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

国师之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

亦思麻儿甘万户府印

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刻款三行，右“亦思麻儿甘万户府印”，左“中书礼部造”、“延祐三年四月日”，印左侧“五十三两”四字。

（以上西藏文管会藏品 文物 9：79—84）

施南万户府镇抚司印

背款“圣旨颁降，施南万户府镇

抚司印，大夏开熙二年六月日造”。

（1975 年冬湖北省恩施市机场出土）

清江施南道总管军万户府印

（早年湖北省建始县出土）

屯田万户府印

背款“圣旨颁降，屯田万户府，大夏开熙元年四月日造”。

（早年湖北省建始县出土）

金崗安抚司印

背款“金崗安抚司印，礼部造，永乐五年四月日”，左侧款“节四十六号字”。

（1959 年湖北省咸丰县大悔寨出土）

忠孝安抚司印

背款“忠孝安抚司印，永乐五年肆月拾三日，礼部造”。

（传世品）

唐崖长官司秦关克印

（1973 年湖北省咸丰县活龙坪出土）

施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

背款“施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礼部造，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造”，左边款“位字二十三号”。

（早年湖北省利川县南坪出土）

（以上文物 5：89—91）

钦差江北恤刑关防

背款右“钦差江北恤刑关防”，左“弘光元年三月日”、“敕字四百六十四号”、“礼部造”。

吏部验封清吏司之印

左边款“弘光元年拾月日”。

（以上 1978 年 12 月浙江省宁波市南郊公社泗巷口墓葬出土 考古 10：907）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

阐教王印

（以上西藏文管会藏品 文物 9：89—94）

规秦将军之印

背款右、上、左方镌三十四字。右方两竖行“永历二年十一月奉”、“圣旨礼部造以铜代银”。正上方“永字第一千一百三十九号”，左方“规秦将军之印”。

（1979 年 4 月贵州省道真县尖锋出土 文物 8：48）

湄洲祖庙天上圣母护国庇民灵宝符篆

边款有“敕封”字样。印柄周围刻有“敕赐灵宝秦公金印”八字。

（福建省莆田县湄州妈祖庙发现 文物天地 6：62）

和硕特蒙古扎萨克印

印为银质。印文系满文和蒙文合璧。译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盟长之印”，边款“乾隆肆拾年玖月日”、“礼部造”、“乾字伍百肆拾伍号”。

管理和硕特部中旗扎萨克之印

边款“乾隆肆拾年玖月日”、“礼部造”、“乾字伍佰拾柒号”。

（以上 1982 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和硕县发现 蒙古文研究第一辑：69）

三 墓志

（附一：墓石刻铭 附二：买地券）

南北朝

北魏崔猷墓志（缺盖）

首题：“魏故员外散骑常侍清河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延昌元年（512 年）十一月廿八日葬

(1983年4月山东省临淄市窝托村墓葬出土 考古3：219)

北魏杨舒墓志（有盖）

首题："魏故镇远将军华州刺史杨君墓志铭"。

延昌二年（513年）十一月十六日卒

(1984年7月陕西省华阴县五方乡杨家城附近墓葬出土 文博2：4—11)

北周李贤墓志（有盖）

盖铭："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

天和四年（569年）卒

(1983年9月宁夏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墓葬出土 文物11：14)

北周李贤妻吴辉墓志（有盖）

盖铭："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

大统十三年（547年）九月二十六日卒

(1983年9月宁夏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墓葬出土 文物11：14)

北齐（张）道贵墓志（有盖）

无首题文

天统五年（569年）二月廿日卒

(1984年10月山东省济南市马家庄墓葬出土 文物10：48)

北齐傅华墓志（缺盖）

首题："北齐宜阳国太妃傅华墓志铭"。

墓志刊于武平七年（576年）

(1977年山东省历城县西郊公社后周大队墓葬出土 文物10：55—57)

北齐赵彦深墓志（有盖）

首题："齐故使持节都督齐衮南青诸军事齐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司空赵公墓志铭。"

武平七年（576年）六月卒

(1977年山东省历城县西郊公社后周大队墓葬出土 文物10：55—57)

隋唐五代

唐司马睿墓志（有盖）

首题："大唐太子故左内率河内司马公墓志铭并序"。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卒

(1984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洪庆乡路家湾墓葬出土 考古与文物1：44—49)

唐赵行□墓志（有盖）

盖铭："麟德□年……赵行□"。

麟德年间（664—665年）葬

(1984年2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人民银行纺织城办事处墓葬出土 文博6：86—88)

唐史道德墓志（有盖）

盖铭："大唐故人史府君之铭"。

仪凤三年（678年）葬

(1982年11月宁夏固原县王涝坝墓葬出土 文物11：21—30)

唐杨谏臣墓志（缺盖）

原文报道未详

开元二年（714年）九月葬

(1952年陕西省咸阳市边防村墓葬出土 文博4：66)

唐俾失十囊墓志（有盖）

盖题："唐故俾失特进墓志铭"。

开元廿六年（738年）十二月十三日卒

(1983年7月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枣园村东陕西省钢铁研究所内墓葬出土。 文博6：1—4)

唐严氏二子墓志

首题："唐故冯翊严氏二子权□墓志"。

乾元二年（759年）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阳彭山出土 考古2：138）

唐高耀墓志（缺盖）

生前任北庭都护府副都护。

永泰二年（766年）卒

（1984年新疆吐鲁番县火焰山下发现 北京日报1月13日）

唐徐巽墓志（有盖）

首题："唐故处士徐府君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一年（795年）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2：147）

唐周夫人（庭文）墓志

首题："唐故彭城□□周夫人墓志铭并序"。

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一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2：139）

唐□府君墓志

首题未详

元和十五年（820年）卒

（近年来江苏镇江市区西南磷肥厂出土 考古2：146）

唐李进兴墓志（有盖）

首题："唐故浙江西道处置使左随身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长庆四年（824年）三月十二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东京岘山出土 考古2：140）

唐殷（府君）墓志（有盖）

首题："□□□□大夫使持节明州诸军事守明州刺史上柱国陈郡殷府君墓志铭"。

宝历二年（826年）九月七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磷肥厂出土 考古2：141）

唐许遂忠墓志（有盖）

盖铭："大唐故许府君墓志铭"。

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八日葬

（1982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堡子村征集 考古与文物6：29—31）

唐郑夫人墓志（有盖）

首题："唐故郑夫人墓志铭"。

太和八年（834年）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跑马山出土 考古2：147）

唐王夫人墓志

首题："唐故王夫人墓志铭并序"。

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十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2：148）

唐弘夫人墓志（有盖）

首题："唐王公故弘夫人墓志铭并序"。

会昌六年（846年）七月十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阳彭山出土 考古2：142）

唐于夫人墓志

首题："唐故王府君于夫人墓志铭并序"。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三十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2：143）

唐王叔宁墓志（有盖）

首题："唐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中二年（848年）六月二十九

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阳彭山出土 考古 2：148)

唐许赞墓志

首题："唐故高阳许府君墓志铭并序"。

大中六年（852 年）七月三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 2：144)

唐王清墓志（有盖）

盖题："唐故太原王府君墓志"。

大中六年（852 年）八月十八日卒

(1952 年湖南省长沙市黄泥坑出土 考古 7：619)

唐荀夫人墓志（有盖）

首题："唐陈公故荀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大中八年（854 年）三月十一日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南李家大山出土 考古 2：148)

唐李敬实墓志（有盖）

盖题："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

大中十三年（859 年）二月二日卒

(1982 年 12 月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发现 考古与文物 6：32—36)

唐侯氏墓志

首题："唐故□川□府君夫人上谷侯氏墓志铭并序"。

咸通六年（865 年）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旧南门出土 考古 2：145)

唐李元璥墓志（有盖）

首题："朝仪大夫守济州刺史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卒年未详

(1983 年 2 月河南省偃师县偃师变电所院内出土 中原文物 1：19—22)

唐李元璥妻郑氏墓志（有盖）

盖题："大唐故郑夫人墓志铭"。

卒年未详

(1983 年 2 月河南省偃师县偃师变电所院内出土 中原文物 1：19—22)

唐吴国妃杨氏墓志

方形石上刻："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

卒年未详

(1980 年 1 月湖北省安陆县王子山出土 文物 2：83—93)

宋

宋杨承信墓志（有盖）

盖题："大宋故河中护国军节度使相国恒农郡杨公墓志"。

建隆二年（961 年）卒

(1962 年 12 月河南省新安县高家湾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 1：55—58)

宋王拱辰墓志（缺盖）

首题未详

元丰八年（1085 年）七月卒

(1976 年 3 月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南约十公里处墓葬出土 中原文物 4：16—23)

宋范惇墓志（有盖）

盖题："宋东阳范府君墓志铭"。

元符二年（1099 年）葬

(1979 年 2 月浙江省兰溪县白塔坞墓葬出土 考古 2：155)

宋范惇妻杜氏墓志

首题未详

元祐六年（1091年）葬
（1979年2月浙江省兰溪县白塔坞墓葬出土 考古2：155）

宋张二娘墓志（缺盖）
志文为砖铭。一方祝词铭文砖，六行十二句，共四十八字。
崇宁二年（1103年）二月十七日卒
（1979年4月湖北省襄阳市磨基山东坡庙台子西岗出土 江汉考古3：26—30）

宋虞公著墓志
首题："宋中奉大夫渠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使仁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虞公著……"。
宝庆二年（1226年）五月卒
（1982年7月四川省彭山县双江镇亭子坡出土，考古学报3：383—401）

宋虞公著妻留氏墓志
首题未详
庆元五年（1199年）九月三日卒
（1982年7月四川省彭山县双江镇亭子坡出土 考古学报3：383—401）

元明清

元刘义世墓志（缺盖）
无首题文
至正甲申岁（1344年）卒
（1983年11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惠家庄墓葬出土 文博4：5—9）

明周闻墓志（缺盖）
首题："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
成化庚寅年（1470年）卒
（1983年10月江苏省太仓县发现 文物6：86—87）

明周闻妻张氏墓志（缺盖）
首题："明故宜人张氏墓志铭"。
宣德壬子年（1432年）卒
（1983年10月江苏省太仓县发现 文物6：86—87）

明陆深墓志（有盖）
首题："明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陆公墓志铭"。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卒
（1969年上海市浦东区海兴路典当弄出土 考古6：544）

明刘相墓志（有盖）
首题："明故山西平顺县儒学教谕冲庵刘公墓志铭"。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卒
（1978年春河南省洛阳市郊邙山乡徐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3：32—36）

明何维柏妻劳廉墓志
首题未详
万历八年（1580年）葬
（1985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赤岗墓葬出土 文物天地4：64）

明李右川墓志（有盖）
首题："明处士李公右川墓志铭"。
万历十年（1582年）卒
（1985年3月湖北省汉川县马口镇松林村墓葬出土 江汉考古4：35—37）

清刘家镇墓志（缺盖）
首题："皇清敕授文林郎南安县学训导刘君墓志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卒
（1976年福建省福州市北门外福州市纺织印染厂基建工地出土 文物12：10）

附一：墓石刻铭

东汉崖墓纪年铭

一墓室画像一处刻铭："喜平元年十月廿▨（五）□（日）作此冢宜子孙。"字体八分书风格。另有铭"□平七□四月□"。此外尚有元代刻铭，从略。

另一墓室在马戏图前方铭"喜平十年十月二日易"，左上角另有几个小字，仅开首"子"字可识，余皆漫漶不清。

另一墓门下有一行字，铭"赵▨云门"。

另一墓墓外左方书刻两行字，上边铭一"李"字，下刻绘一条鱼，鱼下铭"黄是（氏）作此冢一门口究苦，知者谓我直，不知者怒"。字体八分书风格。

（1981 年 10 月四川省长宁县"七个洞"发现　考古与文物 5：43—53）

魏晋墓志碑

碑残缺不全，正面残留六十余字，背面残留二十字。碑文书隶书。

（1984 年夏河南省偃师县杏园村墓葬出土　考古 8：734）

魏晋墓题字

墓室左侧室南门柱左上方刻铭"为俊子孙□（孝）"。

（1983 年冬河南省南阳市独山西坡墓葬发现　中原文物 3：36—39）

唐李孟常碑

碑主篆书"大唐故右威卫大将军上柱国汉东郡开国公李公碑铭并序"。

碑文三十五行，行八十字。李安期撰文，李玄植正书。

（1964 年冬陕西省昭陵西屯村东北李孟常墓前出土　考古与文物 5：56）

隋舍利塔下铭

铭为"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以下为佛教用语，从略。

（陕西省扶风县黄堆乡凤泉寺发现　考古与文物 4：19—20）

宋陈仁璧墓碣

首题："大宋故承奉郎检校尚书膳部员外郎守泉州录事参军赐绯鱼袋赠太子洗马陈府君墓碣铭并序"。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立

（福建省莆田市城关发现　文物 5：71）

宋舍利石函

函盖正面刻铭楷书题记十六行，每行九字左右，共一百四十五字。内容是乞求福贵，乞求冥福。

（1974 年夏河南省登封县少林寺初祖庵后发现　中原文物 2：82—87）

辽《夏蕴石棺记》

篆题："故谯国府君夏公佳城石棺记"。

重熙二十年（1051 年）四月十一日迁葬

（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故城内发现　文物 5：57）

金石棺

石棺下部右为墓主后嗣题名："儿男姚吉、儿男姚□、儿男姚隐；新妇张氏、新妇杨氏、新妇樊氏"。下部左刻："贞元元年十月十四日，埋殡了棺郭，于降（绛）州稷山县。石□董博士造。价钱五百贯，后人

卖了，永劫不作人身"。

(1979年4月山西省永济县北杨出土　文物8：94)

扁鹊墓碑

墓碑楷书"广应王扁鹊之墓"，于"泰定四年（1327年）冬十月日立石"。

(1981年9月河南省汤阴县大寺台出土　中原文物3：62)

附二：买地券

唐伍松超砖地券

延载元年（694年）卒

(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区西阳彭山发现。　考古　2　146)

元买地券

地券陶质，朱书文字，总共一百七十七字，从略。

(1983年11月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墓葬出土。　考古11：1055)

四　碑刻

(附：造像刻铭)

东汉黄肠石铭

两块黄肠石的一侧均有隶书两行。一块铭"第百五十一，广三尺一，厚二尺一，长尺八寸；建宁五年二月，省椽主刘宫主"。该石左上角还刻一"索"字。另一块铭"熹平六年二月，省椽邵慎主，第一百卅，广三尺，厚尺五寸，长三尺三寸。"

(1984年5月河南省孟津县刘家井村发现。　中原文物3：81—82)

西晋题名石柱

石柱有官职、郡邑人名等25人题名。另有清人王绍羲题记一则。

(清嘉庆年间出土于河南省邓县县西二十公里汉冠军城旧址，该县城关第一小学校内存。中原文物1：76—78)

唐智该法师碑

碑文云，智该法师是贞观十三年六月八日圆寂于长安灵化寺，终年六十二岁。按此推算，应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俗姓王氏，豫州人，九岁出家。碑文云智该法师生平种种经历，从略。

(1979年3月陕西省长安县终南山天子峪口附近发现　考古与文物4：21—24)

唐《上方舍利塔记》碑

碑面上款刊"上方舍利塔记"，下款刊"大唐开元廿九年四月八日"。内容主要记述上方舍利塔的位置，塔曾遭遇大风，命京师长安温国寺承宗法师充寺主（唐庆山寺），自开元廿五年至廿九年，历五年寒暑，以豫章巨材营建而成。

(1985年5月陕西省临潼县新丰砖瓦厂出土　文博5：73)

唐石塔塔身东西题记

其铭曰："维大唐天宝九载岁次庚寅八月□十八日，浮图主孟崇仙抽减净财，敬造石浮图□级。今得成就。上为开元圣神文武皇帝陛下郡守，又为七代先亡师僧、父母普及法界苍生，同沾此福。"

(河南省林县阳台寺石塔　考古与文物2：29—32)

唐残碑

一块石上刻有一"奇"字，字大如斗。碑的左下方有一段说明文字："邑城南锦屏山玉柱峰巅有唐武后

书'锦屏奇观'碑，被雷击毁，仅存'奇'字，移此存古"。

（河南省宜阳县发现 文物天地 4：64）

后蜀广政碑

碑题为："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

广政二十二年九月六日记

（1976年四川省广元县皇泽寺石窟发现 考古与文物 1：50—54）

宋嘉祐石经

石经作篆、楷二体，刻《周礼》篇章。

（1982年10月河南省开封县陈留公社农机修造厂基建中发现 文物 1：63）

宋《大荐福寺重修塔记》

政和六年立

（陕西省西安市大南门外大荐福寺内发现 考古 1：42）

宋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华侨刻石

刻石有三块。第一块刻石六十余字："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丁□，舍□十贯□，砌路一丈。功德奉献三界诸天、十方智圣、本□上代，本命星官、见（?）生（?）□□□总法界众生，同生佛□□者。乾道三年四月日"。

第二块刻石共四十九字："日本国太宰府居住弟子张宁，舍身砌路一丈。功德奉献三界诸天、宅神香火、上代先亡、本命元辰、一切神祇等。乾道三年四月"。

第三块刻石共四十三字："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孝男张公意，舍钱十贯，明州礼拜路一丈。功德荐亡考张六郎、妣黄氏三娘，超升佛界者。"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存 文物 7：26—27）

基督教叙利亚文刻石

刻石是十四世纪从欧洲来到阿力麻里城传教的基督教徒的墓碑。

（1980年新疆阿力麻里古城旧址中发现 文物 4：50）

辽懽州西会龙山碑铭

碑身两面皆刻楷书，共二十八行，满行三十一字，全文六百七十四字。碑文铭曰"佛身感应舍利塔"。碑文主要为颂祷之词。

（1966年辽宁省阜新县大巴乡半截塔村西山岗塔基中出土 北方文物 2：37—42）

元"柳城耆老"碑

碑面正中两行十二字："柳城耆老阎公济南刘氏之墓"。

至正十八年立

（1979年7月辽宁省朝阳县四家子发现 考古 3：288）

明郭干平墓道碑

碑题："大明钦赐捕盗官郭干平墓道碑"，为明代郑和奏请皇帝钦赐回族郭干平捕盗而树立的。

（福建省惠安县发现 文物天地 5：64）

明《僧勺思吉刻礼部劄付及寺塔全图碑》

正统十四年立

（1980年陕西省西安市大南门外大荐福寺内发现 考古 1：43）

明王鹤题字

小雁塔北门楣上明王鹤题字，言塔经历二次地震。

嘉靖三十年秋月题

（陕西省西安市大南门外大

荐福寺小雁塔发现 考古1：45）

明修筑长城碑

石碑记载明代蓟州总兵官戚继光等将领戍边和指挥修筑长城的事迹。同时还发现一段用数以万计的文字砖垒砌的城墙，文字砖上分别刻有烧制长城用砖的年代（明代隆庆和万历年间），以及烧制者——各兵种名称和各部队番号。

（1984年11月北京市密云县和河北省滦平县交界处金山岭长城发现 文物天地2：64）

清摩崖刻铭

“功垂百代”摩崖刻铭

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征剿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部的中路清军征战情况。

“异域流芳”摩崖刻铭

颂扬清军剿灭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部的功绩。

“安藏碑记”摩崖刻铭

记述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之事。

“雍正六年摩崖刻铭”

简略记载雍正五年西藏发生内乱，六年清兵进藏安抚的情况。

（1984年12月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红山东侧断崖上发现 文物11：88—91）

附：造像刻铭

北魏正始二年造像碑

碑一侧上凿拱形龛，龛外两侧为发愿人姓名，中间刻魏体字五行，行三十三字，计一百六十五字。右起二行刻“正始二年秋九月己巳朔廿六日”等字。

北魏神龟二年造像碑

碑阴右上角有陈树藩题跋小字六行。碑阴下部中间有知临潼县事阮员豫识跋楷书小字十四行。碑一侧刻有姓名，其下有魏体字八行。右起第四行刻有“神龟二年七月戊寅朔七日”等字。

北魏神龟二年造像碑

从陈树藩和知临潼县事阮员豫的两段识跋得知，此碑系清嘉庆戊午年（1798年）出于今栎阳镇。

北魏正光四年造像碑

碑一侧下段有魏体字十行，后起第三行刻有“正光四年岁次癸卯七月己酉二十六日”。此碑初刻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碑之正阴两面额上有宋哲宗绍圣元年和元祐八年的纪年，当是宋人加刻的。

西魏大统六年吉长命造像碑

龛左侧是造碑人吉长命及其叔父的侧立像及姓名，右侧是他祖父和父亲的侧立像及姓名。碑阴下半刻十行魏体字，文为“大统六年七月十五日，清信士佛弟子吉长命为岳父母阖门大小，一切众生造石像一区。愿弥勒下生愿在初首常文出法□愿如是。”碑两侧分别刻吉长命祖母、母亲及三个兄弟等的侧立像及姓名。

北周佛故事造像碑

此碑没有题字。

下元三年造像碑

碑一侧下段刻小字九行，右起五行刻有“下元三年岁次甲辰□八年十五日。”此碑形制、书体、造像酷似唐代。但碑所刊“下元”年号无从查考。设若“下元”为“上元”之误刊，则有高宗李治用“上元”年号凡三年，肃宗李亨用“上元”年号仅二年；而高宗上元三年

(676 年) 岁在丙子，又与“甲辰”不合。此碑待考。

(以上陕西省临潼县发现 文物 4：15—26)

北魏正光二年伊□石造像

座前面刻有“大魏正光二年岁次辛丑夏六月五日佛子伊□上为皇帝下为父母兄弟姐妹二十三人敬造佛像一躯时时供养子子孙孙咸同斯福”。

(1983 年 8 月山东省青岛市一居民捐赠 文物 1：47)

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等造像碑

碑身第二层中部为造像记，魏碑体，二十行，满行十一字，共二百余字。

(1984 年 11 月河南省偃师县宋湾村发现 中原文物 2：21—26)

东魏武定五年张显珍造像

造像座正面刻字十六行。言“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八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沧州乐陵郡厌次县张显珍敬造玉石像一区”。造像座左面刻有六行字，右面刻有四行字，均为造像人姓名。

(1967 年山东省阳信县曹家庄群众捐赠 考古 11：1046)

北周保定元年宇文邕造释迦佛像

佛座四面刻有官职、邑地、人名，从略。

(1984 年 1 月甘肃省正宁县罗川县聂店村小学发现 考古与文物 4：109—110)

北周尉迟迥石窟造像

造像铭云：“维大周明皇帝三年岁次己卯二月十四日……秦州刺史开国公尉迟迥……敬造释迦牟尼佛一区……”。

(甘肃省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石窟 文物 5：11)

北齐天保三年铜造像

像背刻铭：“天保三年正月廿三日盖家破上愿家□聚集造像一区”。

(1981 年春江苏省徐州市侯孟村出土 考古 7：666)

北齐天统三年造像

石造像刻铭多为人名，左下为“大齐天统三年 (561 年) 年岁次丁亥十二月丁卯朔九日乙亥立”。

(河南省临汝县文化馆藏 中原文物 4：62)

北朝铜造像

永安二年造释迦像

背部刻铭：“永安二年上月五日为□亡兄弟二人□□愿意□长龛□□□”。

永安三年曹光生造释迦像

背光后及四方座周围有铭：“愿释迦闻佛一区 (躯) 永安三年五月四日佛弟 (子) 曹光生”。

永安三年造菩萨像

座前刻铭：“永安三年九月六日报愿造像一区 (躯)”。

永安三年造观世音像

座周有铭，仅能看出有“永安三年□月□日，大念父母亡 (造) 观世音像一区 (躯)，愿受苦回生，一时成佛。”

建平二年温生造释迦像

座周刻铭：“建平二年二月廿二日佛弟子温生为丘妹署女造像一区 (躯) 愿丘妹托生以□□之□”。

天平四年王早文造释迦像

座周刻铭“天平四年六月廿九日清信女佛弟子王早文为父母造佛一

区（躯）"。

兴和四年赵伏姬造观世音像

座周刻铭"兴和四年三月九日，倩（清）信士佛弟子赵伏姬，愿造观世音一区（躯），伏愿俱口之长命，先受发愿以后常与善俱"。

（以上1970年河南省郑州市西郊自来水厂窖藏出土 中原文物1：14—18）

隋造像碑

文字已多剥落，仅隐约可识"开皇九年"、"大隋应图"等字样。

（山东省临沂县出土 考古6：484）

隋铜造像

像背刻铭"开皇十八年二月八日佛弟子为佛婢为父母造像一区"。

（1981年春江苏省徐州市侯孟村出土 考古7：666）

唐鎏金造像

残床腿上刻"武德三年二月四日"。

观世音立像足床面上，正面右腿刻"吕温王造观世音像"，正中接刻"一区，为身平安，佛弟子一心"，左腿接刻"供养天宝九载造"。背面刻"作供奉人吕□奉"。

（198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邢家村窖藏出土 文物4：1—8）

唐毗卢洞石刻造像

毗卢洞共有三个窟龛：毗卢龛、观音殿石窟、庇普佛龛。毗卢龛是佛教密造像区，造像碑文为佛教用语，从略。

（四川省安岳县毗卢洞发现 文博4：1—4转9）

五 有铭砖

东汉墓有铭砖

砖铭"富贵吉祥"。

（1982年10月广东省南雄县新田村龙口山墓葬出土 考古11：990）

西晋墓有铭砖

砖上分别铭"折上"、"七十"、"太康六年作"。

（1983年12月山东省诸城县西公村墓葬发现 考古12：1115—1116）

西晋墓有铭砖

数块砖铭"太熙元年"。

（1981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东郊沙河顶永福村广州市音乐专科学校墓葬出土 考古9：800）

西晋墓有铭砖

砖铭"元康七年八月陈氏作"。

（1982年底江苏省江宁县谷里乡梁塘村墓葬发现 考古10：909）

东晋墓有铭砖

楔形砖铭"太和五八月四日作小釜"。另有一楔形砖头端铭一"江"字。

（1966年4月江苏省无锡县赤墩里东南桃花山墓葬出土 考古11：1005—1006）

北魏墓有铭砖

刻字砖两块。一块砖铭一"杨"字，另一块砖铭二个"杨"字。

（1984年7月陕西省华阴县五方乡杨家城附近墓葬发现 文博2：8—9）

南朝墓有铭砖

长方形砖铭"永明年六月"。

(1983 年 5 月湖北省大冶县茗山公社瓦窑塝村墓葬发现 江汉考古 4: 29—30)

隋墓有铭砖

砖铭皆个人姓名。有:"曹翽一"、"邓净鉴"、"康玄庆"、"段书成"。

(1982 年至 1983 年湖南省郴州市墓葬出土 考古 8: 764)

隋墓有铭砖

砖左面刻铭"大隋开皇十二年作",砖面刻铭"大隋开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为记"。

(1982 年 4 月浙江省杭州市出土 文物 4: 8)

隋墓有铭砖

砖铭"仁寿元年太岁"、"辛酉□梁贞威将军散骑侍徐释山"。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汪村墓葬出土 考古 5: 450)

隋墓有铭砖

砖分别铭"大方"、"大针"、"二针"、"三针"、"三针"。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湖西墓葬出土 考古 5: 453)

唐墓有铭砖

砖铭"武德八年……"。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汪村墓葬出土 考古 5: 456)

明有铭砖

砖铭:"武昌府提调官张勗司吏徐用德安州判官司吏玠时中应城县知县吴均美司吏张斌作匠卢福一人户贾政陈玉贤吴成"。

"武昌府德安州应城县提调官知县吴均美典廖兴造砖人贾政李兴作匠卢福洪武十年三月□总甲首陈文胜"。

(1984 年 11 月湖北省应城县黄滩镇发现 江汉考古 2: 74)

六 瓦当和瓦削文字

秦有铭瓦

筒瓦瓦面铭"左司高瓦"。

瓦当身印记"大"。

(1973 年以来陕西省秦始皇陵赵背户村出土 考古与文物 5: 38)

秦汉有铭瓦当

有铭瓦当有:"羽阳千岁"、"长生无极"、"万岁冢当"、"长生未央"。

(近几年来陕西省凤翔县秦都雍城附近采集 考古与文物 4: 3)

汉有铭瓦当

有铭瓦当有"羽阳千岁"、"汉并天下"等四十种。

(瓦当为宋云石藏品,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现由陕西省安康地区文化部门保存 考古与文物 4: 8—15)

汉有铭瓦削

板瓦和筒瓦有戳印:"结"、"居"、"锻"、"马"、"根"、"林"、"黄"、"胡"、"裹"、"赞"等印记。

瓦当有"乐未央"、"万岁"、"常乐万岁"等。

(以上 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1 月福建省崇安县城村汉城出土 文物 11: 42)

高句丽有铭瓦当

有铭瓦当有:"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孙"二十字。当为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 年)八月六日,相当于高句丽第十五代美川王廿六年。

"泰字"瓦当，中间乳突上有阳模"泰"字，连弧中有阳文"岁□戌年造瓦故记"。

"丁巳"瓦当，铭文曰："□四时兴诣□□□□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

"十谷民造"瓦当，连弧内有模印阳文"十谷民造"四字。

"己丑"瓦当，仅存"己丑"二字。

"□作"瓦当，仅存"□作"二字。

"月造记"瓦当，"[岁] □□ [年] □月造记"。

（以上吉林省集安县出土 考古 7：644—647）

七 陶器文字

周原陶文

陶器残片和瓦片上的符号及文字有几十种之多，详见原文。

（1979 年春至 1980 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和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建筑基址出土 文物 3：63—75）

东周陶壶铭

壶上铭"眾事"二字。另一壶铭"人"字，读作人、内、六。此三字古人皆作"人"字。

（1983 年 5 月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西工段洛阳市供电局综合厂墓葬出土 文物 12：21—22）

战国陶文

鼎器盖内铭"□六"。豆器盖内铭"□ •"。匜内底中铭"□六"。盘中铭"□六"。

（1984 年 4 月河南省新乡县大召营乡丁固城村墓葬出土 中原文物 2：1—10）

战国陶文

瓮腹下戳记"咸完里□"四字。瓮腹下戳记"咸郑里□"四字。盆底内戳记"咸重成枚"四字。盘口沿残存戳记"咸阳亭"三字。井圈戳印"咸阳巨戏"、"咸阳里卫"、"咸沙里冢"。量器背面刻"咸斗"二字。

（1981 年至 1982 年陕西省咸阳市长陵车站一带出土 考古与文物 3：12—24）

战国至汉陶罐铭

陶罐口沿铭"芷"字。

（1982 年 10 月陕西省临潼县芷阳遗址出土 文博 3：5—13）

秦汉栎阳城遗址陶文

两件陶罐戳印铭"栎市"。砖侧面上部戳印"栎市"。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12 月陕西省临潼县栎阳故城遗址出土 考古学报 3：370）

秦陶文

陶片上印记有"寺水"、"芷"字等。

（1980 年冬陕西省临潼县陈家沟遗址出土 考古与文物 4：19—22）

西汉陶壶铭

陶壶肩部篆书三行七字"建元四年长安高"。

（五十年代初期陕西省长安县未央乡出土，详况未明 文博 4：65）

汉陶文

陶瓮、陶罐的肩部和釜口沿有戳印"官黄"、"官径"、"乾官"、"黄"等。

（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1 月福建省崇安县城村汉城出土 文物 11：42）

汉陶罐铭

陶罐底部框内铭“太医”二字。

(1979年冬河南省孟县韩庄岭上出土 中原文物1：13)

汉陶文

陶罐口沿残片铭“非子□□”。陶盆口沿铭“大敖”，陶文中有铭“舍”字。

(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铸遗址出土)

东汉陶文

陶灶上二釜有“河三”二字戳记

(河南登封收集，均《考古学报》2：171)

已审阅
子居 10-03-13，13:52